血色中国

目　录

专访苏明：《血色中国》的见证

【大 纪元 4 月 11 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近半世纪“中国自由文学”运动规模最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4 月 10 日到 13 日在台北举行。应邀前来与会的加 拿大“中国民主阵线”分部副主席苏明先生的新书、全景式展现了 20 世纪“后文革”时代的血色历史的纪实文学作品《血色中国》新书发布会也同期举行。苏明先 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责任有必要让世人了解六四以及中共五十多年的真实面目。

当记者问起新书《血色中国》出版发行的经过时，苏明先生 很平静的告诉记者：因经历太多苦难的他，当今年初袁红冰先生告诉他，作品已经出版的消息时，他竟然都不能相信这是真的。甚至也没有感到高兴，只是用平常心 告诫他自己，完成了一件夙愿。他说：他一生对名与利没有什么要求，他要求自己就是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这也是他一生的准则。

苏明说：89‘六四’后曾被关进监狱四个月，之后逃离中国大陆来到加拿大。目前已经在加拿大生活 19 年。家庭也因此而破裂。因是中共黑名单上的人物，多年不能回中国，甚至 2000 年其父亲过世也没能回国。目前 84 岁的老妈妈生活在北京。

关 于这本纪实小说《血色中国》写作经过他披露：1997 年开始动笔，凭自己的记忆用了三年时间在 2000 年完成这部 50 多万字的初稿。书中所言都是他个人和他了解的周边人的经历、遭遇，他把他们真实的纪录下来。作品完成后，他先后曾经联系过北美 61 家出版社合作出版都没有如愿。因此该作品一直压在手里整整 8 年。两年前他遇到澳洲“自由圣火”的袁红冰先生，他表示：“我运作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就是搞这些，别人不出版，我来出版。”

于是 2008 年 1 月《血色中国》终于出版面世。他说：“当袁红冰先生告诉我书已经出版这个消息，我都没有相信是真的。我认为他是在安慰我。你问我高兴吗，

我真感觉不到高 兴。但是我自己对自己说我又做了一件事情。就像有开头必有结尾一样。我有责任有必要让世人了解六四以及中共五十多年的真实面目。”

令苏明和 袁红冰先生惊讶的是，作品一经面世，销路很好。他说：目前该书在港台销售情况相当好。香港机场把这本书作为主要推广发行销售的重点书在卖，目前情况不错。 有朋友告诉他《血色中国》盗版书目前已经在中国大陆开始销售。对此他认为虽然经济上吃点亏，但是目的达到了。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中国人去读它。

《血 色中国》为作者的回忆录。描述了“六四”以及之后苏明先生在人间炼狱中挣扎的苦难经历。先是入狱，虽时间不长，但精神和肉体上经受了惨绝人寰、为一般人所 难以想象的摧残，后在朋友帮助下经由中缅边境逃亡海外。途中历尽艰险，先到达比利时，最终在加拿大获得政治庇护的经历。该书被誉为全景式展现了 20 世纪“ 后文革”时代的血色历史的见证。

苏明 1950 年生。父亲为中国建筑工程界专家，母亲受过高等教育。1966 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作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到内蒙古哲里木盟 7 年半。1978 年，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担任过某研究所副研究员、副 所长兼党委副书记。《中国大百科全书》记录有他执笔的三篇学术文章，他在学术上坚持客观研究精神。1989 年后生活在加拿大。目前在中国民主阵线任职，同 时应邀在知名国际媒体担任嘉宾评论。

第一章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阿 生告诉我:「阿聪下落不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与阿聪一起共有五、六人，只有三个人越过边境，包括阿聪在内的三个人下落不明。六四后边防的军人接到命 令，对所有偷越国境的人可以开枪。我倒希望阿聪被打死了，总比被抓住受活罪要强。阿聪的性格你知道，即便被抓住也会激怒对方打死他……」我没有打断阿生。 一个多月前阿聪和我道别的那一幕又出现在眼前。

一 九八九年六月七号下午，大屠杀发生后第三天，我终于在同仁医院的太平间里找到了好朋友阿朋的尸体。尸体已经开始变质，散发着一种气味。同去的阿朋的妹妹一 眼就认出这是阿朋；我还不敢断定，要医生出具尸体的证件。医生回答已经详细检查过，没有任何证件，已几天无人认领，火葬场几次要拉走，都被医生拒绝，希望 再等几天会有亲属来认领。尸检结果是死于枪击，后腰部被击中七粒开花弹，整个尸体成了两截；另在头部发现一处达三寸长刀伤，但这不是死因，因为这个刀疤已 是十多年前的痕迹了。凭着这个刀疤，我才敢认定这具断成两截的尸体，正是经济学副教授、经济研究室主任，我的好朋友阿朋。

我 马上出去打电话，告诉也在寻找阿朋的阿聪。当我刚把阿朋的妹妹安慰到止住了痛哭时，阿聪闯了进来。他双眼红红的，满脸汗水和泪水混在一起，头发蓬

乱，一句 话不说，跪在阿朋的尸体边上，一只手紧握着阿朋的手，闭上双眼，将头靠在阿朋的那只冰冷僵硬的手上。大约二十分钟后，火葬场的车来了。两个工人抬出两具尸 体后，又进来抬阿朋。阿聪跪在那里，头仍靠在阿朋的手上一动不动。两个工人看着我，我只好走过去拉阿聪，可是拉不动。阿朋的妹妹也过来劝阿聪，仍没用。最 后我和两个工人只好用些力气，强把阿聪拉开。两个工人在医生的指导下，先将阿朋的上半截尸体从床上抬到担架上，然后去抬下半截，在担架上拼放好，又用布盖上，才抬出去。两个工人讲，家属不必跟着去，因为尸体太多烧不过来，至少要等一周或十天后，要家属一个星期后去火葬场问问具体烧的日期。我一手搀扶着阿朋的妹妹，一手拉着阿聪的胳膊走出了医院。

阿 聪一声不响，只是不停流泪。找到各自的自行车后，我要陪阿朋的妹妹去阿朋家，告诉阿朋太太和他们那个刚七岁的儿子这个不幸的消息。我问阿聪：「你和我一块 去好不好？」阿聪摇摇头，用颤抖的手点了一支烟，大口吸了两口后，对我说：「今天晚上，也可能明天晚上，我去找你，别出去，等着我。」

第 二天晚上，阿聪来了，精神似乎好了一些，但脸上仍是毫无表情。进了我的房间，他把门关紧了，然后坐在沙发上大口地吸烟。我知道他的脾气，所以什么也没说， 只是等待。过了一会儿，我问他要不要喝杯茶，他摇了一下手，嘴里蹦出一个字：「酒。」我说：「你心情不好，少喝点，慢慢喝。」他说：「我是来向你辞行的， 今天半夜就走。今后你我再在一起喝酒，可就不知道是什么年月了。来——干一杯，我还有事托付你。」「走，你去哪儿？在这个时候？」我说。他答：「哪儿都 行，只要离开共产党，天涯海角。只要有一块干净的土地，宁可挨饿受苦。我不想总是偷偷摸摸，不想生活在暴力和压抑下，这个世界上总有个地方可以让我干想干的事吧。」

我 明白，可是他既无护照也无签证，又正是这个时候，是极危险的。他从背包中拿出两个鼓鼓的信封，放在桌子上，并说：「我以老朋友的身份托你一件事，并嘱咐你 一件事。这是两笔钱，一笔是四千一百元，是我为天安门绝食学生捐来的，还没来得及送去，大屠杀就开始了。另一笔是我工作十年的一点个人积蓄，共二千三百 元。这两笔钱都留给你，用它去把死难人的家属孩子安排好。我的自行车在门外，后架上一个旅行包里面是我的几件好衣服，也留给你，会派上用场的。」他从口袋 里拿出自行车钥匙，放在桌上。他知道我要说什么，又向我摆摆手，表示别打断他。

他 大口吸了一口烟，接着说：「我仔细地分析过了，我相信你并没有任何的暴露，现在的形势就更需要你保护好自己，利用你的职位和权力尽力地去保护一批人。你必 须停止写文章，至少在今后几个月内不与沙龙的人来往，他们会理解你的，因为我已对他们讲过了。你是明白共产党的，这场屠杀并不是结束，接下来的就是大清 查，大逮捕，我相信不少人已经在黑名单上了。你想办法去保护他们，是很难的，但至少通知他们，让他们走，千万不要让他们落进共产党的监狱里。我说这话，你 是明白的。」我们又碰了杯，一口喝干后他站了起来。我对他说：「路上要用钱的，你多带些吧。」他摇摇头说：「这是冒险的事，成功与失败各占百分之五十，与钱没关系。我带了五百块钱，还有这个小背包，就足够了。逃出去，一切都有希望，失败了，命也没有了。」我坚持着把一个信封塞在他手里，

他推让一下，看我有些急了，才打开信封数五百块钱放进口袋。

一 九五七年，我和阿聪都七岁，在同一天被各自母亲送进同一所小学。我们长得都很高，老师把我们安排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座位上，又是同课桌，整整六年。到了十三 岁时，幸运地，我们俩考入不同的名牌中。这一分开就是五年，直到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已开始两年了，我接到他的邀请去他的新居作客。那是在和平里一所新 楼里的一套三居室的大单元里，我的父亲已经被批斗两年，房子被封，我们一家人被赶到一间十四平方米的小屋里，所以看到阿聪住进如此宽大明亮的住房，我心里真是羡慕得不得了。五年没见，说起来没个完。

我们都快十八岁了，从这次接触中才知道双方家庭的一些事。阿聪母亲再嫁，嫁给一位刚出狱不久的国民党将军。为搞好对外宣传，中共政府给这位将军这套住房、家具不说，还给他一个中国文史资料馆馆员的职位，月薪一百四十元，在那时是不低的收入。

阿 聪生父在婚后不久赴美国留学。一九四九年共产党立国，中国的大门紧紧关闭了，将阿聪父母也关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二十年互无音讯。阿聪只从照片上认识父 亲，但他父亲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儿子。母子相依为命生活了十八年，靠着他母亲在中学教书的收入生活连阿聪也说不清他母亲后来怎么会嫁给这个将军。但有一点， 我们俩是可以了解的，那就是阿聪母亲的家庭背景和在美国的阿聪生父，仅这两点就已使阿聪的母亲在运动中倒足了楣，也受够了罪。嫁给这个将军，在政治上是个 保护；政府会看在这个将军尚有可利用的价值的份上，多少会暗示一下学校方面对这位将军的新夫人不要批斗得太过分。那天的傍晚，我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前国 民党的将军，并不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好像什么杀人的恶魔，双手沾血的妖怪等等。他是一个善良、和气、谈吐高雅的渊博老人。他对我和阿聪谈到国共两党三年 内战的一些事实，那都是我们以前从没听过的。

那 一晚的谈话对我影响很大，我第一次明白了共产党的话全是宣传，实际上可信的程度连百分之一都很难达到。几个月后，我和阿聪又分手了。在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 山下乡，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所谓的伟大指示下，全国几千万的中学生被强迫送到农村去接受思想改造，我去了内蒙古，阿聪去了陕西，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 育。记得是一九七零年一月里的一天，我病了。一个人孤伶伶躺在内蒙古的那间泥土小屋的土炕上已经两天。因为离春节近了，同去的学生们都回北京与家人团聚，我为了让挨斗的父母和正在长身体的弟弟妹妹吃些营养，宁愿把辛苦了一年挣的那可怜的几十元寄回家去，不想花在路费上。外面冰天雪地，里面是冰房冷屋，我迷迷糊糊躺了两天，没有人知道。

终于，有一个老乡来敲门，但是我弱得连回答的力气都没有。

这 个老乡没有离去，推门进来了才发现我病着。他跑出去叫了不少人来，大家七嘴八舌出主意，想办法，有人想送我去医院，但在这种天气，我又病得这个样子，有人 担心我会死在半路上。有提议去请医生来，但马上被否定，医生不会在这种天气里走十几里路出诊。人们正商量着，村里的几个女人回来了，她们不

参加男人们的争 论，马上动手用木柴烧热了土炕，又提水烧开了让我喝。终于有人想出主意：让我吸几口大麻；据说可以马上减轻病痛的。这个主意马上得到赞成，立刻有人把大麻 掺在捻碎的烟叶里，再用纸把这种混合物卷成烟卷。村里人人吸大麻，没人认为不好，反认为大麻是医治百病的仙丹妙药。当一个村民卷好大麻点燃放到我嘴上时， 我紧闭上嘴。好心的村民们对我的拒绝显然不解，同时有些不满。我没有力气解释，以微弱的声音请他们拿些东西让我吃。我不懂医学，但直觉觉得我年轻有抵抗 力，只要吃些东西，睡上一觉，隔天就会好的。村民们拿来粗糙食物，我费力地吃了一些后，筋疲力尽地躺下，不久就睡着了。

不 知睡了多久，我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叫醒。我睁开眼，看到煤油灯已经点燃，窗外一片漆黑。迷蒙中彷佛看到阿聪坐在炕边上看着我。我拼命睁大了眼看着，那高大的 身材，说话的声音和那张永远带笑的脸，真的是阿聪。我一把拉住他的手，高兴得说不出话来。几个伴随阿聪进来的村民忙了起来，我请求他们生火烧暖屋子，烧热 水，准备饭。阿聪凑近了我说：「我整整两天两夜才来到这里，进了村子后，就打听你住在哪儿。他们领我来了，又告诉我你正在病着，我对他们说没关系，只要他 看到我病马上就好了。」他移动油灯靠近我的脸，又说：「你的确病得不轻，我来得正是时候，我可以照顾你。」

我 问他怎么会来这里？他开玩笑说：「知道你病了，我特地从大西北赶来东北，你说我够不够朋友？」可能是睡了一觉的原因，我的精神好一些，但仍是起不来，只是 半坐起，用头靠在墙上，问热水烧好没有；又告诉阿聪哪个盆洗脸，哪个盆洗脚，肥皂在哪儿，用哪块毛巾。又告诉村民做饭，问他们知不知道谁家有肉有鸡蛋，我 给了他们钱，让他们快去买来做饭。几个村民忙成一团，刚才还是冰冷漆黑的小屋，现在变得温暖热闹了。阿聪用热水烫着脚，一边告诉着他一路上的经历，不断开 着玩笑。

村 民们端上了饭菜时，看得出来阿聪是饿了，马上自己盛上一碗高粱米饭，大口吃了起来。我仍是半躺着，看着他吃饭，一边一再地让他多吃。转眼一碗饭吃完了，他 又盛上第二碗时才发现我正在看着他，他马上用另一只碗盛上饭又放上菜，推到我面前；我摇摇头，说我实在吃不下东西。他笑一下，对我说：「如果现在我揍你一 顿的话，你除了老老实实的挨揍外，是没有其它办法的，对不？别让我生气，陪我吃点，别等我真的揍上你时，你再求饶可就晚了。」我真的笑了出来，端起那碗饭 勉强吃一口，费力咀嚼着。

他 向我碗里添上菜，一边又催促着我多吃，直到三碗饭下了肚，汗也出来了，他才放下碗。几个村民带着满意的神情走了。阿聪锁上了门躺了下来，开始告诉我为什么 在这严冬时节，他不惜跋涉两千多公里来找我。原来，阿聪所在的那个知识青年小组里有一个学生，因为家庭出身属于红五类，于是处处想出人头地，以此捞取所谓 的政治资本。如此当然就要选择一个打击的对象，并彻底击垮他，才可以表现出自己是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又是多么的忠于党和伟大的领袖。于是加入共青 团或共产党，有了这个政治资本后，才可能在任何出现的脱离农村或返城的机会中捷足先登。而阿聪则成了这个人的选择，也就是被打击的对象。阿聪无论是生父、 继父或是母亲都脱不开一个黑五类的家庭背景，仅这一点就足以决定了阿聪的必败命运。

阿 聪从小受母亲的影响，爱拉小提琴；十几年了，当然造诣匪浅。初到这个村子的两个月后，他的这一特长即被发现并利用。当地政府把他选去参加所谓的毛泽东思想 宣传队，每天的工作量就是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去演唱演奏革命的歌曲。尽管那是与贝多芬、莫扎特风马牛不相及的音乐，但至少脱离了农村的艰苦繁重的体力 劳动，多少也有一点点的优厚待遇，绝对算是个上上等的工作，引起同去学生们的羡慕，同时也引起了嫉恨。

运 动正在进行，高潮一个接一个，加上当地村民们的愚昧无知，他终于被赶出宣传队。当他再回到村子里时，情形已完全不同了。村民们不再认为他是个才华横溢的年 轻学生，而认为他是个阶级敌人、反动分子。第二天即命令他与村里的地主、反革命分子们一起劳动，去做最脏最累的工作，同时还要受到监视和辱骂。阿聪高大健 壮，艰苦的劳动他不怕，但生活在孤立与歧视中确实使他受不了；没有人与他说话，每个人都疏远他，甚至连几岁的小孩子都指着他骂反动派、狗崽子。阿聪受不了 想离开那里，又无处可去。他曾回北京躲避，时间不长就被街道委员会催逼着回去抓革命、促生产。终于他想起我。

能与一个多年知己的朋友在一起，无论多苦，在精神上总有一个可以说得来的伙伴。说干就干，这也是阿聪的一个特点。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和我一道去说服当地政府，允许阿聪调来和我同在一村。我们经过了四天的奔波，与各级政府的接触后，所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不可以。

与 阿聪再次见面，是一九七八年初春在大学校园里。那天我正走出教室，看到一个人远远向我走来。我一眼就认出来，那个人正是八年音信全无的阿聪。我兴奋地向他 跑去，高声大喊着：「阿聪，阿聪，是我，老兄，你还认识我吗？」来到他的面前，我紧紧抱住他的双肩，兴奋地笑着。一丝笑容在他脸上一闪而过，继而挣开我的 拥抱，推开了我，面无表情，声音干冷地对我说：「几个月前，我就已经知道你也在这里，一直没找你……」我问：「为什么？我是现在才知道你也在这里的。为什 么不来找我？」他仍是那副神情，冷冷地说：「不为什么，就是不想见人，更不想见老同学、老朋友。」我正要接着问，突然发现他的脸那么冷酷，我从来没有见过 他这种表情。

我 有些吃惊，只听他一点儿也不客气的对我说：「别问那么多，听我说完好不好！我知道你父亲仍在挨斗，经济上拮据，你每个周末都要去做工，我是看在你我老朋友 的份上，才来找你并准备帮你一下。」说到这里，他从口袋里拿出二十元钱，送到我手里。「这是二十元钱，你拿去贴补生活，以后我会每个月帮你十块钱或十五块 钱的。你就不要再偷着出去做工，让学校发现，你会被开除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感到委屈，几乎是哀求地对他说：「你究竟怎么了，老兄，你全变了，变得 让我都怕你了。告诉我，这八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否则你不会是这样的。我是你的老朋友，告诉我实话吧。」一个冷酷的笑在他脸上出现，自 言自语说：「什么事都可以发生，每个人都在变。」

他 伸出手把那两张钞票一下子塞进了我的胸前的口袋里，又顺手在我肩上拍了一下，两眼看着我，我努力做出微笑，又握了一下他的手，算是接受了他的帮助。

他用干 巴巴的声音对我说：「我在文学系，攻读西方古典文艺，不要来找我，我会找你的。」从那以后，我们每个月见一次面，都是他来找我，每个月都给我十块钱，也有 几次给了我十五块钱，从没间断，也没延误过。我从不敢说谢，也不敢有谢意的表示。我试着去谈他、问他，但不是没有回答，就是被他严厉打断。他已成一个怪 人，怪得让人无法接近了。

所 幸同年年底，我的父亲平反了，官复原职，补发了十二年的全部工资。第三天，我终于找到了阿聪，他给了我一个难看的冷脸，责问我为什么来找他。我没理他，兴 奋地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显然，他也为我高兴，连说了两遍：「这就好了！」我趁机赶紧对他说：「让我们出去庆祝一下，好不好？我请客。」这顿饭，我吃得开 心极了，阿聪脸上也出现了几次微笑，并不时地说话。令我惊奇的是，真没想到阿聪的酒量竟然这么大，不到一小时，一瓶六十度上等白酒就让我们喝光了。我又要 了一瓶，正要打开盖子时阿聪止住我，对我说：「今天我吃得很舒服，也喝得很痛快。我还能喝，你也还能喝，但这种酒太贵了，适可而止吧。让我把这瓶酒带回 家，留给我慢慢享受吧。」我高兴极了。刹那间感到过去的那个阿聪又回来了。饭后，我们都点上了烟。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阿聪，里面有我母亲放的二百 元钱。阿聪没有拒绝，也没有生气，一句话没说，拿起信封装进口袋。我松了一口气，端起茶杯正要喝时，他说话了：「我母亲四年前就死了，我的继父也死了六年 了。他们总共给我留下不到两千块钱。你以为我阔气？进大学前两年，根本没工作，就靠着这笔钱生活两年。大学招生，我千算万算地算过这笔钱可以使我读到毕 业。」

好 的时光总是过得那么快，转眼到了一九八一年春天。我们都毕业了，也都分配了工作，幸运的是，我们都被分配在北京工作。说实话，在毕业前我确实为了阿聪的工 作分配一事而着急发愁。四年了，他同系同班同学们几乎没有一个人喜欢阿聪。他不参加社交活动，也从不与人打招呼或交谈，系里对阿聪的评语也不好。最令我不 可理解的是，他的成绩也不好，处于中等偏下，但阿聪读书极其刻苦，每周总有两三个晚上是彻夜不眠地待在图书馆读书的。不管怎么说，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注定 阿聪毕业后的分配会是那些边远省份，从事根本与所学无关的工作。

我 曾去请求阿聪的指导教授，请问他能不能在阿聪的分配一事上给予照顾。这位教授是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在听了我详细叙述以前的阿聪和现在的阿聪后，老教授十 分冷静地说：「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大后遗症之一，就是使得千千万万的人患有心理和神经病。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阿聪的内心深处一定有着一个极大的痛 苦或刺激改变了他，他又不说出来，这是最糟的事。但愿时间可以医治他，我也会尽力在他分配一事上帮忙的。但是你作为他的朋友，要答应我一件事，那就是永远 不要放弃，不要疏远他，不要孤立他，想办法能使他主动对你倾诉出一切，只要能说出来，以前的阿聪就会回来。」

或许是因为大学关闭了十一年后的首批毕业生，或许是那位老教 授确实努力帮助，阿聪所被分配到的工作极其令人满意。我不但放心，更为他而高兴，而阿聪本人好像无所谓一样。当然了，他是根本不知道我曾去请求他的指导教 授。离开学校后，分手又是五年。尽管我们同在一个城市，但各自忙各自的事，加上我

们各自的工作性质是要经常外出考察的，每年中总要有一半的时间是不在北 京，也造成了我与阿聪之间联系上的困难。这五年中，我与阿聪只见过一面。说起来也可怜，我们的见面是在火车站，我刚结束考察从湖南回来正要走出车站，就见到阿聪匆匆正要走进站，他要赶去上海参加一个研讨会，仅谈了三、四分钟他就去赶火车了。

他从来不给我打电话，偶尔我给他打电话，也都只是我说他听。

几 次在过年前约他来我家一起过年，他都拒绝，不想见人。直到一九八六年，我刚刚结束在西藏的考察工作回到北京，出乎我意料地接到阿聪的电话，他说他要见我， 有事面谈。放下电话，半个小时后，我就按照他在电话中给我的地址到了他的家。这是一座旧的居民楼，似乎是五十年代建造的。我爬上六楼敲了一家的房门，开门 的是阿聪。

快十年了，我第一次才知道他住在这里的。这是一套一居室的公寓，屋里很干净，布置得也好，看到了靠墙的是一张单人床，我笑着问阿聪：「为什么还不结婚？耍光棍有瘾？」

他 没理我，扔给我一支烟就跑进厨房。我欣赏着挂在墙壁上的几幅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油画。不久，他端着两个盘子出来，放在桌上。阿聪是不会做饭的，盘子里的东 西都是都是现成的鸡肉、熏鱼之类的熟菜。我问他今天是什么日子，是不是有喜事，他又没理我，只顾向桌子上摆放碗筷、酒杯，转眼一切就绪，他才说：「坐过 来，我们边吃边喝，我有事求你。」他不断地让酒让菜，又问我一些西藏风土人情，慢慢地话题开始转到他的事情上来。他直截了当告诉我，在他工作的单位几乎人 人恨他，他的上司对他不满，尤其前不久他从一本英国的学术刊物上翻译了一篇文章，签上他的名字，结果被发现了，惹了麻烦，名声上也受影响，自己感到实在待 不下去，想换个单位。他希望我帮他，去说服我的上司接受他到我所在的研究所工作。

我 震惊了。我的朋友阿聪，竟然做出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事？不可思议。他继续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不管你怎么看我，我不在乎，我在干我自己的事，我没时间 去研究什么西方古典文艺的，告诉你实话，如果我继续留下工作的话，我还会这么做。」我对他说：「对不起了，你的这个忙我帮不了，我很看重我的名声。」「坐 下！」

他 用了更高的声音对我说：「你以为我整天不务正业吗？你以为只有你工作的最辛苦吗？告诉你实话，我比你辛苦十倍，你知道那年在内蒙古你我分手后我受到了什么 待遇吗？你以为一个人就那么容易忘掉他所遭受的一切？……」他激动了，一口喝干了酒，又给自己点燃一支烟，大口吸着。「老兄，别激动，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 么事。」他猛吸了几口烟，一次喝干了那杯酒后，才开始用他那生硬的声调，告诉我自一九七零年我们分手后的事。

当 时，离过年已经很近，所以阿聪离开我后就直接回到北京与母亲和继父一起过年。年后一个月左右，他又回到了陕北的那个村子。尽管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去

和村民、 同组的同学们搞好关系，但是一顶反动分子阶级敌人的帽子已戴在了他的头上。情形不但没有一点好转，反而一步比一步坏。终于有一天，一位干部将一口口水吐在 阿聪的脸上，又命令阿聪不准擦掉。阿聪忍受不住，当场拉着这个干部要去上级那里讲理，这个干部当即大喊：「阶级敌人要造反了。」又马上召集了一些村民和学 生，在他的指挥下把阿聪打了一顿，直打到阿聪口鼻流血，两处肋骨骨折，疼得倒在地上晕过去才停止。等到阿聪苏醒后，既被两个由那个干部派来的村民押解着去干活，不准去医院，更不准休息。

从 那时开始，阿聪就像犯人一样，每天清晨即被两个村民叫醒，在他们的监视和打骂下开始一天的劳动，直到天黑后再由这两个村民押送回学生宿舍。同组的学生们则 开始执行对阿聪的看管，阿聪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报告到那个干部那里；如果阿聪稍有不慎，或说错话，招致而来的则是一顿毒打。所有阿聪的来信都被拆开看，阿聪 写给父母朋友的信也必须先由干部查看，认为没问题了才允许装进信封发出。同时阿聪也不被允许离开这个村子。整整一年半，阿聪过着苦役犯般的日子。当然他是 不会这样忍受的，他曾精心的策划了一次逃亡，但仅六个多小时后就被抓了回来，吊在了村中的一棵大树上，当众被皮带抽打六十多下。

两 个月的奔波，根本无人理睬，毫无反应，正在阿聪走投无路，束手无策时，一个更大的不幸发生了。不知是哪级政府的哪个部门将阿聪的申诉材料转给了陕西的那个 阿聪所在的县政府，而阿聪更是不明白的是这封信又怎么会让那个学生看到了。于是那个学生立即赶回北京，与他的一个当警察的亲属密谋后，安排一个在街头偶然 相遇的场面，然后对阿聪进行百般侮辱骂，终于激怒阿聪，不顾一切挥拳向这个人打去，几乎是同一时刻，埋伏的几个警察跑了出来抓住阿聪，没有任何的司法程 序，就把阿聪关进了一间监狱达两年之久，直到阿聪的母亲去世后的第四天，才被释放出来。

他一口喝干杯中的酒，又倒满，又一口喝干，然后点燃另一支烟，反问我：「你以为仅仅这些就能把我整个人变成这个样子吗？」

我 说：「你也知道你变了，变得如此古怪，甚至不通人情。可是你为什么不控制呢？你的指导教授对我讲过，只要你能说出来，你就会好了一半，然后再读几本心理学 的书，你会调理好的。」阿聪突然转向我，两眼红红的，冒着仇恨和凶狠的光，一字一字地说：「你以为，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一本心理学的书可以医治一个从共产党 监狱里活着出来的人吗？」

足 足有一分钟他才平静下来，似乎拿出了最大的勇气，开始告诉我他在监狱里的遭遇。那个监狱里上到监狱长，下到普通看守，几乎每个人都是杀人狂、虐待狂、嗜血 鬼和性变态者，正是这些恶魔们掌握着监狱里三百多名未经审判的囚徒的命运，把囚徒们的嘶叫声、求饶声、哭喊声当做是流行歌曲一样来欣赏。已是一无所有，又 失去了那点可怜的自由的囚犯们，也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年轻力壮的囚犯则时常被捆绑起来，强迫过量地抽血，抽骨髓，有的更达八次之多。八个年轻的囚徒被 无缘无故地公开枪决后，尸体立即被抬了出去，由等在外面的医生立即取出尸体的内脏，然后送到不知什么地方去，尸体则立即被火化了，事后政府更派人向死者家属收取六毛三分钱的子弹费。

监 狱当局对待犯人不仅是暴力相向，在他们身上留下永久性的伤害，而且还要在精神上去彻底摧毁囚徒，迫使囚徒们承认他们不是人，是人下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侮 辱，每个被拉出去受折磨的人都被剥光衣服，一丝不挂地受到拷打。有时让犯人自己手淫，或做出下流的性动作，以供那群畜生们取乐，或作为一个交换条件暂时停 止折磨。他们取笑犯人的性器官，甚至对性器官用刑，最常用的是对男性性器官使用电流刺激性器官胀大，狂喷，或是在不使用任何麻醉药的情况下强行切除，据说 可以制药。阿聪几乎受尽了各种各样的折磨，在身体上也留下了永久伤痛。他出狱至今已十多年了，从不去游泳，不愿意让人看到他浑身的伤疤。「士可杀，不可 辱。」阿聪说：「我大约想自杀想过一百次了。但我想到，司马迁受辱后，坚持写完了《史记》，所以我放弃了死的想法。我必须活着，我要让人们、让全世界都知 道这个政权的野蛮、残酷，甚至比奴隶制度还要野蛮一百倍、一千倍的，这是我活着的唯一目的。」他又告诉我，上大学之前两年，他一直在自修法律，读大学后他 自修社会学、生物学和西方近代史，并且精通英文和西班牙文。从大学开始，他就已从事秘密的调查工作了。这样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他的学习如此刻苦，而考试分数 都如此低。

那 一天，我在他家待到将近午夜。阿聪告诉我他已经为一个秘密沙龙写文章达四年之久。说着，他拉我去了厨房，从碗柜的背后取出了一个塑料包，里面是他这些年来 所做的调查材料，足足有两百多页。我一边翻看着这些数据和数据，一边对他说：「你刚才还告诫我千万不要落进共产党的监狱，可是现在你干的事，万一出点事是 又会进监狱的。」他很自信地对我说：「我随身带着一种自己配的药，吃下去后二十分钟之内就死了。你以为我傻？共产党口口声声说这个政权是他们的命换来的， 当然想推翻他们也得用命。」说到这里，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从一个夹层中拿出一个小小的塑料包，打开给我看，那是一小粒灰黑色的小药丸。他马上又包好，小 心地放回钱包。阿聪坚持要送我回家。他背着大书包，里面那包他摘录的资料，在我一再请求下他才同意让我带回家去看，也因此他坚持要送我。路上静得可怕，半 夜又很冷，我们把车蹬的很快。时间不久，就来到我家门口，阿聪把那包资料给我，低声说：「用脑子记，不要写在纸上。」

我 的上司、副所长、哲学家阿成，大我五岁，一起工作已经一年多，我们还从来没有说过话。偶尔几次在楼梯或走廊上碰面，也仅是互相点点头，笑一笑而已。听说这 个人是个十分复杂的人，但工作能力极强。他上任短短的两年，就建立了一套新的管理体系，不但大大推动研究工作的进展，而且很得人心。由于与他少有接触，所 以我对他没有特别看法。只是心里隐隐地感到一个搞哲学的人，心理和思维上一定是很怪的，尽管我的这个想法根本没理由，但我仍相信我是对的。与他问候寒暄了 之后，我直接向他提到阿聪， 做一个大概介绍后，直接请求他允许把阿聪调来这里工作。我就所里的特点和问题解释了虽然阿聪的专业并不符合我们的研究专案，但是阿聪写文章是一流的，并例 举了所里的几位研究人员，尽管一再地出成果，但在写论文时往往要费上许多时间，而且文章中仍然出现不少的毛病，又要费上许多时间去修改。同时提到阿聪自修 了法律，也可以担任法律顾问的工作，同时阿聪精通英语和西班牙语，更可以帮助专业人员翻译文章。

看 来这最后的一点打动了他。一个月后人事处通知我，有一个叫阿聪的新人近几天就会来我们研究室报到了，我吓了一跳，几乎不相信我的耳朵。阿聪仍是那个样子， 同事们也仍都把他当成是个怪人。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我有意地把室里的几份积压的论文草稿、和几份要排队等候数据室翻译的英文的资料给了阿聪。几个月后， 人们开始佩服阿聪的才学了。一手漂亮的文章，精确的翻译，改变了人们对阿聪的看法。当然，阿聪没有改变，人们仍不敢与他接触交谈，甚至有些怕他，即使是那 些得到了阿聪帮助的人，也不敢去对他表示谢意的，因为得到的通常是一个连头也不抬的哼声。我时常有意无意的在同事们中间替阿聪辩解；阿聪没有得罪任何人， 同事们也多少看在我的面子上没有与他作对，天下太平，我也终于把阿聪那份资料读完。

阿 聪以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学者的严谨态度，在这份资料中列出了一连串的事实和数字，其中有些我曾有过耳闻，大部分的事项令我大吃一惊。到在一九四九年，中国人 口是四点七亿，知识分子五百万，三十八年后人口达到十二点一亿，知识分子总数不足一千万，其中百万在监狱。近三亿人口是百分之百文盲，另有三亿人口的文化 程度仅是小学一、二年级。在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的总耕地面积是十六亿亩，到了一九八七年，耕地下降到不止十三亿亩。一九八六年，中国大陆的监狱人口达到 一千万，其中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囚犯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判决，相当一批数量的人已经被关了二十年，从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更有一大批囚犯是为了顶数字， 而在历次的所谓严厉打击的运动中被枪决，目的是为了取得他们的内脏。

一 九八四年，黄河的一次大水灾后，一位十九岁的姑娘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家园，孤身一人流落到河南省的开封市，得不到政府的帮助又找不到工作。在第二天的夜 晚，这个女孩子被强奸了，当那个暴徒发泄完了转身要走时，女孩子请求他给她一毛钱，因为她已经两天没吃东西，想要一毛钱买个馒头充饥。这个人扔给她一块 钱，从此以后女孩子做了妓女。她接到第九名客人时被捕，正赶上严厉打击运动，以败坏社会风气的罪名被枪决。

文 化大革命运动中，广西、云南两省的一些地区的干部们为了响应毛泽东的消灭阶级敌人的号召，竟然带领当地民众，把所谓的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当众开膛，取出内 脏，大家分而食之，超过八百人被吃掉。这些吃人的生番们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十年后，仍担任着当地的书记、队长、主任的，无一人受到法律制裁。同样在文革 中，离北京仅几十公里的三河县的一个村庄，一夜之间六十多人被活埋，理由是这些人出身地主或富农家庭，属于狗崽子。一九六零年大饥荒，山东省沂蒙山区的一 个村子两百一十五村民中活活被饿死了一百八十三个人，离这个村子不足五百米远就是一个国家粮库，粮库的官员眼看人们一个一个饿死，而不做任何事。中共元老王震听说此事后仅说了一句话：「人民宁可饿死，也不去抢国家粮库，我们的人民多好！」

在 宁夏、甘肃两省，有几个县见不到二十岁以上的男人，这几个县居住着回族，由于共产党的所谓民族政策激发了民族矛盾，发展成了反抗，政府调来军队，对这几个 县进行了血腥屠杀，四十万人遇难。在七零年代，发生在云南塔山县的事就是一例。县民与政府间的矛盾，被政府调来的一个连的军队激化，人们使用

了毛泽东的游 击战术，分化瓦解了这支部队，政府马上又调来了一个团的兵力，并动用了大炮和坦克，几天后塔山县变成了无人区，将近二十万人几乎全部死亡。黑龙江省的一些 军队的高级军官，利用职权强奸被派到军队的城市女学生，资料中有名有姓地提到这些军官，有的强奸了一百四十个女学生，有的强奸了一百二十二个，有的强奸了 一百一十七个，有的强奸了一百零四个。由于受害人太多，受害人的父母们纷纷上诉，中共感到遮掩不住，派人调查属实后上报给中央高层，竟然无人过问和处理。 最后，周恩来坚持了一下，将一名强奸了八十五名女学生的师长枪毙了以平民愤，其它的高级军官们仍逍遥法外。

一 九七一年，中共在内蒙古地区搞了一场清查内蒙古人民党的运动，仅八个月不到的时间，二十八万人惨死于这场运动，百余万人被关进了各级政府设立的临时监狱和 私刑室，受到了极其残酷的折磨，造成了终身的残疾。尤其是女人们受到了使人难以置信的折磨，被强奸和轮奸，用马鞭抽打阴部，被用野猪鬃刺乳头，被用铁夹子 夹乳头，甚至被割掉一边或两边乳房的，更有许许多多的女人是被烧烫的铁棍捅进，造成终身不孕。

一 九七九年，山西省平鲁县有一个政府经营的大煤矿，党委书记无视安全，强迫矿工吓到已是极危险的矿井里工作，仅几个小时后，矿井坍方，两百八十五名矿工无一 生还，由于这位书记与省政府一位官员有亲戚关系，事发后不但不负任何责任，反而立即被调到另一个大矿做党委书记。阿聪的资料中还提到共产党在井冈山、大别 山、沂蒙山打游击时，与占山为王的土匪无异，他们抢劫过往的客商，打劫富户，霸占女人，甚至绑票，当拿到赎金后又撕票。

从 共产党的这些过去的所为，当然就不难解释一九六六年那场全国性的大抄家运动，更不难理解毛泽东赞扬红卫兵抄家的行为是「好得很」了。资料中提到毛泽东在与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谈话中，竟然说：「我们得感谢你们日本人的，没有你们的侵华，我们还夺不下这个江山呢。」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十六岁的我在北京大学看大 字报，当我看到一篇文章上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知识越多越反动」时，那是我第一次大吃一惊，后来惊吃得太多，也就不惊了。我甚至想到几年前几位史学界的老 前辈们提到，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北部一百零四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毛泽东及其一伙卖给苏联的斯大林，以换取支持，夺取政权。

在得到阿聪的同意后，我计划引用这些材料写成一篇文章。但两个月后，阿聪就向我要回这些材料。我对他说：「不知你能不能够听我一句话？老兄，这份材料必须销毁。我担心你的安全，何况你多少次告诫我，千万不能进监狱……」他说：「我不怕死!」

当晚，他去我家取走了那份材料。

第二章 同床而眠 没有性生活

我和我太太之间的关系，阿学知道得最清楚。他曾几次调解、劝说过我和太 太之间的不和，并请我们夫妇两次去他家看成人录像带。他是理解的，我们属于一代人，传统的东西在我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结了婚，就不能提出离婚。即使夫妻 不和，却从不公开吵闹，怕被人听到要笑话的。经常，一句话不投机就导致夫妻间几月不说话，无论是父母或朋友来，绝看不出我们是冷战中。记得婚后仅三个月， 为了一件小事，导致我们将近一年不说话。在僵局中，我们也是同床而眠，没有性生活。

家 庭背景的不同，教育层次上的差别，加上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不同经历，几乎使我们之间无法、也不知道该如何交流。我太太那方面，我可以理解她的矛盾。一方面她 羡慕并且也向往着我们这种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及生活方式；但在另一方面，受了共产党三十多年的宣传的影响，习惯把知识分子当作敌人来，或者至少当作怪人。

我 也是矛盾的。她的家庭背景，正是共产党所宠爱的那种所谓「红五类」，几代人除了偶尔看看报纸之外从来不读书；尽管如此，那种被灌输的盲目阶级优越感强烈存 在着。在文革中，她的所有亲戚几乎都是叱咤一时的人物，至少都是红卫兵。抄家、斗人不用说，至于打过人没有，却都矢口否认。但是，一场十年半的文革结束 了，却没有一个人掏到任何好处；忠于毛泽东二十几年，没有一个人被提议加入共产党，更没有一个人被提拔为干部。在上山下乡的运动中，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子女 被强迫送到农村，我的太太就在内蒙古的农场待了八年，最后还是伪造病历，谎称有病，花钱行贿才重回北京。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对共产党也不满的。从农村回来 后，年龄不饶人，又急于结婚成家，似乎已经顾不上多考虑，马上就进入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传统轨道上。

在我离大学毕业还差一年时，就已经被双方父母和我太 太催逼着的毫无退路，只好同意结婚。看着父母恳求的目光，我理解，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文革，他们急于要把生活恢复正常，大有要把文革耽误的十年夺回来的意 思。我投降了，只是微弱地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先不要小孩。婚后，她上班，我上学，晚上是唯一的时间我们可以在一起的，但也不过两三个小时而已。又要做家 务、做饭。饭后，我必须学习、看书、写东西，直到半夜；而她则要早睡，一天的工作使她疲劳，第二天又要起得很早。即使如此，我们之间也往往因为一句话而发 生冷战。我曾试图教她读一些书，可她并不喜欢。她醉心的那些宣传式电影和流行歌曲，又实在令我倒胃口。我试着带她去参加音乐会，可她并不知道贝多芬、肖邦为何许人也，看着太太那无表情的脸，我知道她在受罪。我仍努力地创造理由去爱她。

我 几次与阿学谈到这事，阿学的看法是：结婚时我们都已是三十岁的人了，那种激情和性的欲望已经在长期的压抑和自我控制中变得淡薄，或不正常了。他建议让我们 从性生活的改善上开始去协调夫妇关系。他不顾冒着两年入狱惩罚的风险，搞来成人录像带，把我们夫妇反锁在屋里看，但效果实在不大。结婚一年

后，为了准备毕 业论文，我得到了个机会与几位教授去贵州省考察三个月。我兴奋极了，告诉父母，并开始作准备。我的父亲，这个曾经受到西方教育，具有西方开化意识的父亲竟 然对我下命令似地说：「你的太太不怀孕，你就不要走，我也可以去找你的教授谈，取消你的这次考察，我已经六十 多岁了，我等不了，我要见第三代人。」听了父亲的话，我大吃一惊。我马上解释，我尚未毕业，正在一个忙碌的时期。我又耐心讲述中国的人口及经济分析，如果 经济不能增长一倍的话，是根本养不活三十年后的十六亿人口的。共产党不懂，也没有能力搞经济；下一代人将面临着教育危机、居住危机、甚至水资源危机。在这 种环境下，基于负责的精神，最好不要小孩。

一 番的解说，招来的是父母的大怒和指责。母亲甚至哭着说：「这可能是在你一生中，我们做父母的求你的唯一一件事的。」我不想伤父母的心，与太太商量，太太 说：「嫁给你一年了，我几乎天天都被别人问是否怀孕了。近几个月，问的人少了，可是流言风语也传出来了，说或是你，或是我，准有一个有病的。所以不能怀 孕，我父母也逼问过我多少次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们才好。」我找到阿学，向他讲述这一切。他说：「你的压力比我大，多了双方父母的压力，我不存在这一 层的压力。但仅是社会舆论和太太 的压力，我就不得不投降。我的儿子已经五个月，十分可爱，我已经在为他的将来担心了；你我都明白，在我儿子到了你我这个年龄时将面临的是什么。没有人听， 更没人愿意知道，怎么办？投降吧，只有当我们老了时，不要替儿女去选择生活就行了，做个开明的父母吧。」我没话说了。

阿学是个坚强的人，尤其在学术理论上，凡是他认为是对的东西，他可以不吃不喝不睡觉地和你整天整夜的辩论，直到你投降缴械为止。在这件事上，他竟然这样劝我，我挣扎着说了一句：「为什么我们总要听别人的？私生活都要受人安排。我算什么？」

那 天，我的教授出人意外地邀我去他家喝茶。教授夫人语重心长地劝我要多多体谅父母的心，又哭诉着他们失去儿子的痛苦。一九六九年初中苏边境的珍宝岛一战，教 授的儿子当时正在东北农村，被征入伍，未经任何训练就上了火线，在一次双方的炮击中阵亡。一年后，教授夫妇才接到政府寄来的阵亡通知书和两百元的抚恤金。 当时教授夫妇都在挨斗，又承受丧子的打击，几乎使他们失去了生活的勇气。教授对我说：「你的父母来过我这里，我们很谈得来，他们要我劝说你改变你的看法，给他们的晚年生活中一些乐趣和快乐吧。我们和你的父母是一样的，都是经历了九死一生的人，不要再伤他们的心。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或许阿学是对的，投降吧！」

回 家后，我与太太一起翻书，计算可以怀孕的日子。一个多月过去了，太太的例假没有再来，陪太太去医院检查，证实怀孕。我告诉父母，他们又惊又喜，甚至连名字 都准备好了。当时我忙于收拾行装，几天后就去了贵州。对后来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女儿，我是爱的；但心底总有一个阴影，那就是这个女儿的来到，并非出自我的 本意，而是为了平息社会舆论，讨父母的欢喜，同时也为了我能安静做我自己的事的一道挡箭牌。女儿的出现，也仅仅是为我们夫妇增加一个谈话内容而已。我们之 间的冷淡关系丝毫没起任何变化，除去谈论女儿外，仍是

无话可说。一九八六年春，我结束在西藏将近一年的工作，回到了北京。

女儿已经快五岁了，我获得假期，决定带太太和女儿去旅游，离开一年，我当然想她们，又感到对不起她们。我们一家三口去了江南。十几天的青山绿水，名庙古迹，驱散我一年的疲劳，带给女儿无限的欢快；可是我和太 太之间仍发生两次口角。在那两个多星期的旅游中，我们夫妇没有做爱。我已步入中年，我们生活在这个残酷的政权下，人心难测，迫使得人们变成两面派。应对着 共产党干部们的丑恶嘴脸及恶心宣传，政治腐败动荡，物价飞涨，加上工作上不顺心，自己本身虽尚存一点点的事业心，但早已筋疲力尽；回家再要去面对一个冰冷 的家庭关系。人的承受力究竟有多大？我突然想起阿主。

阿 主是我的中学同学，又是我的朋友，比我大两岁。他曾是北京的一所大学里最年轻的教授，就在他被授予教授职称的两个月后，就被医生检查出他患有肝癌晚期。他 父亲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自杀，那年阿主九岁，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是医生，一直没有再婚，苦苦把阿主养大。文化大革命中，阿主被送到山西省的农 村。一年后阿主的母亲在一次被批斗中，死于脑溢血，他成为孤子。他挣扎着把自己办回北京，进大学攻读物理，毕业后留校任教。

阿主结婚十年，太太与他同龄，在一家报社做印刷工人。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已经上了小学的女儿。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但实际上只有很少数的几个人知道，阿主的婚姻并不美满，而且可以说是场悲剧。原来当阿主和他太太都还在娘胎里时，就已经由阿主的爷爷和他太太的爷爷互相指腹为婚订下婚约。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抄了阿主的家，他是在红卫兵走后，清理屋子时无意中发现了他父亲自杀前留下的遗书，才知道他父亲的死因，而且知道他早已有了婚约；遗书中提到要阿主成年后一定要履行婚约。

阿 主成了孤儿后，他太太一家很照顾过他，并且在他办回北京一事上很是花钱出力。阿主回到北京既无工作又无地方可住时，他的岳父母收留了他，对他照顾得很好， 不久后又帮他找到一个工作。这一切都使得他十分感激，于是就在一九七六年年初，阿主主动提出要履行婚约，这使得他岳父母十分高兴，并马上举行婚礼。一九七 七年，大学重新招生，阿主成功地考入大学，他的女儿已经出生了几个月了。他的岳父母给予他全力支持，不仅是财务上的支持，而且要阿主不要为家务和女儿的事 操一点心，全力读书。他做到了，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和探讨中。四年的大学学业，加上四年的辛勤工作，连续发表了几篇十分有创意的论文，受到高度重视。毕业仅 四年，他就被破格授予教授职称，成为最年轻的教授。

我 们始终不太明白，在阿主死前他是不是知道他的最大错误，就是忽略了人间感情。朋友们都知道，阿主一年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以上。要找他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实 验室，一个是图书馆，在家里是见不到他的。他们夫妻之间关系冷若冰霜，女儿视他如陌路。作为朋友，我们曾多次劝说过阿主，但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不是时 候」。他总说，等得到了教授的职称后，便可以告慰父母、报答岳父母，对得起他的太太和女儿，「那时候，我就会带太太去旅游，我会好好地开始爱她们，照顾她 们。」

阿主没能带太太和女儿去旅游，也没有让任何人知道他患上了癌症，只有六个月的生命了。他发疯似地工作了两个月，完成了正在进行的专题，并写出了论文。又忍着癌症带来的时时剧痛，不露声色地修理了家具，做了对太太和女儿今后的安排，然后告诉太 太他要去上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几天后就回来。最后一次拥抱太太、亲吻女儿之后，他便走上了不归之路。在阿主的一生中，他唯一真正想要去的地方是黄山。这 次他去了。他没有去上海，直接去了黄山。在第三天的下午，他爬上黄山景点之一的泥鳅背，坐在那棵老松树下，借着晚霞余晖写下他的遗书，然后以酒伴着杀虫剂 一起喝下去。他的遗体在隔天清晨被发现，遗书迭得很好地放在上衣口袋里。

我 始终记得遗书中这样几段内容：「……我这一生中，遭遇了太多的苦难。尽管如此，我并没有被压垮，我努力了，也奋斗了，我创造出了成就，也有了名誉和地位， 但这些仅仅是个开始，我还可以干得更多，可是癌症毁灭了我的一切，不但如此它还要在夺走我的生命之前，让我再受几个月疼痛的苦。我受苦受够了，我已经受得 太多太多，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过三十八年，而受苦受难的日子占去了我三十年，我决定不受了……。黄山确实很美，比我想象得还要美，就让我的生命结束在这里 吧。其实，我真的不想死，生活对我来说好像刚开始一样，我有我的家庭，我有个太太，还有个可爱的女儿，我知道 这么多年来，我冷淡了她们。在我得到了教授的头衔后，我是准备要做几件事的，去弥补她们这些年来失去的夫爱和父爱的。但是，已经太晚了，死神正在走近 我。……这么多年的苦难，我已经失去对死的恐惧。即便不死在癌症上，天知道今后又会死于哪场政治运动中？我只是再也受不了更多的痛苦和疼痛了……，就让我 在这里结束生命吧，我只是感到……太对不起她们。」

反 省着我自己的生活，几年没有搞运动，似乎平静，但并不等于正常。白天要说着违心的话，干着自己不爱干的工作，晚上回家又要埋头钻研写作；夫妇关系冷淡，口 角、冷战不断，家庭的温暖、夫妇间的温存、体贴，我没有感受到过。回家仍像上班，神经永远没有松弛的时候，有家如同没家一样。这不是生活。我感到自己有做 不对的地方。我看不起她的家庭（或者说对她的家庭总有一种戒备和警惕），从没有正式拜访过她的父母；由于她实际上只受了基本的教育，就感觉她处处不如我， 从不对她谈我的工作和我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除去应酬外，也从不带她参加朋友聚会。我们夫妇没有私房话，性生活更是少得可怜。

她 是个女人，嫁了我，当然是要一辈子和我生活在一起了，女人的最大愿望无非就是丈夫爱她，对她好一点，她会心甘情愿地与我同甘共苦一生的。可是我们现在的关 系，她也在忍受，中国人已是灾难深重，多苦多难的了，难道家人间也要如此？我沉思着，决定马上开始做点什么，改善我们的关系。既然没有专业的咨询和指导， 那么阿洪参加的那个「裸体聚会」可能对我们应也会有帮助的，当然了，第一步是要征得太太的同意。几天后，又是太太要回娘家探望她父母的日子。早上，我对太 太说如果她不介意，今天我想一起去探望父母。

「为 什么？」太太显然是很吃惊的问我。我接着说：「别问了，结婚快七年，女儿五岁，我却没有正式的登门拜访过他们，不管什么原因，我是有失礼貌的。咱们先去商 场，妳告诉我他们喜欢吃什么，我们买几样，然后一起去看望他们，好不好？」太太惊喜了，想说什么可没说出来，只是看着我。我笑着催她说：「别愣在这里，赶 快去换件衣服吧。」她不知所措地点着头，进房换衣服去。时间不长，她出来了，有点不好意思地问我：「你看这件衣服还可以吗？」我好像是第一次注意到她，入 时的衣服裹住她丰满而曲线突出的身体，有点发红的面肤，一对亮亮的大眼睛正在看着我。我的太太也是一流的女人，为什么……。我打断思路，笑着点头夸好，然 后拉着她的一只手走出来。太太几次要挣脱出那只被我紧握的手，但我握得更紧了。

这 一次去探望岳父母十分成功，不仅是岳父母意外的惊喜，对于那住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大院子里的邻居们也是个意外。从跨进大院的门开始，我们就不停的与邻居们 点头、打招呼、握手，直到进了岳父母的屋子，两位老人有些过份殷勤地招待我，气氛不是那么自然。我尽力地表现得随意，主动抛出话题，又打开礼物请他们品 尝，气氛开始正常了。岳父母坚持要留我吃完中饭再走，看着太太那恳求的眼光，我同意了。可我必须给研究室打个电话，但我又实在不愿意再次一出一进这个大院 子而受到注视。只好对太太说最好是她出去找个公用电话，告诉所里我在下班前会回去的。太太高兴地答应了。

岳 父似乎对我的这个副主任的头衔兴趣极大，问了一连串的问题，无非想弄清这个官有多大，管多少人，有多大的权。依我的性格，我会马上说我对这个没兴趣，我不 在乎这些，我更根本不想干这个工作；我是副教授，副研究员，历史是我的专业。但是我不能对他们讲这些，他们辛辛苦苦的做了一辈子的工人阶级，共产党也并没 有给他们一点的实惠，尽管做共产党宠爱的工人阶级听起来光荣、高尚，可是在他们的头脑中，那些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传统观念仍顽强地存在着。这么多年，共 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敌视政策，也使得他们不懂、而且也不想去懂什么是教授、副研究员、研究专题又是什么。他们感兴趣的正是我憎恶的，而我全身投入的事，他们 又正是一窍不通。我知道我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他们是岳父母，我只好耐下心来，向他们解释副主任职务的级别和职务范围。两个老人大乐。

令 我没想到的是，岳父母接着竟十分认真对我说：「你可要感激赵紫阳总书记，正是因为他上台实行新政策，才开始提拔知识分子的。」我点了一下头，心里却反感极 了。我为全人类工作，我不盲目效忠一个政权，更不单为一个政党或某个人工作。共产党有意搞乱这些概念去愚弄人民，我的岳父母也包括在内。沉默了片刻，我抑 制住自己而没有告诉他们，就是那个赵紫阳前不久接受了日本一个公司送给他的一套价值二十万美元的家具，以换取优惠条件，在大陆开设公司。算了，我对自己 说，今天来不是为了辩论，而是要使夫妻关系正常化。正想换个话题时，太太回来了，告诉我室里没什么事，可以不必回去，但明天有个会议十分重要，提醒我不要 忘了。

这 正好给了我一个话题，明天的会是要商量我们前不久在四川省东部山洞里发掘出的一批文物，是属于一个已在大约两千一百年前绝种的少数民族的。我向他

们讲起了 这批文物的发掘过程，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岳父很兴奋，在午饭时多喝了两杯，不胜酒力睡觉去了。直到太太帮岳母收拾好了一切，没有惊动熟睡中的岳父，我们告 辞了。

岳 母一直把我们送到院门口。走在路上，太太高兴地说她从来没见过父母像今天这么高兴。又告诉我，她打完我的电话后，也给她所在的公司去了电话，请假一天。我 问她为什么，她看着我却没回答。我明白了，马上提议去北海公园走走。她高兴地点着头。我并没有想到事情是如此的顺利，并不像我预料那般复杂，看来今天我可 以和她谈到那个裸体聚会了。

坐在幽静的公园里，置身于鸟语花香中，远山近水，白塔的倒影在水波中荡漾，我们全身心地沉浸在这美景中。我知道，坐在我身边的太 太一定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只是不知从何开始；其实，我也一样。一阵沉默后，我开始说话，我提到婚后我们之间的冷淡关系，列举了种种迹象说明这些都是不正常 的。太太点头表示同意。我又提到我曾采取的措施，例如，看成人录像带和那次去华东的十几天的旅游，但似乎并没有起作用。她又点头同意，但却马上接上来说：「你是不是觉得没希望了，想离婚？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同意的。」

她 的这个想法也在我意料之中，是时候可以进入主题了。我开始分析问题的所在，就是性冷淡和性生活的不正常，又羞于开口去要求对方，于是形成性压抑，也造成心 理上的失调和不正常。我们需要帮助，也需要刺激，没有别的办法了。看到太太又点头表示同意，我就提到了阿洪和他参加的那个裸体聚会的事，希望她能同我一起 参加；也可能对我们起不到太大作用，但试一试也是应该的。太太有些不好意思，吞吞吐吐半天说不出话来。我给自己点燃了一支烟，然后静静的吸着，给她些时间 去考虑。当我这支烟快吸完时，太太才红着脸问我：「你说那样好吗？光着身子的样子……。」

她 这一问，倒使我顿时无法回答。结婚七年了，我还从未见过她全裸呢。我们都在深更半，门窗紧闭、漆黑一片的情形下在被子里做爱，同时还十分小心不要弄出任何 声响，以免被隔壁房间的父母和邻居听到。夫妇间正常的性，对我们来说却好像是犯罪。让太太在别人面前裸体，则是一个我能不能承受的问题。我要的是夫妇和 睦，家庭温暖，既然阿洪这个办法有效，我们为什么不能去试？究竟这个聚会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我对太太说：「妳先不要想得太多，我会与阿洪夫妇先谈 谈，弄清楚是怎么样的聚会后再决定，好不好？」

第三章　男人光着身子也不好看

阿 洪比我大三岁，曾攻读国际政治，毕业后被分到外交部工作。从外表上看他一点儿也不像个外交官，中上等的个子，体格健壮，有点发胖，有一张忠厚的脸，为人正 直、可靠，又肯帮助人，所以在朋友们中间被尊为老大哥。记不清究竟是一九八三年还是一九八四年，英国与阿根廷为了马岛一事发生军事冲突，中国政府马上跳出 来发表了支持阿根廷，反对英国的声明。可是就在第二天，中国政府在这件事的立场开始变得不明朗，以后就一直保持沉默而不再评论这件事，这多少是因为阿洪的 影响。在中国的声明发表的几小时后，阿洪交上去一份报告。在报告中，他直接指出中国政府在此事上的错误立场，尤其提到所谓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在此事上更是错误；马岛是英国的领土，是阿根廷派兵攻占了马岛而引起了事端。

当 时，朋友们都为阿洪捏一把冷汗；政府声明已经发表，他如此做，后果简直不堪设想。阿洪反倒安慰大家，说这就是共产党的教条主义；把发达国家当敌人，落后国 家全是朋友，一旦有事发生，想也不想马上跳出来就支持或反对；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根本不可能是那么绝对，现在已是八十年代了，如果因为他说了实话而得 罪了共产党的话，他情愿从此出家做和尚去。几天后，英军攻下了马岛，岛上的阿根廷军队投降，一场事件结束了。阿洪却被调离了工作，改派到图书馆去工作，离 开了他的专业。直到一九八二年，才又不声不响地把他调回原工作，并升为主任，对那已过的两年，既不解释，也不道歉。

在 阿洪被派到图书馆工作的那两年，他真的开始读经书，甚至吃素。说起来阿洪是个苦命人，他出生在内战时期被共产党包围的长春城里，几个月的包围，城中的市民 已被活活饿死了几十万人了。阿洪的母亲在生出阿洪没几天后，也死于饥饿中。阿洪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医官，驻守长春的国民党军队投降，共产党进了城，阿洪的 父亲成了俘虏但不久由于他是医官而不是带兵官，同时又抱着个婴儿，于是被释放了。几经奔波后，终于父子俩回到北京，阿洪的祖父是位有名气的中医，曾祖父曾 在清朝做过太医，在北京买下了这所四合院，房子不大，但十分清静。阿洪父亲抱着阿洪就回到了这所祖居，与阿洪的祖父母住在一起。

阿 洪的父亲始终不能从丧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终日闷闷不乐。逢人便讲共产党残酷，为了夺取一个城市包围几个月，不惜几十万平民活活饿死。一段时间后，他的神 经开始有些不正常了。在一九五零年的那场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就因为这句话而被指控为国民党反动军官，送上了刑场。因为害怕他会说出些什么共产党不爱 听的话来，在送往刑场之前，阿洪父亲的舌头被割掉。阿洪的祖母承受不住这个打击，在儿子被枪决的第二年也去世了。小阿洪则由祖父抚养，祖孙俩相依为命。

一 九六六年，一群毛泽东的红卫兵闯进了这所房子，拿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和家具，并在院子里烧掉了所有的书，当一个红卫兵将一只装满药方的盒子扔入火中时，七 十六岁的阿洪的祖父不顾一切的扑向火中去抢救这个盒子，里面装的是这个中医世家三代相传下来的秘方，但被几个红卫兵揪住，其中的一个红卫兵

用木棍向老人当 胸打一棍，老人立时吐出一口鲜血，倒了下去，没有再起来。阿洪安葬了祖父后，继而又被轰出了这所房子，因为政府要占用这所房子，阿洪只好寄居在好友阿天 家，两年后便被分配到陕西省的农村去劳动。直到一九七七年初，才以有病为由，又回到北京，仍寄居在阿天家。

半 年后，阿洪考进了大学，便住到学校去。他固执，但固执也有固执的好处，自重回北京后，他就一直不断的照政府要回这所祖居的房子。整整五年，想尽一切办法， 并且拒绝了政府的所谓道歉和解决方案；给他钱不要，另外给他一处房子也不要，终于阿洪胜利了。一九八二年，他再次推开这所房子的门，回到这所已是面目全 非、一片残破景象了的祖宅，但阿洪却高兴得哭了起来。以后的半年中，阿洪拒绝任何人在钱上和人力上的帮助，自己进行着整个房子和院子的翻修工程。工程结 束，阿洪请了十来位好朋友举行庆祝会，细心向大家介绍着他如何凭着记忆把这所房子尽力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样子。

我们欣赏着这个小小的院子，又一间一间的参观了全部九间屋子。北京人平均居住面积不足二点二平方米，而这所房子的居住面积超过一百四十平方米，简直是人间天堂了。这次我去拜访阿洪，正赶上他们一家三口在吃晚饭。互相问候后，他们夫妇又拉我参加他们的晚饭。我们这种关系是不必讲客套的，边吃饭边聊了些近来的工作、生活上的事。饭后，我缓缓告诉阿洪关于我和太太关系上的问题，并提到我听阿朋讲过这个裸体聚会的事。我想知道这个聚会是什么样子，可不可能改善我们夫妻关系 。

阿 洪认真地听我说完以后，没有说什么，而是把他太太喊了来，当着我的面把我刚才告诉他的事对他太太全部讲了一遍，搞得我窘困极了。他太太听完后，坐在我身 边，十分亲切地对我说:「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们都是男人，要体面，没人敢让你们脱衣服的。况且你们男人光着身子也不好看。我们女人身体美，好看，你们 男人喜欢。带你太太来吧，我会照顾她。女人可怜呀！嫁个男人就是一辈子的事，好也是他，坏也是他。阿洪总是对我说，在这个制度下，没人好受，如果夫妻关系 再不好的话，干脆真的出家当去算了。」我们聊到很晚，他们详细告诉我一切状况。这个裸体聚会总共有三对夫妇，包括一对哲学副教授夫妇和一位心理医生夫妇，通常在阿洪家聚会，一个月一次，每家带一个菜来，共进午餐。他们已经搞了有二年了，一致认为效果很好。

对 于我来讲，两件事令我放心，一件是这里有一位心理学医生，参加的人都是知识分子，绝不是色情上的胡闹；另一件是男人不裸体，令我大大松一口气。尽管我思想 开化，崇尚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及生活方式，但真的让我在别人面前裸体，我还是很难做到的。让太太在别人面前裸体，我也并不情愿，可想到我们还要生活在 一起至少三十年，我害怕我没有勇气再这样继续下去。回到家，我详细告诉太太一切。她听着，没有说话，我相信她也不愿意再这样生活。当我告诉她我决定去试试 时，她只是不好意思地笑着，没有反对。接着我又告诉她，两周后的周日上午，我们就去阿洪家参加聚会。她又没说话，只是极轻地点了一下头。

第四章 腐败是大趋势

一 天上午正在工作时，我接到了党委紧急电话通知，要各行政部门的正副处长、各研究室的正副主任，马上去党委会议室开会。在会议上，研究所的头号人物、党委书 记、一个五十七、八岁的姓郭的人——有极高明的权术和丰富的共产党官场经验的党棍、党霸、政治流氓——这个被职工在背后称为「书记郭」的人宣布：中共中央 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发起重修圆明园捐款活动，以洗刷百年前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烧毁清朝皇帝御花园的国耻。

这 位书记郭也是闲了几年没事，好不容易抓住这个机会出面训话，无非是要大家不要忘记，尽管不搞运动，他仍是这个研究所的最高领导人。他用一个小时讲解此事重 要意义，且是如何地刻不容缓，广大的中国人民又如何巴望着重修圆明园，如何强烈地要求洗雪国耻等等。由于此事太重要，故总书记任命他的儿子担任这个重修圆 明园委员会的主席。书记郭最后要求大家要以最大的热情去支持此事，又提到这绝不是一个支持和捐款的事，而是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的原则问题，最后则威胁地 说，此事将考验在座的每一个人是不是与党一条心，是不是坚决执行党中央号召的大事。

财 务处长老君第一个说话了。这位有着三十多年财政工作经验的老人的问题是，这笔捐款从哪个项目中支出的？财务条文规定明确，专款专用，上级没有拨下一分钱是 可以用做捐款的。全体参加会议的人都点头表示同意老君的说法，不约而同地把视线转向书记郭。书记郭喷着烟，说：「总有些储备金，或是一些项目的结余吧。我 看就从这些项目中去支出吧。」老君马上说，这样是违反财务制度的。书记郭不高兴了，板起脸说：「你把捐款的收据拿来，我签字，我负责，这你总该放心了 吧？」老处长没说话，会场的气氛有些紧张。阿朋突然发言，他提到他们研究室的经费本就不足，有几个研究专题项目下的经费连一半都不到，但是为了一件有如此 重大意义的大事，无论如何也要捐些钱的，只是想请示一下书记究竟捐多少钱才合适。

书 记郭高兴了，清了一下嗓子后说道：「像我们这样一个规模的机构，每年政府的拨款都在两千万元以上，不同功能的研究室和行政机构四十多个，我大致算了一下， 以我们所的名义，总共捐出十万元不算多吧。」我相信在场大多数人都像我一样吓了一跳。像我们这样的单位，全国有几百个，修建一个圆明园究竟需要多少钱？可 再想想，又感到自己关心太多，钱是共产党的，共产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至少两个关键问题解决了，一是书记郭签字，我们不承担责任；二是阿朋套出了书记郭的 十万元的打算。下面的事就好办了，只要平均每个部门掏两千多元，凑上十万之数。想到这里，我要求讲话，提
出历史室捐款三千元。这下子，会场上活跃了，各室、处和办公室的负责人相继一千、两千、三千的报出了数字，结果总数达到了十万，书记郭大大满意。午饭时间到了，会议结束。

两 天后一个下午，阿聪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一句话没说，就给阿朋打电话让他到我办公室来商量事情。我出去倒开水回来时，看到不仅阿朋来了，阿学和阿天

也在这 里。阿学说：「阿聪搞了一项关于重修圆明园的调查，他已经对我讲了，我完全相信这个调查结果的可信性，阿聪坚持我们五个人都来，就是要劝说你们两个人不要 去支持这件事。」原来胡耀邦儿子成立的这个委员会已有两、三年，派出不少的人，在全国范围内征收捐款，究竟征到多少没有人知道。在几个月前，胡耀邦的儿子 带着十亿现金去见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要求马上兑换三亿美元。由于总行的金库里当时只有二亿美元现钞，使这位太子极为不满。行长一再表示保证尽快凑齐那不 足的亿元后，他才离开。那二亿美元装在军车上，由一支武装军人护送，运到什么地方去也没有人知道了。到目前为止，圆明园管理处只见到不到三百万元的重修 款。

阿 聪熄灭了烟，又告诉我们另一件事。那就是前财政部长下台的原因，是为了拒绝报销中共元老叶剑英的一笔二十万元庆祝生日的款子。阿聪说：「我听说咱们所一共 捐出十万元，这笔钱实际上还不够给一个人过生日。为了给叶剑英过生日，全国的将军们都赶来祝寿，而且每份礼物都价值万元以上。想想一个少将的月工资是三百 九十元，怎么可能送出如此的大礼？除去贪污军费，我再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其它办法了。」他刚说完，阿朋笑了，不急不忙地说：「我知道阿聪老兄的意思了，是要 我们抵制这次的捐款，说句实话吧，这是办不到的。我再告诉你，不这样就不是共产党，也只有这样，共产党才能垮台。我敢打赌这是刚开始，以后会越来越腐败 的，这是大趋势，没有人可以阻止得住。说句真心话，我会很高兴地看到共产党腐败，十年后中国就可以摆脱苦难了。」

送 走了他们，我回到了办公室，赶写着一份报告。听到有人敲门，没等我说话门就被打开了，进来的是总支书记。我马上站起来，请他坐下，又请他吸烟，又问他喜欢 不喜欢福建花茶。他吸了一口烟说：「就是因为你是喝这种茶的人，所以我才来。」对于这位总支书记我倒并不反感。经过上次与他接触后，感到他还多少有点人情 味，况且现在我们又是同僚，搞好彼此的关系还是必要的，只好忘掉堆在那里的一堆工作，陪他山南海北聊了一个多小时后，他突然转了话题，提到近几个星期来， 有一个专做这一层楼的清洁女工，问我是否注意到。经他一再描述后，我才有点印象，好像是有那么个女人，三、四十岁的年纪，每天进进出出这层楼各个办公室， 人很和气，见人就笑。见我想起来了，总支书记开始告诉我，一个月前，不知又是什么关系，又有四个女人被强行塞进这个研究所来工作，由于是行政上的事，据说 阿成很是为此事为难了几天。

这 四个女人的丈夫们都是新提拔起来的干部，不知通过什么样的关系，非要把太太安插进一个政府部门工作，得到一份薪水。这些女人们自从十几岁嫁人后，就一直在 家做家务，抚养孩子，从来没有除了工作过，当然也更提不到什么文化程度。阿成想请书记郭把她们安排到党委所属部门去工作，可能是这几个女人的靠山不够硬， 被书记郭拒绝，阿成也没办法了，只好把这件事交给了福利处长办理。福利处长是个大胖子，五十多岁，人很好，爱助人，工作卖力，整天忙忙碌碌，从来听不到他 抱怨。而且总有办法把事情办好。果然，胖处长满口答应。很快，一个女人被安插到食堂，一个女人去了托儿所，两个女人被安排做了清洁工。听着总支书记说着这 些，我虽然还不明白他的意思，但已经感到有件为难的事要落到了我的头上。

果 然，他转了话题，提到他在一九四八年加入共产党，根据资格应当享受副局级的待遇；他年龄大了，革命了一辈子，本该退休，可又想为党再多工作几年，发挥自己 的余热，由于身体不好，工作太多，实在感到需要个秘书。这个新来的女清洁工就是个合适的人选，由于这属于行政上的事，所以来和我商量，要我帮忙。听完他这 一套说辞后，我几次差点恶心吐出来。仔细一想，马上觉得这件事并不简单，他应当去找副所长阿成去要求，因为我没有人事权，他是知道的，他来找我谈，或许已 经在阿成那里碰了钉子。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能怎么办？他看到我半天没说话，站了起来说：「下班时间快到了，我们明天再商量吧。」

他 走了。我马上上楼去副所长阿成的办公室。阿成告诉我，那位总支书记已经找过他。阿成的答复是，需要考虑一下。说到这里，阿成停了一下，笑着问我对此事的看 法。我实话实说的道出我想法。总支书记并没有去党委向书记郭要求此事，而是直接按党政分工后的行政程序提出要求，做得十分得体。

他 明知他会得到这个女人的，这是给阿成一个面子，如果阿成不同意，他会去找郭书记的，他与郭书记在一起工作快二十年，交情极深，郭书记不会为这点小事而得罪 他的，于是郭书记会来找阿成，而阿成也不便为了这件小事而驳回同僚的面子，于是阿成就输了。如果阿成继续不同意，书记郭会到上级那里搞来一份文件，提到总 支书记年龄大了，身体不好，工作需要等等一大堆的理由，要求阿成将这个女人派去做秘书，这样一来，阿成会输更惨，而且与书记郭之间也结下矛盾，对今后的工 作上会有麻烦的。我建议阿成同意此事。阿成看着我，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大约有半分钟，办公室里一片寂静。终于他转过身来，对我说：「你是对的。明天上午，我会分别找福利处胖处长和你来谈话，然后由你带那个女人去总支书记的办公室。你看这样办可以不？」

隔 天上午，阿成秘书打电话通知我马上去阿成的办公室。坐下后，他告诉我，胖处长去通知那个女人，一会儿她来了，要我对她交待几句，把她送去。阿成叫秘书，请 那个女人进来，又把我介绍给这女人。阿成简短的对那女人讲明请她来的目的，又十分客气地问她对这个新工作的看法。女人说没看法，都是党的工作，服从上级的 安排。没等阿成说话，我插进来问她：「副所长的意思，是想问妳能不能胜任这个秘书的工作，整天和档案打交道，而且还要写些东西，妳行吗？」她马上说：「没 问题，我上过六年学，看报纸没问题的。」

阿 成笑了一下，对她说：「十分好。现在就由你们室的副主任带你去见总支书记，今后在工作上遇到问题，可以向任何人请教，也可以直接来我这里，不必拘束。」说 完，阿成站起来，把我们送到门口。这女人十分高兴，笑着对我说：「我早就知道你了，也知道你是个干部，又是什么教授。我原来以为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一定看不 起我们的。可你们不是，对人是那么和气，以后有什么问题，我一定随时向你请教。」我马上说：「不要向我请教，总支书记有二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你随时向他请 教就可以了。」

边说着，我们来到总支书记的办公室。总支书记见到我们，连忙站了起来。我说明了来意，又把这女人介绍给他，并说这是副所长阿_____成的决定。总支书记

大乐，让坐又让烟，又要沏茶，我连忙阻止。

他 说:「你们这批新提拔的起来的知识分子干部们,对我们这些老同志十分关心、尊敬，我很高兴，我会向副所长阿成当面致谢的。我认为，中央的这个提拔知识分子 的决定十分正确。你们这批人有专业技术，又能干。前几天，我遇到计划统计处的一个老干部，他告诉我说，今年全所所有的研究项目都可以在年底前完成，这在这 个所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前好年头，完成百分之七十至八十，遇上政治运动，连百分之三十也完成不了的。他们还特别提到我们研究室，人多、项目复杂， 又分散在全国各地，可一切进行的顺利，认为我们十分有可能提前完成今年的工作。」

他 高兴了，扭过头去，向站在他身后的女人开始夸赞起我是如何能干，那女人又夸我：「我早就听说副主任年轻、能干，又是个知识份子，加上你这样一位有经验的老 革命，当然就与其它研究室不同。副所长让我来这个室工作，我高兴极了。向你们两位领导保证，我一定好好工作，不让上级失望。」_

第五章　男人们搂抱着他们赤裸的太太

我敲响阿洪家的院门时，太太又紧张了。一只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两只大眼睛看着我。来不及说话，院门打开了，开门的是阿洪夫妇。阿洪太太拉着我太太的手，十分亲热地问候着。穿过院子进了屋才发现那两对夫妇早已到了，经阿洪介绍，一一握手问候，然后大家坐下。

哲 学副教授阿余提到阿成，原来他们是老同学，又是好友。他大赞阿成的工作能力，并提到决没想到阿成会被提拔的这么快，甚至表示担心阿成会放弃专业。我马上 说：「这倒不必担心，很少有人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专业而一心从政的。据我所知，这些担任了职务的专业人员几乎都是在夜晚搞自己的研究，很少有人在午夜前睡觉 的。」我刚说完，那位心理医生阿弓接上来说：「那么，你的生活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说夫妇间的性生活和家庭生活，如果为了事业而把这一切都弃之不顾的话， 那当初为什么又结婚成家？
社 会上的悲剧已经不少，难道我们还要在家里自己给自己制造悲剧吗？你的太太是个漂亮的女人，你冷淡她，不是糟蹋你自己的幸福？」听了阿弓这一连串的发问，我 有点慌，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阿洪替我解围，他说：「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夫妇才来加入我们的聚会的，证明他们已经重视到了这个问题了。」说到这里，阿 洪转向我太太，对她说：「都是我们这些做丈夫的不好，出了毛病，才使你们这些做太太的受委屈。现在还需要请你们做太太的帮助我们，做男人难呀。」阿余的太太马上说：「做女人苦啊！」话音一落，马上招来一阵大笑。

我 看到阿弓点燃了一支烟，感到奇怪，医生一般都是激烈反烟分子的。他笑着叹了口气说：「没办法的，二十多年的习惯了，我也不想去戒掉，怕戒掉后又产生其它嗜 好，甚至比抽烟更坏，那就麻烦了。」阿余接上来说：「嗜好并不能说全是坏的，许多事情是根本不能简单的用一个好或坏来下结论，直到今天在中国仍不能公开的 谈性和性生活，谈到这个问题就被扣上流氓的帽子。性是实际存在，同时又是科学，不谈或不让谈并不等于没有这件事，更不等于就没有问题了。没办法，我们只好 自己想办法解决。你能说我们这种聚会是好或者是坏？」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更感激他说这些话使我们感到放松。我笑着说：「我完全明白，也正是我们夫妇间存在问题，所以我们才来，只是有点担心我的太太紧张。」说到这里，我看着太太对她说：「昨天晚上我是要和妳好好再谈谈的，但被父亲叫去帮他工作，来的路上又不好谈这些⋯⋯」阿洪和阿弓太太打断了我，对我太太说：「咱们走，他们不懂我们女人。咱们去厨房说话。」边说边把我太太拉走。不一会儿功夫，厨房里就传来女人们的笑谈声。

阿弓医生给我们讲了佛洛伊德的性心理学。阿余试图以佛洛伊德的理论观点自我诠释，结果引起我们的大笑。正说得热闹时，女人们从厨房出来了，拉桌子、摆桌子，又一盘一盘端上菜来。阿余太太说：「男人真懒，非要等我们说请，才肯坐过来。」阿洪太 太说：「我从不说请，只说饭好了，想吃他就过来，不过来就是不饿。」阿洪马上站起来，让我们坐到饭桌前。我问了一句：「夫人们呢？怎么都不见了？」阿余 说：「在阿洪卧房里脱衣服呢，一会儿就出来。」阿弓对我说：「我们有规矩，一会儿夫人们出来后，谁也不许谈工作、时局或政治，只能谈浪漫的题目和性；让我 们完全进入到男女关系那种刺激、柔情和爱当中去，绝不准任何事破坏气氛，同意不？」阿洪开玩笑说：「违者罚酒一杯，新来者罚三杯。」阿余端起酒杯说：「别提罚不罚的，我们先干一杯欢迎新朋友。」我赶紧表示感谢。

干了杯后，大家开始评论桌子上诱人的几盘菜来，又要我介绍我们带来的这两盘菜。我只好告诉他们，一盘是扒牛肉条，另一盘是红烧栗子鸡。然后颇有点得意地说：「我太太的这两道才还是不错的，很受过几个朋友的好评，可是至于如何做，只好一会儿问我太太了。」大家都笑了。阿洪用筷子夹起牛肉放进嘴里，边咀嚼边大声夸赞说：「好，好，确实好！」阿洪卧房的门打开了，女人们的笑声传来。接着，阿洪太太出现了。天啊！雪白、细嫩的皮肤，丰满的玉体，三点毕露，曲线突出。美极了。她站在门口，扭过身子，似乎是在对什么人说话，然后又退回屋里。阿余、阿弓两位夫人出现了。脸上都带着极不好意思的神情，后面，阿洪太太拉着我太太的手也走了出来。她低着头，脸红红的，走到我旁边。我拉着她坐下来。阿洪太太举起了酒杯，建议为欢迎我们夫妇干杯，气氛活跃了。太太看看我，又看看酒杯，她不喝酒的，我替她喝了。大家开始挥动着筷子，品尝每一道菜。阿洪太太站了起来，胸前双乳晃动。一边给我太太让菜，一边抱怨我：「你只顾自己，怎么不照顾一下你太太？」我太太欠了欠身，表示感谢，一对乳房也晃动着。

我 仔细地看着太太的乳房，第一次发现它们是那么丰满坚实，同时又是那么可爱诱人。我的太太有着与其它三位太太一样的秀气的肩头，柔软的后背，但是，我好像是 第一次发现我太太的身体是那么美，那么迷人，那么富有性感。我禁

不住把一只胳膊搭在太太的肩上，又用筷子夹起菜送到她嘴边。太太抬起头，看看我，又看看其 它人，然后不好意思的摇摇头。阿弓太太站了起来，扭动美丽的肢体走到我太太的背后，对她耳语着什么。阿弓也走过来对我说：「可以看得出来，你是爱太太的。对不？」我点点头。阿弓又说：「只是从未发现你太太是如此可爱而且诱人，对不？」我点点头。他又说：「所有 的女人都可爱，中国的女人更可爱，尤其是结了婚的女人更是无价宝。」我问，为什么？阿洪转过身对我说：「传统意识：从一而终。在这个五十亿人口的世界上， 二十五亿是男人，你太太只能被你一个人爱，她也只能爱你一个人。她只相信你，而且心甘情愿的为你做一切事，直到老死。」

男 人也是一样的，我说。「不一样，我的老弟。」说话的是阿余，「好好看看这四个女人，看看她们的肉体，精妙绝伦，是上天给了她们这样的一副诱人的身体。我太 太爱我、嫁我，主动向我奉献出她的千金之体，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去享有这副玉体，去触摸任何部位。」说到这里，他伸手去抚摸他太太的乳房，又凑过嘴 去，在乳头上亲了一下，接着又说：「与她做爱，我们两个人的肉体结合在一起，从而升华为两个人的灵魂融为一体，无她无我，无我无她，我们是一个人，这才是 真正的婚姻。」他讲的这些我都知道，但今天好像才真正懂了。看着太太裸露着身体，低垂着头，一副害羞的样子，我触动极大。这是我第一次在白天看到太太的裸 体，从没想到她的身体是如此美好诱人，令我吃惊。太太是爱我的，也想让我爱她，否则她不会和我来这里。我激动了，喝干一杯酒，对大家说：「直到今天，我才 发现我的太太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说到这里我拉太太站起来，说：「你们看，我太太哪点比你们的太太差……」我没说完，大家鼓起掌来。

阿 洪起来说：「我的朋友，全是有学识，有头脑的人，刚一个多小时，他就已经领会到了要点。」他转过身对我说：「当着大家的面，拥抱你的太太并亲吻她吧。」我 把太太拉了起来，紧紧抱住她，一边亲吻着，一边用手在她那丰满光滑的后背上抚摸着，大家又鼓起掌来。我太太的脸由于害臊而变红，而且热得烤人。我拉她坐 下，一只胳膊搭在她肩上，用另一只手端起一杯水送到她的唇边，她喝了两口，又拼命的把赤裸裸的身体紧靠着我，又拉下我搭在她肩头上的手去遮住她那露在外面的乳房。男人们都搂抱着自己赤身裸体的太太。

尽管三位太太已是参加过这个聚会两年了，但仍羞答答像依人小鸟般偎卧在各自丈夫怀里。

两个小时后，午饭结束了。男人们酒足饭饱了。女人们似乎都没吃什么。得到了感情上满足的女人，大概几天不吃饭也不会觉得饿。

男人们回到了起居室开始抽起烟来，四位只穿着鞋的夫人们忙着清理饭桌，然后聚集厨房中洗碗，欢快的说笑声不时传来。男人们沉默了，屋里被烟雾笼罩着。阿弓突然问我是不是感到了性的冲动，我点了点头。阿弓笑了一下，对我说：「做个计划，至少每周也要拿出半天的时间与太太做交流。想想，得到太太的温存和体谅，不是比追求名誉和地位容易得多？

这时四位夫人从厨房出来了，走到各自丈夫的身边坐下。在这间起居室里，没有饭桌的隔挡，每个女人的身体完全呈现出来了：四具白玉雕像。阿弓太太说：「我总认为不公平，让我们女人光着身子，你们男人却穿着衣服……」阿洪太 太笑着打断推说：「我可不想看男人的裸体，还是女人裸体好看，不要说男人爱看，我也爱。有时在镜子前欣赏自己的身体，越看越爱。我在心里对阿洪说：『阿 洪，阿洪，你何德何能而拥有我，享受我的身体，占有我的灵魂，别以为你上过大学，又当个什么官就了不起，在这个世界上能给你一切的人只有我，无论发生什 么，我永远是你的老婆。』你们说我的话对不对？」她最后这句话是在问我太太。我太太只是点点头，没说话。

我 忍不住了，说：「女人总是抱怨，其实男人在外面奋斗挣扎，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我不知道阿洪每月拿多少钱，我每月多拿六十块职务津贴，可是这几十块钱就把我 的所学会专业都毁了。每天面对的都是头疼难办的事，加上复杂的人事关系，说实话，真不知道哪天会翻船，弄上一身麻烦。可每个月多给太太六十块钱，看到她高 兴的样子时我又想，算了吧，想那么多干什么，还不都是图个眼前高兴？」

阿 余慢慢地开口说：「我和阿弓曾几次与阿洪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些人究竟能不能在这样一个制度下做官，答案是，太难了。我几次劝阿洪应把工作的事对太太 讲，可阿洪总摇头。阿弓和我都明白这是男人的一个通病，自己承担一切，尽力去保持家里的安静和温暖。其实这样不好，太太有知道的权利，更有去分担的义务。 可事实是，包括我在内，我们没能把自己太太当成或伙伴、同志和最可信的人看待，所以当太太不理解、抱怨时又怪谁？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他的话引起女人们的议论。阿洪太 太说：「阿余说得太对了。几年前，阿洪在英国和阿根廷战争一事出了事被调离工作，我一点也不知道，直到一年多后我才从他的一个同事那里知道。我当时为他抱 屈，又心疼他，拼命对他好，想让他好受些，同时也更想让他亲口告诉我。可是几年了，我做的一切能让他高兴的事，可他就是一个字也不提被降职的事。直到去年 的一天中午，阿洪去工厂找我，说是给我请了半天假，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出来后他才告诉我，就在那天上午，上级宣布他又回到原工作单位，并提升为主任，所 以他想和我去庆祝一下。我当时就问他，几年来被降职的事一个字也不对我说，今天升职了，就马上来告诉我。他假装没听见，一下子把话题转了。看着他那高兴的 样子，我当时掉了泪。我知道他爱我，只想让我高兴，不想让我烦恼。可是你放心，我是你老婆呀，无论你是升官还是降职，哪怕你被充了军，我也跟你走的。」

阿洪激动了，拿起了太太的一只手在脸上玩弄着。阿洪太太凑近了他，用另一只手在阿洪的脸上抚摸着，抬起头，对我们说：「做个女人多难呀，有了丈夫，其实就像多了个孩子一样，多操多少心！」

看 到他们夫妇亲昵的样子，大家都感动了，女人们的反应可能更大。这个景象感动了我的太太，不知从什么时候，她把一只手放在了我的背上，并不停地慢慢的抚摸 着。我看了她一眼，发现她的眼睛有些湿润。我应该说些什么，可是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太太把头靠在我的肩上，轻声对我说：「你知道我是用

一百个心对你 的，对不？」

我 点点头，她又说：「今后我会用两百个心对你的，你信不信？」我又点点头，并伸出手去，想在太太那光滑的肩上拍拍，可没想到竟拍在太太那裸露的乳房上，太太 不好意思地推开了我。这一切都被坐在对面的阿弓夫妇看到了，他们正冲着我们笑。已是下午两点多钟，女人们重又回到卧房穿衣服去。阿洪笑着问我感觉这么样？ 是不是能有帮助？我肯定地说是有帮助的，今晚我们会有一场令双方都满意的性生活。现在我迫切希望的是和太太单独在一起，我好像有许多话要对她说。阿弓说：「你太太也有许多话要对你说的，如果你们没事的话，先不用回家，去公园坐坐，在外面吃顿晚饭。」

我 也是这么想的。但是首先第一件事是给太太买双新鞋，今天太太穿的这双鞋太糟。这一双已经是她最好的，但比起其它人的夫人来，我仍感到没面子。所以买鞋第 一，去紫竹院坐坐第二，在莫斯科餐厅吃晚饭第三，回家做爱第四。离阿洪家步行十几分钟，就是一个商业区，我买了新鞋给她套上，脱下了她的旧鞋，让售货员包 起来。

剩 余的下午，我们的手始终拉在一起。紫竹院是我们第一次相约的地方，结婚前曾多次来这里散步，婚后就再也没有来过。这一次旧地重游，勾起了几个美好的回忆。 转眼七、八年，我们又来到那个小亭子，这是我们第一次亲吻的地方，在一处树丛中的一颗大松树下，是我第一次摸她乳房的地方。我尽力回想当时的情形，太太不 好意思地笑着，我又几次想旧戏重演，都被她笑着推开。

晚 饭很好。直到甜食端上来后，太太对我说：「我只知道我们女人有痛苦，有烦恼，但却不知道你们男人也有痛苦，今天我才知道，原来你们的痛苦和压力要比我们受 到的多得多。你为什么从不对我讲？你从不提你的工作，我只是认为你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自己却什么也不干。从没想到你有这么多头疼的事和这么大的压 力……」

我 打断她说：「这些都不算什么，最可怕的是政治风险，一夜之间，一个大人物的倒台，马上就造成千千万万的人家破人亡，死于非命……」太太用手捂住了我的嘴， 对我说：「别说得那么可怕，这种事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但绝不会是你。你为人忠厚，干事认真，又有头脑，你只会被不断的提拔，不会有风险。」

我 想反驳，却止住了。太太的心愿是好的，又何必让现实去破坏。我相信我们夫妇间的冷淡和隔阂已在消除。今天，我真是感到幸福极了，让现实滚开，我们需要甜美 的二人世界，我们需要一个幸福的家。那一晚，我们第一次发生了能使双方都达到高潮的性生活，然后互相拥抱着睡着。闹钟响了，惊醒了我们。太太推了推我，又 笑着拔出了那个在我嘴里含了一夜的乳头，并用手指在我额头上点了点。

迷蒙中我知道，又是星期一了，又要回到现实中去，残酷、没有人性的现实。但我好像不那么害怕了，因为我真正有了一个家，一个可以使我得到片刻喘息的家，生活似乎变得不是太坏。

我的家族

二十多年了，我一直极力使自己忘掉那十年。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一群工人、红卫兵闯进了我们家，历时三个半小时，我们家被抄抢一空，父母跪在地上被批斗、被打。那年我刚十六岁，因要阻挡一个暴徒抽打母亲，也被强逼着跪在地上陪父母挨斗。

父亲的家曾经是个大家庭，的曾祖父在清朝是个二品官，祖居福建省。曾祖夫兄弟三人，
下 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做官，一个经商。这曾是一个显赫的大家族，三兄弟共生出我祖父辈的六个儿子。受到父辈影响，自小苦读圣贤书，在清朝灭亡前，六兄弟中有 四个已考中秀才，一个人考中举人，只有我爷爷年纪最小，没有赶上机会去考取功名。清王朝垮台不久，这个大家族也开始衰落，于是分散家产各奔前程。究竟是什 么原因使我的祖父迁居到北方，就不得而知了。但由于祖父出身于名门，有才学、为人正直，在来到北方这个大城市定居不久，就受聘做过一任法庭的庭长，以后又 在一所美国教会中学做了几年校长。后来与一个美国人合作，做酒的进出口生意，实际上祖父并不是个精明的生意人，更多的倒是文人气，一生喜好琴、棋、书、画 和古董，可惜寿数有限，仅五十岁就死于心脏病。我父亲那年才五岁。我父亲这一辈子，总共有兄弟十九人和姐妹五人，都出自于祖父兄弟。

在 这十九个人中，除去一个最小的叔叔毕业于前国民党政府军校，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占领整个大陆前已是陆军上尉，随着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其它十八个兄弟全部 大学毕业，都成为工程师、教授、专家和医生，成了当时总理周恩来所说的旧社会留下来的五百万宝贝。可惜的是一场文革后，十八个兄弟只剩下四个还活着。

我 母亲的家庭，相对我父亲家庭，按共产党的话说是多少清白一点的，没人在国民党的政府或军队里工作过，也就是没有与共产党公开对抗过，可尽管如此文革前后的 遭遇也是悲惨极了。母亲的祖母，我的太婆，出生在苏州城里的一个贫苦人家，从小由父母作主与一位同样家境的少年订婚，也就是我的太公。太公勤学好读，后来 中了举人，被朝廷派去云南做知县。政绩好，正要被升迁时患上了一场云南的地方病，不久就死在云南任上。

太 婆带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儿子回到了苏州老家，遵循先夫遗训，静心寡欲，一心抚养儿女。后来两个女儿长大，也先后出嫁，儿子也到成婚的年龄，在 我太婆一手安排下，一个门当户对的年轻女人进了这个家。但事情却开

始走向了反面。太婆年轻守寡，苦心抚养大了儿子，这时看到这小两口亲热恩爱的样子，引起 她的嫉妒，总认为这个女人夺走她的儿子，于是婆媳间时常发生不快，继而出现口角争执，可以想象这个做儿子的夹在两个女人间的日子是不好过的，一边是含辛茹 苦的母亲，另一边是恩爱娇妻，劝解已是无用了。婆媳间终于反目成仇，束手无策的儿子离开家，投考国民党的航校，毕业后在空军服役。日本侵华时，在武汉上空 的一场空战中以身殉国，死时不到 30 岁，留下一个他从未见过面的女儿。这个女儿后来嫁给一位杭州医生，生一个儿子年龄和我差不多。两夫妻都死于文革中，儿子也去了农村。后来一位他父亲在美国的亲属找到他并把他送去美国，以后再无消息了。

我的外婆是老大，嫁给一位在吴佩孚手下将军的儿子。外公是最小的儿子，据说是个纨绔子 弟，学业无成，终日斗鸡走狗，挥霍家财。将军死后，兄弟们分了家，我外公几乎没分到什么，原因是众兄弟认为他早已把该分的那份家产挥霍光了。这一下倒也激 发了我外公的志气，变卖手头上不多的东西，又要走我外婆的陪嫁来到天津，从一个西班牙人手里买下一间旅店，苦心经营后，不但使这家旅店著名，而且又买下了 其它的旅店，成了天津的巨富之一。美中不足的是膝下荒凉，一生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我来到这个世上后，他宠爱我宠得不得了，不是因为我是他的大外孙这个简 单原因，更因为我与他同月、同日、同时辰出生，相差六十年，又同属虎；这么巧的事确实不多。

在 一九五六年的公私合营中，外公的几个大旅店也被没收。外公外婆开始变卖珠宝首饰过活，后来又把他们居住的那所西班牙房子卖了一半。尽管如此，他们的生活还 是大大的高于常人。外公死在文化大革命第一年。他不堪忍受没完没了的批斗和侮辱，半所住房又被政府没收，尚有的十几万家产被抄抢一空，靠政府每月发给他的 七块钱过活。享受了一生的外公，实在忍受不了这种贫困，终于支持不住死在一次批斗会上。五年后的一九七一年，外婆贫病交加死在一间不到三平方米的地下室，尸体在一周之后被发现，匆匆抬出去火化。文革结束后，天津市政府不但拒绝退还半所住房和抄走的全部财产，反而要我母亲补交外婆的火化费二十八块半。

我 外婆的妹妹嫁给当时中国四大私人银行之一的盐业银行总裁。先是在上海，后来银行的董事会搬到了北京，于是姨婆带着太婆也搬来北京。他们共有一个儿子和两个 女儿，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在一九五六年，共产党迫使姨公拱手交出银行，并入共产党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姨公曾找当时任总理的周恩来抱怨此事，究竟谈了些什 么，没人知道。

从 那以后，姨公不说不笑，每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读古书，后来我曾不止一次的听父亲说，姨公是幸运的。一年后姨公死于癌症，那年正是反右运动，否则不是死在共 产党的监狱里，也会死在劳改农场的。一九六六年，红卫兵抄了姨婆家，姨婆和当时八十七岁的太婆被批斗两个小时，当晚姨婆给自己和太婆服下过量的安眠药。第 二天，红卫兵来通知她们这所房子被政府没收了时，才发现这已经没有必要。

姨婆的儿子早在一九四六年就被姨公送到德国攻读机械专业，十多年后回来，却得不到工作。因为他去的是二次大战后的西德，而不是共产党的东德，于是被认为有特务间谍的嫌疑。他一直靠翻译德文书维生，直到一九六四年政府突然邀请他到南京第二外语学院担任德文教 授，并担任系主任职务，又授予上校军衔。原来这所外语学校属于军队系统，专门为外交官、军队和派出国公干的人训练外语。大舅带着妻儿去了南京，住进学院。 同时也好像住进监狱一样与外界完全隔绝。好处是后来十年文革，他们一家没有受到任何的冲击，反而生活极平静舒适，这是个大奇迹。他母亲和外婆的死他不知 道，两个妹妹的遭遇他也不知道，直到十七年后退休回到北京，找到他失踪了二十六年的大妹妹，才知道发生过什么。

第六章 司令官正在她被剥得 一丝不挂的身体上

大 阿姨在五十年代中突然失踪。亲属们寻找了几年毫无线索，大家都认为她死了。随着时间推移，大家也就忘记了，加上这么多年运动不断，死人无数，亲友们顾自己 都来不及，更是没有人再提到她。一九八一年夏天，我母亲突然收到大阿姨的一封信。信很简单，问我母亲是否同意她来小住几日，畅谈一切。母亲吃惊之余慌乱地 回信要她赶快来，按她信封上的地址发出了信。查地图后才知道发信的地点河北省最北部山区一个小村庄，距北京不远。大阿姨怎么会到那里？一切只等她来才能明 白。

十几天后，我下班回家，看到母亲屋里正坐着一位农村装束的老太 太，经母亲介绍，才知道这就是大阿姨。她看起来有七十岁了，与照片上那个天仙般漂亮的大阿姨相比，哪里还找得出一点相像的地方来？她站了起来，很慢地走向 我，突然紧紧地抱住我哭了起来，含糊不清地说着对我小时候调皮样子的印象，现在长成大男人了，走在街上是不会认出我的。

我含糊地答应着，想马上搞清一切。几天后，我终于知道真相。

一 九五六年，大阿姨十九岁，正忙于高中毕业考试。一天大阿姨被叫到校长办公室，有两个军人正在那里等她。校长开门见山地说，大阿姨已经被军队的文工团选中， 不久就会成为一个大明星，前途无量，要大阿姨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

会。两个军人也先后开口，提到他们挑选演员的标准是如何高，如何在全国范围内万里挑千，千 里挑百，最后才选中几个人，又提到参军是多么光荣，前途是多么光明，以大阿姨的资质、条件来讲，只要稍加指点训练，很快会成为明星。大阿姨性格活跃，能歌 善舞，而且出奇漂亮。高中马上要毕业，她不想考大学，一心想登台演出，如能有机会将来成为一个电影明星。这次这两个军人来找她，恰好正是她的心愿，不必多 说，大阿姨已是千愿万愿。只是顾虑父母一定会反对的，尤其是父亲这一关肯定过不去；两个军人马上表示这不是问题，军队会派人去劝说她父母。同时又告诉大阿 姨此事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讲，他们将向上级报告并办理一切手续。临走前，又给大阿姨拍了不少照片。

以 后的几天，学校方面格外照顾大阿姨，无论她走到哪里总有一两位老师陪伴着，而且每天都被叫到校长那里。校长笑容满面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参军如何光荣，军队 待遇如何好，前途又是如何的光明等等。大约一个星期后，几个军人把当时正在进行毕业考试的大阿姨叫到校长办公室，向她宣布她已正式参军，分派在总政治部文 工团做演员。校长说这几个军人是来接她的，汽车就在外面，要大阿姨现在就跟他们走。大阿姨犹豫了一下，问他们父母那里怎么办？他们还一点不知道呢。一个军 人说，几个军官正在家和她的父母谈，要她放心，保证父母会同意。而且几年后大阿姨真成了大明星，父母会感激军队的。满脑明星梦的大阿姨就这样跟他们走了。

大 阿姨穿上军服，当上演员，享有军官待遇，在文工团里有一间自己的单人住房。文工团的政委、团长对她十分客气，而且破格允许大阿姨可以在校官食堂吃饭。看起 来，一切都如了大阿姨的愿，唯一令她感到不舒服的是没有自由，得不到批准是根本走不出大门，给家里写封信也要检查，多走一步也不行，一切都管得死死的，稍 有小错就会被关入禁闭室。但很快大阿姨也就习惯了。至于她的工作，来到文工团两个月了，始终还没登过台演出，每天傍晚都被车接走，去陪中央首长们和军队司 令官、将军们通宵达旦跳舞，然后又被车送回来。大阿姨向团长提出，能不能不去参加舞会，让她有时间多练功、多 登台演出，以便探索和提高演技。得到的回答是她正做着的是十分重要的革命工作，是党的工作，也是革命的需要。经过几次提出要求后，回答有些不客气了。终于 团长说：「妳是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让妳去做这个工作，就要去做，而且要做好。记住，不服从命令是要受处罚的。」最后威胁说逃跑就是背叛，抓回来要枪 毙。

奇 怪的是，大阿姨说，文工团里有许多女孩子羡慕、嫉妒她，还有人说她傻，每天晚上有小汽车来接去跳舞，比她们白天练功晚上演出要好多了。可大阿姨不这么想， 她感到有什么事马上要发生了。果然一个星期后，在舞会上一位每次都要大阿姨陪他跳舞的大胖子司令官把她带到了楼上的一间小书房里，一把抱住亲吻着，一边又 把手伸进大阿姨的衣服里去摸她。大阿姨挣扎、反抗着。大约二十分钟后，那位司令官可能累了，放开大阿姨，坐在沙发上抽烟，趴在地上的

大阿姨也已是筋疲力尽 了，一边喘息一边用手去整理已经被撕碎了的军服，尽力掩盖自己那半裸的身体。司令官熄灭了烟站起来，恶狠狠地说：「妳太不识抬举，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没 人敢反抗我的。」说完走了出去，立时一个持枪的士兵走进来，站在离大阿姨两米远，端端正正的持枪站在那里。刚想站起来的大阿姨只好又趴在地上。

直到楼下的舞会结束，那个每次接送她的小军官进来，用他带来的一件上衣盖住大阿姨的身体后扶她起来，又用汽车把大阿姨送回文工团。第二天上午，大阿姨正要找文工团长叙述 昨晚发生的事，两个士兵推门进来对她说奉团长命令送禁闭室关三天。不容说话，每人抓住大阿姨一只胳膊将她带到地下室，关进一间小黑屋里。三天的禁闭室结 束，大阿姨被带到团长面前，团长十分严厉地说当天晚上司令部有舞会，团里决定派她去参加，这是任务也是命令，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努力完成任务。这是军人的 天职。说完一挥手，大阿姨就被两个军人推出来送回宿舍。尽管有满腹冤屈，但她似乎明白自己已经陷入魔 网。傍晚，又是那个小军官、那部小汽车把她接走。这次不同的是，她被直接带到楼上那间小书房里。司令官坐在书桌后面的椅子上等她，待小军官小心翼翼地关门 出去后，司令官问大阿姨懂不懂一个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大阿姨保持立正的姿势，清楚地答是，又说：「但……」话没说出口就惊呆了，那个司令官正用手枪对着 她，一个字一个字说：「我命令妳，脱光衣服。」

大 阿姨反倒镇定了。站在那里，没有脱衣服，也没有执行这个命令。几秒钟的沉默后，司令官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几步走到大阿姨面前，用枪对着大阿姨的前额 说：「我数到三，不执行命令，我就毙了妳。」大阿姨坚定地闭上眼，等着他数。枪没响，但重重的一掌打在大阿姨的脸上，她昏过去。一阵撕裂般的疼痛使她苏醒 回来。那个司令官正在她那被剥得一丝不挂的身体上蠕动。直到司令官发泄了兽欲离开她的身体，一股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驱使大阿姨猛得站起来，用尽了全身力量 一巴掌打在司令官的脸上，但马上被推倒在地上。司令官冷笑着，一边穿衣服一边说：「我喜欢妳的性格，又踢又咬，像匹野马。实话告诉妳，再野的马到我手里也得驯服。只要能讨我喜欢，什么也能给妳，回去好好想，下次不许再这样扭手扭脚。」

那 天晚上大阿姨被送回来后，立即写了一份报告，天亮后亲手把报告交给团长，哭诉昨晚发生的一切，请求团长保护她并向上级请求伸张正义。团长一边听一边翻看报 告，最后对大阿姨说这件事太大，他会立即向上面报告，但要大阿姨必须暂时不可对任何人讲这件事，否则要受处罚。说完，又亲自送大阿姨回宿舍，并嘱咐她好好 休息。一天一夜没睡了，又经历这一场羞辱，大阿姨已是疲倦极了，很快就沉沉入睡。也不知睡了多久，一阵敲门声惊醒了她。她急忙穿上衣服，一边用手梳理着头 发一边去开门。两个军人冲进来，迅速地用手铐把大阿姨的双手铐在了背后，一个军人用两个手指掐住了她的下巴，迫使大阿姨张开嘴，一

团不知是什么的东西塞进 了她嘴里，又迅速地被两个军人推了出来，押进车里。一个军人始终用一只手按在大阿姨的后脖子上，使她的脸紧贴在膝盖上。车停了，大阿姨被拉出来，又迅速地 被关进了一间漆黑的小屋，关了多久她也不知道。

终 于门被打开，是那个每天接送她的小军官。他把大阿姨拉出来，一边说：「司令官要见你。」当走到楼梯前时，小军官凑在大阿姨的耳边小声而急促地说：「见到司 令官时，千万不要固执，他让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妳最后的机会，千万记住我的话。」由于长时间嘴被堵着，喘息困难，她已是昏昏沉沉的了，对这番话似懂非 懂，更不明白为什么司令官还要见她。直到到了楼上大阿姨才认出来，小军官敲的门正是司令官那间书房。她挣扎了一下，但胳膊马上被小军官抓得更紧。她被推进 书房，见到司令官坐在书桌后的椅子上，两只脚跷在书桌上，冷笑地看着她。小军官在她的腿关节上踢了一脚，大阿 姨不由自主地跪下，嘴里的东西被掏出来后，小军官退了出去。司令官慢慢地说：「我一直很看重妳的有才有貌，所以才请妳来参加舞会。可没想到妳竟是个特务， 昨天晚上妳从这间屋子里偷走了一份军事机密檔。幸亏你们团长发现了及时报告，我听说后打电话叫他们先不要把妳送进监狱，让我先和妳谈谈，这里可能有什么误 会。

现 在就看妳了，好好求求我，我可以叫他们不要管这件事，就由我来处理。妳看怎么样？」跪在地上的大阿姨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最后几乎是喊着说：「昨晚你打晕了 我，又强奸了我，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机密的……」司令官拉开抽屉，拿出一份文件摔在桌子上，声势逼人地说：「这就是妳偷走的檔，证据确凿。妳好大胆，竟敢 污蔑我强奸妳……」他站了起来，走到大阿姨面前，用手摸着她的下巴说：「像这样的小妞，我倒是真想强奸。」说完，他一边笑一边动手撕开大阿姨的衣服。大阿 姨挣扎着，她本就敌不过这个大汉，更何况此时双手被铐在背后。很快她就被剥得一丝不挂被拖到沙发上，又是那个沉重的躯体压下来，再次在她身上发泄兽欲。

司 令官穿上衣服出去了。大阿姨挣扎着用铐在背后的双手去穿衣服。门悄悄打开，那个小军官笨手笨脚地用钥匙打开手铐，然后又打开了书房另一端的一个门，原来是 卫生间，里面有一个大澡盆。离家几个月、再也没有洗过热水澡的大阿姨，此时更是需要好好清洗自己的身体。当她洗完澡穿上衣服走出来时，那个小军官仍然在书 房里，见她出来，慢慢的举起一只拿着手铐的手，轻声说：「要我去把士兵叫来，还是妳自己……」大阿姨什么话也没说，转过身去，又把双手放到背后。小军官轻 轻地铐住大阿姨的手，然后打开小书房的门，两个已经等在门外的军人迅速走了进来。一个军人对大阿姨说：「妳犯 了盗窃军事机密罪，妳被捕了。」她被关在台区军人监狱的单人小囚室里，每天晚上都被带出去审讯。她始终不承认那个强加在她头上的罪名，且控告司令官两次强 奸她。作为惩罚，她被戴上脚镣，双手也多次被铐在背后，被关进一间漆黑地下室达一年之久。终于她沉默了，被关进单人囚室。一段时间后，脚镣手铐也被一件一 件拿掉。

有 一天，这间囚室的门打开，她被赶到女犯们的大囚室，她每天与其它囚犯们一样可以在农田里劳动。但同时她又被严厉的警告绝对不准对任何人说话。而且在分派工 作时，她也总是被派在远离人们的地方单独劳动。两年没有见到阳光、没有呼吸过新鲜空气的大阿姨，此时好像得到了大赦一样。尽管是被严格监视着，干着粗重苦 活，吃着粗糙的食物，但对于刚二十一岁的大阿姨来讲，似乎阳光和新鲜空气对她已经足够。苍白的脸上出现了红晕，苦累活儿并没有阻挡住她体内的那股青春少女 的活力，天生的资质和俏丽又顽强地表现出来。

渐 渐地，上到监狱长、看守长，下到看守们竟都开始打她的主意，好说好劝不管用，那就强奸。上行下效，甚至一个刚强奸完，没容穿上衣服，另一个就又扑了上来。 抗议无效，控诉无门，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的撕打、反抗。但十次中九次都是失败的，另一次激怒对方，又被加戴上手铐关进单人囚室。

她 开始喜欢这四堵厚厚的墙。一个小铁门的囚室，尽管没有阳光、空气潮湿，但可以保护她在今后一两周内不会再被强奸。每次小铁门被打开时都使她感到恐怖，她有 意去做一些违反监规的事，好再被关进来。除了这间囚室，她再也寻求不到任何保护。她十几次自杀都被发现，「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可耻叛徒行为、对 抗改造、不服罪认罪等一大堆罪名扣到她头上，又被戴上脚镣、铐上双手，关进那漆黑的地下室。待到被放出来后，暴行又开始了。她四次怀孕，都被强行打胎。大 阿姨终于被「改造」成一具行尸走肉，没有反抗挣扎，没有思想，没有话可说。在监狱的日子也因此好过一些。

一 九七一年，已经被关了十五年的大阿姨仍奇迹般地活着。残酷的折磨和非人的生活使这个三十四岁的女人过早地衰老。头发斑白，皱纹爬上了她的脸，皮肤变得粗 糙，腰似乎也弯了；目光呆滞，脑筋也迟钝了。一天上午，她被叫到监狱长的办公室去，笔直地站在那里，准备接受另一场无缘故的训斥或处罚。可这次有些不同， 监狱长让她坐下，然后向她宣布了一个决定。十五年来由于大阿姨表现尚好，考虑到革命需要，并且使她也可以为革命做些贡献，决定将大阿姨假释，与一位老革命 同志结婚，去照顾老革命的生活和身体，同时可以在老革命的监督和帮助下继续「改造」自己。最后监狱长说：「妳还年轻，这是个机会，总比关在这里一辈子强，这是上级的决定，也是命令。如果不服从的话，可以考虑到后果是什么的。」大阿姨站起来，用清楚的声音说：「服从上级的命令。」监狱长高兴了，满意地点头。

十 多年的监狱生活，大阿姨终于说出这句共产党最爱听并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说的一句话来。监狱长让大阿姨休息几天做准备，在大阿姨离开办公室前，他笑嘻嘻地凑近 伸手捏了一下她的腰，又小声说：「真舍不得放妳走呀。」然后冷不防地在大阿姨脸上亲了一下。几天后，大阿姨手里拿着一个装着她的全部衣物的小包袱，跟随两 个军人进了吉普车。在车子驶出大门前，一个军人拿出手铐锁住大阿姨的双手。车子驶上了熟悉的街道上时大阿姨才知道，十五年了，她被关的地方竟然离家那么 近。见到外面的世界，她突然想家了，渴望见到亲人们，哪怕只看一眼也好。其实她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五年，更不知道她的父母亲、外婆、阿姨和姨父 都已惨死在这场运动中。这些坏消息，她也是十年后见到我母亲后才知道。

由 于交通混乱，道路不平，吉普车放慢车速。一个军人开始对大阿姨介绍关于那位老革命同志的事，大阿姨默默地听着，没有提任何问题。这位被称为老革命同志姓 肖，那年五十五岁，出生在河北省最北部山区里的一个极贫困的小村庄里。在他二十岁那年日本人血洗村子，一家人都遇难。他躲在死人尸体下，侥幸没被发现。他 掩埋亲人的尸体后就与同村的几个年轻人参加抗日游击队，整整与日本人打了八年。日本人投降后，这支游击队被共产党收编，他成了共产党军队里的一个排长。随 着军队又参加四年内战后，国民党败退台湾，共产党立国，他升任为营长。

战 争结束，大量军队干部开始转业，被派到城市和县城改做地方干部。他被留在了浙江省的一个县城里做地方治安干部。可惜的是，和平后的建设时期与战争年代是大 不相同的，这个在战争年代屡建战功的人，却在和平时期英雄无用武之地。首先是他从未读过书，大字不识，连续在工作中出现错误遭降级。后又因为三十好几岁的 人了，从不知女人是什么，在追求女人上不断制造丑闻。上司再也包庇不住，找他商量今后怎么办，没想到他十分爽快地要求回到自己的老家务农去。上司喜出望 外，马上同意，不但隆重地给他颁发荣誉证书，而且通过上级给他家乡县政府发去一份特别公文，提到由于他的功劳显着，回乡后可以不必劳动，也得到与其它农民 同等的收入，并且享有政府每年春秋两季的救济补贴金。他下令要求县政府通知所属各部门，都要尊敬他是个有功劳的老革命同志，尽可能满足他的要求。

他 回到久别的家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地方政府在被日本人烧毁的原址上为他又重建了两间石头房子，又在村子里的党支部中给了他一个挂名委员的头衔。这一切都 使他满意极了。开始时他还高兴地和村民们一起干活，可不久后他也认为自己是个大功臣、老革命、开国元勋，于是再也不愿意干那又累又苦的农活，开始变得游手 好闲。

他 整天梦想着娶媳妇，可由于这个小山村太穷，外面的姑娘不愿嫁进来，本村的姑娘又拼命要嫁出去，村里年轻小伙子大多都是光棍，即使有个女人要嫁也轮不上他。 他的梦始终是个梦，寂寞孤独的生活，终于使他酗上了酒，酒成了他唯一的伙伴，可也使他越来越懒，终于变成一个无赖汉。房子年久失修快要倒塌了，他也不在 乎。衣服越来越破旧，也没钱去添置新的，所得的那不多的钱拿去喝酒还不够用，每年分给他的粮食也换酒喝。村民们开始躲着他，他长了一个嗅觉灵敏的鼻子，无 论谁家做了些好吃的东西，他马上就闻着味来了，一点不客气地大吃大喝，同时又把他那些打仗的故事添油加醋地讲过一遍又一遍，直到酒足饭饱才摇摇晃晃地回家 睡觉。

文 化大革命开始后，老革命又变得十分重要。那个时候讲究忆苦思甜；宣传毛泽东大救星，共产党恩情比天大，他正是个合适的人选。于是大会小会都请他去，在几 百、甚至上千人的会上讲述旧社会是如何的苦，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人民的生活又是如何甜美，以及毛泽东是如何神明地指挥军队，终于把人民从苦难中拯救出 来。几百次的演说，他的故事变得越来越神，已毫无事实基础了。当时正在运动期间，谁又敢去批驳指正他，于是这个老革命大名重振，每次讲演后，照例给他一顿 酒肉招待，然后派人把醉得不省人事的老革命送回他的破屋睡觉去。

大 约是几个月前，一支军队在这个地区进行山地作战的军事演习。空闲之时访到这位大名鼎鼎的老革命，请他来给士兵们讲演，照例的一番口水四溅的胡说八道之后， 在士兵们的掌声和口号声中走下讲台，享受那顿酒肉的招待。也是凑巧，正赶上这支军队的师长巡查到了这里，几句交谈后互相认了出来，原来这位师长与老革命在 二十多年前是在一支部队里的老战友，只是由于文化程度的差别，人家做了师长，而老革命却成了无赖。师长了解老革命的生活状况后大为不满，立即向上级报告， 并且提到作战十几年，战功显着的老革命到今天这种悲惨的境地，不但是给革命事业的脸上抹黑，而且也使其它老革命们感到寒心；建议尽快解决老革命的成家问题，拨款修理房子，并提高生活待遇等等。看起来这件事引起了上级重视，房子很快地修好了，大阿姨成了老革命夫人人选，于是铐着手铐由两个军人押着来给老革命做太太来了。

长 达七、八个小时的路途中，那个军人两次提醒大阿姨，说她仍是个罪犯，刑期未满，只是由于革命的需要而给了假释的这个机会，如果不服从或者是逃跑的话，抓住 后要两罪并罚被枪毙的。然后又好意地劝说她与老革命结婚后，根本不用下农田去干活的，只是在家照顾老革命的生活，老革命享受地方政府特殊待遇，她也沾光。 傍晚前后，吉普车停在这个县城的一个旅馆前。下车前，大阿姨手上的手铐被拿掉了。在旅馆里，几个主要的地方官已经等在那里，握手寒暄后，两个军人向地方官 们介绍了大阿姨，说大阿姨是总政治部文工团的干部，听到老革命的身世后十分感动，主动地提出要与老革命组成家庭，共同生活。这

番介绍使大阿姨立时受到了极 大的尊敬，几个地方官恭敬地轮流握了大阿姨那只仍有手铐痕迹的手。一顿丰盛的招待后，再次握手道别，约下明天一早一同去那个小山村举行婚礼。送走地方官 后，那个军人给了大阿姨一个小时的自由时间，然后又用手铐锁住了她的双手，把她推进睡房后，关上房门。

大 阿姨久久不能入睡，她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更不知道老革命是个什么样的人。至于今后又会如何，她是不敢去想的，但有一件事使她放心，那就是从明天开 始，她只和一个男人上床，无论老革命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是他老婆了，他会保护她的。一个像她这种处境的女人，到了这个年岁，还能巴望什么？嫁个男人成个 家，好好过日子吧，生活苦又能苦到哪里去，总比监狱里强些。隔天，她的精神好了许多。当她舒服地伸着懒腰，手铐又马上使得心情沉重下来。难道他们要我戴着 手铐结婚？

门被推开了，一个军人披着衣服进来。大阿姨惊坐起来，双手紧紧抱在胸前，惊恐地看着他。军人笑了一下说：「紧张什么？」又向大阿姨扬了扬手里的钥匙，大阿姨才松了一口气伸出双手，手铐被拿掉了。军人笑着说：「今天你是新娘子，总不能戴着手铐结婚吧？」

大 阿姨趁机问以后还铐不铐？军人又笑：「那就是你们两口子的事了，如果老公要铐的话，我们是管不着的。」顿了一下，这个军人又说：「记着我昨天对他们是怎么 介绍妳的。十九岁参军，在总政治部文工团工作了十五年，是干部，其它的事不准讲，这对妳有好处，记住了？」大阿姨点了点头。他催她快点起来，早饭后马上动 身，有二十几里山路要走。

婚礼进行得很快，也很热闹。在那样的一个小山村里，这样的婚礼是相当铺张的了。身穿一身新军服的大阿姨和那位身着一身新做毛制服的老革命，向毛泽东的照片三鞠躬后，典礼结束。大阿姨被一群女人拥进屋里坐下，外面的男人们开始狂饮猛吃。

这个县里的几个主要官员由于那位师长的一份报告，都被上司叫去挨了一顿臭骂， 扔给他们三百块钱，说这是上级拨下来专款给老革命修房子，又告诉他们说很快就会有个上级派来的女人与老革命成婚，要他们好好去准备。这几个吓坏了的地方官 回来后，赶紧开会商量。跑到老革命住的村子里去查看安排，首先发现要想修好老革命的房子，三百元根本不够。县政府已是穷得都向银行贷不出钱为农民买种子 了，最后只好决定用三百元买修房材料，至于人工则只好求村

民们帮忙。又给公社的几个官员下令去筹办老革命的衣服和生活用品，公社的几个官员聪明，看到这个 情形知道这件事有来头，马上答应一切照办，而且还额外送来了几百斤麦子。村民派了几个女人，一天一夜用驴拉磨，准备婚礼那天蒸大馒头。一个县官员的亲戚在 临近的一个县里当酒厂的厂长，借着这层关系，拉回来几十斤烈性白酒，没花一分钱。主管商业的副县长又给县里的国营商店下令，商店经理马上老老实实的送来了 十条香烟。

最后，只有婚宴上的肉不好解决，几经商量，村里的民办队长出了个馊主意，村里有几家人家属于地主富农阶级，就让他们每家出一只猪或一只羊，这个主意得到一致同意。

于 是一群年轻人闯进了这几家人家，一阵鸡飞狗跳后，两只猪、两只羊被拉来杀掉。至此几个县官才算松了口气。没见识的村民们看到这么多大小官员进进出出为老革 命忙碌着，那天又看到新娘子是个军人，是在军人陪同下坐吉普车来的，马上就对老革命肃然起敬。老革命的神气劲又来了，大呼小叫地招待客人们，忙里偷闲的也 没少往自己的嘴里灌酒，直到几个官员悄悄把他拉到一边小声地说了些什么后，他才红着脸点着头，无可奈何地把手里的一满瓶酒放下。太阳落山，天黑了，山村没 有电，村民们习惯起早，这时也到该睡觉的时候。于是酒足饭饱的人们开始散开，吉普车载着几个官员和两个军人离开了，村子又恢复寂静。

老 革命关紧门，端详着坐在小油灯边的阿姨，心里高兴是不必说的，五十多岁的人了，终于有了自己的女人。他嘴里哼唱着「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 毛主席亲」，又吸了一袋烟，才站起来脱衣服准备上床。这时大阿姨才抬起头，第一次正眼看着他，问他叫什么名字，一对互不相识的人才开始互相自我介绍。几句 简短交谈后，老革命突然一口气吹熄油灯，向大阿姨猛扑过去。大阿姨本能地挣扎了几下，突然想到现在和以前不同，这个男人是自己的丈夫，他有权这样做，而她 有义务顺从。挣扎停止了。但当老革命在她那赤裸的身体上疯狂地抽动时，她感到这与以往多次的被强奸没有不同。

大阿姨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鸡叫起床，日落睡觉。老革命教她喂猪养鸡，又在屋前屋后的空地上种了菜。两个人都不必去干活，有的是时间安排料理生活。不过一个月，老革命的家变干净整齐了。

老革命也变了，胡子经常刮，衣服也像个样了，最重要的是再也看不到他喝酒，房前屋后总能看到他在侍弄着自己种的菜。二十年来，村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干活呢，一齐夸赞老革命有福气，娶了个好老婆，人人都为老革命庆幸。

但 大阿姨似乎没有变。生活清苦她不在乎，何况又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更没有人整天训斥她。村民们朴实，对人也忠厚热情。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翻地覆，这 里是世外桃源，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清外面发生了什么，人们也不想知道。这个村子与外界唯一的联系，就是每月两次一个乡村邮递员来送信，但多数的时间是没有信 的，人们去争抢那几张报纸，然后撕成长条用来卷烟抽。村民不识字，没人会看报。生活悠闲清静，天黑后更是静得连狗都不叫的。大阿姨确实感到一种解脱和舒适 感，也逐渐地喜欢上这个小山村，与村民们相处得也很好。

老 革命对这个新夫人可以说是爱如珍宝，这一点大阿姨是百分之百地肯定的。但问题是，一个从没读过书又到了这个年纪的这个人有些变态了，而且性欲又极强，每天 几次地做。无论是白天黑夜，只要他想要，大阿姨就立即被推倒在床上。气喘吁吁地发泄后，不许大阿姨穿衣服，他还要欣赏、抚摸大阿姨赤裸身体的每一个部份。 异性肉体对他来说，永远有着巨大吸引力和发泄不完的欲望，这成了他最大的乐趣。而这对于大阿姨来说是折磨，这种折磨比坐牢更苦。婚后的第四天，也是出于 「爱」，大阿姨的双脚上多了一副铁链，两端均被锁锁在脚脖子上。做爱时打开一只脚上的锁，完事后立即锁上，从不疏忽。大阿姨抗争过几次无用，但得到了更多 的温存和体谅。老革命也是个诚实的人，毫不隐瞒地说出了三点理由，首先是这个村子这么穷，怕她这外面来的女人受不了会逃跑；第二是年龄上二十年的差异，又 知道大阿姨是文工团的干部，怕她看不起他会跑掉的；第三点是村子里光棍这么多，怕他们打大阿姨的主意。无论大阿姨如何解释，这根铁链始终牢牢地锁在双脚 上，老革命情愿做任何事去讨大阿姨的欢心，去使大阿姨笑，但在这根铁链上绝不妥协。

苏明长篇连载《血色中国》（8）

成文日期：2008-11-22 16:07:36　更新日期：2008-11-22 16:07:36　点击:2979

老 革命的这个锁脚的作法，村民们没有异议，甚至连受到尊敬的老村长也赞成。同村的女人们时常来串门聊天，对大阿姨脚上的铁链都做出一种视而不见的样子，女人 们的解释大同小异，有的说这个村子这么穷，十年了都不见个女人嫁进来，好不容易嫁来个女人不锁上点怎么行。还有一种似乎是带有哲理性的解释，说女人嘛天生 就是受罪的。更有一种带自豪感的说法是男人爱妳，离不开妳，所以锁住妳。最后的一种说法似乎才接触到实质：去问问这个村子的女人们，哪个不是被锁过一年或 两年，等生了孩子后，男人就不锁妳了。她没办法，渐渐地也习惯了。她在屋外喂猪或打扫院子时见到路过村民也不再难为情了，偶尔得到老革命批准和几个女人去 别人家作客，双脚拖着铁链一摇一晃走在村中泥土小路上，从来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每 次当老革命应邀出去讲演时，都有几个女人被请来日夜陪伴着大阿姨。每次他讲演回来后，也都像是饿虎扑羊一样，要在大阿姨身上发泄够了才肯起身。一年半后， 老革命终于有了自己的儿子。大阿姨脚上的铁链果然被拿掉了。老革命高兴得像疯了一样，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搂着大阿姨，接受村民们的道贺。受了上次的教训的 地方官们马上送来一点钱和婴儿必需的衣物。儿子办满月那天，老革命把自己的唯一的猪杀掉，请全村人吃一顿。以后几年中大阿姨又怀孕几次，但都没有活胎。这 个孩子就变得更是宝贝一样。

给这个儿子过七岁生日不久后的一天下午，老革命打发儿子出去与村童们玩耍，然后把大阿姨按在床上做爱，就在他发泄出来的一瞬，一口气没上来，两眼一翻没再爬起来。村民们赶来七手八脚去救他时，一位有经验的老村妇对大家说：「人死了，准备办后事吧。」

当地政府出钱出力埋葬老革命，宣布他生前的特殊待遇由大阿姨继续享有并用以抚养孩子。

不 久后的一天，在县城开了一天会的老村长骑着车回来，没顾上回家就在村子中的那棵大树下召集村民开会，告诉大家现在形势变了，不搞文化大革命运动，新的「四 个现代化」运动开始了。在这个运动中，所有的孩子都要上学读书。他指着驴背上的两包书和本，对大家说：「书本我已经领来了，学校的地点我也想好，就是那间 破牛棚。大家一起动手修，做上几条长板凳，我们马上就开学。」尽管村民们蒙昧，但听说让要孩子们上学还是高兴的。于是有人就马上问，谁来当老师？老村长似 乎才被提醒，马上告诉大家，县政府已经指定大阿姨担任这个学校的校长和老师，每月享受额外的十二元津贴。村民们齐声惊呼；十二块钱是个大数呀。大阿姨愣着说不出话来。

几 天后，学校开学。大阿姨变得忙忙碌碌，但同时也给她的生活带来乐趣。她不但要教全村五十多个从六岁到十五岁的孩子，而且也变成村子里的几个体面人物之一。 不识字的村民们对老师有特殊尊敬，凡村干部们开会，大阿姨皆被邀请参加。一次会议上，大阿姨要求村长下令以后报纸都要有一份给学校，她要教孩子们读报。命 令被执行了。二十余年没看过报纸，又始终过着与世隔绝生活的大阿姨，用了几乎一年多时间才了解这二十多年来整个中国发生着什么，同时也隐隐感到劫后的宽松 和恢复气氛。她第一次提起笔给家里写信。几周后信被退回，注上查无此人。以后又写了两次，但结果与第一次一样；她给哥哥和妹妹写的信也被退回来。写给我母 亲的终于没失望，她带着儿子第一次离开那个小山村，回到阔别二十五年的北京。

可想而知老姐俩见面时的情形了。她们抱头痛哭，叙述着遭遇，又为死去的亲人们几次哭得死去活来。几乎两天两夜，她们几乎没睡过觉，不停地说着、哭着。我们兄弟对大阿姨这个儿子有着极大的同情和好感，他是大阿姨的唯一亲人。我们极力对他好，带他去玩、去吃， 又给他从头到脚换新衣服，并送给他不少玩具和书。一个多星期后，他们母子要回去了。我们送他们到火车站，把两只装满衣物用品的新旅行袋放在行李架上，然后 隔着车窗，又是叮嘱，又是安慰。火

车开动，父亲把两百块钱塞进大阿姨手里，大阿姨推辞着，父亲只说了一句：「不要苦了自己，妳已经受了太多，要保重。」

大 阿姨总算是被找到了，然而大阿姨的妹妹至今下落不明。三十多年过去了，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据母亲讲，大阿姨失踪一年后，姨公死于癌症，姨婆对这 个小女儿格外宠爱起来。小阿姨和她姐姐一样天生丽质，爱唱爱跳，尤其喜好京剧，据说唱得十分好，逐渐像着迷一样非要拜师学京剧。姨婆抵不住小阿姨的几次要 求，终于请来当时最走红、大名鼎鼎的京剧界魁首梅兰芳先生，大摆酒席并让小阿姨当众磕头拜师。其实小阿姨也只是对京剧喜爱着迷而已，她并不真正具备这方面的天赋，以后登台表演几次后，京剧界的评论并不太好，只是由于她是梅兰芳先生的学生，又长着一张漂亮的脸，始终吸引着一部分观众。据说有一次小阿姨演主角，姨婆动员所有的亲戚朋友们捧场，到了开演前整个戏院还有一半的座位是空的，戏院的外面却挂出客满牌子——姨婆好面子，买下了所有没卖出去的票。

几年的舞台生活，小阿姨的演艺才能没有提高，但在她在个人生活上却发生重大的变化。一个年轻有为、懂艺术、在文化部当处长的高大年轻人迷恋上小阿姨。一年多的追求后，她死心塌地嫁给他。

在他们的女儿出生后不久，小姨父高升被派到南方的一个省去做文化厅厅长，小阿姨成了高官夫人，带着女儿随丈夫去了南方，回来探望姨婆和太婆过一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从此失去她的消息。直到文革后她那做了主任教授的哥哥退休，用两、三年时间去找她，所知也不多；只知道文革开始后，由于小姨父受不了没完没了的批斗跳楼自杀，小阿姨成了反革命者眷属，被送到郊区一个农场去劳动改造，不久又被送到边远某一个小村子去，究竟是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

所 有的线索全都断了。这个省的各派组织之间在文革期间发生过上百次武斗，尤其在军队参与运动后，不但武斗的规模大了，且由以前的棍棒拳头的武斗方式一下子升 级为机关枪、大炮和坦克，每次武斗后的死伤人数也由以前的几人、十几人升到百、千人，至今这个省还统计不出来到底有多少人死于文革的武斗期间。小阿姨所在 的那个劳改农场负责人和看守们已全部死光，查找线索至此全部中断，小阿姨和她的女儿被送到什么地方去，成为永久的谜。我不应该这么想，但我的确希望她们已 经死了，没有遭受过与大阿姨同样的罪。

第八章 俗人有俗事

副 所长阿成打来电话，要我去他办公室。一位朋友从福建来送了他一点茶叶，知道我是专喝福建茶的，刚沏好，他请我去品尝一下。我们同时坐在沙发上，我打开茶杯 的盖子，一股芳香气味扑面而来。我不禁点了点头，大赞新茶味道就

是不同，不必尝，只闻气味，就是极纯正的。阿成尝一口茶，也不住地点头称好。他看来很高 兴，一直微笑。

我 放下了茶杯问道：「你要我来，有什么事吗？」他摆了一下手说：「没什么事，就是请你来品尝新茶。你我平时工作太忙，难得有个机会能静静地坐下来，聊聊天放 松一下。今天有借口了，尝尝新茶不就是个好借口吗？」我笑着说能忙里偷闲喝杯茶，确实是个享受。阿成又呷了一口茶慢慢说：「茶是起源于中国的，后来传入日 本，成了什么茶道。你看看那些讨厌的仪式，磕了几十个头，双手捧着个饭碗，好像讨饭的乞丐一样，这也是文明？我可接受不了那种东西。」我点了点头，告诉他 年初一个日本留学生在课堂上向我提的一个问题。那个小日本问我：「你提到中华民族已经有了五千年的文明史了，可是贵国政府却说，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农 民起义、改朝换代的历史，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中华民族的五千年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内斗史呢？另一方面，凡遇外民族入侵准失败，例如元朝统治了中国九十七 年，清朝统治了两百六十八年，这三百多年是不是也算中国文明史里？」

我 说到这里，阿成打断了我说：「可恨！一个学生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回答的？」我说我当时气坏了，压着性子对那个小日本讲：「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 在他们的历史上都有过被屈辱的时期，但与整个历史比较起来，这种时期是很短的，同时历史又证明，任何一个野蛮落后的国家在以武力强行占领了一个文明发达国 家的同时，也在被这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征服。例如本世纪中日本侵华一事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我说，我一点不客气地对那个小日本讲，回去后可以转告他的同 胞们，告诉他们你们日本人还是很幸运的，那是因为我晚出生了三十年，如果早出生三十年的话，我是不会允许日本人想打就打，打败了就投降的，我不会接受投 降，我会一直追着他们打到日本，然后效仿他们在中国的所为，直到我说够了、不打了，才算完事。他来中国学习，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 身」。我对他说，希望他下点功夫，搞清这句话的意思。

阿成笑了起来，说：「我了解，也只有你，才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以后有什么麻烦没有？」我说，有点儿，不大。几天后历史系的总支书记找我谈话，指责我在回答日本学生的问题时说了不该说的话，因为中央一再提出要「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不要再提那八年抗战。我一听就火，问那个书记是不是想把日本侵华的历史也改写一下。同时告诉他，我是搞历史的，不是搞党史的；我尊重事实，不行胡乱改写。我说的话我负责，同意不同意是别人的事。

阿 成笑起来，喝了一口茶后对我说：「这件事我全知道。大学方面寄来了份公文，专门讲这件事，要求所党委对你进行批评，所党委在开会时，也把这件事当成了大 事，有人建议要你停职反省，还是我在会上说的，这件事就让我来处理吧，在下一次的党委会上，我告诉他们我已批评了你，你也承认说话有过份之处，此事也就过 去了。

今天提到，我才告诉你，否则我也记不起来了。」听了他的话，我一愣。没想到为了一句话，还引起公文的来往，同时又勾起了我的火气。我对阿成说，两千多

万中国人命死于八年的抗战中，难道我说句话，比杀人的罪过还大？阿成没说话。我点了支烟，狠狠地吸两口。

阿 成看了我一眼，对我说：「我回答不了你的问题，我也正是一肚子气。两天前我参加了一个宴会，一个日本专家小组于咱们的一个研究室有过一项合作，项目完成 了，日本人准备回国了，日本使馆出面举行的这个告别宴会，我和书记郭都被邀请了。当宴会结束时，我们站起来告辞，日本人一边与我们握手鞠躬，一边又很快地 把留在桌子上那些已经打开了包的香烟塞进我们的口袋。我当时就火了，掏出那半包香烟，给他们扔了回去，同时说，我不接受侮辱。那个日本人一愣，我也没与他 握手，转身出来了。书记郭喝酒喝得满脸通红，当半包烟塞进他口袋时，他又是笑，又握手，还学日本人鞠躬。在车子里，我们有过争吵，我说的他不服，反过来还 指责我不友好，我当时也在气头上，说了一句：『不接受侮辱就是不友好，那么我是不是应该把老婆送来让日本人睡才算友好？』到今天，我们两人还不说话呢。说 句不该说的话，如果日本人再侵华，汉奸就是这些人。」

办 公室里静了一下，阿成又将茶杯倒满水，笑着对我说：「我们言归正传吧，请你来品尝新茶是一个目的，另外还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我马上放下茶杯。他继续 说：「这个研究所没有所长，只有一位名誉所长，是个物理学家，已经很老了，只在家里养病、写书，从来不上班的，工资都是每月派人给他送到家去的。我是副所 长，实际上等于代行所长的全部工作，所以在党委又给挂上了第一副书记的头衔。阿宗是民主人士，只是主管研究项目和进度工作。所以我的压力很大，党委会上也 讨论过，决定提拔一个人做我的帮手，名义上叫作所长助理，人选一事也争论了几次了。现在只是在两个人中做最后的决定了。一个是数据室主任阿建，另一个就是 你。我是希望能担任这个工作，你怎么认为？」听到这里，我倒抽一口气，半天说不出话来。阿成笑着说：「别紧张，我不要你马上回答，你可以考虑两个星期。」 我抽出一枝烟，用打火机点了几次才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后我才说：「你应该了解我，我不喜欢也不想当官。只是想安安静静的搞点研究。尤其我的教授刚告诉我，要我和他合作写一本书。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正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这个时候，你让我当什么助理，不等于是要我的命？」

阿 成笑说：「不出我所料，你会拼命推，想方设法不干。而阿建是拼命钻，千方百计要干。而且听说阿建已经给书记郭送了价值八百元的一份礼。我不但没收过你送给 的礼物，也没听到句感激的话。反而还要赔出茶叶来劝你。我看我这才是自找麻烦呢。」我马上说：「人人不同，我不懂政治，也不是干行政工作的材料。阿建愿意 干，为什么不让他干呢。他有后台，出事有靠山的。我的家庭可不同，都是知识分子，出点事可就全家都倒霉。」阿成收起笑容，对我说：「我可以再多给你几个星 期去考虑，但盼你刚才的话不是最后的回答。我希望你多想想，与你的朋友们去谈谈，现在不要对我多说了。我会再找你谈。」说到这里，他站起来做出要送客的样 子，但马上又走到办公桌后，从抽屉中拿出一个小铁筒送到我面前，说：「这是刚才喝的茶，送你一筒，慢慢享受。」

阿 建这个人，全所上下都知道的。他父亲是军队里的一个中将，指挥一个集团军，仅这一点就已经使人们对他另眼看待了。阿建本人高高的个子，相貌很好，

与我同 龄，现任资料室主任。他说他香港大学毕业，可是没人知道他学的是什么专业，更没人看到过他的毕业文凭。实际上他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是可信的。在知识分子 中，几乎没人与他交往，一个共同的看法是他不学无术、好吹牛、讲究官派，讲究吃喝玩乐，爱在女人堆里混，已有几个漂亮女孩子让他弄大了肚子。连阿天这种大 少爷都不与他来往，说阿建这种所谓的高级干部子弟，除了吹牛之外实际上什么也不懂。

其 实说起来，我与阿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一年前的一天，我和阿建下班骑车回家的路上，不知因为什么突然提到了涮羊肉，我说我可以吃两斤，阿建说他可以吃三 斤，说着说着勾起了馋虫。我们进了一家饭馆，要了五斤羊肉片，也说不上三斤、两斤的，一顿都吃了，还喝了一瓶酒。在付账时，我们又争抢了半天，最后我坚持 由我来付。从那以后，我们变得熟悉起来。可不好的事是不管我忙不忙，他来我办公室聊天，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于是，我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估计他又该来找 我聊天时，我就去他的办公室坐上十几、二十分钟，然后借口有事就走掉了。总的说，我和阿建的关系是正常的，不是朋友，只是作为同事相处还不错。我这个人没 有任何偏见，而且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如果阿建对我表现出不敬，或者以他父亲的权势压我，我是不会客气立即回击。也正是他还没在我面前表现出这些东西，而 且又愿意和我来往，我当然没有理由拒人于千里之外。

现 在事情复杂了，无形中我们成了对手。他上窜下跳又送礼，要谋求这个职位，我是千方百计要去推托开。我明白，但阿建不明白，他把我当成了对手，而我却无意与 任何人作对。这个阿成可把我害苦了，为什么不让我安静地过日子？偏偏把我架在火上。可能天下的男人都如此，烦闷时就想去喝杯酒。我又从不自己一个人喝酒， 总喜欢找个伙伴边说话边喝，真正能和我对饮的则只有阿聪了。我没回办公室，直接去找阿聪。他正趴在办公桌上写着什么，见我推门进来有点惊讶。我对他说：「你忙不忙？能不能现在就下班？咱们找个地方去喝几杯酒，怎么样？」

与 阿聪山南海北聊天，一瓶酒已喝完，又打开了第二瓶。阿聪一直没有说话，却专心地听我说。这时他拿起了瓶子，给杯子倒满酒后，便开门见山地问我：「告诉我， 是什么事？三十年的朋友了，我还能不了解你？说吧，我听着。」我才开始老老实实、一字不差地对他讲述我和阿成的全部谈话内容。他面无表情地听着，又大口地 喝着酒，同时不断地吃着。我说完后，他又把两只杯子倒满了酒，然后举起他的杯子要和我碰杯。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是好事，应当庆贺的，干杯吧！」我把 已经拿起的杯子放下，问他说：「开什么玩笑？我是烦，才拉你喝酒，也想你能给我些主意。你不但不帮忙，反而要庆贺，庆贺什么？」

他 没理我，自己把一杯酒一口喝光，又点了支烟，才对我说：「我已经庆贺完了。我不管你怎么想，只告诉你一点，在上级的人事部门中，对你和阿建这两个人选，他 们是会选你的，他们不会蠢到把阿建这种人放到一个要做大量实际工作的职位上。这是我的分析。不管你什么烦，你是跑不了的，赶紧把酒喝了，我回家还有事。」

回 到家刚好是晚饭时间，父亲已经居中坐下了。母亲正把一大碗汤放在桌子上。看到我回来了，对我笑了一下，但马上就发现我喝了酒，于是抱怨说：「看你一脸的酒 气，下了班，不回家，怎么又去喝酒呢？」我没说话，坐到桌子边上，端起了饭大口吃着。母亲是反对我喝酒的，但唯一能使她高兴的是，我每次喝了酒后都吃特别 多。母亲一边向我碗里夹菜一边说：「快四十岁的人，少喝酒，小心心脏和肝，这个年龄最容易患上心脏病和肝硬化的。」我点头应着。吃饭从不说话的父亲突然 问，是不是有什么事？我摇一下头，但又点头。父亲脸上现出关切的样子，我马上说：「别人认为是喜庆之事，而我却不那么看，古人说：『激流勇退』。退不出， 还要进，进退两难。真想出家做和尚去，可是和尚的饭我吃不了，只好仍做俗人。俗人有俗事，酒就是帮俗人应付俗事的，孔圣人也说：『唯酒无童』。」

做 母亲的总是敏感。晚上抓住个机会又问我是不是工作上不顺心，或有什么麻烦事。看着母亲慈爱、关切而又认真的样子，我真不想她多操心。这些年来她已经经历了 太多的苦难了，好不容易才有了这几年的平静生活。所以我说：「放心，没有事的，只是突然想喝酒了，约阿聪一块喝了几杯。您是知道我的，我酒量大，从没喝醉 过的。」母亲看着我，慢慢又说：「我知道在外面工作不容易，你现在又有老婆、女儿的，遇事能忍就忍，能退一步就退一步，实在有什么为难的事，就和你爸爸去 谈谈，他工作几十年了，经验总是有的。还有，以后想喝酒，就在家里喝，我给你弄菜，你吃着也顺口，我看着你喝酒也放心，好不？」

共 产党极力要人们信服他们什么事都能干，这一点我不反对，因为这是真的，但是说法上还不够精确，正确的说法应是：共产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据几个消息灵通 的人讲，研究所高层近来有争执，而且进入了白炽化的阶段。事情起因就是那群督导员们。自从卸了任以后，他们吵吵闹闹过了两三个月，看来大局已再也无法挽 回，于是沉静了一个阶段。但这群人在理解中央政策上是有独特本领的，他们马上把「搞活经济效益」等词句，变成了大办商业、赚钱获利的实际行动。于是这群靠 着整人过了一辈子的党棍们，联名上书给党委的书记郭，要求一笔资金开饭店，并保证每年向所里上缴十万元利润。

侥 幸保住职位的书记郭大为高兴，想终于这批人想出了什么事可干了，总比他们整天喊冤叫屈、摆资历、比地位地吵闹要强。书记郭马上点头，并一再保证全力支持并 帮助，而且大方提出两年之内无需上缴利润，甚至连个合同也没定，更没有与阿成商量，利用职权强行调出研究经费一百万元给这群人。很快地，一家规模很大的饭 馆开张。书记郭去道贺，当然一顿丰盛招待是一定要的。

从 那以后，所里再也看不到这群人闲逛的身影，职工们觉得清净了，不久听说另一家饭店也开张，又听说在什么地方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大大小小的贸易公司开了有十 几家，也有的说开了二、三十家的，实际上都在干着买空卖空的勾当。这些督导员们穿上西装，系上领带，漂亮的名片头衔都大得吓人，什么集团的总裁、某某贸易 中心董事长、总公司总经理，这些公司都在哪里则没人知道了。他们整年包租着出租车，给司机一点钱，把出租车招牌拿掉，于是就像是大老板的私人车了，再每月 用上百八十块钱，雇佣一个年轻女孩子做秘书，派头做足，倒也神气。

据 说前不久，有人看到副所长阿成恼怒地走出书记郭的办公室。又有人说阿成与书记郭有过几次大争吵。不久又听说，财务处长老君向阿成递交辞职书。后来听说书记 郭为这群督导员共拨出四百万元的研究经费，可利润却是一分钱也没上缴。据说还有一些督导员们欠下大笔的债务，不得不东藏西躲逃避债主。书记郭的理论是：新 的形势，要学些新的东西，在学习过程中花些钱，买回些经验教训还是必要的，这不是原则错误，不值大惊小怪。阿成则指责财务处长的账目的空白，质问四百万的 收据在哪里，几十位经理、总裁、董事长们长年包租汽车，用公款吃喝送礼包女人，无论如何要把收据拿回来，顶上四百万的亏空让账目平衡；这是常识，否则的话就是贪污。书记郭马上摆出一副吓人神情大喊：「为党工作了几十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到了今天，竟敢有人说我贪污，我连贪污这两个字怎么写还不知道呢，我和你去上级那里讲理去。」

后 来如何我就不知道了。我抓住一个机会离开这个喧闹之地，躲到陕西的一个古老乡村进行考古挖掘。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比预期效果和进度要好的多。六个星期后， 我们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再一个星期就可以出土文物回北京。一天下午，我们正在现场工作，村里的邮递员来到工作棚，交给我一份电报。我赶紧打开来看，原来 是上级的组织部打给我的，要我收到后立即赶到北京，向组织部报到，有重要事面谈。我把电报递给两个同事，自己却在紧张地思考着可能会是什么事。组织部的工 作是审查和推荐干部。阿建应该已经上去了，又找我干什么？

第九章 共产党与黑社会帮会是一样的

根据指点，我来到组织部。两位五十多岁的男人与我握了手，一位是副书记，另一位是组 织部长。部长给副书记和我递上烟，我又站了起来，替他们与我自己点燃了烟，部长笑着问我在陕西的工作情况。我是有准备的，简单地讲述了整个的发掘情形：两 个星期后，发掘出来的东西就可以全部运回来；分析、研究工作和写论文，至少要半年时间。那位副书记听我说完，笑着对我说：「我想你怕是不能进行这下一步的 研究工作了。党组根据组织部的提名，又几经考虑，最后决定委派你去担任你们研究所的副所长职务，同时兼任所党委的第一副书记，而且要你立即到任，开始工 作。」我一下子愣住，反应不过来，只是看着他，说不出话。组织部长笑着对我说：「祝贺你，组织部是根据政策和选拔干部的标准，提出了几个人选的，然后又做 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最后将你推荐 给了党组，很快就得到了批准，所以我们才打电报召你回来，这是上级对你的培养和信任呀。」到了这时，我似乎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我的心开始往下沉，两眼呆呆地盯着正在燃烧着的烟头，似乎同时出了一身冷汗。副书记对我说：「你怎么不说话？有什么困难讲出来，我们会帮你。组织部是党员的家，来到这里就如同回 家，什么都可以说。」

我 镇定了一下，对副书记和部长说：「我很感激你们对我的提拔和重用，实在是感激，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我没想到会是我，为什么？说句实话，我连一个研究 室的副主任也是不能胜任的。我学的是历史，爱的是历史，工作几年了，我可以说我干的不错，有成绩。所以，我请求上级收回成命，同时免除我现在的副主任职 务，就让我一心一意地干，给我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我会干出成绩。」

说 到这里，我停了一下准备继续说下去时，听到了他们三个人的笑声。组织部长边笑边说：「我干了三十多年的组织工作，你还是我第一个遇到的，别人都是感激，并 表示要干好工作，你却是在推托，有意思。你心里有什么事就说吧，书记也在这里，有什么条件可以提出来。」我摇了一下头，问他阿成是不是升了所长。部长摇了 一下头，看着副书记，副书记收起了笑容慢慢地说：「阿成已经调离了，上级对他另有任命，你就是去接替他的工作。实际上，你也明白，你是代行所长工作的，只 要你把工作干好，上级会对你下新任命。」

我 坚持问阿成是因为什么调离的？副书记的脸拉长了，组织部长说：「这你就不要问了，上级做事是有原因的，这也是党的安排。我们正说着你的事，总该表示个态度 吧。」我没回答他，接着又说：「阿建已升任所长助理，而且已经干了三个月，也有经验了，应提升他，而不是我……」我还没说完，副部长插进来说：「阿建的提 拔没有经过我们的审查更没有党组的批准，所以阿建仍回到数据室。你到任后会忙一些的，但一切正常后就好了，目前上级没打算设立所长助理，或增添副所长的位 置。」

我 正要说话，副书记站起来，笑着对我说：「我还有个会，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和两位部长谈，有什么困难，你可以随时找我，也可以找副主任委员，他是你的行政上 级，我们都会支持你的工作的，希望你立即到任。」说完，他伸出手与我握了一下，就转身出去了。我坐下后，部长对我说：「党对你做了详细调查，又根据新的提 拔干部的五个条件，比较其它的人选，相信你是有能力胜任这个工作的，于是才做了决定。你是党员，就应该接受考验和委托，这是原则，党已决定了的事，怎么可 以由于你一个人的反对而推翻？」听了他的话，我不客气地说：「既然是对我做决定，怎么可以事先不通知我，又不征求我的意见？」

部 长反倒笑了，对我说：「党是有权力对任何一个人作决定的，不需要去征求本人的意见的。」我也笑了一下，用比较缓和的口吻说：「我实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 不太会做官，也不想做官，我可以给你一个实际例子，在我做副主任前的四年半里，我发表了十篇论文，当了副主任至今，已是两年了，仅发表了一篇。其实，我手 边既有项目又有数据，所需要的就是时间，这次的任命等于是

要我放弃专业，改行从政。说实话，我不是那块材料，一旦出点事，责任可就大了，我承担不了的，也 给党的工作造成了损失，到那时即使把我枪毙也已经太晚。所以，我郑重请求上级重新考虑人选，我不够格。」

副 部长笑了起来，说：「我原以为知识分子客气、谦虚，表面上推托一下而已，没想到你是真的推辞，真是少见。」我马上说我讲的都是实话，我知道自己，也了解我 的能力，「党的工作都是重要的工作，我干不了的事一定要我去做，会对党的事业造成损失，到那时候谁又去负这个责任？」部长的脸拉长了，对我说：「党负责。 党提拔你，委任你工作，你去做了，没做好，党负这个责任。可是你不接受党的委托，那么你是要负责任的。此事已经决定了，你们所的党委已接到了通知，正等着 你到任。我知道你在陕西工作了三个月，很辛苦，但你不能休息了，这件事就这样定了。有什么困难、问题，党会帮你解决。」说完，他站起来，伸出手做出送客的样子。我没有去握他伸出的手，只是说我还需要时间考虑。

部长马上说，希望我考虑的是立即到任，而不是考虑接受或推托。

我 有点冒火，刚想说话，副部长在我胳膊上拍了一下说：「当然可以考虑了，今天考虑，明天到任。你们所已是三个星期没有行政主管了，快去把那个乱摊子收拾好， 然后你有什么话要说，可以随时来说的，我们永远欢迎。」拉着我到了门口，她又握着我的手说：「党是相信你的，你也会干好的。」部长这时也来到门口，脸上挂 出笑容，对我说：「再次祝贺你，你三十多岁就被提拔到这个高职位上来了，想想吧，你我是同僚，作为同僚我只想说，千万别固执，服从决定马上到任，好不 好？」他再次伸出了手，我只好握了一下。走到了外面，推着自行车，竟不知道该去哪儿。回家？父亲每天被汽车接走去做顾问，母亲对这事的看法我是知道的，朋 友们都在上班，想找个人商量一下都没有的。

我第一次感到自己那么孤独可怜，我长长地叹了口气，惹得站在大门外的警卫直看我。

我 推着车站在那里，突然想起今早送女儿去上学时，女儿对我说让我下午去接她，并要我给她买个冰淇淋。三个月不在家，我决定现在去接女儿，带她去颐和园玩，那 里的石舫饭馆还是不错的。忘掉一切，别辜负了这个好天气。女儿高兴极了，午饭吃得也好，满足女儿吃鸡肉的愿望。看着可爱的女儿，我也高兴了，与她一起又跑 又跳地玩，只可惜忘了回家拿照相机，真应该给女儿多照几张。

直到傍晚我们才回家。女儿吃着冰淇淋，一直在滔滔不绝地对我说着什么，我极力地表现出认真在听 的样子，几次我实在忍不住笑。当我们手拉着手回到家时，已是万家灯火、炊烟缭绕的时候。

父 亲从他的房间出来，问我与组织部谈话的内容，我拉他重又进了他的房间，并关上了门，把上午的整个谈话内容如实地向他重述一遍。父亲的脸阴沉了下来。「我不 知你是怎么想的，我可不认为这是件好事，要三思呀。」我说，我也不认为是好事。可一时又找不到人商量。所以带女儿去玩了一天，准备今晚商量，看看有没有办 法可以摆脱掉这件事。「到了这个级别上，就由不得自己了。从他们吞吞吐吐的话中分析，阿成不知是坏在什么事上，已被调离，说是另有委任，可又不说究竟是什 么事和什么委任。」父亲点了点头说：「别忘了，现在是平静时期，可能还不会太坏，如果赶在运动中，那就不要讲身家了，连性命都难保的。你是从头到尾经历了 文革运动的人，做个知识分子挨整挨斗多少还有个机会可以活下来，可是从了政的人，就是身不由己了。」我马上说，我当然明白，所以才推托，打算想个什么办法 推掉这事。父亲摇了摇头说：「不容易，也可以说太不可能了。这件事要好好想想。」正说着，母亲喊我们吃饭。

饭桌上母亲和太 太几乎同时问我组织部找我什么事，有没有麻烦。我正塞满了一嘴的饭，说不出话来。父亲简单地对她们讲了一下。母亲马上皱起眉头，叹了口气。我太太却大高 兴，问这问那，又对女儿说：「爸爸升官了。」我咽下了嘴里的东西后，对太太说：「先不要高兴，我还没决定干不干呢。」这时母亲开口了，她说：「文革还不就 是个教训，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副所长了，一个堂堂的国家主席、元帅、部长们，还不是说关就关起来，说不给饭吃就活活饿死吗？好好做学问、写文章，已经有点成 绩了，为什么又想当官呢？政治风云变化无常，咱家没个靠山或后台，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政治肮脏，一旦与做人准则或者与你的所学背道而驰，怎么办？」我放 下饭碗站起来，拿来了酒，将酒倒在杯子里大口喝了两口。父亲对母亲说：「不说了，先吃饭吧。」然后转向我说：「喝两杯就不要再喝了，永远保持头脑清醒，尤 其在这件事上。」

那 天晚上，当全家人都已经睡了后，父亲把我叫到起居室，关上门后对我说：「我和你的恩师已经谈过，最后的一致看法是，你必须接受这个任命，并立即到任工作。 这是没有办法的，只是今后处处小心，说话小心，遇事多想，慢慢找机会再退下来。当然是不容易的，可总会有什么机会的。」说到这里，父亲的声音变得小了，几 乎是耳语般地对我说：「其实，共产党与黑社会帮会是一样的，它看中了你要你去干什么，你不干，早晚是有麻烦的。我比较高兴的是，当初他们要你入党你没拒 绝，如果那时你拒绝了的话，你后来的大学、分配工作和在搞研究上都会遇上麻烦的。把这一条记入你的档案，跟你一辈子，遇上运动连命都可能保不住的。那时你 年轻，处理这件事是很得当的，怎么现在反倒变得犹豫了？」

我 对父亲说：「不是我变得犹豫，是这么多年，经历的、看到的、听到太多了，于是也明白了共产党是个什么东西。我知道我有能力去干好这个工作，但实在不想给共 产党干。运动一个接一个，共产党自己又狗咬狗，争权夺利，一个人争到了权，一大群人倒了台做了牺牲品，我不愿意去蹚这个浑水的。母亲刚才说的也对，我们又 没靠山后台，况且尤其是共产党的所谓政治更是肮脏，毫无原则。」父亲点了一下头，又伸出手在我的头上摸了一下，站了起来说：「其实，作父母的都希望子女得 到提拔重用、出人头地，可是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下，好事也变成坏事。说实话吧，我很高兴地看到你在这件事上的反应，证明你成熟了。不早了，你也去睡吧。」

我 决定告病在家休息几天，调整情绪。第二天天下午四点钟左右，所里的书记郭和副所长阿宗坐车来探望我。我有准备，但没想到他们来的这么快。见了面后，两个人 都向我道贺，先是祝贺荣升，接着祝贺陕西工作的出人意料的圆满结局。坐下来后又问到我的健康，我只是说头疼，疼得厉害，医生讲必须休息至少一周。两人表示 了一下同情后，逐渐话题转到公务上。他们说几天前，阿成接到委任，将要去江西省的一个大县做县长。我这才知道，阿成的确已在三周前被解除了职务，原因他们 两个人全说不清。这我不信，阿宗不知道是可能的，书记郭说不知道是撒谎。唯一可猜测到的原因是这个县是阿成的老家，阿成目前正在准备搬家，因为他太太和儿子也将一同去，何时启程不知道，估计至少要两三周后的。所里已经三个星期没有行政主管了，所以事务堆积如山，许多事情急待解决，几个部门的工作目前已陷于半停顿状态。我明白言外之意就是要催我上班，我听着，没说一句话。

书 记郭又告诉我，他已接到通知，下个月他将去中央党校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和训练，整个党务工作就全落在我的头上。听着这些，又想到党委的那位顽固的老副书 记，我那原本不疼的头，这下真的疼起来了，端着茶杯的手也抖了起来。他们以为我确实病的很重，于是寒暄了几句，准备告辞。恰在此时，我父亲坐车回来了。在 这个所被国务院部门接收前，是属北京市政府的机构，所以父亲与他们俩人都认识，尤其我父亲又是文革浩劫后残存的几个活宝之一，所以倍受注意和尊敬。见到我 父亲进来了，他们俩人都站了起来，亲热地与父亲握手问候，我父亲看在都是同僚的份上，又把他们让进他的房间去坐。我只好强打精神陪他们进了父亲的房间。

父 亲看着我问：「你没去上班？病了？」我点点头，慢慢地说：「可能是工作太辛苦，又加上之前不停赶路的缘故，头疼得厉害。」书记郭和阿宗马上表示，他们都知 道我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作风，又大赞我的能力等等。接下来，书记郭又以一种表现他极端了解我、并早已料到我会被提升的口吻去吹捧我和我的父

亲。我大为反感， 差点说出文革时，我曾被逼着承认我是狗崽子。我站起来，对他们说：「实 在对不起，我头疼厉害，要去躺一会儿，失陪。」阿宗马上站起来告辞，书记郭只好也站了起来。父亲坚持要留他们吃晚饭，我马上看了阿宗一眼，阿宗是个精明 人，坚持告辞，书记郭也不得跟着表示。我和父亲送他们出来，在他们上车前，书记郭对我说：「明天早上，我把你的车派来，就是阿成的那部车，司机是新的，你 的秘书也是新的，明天我让他们都来，你若仍不好，去医院买药，他们可以帮忙。」我马上说：「不必了，我若好了，打电话让车来接我上班，若不好，我就不打电 话，还要休息一下。」阿宗马上说：「没问题，养好身体第一，有什么事来电话。马上进屋吧，不要再受凉。」

车 子开走了。进了屋，我没等父亲问，就讲了所里的现状和我将面临的一切。父亲的脸又阴沉了，看得出来，一块同样大的石头也压在他的心上。我马上笑了一下说： 「记得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吗？无论是什么样的命运在撞击大门的时候，一定要引起些喧闹、不安和激动的，放心吧，我需要时间去考虑，平衡心理。头疼是真的， 可吃药没用的，无论如何，母亲今晚多准备了几个菜，晚饭时间应该是开心的。我们开心一会儿是一会儿。」

隔 天上午，我和母亲收拾完房间，正坐着说话，听到有人轻轻地在敲门。我打开了门，一男一女站在门外，十分恭敬地称呼我所长，并自我介绍，那个三十岁左右的男 人是我的司机，而那位看来也是三十岁上下的女人则是我的秘书。我当然知道他们都是上级政治部派来的，于是请他们进来，又向母亲介绍了他们。那个女人很懂交 际，马上十分亲热地拉着母亲的手问候着；司机看起来很规矩，有着一张忠厚的脸，给我印象不错。母亲一说要出去买菜，那司机马上站起来说要陪我母亲同去，我 刚要谢绝，那秘书马上说：「也好，这里有几份档案需要所长马上批示一下，我和所长把这几件事办一下，几个部门正等着呢。」我看着檔，对秘书说我对许多事根 本就不清楚，怎么去批？至少要把这几个部门的负责人请来，向我讲讲清楚，然后才可以根据以往的惯例去办理。秘书说：「我已经让他们写来了详细的说明，你看 一下，或许可以帮助你了解情况。今天早上，阿宗副所长亲自帮我整理出这几份东西，他说如果再拖延几天，这几个部门就无法继续工作了。他知道你病着，一再让 我代他问候并致歉意。」

我 知道阿宗是会欢迎我到这个职位上来，我们共事几年了，又是朋友，也是酒友，我们会合作得很好的，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我看着文件，阅读着说明，屋里静极了。 也不知过多久，听到窗外汽车的响声，接着是母亲用钥匙开门的声音，秘书马上跑过去开门与母亲说话，司机提着一篮子青菜进来。母亲买了点心回来，准备招待司 机和秘书。一番推让客气之后，他们三个人坐下来享受着点心，母亲待人宽厚真挚，她不会想到这两个人是被派来监视我的。我在几份檔上签了字后，点上了一支 烟。那女秘书进来了，十分利落地收拾好檔，又问我还什么事没有，是我请她转告阿宗副所长，我可能还要休息几天， 如果没有特别的事，

就请他代我处理一下，等我上班后再向他当面致谢。我一边说，她一边记录，我又说：「你们两个人这几天也可以休息一下，我有事会打电话 去，如果我没打电话，就不要来了。我实在感觉不太舒服，我要去躺一会儿了。」母亲送他们出去，回来后对我说：「你还没上任，官架子已经摆出来。对人家那么 冷冰冰的，我看他们都是挺好的人。」我心里在苦笑，但什么也没有多说。

那 天下午，我们家很热闹。阿朋、阿学、阿聪、阿长全来了，并带来酒和熟菜。我们热切地问候着，当然我还得忍受他们那种半开玩笑半讽刺的祝贺。他们连客厅也不 进，直接在餐厅里围着饭桌坐下来。阿朋、阿聪去厨房，乒乒乓乓地把盘子碗的搬到了桌子上，于是又是敬酒又是开玩笑地聊起来。喧闹声惊醒了午睡的母亲，她看 到我们在喝酒，说要去厨房做几个菜，马上就被大家拦住。阿朋拉她坐下，于是母亲又受到他们的同声祝贺。母亲微笑着叹了口气说：「祝贺什么，我们家可是没有 一个人为这事高兴。」她又指着我对朋友们说：「他已是愁眉苦脸的几天了，你们这些做朋友的也该说说劝劝他才好。」阿长笑着说：「伯母，您放心，我们知道他 在想什么，他会高高兴兴的走马上任去的。」阿朋看着我说：「愁眉苦脸什么？自古以来，升官就是好事，应该高兴；等他们整你时，再愁眉苦脸也不迟的。」母亲 说道：「这几年安定，估计不会很快又搞运动吧，我已经老了，再搞一次运动，可真挺不过去了。」

阿 聪用他那干巴巴的声音插进来说：「共产党的事就是这样，整你时不要喊冤，整死你都是应该的。共产党那么伟大，会错吗？同样的道理，共产党提升你是对你施 恩，你应该涕泪交流地喊万岁，否则记上一笔账，下次运动不整你整谁？」他刚说完，阿学马上笑着说：「阿聪老兄看问题尖锐、透彻，说话也直率，一语道破了我 们来的目的，弄得我们反倒无法可说了。」说到这里他转向我，对我说：「阿聪说的是实话，也是实情，你要好好考虑一下的。」我笑着说：「我考虑什么，我是有 病，需要休息几天，难道生 病也得罪了共产党？」刚说完，他们都笑了起来。阿朋站起来在我的肩上打了一拳，说：「在真人面前说假话着，罚酒三杯。」我将了他一军，说：「那好吧，我和 你碰三杯吧。」阿朋马上坐下，不说话了。又是阿聪的声音，他说：「今天不罚他，让他好好考虑，想想我刚才说的话对不对。」

我 拿起杯子，喝了一口酒，对着历来老成稳重的阿长和阿学说：「你们应该明白在我面前的是什么，行政和党务两个摊子，从此和专业告别。我不懂政治，而且痛恨政 治，我母亲是对的，共产党讲究关系，可惜我们没有可以做靠山的关系，一点点风吹草动，首当其冲倒霉的就是我，然后就是我们这一家人都受牵连。你们都了解 我，我做事就一定要做好，否则我宁肯不做。可现行的制度下，什么是好，什么又是坏，没有标准的，运动一来，更没有是非黑白。文革还不就是个例子，七千万人 倒霉冤死。我倒不怕死，可父母年老了，女儿、侄子、外甥又小，我出点事是要影响他们的。

所里的人事关系复杂，那些凭关系走后门进来的高官子弟们、军官太太们，不学无术，整天搬弄是非，又都自以为是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这个职位他们已经巴望了很久了，这些人每人给我一次小鞋穿，还不把我活活摔死？」我说完，发现母亲已经在用手绢擦眼泪了。母亲突然说：「我去找你们的上司去，告诉他我儿子干不了这工作，让他们另找别人。」

大家都笑起来。阿学笑着对母亲说：「您以为您是以家长的身份去找老师谈话吗？可惜的是您的儿子已不再是个学生了。相信我，事情并不是那么可怕，您儿子朋友多，我们不会看着他有麻烦的。」阿朋凑近母亲，对她说：「伯母，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在想着我结婚的前一天晚上，在这里您给我煮了一碗面吃，那个味道实在好。今天我们几个为了来这里，都没顾上吃午饭，求求您能不能再做一次那种面条，让他们也都开开眼。」母亲高兴了，她喜欢有人夸奖她的厨艺，加上阿聪、阿学的相应，母亲高兴地去厨房了。话题仍继续进行，从分析国际、国内的形势，到赵紫阳的现行政策，从讨论所里的情形、存在的问题，到这次人事变动的种种可能性，并且分析了其它几个人选的情形。

最后，阿学说：「上级在做决定前，可以说确实是下了一番功夫去调查、了解，而且也全面地考虑到了所里的实际情形，最后确定了你，是完全从实际出发的，直接给你下了任命，而不是让你代理，也说明了他们曾很下了一番苦心去调查和了解你，并且清楚你是继阿成之后唯一可以平衡所里各方面关系的人。对你来讲，推辞和拖延都不好，你必须服从这个决定，并马上开始工作。我们这群朋友们就是你的智囊团。」他说到这里，阿朋又接上来说：「阿成原来就有一个打算，想成立一个行政办公室，因为事务太繁杂，不论什么事都要经他的手，搞得他根本没时间去考虑问题。这次你成立这个办公室，人选的事，我们也替你想好了，你就任命阿聪担任主任，以后无论什么事不好直接找我们，就请阿聪出面，阿聪唯一肯帮助的人就是你，你看怎么样？」

他又转向阿聪，说：「这件事在几天前，我和阿学对副所长阿宗谈过，他表示完全没问题的，只是怕你脾气怪，不会接受这个职务。对这件事，你怎么想？」一直在不停地喝酒、抽烟的阿聪，虽然面上毫无表情，但他是在认真地听着，听到阿朋问他，他马上说：「可以，我也当主任了？我知道我该干什么的。」我用手敲了一下桌子，说：「这样不好，几年了，阿聪一直没机会搞他的专业。当初是我求阿成把阿聪调过来的，阿成帮了大忙，我就不好意思再要求阿成让阿聪搞专业了。这次我会创造个机会让阿聪一心一意地搞专业的，我不要阿聪为我做牺牲。」

阿聪站了起来，端着酒杯对我说：「听到你的这几句话，我就很满足了。况且什么是我的专业？在一个专制独裁的制度下去研究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艺术？我还没有么超然。专业，我有。给你当这个主任，对我只是个副业，但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我明白他说的专业和副业，也知道他一直在干的事，听到他这样的表示，我很感动，马上也拿起酒杯，与他碰了一下。

母 亲端着一锅面条进来了，又指使阿聪去厨房端出两盘母亲刚刚做好的菜。饭桌上的气氛热烈起来，母亲的厨艺确实是一流的，一锅面一下就被吃光了。母亲慌了又要 去再做，被阿长拦住，一直到大家都表示实在吃饱了，母亲才放心。阿学笑着对母亲讲：「伯母，看起来，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您的儿子后天就上班，您也可以放心 了。」母亲看着我，我也不明白。阿朋笑着说：「演戏就要演完它，没有结局是不好的。」我更不明白了，问道：「开什么玩笑？谁演戏了？」阿聪说：「我们已经 分析过了，明天上级至少会有两个大人物来探望你，并且会对你做出一些许诺的和保证，以表示他们支持你的工作，你的『病』也该好了，后天也就该走马上任，一 大堆事等着你呢。」

听 了他们的话，我由衷地感激他们，我根本就没想到这一层。阿学对母亲说：「伯母，明天您最好在家，帮助招待一下，这是很重要的一次谈话。」母亲点点头。他接 着对我说：「阿聪在几个月前搞了一份所里的这些贸易公司的调查资料，是涉嫌这些督导员贪污，至少是滥用公款，已高达五百万元。从目前情况看，到年底前的这 两个多月里，所里已经没有研究经费了，这是你面临的最大问题，材料给你留下，今晚你考虑一下，明天大人物们来时，你可以作为一个条件或要求向他们提出来。 我们分析过了，无论你提出 什么要求，他们都会接受的。」阿聪从他的背包里拿出这份材料递给了我，对我说：「目前，我还没有证据，但我始终认为，阿成的被解职，这也是原因之一，他一 定采取过措施，但失败了。书记郭的势力还是很大的。所以在处理这件事上你要小心，我可不想看到你被解职的。」一直没说话的阿长笑着说：「你不要感到压力， 我看时间不早，我们也该走了，你想想今天的这场谈话，高高兴兴地上任去吧。」

我 送他们出去，看着他们上车，消失在楼房拐角处。我感动了，想到刚才的谈话，似乎对赵紫阳抱一线希望，希望他能多少改变共产党的残暴本性和与人民为敌的立 场，实实在在地把国家建设好。如果我们的分析正确，那我应该接受这个任命。任何事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做成，赵紫阳也同样需要别人帮助，我乐意为国家去做任何 工作，绝不是为共产党。想到这里，几天来的愁闷心理似乎一扫而光。我相信自己只要想干，任何事都干得好。

第 二天上午，上级党组织的那位副书记果然来了，随同他来的还有一位政治部的主任和那位组织部长。母亲有了准备，亲切地招待着他们，气氛从一开始就很好。照例 问候、寒暄后，他们开始提到在决定这个副所长人选上的一些想法和过程。看起来，阿学他们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由于事前我也做了准备，所以把话题拉到了所里 的财务状况上来，提到经费五百万被挪用去做贸易公司，到今年底以前全所百余个研究项目没有经费了，同时由于今年的任务没有完成，必将影响到明年的上级拨 款。说到这里我停了一下，问他们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

副 书记犹豫了一下，对我说：「你的行政上级是一位副主任委员，也是一位科学家，他是知道的。今天他临时有事，没能来，托我们代他向你问候。我听说过一点，但 不详细。」听到他的这种含糊的说法，我有些恼火，尽量做出笑脸问他：「如果这个情况是属实的话，我该怎么办？上级的意图又是什么？上级总要给我个办法或指 示的，否则这个摊子又怎么去接呢？」我说完后，组织部长点了一下头，政治部主任没有表示，只是看着副书记。副书记看起来显然是在考虑，屋里沉静。我做出一 副等待回答的样子望着他们。

副 书记终于说话了，他笑了一下说：「你已经开始工作了，这很好。我还没有与副主任委员商量过，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一件事，我们任命你，就一定会支持你的工作， 明年的拨款不会减少，你可以放心。今年的工作不能停，你要想办法尽量去完成今年的工作，至于经费……」说到这里他停下来，看了看组织部长和政治部主任，然 后，他好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关闭这些贸易公司，追回这五百万块钱，你们看怎么样？」他最后这句话不是对我说的，他是在问政治部主任和组织部长。组 织部长马上说：「我完全 赞成领导的这个决定。」他又转向我说：「我估计这就是你生病的原因吧？上级做出了指示，你可以放心了。」我笑着摇了一下头，说：「那倒不是的，事情多得 很，不过有了钱，完成任务就不是空话了。我很感激上级对我的支持，不过关闭贸易公司，阻力会很大的，而且至于能追回多少钱，又是没有把握的……」政治部主 任打断我说：「不管有多大阻力，上级的决定你要执行。能追回多少钱，没有规定，能全部追回来最好，但估计是不太可能，你尽量去做吧，上级说支持你，那就一 定会支持。」

四 十分钟后，他们满意地走了。我还在反复分析着副书记的态度和如何去追回经费的问题。母亲坐到我的身边，轻声说：「我知道难。生活本身就难。读了那么多书， 都讲生活是美好的，我这一生就几乎从没有感觉到过。每次运动后，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感觉，还要小小心心地面对着全无头绪的未来。」

第十章 一个女人裸体吊在窗前

我 上班了；如人们说的那样。一上任，立即着手成立行政办公室，委任阿聪为办公室主任。下面是最头疼的资金问题，财务处长老君的报告上讲，整个资金缺少六百 万，报告上没有提这六百万到哪儿去了，却明确地警告，如果全所的百余个研究项目不马上停止的话，今年最后的三个月全所职工没有工资可以拿。

恰 在这时，书记郭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就要去党校学习，问我明天是否有时间去向我移交工作。我马上答应，我也正要去找他商量经费的问题。当初是他支持那批督导 员们动用研究经费去办贸易公司，钱是他一笔一笔批出去的，也是他说「花些钱买回些经验教训也值得」。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要走人，我去收拾残局？按上级党 组副书记的指示，我得去关闭这些公司，向这批人追回公款，会得罪一大批党务干部的，而他却没事。我已经想好，要在他走之前共同商量个办法，拟定个方案然后 共同签字。就在那天，我接到 阿成打来的电话。他的声音仍是平静、亲切，向我问候后就问我是不是愿意接受他的邀请到他家小坐一会儿。我高兴地答应，说实话，许多工作的程序问题，我是要 向他请教的。由于明天办理党委工作移交，所以定在后天。他坚持让我去吃午饭，我也答应了。刚放下电话，秘书进来递给我一份檔，告诉我这是她在整理阿成的檔 时发现的。我看了，心里感到很不好受。

这 份文件是在三、四个月前阿成亲手拟定的，是针对经费被挪用而提出的几项解决办法，其中提到限期关闭所有的贸易公司，追回剩余的款项，清查所有贸易公司账 目，督导员们回所里上班等等。在文件的右下面是阿成的笔迹，写道：「此事与党委意见有分歧，暂缓发布。」这正是我想的。书记郭死保这群督导员，事不是那么 容易办。现在不同，我有上级党组的指示，不怕反对。我没有犹豫，当即按照阿成檔中宗旨，重新起草另一份，然后叫来秘书要她打印，明天去党委前交给我。

不 搞运动，党委就没事可干，加上党政分工后，党务干部们更是闲得整天只有喝茶、抽烟、看报、打扑克牌。他们特有的小题大作、无中生有、造谣惑众的本领在这段 平静的建设时期，也没有用武之地。一个茶会，据说他们准备了一个星期。书记郭郑重地说这茶会有两个目的，一是欢迎我，二是欢送他。举行个仪式，也是同志们 「一片心意」。我看着一张张苍白又带病态的脸，那干净又空荡的办公桌，不知道这些人每天是如何打发时间。书记郭特地发表一段措辞十分得体的致辞，一定是什 么人替他写的。他照纸宣读，念得结结巴巴。当然一阵掌声不可少。

轮 到我了，我只是简短的感谢，又是掌声。接下来就是党委所属各部门的负责人的讲话，无非都是一个公式，对书记郭的惜别之情，盼他早日学成回来，对我欢迎之 意，又是决心、又是保证地要支持配合我的工作等等。一个上午就这样荒废在这种迂腐的形式中。极端烦闷和头疼之中，我也学了些东西。原以为党委下属不过是一 个组织部，一个宣传部，再加上个党委办公室就够了，其实不然。党委的系统其实十分复杂，又有很多部门，如监察部、纪律检查委员会、政治处、保卫处、武装 部、共青团、妇联、工会、档案室；还有不少令人想不到的如计划生育办公室、绿化办公室、节水办公室、环境保护办公室、修复长城捐款办公室，每个办公室都有 主任一名，工作人员两至五人不等。加上党委派到全所各部门的总支正副书记，总共一百四十多名党务干部，占全所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五。

在 后来翻看党委文件时，我发现在这一百四十多人中，最高文化程度是初中毕业，但仅占不足百分之五，小学毕业的占百分之三十七，剩下的百分之五十八分别受过小 学一年到五年不等的教育。正是这批人，在下一个运动中，可以把这个研究所捣毁，无论是工人、技师，或是专家、学者都可能死在他们之手。他们可以不懂装懂地 批判科学，指责它是起源于西方的资产阶级的东西，旨在反共反华。但是如果你去问他们马克思是哪国人时，则只有很少的几个人能说出是德国；如果继续追问德国 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时，这几个人也会胡涂的。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就是被这样的一群人统治着；将近一亿人的生命，在十多次的运动里，断送在这群人手里。

那 天下午书记郭向我移交工作，在场的还有党委的那位老副书记、党委办公室主任阿同。其实不过是半个小时的事，又用去大半个下午。我拿出了那份打印好了的档， 交给了书记郭，又大概地讲述了一下所里的财务危机情形。可以看得出来，郭有点感到意外。他没想到我会如此快地着手此事，仔细地看着档，估计我说的话他大概 没听见。我们不急不忙地说着，好在这两个人也是党委的主要成员，几次点头表示赞同我的看法。老副书记只是不断地看着我，又看着郭，而不说一句话。郭已抽了 两支烟了，终于放下了文件。我对他说：「这一个多星期，我实在太忙，也忘了告诉你，这个办法是党组同意的，知道你马上要离开，我匆忙赶写了出来，希望你我共同签字生效，以保证今年全所任务的完成。」他熄灭了烟，又想了一下，然后说：「好吧，也只好这么办了。」阿同马上把笔递给我，我签上我的名字，然后将文件和笔递给书记郭，他似乎又犹豫了一下，但终于签了字。

在 我离开前，他站了起来，握了一下我的手，笑着对我说：「党的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的财富，他们都是辛辛苦苦为党工作了一辈子的人了。我保证他们都是忠诚可靠 的好同志的，办贸易公司也是社会上兴起的一股潮流，他们出去闯闯

学些新东西也没什么不好，只是没经验，一心想给所里挣回钱来，可结果赔了，让他们吸取经验 教训吧，好心办了坏事，让他们自我检查一下，我看就不要处罚了。」我也笑了一下说：「我们没有权力去处罚干部，一旦有结果，交上级去处理好了。」

我 回到办公室立即把阿聪找来。我说：「请在明天上班前把这些檔贴出去，保证每个督导员都收到，同时通知财务处按照这份檔，收回所有贸易公司账户上的钱，然后 冻结账户。让老君办好这两件事后，马上来见我，我与他商量成立查账小组的事。最迟在明天下午要通知转让办公室主任，让他马上成立训练班，这些督导员都要参 加训练，以后就让他们在转让办公室搞技术成果转让工作，你看怎么样？」阿聪说：「这些事我明天中午前全可以办到的，但六百万你是追不回来的，最好有其它准 备，如果到年底全所需要六百万开支，最好做好两百万追不回来的准备。」

我 是有这个准备的，我已与阿宗分析过了。阿宗讲过，根据这一百多个项目的进度，大约还需要两三百万块钱，年底前是基本有把握完成预定计划的。即使这样，全所 的工资和办公开支，我尽量控制在八十万元以内，今年也就过去了。我把这些告诉了阿聪。阿聪在当天晚上把文件给送到老君家里去了，隔天一早九点钟，老君便行 动了，通知银行，回收余款，并冻结所有贸易公司的账户。上午不到十一点，他便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打开账本，指着一笔又一笔批进去的钱，每笔钱都是书记郭 签字批准的，总数接近六百万。我问他估计能追回多少，他苦笑了一下说要两天后才能知道。但是不乐观，能收回一半就很不错。

我 立时吓出一身汗，对他说到年底我们至少需要三百五十万块钱的。他说如果在两三个月前就开始这样做是可能的，如果再拖上几个月，恐怕连两百万也追不回来。我 马上问他：这里会不会有贪污？他说没有证据，不敢这样说。他问我在檔上提到成立查账小组的事，打算什么时候办？我说：现在。就是现在。最好今天就开始。他 笑了一下，递给我一份名单，上面是十几个人的名字，分成五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清查几个贸易公司。我也笑了，拿起笔在名单下面写上：同意，并请立即着手工 作。

我 听阿宗、阿成讲过，老君是个极正派的人，能力极强，又是会所唯一的持有高级会计师证书的人。阿成曾经常把他请到办公室商量大大小小事，老君都能提出很好的 建议。从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来看，他们对老君的评价是对的。老君收起名单正要告辞，秘书进来对我说车已准备好了，该去阿成家了。阿成看上去很好，精神也 好。看不出那种犯了错误被革职降级的样子。他的太太看上去也是那么平静。按常规，以阿成的级别，派到外省去，应该是做负责几个县一个城

市的地区专员，这次 是派他去做县长，实际上是等于降了两级。看到他们夫妇都是那么平静愉快地对待这一切，真让我钦佩。他们才是真 正的知识分子呢。我几次忍住而没有去问他们，阿成被调离究竟是什么原因，又为什么调到外省。我知道这里有原因也有冤情。我即便问了，他们也未必讲的。其实 想想，我不是也一样吗？如果现在有人抓住我一个错误而马上把我免职的话，我不但不会喊怨报冤，反而会高兴，谢天谢地，终于解脱。

午饭四个菜早已准备好了。相信是阿成太太的拿手菜，味道极好。阿成不喝酒，特地买了啤酒。他给自己倒半杯，陪着我喝，气氛十分随和。我几次就工作上的问题向他请教时，他都马上转换话题，使我无法再问了。饭后，阿成帮他太 太清理餐桌，又把碗盘送到厨房。我坐在客厅里吸着烟。一会儿阿成回来了，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笑着对我说：「我知道你今天来，一定带着一大堆问题。但我要 告诉你，我不会回答你的任何问题。我们两个人性格不同，工作方法也不同。你用你的方法去工作，会比我干得好。我请你来有两个目的；一要求你一件事，二是要 给你一点启示，可能对你今后在职位上有帮助的。顺便告诉你，这次你的提升，我做了许多工作，也可以说我起了很大作用。如果你恨我，你现在可以走，我完全理 解。」说到这里，他笑着看着我。我倒无话可讲了，只是冲着他苦笑了一下，并且摇了摇头。一阵短暂沉默后，阿成笑着说：「既然你还不是太恨我，我要要求你一 件事。」我马上说：「请讲，我一定尽全力。」

阿 成接到调离的通知，但并未说明调到什么地方去。所里已没有他的名字，工资无处领，已两个月没领工资。去找上级，上级说没有把他调进上级部门，两边推托，没 个地方给他发工资。阿宗也着急，可他又无法插手行政事务。一周前阿宗告诉他，我已经到任上班了，让他与我谈谈。可阿宗又告诉他说我是不情不愿地到任的，怕 我恨他，所以阿成又犹犹豫豫直到我上班一周后才打电话给我。阿成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还有一个星期，我就要离开北京了，可许多事我还一点儿也没准备 呢，也是由于经济上的拮据，仅是这笔搬家的费用，我就承担不起的……」

听 到这里，我马上说：「这就是共产党的行事做法，也是我不愿意给他们做事的原因之一。念完经就打和尚，你是经还没念完呢，就被打上了。你放心吧，明天上午、 最迟后天，我会派人把你的工资、搬家补助给你送来，并且会让福利处的胖处长派几个工人来帮你包装家具并送去火车站。你告诉他们你是在什么时候动身，让胖处 长派人去订火车票，无论是火车票还是家具托运费用，所里全部承担。你的调动是公务，我作为现任的行政主管，我有责任让你高高兴兴地离开。」我说完这些，阿 成没有说话。我以为他一定还有什么事，于是问他，他才说道：「我当初要让你做所长助理，也正是以为你的这个性格，可是你远远地躲到陕西去了。现在，你能这 样义不容辞的帮助我，我还能说什么？说感激的话，你不爱听，我只能说拜托你多费心了。第一件事解决了，我没话可说了。」

我 马上说：「那好吧，赶快给我些启示吧。你在这个位置上几年了，我刚上来，又是你极力推荐上来的，你是有责任帮助我的，我也知道你会的。」他笑了一下，说： 「其实，我早就想给你这个启示的，一直没有这个机会。现在你到了这个职位上，是时候了。」说完，他站起来，引导我走进他的卧室。阿成关上了门后，卧室里一 片漆黑，窗帘紧闭。阿成打开床头的台灯，我眼前一亮，马上看到一个全身裸体的身体在窗前，是个女人的裸体。她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又被一根绳子悬吊在窗帘 的横柱上。她的双臂被吊起来，腰部弯曲成了九十度直角，头低垂在胸前，头发遮住她的脸，乳房下垂，双腿笔直地挺立着，两只脚腕上被一根铁链锁住，两只脚的 后跟，由于被吊而高高地离开地面，全身重量集中在两个前脚掌上，那本看来是天生美妙而又自然的女性的躯体被扭曲了。

我 的心急剧地跳动了一下，似乎感受到什么，究竟是什么又说不出来。阿成让我坐在一张椅子上，慢慢地对我说：「她是我太太，更是我的精神支柱，我们相识二十年 了，每年我们都要这样做几次到十几次的，她是完全理解的，也正是由于她的帮助和启发，这次我才避免了一场大祸，如愿地回到了家乡，但仍没能按我意愿去隐姓 埋名地教书度日。想象一下吧，北京的官场上尚且如此，外省也就可想而知了。我绝对离不开我太太的。」

我不安了。他竟然将太太如此地展现在我的面前。我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了，只是语无伦次地说：「我明白了……，太感谢了……，请快将嫂夫人放下来吧，我懂了……。」阿成并未说话，只是盯着那具躯体看着，好像是在想什么。只听阿成太太轻声说：「你千 万不要感到不好意思，这是他的主意，我也同意的。这么多年，凡是工作上的麻烦，或者什么事他不顺心了，他回来就把我这样吊着，整小时地坐在那儿看着，又想 着什么。我不是太明白他在想什么，既然对他有帮助，当然对你也有帮助的。你是个好人，我是知道的，所以我才同意的。」我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我看看阿 成，他似乎在处于全神贯注中，我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也集中精力去观看这裸露的躯体。屋里静得没有一点声音。我突然感到那个被吊的躯体是我。我已经没有 个人意志。我是什么？我可以被吊得更高，也可以受想象不到的折磨，更可以就这个样子被十分容易地被杀掉。

阿 成突然关上台灯，打开了一边的窗帘，秋天强烈的阳光照射了进来，屋里立时明亮起来，女性身体的那种自然美和曲线美一下子全部呈现了出来。尽管由于被吊在那 里，但这种美仍是顽强地显现着。那对美丽诱人的乳房，那曲线柔美的腰，丰满圆润的臀部。她的双肩及双腿上的肌肉却是紧张地突起，双脚那不自然的姿势，纤细 柔美的脚腕上锁着粗重的铁链，细巧的双手被捆绑着吊着，这具躯体只能做出微弱的挣扎，但却绝对反抗不了，就这样被扭曲着。我突然想哭，感到委屈不平，我想 冲上去把她放下来，然后去爱抚她，安慰她，告诉她恶梦

已经结束，去打开那半边的窗帘，打开全部的门窗走出去，就这样走出去，把她的身体沐浴在阳光和微风 中，归到大自然中，让人类自然的身体的美与大自然的美融为一体……。可是她不能，尽管她有意识，她知道外面是美的，大自然也是美的，可她却是被扭曲了 的……。

阿 成站了起来，笑着看着我说：「我相信你是感受到了些什么的。」我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但仍感到窒息，我对他说：「太感谢你们了，我感受很多，我的初步认识 是自然与反自然的对抗，实际上就是人性与反人性……」我没说完，他走近我，在我肩上拍一下说：「入门了。」说完，他做出手势让我到客厅坐。

我 坐在客厅沙发上，点了支烟，深深吸了两口，闭上眼睛，那种窒息的感觉仍然笼罩着我，直到阿成对我说：「在最后剩下你和阿建两个人选的时，我尽力的说服了几 个人，加上阿建在做所长助理的两个多月中，也表示出了他的无能，所以即使我不去说服任何人，这个责任也会落到你身上的。就在他们对你做出了决定的那一刻开 始，你实际上就已经被锁住了双脚，高高地被吊起来。改革开放喊了几年了，有识之士们一直在酝酿着政治改革，他们讲：『让一群被捆住了手脚的人怎么去搞改革 开放？』这是实话，也是实际问题。我不认为他们会同意搞政治改革，那等于否定他们自己，也等于这个政权的灭亡，他们很清楚。」

我说：「那你的意思是说，即使一切都被颠倒了，但是那种天生、自然的美的东西仍然存在，还是有影响力的，对吗？」这时，阿成的太 太端着两杯茶出来了，她的脸上仍红红的，显出不好意思的样子。她轻声对我说：「真不好意思，在你面前出丑了。」我马上说：「千万不要这么说。我实在感激你 们夫妇的，相信我，我会去适应这个环境并且尽力去起到些作用的。」阿成端起了茶杯，对我敬了敬说：「你明白了，我没看错人，你应该会干得很好的。」我苦笑 了一下，也端起茶杯。阿成太太说：「在阿成的去和留的问题上，在上司之间也产生了争论。那位副主任委员是拼命要保住阿成，对抗着来自党组和所党委的压力，还是阿成说服了他，退让了一步，否则这位副主任委员也会有麻烦的。这次我们能回江西老家，也是他帮了大忙的。我们一直想着是回去在中学里教书，从此太太平平地过日子。谁知道，又给阿成挂上了个县长的头衔，阿成也是苦想了几天，只好妥协了。这一下，又不得安宁了。说句不怕你见笑的话吧，他又会把我那个样子吊起来不知多少次了。」

这 次阿成苦笑了。我对阿成说：「现在共产党腐败的厉害，贪污成风，尤其是外省，山高皇帝远，加上地方势力拉帮结伙，你不去随和他们，他们会排挤你，陷害你， 你可要多加小心呀。」阿成看着我，点点头，我站起来准备告辞了。阿成没有挽留我。他太太对我说：「我们会与你联系的，更希望你有机会能去江

西。」我连声答 应着，阿成站了起来与我紧紧地握着手，我们互相直视着对方，长时间地握着手，谁也没说话。阿成太太的眼睛红润了。

督 导员们共曾开了三十一间贸易公司，全部关闭。追回了将近三百万元，其它的一半已是去向不明。查账小组开始了工作，后勤与福利两处共同成立了一个物资清查小 组，原本是想将这些公司当初从所里拉走的桌椅物品收回来，没想到的是收回的竟然是豪华的沙发、皮椅、地毯、油画。这些都是督导员用公款买来供自己享受的。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还收回了四辆日本进口的汽车。我与阿宗、老君商量这三百万元是否能支撑到年底。老君马上说，这收回的三百万并不是个实际数字，不少贸易公 司外债累累，债主登门讨债每天不断，目前还不能确定要还多少债务，但至少要几十万元的。阿宗皱起眉头，头也疼起来。现在的情况是，如果要完成任务就没钱发 工资，若发工资就无法完成任务。最后临时决定贸易公司的债先不还，待到查账工作结束后再说。阿宗与各专题小组协商，看看有没有节省开支的余地，并责成福利 处把贸易公司豪华家具和汽车卖掉，收些钱，弥补开支。

在 这三十一间贸易公司之外，还有一家规模不小的饭店，是当初阿成批准开办的。一为了解决督导员们的工作问题，二希望饭店赚回些利润，以应付所里的日渐庞大的 招待费用。在开办这个饭店时，所里出资三十万元，同时与离这家饭店很近的一所厨师学校合作，既解决了厨师问题，又给了学生们一个学习的机会。一开始时据说 办得很好，很是赚钱。但不久后，由于什么豪华风、高档风的兴起，督导员们不但要求投资三十万重新装修，改用高级桌椅餐具，饭菜价格也一下子猛涨了上去，马 上使这家饭店冷落了，依靠工资为生的人们不敢问津。于是他们召人来租或承包饭店，几个承包人在承包了几个月后卷钱消失，无影无踪，留下一笔债务和个烂摊 子。督导员们用公款去填补，一次又一次几十万元又填进去了。当然也包括这些督导员带着亲友去大吃大喝，吃饱喝足后一分不付扬长而去。老君说，就是金山，也 有吃光的时候，所以建议关闭。我把胖处长找来，要他请几个内行人去饭店实地考察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保留的价值。如果还能保留，就请福利处派人接管过来，重新开张，解决一点社会上的就业问题，并且给所里挣点钱，留做年底给职工发奖金。

所 里又不安静了。贸易公司关闭，督导员们全回来了。转让办公室办的训练班，他们不去，整天在所里到处抱怨，甚至听说要来包围我的办公室，还要控告我。我以党 委代理书记的身份在党委会议室，与这群督导员们开会，没想到整整占去了我半天的时间。这群曾经是面无表情、心肠冷酷、整人杀人从不手软的党棍们，经过几年 的经商和社会实践，似乎都产生了极大的飞跃，变得油头滑脑，像世俗气十足的地痞流氓一样。

在 会议上，有人要我赔偿他们的名誉损失，也有人要我承担他们的经济损失，有人要我赔偿他们的客户损失，还有几个人让我替他们要账去，更有几个人理直气壮地冲 着我拍桌子，指责我做了错误决定，不应该如此对待他们这群有功劳的老干部们。我没有说话的机会，只好听着。将近三小时过去，他们的火气减弱了，可能也都叫 喊累了，我才开始说话。我详细讲述所里目前经费短缺的现状，又提到如不这样做的话，至少有百分之二十二的研究项目要停下来，百分之五十的项目完成不了。我 直率提出近两三年来，钱一笔一笔拿走，却从不见一分钱进来，不要说利润，目前连本金都收不回一半。我恳请他 们能够配合查账小组的工作，同时希望他们接受一些专业训练，把科技成果变成经济效益是一件重要的新工作，希望他们在这项工作上为国为民做出新贡献。最后我 对参加会议的转让办公室的两位主任讲，请他们派出最优秀的专业人员担任训练的老师，不但要保证教会、教好，而且今后还要协助这些督导员们的工作。会议在下 班之前结束。

我 知道他们不满意，也恨我，但我说的都是实话，讲的都是实际情形，同时在关闭贸易公司的这份决定檔上，也有书记郭的亲笔签字。他们明白再闹下去也是没用，于 是三三两两的议论着离开会议室。后来，我听说他们联名写信给上级，也有人到上级那里，都是要告我的状。一个月一次全所党政部门负责人的现场工作调度会召开 了。各部门汇报工作，提出问题，并且当场解决。这也是阿成当初搞起来的，效果很好。这是我第一次主持这个会议，加上秘书告诉我晚了，一点准备也没做。所以 有些紧张，开会前二十分钟与阿宗商量，阿宗笑了，对我说：「紧张什么？到了会上你就知道。」

果 然，会议进行得很好，也很自然。不少问题很和谐地解决了。我再次要求各研究室主任、副主任，对各个研究小组的项目尽可能地督促完成，任何问题困难及时向我 或阿宗提出来，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支持。在今年最后这两个月中，预定的研究项目尽可能地完成，以减少明年的工作压力。就在我讲着这番话的同时，我突然发 现，几乎所有人都看着我，而且很注意地听着，每个人的脸上都那么平静。

当我环视大家时，还有不少人对我微笑着点头，我感到了一种温暖和鼓励，同时我也感到他们对我上任来的这半个月的工作是满意的。一种彼此信任正建立着。

散 会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在为阿成搬运家具时，胖处长碰了汽车队阿强的钉子。我立即给车队的队长打去电话，要他立即派车。大约十分钟后，车队书记阿强问我 是不是要车给阿成搬运家具。我回答他，又问他有什么问题没有。电话被挂断，但车是派出去了。这是所里的一个问题，许多部门宁可花钱到外面雇

车，而不愿意使 用本所车队提供的服务，这也是我在这个会上要提出的问题。我向大家述说了这个过程。我提出问题，车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车队的两个队长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 必要？同时，我也明确地说出，在这个研究机构中，研究人员、知识分子是属于第一线的生产人员的，任何人和任何部门在这个所里的工作和职责就是为了这些生产 人员提供后勤服务的。

我 对车队的两个队长说：「从今天开始，你们两个人在工作上要负起责任，做你们该做的事，干不好或出了事，我是要追究责任的。说到了这里，我转向了阿强对他 说，目前党的工作的重点是搞经济建设，不搞阶级斗争了，同时党政干部分工明确，如果认为福利处要车给前任副所长搬家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或者是在颠覆无产 阶级专政的话，可以向党委提出来或进行讨论。但他是没有权力去干涉或决定每一个派车的要求的。」说到这里，我就要宣布散会了，阿强突然站了起来，大声地 说：「党永远领导一切，党也要监督一切，这是永远不会变的原则，我没错，我不接受这个批评。」

我 刚要说话，坐在我背后的阿聪将一份材料放在我面前。原来是一份今年一至九月贸易公司用车的统计报告。我迅速地翻到最后一页，看到总用车次数达三多次。我马 上问阿强对各个贸易公司的用车要求，有没有一个个向前任副所长或党委书记查询或核实？他回答，没有。我还没有问为什么，他又大声说：「这些督导员们都是老 干部，他们正在发挥着余热，为党做着贡献。」他说完，会场上响起一阵轻轻的哄笑声，不少人不断地摇着头，在场的党务干部却都不自然地板起脸。我笑了一下， 对坐在离我不远的党委办公室主任阿同说：「请你安排一下，我觉得有必要与车队的书记谈次话。」阿同点一下头，我宣布散会。

回 到办公室，秘书对我说车已在楼下等着。我曾对阿成说，他们离开时，我会去车站送他们的。阿成夫妇的火车还有五十分钟开走，没有时间吃饭了。我正要走，阿聪 进来了，递给我一块夹好了肉的大饼，对我说：「我要沾个光，坐你的车一块儿去，怎么样？」秘书马上也说她也想去送行。我们匆匆地下了楼，坐上车，飞快地向 火车站驰去。远远地看到阿成被一大群人包围着，我挤进了人群，向他挥着手。阿成看到了我，也挤了过来。我们紧紧地握着手，互相凝视着，阿成说：「谢谢你的 帮助，一切事都办得很好？」我问他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他笑着说：「没有了，胖处长帮我办好了一切，江西那边也一切都由当地政府安排好了。我到了后，安置一下家，大约一个星期后，也要正式到任了。当然了，了解情况，熟悉工作，至少有一、两个月，肯定会是很忙的。」我对他说：「多保重自己，以后有机会我会去看你的。无论你有什么事，告诉我，我会尽力去办。」

他 笑着点点头，拉着我走出人群，他小声地对我说：「我作为你的前任，给你一点经验之谈吧。注意搞好与上级党组和所党委的关系，凡事退一步想，能忍则忍，说话 小心。我不是在告诉你如何保住你的官位，而是在说如何去保护你自己。你把自己保护好了，也就等于保护了全所的科技人员，国家要富强，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 的。可这四十年来，你也知道，知识分子是受打击的对象，没有一个政治组织或团体是保护知识分子或为知识分子说话的。这几年，我尽力去做，但做不好，现在轮 到你了。我知道你不愿意干，其实我也一样，但是你要想想，你我这种人去做，是不是要比那些人去做要好？你既已上任就要对这个所负责，我也一样，推不掉，我就必须对全县三十几万人负责。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我 有些激动地说：「放心吧，我干了，就会尽力干好的。」他看着我，笑了。火车要开了，我催他上车，他又一一与来送行的人握手，然后登上列车，车缓缓地开动 了。给人送行的心情总不是那么愉快的。有几个同事的眼睛红红的。阿宗走近了我，对我说：「在阿成这件事上，我一直是感到压抑的。阿成是个好人，这么多人来 给他送行，说明大家的心里也是明白的。我想阿成也该是高兴的。」我不自禁地说：「我会弄清这件事的。」阿宗看了我一眼，显然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们肩并肩 向外走着。一位同事走近了我，对我说：「我的心情不太好，也有点累了。下午我想休息放松一下，你同意吗？」我对 他说请他转告这些来送行的人，如果心情不好，今天下午就都休息一下。他答应着走了。阿宗笑了一下对我说：「自你到任后，就一直忙，我们俩人也没机会说说 话。我的心情也不好，你愿不愿意来我办公室，让我们好好聊聊？」我也笑了，说：「我的心情也不好，来我的办公室吧，还保持着阿成在任时的样子呢，一点儿也 没有改变。」他马上说：「你的办公室太忙，没有片刻清静，还是到我办公室来吧。我还有事要和你商量。」

与 阿宗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我们品尝着花茶，聊起过去，又提起了这半个月来我的一切所为、他表示百分之百赞同。我又提到了几件我想办但尚未考虑成熟的事，他 也坦白地说出了他的看法和意见。阿宗是个好人，有着极不寻常的个人经历，加上他比我大了七、八岁，又在这个职位上好几年了。我是尊敬他的，也渴望听到他的 建议，更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半个下午的聊天，在许多事情上，我们的看法基本上都一致，我深信我们之间的友谊已经变成了同僚间的互相支持与共同合作了。茶已 喝淡了时，阿宗对我提到一件事。根据国务院的文件，各个单位可以从行政费中自留百分之四，作为行政负责人支配，主要用来给有贡献的职工升工资，发放奖金和 给职工发放福利使用的。两三年来，这笔钱已有十几万元了，而阿成从不动用这笔钱，怕引起纠纷和不满。可是根据规定，如果每年不提出这笔钱的话，那就应与剩 余的行政费一起上缴。财务处长老君每年都提出这笔钱给阿成，但阿成不接受。老君只好把钱给了阿宗。

阿 宗找阿成几次商量这事，阿成就是不说话，阿宗也没办法。阿宗对我说：「我是无权动用这笔钱的，现在我只好问你了，如果你也不想多事的话，现在快到年底，我 去告诉老君，让他在做年终财务报表时把这笔钱做上，给上级退回去算了。」他说完，两眼看着我。我马上说：「开什么玩笑？我正愁年底没钱发奖金呢，每个单位 都发奖金，并且发鸡鸭鱼肉的，只有我们从不发。我当初就一直对这事有意见。现在才明白，原来是阿成不愿多事，我可不怕。」阿宗笑了，对我说：「我知道你会 这样说，我让老君把这笔钱计算一下，把钱给你送去。」我说：「可以。离年底还有两个月，奖金怎么个发法，要找几个人商量一下，我不同意搞平均主义。」

阿 宗马上说：「我也不同意。我明白你的意思，既然你敢动用这笔钱，我想征求你的同意，先动用四千块钱，给全所职工买些过冬的大白菜。你看怎么样？」我有点不 明白，问他为什么。他笑着把我挖苦一顿，最后才解释说：「这两三年物价飞涨，以前大白菜仅几厘钱一斤，而现在已上涨到一毛钱一斤了。以前一个家庭存三、四 百斤菜也不过两、三块钱，而现在要三、四十元，这对于指着工资过日子的人来讲无形中是个大负担。可现在如果不买，到了冬季，价格又要几倍上涨，一个普通家 庭就连菜都吃不起。这你懂不懂？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似的。」我只知道物价上涨了，但从没想到这么多、这么细。

受 到他的一顿挖苦后，他才说出他的打算。他是想让福利处与车队合作，在北京的远郊区与菜农直接交易，买回三十万斤菜。这样有两个好处，第一是便宜，一分钱一 斤是可以成交的；第二是菜农也高兴，我们直接付现金去买，他们至少不用拿着政府欠单又等几年。我当然马上同意了他的计划。由于是第一次办这种事，所以我请 他参与此事，他很高兴地同意。只是恐怕车队的书记阿强会从中阻止。我对他说：「这倒不必担心，今天调度会上我已对他提出警告，给他一些时间去改正。如果他 再干涉正常工作的话，我会对他采取动作。 」

不 知不觉地一天一天过去了，年底快到了。照例又是全年的工作总结、明年工作计划、财务报告及预算，几乎又忙了一个月，再看看日历，离年底仅剩下几天了，一切 该干的都干完了。我伸了个懒腰，靠在椅子上，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气来，静静地坐在那里，这种宁静和安逸，我已是两个多月没有享受到了。我闭上眼睛，似乎感到 有点疲劳。神智是清醒的，总结着自己这两个半月来的工作，感到满意；至少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今年的研究任务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八。根据阿成打下的基础，我 又推行出一套新的、以研究项目为中心，行政、后勤为研究服务的工作程序，尽管有人反对，但开始以后，效果很好，大多数职工是满意的，工作进度快了，各部门 之间的关系也协调了，相互间的配合工作得很好，这部大机器整个运转良好，工作上的摩擦和不快减少了，使得职工间的关系也改善了。

两 个半月，我干了不少的事，明年还有许多事要干，我已有了大致的计划。但那是明年的事了。还有几天才到呢。我的神智有点模糊，我想我可能是睡着了。也不知道 过了多久，被秘书叫醒，她告诉我说刚接到个电话，上级的那位副主任委员明早要我去见他，当面向他汇报工作。秘书问我需要准备写什么材料，我摇了摇头告诉她 说，我的汇报与我已上交了的书面报告是一致的，我历来实事求是，绝不会弄虚作假。秘书仍坚持要我做些准备，以防止上司提出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来的。我对她笑 笑，什么也没再说，将两条腿跷起来放在办公桌上，双手放在头后，又闭上眼睛。这位副主任委员是一位六十多 岁左右的老人，一副学者气质，待人和气、热情。我敲了他办公室的门，由他亲自打开。我们握手问候着。他注意地端详着我，脸上带着慈爱的微笑，我也打量着 他，并且确定了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极好的。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所以在前半个小时里，他问了我许多关于我个人的简历、家庭、生活，以及在专业上的 研究范围等等，我尽可能详细回答他所有问题，逐渐地把话题转到了工作上来。

他 对我已交上来的工作总结及明年的工作计划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又抱歉对我的帮助和支持不够，原因是他连续参加了几个全国性和国际性的会议和学术会议，实在是 抽不出时间。看来，他最关注的事是那些督导员们花出去的三百万。我告诉他，查账工作还在进行，目前看不出结果。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这三百万是收不回来 的。这些贸易公司干的都是买空卖空的事，根本就没有货，却订出了合同无法兑现，就牵扯到了一笔罚款的问题，而且还要退回对方当初预付的一笔贷款，究竟又是 多少钱，目前还不得而知，几十万是有的。

他 皱起眉头，问我可不可以马上给他一份查账报告。我讲目前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工作量越来越大，这些公司的商业活动几乎乱得无法查清，加上又没有账目，所以我 打算年后，从党委所属的部门中抽出一部分人力组成调查组，详细地对每一个贸易公司进行清查。我也明白也地告诉他，我不想弄清楚究竟有没有贪污或贪污了多 少，我只想尽量再多追回点钱来，实在追不回来，也只好向上级报告，一切由上级做决定。他点点头，对我说：「我同意你的想法，年后成立调查组，尽快地查清， 然后报告给我，我会做我该做的一切的。我是不能让几百万研究经费就这样没有了的。」过了一会儿，他平静了，微笑着问我一些所里的其它事，然后又嘱咐我一定 要在所里的医务室建立每个研究人员的健康档案，并定期送他们去大医院坚持身体，他要求我必须要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解决实际问题。他说：「中国的知识份子 苦啊！如果我们不去关心、珍惜他们，又怎么搞现代化？」

我 被他的话感动了，对他保证我一定会按指示马上去做。我向他报告了最近我和阿宗的一个新想法，准备扩大技术转让部门，增加费用和人力，多转让挣钱、发些奖 金，甚至考虑

建立工厂，生产自己的技术产品，几年后我们可能就不需要上级拨款了，完全在经济上独立。他看着我，注意地听着。最后他说：「看起来，你的前任 阿成是对的，他推荐你是有道理的。阿成临走前，他曾来向我道别，告诉我，你已经到任了，他很放心，也要我放心，现在看起来，我可以放心了。」将近一个半小 时的谈话结束。他送我到办公室门外，我们握手并互祝新年后，他说：「你还兼着党务工作，最好现在去党组办公室，不管有事没事，去问候一下，聊聊天，也是必要的。」我答应，与他告别。

我 是有这个打算到党组去的。尽管他们没找我，但我既然来了，若不去一趟，似乎于礼仪上也说不过去。况且，那些督导员们把我恨之入骨，一定没少来告状的。我不 露面，又不说话，似乎理都是他们的。这些人都是老党棍了，深明谎话说一百遍就是真理的戏法，我没做错事，为什么要避着？有话当面讲清，是更好的。恰好那位 副书记和另外两位党组成员的负责人都在，门是开着的。我走了进去。他们看到了我都站起来，我们握手，问候着。坐下后，先谈天气，然后转入工作。他们没有提 出要求和问题来，我干脆简单地按书面写来的那份总结报告，口头上向他们叙述一下。待我说完，三个人一齐赞扬。

这里可以抽烟，于是我拿出烟，也给他们每人一支。吸了几口烟后，我主动提到打算从党委抽人组成调查组，清查贸易公司的活动。

于 是引来了五、六个话题，我尽可能详细地回答了，并讲明这三百万是没什么办法可以追回来的。他们似乎并不吃惊，副书记说：「无论采取什么措施，一定要尽快的 查清，然后马上报告，党组会做出决定的。」副书记问我是不是已给大家发奖金，我点头说是。他接着说：「我们听到些反映，是关于奖金分发的不公平的议论，你 听到些什么样的议论吗？」我摇了摇头说：「我一点儿也没听到，能告诉我都是些什么样的议论吗？」他没有回答我，只问我拿到多少奖金。我告诉他，我拿八十 元。他不相信似地问我：「真的？」我有些不高兴，对他说他可以去财务处查。沉默片刻后，另一位在座的负责人问我：「你们把奖金分成两等，一等是一百二十 元，另一等是八十元，对吗？你为什么不拿一等，而拿二等？」我坦率地告诉他说：「研究人员是主力，也是一线的工作人员，拿一等奖，其它的职工全是二等。我 在今年前九个半月是研究人员，可后两个半月我是做行政工作，所以我只好那二等奖了。」我说完后，三个人脸上显出笑容，似乎像解开了一个谜团一样。

第十一章 六千个亿不在帐上

新 年的钟声敲响了，整个世界跨进一九八九年。每个人都抱着一个新目标、新希望，巴望在新的一年中通过努力去实现。我除去祈祷上天，保佑父母家人健康长寿，合 家平安顺利以外，更是盼望国泰民安，根除腐败，改革政治，尊重人性和人权，真正达到经济改革的目的。当然我也幻想着，能有个机会摆脱这个工作，回到专业 上。可能是我希望太多了，脑子有点乱，最后自己也说不清究竟希望什么，倒不如像大多数人一样，过一天算一天。希望多，失望也大，结果是自寻苦恼。明天醒 了，又是新的一天。

新 年刚过，阿宗第一个大发脾气。他又写完剧本，几个行家看后，评论都很高，但又和以前的二十几部剧本一样，通不过政治审查。阿宗倒也习以为常，一位工作在审 查部门的人对阿宗透露，说要通过审查不难，只要花点钱，给几位审查员送些礼，然后按他们的意见多少做几处小修改，就可以通过。但要把他们的名字列在剧作者 上。至于稿费，他们几个人「只要」百分之三十。阿宗差点没气昏，若不是太太和女儿拼命劝住，他会一把火烧毁大半生创作。

接 下来第二个大怒的是阿朋。他来到我的办公室拍着桌子问我:「政府强迫人民买国库券七、八年了，你知道不知道人民总共买了多少国库券？」我摇了摇头，他接着 说:「六千个亿，了不起吧？人民是伟大的!」我吃一惊，国民生产总值不过两万个亿。阿朋接着说:「国家有困难，老百姓再穷也尽力帮助，可老百姓不知道的 是，这六千亿竟然在中国银行总账上找不到？你懂吗？不在账上。」我愣了，看着他问道:「你是说，这六千亿，政府没见到？」阿朋说:「怎么能说政府没见到？ 又会到哪儿去了？总账上根本就没有记入这六千亿，钱不在政府手里，懂了吗？」我当然懂，可六千亿，这么大的数

目被贪污，我是有点不相信的。阿朋说:「我也不愿意相信，可钱到哪里去了？」阿朋是经济学家，更是个严谨的学者，我当然相信他。

第 三个大怒的是阿聪；他对我说全国市场上几个月见不到彩色电视机，是赵紫阳儿子干的事，他下令扣压全国几个电视机厂的全部产品，造成了全国市场上几个月无 货，然后以平常价格高出一倍的价格抛入市场。仅此一举，从中获利几十个亿。这次我不敢说不信，联想到不久前阿建对我说，现在这个时候没人看中职位级别，人 人都只看中钱。邓小平的那个跛儿子，坐在轮椅上弄了二十二亿美元，多少代人都花不完的。阿建讲这种话多少可信，他父亲是中将，本身属于高层，这种事也只有 通过这些高层的子弟才能透露出来。中国的老百姓不造谣的，一是吓怕了，二是每天要挣三顿饭，没有余力。

不 久后，父亲第四个发怒。晚饭时，吃饭从不说话的父亲突然说：「副市长张百发的弟弟倒卖钢材，从中贪污七千万，没人敢去追究，一个副市长就敢这样干，也没王 法了。」父亲告诉我们，那是他去市政府开会，一位秘书长告诉他的。这次我变聪明了，对父亲讲：「我敢保证，这位秘书长贪污的钱低于七千万，所以忿忿不平， 若是他已弄够一亿的话，他就不会发怨言，只会在心里嘲笑张百发是个笨蛋，当了几年副市长，才弄七千万。」我说完，弟弟笑起来，父亲没再说话，只是哼一声。 尽管消息不断传来，但我总觉得这些都离我太远，都是绝高层的人。这种独裁政权注定要灭亡，即使不是这样烂掉，也是要被推翻的。不管发生了什么，这个研究所 仍要存在，尽管是这个政权任命我，但我是不会为这个政权效力，我是为了灾难深重的国家和受苦受难的人群在工作。我尽量地平静自己，继续工作。从党委所属的 部门中挑选出了十几个干部组成调查组，清查每一个贸易公司。在做这件事之前，我与党委的那位老书记进行了几次的谈话和商量，但他始终认为成立这个调查组就 是为了打击一大群对党忠心耿耿的老干部。我说服不了他，最后只好搬出上级党组，告诉他这是上级党组副书记同意的。他马上又责怪我为什么事前不与他商量就先 告诉上级。我没话说，请求他支持我并支持这个调查组的工作，他拒绝了，搞得我很下不了台来。尽管党委意见不统一，但在给查账和调查两组人开会时，我仍坚持 提出了尽快和彻底的要求。

福利处的胖处长找我，谈到阿成曾让他为住房困难的职工去盖一 座 住宅楼。阿成一直在筹集资金，胖处长也一直在办理申请、审批的手续。由于六百万元被拿去开了贸易公司，阿成只好暂停此事。胖处长却始终没停地在办理着手 续，他告诉我通常这种手续要办一两年的时间，要经过几十个不同的部门审批盖章，他已经盖了近一半二十几个章了，问我是否还继续盖下去。在第二天，我把老副 书记、阿宗、老君、胖处长又请到一起，讨论这件事。除了老副书记不表示态度外，都同意。于是话题马上转到资金一事上，阿宗提到在研究经费上多少总可以有些 结余的，拿出几十万元应该问题不大。我提到行政费中也可以挤出一点，同时我又提到党委办公费中也有结余，加上几年没搞运动，也存下了一笔钱，可以考虑提出一部分。

我 刚说完，老副书记马上反对，提出这笔钱是为了下次运动做准备的，除去用在宣传和党的活动上，不便挪做它用；我提出是借用，以后还上，也被拒绝。老君对我使 个眼色，我没有再说话。由于这是行政上的事，尽管老副书记不说话，最后在我的坚持下还是通过了一项简单的决议，这座楼的手续继续办，同时买块地，资金继续 筹集，力争下半年能开工。由于此事尚未有定局，所以暂时对职工保密，到可以开工时再宣布。后勤与设备两处从仓库也打来报告，要求处理由三十多间贸易公司收 回的家具和汽车。仓库太满，已经影响了正常的工作。与几位负责人商量后，决定对每件东西做价，各部门根据自己

的需要和财务状况去买来用，卖不出去的再拉到外面去卖。无论如何这是一笔可观的钱，用在哪里，我还没想，但可用钱的地方不少。

事情一件又一件出现，也只好一件一件去办。车队的书记阿强，比我大一岁，真不明白怎么会那么固执。我和他曾有一次谈话，几乎争起来。各个部门从外面雇车的费用越来越大，车队反倒没事干了。

所 以我想了个办法，把车队做自负盈亏的试点，所里不再给车队发放任何钱，把这笔运输费用退回到有预算的部门去，由他们直接去用车付钱。阿强继续刁难用户，没 人用车，那么车队就没钱，工资也发不出去。阿强反对，车队的两个队长和调度同意。两个队长是有经验的人，用一连串的数字说服车队的职工们，于是生效实行。 阿强去老副书记那里去告我的状，但老副书记没有来找我谈这件事。阿强又去向党委办公室主任阿同告状，反倒让阿同把他批评一顿。这个新办法仅开始一个月，车 队每个人就得到额外的四十多块奖金，阿强孤立了。

两 个实验工厂也马上提出要这样做，阿宗是从保证进度的角度出发，极力赞成。我当然没意见，但问题是，研究人员每月的奖金从哪儿来？各职能部门的奖金又从哪儿 来？而且党委下属的这一百多人尽管没事干，可如果看到别人都有奖金而唯独他们没有，这个麻烦可是比什么都大的。阿宗不说话。为了这件事，我和阿宗大大小小 召开各种会议商量办法，又在两次工作调度会上提出来，最后还是几个研究室的主任们各自提出不同的奖励办法，几次研究后认为可行通过。

我 和阿宗心里的一个大负担消除了。研究人员们的反映也很好，各个职能部门能主动地配合他们的研究项目，不再像以前那样拖延、推诿甚至刁难了，而且每完成一个 研究项目，还有一笔奖金可拿，虽然比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但比没有强多了。于是行政和党务部门的奖金就不难解决，可以从技术转让费中提出一部分作为奖金。 至此，这件事全部结束了。虽然这是由于要解决车队的问题而引发出的一连串的事，但是经过几乎三个月的时间，我建立起了一套新的管理制度，从这一点上来讲， 还是应该感谢阿强。

第十二章 有权就有钱 这你都不懂

春暖花开的四月，接到上级的通知，让我去参加即将召开的河北省中部地区的十六个县市 的经济发展会议；并要我组织几个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一同去用外面的技术和国务院拨给我们的扶贫资金去帮助这一地区发展经济。我想到所里正好有两个小组的人 正在这一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同时还有一个技术转让的专案正在这一地区兴建着，阿军和几位工程师正在这里帮助兴建。但据他们最近打来的报告，似乎有些问 题。我决定其它人坐火车，我坐汽车，为的是散会后可以去探望这些同事，帮助他们解决些问题。我也有个私心，这一冬工作太辛苦，

一切工作都已进入轨道，我想 藉这个机会，也恰好是这个季节，去散散心。

会议很长，加上在会议期间又去了几个地方参观，整整用去六天的时间。我们也签出几项 技术转让的合同，其实这次会议的宗旨十分好，会议要求无论是城市或县要互相帮助，交流信息，互通有无，开放技术人员和资金的流动，利用本地资源引进科学技 术，发展工业，摆脱贫困。通过对几个地方的参观，也确实发现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得极缓慢而且不平衡，更有不少县至今仍采取关门政策，经济水平仍保持在十至 二十年前的状态上。会议结束前，省一级官员一再强调要各县、市长们开放思想，能够跟上形势，发展工业，带动经济发展，但是我对这次会议的看法却是悲观的。 参加会议的这几十位正副县、市长和正副书记们，目光无神，面孔呆板，一副痴呆样子，似乎大脑中一片空白或是另有所思；但每到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另外的人，活跃、大声说笑着，开着下流的玩笑，丝毫不顾体面地大吃大喝，晚上则又早早回到下榻的旅店房间，紧紧关上门与带来的女秘书在里面热烈地工作。

我 努力地与不同的人接触，试图去交谈，了解人们的想法，发现为什么这个地方仍然那么落后的原因。从这些朴实的百姓们嘴里，讲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不幸的 是，每一个故事的内容都与这个会议的宗旨和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我愤怒、痛苦，但并不等于这些事实不存在，反而更多的故事被讲了出来。一位五十岁上下，在 县政府做了三十年的职员的人对我讲，在他们那个县里，唯一的工业就是一家建于五零年代末期的纺织厂，到现在技术落后不说，设备已老旧得几乎每天发生故障， 所有的合同早已在七、八年前就都被取消了，原因是所有的产品全是次品，只好以极低的价钱就地销售。纺织厂和县工业局的官员多次要求县政府拨出一点钱，更新 设备，并挽救全县这唯一的工业，但都被县政府以没钱为理由而拒绝。在去年的秋天，县委书记的父亲去世，这位书记竟然动用了县政府的四十七万公款，为他去世 的父亲办了一场前所未有、令全县人目瞪口呆的大葬礼。至今已七个月，在县政府工作的一般职工们仅发过一次工资，连今年春天农民们急需的种子，都是从银行贷款才买来的。

在 与这个县相邻的另一个县，我见到了一位在一年前辞职的督学。据他告诉我，这个县的政府认为，要想搞活经济就要广交朋友，于是大吃大喝、请客送礼成了风气。 前年一年就挥霍掉五十多万，而去年花掉接近七十万元，可是本县经济毫无发展，百姓生活依然贫苦。最糟的是教育经费已连续被拿去请客送礼花掉了。他说这个县 目前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学龄儿童无法上学，而且这个数字仍在上升。在这个县里，很难找到一所象样的学校，将近一半的教师由于整年的领不到工资而被迫改行。到 去年底为止，仅他们这一个县就已经为二十年后的将来创造了四万个文盲，他感到有罪。

这样的县全国有两千三百多个，如果每个县都如此的话，二十年后中国将在现有的三亿文盲上再增加一个亿。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二十二公里以 外的另一个县的一位文书对我说，在他们这个县里想找学校是不容易发现的。大树下、马棚里，没有人告诉你，你不会想到那是学校，几十个或上百个孩子由一个老 师负责，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学生们连课本也没有。四个现代化喊了好几年，这个样子难道是为现代化培养人才的方式？停了一下他又说，去到任何一个村子，不

用打听村长或书记住在哪里，只要看到村里最大最漂亮的房子，去敲门准不是村长就是书记的家。进了县城后，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找到县政府的官员们的家。我 问这些人是怎么弄来的钱盖这么好的房子？他惊奇地看着我，反问：「有权就有钱，这你都不懂？」

一 件荒唐的事发生在另一个县。一位曾在一家倒闭的工厂当过厂长的人对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两年前那个县的县长的女儿因患上一种什么样的病，医治无效去世。这 个女孩死时才十六岁，当然还没有结婚，可是按当地习俗，一个未出嫁的女儿是不能葬入祖坟，所以只好把女儿单独埋葬在另一处。县长始终为此事感到不安，认为 女儿在另一个世界太孤独，无人照料。就在几个月前，同县的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不幸死于一场车祸，这位县长高兴了，马上找到死者的父母，打算让两个已死 的男女结为夫妻，在阴间成为一对，以免孤独寂寞。据当地人讲，这叫结鬼亲，这种风俗已在几十年前就不存在。

到 了今天，又从县长的嘴里提出这种要求，这对当父母的当然不能拒绝，而且从此攀上县长，不但荣幸，甚至以后还会有些好处。于是一言为定，县长开始操办起来， 女孩子的棺材被挖了出来与男孩的棺材并列在一起。整个仪式进行一个星期，至少有五千人参加，最后直到两具棺材被埋入了男方的祖坟后，一切才算结束。县长高 兴得不得了，宣称终于办完了一件大事。

这 件所谓大事耗费公款三十万。这个县共有九家规模极小的工厂，全是做对外加工的，工人总人数不是不足五百人，由于三十万花在结鬼亲的这场闹剧上，立时造成两 家工厂关闭，八十多名工人失业，另两家工厂因无周转资金而即将倒闭。这位前厂长对我讲，全县人民几十年辛辛苦苦，建立了这九家小厂，让一场结鬼亲的事毁掉 四个，或再有个什么官员办件什么事的话，这个县就没有工业了。我问他上级知不知道这件事，为什么不管？他看了看四周，小声对我说：「县长和地区的专员是亲 戚，专员又和省里的什么大官有关系，你想想谁敢管？」

在 一个正在繁忙地兴建县政府办公大楼的县城里，我遇到了这位四十岁左右的正在指挥施工的工程师，他知道我们是从北京来的，一定要请我们喝茶。在交谈中，话题 很快就转到了这个工程上。他苦笑着叹了口气，说：「我已是一只脚跨进监狱了的人了。」我连忙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很直爽地告诉我，在县政府决定动工盖这座大 楼以后，根据工程的预算，全部的建造费用为八十四万元，而且这笔钱也及时地拨了下来。就在开工后不久，一位县政府的什么办公室主任来到现场找他，对他转达 了上级的指示，那就是务必想办法在这个工程的建造费用中节省出十万元，上级另有他用。这位工程师当初拒绝了， 明白地回答说是不可能的。从那以后，几乎每天都有官员来找他，从劝说、出主意到威胁、恐吓，目的全是一个，要从这个工程中拿走十万元。最后又派了一位专 家，这位专家曾在二十多年前在建筑公司的当杂工，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入了党，又提了干部，以后就一直做党务工作。在这位专家指挥下，工程所需材料全部换成 了次品，更可怕的是偷工减料，在该放置十二根钢筋的柱子里竟被这位专家下令减到六根，幸好被工程师发现，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执后，专家同意将钢筋增至九根。

工程师对我举了不少这样的例子，最后对我说：「从目前看，十万元是可以省出

来的。但是当这座大楼该好后，实际上就是一个危险建筑物，同时根本不具备抗地震的能力，将来就是这群当官的坐在里面办公的，为了分几个脏钱，难道他们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了？」

这 位工程师还告诉我另一件事。大约一年前，这个县的银行里有一百七十万元不翼而飞。县政府下令调查，就在第二天，这个银行的会计主任、一位五十八岁、在银行 工作了四十年的质朴老人自杀了。当然，调查的重点马上就要转向这位老主任，并且舆论也造出来说是他贪污了这笔钱后畏罪自杀。可是在以后的调查中发现，这位 会计主任家的经济状况与一般人的差不多，甚至在两年前，由于给小儿子办婚事，至今还有几百块钱的债务没还清。

调 查进行了几个月毫无线索，于是事情也冷淡下来，没人再提到这事。可是就在今年的年初，县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和银行行长的四个儿子以自费留学的名义，飞 到美国去。这一下又引起了人们议论，自费留学美国，那是要每个家庭至少支出五万美元的，相当人民币三十多万，这四位官员的月工资都是在两百元上下，又怎么 能有三十多万。

尽管这件案子已经停止调查了，但此时人们都开始明白了这件案子，都为那个老主任的死抱持怀疑。尽管如此，人们也仅是私下说说，没有人敢公开说出来。

无 独有偶，在另一个县里，两年前也发生了一件谋财害命的事。尽管已是两年的时间，但当人们提到这事时，仍是战战兢兢地先看看四周，然后才压低了声音，小心地 说出了这件事的始末。这个县在一九四九前出现过一个大户人家，姓张，是以制作张家烧鸡而闻名于北方几个省的。但后来，张家被划分为反动资本家的阶级成分， 跟着就被送到农村监督劳动改造，生意也被没收。政府派人接管张家的工厂继续生产烧鸡，而且仍打张家烧鸡的旗号，但是由于没有了张家的秘方，制出的烧鸡不受 欢迎，市场越来越少，终于在那场三年的大饥荒中，工厂关闭，张家的烧鸡也被人们逐渐地遗忘。张家的人在一个又一个运动中屈死。

直到一九八一年，农村的经济改革开始后，张家第四代人、当时已是五十多岁的张老先生根据口授下来的祖传秘方再次制做出了真正的张家烧鸡，马上就受到了欢迎，张老先 生带着一家人从家庭小作坊开始，仅几年时间，就办起了工厂和分店，总资产达到七十万元，成为全县首富。张家事业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县政府官员们的嫉妒，他们 忘掉以前经验的教训，也没有看到张家每年向政府上缴十多万元的税，更没有去想张家生意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一百多个工作位置，仍打算让三十年前那场戏再 重演一遍。略有不同的是，这次他们要钱，不要张家工厂。县政府授意税务部门去查查张家有没有偷税漏税，一番突袭式查账后，张家奉公守法，没有偷税漏税。公安局又接到指示去清查张家有没有违法行为，这一次公安局没让县政府失望。

在 张家当初被下放到农村监督劳动的二十多年中，他们的邻居中有一个女人一直负责暗中监视并报告张家的言论和举动。据说这个女人干得很好，后来入党又做了干 部，一九七九年后政治运动不搞了，开始经济建设，这个女人没事干了。

她看着张家在这几年间从一口锅开始而发展到现在这个规模，没有为张家高兴，反而更恨张 家。尽管她的儿女们都在张家工厂工作，而且几次当这个女人家里有事时，张家都及时送来现款帮助她，但是她无缘无故的嫉妒反而越来越强，当县公安局接到调查 张家指示后，这位局长想到了这个女人。他们曾有过一段不寻常关系。几次密谋后，一场悲剧发生。

一天半夜，张老先生突然被抓走，关进监狱。不审又不问，就被几个警察毒打一顿，张老先生昏死过去，被用凉水泼醒后，继续受折磨。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遍体鳞伤、多处骨折的张老先生才被告知，一个远近闻名的大盗被抓获。据他供认，他抢劫来的一百万元的财产都是由张家代为保管的，由于张家为人都好，从来没有过犯法的记录，可以作为由于不知情而做错事处理，只要张老先生承认，可以马上释放。可是张老先 生不但不承认，反而大声喊冤。于是拷打、折磨又继续了。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公安局长派人到张家，一点不含糊地问他们是要人还是要钱？根本不知真相的张家为 了救人，立即卖掉工厂，转让出商店，凑起七十七万元给公安局长送去，没想到反而召来局长的一顿臭骂，限他们一周之内马上交来另外的二十三万元来，否则后果 自负。走投无路的张家人一边卖掉了房子，一边托人去向公安局长说情。这时这个女人出现了，表示她可以拿着张家刚卖掉房的几万元去向公安局长说情，但代价是 她要张家把在农村住了二十多年的那间房子卖给她，走投无路的张家一点不犹豫地同意。

仅几天，奄奄一息的张老先生被家人用门板抬了回来。据不确实的消息说，那个大盗也在同一天被释放了，在释放前被警告说，在十年内不准在这个地区出现，否则再被抓获是要枪毙。张老先 生回家后看到一切，气得吐了血，几次昏死过去，不到十天，就含冤离开人世。张家的人开始感觉到这里有事，于是向地区法院投诉，但很快他们的投诉被驳回，理 由是既无人证又无物证，无法受理。更令张家想不到的是，他们受到了监视和警察的不断的骚扰和威胁，邻居、亲友们都躲着他们。张家的抗争失败了，也彻底地孤 立了。终于在一天深夜，已是一无所有的张家告别了这块祖居的土地，去了哪里没人知道。一条人命，一个冤案，就这样结束。

几天来看到、听到的，让我感到沉痛，同时又有说不出的凄苦。

会 议在一顿午饭后宣告结束，我坐车去了阿军那个专家小组正在工作的那个县。阿军的那个研究室里有一位老工程师，用了十年的心血去研制一种变色染料，后来在阿 军和另一位年轻的女工程师阿蓉的参与和合作下才最后获得成功。去年底，在这个县的请求下，合同终于签定了。我们不仅向这个县免费转让这个技术，而且同时拨 出一百万元的扶贫款，在这个县建立新工厂，安装机器设备大规模生产这种染料。今后的利润所得我们仅收百分之三十，共收三年，作为技术的转让费，三年后全部 利润就由这个县所有。约一个月前，这个县报告说厂房已建好。这个专家小组派出来了，帮他们购买、安装设备，培训工人和试生产，后来听说工作进行不顺利，要 求回来当面报告。正好我来参加这个会议，所以决定自己来看看究竟发生什么问题。

一 个多小时的颠簸行程，终于来到了这个破旧不堪、满目凄凉的小县城。肮脏

的泥土路，残破的建筑物。初夏阳光曝晒着，找不到一棵树，也见不到一个行人。司机突 然停住了车，指着一所破旧房子对我说：「这是县科学技术委员会，我进去问问，他们会告诉我们新工厂在哪里的。」说完，他跳出车，直到由于停车而引起的那股 飞扬起来的尘土消失一些后，我才看到那块写有科委的小木牌。我也走下车，舒散一下胳膊和腿，但马上看到司机走出来生气地对我说：「屋里三个人全在睡觉，我 叫醒了一个，刚要问他，他反而斥责我，说现在是午休时间，不见人的。」我看了一下表，已是下午三点二十分，我说一声：「岂有此理！」就向那房子走去。进屋见到一个人刚坐了起来，正在喝水。

我正要做自我介绍，没想到那个人生气地站起来对我说：「已经告诉你了，现在是午休时间，不见人的，出去！」没容我说话，他走到我面前，推了我一把，我顺势退到屋外，刚要说话，门在我面前砰一声关上。司机马上走上来，举手要敲门，我阻止他说：「我们去找县长吧。」

汽 车在飞扬的尘土中转了几个圈子，终于发现了县政府，司机把车开进了院子，停了下来。他跳出了车子，去敲一间办公室的门，并大声地问县长办公室在哪里？一个 人出来，用手指着后面的一排房子。我下车追上了匆匆走向后边去的司机。在来到这排房子前时，我拦住司机，敲了门后，里面传出了一声「进来」。我推开了门， 一位五十多岁左右的男人正坐在办公桌后面一手夹着烟，正上下打量着我。我马上做着自我介绍，又一边递上了我的名片，并且提到我刚结束会议，顺便来看看新工 厂的情况。他站了起来，迅速地走到我面前。原来的那张呆板、僵硬的面孔马上变得那么热情地笑着，双手紧握着我的手，一边自我介绍他就是县长，一边又向我问 候，关切的话语从他那长满了黄黑牙齿的嘴里吐了出来。把我让在椅子上坐下后，他又飞快地走到门口，推开门向外面大喊了一句什么，又马上转向我，问我站在外 面的人是谁。我告诉他那个人是我的司机，他马上跑出去与司机握手，又把他拉进了屋里来。

司 机显然仍在生科委的气，马上就向县长告了科委一状。我试图打断他时，一个女人端着一个托盘进来了，盘上是茶和美国香烟。女人给我送上了一支烟并熟练地给我 点燃后，又利落地给我倒满一杯茶。等我抬头再看他们俩时，司机已经说完了他想说的话。县长脸上显出了极不自然的表情，只见他向我做了一个客气的手势后，马 上转身在办公桌上匆匆写了几个字，把字条塞进那女人的手，并马上推她出去。这时他才又转向了我，十分客气地向我道歉，我摇摇手正要说什么时，只听院子里响 起了广播喇叭的声音，播送这一条紧急通知，要各部门负责人十分钟后到会议室参加紧急会议，不准缺席，不准有误。这项通知播放了三遍，又恢复了平静。我马上 站起来，对县长说：「你们有重要的事要办，我就不打扰你，只请你告诉我那个新工厂在哪里就。」

他马上站起来，连说了几个不字，又推我坐下，对我说：「听到你们在科委的遭遇，我十分生气。这些混蛋们怎么可以如此地对待支持我们又远道来访问我们的

客人呢？这个紧急会议，我就是要严厉批评他们，并公开向你道歉。」我马上说，那倒不必了。我只是想在天黑前赶到新工厂去。他马上变得爽朗，说：「客随主便，我替你安排吧，保证你会满意的。现在请你参加这个紧急会议。」说完，不等我同意，他就拉我起来一同走出去，这排房子另一头的最后一间屋子就是会议室。

当我们走进会议室时，里面大约三、四十人都站了起来，县长马上向大家介绍我，然后又带头鼓掌，于是人们也随着他鼓起掌来。县长用手势示意大家都坐下后，他大声而严厉地批评科委的行为，其中也夹杂进不少不堪入耳的谩骂，会场上静静的，终于县长骂痛快了。

科 委的主任，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站了起来，表示接受批评，回去后马上开会，对在工作时间睡觉的人做出处罚，又向我道歉。他说完后坐下，县长看着我，我明白这 个时候若不说几句是无法收场的。我站起来，环视着那一张张苍白无表情的面孔，几天来听到的那些腐败、害命图财的事突然涌进我的脑子，一种反感和憎恶的情绪 占据我。

我 一点也不客气地表示接受道歉，同时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是一个农民去科委要求新信息或帮助而被拒于门外的话，县政府会不会召开这个紧急会议呢？会场上静 极了。不必等回答了。我说：「当上级委派一个人到任何一个部门去做负责人时，这个人就开始要对这个部门负责，对这个部门所有的人和工作负责，这是首要的。 对于委派他的上级负责是次要的，『为党工作』、『对党负责』都是模糊的概念，把这种口号式的说法加进些具体现实的意思，那就是为人民工作、对国家负责。再 具体一些，那就是帮助这个县的每一个人过好的日子，把这个县由穷变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希望全体干部们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我知道我应该用赞美和称 颂去结束我的话，但我说不出来。会场上的气氛有些僵，县长站起来讲话，提到我刚说的话十分重要，要大家好好想想，要大家今后努力工作，尽早改变贫困，然后 宣布散会。

县 长拉着我回到他的办公室，两个男人正坐在那里，经介绍才知道一位是本县的书记，另一位是副县长。握手问候后，他们两人又再一次向我道歉，书记很婉转地提到 我远道而来，帮助我们摆脱贫困，他们想要尽一点地主之谊，请我吃顿便饭。我知道这不可避免，既把他们惊动了，也只好走这套官场上的程序。于是我干脆地答应 了。没想到这使得他们三个人大为高兴，又是几句闲聊后，他们三人和我一起挤进我的车，车子拐了两个弯，总共不到两分钟的路程，就来到了一条不足二百米长的商业街，车子停在了一家挂有县政府招待所牌子的平房

前。从里面立即跑出几个男女，满脸堆笑、毕恭毕敬地引导我们进去，又把我们带到一间很隐蔽的小房间。

一 张大桌子上已经摆好了几道菜，一番让坐后。美国香烟、名牌酒又一连串地送上来。于是是一番的敬酒，让菜，三杯酒落肚后，每个人的脸都红了起来，说话也随便 了，声音也提高了，话题从工作转入到生活上来。真不能不佩服这些人的，他们的那种问话的方式，就好像他们是我的老朋友一样。尽管我很反感，但还必须耐着性 子，做出笑脸去应酬。气氛变得热烈了。当门再次被推开时，进来的不是端菜的招待员，而是在县办公室送茶的那个女人。看得出来她是经过了一番梳妆打扮的。书 记让她坐在我和县长的中间。由于她的到来，气氛活跃起来，加上又都喝了酒，于是下流的玩笑的话如同流水般从这三位官员的嘴里流了出来。大约一个多小时后， 大家都已酒足饭饱，也有些疲倦了。

就在那个女人给我点烟时，我注意到县长给书记做了个手势，书记不动声色地点了一下头。

我 吸了一口烟，正要喝茶时，这位书记说话了。他再次地表示我们在这个县创建的工厂，将对本县的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一番感激的话后，他提到根据他们县制 定的新政策，对在这个县投资的单位可以得到一笔总投资额百分之五的现金作为奖励。这完全是出于要刺激投资、发展经济为目的的，绝不涉及其它目的。说到这 里，县长拿出了一个有机密字样的公文信封，送到我的面前说：「这是五万元的现金，请你收下，搞活经济嘛，谁帮了我们，我们也帮谁。」我问他说：「这笔钱是 你们送给我？还是送给我们研究所的？」那位书记马上笑说：「完全由你作主。我们认为，当初若不是你同意支持，这个工厂是不会建在我们县的，所以我们是对你 表示感谢。」

我 笑一下，把信封推回到县长面前，然后慢慢地说：「在你们县建立这个工厂，我是根据三个原则来考虑决定的。第一是根据国务院每年下发的四百至六百个贫困县的 名单，你们县在名单上；第二是根据国务院发给我们的扶贫款和使用这笔钱的条文规定；第三是根据专家们对你们县的实地考察所形成的可行性报告，于是我才可以 做决定。对于这一百万元，我也是根据专家、工程师们的预算而定的，现在你们给了我五万元，那么这个项目的钱就不够了，工厂建不成，又怎么办？」书记马上 说，这五万元不是出于那一百万元投资金，而是他们县政府在本地筹集起的奖励基金，与建新工厂根本无关。他的话我不相信，一种不祥的预感出现。我开始担心这 个工厂。

我 站起来对他们的盛情招待表示感激，明白地告诉他们这笔钱我不能收，并且提出请他们派个人，带我马上去工厂。从他们的脸上看，我的反应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一 时出现了僵局。只听那女人说：「今天是不能去工厂的，外面正在下雨，路滑，车子不好走。县长已经安排好了，请你们今晚就住在这里，明天再去，大家都工作了 一天，不如现在就散了，都早点休息吧。」她的话马上打破了僵局，大家笑着站了起来，握手道别。又约好明天早饭后，大家坐我的车去新工厂。我看着他们消失在 雨夜中，便由这个女人引到了一个房间，她一再表示这是全县最好的房间，但我还是为房间的破旧肮脏而吃惊。

打来一盆凉水擦洗了脸，我坐在床上，感觉那不祥预感越来越强。一个可怕的想法出现，这一百万被贪了！这里根本就没有工厂。

专 家小组在这里干什么呢，难道他们也分赃吗？我摇了摇头，对自己说：「不可能的，想太多了，明天就知道一切了，早点睡吧。」我躺了下来。正当我昏昏欲睡时， 发现我房间的门被无声地打开。借着外面走廊的灯光，我看到那个女人轻轻地走进来，又轻轻地关上门，然后她向我的床走来。我猛地打开了台灯，并坐了起来。女 人惊叫了一声，顺势坐在了床边上。我看着他，她马上镇定了，笑着对我说：「你与其它干部不一样。他们让我来问你，百分之五是不是太少了？或者你还有其它要 求，都可以提出来的，一切都好商量，没有问题的。」我点了一支烟，看着她，冷冷地问：「包括要上床陪我睡觉也没问题，对吗？」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半支 烟的功夫，我问她究竟知不知道这个工厂的情形，现在这个工厂怎么样了，建成了，还是根本没开工？她抬起了头，低声说：「工厂已建好了，好像机器还没安装 完，其它的就不知道了。」

我 下了床，穿上衣服，出去敲了司机的房门。正好司机还没睡，我把他拉到我的房间，对那女人说：「请你告诉我的司机去工厂的路怎么走，尽量详细些。」女人讲解 着，司机画了图。我附在司机的耳朵上说，明早六点，不要惊动任何人，我们去找这个工厂。司机点点头，出去了。我对那个女人说：「我不需要妳陪睡觉，妳回家 吧。明天告诉你们县长，我和他在工厂见。」她连声答应着，迅速退了出去。我失眠，脑子里被各种各样的事塞得满满的，直到天快亮了才睡。但很快司机来叫醒 我，踏着清晨的露水，我们去了工厂。其实路程并不远，不过半个小时的行程。建厂地点选得很好，在一片小丘陵的上边，面对着一条小河，工厂的围墙外边种上了两排小树。由于还早，没有人上班。

我 们把车开进院子，下了车。我首先发现院子里的路只是在泥土地面上撒上碎砖，没有水泥，也不是柏油的，而且基础也没打好，路面已经出现了高低不平。走进厂房 看看，工厂的质量实在说不上好，可能也是基础的毛病，几处的墙上

已经出现了上下裂缝。但令人惊喜的是，已经有了产品了，包装得很好，堆放得很整齐，正在等 待运出。我高兴了，看来一夜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绕过了成品堆，我的眼睛一亮，好大、好宽敞的厂房，但马上就发现，一半的厂房空荡荡的，两套机组和流水线 看来已是使用上了。我拼命地回忆，不会错的，合同上定安装四套的。我仔细看着这两条流水线，尽管是外行，但我可以确定它们都是新的。我又放下了一点心。在厂房里转了几圈，可以看出来一切井井有条，管理的很好，但昨夜下雨，墙角和地面上都有积水，甚至还有一颗从屋顶落下来的水珠正打在我的头上，厂房的窗户上没有玻璃。

我 正在边走边看的时候，突然被人从后面在我的肩上重重地打了一下，回头看到了阿军那张忠厚的脸上带着惊喜的微笑。我们拥抱一下，互相问候着。阿军向我讲解着 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兴奋地对我说：「成功了，产品的质量比预料的要好，刚刚开始试生产，十多天，就已经接到几份订货单了。」铃声响起，上班的时间到 了。阿军带我去工厂的办公室，老专家、阿蓉工程师，两位机械工程师全都在。一阵亲热握手问候后，我开始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女工程师阿蓉给了我详细的数字， 老专家对我说：「我正准备这一两天回北京，向你当面报告一切。如果钱的问题不能解决，我就准备宣布这里的工作已结束，我们可以回去了。」

一 位机械工程师送给我一张纸，上面清楚标出几个数字，按合同规定，安装四条流水线，预算为六十八万元，已安装两条，实际用款不到三十四万元，预算中的辅助设 备和专用运输工具是十万元，工厂没有见到，加上另外两条流水线的三十四万元，总共尚缺四十四万元。我的手开始发抖。这时，又听阿军说：「这一个多月，我们 不是在工作，而是在为钱而斗争。目前正在为两项紧急开支而斗争。一项是在预算中有五万块钱是用于购买原料和周转资金的，但我们只见到一万元，已经用完，我 们需要购买原料，另一项是工人们已两个月没有工资了，这项开支不大，约四千块钱左右。」我看着他点了点头说：「现在看起来，共少四十八万块。」女工程师阿 蓉说：「不止这些，在建造工厂上偷工减料，一百万的投资，至少有一半是被贪污了。」老专家马上笑着打断阿蓉，说：「没有证据，怎能说贪污？」

大 家的眼光都转向我。我马上振作一下，说：「你们的工作很辛苦，而且工作得出色。我们是根据国务院上级的指示去做的，用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投资成套的中、 小型工厂去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从你们的工作，再次证实了我们这个研究所是有这方面的综合实力的，无论从实地考察、工厂的设计、机器设备的安装，都是绝 对没有问题的。更值得高兴的是，这项新技术是成功的，从实验室进入到实际生产中，马上就受到了社会的承认，这是了不起的成功，我很高兴，更为你们高兴。至 于目前的这些事，我认为问题是出在当地，我会向县、地区两级政府去反映的，如能迅速解决这些事的话，还要请各位在这里多工作些

日子，直到我们尽了义务为 止。否则，我会马上通知你们停止这里的工作。」说到这里，我停了一下，看到大家没有再提出什么，于是我要求老专家和一位机械工程师同我一起去县城，向县长 当面提出这些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大家都同意，我们正要走出办公室，司机进来告诉我说，县长、书记和另外三、四位干部坐拖拉机来了。

县 长见到我后，马上快步走近我，一边和我握手，一边笑着抱怨我没有等他们一起来。我对他很冷淡，只是把专家小组的成员一一的向他们介绍了。回到办公室坐下 后，我请老专家向他们报告整个工作的进行情况，然后请机械工程师报告机器流水线的情况，最后请阿军报告了试生产和产品质量的情况。当我正要请县长一行人到 厂房里实地看一看时，阿蓉工程师突然一点不客气地说话了，指责县工业局不按合同办事、扣压工程款，要求县政府立即插手此事，向工业局追查 50 万 元的工程费。她言辞激烈，说话直率，我不得不打断她，马上请县长来看看新工厂。在查看中，我指出一个又一个的建筑质量问题，并且说这个厂房只能算个半成 品，建议县里派专业人员来与建筑公司办理一个正式的验收手续。老专家指着一半是空荡荡的厂房问他们打算什么时候把另外的两套流水线安装上。

县 长一直没说话，只是不断点头。在成品库里正好看到一部卡车停在那里装货，我对县长和书记说：「这是十分可喜的，一个新技术，刚刚转变成产品不到半个月，就 已接到订货单。对于这个新技术，你们是第一家得到转让的，看来效果比预期的要好呀。」他们仍不断地点头，我接着提到目前急需原料和发放工人工资。我们又回 到办公室后，县长笑着开始讲话。他首先是表示感谢，然后又表示了抱歉，因为工作太忙，而一直没能来这里看望大家，更不了解在建立这个工厂中出现这么多的问 题，然后是他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回去后立即把工业局长找来狠狠地处罚他，接着表示原料款和工资都是不成问题 的，今天就派人送来。最后提到至于其它问题县政府马上开会商量解决。接下来是书记，与县长的意思基本相同，只是加上一点，就是立即派人把建筑公司找来，责 令他们把厂房的毛病立即修好。最后他笑着邀请大家一起回县城吃午饭，庆祝新工厂的建成和投产。他们说完了，我站起来，对大家说：「我想和县长、书记单独谈 几句，希望大家不介意。」

人 们退出去后，我关上门，对他们两个人说：「我知道现在贪污和腐败已经成了一股风气。我只想知道这缺少的四十八万元到哪儿去了，在执行合同期间，我们双方都 是负有责任的。」县长这时做出了一副苦笑的样子，对我说：「你也能够看到，这个县是个穷县，穷得什么也没有。说实话，当那一百万元进到县银行后，为了几项 紧急开支，确实是动用了几笔钱应急。事后，我们也开过会商量过怎么把钱还上。昨天我就想和你谈这件事，但是我想到你一路辛苦，打算今

天和你商量。我们动用 的钱，我们会想办法还上一部分的，但全数归还是不太可能的了，唯一的办法，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缩小工厂的规模，等工厂赚了钱后，再把它扩大。」听他说 到这里，实在是有些控制不住自己。我大声说：「昨天你们准备给我的那五万块钱，请你们马上派人送过来。还有四十三万，我想知道你们用到哪里去了。我告诉 你，我从不贪污，也不和女人上床，更不怕丢官罢职，谁贪污了这笔钱，马上退出来，保证合同的执行，否则我会一级一级的上告，直到把事情弄清楚为止。」

县 长发怒了，脸也红起来，可能还从没有人对他如此讲话的。他刚要张嘴说什么，马上被书记拦住。这个老狐狸不慌不忙地说：「关于目前风气不好的事，我们也听到 了一些，我们县的党委也很关注此事，对干部们也进行了审查，到今天为止，我敢保证，至少在县政府这一级的干部们是清白的，也都是为党工作多年忠心耿耿的好 同志，至于下面的干部如何，我们正在审查中，一旦发现问题，我们是不会客气的。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问题，我们会马上开会商量解决。对于在建这个工厂中 造成的拖延和损失，我实在感到很抱歉，一是我们关心的不够，二是我们没有办工业的经验，在学习新东西的过程中， 难免会造成些损失，浪费些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听着他的诡辩，我反而冷静了。事实已经造成，钱又在他们的手里，无论我再说什么都太晚。我吸了两口 烟，对他们说：「请你们尽快做出个决定，究竟那两套流水线还安装不。我们的工作也很忙，今天我就通知这个专家小组尽快结束这里的工作，两三天后撤出。一旦 你们做出了决定，再通知我们。」听完我的话，他们似乎大大松了一口气，高兴地点头答应着，县长马上又变回一副热情的笑脸，极力地邀请我和专家小组一起回城吃午饭，我拒绝，把他们送出来。

当 我告诉大家这一切后，阿蓉大声质问我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还没说话，老专家说：「这个决定是对的，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剩下的就是写出一份 工作报告，管不管就是上级的事了。」阿军接上来说：「我只是发愁这些工人，他们还不能完全掌握这套操作程序的。」阿蓉马上说：「这不难，我们五个人，每人 带上两三个工人，手把手地教。又不是让他们搞研究，只是严格地按照程序去做就可以了。」看着他们，我真心疼。一心在事业上，做点好事都这么难。我对他们 说，我还要赶一个小时的路去地区政府，反映这里的问题，我到了地区后，马上打电话给所里，让他们派车来把仪器设备运回去。

当 天下午，我坐车到了地区的行政公署，不巧正副专员、书记们都外出开会，还要参加晚宴。那位秘书在得知我的身份后，很客气地表示她一定想办法通知专员，同时 让我们在会客室等候。我走进这座楼时，发现了地区科委也在这里，于是我告诉秘书，我要去科委坐一坐。秘书马上打电话，功夫不大，一位头发花白、身材高大的 老人走了进来，他就是科委主任。我们握手问候后，在他的引导下去了科委办公室。他又把另外两位中年男人介绍给我，他们是副主任。老主

任笑着说：「别见笑 呀，中央提出要搞现代化，所以在各级的正副部门中都设立了科委。有办公室，有正副主任，可是没有兵也没有资金，更是没事干。我们三个每天上班就像坐牢一 样，除了看报聊天，一点事也没得做。」

这 位老主任是个十分爽快的人，经过交谈才知道他曾在市里的一所中学当了二十多年的校长，不久前才被派到这个职位上来。可见他在当地的教育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 老先生的。我们说到近十年来的教育情形时，老先生重重地叹了口气。他说，他喜欢做教育工作，在把他调到这里时，他曾掉泪，不愿意离开学校。可是如果再做校 长，他也感到实在做不下去。学生的数量年年增加，可是教室、师资、设备全不够用，教育经费年年减少，即使这还不多的经费，在下拨的过程中还要被一级一级的 政府克扣，教室发不出工资是个普遍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已使得许多家庭从原来的消费单位变成生产单位。

于是，迫使得相当一批数量的学生们放弃学校，帮助父母从事经济活动，失学人数年年上升，学龄儿童就学率不足百分之六十。这样下去，受影响的是整个民族的人口素质。

「我干了一辈子的教育工作，我感到有罪！」老先生沉痛地说。

当 我试探着提到本地官员们的作风不正、官富民穷、滥用职权乃至贪污腐败的现象时，他们三人都不讲话了。他们避免谈到这个关键问题，可能是出于恐惧。我只好转 移话题，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份关于我们所近两年来搞出来的可以转让的七十多项实用新技术的介绍汇集，我又对其中的几个项目做了尽可能详细的说明。这份汇集引 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老主任高兴地说，这一下他们有事做了。我马上去申请点钱，把这份东西印刷几百本，然后发到市县及各级工业部门中去，一定有反应。他又 以恳求的态度对我说：「这里是个贫困地区，在转让技术时，请给我们写优惠待遇呀。」我马上答应了，并且说：「凡有技术需要的，就请你们带他们来北京直接找 我，我会安排一切。」

很 快就下午五点钟了。我知道，请老主任替我向专员反映新工厂的问题是会被拒绝，可我实在应该回去，离开一个多星期，所里肯定有一大堆工作正等着。可是，在这 么个贫困地区，难道就让五十万块钱被地方官员贪污，而我却一点事也不做？即使我告诉了专员，很可能一点用也没有，可是即使如此，我做了我该做的事，对上级 也可以有个交待。

想到这里，我站起来准备告辞，找个地方住一晚，明天一早再来。我一定要见到专员，向他当面讲述此事。当我正与他们三人握手准备离开时，秘书进来了，后面是一位中年男人。老主任介绍说，这就是主管工业的副专员。在副专员办公室里，我没有耽误一点时 间，向他详细地讲述我在那个县里所经历的一切，和那个新工厂的全部问题。并明白地提出这里面一定有贪污的，请求地区政府马上着手调查，追回赃款，并且提到 我已决定将专家小组暂时撤回，一切等有了结果再决定。令我奇怪我是，这位副专员在听了我的讲述后并无任何反应，也没有表示什么，反而笑着对我说，时间不早 了，他让秘书去安排晚饭，边吃边谈。果然不出我所料，没有用的。我拒绝吃饭的邀请，提到我今晚要赶回北京。说到这里，我站起来，准备告辞。

他赶紧也站起来，对我说：「我给你安排个旅馆房间，你住下，今晚我和专员去找你，我们再详细商量这件事。现在我还要赶去开会，我送你去旅馆。」我同意了。

坐 在这位副专员的日本汽车里，他指着街道两边的建筑物，向我介绍着这个城市在近几年来的巨大发展，工业迅速突起，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等等。我反感极了，只 是不出声地听着。从他的说话中可以感觉到他的自我优越感十足，他满意他现在的职位和待遇，看他的年纪大约在四五十岁间，浓重的地方口音，受过些教育，但显 然是不足的。对于这种人，不难断定，在他的背后一定有一位有势力的亲戚，他是靠着这种裙带关系而平步青云，对这种人，只要他不去鱼肉百姓就已是万幸，还指 望什么。

车 子停在一家大旅店的门前，经理已经站在外边等候，引导着我们去了那间给我准备好了的房间。经理指挥着侍者们端上了烟、茶、水果，又给我和副专员点燃了香 烟，倒上了茶。副专员抽了一口烟，对我说他一定马上向专员述说此事，宴会后，他会和专员来的。然后又十分威风地给站在那里的经理下令，要他好好照顾我，务 必使我满意。于是，他又表示歉意，他必须马上走了。握手时，他说晚上见，我也对他说晚上见。待他们出去后，我坐下来，把头靠在了沙发背上，闭上眼睛。马上 进房来的司机打断了我的这片刻宁静，他是来告诉我他的房间号码，我示意他坐下，把桌上的那包美国香烟扔给他。

他 对我说：「我开车已经十几年了，给五、六位首长开过车，但我还没见过一位是像你这样工作的。你太辛苦，自己不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今晚没事了，你要不要出 去走走，散散心？」我对他说：「专员和副专员今晚会来的，把这件事告诉他们，管不管是他们的事了，明天一早我们走。」这时门外有人敲门，司机打开门，进来 的是经理，十分客气地问我今晚想吃什么，他会吩咐厨房马上

准备。我向他摆了摆手说，什么也不需要，一会儿我会让司机去餐厅买两个菜回来，我们就在房间里 吃。我今晚还需要写点东西，同时等专员和副专员来商量事的。经理一一答应，毕恭毕敬地退了出来。我给司机钱，让他去买一瓶当地出的白酒，然后去买两盘菜回 来，我们一起享受晚饭。司机答应着出去了。

我 走进了卫生间。一个多星期了，好好地洗了澡，浑身舒服极了。我喝着茶，看着窗外的景色，考虑着今晚与专员的谈话可能出现的几种结果。房门被推开，司机和经 理走进来，后面是三个侍者都端着大托盘，经理指挥着他们将盘上的菜一盘一盘地放在桌子上。经理又请我在桌边坐下，一边给我倒着本地白酒，一边殷勤地问我不 知道这些菜合不合我的口味。我问司机为什么买这么多，司机只是看着我，用手指了指经理，经理马上笑着说：「本地对于接待不同级别的干部都是有规定的，我只 是按规定办事，没有任何特殊。」我无语，和司机两个人用了这顿饭。饭后，我告诉司机，我要写点东西，同时等待专员，今晚不用车，他可以出去玩玩或者休息， 明早早餐后，我们回北京。他走后，我开始写关于这个新工厂的报告。根据老专家、阿军和阿蓉给我的报告和资料，我尽可能详细地去写出实际情况，直到我写到了 与副专员见面，向他反映了此事，又写到他约定当晚会和专员与我共同再谈此事后，我看了一下表，已是深夜快十一点了。

我 打开电视看着，直到电视里说明天见。我又看了一下时间，已是十二点半了。开门出去对值班的侍者讲，如果专员来，请马上叫醒我，侍者答应着。我实在是困了， 回到房间就睡着了。直到司机叫醒了我，看到经理也在。看到我睁开眼，马上问我早点想吃什么。吃着早饭，我对司机说，昨晚专员没来，也没派人来告诉我。我不 准备去找他们了，饭后我们就回北京了。司机点点头，对我说：「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可实际情形是那几十万块钱的贪污已不算个事了，作为一级政府的几个主要 官员共同贪污几十万，那就更不算是个事了，而且谁都明白，这种集体贪污，根本无法查清。」他说得对，我明白。饭后，我们上路。

奔 驰车在初夏的田野上，阳光强烈地照射着到处是一片绿色的植物世界，空气新鲜。本来应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早晨，但我的脑子里却被这一周来所见所闻的事充得满满 的，一直也没有说话。两个多小时后，司机小心地对我说：「北京发生的事，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我吓了一跳，马上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告诉我大学生们正在天 安门广场上集会，要求中央打击贪污腐败、改革政治体制，要求民主。他们发出请愿书，要求与中央的大头脑对话，可中央到今天还没反应，已经好几天了。我没说 话，但心情立时就好了许多，自己对自己说：「谁说中国没希望了，这不就是希望？而且也是力量。」

我 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新鲜空气，然后对司机说：「一会儿到了北京后，去天安门广场上转一圈，看看怎么个情形。」司机没说话，过了半天，他才说：「你说什么，我 没听见。我想在情形不清楚之前，你是不可以去的，即使你想去也不该让我知道。半年来，和你在一起工作，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才这么说的。」

我 知道我失言了，他是对的。他能对我说这几句话，已是超出范围。我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算是道歉，也是感激的意思。我想着，我们离开北京快十天，司机就已经 听到大学生的事了，可见事态不小。这个时候回到所里，又不知道所里是什么情形，最好我先回家问问我弟弟，打电话听听朋友们的看法，然后再去上班，我就不被 动了。我告诉司机先送我回家，他马上说：「这样好。明天早上我去接你上班。」当天下午，打电话找弟弟找不到，找朋友也找不到，最后只好给秘书打电话，让她 把阿聪找到。秘书告诉我说，阿聪去了四川。得不到音信，我只好听广播、看电视，但因为都是受官方控制的，只字不提天安门。母亲尽力地把她听到的一切都告诉 我，但仍不能在我的脑子里形成一个大概概念。直到父亲回来后，才告诉我一个大致的情形。

学 生们的要求是对的，中央很被动。父亲说他坐车回家，路过西四大街的一个交通岗亭，见到上面挂着一条标语，写着「警察也怕物价上涨」，可以想到，学生们提出 的东西是十分符合民心的。正在说着，弟弟的太太来了，向母亲请教一个菜的做法。我又赶紧地问她，我弟弟到哪儿去了。她说近几天弟弟每天回家特别晚，她知道 他去了天安门，可问他时他却否认。这时电话响了，是阿学打来的，他从秘书那里知道我回来了，说是有事要和我面谈，让我晚饭后等他。这下我放心了。

果然，阿学向我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一切后，又告诉我所里大部份职工已是公开或半公开参加到这一运动中去了；尤其阿朋，不但公开表示支持学生，而且组织职工去天安门声援。接着又告诉我所里几个主要负责人对此事的不同看法，又分析到了几种可能结局。当然估计到了最坏的结果，是一场打击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运动的可能。

他 建议我在这件事上，一不要表示支持学生；二不要采取任何行动支持学生；三闭口不谈这件事，认真隐蔽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万一最坏的事发生了， 可以利用我的现有职权，保护一批人。阿学历来老成稳重，极有见解，分析问题透彻，他所说的这些我无法不听。他匆匆地喝了口茶，笑着对我说：「我是劝你不要 去天安门，也不要支持学生，可我是要去的。任何新动向，随时告诉你。」

第十三章　学生运动

所 里的一切似乎都正常。早上整点，人们都上班来了，但显然是没有心情工作，三五成群地小声谈论着各自的所见所闻。一两个小时后，整座大楼就静得好像是周末一 样，人们找出种种理由都提早离开了。学生运动的声势一天比一天大，支持学生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仍像以前一样埋头工作，同时要求各部门负责人也要像我一样工 作。我没有解释，但是他们都明白，这样做是要保证这个机构的正常运转，无论发生什么事各部门可以马上发挥作用。对于外面发生的一切，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 每天都有人通报。

党 委那位老书记来找过我，要求我以党委的名义发一个通告，内容是不准职工去天安门，也不准支持学生运动。我犹豫了一下，正想说什么时，他马上提出召开党委紧 急会议，讨论这件事。我没有理由反对这个提议，只好同意。半个小时后，党委会议会坐满了大约三十几位党务负责干部。会议开始。老副书记马上先发制人地讲述 了他的两点主张，然后又语无伦次地讲解所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是典型的五、六十年代共产党干部，别看没有文化，但却练就了一副嘴皮子，没完没了地说着， 尽管听众都睡得打起了呼。大约一个小时过去了，他才讲完，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要大家举手表决。令我稍微有些吃惊的是，支持他的提议的人不到三分之一， 另有三分之一是不同意，剩下的三分之一保持沉默。副书记没有浪费时间，马上又是半个小时的讲话，但这个比例无多大的改变。

我 即使不说话，这个会议也会毫无结果地散了。我还是想藉这个机会，让那三分之一同意和那三分之一沉默的干部们听些新的东西，得到些新的概念。所以我抓住这个 时机，开口说话了。首先我明白地表示，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权力去告诫人们不要去天安门或建议他们去什么地方，国家没有这个法律，中央也没有这种条文，我们 不可能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告诫和限制人们不准去什么地方。人们支援或反对学生，则更不是我们该管的事。支持了学生，我们也不能说他是反党份子，学生们 有他们的看法，提出来大家讨论，对与错自然明白。对于学生们提出的政治改革，也并不是件可怕的事。经济可以改革，而且改革后带给我们一个温饱的生活，人人 受益。那么政治又为什么不可以改革？政治的改革必然带动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政治的改革，人们的常识是凡事越改就越好，好的东西人们是愿 意接受的。

最 后，谈到了贪污腐败。我说：「我们所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我不敢下结论。至今一个查账组，一个调查组仍在工作。三百多万下落不明，尽管没有证据，但一些过去 的董事长、总裁、总经理们豪华地装修住宅、购买高级家具，又送儿

女自费出国留学，至少是支出与收入不符的。今年我们很幸运，上级如数地把款拨下来，如果上 级要我们对这三百万负责，而少拨下三百万的话，后果是什么？很简单，全所每个人在今年一年内谁也拿不到一分钱的工资，如果这是真的话，你们又会怎么想？」 我说完后，会场上活跃了一些。我低声地征求了一下老副书记的意见，是不是就此散会。他不同意，又在我耳边说了半天。说实话，我根本没听懂他在说什么，为了 尊重他，我提议再次表决，结果是仍没通过，大多数人不同意发这个通知。于是我宣布散会，我和老副书记一同走出会议室，他一直没理我，直到分手时，我对他说 再见，他也假装没听见，扭头走进他的办公室。

大 学生们又一次递交请愿书失败。共产党无视人民要求的本质已经暴露。几位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外面的台阶上，请求这些伟大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们接见，被以「方 式不对」为借口拒绝了。我可真的火了，弄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共产党又讲究起「方式」来，简直是混蛋逻辑，看来是要与人民为敌到底了。事态形成僵局。我 与沙龙和地下刊物的同志们见面，大家分析研究目前形势：一致看法是：一、学生运动马上就要进入高潮，对政府施加压力；二、美国总统布什和俄国总统戈尔巴乔 夫将来访，要把运动坚持下去，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三、宣传、唤起民众，使人民知道贪污腐败必须惩办。民主自由是世界潮流，政治必须改革，否则中国将更远地落后于世界。

回 来后，我马上找到阿聪，让他通知好友们在下班后来我办公室。也真的要佩服阿聪，不知他是用了什么办法，竟然把阿朋、阿学、阿润一个一个从天安门找回来。看 来，无须我多说什么了，他们都比我有着更清楚和更深一步的认识。最后一个问题是大家都清楚而不愿意说出来的，那就是政府会用暴力去驱散学生，粉碎这场运 动，然后是一场大清洗和大搜捕。但是纵观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有哪一次的改革不死人？可同时历史的经验也明摆在那里：社会在发展，人民要生存。社会的进步 和文明的发展会引起改朝换代。为了使中国繁荣富强，就要推行民主政体，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是改革的先驱。阿朋站了起来，大声说：「结论已有，我们还坐在这里干什么？干我们该干的事去。」

隔 天上午刚上班不久，财务处长老君推门进来，递给我一份查账报告。我翻看着报告，听他大致的说明。查账组和调查组自今年合作以来，已初步确定六位督导员与五 十三万元的款子有关。这是两个小组合写的第一份报告，已在一个月前就写好了，一直在保卫处长的手里压着。老君现在已着手写第二份报告了，昨天老君找保卫处 长核实几个数字，无意中发现这第一份报告仍在保卫处长的抽屉里，老君即没说话，更没问什么，只是不客气地拿走这份报告，今天给我送来。

我看着他笑了一下，马上把秘书叫进来，请她通知党委办公室主任阿同，通知党委成员下午一点开会，老君看了我一眼，告辞走了。我处理了几件事后，正想去找老副书记说明一下下午会议的内容时，这位元老副书记推门进来，见到我就问：「是你通知的下午党 委开会？我怎么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我马上笑着道了歉，又解释说正要去找他商量，同时又沏上茶，请他吸烟。坐下后，我才慢慢的把这件报告的内容讲给他听， 又请他在下午的会议上能帮我通过这份报告，然后尽快转交上级。老副书记喝了两口茶后，对我说：「保卫处长对我提起这份报告，我对他说如果你们敢肯定是贪污 问题，那就提交到党委会上讨论通过再转送上级，如果不敢肯定的话，那就不要提交。这是关系到六位为党工作大半生的老同志们名誉的事，可不是件小事呀。后来 不知怎么回事，他也没提交报告，而且再也没提起此事，看来他是交给你了。」我没有回答他的这个问题，只是简单地说，问题发生在这里，我们当然要调查。有了 结果报告上级，如果上级认为这里有问题或调查方法不对，会派人重新调查的，我们只是按规定做该做的事。老副书记熄灭了烟，看也没看我一眼，说：「好吧，下 午会上见。」站起来走了。我有些生气，控制着自己的情绪，重新把这份报告又详细看了一遍。

下 午的党委会开了几乎两个小时。老副书记做了一些工作，说服了几个委员反对我，我只好孤军作战，会议上出现了几次十分激烈的争论的场面。我有点明白，老副书 记是在利用这种办法去拖延，使这份报告继续压在这里，我可是没有时间如此一个会又一个会、一天又一天的去这样消磨。这种无意义的争论该停止了。我用笔在桌 子上敲了一下，然后十分严肃地说：「当这些督导员们拿走六百万元研究经费，在外面包汽车，雇女秘书时，没有人反对；当他们用公款大吃大喝、请客送礼时，也 没有人反对；当研究经费短缺，全所几乎完不成去年的工作任务时，也没有听到有人说句什么；当我决定关闭这些空头公司，追回余款，冻结账户时，也没听到有人 说我做的是对的；在我成立了查账组和调查组时，没听到有人反对，可也没人赞成。

两 个小组终于搞出了第一份报告，五十三万元终于有了下落了。但是，我没有打算讨论如何做结论，只是请他们来商量把这份报告转交上级，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却 遭到反对。为什么？难道我们少了三百万块钱不应该追查？或者我们查出了结果不应该向上级报告？如果上级问我关于这三百万的调查结果时，他们当中谁又肯替我 去回答？肯定没有。现在我胡涂了，一个堂堂研究机构的党委会，在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上争论不止，这反映出什么？二十分钟后，会议结束。我胜了。回到办公 室，我让秘书立即打电话通知上司，请求接见。我整理了一些明天去见上司的材料放进背包，让秘书打电话通知司机。我有点兴奋，想早一点回家。晚饭时，我又说 又笑 ， 当着母亲的面喝了半瓶酒，我的好心情感染了全家人。但母亲是敏感的，晚饭后，她问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会使我这么高兴。我对父母详细讲述了党委会上发生的一 切，父亲没说话，母亲听完却生气了。她说：「全国人民都痛恨贪污腐败，怎么会有人去包庇呢？！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当那些人贪污时，党委这些人一定没少分 赃。」

隔 天，当我的上司、这位副主任委员读完调查报告后，看得出来他是十分生气的。他用手指着报告完成的日期，严厉地问我为什么不马上转交给他。我才把昨天发生的 一切详细地告诉他。他听完后，用手在桌子上轻轻地拍了一下，两眼看着窗外，他是在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很快他转向了我，声音和蔼地说：「看来，你的工作并 不是那么顺利的，对不？」我点了点头。他笑了一下，又说：「我们都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反对变革是会被时代抛弃的；顺应，又太被动了，不是我们应有 的态度。我老了，没用，你们应该是站在变革的前列，国家要富强，不根除这些败类就富强不了。比较起西方发达国家，我们的工农业还是处于半原始状态的，人民 辛辛苦苦创造出的一点财富还不够这些人贪污呢，老百姓不反对、不造反，还等什么？」我认真听着。

他 说完后，又叹了一口气，我马上说：「财务处长讲，大约一个月左右，第二份调查报告会完成的，是一笔七十万元并牵扯到十一到十二人的调查结果，一旦完成，我 会马上送来。」说到这里，我停了一下，接着又说：「中央应该表示个态度，打算怎么惩治腐败，即可平息学生运动，又可顺应民心的。」他看了我一眼，点了一下 头，放低声音对我说：「你们所里一定有不少人是支持学生的 ，所里的情形怎么样？是不是很混乱？」

我马上告诉他：「所里并没有人出面组织大家去支持学生，对于学生们提出的东西，许多人认为是对的。您可以放心，所里的各个部门都在正常运作着，我可以保证，绝对不会出现任何混乱。但有一点不得不承认，就是各项目进度放慢一些。」

对 于北京的这场学生运动，全国都已经有了反应。他问我，是不是应该考虑把所里那些在外地工作考察的所有人员立即召回。现在完全无法预料这场运动会变多大，结 果又是什么，为了这些同仁的安全，最好马上做这件事。我答应着。他又说：「这份调查报告，我马上考虑处理，希望不会遇上太大的阻力，很快就会有决定的。我 会正式给你发去公文。」说完，他站了起来，我知道他是很忙的，秘书说过我和他只能谈二十分钟。我马上站起来告辞。他笑着握着我手说：「在这个特别时期，一 切要小心，无论发生什么，尽快让我知道。」

回 所的路上，我拟出紧急召回在外地工作考察人员的通知，回到办公室后，立即交给秘书，让她请行政办公室立即发电报，不准漏掉一个人。我刚坐下，阿宗和阿军进 来了。两位老大哥，我当然要招待了，马上为他们沏上茶。当都坐下后，阿宗笑着小声的问我对学生们提出的要求是怎么个看法。我笑了，明白地说：「我是百分之 百地同意，相信我，你要对我说什么，可以直接地说出来的。」

阿宗似乎松了口气，对我说：「你不说话，又不表示个态度，天知道你是个什么看法。有人告诉我， 你召开了两次党委会议，有人认为你的立场变了，我是不太相信的。所以来问问你，我们是朋友，又共事几年了，我只想要求你一件事，那就是无论你怎么想，请不要阻止别人对学生的支持。」听了他的话，我有点生气，他明摆着在警告我。我沉默了一下，向他们讲述了两次党委会的内容和我刚才与上司见面的情形。

我 说完后，阿军有些不安，马上向我道歉。阿宗笑着对阿军说：「不用向他道歉，他既不说话，又不表示态度，办公室的门整天关着，又连续召开党委会议，当然会让 别人多想」。他又转向了我，问：「如果所里的职工们去天安门游行，你支持还是不支持呢？」我放低声音，对他说：「你还要我怎么样？难道非要我去举着大旗， 喊着口号去支持学生吗？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所里职工去游行的话，我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而且最好事先不要让我知道，事后也不要告诉我，这就是我的回答。两 位大哥当然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阿军马上说：「明白，当然明白。」我们都笑了。接着，我又把上次参加沙

龙 会议时，对这次学生运动的分析与他们谈了一下，并且分析了可能出现的几种后果，并且提到研究所不能出现任何混乱，也不能出现任何损失和破坏，这样就不给任 何人以任何借口去制造事端和指责学生运动。所以我希望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必须坚持日常工作，继续发挥功能，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事。可惜的是，我是不好如此 公开地去讲这件事的，只好请阿宗不公开地和各部门负责人谈，并征得他们的同意和支持，阿宗立即着手做这件事，力争在两天内做完。

正 谈着，秘书推门进来，递给我几份公文。我问她有没有上级发下来的檔，她马上递给我一个棕色的信封。我打开后，看到里面是一份对阿军的正式任命和提升两级工 资的决定。三、四个月前，化工研究室主任、一位元老专家因心脏病不幸去世了，所里决定将现任的副主任、一位有名气的工程师提升为主任，将阿军提升为副主 任，并提升两级工资。同时在那份报告中，又提到阿军的出色的成绩，应授予工程师的职称。三个多月了，上级才把正式的档发下来，唯独正阿军的工程师职称一事 上，上级的批示是仍需等待科技委员会一年一次的职称评定时才可以决定的。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好消息，我马上把文件递给他们，然后又与阿军握手道贺。阿军有 些激动，半天才对我说：

「谢谢你！」我摇了摇头，对他说：「不要谢我，要谢你就去谢阿成，是他临走前交待给我的。可是职称一事，看起来还要等一等。」阿军马上说：「我已习惯了，我这一生都是在等待中渡过的。可这次的提升是我没想到的。」他还想说什么，可没说出来。

阿 宗高兴地说：「马上把这两个任命公布出去，我急着要喝阿军一杯喜酒。」我马上说：「我马上让阿聪公布，周末我们喝一杯，好不好？」阿军说：「不要等周末， 就是今天下班都去我家，让我敬你们一杯酒。」当我把这份檔交给阿聪，请他马上公布时，阿聪发火说我把他栓在办公室里，不给他一点时间；外面是轰轰烈烈的学 生运动，可这里是冷冷清清，还有就是没完没了的琐事，最后他说：「我要疯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我把他推坐在沙发上，递给他一支烟。他大口吸着，我笑着看着他。半支烟吸完了，他平静了，站起来要走，我问他到哪里去，他头也没抬的说了一句：「给你当主任去！」说完就走了。我笑了。

果然，学生运动又进入了一个高潮。五月十三日， 绝食斗争开始。稍有了解的人都明白，这完全是由于中共的无能而致使事态发展到这一步的。学生行动已赢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中共完全处于被动了。绝食开始 几个小时后，北京的市民们就行动起来，每个人在做着自己认为是应该做的事去支持学生们。市场上的葡萄糖一下子就被人们抢购光。

我母亲和几个退休的医生、教授组织起来，捐了一些钱，又千方百计地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买出葡萄糖，然后乘车给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们送去。回到家时，母亲的眼睛还是红红的，不住地说：「都是孩子呀，这么年轻就懂得忧国忧民，让人心疼。」

首 先站出来公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的，是北京的知识界。没有人组织，一场知识分子的大签名活动开始，工人、农民也很快参与了支持的活动。第一次的支持学生的大 游行有一百万人参加，几天后的第二次大游行人数上升到两百万。政府方面仍无反应，但同时却下令全市的公共交通停运了。不知什么原因，连警察也不见，各个十 字路口无人指挥交通，但马上学生们代替了交通警察的工作，出现在全市各个十字路口上指挥交通。一个奇迹出现了，在学生们指挥交通的那个月里，北京市竟然没 有因车祸而死伤一个人的。

政 府和警方丢了脸，因为北京市每个月死于交通意外的人数平均因车祸在四十至六十人，因车祸而受伤的人数在三百至五百人左右。据北京市市长陈希同自己说，他受 了中央的委托与学生代表们见了面，要学生们停止绝食，回到学校。在交谈中，陈希同很被动，当学生代表问他每月工资是多少时，他竟然犹豫了几次，最后仍说不 出个准确的数字，只是含糊地说：「大约三百块钱左右吧。」

学生们马上问：「三百元一个月的工资，你又怎么可能送儿子去美国自费读书？」市长的回答更含糊 了，吞吞吐吐地提到有一个美国公司负责他儿子的教育费用。学生们还要继续追问时，被别人转移了话题。

当 时的总理李鹏与吾尔开希在人民大会堂有个短暂的见面。他一再声称他不是来和学生谈判的，又一再地要求学生们立即停止绝食，立即停止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聚集。 说句实话，以前李鹏给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据说他受过高等教育，是个工程师，不少的人认为他与赵紫阳连手，应该在政治经济方面带给中国一个生机。可是这次 与吾尔开希的见面，把我对他以前的印象全否定了，一副自以为是、专横、霸气，冷酷无情的嘴脸暴露出来。我倒抽了一口冷气，揣测着李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但我绝对没想到，十几天后的大屠杀，他竟然是主要策划人之一。中国怎会有这么多大灾星？

北 京大学生的绝食，牵动了亿万人的心。全国都响应了，几十个大城市的人民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中共更被动了。所里反倒更清静，百分之九十的职工参加了两次的 大游行，连党委部门的许多人也参加了。汽车队的那位书记阿强出人意外地同意让所有的汽车出动，把人们一批一批地送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游行，数据室主任阿建也 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支持者了。

一 天中午，阿建来到我的办公室，大声对我说：「你应该出去看看听听，学生们的要求是对的，人们都在支持。我是百分之百的支持的，我已给他们捐了三十块钱了， 我希望你也能为学生们做点事，参加进来，至少也为学生们捐点钱。」我没说话，只是笑着请他坐下，问他近来正忙着什么。他直率地说，他在通过他父亲的关系全 力促成中央与学生的直接对话。我马上问他可不可能成功。他肯定地说：「会的，我父亲已几次气得拍桌子、骂混蛋。就是因为军费被贪污，中央不是不知道，可是 管不了，于是让军队自己想办法搞生产，做生意去挣钱，补上不足的军费。你想想，如果军人都变成商人，这个国家也就完蛋了。」我笑着说：「国家是不会完蛋， 可这个政权是会的，对吗？」他点了点头，又马上追问我的态度。我只好说：「目前中央还没表示态度，而且又一直在躲避着学生，在这种情况下，以我目前的身份 就实在是难了。我实在回答不了你的问题，请你理解。」他看了我一眼，马上说：「我明白，幸亏我当初没有坐进这间办公室来，否则连个自由都没有，更别提民主了。从今天起你我之间的对手关系不存在了，还让我们印象以前一样，做个朋友吧。」说完，又和我握了握手。

我知道他说的话靠不住。高级干部子女的心理是矛盾的，也是复杂的。更主要的是，他们是这个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五月十九日，绝食斗争停止，学生们仍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不难分析，中央高层内部又在激烈地斗争。中国的事就是那么

奇怪，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中国的事是中国人民的事，中国人民却永远被排除在国事之外。一小撮当政者们关起门来，自相残杀，使阴谋、耍手段、比后台，胜的把黑说成白，没人敢反驳，败的从此销声匿迹，成为替罪羊。

我 与同事们分析过，一致看法是中共高层会有人事变动的，用老一套办法去缓解一下目前激化了的局面。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想到中共会动用军队来搞大屠杀。美国总 统布什来访，清楚地看到所发生的事，并且对中共的高层讲过这样的话：「解决这件事的方法很多的，千万不要镇压。」几个高层都点头表示同意。

五月二十三日， 我的汽车发了毛病，车队想尽办法准备抢修，但无奈找不到修理工人。那天正是北京第三次的全市大游行，参加的人数达到了三百万。在下班前一个小时，车队队长 十分抱歉地来找到了我的办公室，一再保证今夜抢修，明早准时接我上班。我安慰了他，马上借了自行车，高兴地骑车去了天安门广场，这还是自学运开始以来，我 第一次来这里。看到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我也激动了。我用两个手指做出 V 字， 融汇在浩荡的人流中，与人们一起喊着口号。

我第一次感到这是真正的我，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令我高兴的是，数量庞大的工人、农民也在游行的 行列中；共产党历来怕工人、农民，既然当初是他们帮共产党建立了这个政权，当然他们也能去推翻这个政权。我默默地对自己说，今后无论多忙，我还是要努力地 为一些刊物多写几篇文章，唤醒民众是十分重要的。那天傍晚，一场雷电交加的大暴雨突然降临。立时，平地上积起了几公分深的雨水，但广场上一点不混乱，游行 仍在进行，几个震耳欲聋的霹雳和几道极强的闪电打在了中南海上空，激起了广场上百万人的喝彩声，谁又能说这不是久积在人民心里仇恨的发泄？

带 病上班已几天了。半年多来这种养尊处优、严重缺乏锻炼的工作，加上那天的那场大暴雨，我病了。一天比一天严重。一天下午，竟然在办公室里晕倒。可把秘书吓 坏了，马上去医务室请来了两位医生，他们认为我是由于受了凉而引起的呼吸道感染，发炎十分严重，他们打算把我立即送医院。我摇了摇头，说：「你们看看这个 摊子，我能离的开吗？最好你们想想办法给我治一治。」他们商量了一下，告诉我吃药对我已起不到作用了，必须打针，迅速消除发炎，否则会有更大的麻烦。我倒 是宁愿打针，而不愿吃药。两针打完后，我感到极疲倦，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直到秘书和司机把我叫醒，医生又给我打了一针，要我明天休息，他会去我家给我打 针。我摇摇头，对他说：「我已感觉好多了，明天我会来上班，在这里打针方便些。」

司 机送我回到家，我刚推门进屋，母亲见到我惊慌地对说：「要镇压了，杨尚昆调兵进京了。」我笑着对母亲说：「不可能的，调兵干什么？」母亲拉我进了起居室， 电视正开着，换了几个频道后终于看到了那位两道眼眉一高一低的杨尚昆正在说着调兵进城的事，我吃了一惊，坐在外屋吃饭，一边考虑着。母亲也走出来坐在我对 面，问我会不会真的镇压，太太焦急地看着我。

我对她们说：「放心吧，如果真的镇压，是不会事先告诉大家的，像以前一样，在半夜里搞个突然行动。而且那是警察的事，调军队只是制造声势，吓唬人而已，怎么能用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百姓？」母亲和太 太似乎相信我，我也以为我的看法是正确的。北京的市民们也许不这么认为。几个小时后，人们就行动起来了。人们开始设置路障，又聚集在几条进入北京的公路上 阻挡军车。当有军车出现时，人们就围了上去，向军人们送上凉茶、汽水、水果和香烟，女人们甚至哭着恳求着军人们千万不要向人民开枪。

从 各路进军北京的军人们的嘴里可以得到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这些军人们已经至少有两个星期是不给报纸看，也不准看电视和听广播的。这次出来，只知道是紧急 任务，至于是什么任务和去哪儿就全不知道了。他们已经在路上至少两天，有的甚至已经走了五、六天了。听到市民的话，他们才知道是来到了北京，也多少明白了 一点在北京发生的事，实际上也与他们本身有着切实关系的。自从宣布军队进城到六月三日一周之内，共有两千多名军官和士兵脱掉军服，放下武器，宣布退伍回家去，另有一个说法是将近六千军人不辞而别。由于路障多，军车无法继续前进，于是军人们弃车步行继续向天安门行进。但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被几百、几千的市民们包围、劝说着。

一 位记者报导，在北京的东单，一位老太太向一个军官跪下，哭着恳求他千万不要向人民开枪，又把一篮子水果送给这些士兵们。那个军官感动了，也跪了下来，对着 老太太和周围的几千名市民们保证，绝不向人民开枪。看来百姓们是深知共产党的保证是从不算数的，仍是紧紧地组织起人墙，不让这队军人前进一步。

就 在这段日子里，据听到进入北京的军队的番号就有第十五军、第十六军、第十九军、第二十三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十七军、第三十八军和第三十九军，共八个集团 军，总兵员超过三十万人。在距北京市区不远的西北部山区里，常年驻守着二十至三十万军队，他们隶属于北京卫戍区，任务就是保卫首都。而这些日子，这些军营 的大门都紧闭着，军人们也不准外出，这一个多月来北京发生的一切，他们是清楚地知道的，所以保卫首都的任务才被外省调来的八个军代替了。摩擦与冲突也发生 了。在市区北边的清河镇，军人们向东边的什么目标开

枪轰击；在南边的南苑空军机场，又发生了军人们为争夺机场 而自相火并的事；在市区里又发生几起两队军车互相对撞的事。由于军人们都穿着同样的制服，又不佩带部队的番号，所以也弄不清究竟是谁在打谁。士兵和下级军 官可以骗，对于将军们，至少要告诉他们一些实话。将军们的表现也不同。在天安门广场上执行了大屠杀的第二十七集团军的政治部主任张工少将，可能是唯一胆敢 在国家电视台上公开否认开枪杀人事实的军人。在六月七日的记者会上，他面对着冷清的会场和一群低头不语的记者，不知羞耻地夸夸其谈着，又否认了二十七军与三十八军曾发生过冲突。

不久，就被认为其人之功莫大焉，而晋升为中将。与张中将相反的一件事是，第三十八军的军长因违抗了一条不知是什么样的命令，而被关进监狱；三十八军的一位师长因此被处决。

六月二日，所里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人们都出去了。照例的一番检查，得知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在岗位上后，我就再也想不起来该干什么了。收拾了一下办公桌，为自己沏了杯茶，然后半躺在沙发上。

我 仍在病中，医生来了，给我打了一针，仍劝我住院，我拒绝了。财务处长老君进来，关切地问了一下我的病情后，递给我一堆报告。我皱起眉头看着他，他解释说， 这是五月份各研究室及各行政部门的领款报告。我点了一下头问他，怎么了？我都签了字同意的，有什么不妥？他说：「怎么说呢？手续上没错，数目也没错，可是 你想想，五月十三日学生开始绝食，从那以后所里的工作基本上就停顿了，可是钱却没少领，总数几乎一百万元。我不说，你也明白，估计一半数量是作为捐款给天安门了。当然了，这样说我是没证据的，我恐怕到年底工作任务完不成，可就让有些人抓住借口。」

听 他说完，我笑了。对他说：「这不是个事，我已经想过了，即使是年底工作任务没有完成，或钱又不够的话，总要有一套说辞去解释，也有一套例行公事的手续的， 最多也不过是你在年终的财务报告上，和我在工作报告上多注意小心一些而已，问题是不大的。同时，假如你估计的是对的话，有四十至五十万是给了学生了，也不 会有麻烦的。想想去年，全所短少了三百多万，可项目基本上都完成了，今年少五十万，我想是没问题的。各部门的负责人都不是傻瓜，他们不可能不考虑就做的， 没有人愿意在年底给自己找麻烦的。你想想，我说的有道理没有？」老君笑了，问我：「他们来要钱时你是知道的，可 什么也不说，就签字同意，对不？」我也笑了，说：「让我怎么办？一切合乎手续。有报告书，有预算书，又没有超支，我没有理由拒绝。换句话说吧，即便这些钱 都给了学生们，也总比让那些人贪污了好得多吧？」老君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他也没

事干，我们又聊起了其它的事来了。老君提到可以从几项开支上节省出一部 分的钱，问我如果仍想给职工盖一座住宅楼的话，现在可以考虑开工了。反正今年是不会盖完的，所以可以从明年的开支中再挤出些钱来，基本上就够了。我马上兴 奋了，让秘书把胖处长请来，一起商量盖楼的事。

那 天下午，我的病又严重起来，几乎失去知觉。这一次医生没有再听从我的话，马上吩咐司机备车，陪我去了医院，做了不少的检查后，又换了几针，最后还不让我 走，硬把我扣在医院又观察了几个小时后，才允许我回家，又给了医生几支药，让他连续给我注射两天。回到家时，弟弟在等我。他告诉我许多外面正在发生的事， 最后下结论似的说：「镇压马上就要开始了，你是身居要职的人，最好做一些准备。」我问他，镇压的可能性有多大。他轻描淡写地说出了两点，正好击中了共产党 的弱点：第一点，越是引起民众广泛支持的事，就越是触及到共产党的那根最敏感、也是最脆弱的神经，那就是担心这个政权会被推翻；第二点，共产党不会处理民 众情愿的事情，加上这次的学生运动组织得很好，没有给共产党任何借口，结果失去时机，引发了全国性的运动。共产党被动了，也丢了脸，越是这种打家劫舍、占 山为王起家的土匪，就越要面子。丢了面子，就恼羞成怒。他问我：「你想想，这里有没有一丝一毫的可能性，共产党不去镇压？」我犹豫了一下，说：「事情已经 弄到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如果镇压，今后在国际上的这个损失，可是十年、二十年也挽不回来的。」弟弟马上说：「这是你我这种人的思维方式，共产党不考虑这些 的。好了，你快把病养好，我明天来看你。」说完，他就走了。我

送 他出来，想和他商量去天安门的事，他已经跳上车。可能是打了这种针的缘故，我感到昏昏欲睡。晚饭后不久，就实在睁不开眼睛了，一觉睡到隔天上午。太太叫醒 我，原来是司机带着医生来给我打针，我迷迷糊糊地挨了一针。司机问我还去上班不，我还没说话，就听医生对他说：「你看看他这个样子，还用问吗，当然不能上 班。」然后又对我说：「下午四点，我再来给你打针，你要多喝水，多休息，记住吃东西。」我一一答应着，太太把他们送了出去。女儿上学去了。太太因为我病 了，请了假在家照顾我。我可能是由于昨晚一夜的好睡，起床后感觉好多了，精神好极了，马上给弟弟打电话想约他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可无论是家里还是他的报 告书都没人接电话。我又给所里打电话，也没人接，连秘书都不在。我正想着自己去天安门看看，可是身体仍软软的没力气。

我刚刚打开电视，母亲来了，送来早点，又关切地问候着我，并让我去她那里吃午饭和晚饭。母亲一向不太看得上太太的厨艺，我答应着母亲，晚饭一定过去吃，但现在我要弄清楚外面的情形。电 视上，仍是一队一队步行的军人们被人们包围、阻挡着的情景，电视电台受共产党控制太严，能播放出这个画面已很不容易。我走到外面去看传单，去参加一堆一堆 聚集在一起的人们的交谈。虽然是小道消息，但也极有参考价值。我感到不安。这种对峙的局面已几天了，军队仍在顽强地要进来，而市民们也顽强地在阻挡。我想 起了昨天傍晚弟弟的话，越想越不安。突然一个念头涌进了我的脑子，这一切会不会都是一个假象？警察已经在

天安门埋伏好了，只是在等待时机出动镇压？我累 了，回家躺在床上。睡是睡不着，脑子很清醒，再一次地分析了镇压的可能性。关键在于，这不是一个民主的政府，

而是一个专制政权，人民的意愿和呼声是不被考虑的。一旦事情发生了，并且发展到现在这一步上，站在这一小撮既得利益者们的立场上去考虑，镇压是他们唯一的办法去平息事端，除此以外，别无它路。

想到这里，我不禁出了一身的汗，马上起来给所里打电话，但是仍没人接。我又往各部门打，也没人接。给弟弟和朋友们打，也没人接。我正不知该怎么办时，司机带着医生来给我打针。

打 完针后，医生轻轻地对我说：「我看情形不太好，恐怕这一两天会有事发生的。」我马上说：「你的意思是指镇压？」他点了点头。我告诉他，我也想到这个可能 性，所以我一天连续给所里打电话，但却没人接。医生说：「这一个多月来，是因为你每天上班，所以各部门都要有人上班，这部机器一直在运转着。今天因为你没 去上班，所以所里也没人了，况且明天又是星期天。现在你什么事也做不了的，好好恢复一下身体，估计镇压不会很快发生。另外，星期一去上班，只能骑自行车去 了，到处都是路障。我们来这里，足足用了一个半小时绕来绕去的，明天早上你还有一针，我会骑车来给你打。」

我 马上说：「不必了，你留下那支药，我母亲会给我打。工作一周了，你也好好休息吧。」他拿出了那支药，放在桌子上，苦笑了一下，小声对我说：「我这种情形 下，休息？怎么可能呢？我要去做点什么的……，对不起，我不该对你说这个的。」我看着他，不知该说什么。他起来告辞，我也站了起来，小声地说：「多加小心 呀？」他点点头，伸出一只手，我们紧紧地握了一下，我又用另一只手在他的肩上轻拍一下，然后送他出来，看着车子离开。我正要进屋，女儿远远地向我跑来。她 刚放学，手里挥动着一个纸做的小旗，旗上写着「民主自由」。女儿来到我面前，很委屈地对我说高年级的同学们都去天安门游行了，就是不准低年级的学生去。

我 摸着她的头安慰她，进了屋。当我正在努力地寻找合适字句去使女儿明白民主的意思时，电话响了。阿学打来的，一定是从公用电话上打的，嗓音大极了。他匆匆地 对我说：「估计今晚或明天会有事的，一些军人已经从地道进入了天安门广场的地下。现在广场上至少有五十万人聚集着，在离广场西边不足两公里远 的西长安街上，市民们截获了一部面包车，发现里面全是武器。军人们已经换上便服混在人群中，继续向天安门进发。几部同样的面包车不顾市民的阻拦，不让检 查，向前猛开，结果撞伤人，又撞到电线杆上。人们围上去，发现了武器，在其它地区还发生了几起军车相撞的事……」我大声问他在哪里，能不能到

我家来一趟。 他没有回答，只是匆匆地问我身体好一些没有，没等我说话，电话就断了。

我 点了烟，发现手在抖。我知道，我的朋友们、同事们和我的弟弟、妹夫都在街头上，他们比我更清楚这个形势，他们在做着最后的努力。我拿起电话打给我的上司， 也没人接。我看了一下表，已是五点多了，当然没人。我放下电话又拿起来，给恩师打电话。恩师在家，我匆匆地把我的分析告诉了他，请教他，作为我现在的身 份，我应该做什么。

恩师没有回答，半天，话筒中传来恩师那平静的声音：「你是学历史的，应该明白中国的事，更应该做多种准备，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政权，不是一个政府，事情当然复杂。不要多想，即使有事发生，也不会很快的。」我从来相信他，更是尊敬他，听了他的话，我多少有点放心。但是不久，我发现错了，恩师也错了。当晚七点钟，电视播放了政府的警告，要求人们今晚不要去天安门广场。

正 在与父亲商量着这个警告时，弟弟回来了。他的样子很吓人，浑身汗水，衬衫也破了，边吃饭边对我们说：「不发这个警告还好点，一发出来，反而更多的人出去 了。现在去天安门已经不可能，连周围的街道也挤满人，坦克也开来了，被人们阻挡着。这里又没有武装，把坦克开来干什么？」父亲不以为然地说：「调兵就是错 误的决定，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把事情激化。又开来坦克，更是愚蠢，难道还要把原子弹也拉来？」我摇了一下头说：「一个星期了，军人们仍没到广场，事情 已经激化，同时也激怒中共。什么下一步计划？如果他们有，那还是不错的，很可能他们没有，那么用这批军人去镇压 也是不可避免的了。」父亲的脸上现出沉思的样子，但马上对弟弟说：「今晚你不要出去了，更不要去天安门。」弟弟正在穿上一件父亲的衬衫，头也没抬地说： 「我不去天安门，我去北边，他们正等着我。」说到这里，他又请母亲给他太太打个电话，说他可能晚一些回家。母亲叹口气，刚想说什么，弟弟已经开门出去了。

母亲转身对我说：「你还病着，能不能今晚在家好好休息？」我答应着，开始感到昏昏欲睡，一定是打那种针的反应。那一晚，我真希望就那样睡下去，永远醒不过来。

第十四章 男孩背后连中三枪全是开花弹

六 月四号早上七点多钟，我被母亲推醒。朦胧地睁开双眼，看到母亲泪流满面，一张脸很苍白，几乎是喊着对我说：「开枪杀人了，真的杀人了……，我求求你听我一 句话好不好，我们不给这个政府做事了，他们杀人了……。」我猛地坐起来，问母亲究竟发生了什么。母亲出声地哭了起来，断断续续地说：「他们杀人了，我看到 十一具尸体，……还有一个小男孩……」我跳起来，穿上衣服，随母亲走出来。在街上，立时就感到气氛的紧张。

没 等我说话，母亲开始告诉我，大约在清晨不到四点钟，他们就被「军人开枪杀人了」的喊声惊醒。他们赶紧起来走到街上，看到手里挥动着沾满鲜血的衣服的学生们 惊慌地跑着，跟着又看到有人用自行车和三轮车载着受伤的人，向离我们住处不远的医院跑去。在不远处的十字路口上，几个人和一个学生正在向一群逐渐聚集上来 的市民们大声地讲述着天安门广场上杀人的事。

到 了离我们住处只需步行十分钟的医院，很快就看到十一具在半夜送来的尸体。那家大医院太平间外面的地面上，铺好一大张帆布，上面整齐地排列着一排尸体，数了 数共是十二具。一个搬运尸体的工人对母亲说，不到二十分钟前，又抬来一具，加上太平间内的五具，总共十七具，全是死于枪击的，说着用手指了一下那具刚送来 的尸体。

我蹲了下来，掀开那块覆盖用的白布单。这是一具男尸，可能三十岁左右，死于一粒打进他左胸的小弹，衬衫上明显地看得出子弹穿透的洞。我翻开他的衬衫，看到他的左胸部有一块大约长宽均八公分的伤口，明显看得到碎肉和碎骨头翻出来。我吸了一口气，这是开花弹；子弹打进人的身体后会爆炸，造成受伤面积增大，致命率也提高。我不但激动，更被激怒了；究竟是为了什么，要把人民恨到这种程度？为什么使用这种残酷的手法去射杀人民？

母 亲拉我去看那个男孩的尸体，血已经浸透他的衣服和身体且开始凝结；脸被洗过，但嘴角上仍有血迹。工人对我说，这个男孩背后连中三枪，全是开花弹。从这个男 孩的脸上看，也不过和我女儿年龄差不多。紧挨着男孩的是一具成年人的尸体。我掀开盖在他身上的白布，尽管他身上血迹斑斑，但却看不到被子弹击中的痕迹。在 他的脸上覆盖着另一块布，我蹲了下来，正准备去揭开那块白

布时，那位上了年纪的工人对我说：「劝你不要看了，恐怕他的亲属也认不出来了。」我没有听他的 话，轻轻地掀开了这块布。

当他的脸显现在我面前时，我一阵恶心，但很快控制住自己。这个人的大半边的脸已经没有了，半边的头骨也没有了，完全是被血、肉、碎骨、脑浆模糊一片地覆盖着，另外的半边脸变形了，根本无法推测这个人生前的面貌。不用多问，这个人的头部也是被开花弹击中的。

我 正要继续查看下去，一位年轻的医生带着几个年轻人走进来。这个医生是那么年轻，可能是个刚毕业不久的实习医生吧。只听他大声但又有些结巴地对其它几个年轻 人说：「昨晚，我没去天安门，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天安门发生了什么。但在今晨两点钟，我被医院召来抢救受伤的人，到现在为止有一百四十名受枪伤的人在医院。 你们看到了，这里是十六名遭枪击而死的尸体。你们是记者，已经看到事实，下一步该怎么做是你们的事了。屋里有一个死者，浑身上下被枪击中八处，所幸是全不 是开花弹，否则的话要把尸体整个抬起来也没办法了。最后我想说，一个政府把人民恨到如此程度，下这样的毒手，整个政府实质上已经不存在。对不起，我还要去工作，失陪。」

说 完，他转身走了。这几个记者蹲了下来，一个一个地检查着尸体，从他们那一张一张还像孩子般的脸上，我没有看到恐惧和泪水。这时那位上了年纪的工人走到我面 前，对我低声说：「陪你母亲走吧，这个环境对老年人是不好。」我点了点头，挽着母亲的胳膊带她向外走去。母亲回过头来对这几个年轻人说：「不是十六，是十 七具。」

我 们走过急救室时，看到墙上贴着四张信纸，开列着七十多个人的姓名和工作单位。一个中年人正紧张地查看着名单，但显然是没发现他要找的人，他对周围的人说他 已经跑了三家医院了。一位护士用手指了指太平间的方向，周围人们沉默地看着他走向太平间；我在心底默默祝愿他不要在那里找到他的亲人。来到医院大门外时， 这家医院唯一的一部救护车刚好开了回来，车子意外地停在大门外，一名医生、一名护士和司机跳出车子，开始向迅速围上来的人们讲述二十分钟前发生的事情。

他 们是第五次去天安门。当行驶到南池子时被军人阻挡住，并命令他们马上调头回去。医生隔着窗户与军人说话，告诉他们还有一些受伤的人急需抢救，请求放行。军 人又拒绝了，并要挟再不走，就开枪了。医生对那个军人说：「还从来没听说过任何人可以对一个正在履行职责的医生开枪，即使是在国际间的战争，也允许医生去 救人的。」两个军人并不说话，从肩上拿下枪。医生冒火了，

推开车门，正想下去和他们讲理时，几声枪响了，车身颤动了几下。司机没等医生说话，匆忙地把车子 开了回来。他们说完，人们马上帮他们检查汽车。很快就发现这部急救汽车中了两枪，一枪打在了前保险杠的左边，子弹在保险杠上打穿了一个洞；另一粒子弹打断右边反光镜的支架，医生正坐在这一边，这粒子弹如果偏向左边三十公分，将正好打在他的头上。

送 母亲回到家，正好妹妹一家三口人来了。他们看起来惊慌而又疲劳，并且还带来了换洗的衣服和食品。他们从早上六点钟就离开了他们的家，骑上车，带着包裹和七 岁的儿子，整整两个半小时才来到母亲家。他们要避开站岗的军人，又要绕过路障，还要躲开正在燃烧的军车，逃难般地终于离开了市区。他们一家是我们最担心 的，因为他们住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足二点五公里远，看到他们全都安然无恙，母亲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妹 夫讲，枪声开始在三日晚上大约十一点左右，从半夜到凌晨两点钟是最激烈的时候，密集而且不断，直到四点多钟时枪声比较不多了，但实际上直到六点钟他们离开 家时，枪声仍在不时响起。在清晨四点钟左右，大批直升飞机飞向天安门的方向，同时还可以看到天安门一带有巨大的黑烟升起，但他们没有听到坦克声。直到早上 五点多钟，街上出现大批军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军人驶向天安门方向。

在 他们来的路上看到德胜门的桥上四部军车正在燃烧，又在三环路上看到两处共十几部军车被市民们点燃的情景。他说：「这一次，老百姓们开始真的被激怒了。昨天 人们还给军人送汽水和香烟，又和气地向军人们讲述着事实。可今天不同，人们围着军人又骂又喊，大声质问，毫不示弱地站在军车坦克前面，一步也不后退。」

我们正说着话，弟弟一家三口也带着衣物食品来了。他们的住处是在天安门的西北方向大约七公里左右，不算是个敏感地区，但有两所大学在那一带，而且从北京往西北去的公路又在那里，大批的军车就坦克就是从这条公路开进北京的。为了安全，弟弟还是把太太和四岁的儿子送来了。我和父母住的地点距离天安门约八点五公里，可实际上这里正是大学集中的地区，被中共认为是这场学生运动的发源地。弟弟和妹夫拉我一同出去，我们骑上车准备到市区去看看。刚出门就发现北京航空大学门口聚集着一大群人，正阻止了七部向南开来的军车。人们的手里已不再是汽水和香烟，而是石块和木棒了，我担心 事态的发展会激怒军人。这时一个军官跳下车，向各辆车上发出了命令，很快各车上的军人都跳了下来，总共一百多名，很快地又排好了队，然后大步地向来的方向 走去。七个军车司机打开了油箱盖子，把一团擦车布塞进油箱，然后又把布拉出一半，用火柴点燃

了这块布，然后七名军人飞跑着去追他们的同伙去了。与此同时，七部车上的火熊熊地烧了起来，黑烟升上天空，火势蔓延，迅速地吞蚀着这七部军车。市民们的脸上没有表情，没有人散去，没有人说话。

天 安门东西两边的长安街全部戒严，没有人可以接近或通过。我们骑车来到南池子，向南往长安街去，骑了没多远就看到市民与戒严军人对峙的场面。我们下了车，挤 进人群，听着住在这一地区的市民们叙述着昨晚的事：昨晚不到十一点，天安门广场东面的博物馆和公安部门前，突然出现了全副武装的军人，向着人群开了枪。在 一阵冲锋枪的射击后，许多人倒下，但人们马上又手挽手地组成了新的人墙。当第二阵枪声再响起来时，已不仅仅是广场的东面了，军人们从广场的北面和西面形成 了三面包围的阵势，向人群开着枪冲过来。

对 于军人们突然出现在广场上的这一事实，我是相信的。阿学昨天在电话里告诉我，军人已通过地道进入天安门广场地下。在第二阵枪声响过后，学生们立即发觉军人 们的杀机，立即阻止军人开枪并提出谈判，军人拒绝，只是限令在很短的时间内，让人们离开广场。此时广场上大约有三十万人，军人已经四面包围广场，只在前门 的东西两边留两条极小的通路让人们离开。学生们立即组织市民们离去，由于通路太狭小，人群阻塞，学生们又向军人要求开放其它道路以便尽快地离去，又被军人 拒绝。

午 夜十二点钟，广场上所有的灯光全部熄灭，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开始。这支一向被宣布为爱人民的人民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们开枪，愚蠢的中共以为熄 灭了灯光，卫星上就看不到这场惨案。直到天亮之前，这场大屠杀已告成功。直升机开来用大网将死尸和仍在喘息的伤者们兜起来，运往西北方向的大山里去焚化。 同时用坦克撞毁所有的路障，又用火焰喷射器烧毁留在广场上的帐篷、衣物、桌椅及各种用品。坚持留在广场的学生们，不是被开过来的坦克辗死，就是被火焰喷射 器喷火烧死。天亮以后，大批的军人进入了广场，用水冲洗着广场上的血迹和焚烧后留下的废墟。

中 午十一点半左右，我们三个人骑车路过德清公路和三环路路口时，看到有十几部军车在燃烧着，围在那里的市民们告诉我们，是军人自己放火点燃的。我的弟弟和妹 夫开始怀疑这是个用来嫁祸于市民或学生阴谋，并且认为军人将要屠城。我也有这个想法，但还是不太相信在全市会进行大屠杀，尤其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有不同的 看法。

在 一个星期前，当我从电视中看到进京的军人和军车时，我就十分惊讶地发现，中共一直在宣传的这支极强大的军队，竟然在装备上、武器上、运输的车辆上以及士兵 的服装上是那么破旧落后。在几年前我就听到军方对每年拨给他们的军费不满，认为这点军费根本养不活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记得好像是在一九八六年，邓小平削 减兵员一百万，但省出的钱仅够把现役军人的待遇提高了一点点，至于装备上仍然无钱去改变。军人自己放火烧车，可能是要藉此机会去摆脱掉这批旧得不能再用的 汽车，然后向中央要钱买新车。

回 到家时，家里的人正在用白纸做花，然后将拿出去一朵一朵地挂在树上。大街上、院子里所有的树上都已是挂满了白花。天气炎热，人们的情绪更是由于压抑着愤恨 而沉闷着。母亲的泪水没有干过。看到一家人全在，母亲第一次用了十分严肃的态度向全家提出了要求。她的声音不高，但十分清楚地说：「从今天开始，在这个家 里谁也不准再为这个政府工作。你们都有自己的技术和专业，去做你们的专业，绝不再做共产党官。宁肯饿死，也不给他们做事。这是我的要求，同时教育下一代三 个孩子，也永远不给共产党做事。这是我第一次要求你们，希望你们听我的。」我们都默默地点了头。母亲的话是针对我和妹夫的，妹夫在半年多后，辞去公职和厂长的职务，我也在一年后躲到香港。

当 天下午大约两点多钟左右，居民委员会的一位老太太领着一个中年男人来敲门，向我们介绍这个男人是附近一所大学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挨家挨户地请求人们可不 可以让几个学生到家里暂时躲避几天，校方恐怕军人进入大学抓人。这个男人说，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能把学生送出北京。母亲立即同意，又用手指着我和妹夫说会 让他们想办法把学生们送出北京。那个男人握着母亲的手，连声道谢。这个老太太又向那个男人介绍我父亲，没想到这个人听到过我父亲的名字，于是很尊敬地与母 亲握手，并且说：「太感谢了，估计军人是不敢进您家里抓人的，我代表校方向您表示感谢。」一向坚强的母亲突然哽咽了一下，说：「都是好孩子，让他们快点 来。」

我 又走上街，不由自主地又来到医院的大门外。一群人正围着一个蹬三轮车的工人，听着这个满身大汗的工人讲着四十分钟前发生的事。他正蹬着车路过西直门大街 时，突然从一条胡同里飞跑出一个年轻人，当他跑上大街时，马上就消失在人群中，在他后面几十米远，两个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军人也追赶着来到大街上，但 已是失去了目标。

两 个军人正在犹豫并四下观望时，从马路对面的胡同里跑出两个年轻人，两个军人立即开枪，两个年轻人中弹倒地。人们立时围了上来，查看两个中弹的人，发现一个 已死，另一个受伤急需抢救。两个军人过来，坚持要把受伤的人带走。

人们愤怒，包围了军人大声地质问、责骂着。枪声把胡同里的居民们惊动了，都跑出来看发生 了什么。一个中年女人立即大哭起来，原来她是这个受伤的人的母亲，那个已被打死的人是她儿子的同学，两个人都是中学生，刚商量着要去什么地方，急急忙忙地 跑出来，就发生这个惨事。女人像疯了一样扑向军人，大喊着：「你们打死我吧，你们打死我吧，开枪呀，还等什么？」人们拦住她，又把一死一伤的两个中学生抬上了三轮车。军人坚持要带走受伤的中学生，但被人群紧紧地围着。这位三轮车工人马上蹬上车，把他们送到医院来了。

这时有人给这个工人端来了水，还有人递给他一支烟，整个人群静静地，没人说话，人们的脸上没有表情。我离开了人群，一个人往回走。

我 没有思维，也没有了感觉，有的只是憎恨和压抑。我低着头走进我住的大院，慢慢地向东边走着。突然东边大门那边有人大声地喊着：「军人冲进来了，军人冲进来 了！」这时大院里的人很多，立时起了一阵惊慌地骚乱，有人急忙回家，但更多的人们是向东大门跑去。我也立即跑过去，远远地看到一个头戴钢盔、只穿一条短裤 的人尖声大叫地跑着，二十多米远后面，四个持冲锋枪的军人尾随着在追，马上就被急速拥上来的人群围住。

军 人说他们在抓那个军用物资盗窃犯，显然是指那个钢盔。住在这个大院的几千个居民都认识这个所谓的盗窃犯的，此人没名没姓，是个神经病，人大约五十多岁，没 有亲属也没有家庭。几个好心的老太太收留了他，让他住在居委会的那间小办公室里，每天人们都可以看到他在清扫院里的通道。此人和气，无论对谁都笑，哪家有 点粗笨的重活都请他去帮忙，他从不拒绝。每次他都会得到食物、衣物用品或金钱回报。据说，他是个非常有钱的人，最大的爱好是去捡垃圾，把捡到能换钱的东西 给离这里不远的回收公司送去。每天都有收入，可又不知道怎么去花钱。这么多年了，那几个好心的老太太们每人手里都为他存起了一笔钱，而他本人根本不知道 的。

今 天，他在垃圾堆里翻出这个钢盔。他感到有趣，于是戴在头上，被巡逻军人看到，大喊着向他冲了过来。这么多年来，他在这个大院里一直受到关心和帮助，何曾受 到过这种野蛮的对待，吓坏了，尖叫着跑回来，一头钻进居委会的那间小屋里。几个老太太跑出来弄清了是怎么回事后，回到屋里把他拉了出来，当着四个军人的面 对他说：「听话，快把那个东西拿下，咱们不戴它，那上面有血，拿下来，还给他们。」他还听话，从头上拿下了钢盔，扔在地上，嘴里还含糊不清地说着：「有 血，不要，有血，不要。」有人用脚将钢盔踢向了军人，一个军人弯腰捡了起来，一个老太太大声地对军人说：「你们追他干什么呀？他是个神经病，疯子，带着那个东西快走吧。」四个军人在人们的哄笑和嘲骂声中走去，人群尾随着他们出了大门。

我 正要往回走，一位住在我隔壁的女人叫住我，关心地问候我们一家人是否都没事？我点了点头，也问候了她，她也点了点头。我说：「没事就好，这个时候可要小心 呀。」女人靠近我，小声对我说：「你说对了，是要小心。军人把局长都打死了，还在乎我们平民？」没等我问，她就急急忙忙地告诉我。她丈夫的弟弟在外贸部的 高级干部宿舍当夜班警卫。这个宿舍就在西长安街上，距天安门大约三、四公里远。就在昨夜，天安门枪声大响，惊醒了外贸部的这位局长，他打开灯，走到临街的 阳台上，向响枪方向张望着，却没注意长安街两侧已站满戒严的军人，站在他楼下的军人根本没有发出任何的警 告，就连向局长开了两枪，这位局长当场死亡。这个警卫吓坏了，天亮后马上带着太太和小孩来她这里。说完，她问我：「你说我们这瑞安全吗？」我看着她，什么 也没说，只是苦笑。回到家打开电视，既没有消息，也没有新闻，屏幕上出现的只是各处路障、燃烧着的军车、全副武装的军人、成群的人群。报纸停办几天了，电 话线路也中断，打到哪儿都打不通。我楞楞地坐下，大口喘了几口气。

太 太回来了。她叫我到父亲那边去吃晚饭。我拉她坐下，看着她半天才对她说：「我心里憋闷得难受极了。」她点点头说：「我知道，我心里也好像有什么东西堵在那 里似的。你可要想开一些，千万少说话，尤其是这个时候。」我没说话，仍是看着她。突然，我出手一把抱住她，把她扔到床上；没等她反应过来，我又扑了上去， 仅几下就撕开了她的衣服，然后不顾她的惊讶和挣扎，进入她的身体。我不顾一切地疯狂地抽动着，太太渐渐明白了什么，不再反抗。我紧闭着双眼，大声喘息，猛 烈而疯狂地抽动着，汗水布满全身。一阵强烈的爆发后，我趴在她身上。喘息逐渐平息，我也逐渐平静下来，紧紧地抱住太太光滑丰满的身体，头深深地埋进她的双乳之间。不知过了多久，太太轻声对我说：「好一些了？快起来吧，他们在等我们呢，万一他们又打发别人来叫我们，让别人看到这个样子，多难为情。」

我 们正准备起床，就听到天上轰轰的巨响声。院子里也立即人声嘈杂起来。我穿上衣服跑出去，看到空中有一架直升飞机正在缓缓地向我们这里飞来。这架飞机在低空 飞行，发出极大的声响，当飞到我们上空时，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飞机上四个军人的脸，更是清楚地看到飞机上左边开着的门里有一支机关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冲 着下方的我们，连旁边的子弹袋都看得到。当飞机在上空盘旋时，又可以看到另一边的门也是打开的，另两个军人也端着冲锋枪，枪口也是对着下方的人群的。院子 里的人们愤怒地指着飞机大骂着，更有不少用双手拍打自己的前胸，大声喊着：「开枪呀！还等什么？快开枪呀！你以为我怕你们吗？」飞机在我们大院的上空盘旋 不到一分钟，慢慢地飞向北边。

我们来到父母家里，弟弟和妹夫全不在，母亲也不在，只有父亲在陪三个孩子读书。妹妹和弟妹在做饭。见到我们进来，妹妹马上告诉我，楼上的那位教 授的小儿子昨晚在天安门广场上受枪伤，幸亏有人帮助，但由于到处是军人，又到处响枪，直到今天上午九点多钟才被送进医院，失血太多，情形十分危险，教授一家刚得到消息，教授夫人正犯心脏病，母亲上去陪她。我重重地叹了口气。我认识教授的小儿子，今年应该大学毕业。他平时爱玩，尤其爱玩摩托车，他现在骑的车 还是几年前我弟弟卖给他的。弟弟爱玩摩托车着了迷，母亲背着父亲买了车给弟弟，又再三嘱咐千万不可让父亲知道。

父亲的反对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北京车祸太多，平均每天有两个人死于车祸，十五至二十人因车祸而受伤，不少成为终生残废。自从弟弟有了车后，便和教授的小儿子成了朋友。但终于父亲发现，给了弟弟三天时间去把车处理掉。教授的小儿子可高兴了，马上去求他母亲买下了这辆车，因为那车在当时来讲是最好的，而且在市场上极难买到。我问弟妹，我弟弟知不知道教授儿子受伤的事，弟妹告诉我，妹夫和弟弟陪教授去了医院。

我们正说着话，天上又响起了轰轰的声音。我们都跑了出来，是一架军用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着，又引起了人们一阵愤怒的叫骂声。在那天的夜晚和第二天的一个白天中，几乎每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就有一架飞机来到我们的头上，低空飞行。

傍 晚时，母亲、弟弟、妹夫回来了。好消息是教授的小儿子的命保住了；坏消息是教授夫人的心脏病十分严重，医院正在全力抢救受枪伤的人，拒绝收治其它病人，最 后还是我母亲给教授打了一针，又给他们输氧，现在情形稳定。弟弟和妹夫爬上楼顶，将一根电线接在了电视天线上，然后又将电线的另一端接在了收音机上，经过 几分钟的寻找后，收音机里终于传出了美国之音和英国 BBC 华语广播，因为干扰太大，还要不时地调整着。

一 家人静静地围着收音机听着，听着来自海外对中国情形的报导。令我们稍稍感到一点安慰的是，全世界都及时地知道了中共这场暴行，许多国家一点不客气地谴责中 共，共产党的残暴再次地暴露在全世界的面前，国际上舆论和支持是不会让这场民主运动就此被永远镇压下去的。一会儿，晚上八点钟英语新闻开始，一位漂亮的小 姐讲着一口流畅的英语。节目开始仅几分钟，这位小姐突然讲出：「昨天晚上在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血腥的大屠杀……」电视屏幕立刻中断了，精通英语 的父母马上把这句话翻译给我听；妹夫用手在腿上拍了一下，要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大约几个星期后，我从一位在电视台新闻部工作的朋友

那里得知，那主播说出 那段话后后，立即被几个军人拉出播音室，在电视台大楼的后面就地枪杀。

这 一天显得那么长。其实什么也没有做，但每个人都好像是经历了长途跋涉一样地疲劳。大约在十点钟左右，大院里各家的灯都熄灭了，大院里静得有些让人害怕，但 是这种寂静，也每隔一小时就被一架低空飞行的直升飞机的隆隆声打破。天气炎热，我的脑子麻木，睁着眼睛毫无睡意地躺在床上，躺在我身边的太太似乎也睡不着，她坐了起来，对我说：「你睡不着就起来看会儿书，或者写点东西？」我摇摇头说：「脑子里空空，胸口闷闷的，好像喘不过气来似的，集中不了 精力的。」太太用手抚摸着我，低声说：「如果你想的话，再对我发泄一次。」我没说话，也没动。太太继续抚摸着我，接着说：「这样对你会好一些，而且我也需要的。」这一次，我是在发泄。所幸是不仅我，太太也在发泄。事后，我坐起来，伸手拿了一支烟。

我 似乎冷静了一些。母亲讲对了，事情果然发生，与我的所学和做人的准则背道而驰了。善与恶、美与丑、自然与恶魔，那么鲜明地冲突着。我怎么办？阿学的忠告， 朋友们的期待，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都要求我能很好地应付这一切。我想调理自己的心理。同事们、朋友们有没有死伤的？明天、后天形势又会有什么变化？大搜 捕会马上开始，魏京生早就说过邓小平会是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个最大的独裁者。几天以后，我会面对一个十分复杂的局面。

点 烟时，由打火机的亮光，我看到太太丰满的裸体，我拉开窗帘，借外面照进来的灯光，细细地看着这具由大自然赋予的美丽躯体。但同时那个男孩子的尸体、那个胸 前被炸个洞的尸体、那个被炸掉半边脸的尸体也出现在眼前；凝结了的血、炸碎了的骨头、流淌出来的脑浆，这一切都是活生生的现实。这美好裸体也是活生生的现 实，而这两幅情景是那么不兼容。太太被我看得不好意思，用枕头去遮盖身体。我把枕头拿开。她看着我，小声说：「你是不是又想吊着我？」我熄灭烟。

太 太被吊在窗帘的横柱上。这是自从那次从阿成家回来后，第四次吊起我自己的太太。我仔细地看着她身体的每一个部份。每块肌肉都扭曲着，刚才还是那么完美和自 然的女性的躯体，现在却在绳子和铁链的强制下已完全改变。太太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地就这样被吊在那里。这是反人性的反自然、反人性，野蛮、残酷，强制否定 人性，改变自然。

我终于更深一步认识，美就是美，尽管被扭曲，但仍顽强地表现着；同样地，人性也是扼杀不了的。我低下头，苦苦地思索着今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形和我应采

取的对付办法。夜深了，一阵凉风吹进窗子。我站了起来，放下了太太，解开了她的束缚，然后亲吻着她身体的每一个部份，由衷地感谢她对我的帮助。太太似乎很激动，不停地抚摸着我，低声地说着什么。我们互相拥抱着，终于睡着。

第 二天，居民大院的情形从清晨就变得紧张，军队已控制了整个城市。走出大院，可以看到街上已经站满了戒严的军人。消息又迅速传来说军人很快会进入各大学去抓 学生，于是各家各户都在做接学生到家的准备工作。太太问我是否愿意接几个学生来家，我点了点头，就出去了。刚走到外面，就遇上了一位邻居，他与我的年龄差 不多，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是知道他在一个部里是作技术工作的，本人是个工程师，人很好，每次我们见面都互相握手问候。当然这次见面也不例外，而且 更是关切地互相询问了对方的家人都是否安然。

然 后，他小声地问我：「你看这个局势还会不会继续恶化下去？」我没法回答，更是无意去分析形势，看着他那紧张而慌乱的眼神，我努力地做出个微笑，对他说： 「多加小心吧，谁也不能预料今天或今晚又发生什么的。他马上又说：中央已经几次向学生们保证绝不秋后算账，可是才几天呀，又是屠杀，又是戒严，又要派军人 进入大学抓人，怎么可以这么做？」

我 问他怎么知道军人要进大学抓人。他告诉我这个消息来自高层，各大学的校方已行动起来去阻止。他尤其提到北京医科大学的校长、著名的加拿大医学教授马海德老 先生，让儿女抬一张沙发摆在学校大门正中，老教授坐在沙发上对大家说，军人想进大学抓人，就先派坦克从他身上压过去，否则就不要想进大学。各大学的教授们 也采取不同的办法，家在北京的学生们已由校方派人护送回家。大多数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学校正想办法把这些外地学生分散到民家去。他正要去临近语言学院接两 个学生。

我 刚进屋，太太告诉我，阿聪刚打来电话说阿朋失踪了，他们几个人正在分头寻找。我有点慌，也感到不祥。正在这时父亲来了，低声告诉我，他已接来了四个学生， 问题是家里的食物不足，要我想办法。商店是开门的，但货柜上是空的，买不到东西的只好到北面的一些小镇上的农民贸易市场上去，可以买到一些我们需要的。我 们正说着，妹夫、弟弟也来了，妹夫不放心他的家，坚持要进城回家看看，并说去年秋天他买了一百斤新大米存在家里，可以用自行车运来，解决粮食问题。弟弟则 提到父母家来了学生，太挤，他准备下午带太太儿子回家，反正他们家在城外，应该问题不大，并建议我和他现在就去北边的农民贸易市场，我则提议让妹妹一家下午搬到我这里住。一切商定，我和弟弟在自行车后架捆上一只大篮子，向北边去。

公 路上很静，这条平时那么繁忙的公路，今天除了几个骑自行车的人以外，就是路障和多处被烧毁的军车，再也看不到飞驰的小型汽车，整个景象好像是在战争中。公 路两边的田野、村庄又是那么静，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我们继续向北骑，同时有点担心农贸市场上可能根本没有人，我们又在商量着如果是这样的话，又该去 哪里。正说着，远远的田野上出现了一大片军用帐篷，不知道是属于哪个番号的部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在这一大片帐篷的后面，就是一支长期驻守在这里的军 营，里面的地方极大且楼房林立，大门却紧紧地关闭着，里面静得见不到一个人走动。弟弟说：「中央搞了这次

的 大屠杀的同时，也在军队内部制造矛盾，你信不信，军队内部也马上会有人事大变动的。」我点了点头说：「反正是狗咬狗，让它们去打吧。这些军长、将军们没有 一个是有真才实学的。在昨天的那种情形下，只要有一个军长站出来公开反对中央，他是不会孤立的。百姓支持不说，驻京和来京的这至少六十多万军人中，也会有 人支持的，而且大多数军人会保持沉默和中立态度的。真正要作对的，除了开枪杀人的二十七军，还有谁？二十七军投降，天下太平。如果打起来，也不过两三天就 可以结束，那么中国马上就进入一个新局面。」我说完，弟弟马上问：「什么样的新局面？你认为那样会出现一个民主政府？还是一个军政府？」我不说话。弟弟是 搞自然科学的，反倒比我看问题看得更透彻，我感到惭愧。

来 到了农贸市场，幸运的是大约有十多个农民在摆摊，顾客不过几个人。正好，我和弟弟都不是对采购有兴趣的人。我们分了工，分头去采购。我来到了一个卖肉的摊 子前，那个卖肉的农民战战兢兢地告诉我，昨天上午他们村的一个农民，用自行车带着两大筐鸡蛋进城去卖，在离这个市场南边不远的公路上，被一粒不知从什么地 方飞来的子弹打在头上，当场死亡。今天大部份农民们都不敢出门。他说我幸运，因为他胆子大，敢来摆摊。在他旁边另一位也在卖肉的约四、五十岁的农民小声问 我军人是不是还在杀人？我没有回答，军人的职责是保卫国家，抵御外敌，不是政治斗争工具，更不应该充当某个人看家护院的家丁打手。

这 个农民看着我，走到我面前又是小声地说：「其实当兵的也懂这些，昨天快到中午时，有二十二个只穿着背心裤衩的人走进了我们的村子问路，他们都是昨天清晨才 来到的，四、五十部军车停在离我们村子不远的公路上。人们围了上去，告诉车上的军人们，城里正在杀人，是军人在用冲锋枪杀学生和市民。这二十二个人就是从 这支部队跑出来的，其中听说还有一个是小军官。」一个大约三十岁也来买菜的男人也插话：「六月三日那天在石景山地区，人们也看到不少于一百名军人放下武器，脱下军装走掉了，人们马上给他们衣服，又凑了些钱给他们做路费。」

我 们兄弟俩的收获不小，两个大菜篮子都满满的。弟弟告诉我，他听到一个卖菜农民讲，就在离这个市场北面两三公里远，也有十三辆军车是在昨天半夜被烧毁，几百 个人亲眼看到，是军人自己点火烧的车。半天，我才问弟弟：「军人烧车是表示抗议中央？还是借机向中央要钱？或者就是要嫁祸于人？」弟弟马上说：「我倒宁愿 是嫁祸，你以为杀了人就完了？总要有个借口。不但杀人有理，以后抓人也有理了。」母亲看到我们回来，大大放心了。又看到我们的采购十分成功，于是马上把我 们向躲避在家里的四个大学生做了介绍，指着一个脖子上缠着纱布、瘦瘦高高的学生对我们说：「他真是幸运，子弹偏过两公分，他就没命了，幸好只是擦破了皮肤。」

和 他们握手后，又都坐下，听这个受伤学生讲起四号凌晨的经过。那时已是凌晨两三点钟，天安门广场上已到处是火光，枪声密集，人们都在拼命逃生。他是从广场沿 西长安街向西单方向飞跑。在距离中南海不远处，见到了两个军队正在追一个男孩子，一个军人停了下来，端枪向男孩瞄准。只见一个女人从路口上的便道上喊叫 着，向军人飞跑过去，并跪在了军人的面前，并急速地在说着什么。一定是在求那个军人不要向男孩开枪。

军 人放下枪，慢慢地转过身，向天安门方向走去。女人站起来，又向那个男孩跑去，就在她已是很接近男孩时，两个军人突然转身开枪，女人和男孩中枪倒地。相距大 约五、六米远，一位在便道上的大约五十多岁的男人向两个军人大声地喊道：「你们两个畜生，竟然向女人和孩子开枪了，我不想活了，向我开枪吧。」他边说边向 两个军人走去，军人的两支枪转向了他。这个学生和另一个同学大声喊着：「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并向这个男人跑过去，拉着他躲进了高墙和树的阴影里。枪还 是响了，子弹飞过来，打在他们背后的墙上。三个人无恙，只有他被子弹擦伤了脖子，直到两个军人转身走开，他们才继续逃离。另外一个也是瘦瘦的、中等身材的 学生告诉我们，在六月三日午夜十二点时， 突然广场上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从大会堂里冲出了许多军人，并迅速地站成一字形，向广场上的人群走去。枪口冒出了火光，人们成群倒下，场面马上大乱起来。人 们喊叫狂跑着，军人违反了与学生代表在半个多小时前达成的口头协议，那就是要军人给时间和更多的通道，让学生们尽快地把广场上的二三十万人疏散开去。

看 来，这一切全是有预谋、有计划的，不给时间，又不开放大路让人们疏散，迫不及待地开始这场大屠杀。他恨恨地又讲到坦克车如何撞倒自由女神像，又轧伤人，人 们愤怒了，并放火烧了坦克。后面的坦克无路可走，于是加大油门，向人群冲过去，至于是否有人死伤，他无法看到。但很快这辆坦克被路障截住，人们围了上去放 火烧毁，后面几十辆坦克不顾人群的阻挡，仍是慢慢地向广场中心推进，人们仍在用身体去阻挡，但很快从坦克喷出几十道熊熊的火蛇，纪念碑北面的几百个帐篷迅 速地燃烧起来，许多坚持斗争的学生们仍在帐篷里。他想赶去救人，正看到两个同学抬着一个胸部和大腿连中两枪的女学生逃离广场，

一辆坦克几乎已是撞上了他 们，他马上跑过去帮助。大约在两点半左右，才撤到了西交民巷上，由围在那里的人们把他们接了出去。

说 到这里，他眼睛里现出泪水，但马上低下头用袖子抹一下眼睛说：「我恐怕那个女学生活不了了，几乎两个小时，血一直不停地流……，到现在为止，我始终不认为 我们做错任何事，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一直没有说话的父亲这时候声音颤抖地说：「即便做错事，也不可以这样，你们是孩子，不是敌人。」

快 晚饭时，妹夫才扛着那一百斤大米推门进来，母亲和妹妹松了一口气。妹夫洗了脸坐下后，讲到一具被枪打死、躺在建国门立交桥下的尸体，一辆自行车在离尸体不 远的地方倒在地上，桥上站着由八个军人组成的四个岗哨，桥上桥下则围着几百个市民，看起来是向军人们在做无声抗议。直到下午妹夫回来时，又路过这里，那具 尸体仍在，人们也仍在抗议着。他问一位就住在大桥附近的居民打听，这个居民告诉妹夫说，他在清晨七点多钟左右听到了几声枪响，但没敢出来，直到快九点钟 时，他才出来看到不少人围在这里，于是才发现那具尸体。一整天了，也没人来认领，火葬场来车抬尸体，军人不让抬，又警告说要开枪，想用这具尸体吓唬人！这 个居民滔滔说着。

令 妹夫比较激动的是，他已听到城里的居民开始向军人报复的事了。就在昨天半夜，离妹夫家不远的一条胡同里突然有人跑出来，向站在街上的两个军人扔了两块石 头，然后转身跑进胡同。两个军人立即追进胡同，那个扔石头的人已消失的无影无踪，可是直到天亮，这两个军人也没能回到街上的那个岗上去，他们也消失了。妹 夫的一个朋友也告诉他，今天早上天还没亮，一辆小汽车开上了西直门立交桥，在接近岗哨时从车窗里突然射出了一串子弹，两个哨兵当场倒下，汽车开跑了。妹夫 吸了一口烟说：「当然了，无论哪一家人有人被军人打死了，都不会罢休的。这就是仇恨，有仇是要报的。」大家都没说话，我打破沉默说：「今天好像直升飞机没飞来巡逻。」母亲马上说：「上午还来过几次呢，但只从这里飞过去，在那边大学上空飞了几圈。」

说 到这里，母亲又担心地问父亲：「如果他们发现大学里没有人，会不会在居民区里挨家挨户搜查？」父亲说：「也可能，也不可能。但我们的家我想还不是几个军人 就可以随便进来的。」妹夫说明天他去工厂看看，把学生转到工厂躲几天，他们不搜工厂的。他又对我说，过几天要我联系一下过去在运输公司的朋友，把学生带出 北京，只要离开北京一百公里就安全了。我点了点头，说我明后天就去办这件事。就在我们要吃晚饭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位与母亲每天一起锻炼身体的好友，告诉母亲说他们另一位好友刚在医院找到她那二十七岁的儿子尸体，她来约母亲一起去安慰那个人。母亲马上慌乱 起来，急匆匆地要走。

我把母亲拉到一边说：「您是去安慰别人的，自己先不要激动，同时千万转告他们，不要太悲伤，更不要让外人知道这件事，我相信一场大搜 捕会马上开始的，又将是个什么情形，不好估计，告诉他们不要去派出所销户口，过两年再报告也没关系的。」母亲答应匆匆和来人走了。

六月七日上午， 电视出现袁木和那位张工少将演出的对口相声，面对一群低头不语的记者，面对着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两个混蛋开始表演。袁木说到目前为止，只接到二十三人死亡 的报告，军队没有开枪，死亡原因是由于拥挤和其它意外造成的。张工更是否认了二十七军执行屠杀的传言，又否认了二十七军和三十八军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并 且以反问的形式说：「人民的军人，怎么会向人民开枪？这纯粹是谣言。谁在造谣，我不知道。」

六月十二日上 班后，副所长阿宗告诉我，住在他的那座楼里的一家人，因为儿子在天安门广场上被打死了，听到这两个混蛋的否认后，这一家人包括父亲、母亲、姐姐和一个弟 弟，立时愤怒地冲到楼外，站在街上大声喊：「造谣！胡说！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血债要用血来还！」就在附近的四个军人立即冲了过来并开了枪，这一家四口 人全部中枪倒地。这个家庭还有一位老祖母，刚走到楼门口，就听到枪声，亲眼看到了儿子、儿媳、孙子孙女被打死，老人立时昏倒在地。

第二天六月八日清 早，同样发生在他住的那座楼里，有人在四楼外墙上贴出大字写的「报仇、雪恨」标语，引来军人一阵冲锋枪扫射，子弹将八户人家的玻璃打穿十几个洞，幸而无人 受伤。紧接两个混蛋的表演后，中共在电视上发布对二十二个人的通缉令，又播出邓小平和将军们握手庆贺的镜头；把一切责任推倒赵紫阳身上，免了他的职务，李 鹏似乎立大功，但却没能代替赵紫阳的位置，他的嘴脸彻底地暴露于世。

一 位原在《人民日报》做记者的朋友告诉我，邓小平在大屠杀之前和之后都反复地讲过这样的话：「借二十万人头，保二十年江山。」中共另一个元老陈云也说：「不 能在我死后不久就让人挖我的坟。今后选拔干部，必须从我们的子弟中挑选，还是我们的子弟可靠些。」紧接着，官方的舆论出现，事实被改变了，变成了由于北京 发生反革命暴乱，于是军队来维护秩序，而暴乱的证据就是从六四天亮后，人民愤怒地指责军人及围堵军车坦克的镜头，及大批军车和坦克被焚毁的镜头，但却拍不 到任何一个学生或市民去点燃军车的镜头。又把绝食斗争已经停止后吾尔开希与朋友在饭馆吃饭的镜头连续播放，说成是学生们在绝食而吾尔开希却在大吃大喝。当 然，中共喉舌并没有提到，这是不是就是个理由而需要调兵进京。

接 下来，宣传变得可怕。几具被烧焦的不知什么人的尸体，被用绳子栓在脖子上吊在树上，头上扣上一顶钢盔，说成是在平息暴乱中被反革命暴徒打死或烧死的军人。 人们第一次知道「共和国英雄」这个新名词，几对英雄的父母被请到北京，受到中共高层的接待，一时荣耀得不得了。但很快消息就传出来，一对在北京荣耀够了的 父母回到山东老家，半夜被敲门声惊醒，开门后看到的是只穿着裤衩，筋疲力尽的儿子，才知道儿子在六月三号下午脱了军服，徒步走回来。这对父母在北京哭了几 天的那具尸体原来不是儿子的，究竟是英雄的还是暴徒的不得而知。这对父母正在庆幸之时，儿子却被抓走并被秘密处决。他的父母仍享有共和国英雄的父母的荣 誉。共产党的事就是这样的，尽管他们没干过对的事，可对于他们干错的事，无论如何要坚持错到底。

究竟在这场所谓的平息暴乱中，共和国出现英雄没有，我不知道，也不敢说。但共和国级的替罪羊倒是不少。据一份调查显示，六四大屠杀发生后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市政工人们从全市各处的下水道里共找出一百五十三具军人尸体。另一个更是骇人听闻的消息是，六月四日天亮时，天安门广场上执行屠杀的两千多名士兵被送到西北山里，一场庆功宴后，这两千多官兵全部中毒身亡。

杀人灭口，是共产党惯用的手法之一。对于这个说法，我是相信的。一位在军队做中校军官的中学同学后来告诉我，六月三日晚， 全部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军人都被打了「预防针」，理由是北京出现传染病，要打针预防。我听到不少于二十个从天安门广场上跑出来的人讲过，他们都有的一个共同 感觉是，那群军人的面部表情奇特，兴奋异常，且时时忍不住狂笑，面带笑容地开枪杀人，在混乱血火中，也不时乘机去摸女人的屁股和乳房。

我 记得在陕西工作时遇到过一位抗日战争的老英雄，很自豪地说他曾亲手消灭了三十一个日本人，至今提到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时，他还是气得咬牙切齿地：「根本 就不应该同意日本人投降，应把他们杀光才对。」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位英雄，在一次处决一名日本军槽时手也软了，几乎丢了脸。当时有一对日本兵驻在一个小镇 上，经常出来骚扰四乡百姓，其中这个军槽尤为可恨，杀人、抢东西不算，还把周围几个村子里的女人们几乎都强奸遍了。在一次战斗中，这队日本人被消灭，这个 军槽应乡亲们的要求决定处死他，一致要求由这位英雄去行刑。没想到在刑场上他看到被捆绑在大树上的军槽和一条受了伤的大腿，英雄手软，举枪的手颤抖了。他把枪放下，看着周围的乡亲，一个乡亲给他端来一碗酒，他一口喝干后，才举起枪处决了那个日本人，但老英雄始终不把处决军槽列入那三十一个日本人的名单上。

向赤手空拳的人群开枪，不是神经正常的人可以做得出来的事的。阿朋死了。是谁向阿朋射出那几粒子弹？他做错了什么？他争取民主和改革腐败制度，反对贪污，打死阿朋不感到有罪？共产党杀人还少？天晓得哪一天轮到你。

第十五章　向首都人民敬礼

六月十二日，　司机一早不到八点来接我上班。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早？他没有回答我，片刻后才说：「我想，你今天会很忙。」一个星期了，政府通知今天上班上学。我实在不想去 上班，还有几份东西在家没写完呢。车子停在一个十字路口上等绿灯，只见一个小军官手持高音喇叭，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向首都人民敬礼！」于是，十几个站在 十字路口上的军人们像木偶一样对着上班的人流举手敬礼，但看起来「首都人民」们并不买这个帐，人们调转头，连看也不看他们。

走 进办公室，桌上干干净净的，既没有档案也没有表格。我坐下，又站起来，走到窗前，站了一会儿，在屋里踱了两圈。我点了支烟，又坐下。秘书进来了，送来开 水。我给自己沏了杯茶，回头看到秘书仍站在那里，我问她还有事没有。她马上说：「没事，我只是想问一下，你有什么事要我去做吗？」我走回到办公桌的后面坐 下，示意她也坐下，然后慢慢地说出了我最怕说、可又不得不说的事：「请立即通知各部门的负责人，立即查清本部门有无死伤失踪人员及设备、机器、物品有无损 失、损坏，开列清单。」说到这里我停了一下，要她通知各部门负责人十点钟在会议室开会。我打算现在去见阿宗，和他商量开会的内容。秘书走了出去，但马上又 推开了门，探进半个身子告诉我：「阿宗副所长来了。」

看得出来，阿宗的精神并不好，也没刮脸，似乎显得老了许多。坐下后，他说：「现在清查职工的损失是头等重要的事，先开个会安抚人们的情绪，先不要强迫大家马上工作，需要一段时间的，待到人们的情绪平定一些后，一切都会进入正轨，你看怎么样？」

我 当然同意，并告诉他我已让秘书通知开会了。他点一下头，问我开会时准备说些什么。我对他说正要找他商量这个问题，他马上说：「你最好马上去找那位

老副书 记，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咱们不知道那个老家伙怎么想。另外，我想这个会也可以算是个紧急会议，不妨让党委各部门负责人也参加，至于会上如何说，我现在考虑 一下，开会前十分钟，我给你个提纲。」我立即赞成，于是我们一起走出了办公室。他去准备会议内容，我上楼去找老副书记。我敲了门，开门的是党委办公室主任 阿同。他见到是我，马上用身子关上门，拉我到一边对我说：「老副书记的儿子失踪一个星期，生死不明。他心情坏透了，又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只说他老伴的心脏病犯了。我告诉你，你知道就行了，千万别说露。」

阿同打开了门，我们一起走进办公室，老副书记半身躺在沙发上，看到我想站起来，我马上拦住了他，并在他身边坐下，对他说：「阿同刚告诉我，尊夫人心脏病又犯了，应该在家照顾一下才好。」老副书记与我寒暄着。我明知是假的，也没有必要再过去表示关心，马上把话题转到我来的目的上来。他没有长篇大套的说教，没有反对，也没有不同的意见。我请他在会议上讲话，也被拒绝了。他不想讲话。目的达到，我告辞出来，吩咐阿同通知党委各部门，阿同答应。

我 回到办公室，秘书正等着我，把一份刚收到的电话记录给我，是北京市政府打来的，要求北京市的各单位尽量想办法腾出一些空房，安排进京部队的军人们居住，并 且要拨出专款慰问戒严部队。看着这个通知，我就一肚子火，看到秘书还站在那里，我问她还有什么事，她摇了摇头，问我：「要不要我去通知后勤、福利、财务三 位处长来商量此事？」我没回答她，只是让她把这份通知给阿同送去。我来到阿宗的办公室，告诉他老副书记儿子失踪的事。阿宗说：「按道理讲，我不该说这样的 话，但实际上我又应该说，这是好事，至少，他的嘴是堵上了，不会去教训别人了。」我又告诉他刚接到的那个电话通知的内容，阿宗一点不客气地说：「把你和我的办公室让给他们住，你我回家，等他们走了，我们再回来上班，这是我的主意，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笑了一下，没再继续说下去，商量了一下会议内容后，我们一起去了会议室。会议在半小时后结束。车队的队长和书记阿强追上我，要求向我做单独报告，我带他们来到我的办公室。队长告诉我，车队的那个卡车司机大个李在六月三日晚被 一粒子弹击中右边的太阳穴，当场死亡。我啊一声，愣住了。凡是经常外出考察工作的人都认识大个李的，一位三十岁左右瘦瘦高高的好人，脸上总是带着忠厚的微 笑，做事认真，又肯帮人，无论是谁到外地工作，都希望车队派他把设备器材运走，工作结束了，又要求车队派他再把东西拉回来。我问他们，知不知道这到底是怎 么发生的。

队 长马上说：「其实，这件事应该怪我，六月二号一早，我派他去河南省把一批设备拉回来，根据你的通知，在那里工作的人员早已回来了，只是留下了一大

堆的设 备，已经运回两车了，只剩下最后的一点东西了。我也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去，还特别给他派了个助手，嘱咐他们快去快回，我还一再告诉他们，如果回来时北京戒严 了，进不来的话就找个地方住下，通知我，我会想办法的。没想到三号晚上九点钟，他们回来了，设备也拉回来了。大个李回家吃饭，他太太告诉他，他们的儿子还 在奶奶家，奶奶住在天安门东边的北池子大街上，看这情形怕要出事，问大个李是不是去把儿子接回来。大个李一听就急了，饭也没吃，就骑车去接儿子。他带着儿 子离开母亲家，刚骑车拐上大街时，枪声已经响起来，他拼命骑车想要赶快离开，结果一粒子弹飞起来，事情发生了。」

队 长说到这里，沉默了一下，又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无论如何，大个李绝不是个反革命暴乱份子的。」我马上大声说：「当然不是。」停顿一下，我又问有 其它人受伤没有。阿强摇了一下头，告诉我只有两部卡车出了点事，一部卡车被子弹打穿了将近十个洞，现在正在检查中，而另一部卡车是去年底由上级调拨来的军 队的退役车，由于忙，一直没有重新喷漆，仍是军车的颜色。六月三日晚，这部卡车送了一些人去天安门广场，可是当到了东长安街和王府井大街的十字路口以东就再也无法前进了，只好把车停在了那里。半夜开枪以后，人们惊慌地四处奔跑，没人顾得上这部车了。几天后，他 们去找这部车，结果发现这部车已被当军车烧了。阿强说完后，我请他们马上去大个李的家，向他的亲属慰问。关于这件事先不要写报告，过几天，等我把全所的情 况全部弄清后，我会召开一个特别会议与各部门的负责人共同商议如何办理。同时要求他俩在今后的几天内，按照我刚才在会上提出的要求，把车队所有职工和车辆 设备再做详细了解，还有没有其它的伤亡和损失。

他们两个人刚走，党委宣传部部长进来了。告诉我，一位二十八岁的宣传干事可能死于六月四日， 有人见到他中枪倒地，但没能把他救出来，究竟是死是伤现在还不清楚。我冒火了，对着这位平日养尊处优、从不干事的宣传部长大声说：「那你就去把事情弄清 楚，难道你要我去问清楚来向你报告？」他愣在那里看着我，似乎想说什么，但我没容他开口就向他挥了一下手，他转身出去了。接下来，几个行政部门、研究室、 实验厂负责人一个个地来报告，有死的，有伤的，也有失踪的。整整一天，搞得我心情沉重，尤其是我的三个好朋友，阿朋已死，两个出走，生死不明。我真不明 白，我什么还要坐在这里演戏？若不是朋友们的嘱托，我真巴不得离开这块浸透着人民鲜血的土地。我让秘书通知司机，我今天受够了，要早点离开这间办公室。

就 在要离开时，阿朋研究室的党总支书记、一个五十多岁又黑又胖的老党棍推门进来了。坐下后，向我不慌不忙地提到了阿朋的死，并且说：「党培养他上大学，又把 他提到如此重要的职位上来，但可惜的是，他的思想没能跟上形势，我也有责任的，一个很聪明，又很能干的人，竟会参与了反革命的暴乱，结果弄出这么个下场 来，辜负了党的多年的培养，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听着他的

话，我几次忍不住要爆发出来，他明知我和阿朋是朋友，在我悼念朋友惨遭杀害时，他竟然在我面前 责备阿朋。他的几句责备阿朋的话，正是共产党的「原则」，言外之意他是说阿朋的死罪有应得，同时要警告我。

我 实在忍不住，十分严厉地对他说：「我没有要求你去对任何一个伤亡者下结论，而是要求你去把事情搞清楚。几天来，中央电视台一再强调，军人没有开枪，而且通 缉的名单上也没有阿朋的名字，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难道你是在告诉我，死了的和受了伤的都是反革命和暴乱份子？而活着的都是革命群众？别忘了，连我都没有 权力去对任何人做结论的，更何况你了。」他很不自然地看着我，支吾地说：「我只是对你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我并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这并不违反组织原则 呀。」我一点不客气地对他说：「你以为在这场事件发生后，我会有时间来听你的个人看法吗，如果你想帮助我工作的话，就去把事情搞清楚，做些实际工作，如果只是找我谈你个人的看法的话，实在对不起，今后几周内恐怕我没有时间，我太忙，失陪。」

第 二天午饭的时间，党委办公室主任阿同端着饭碗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们吃着饭，他提到了市政府的那个电话通知的事，他低声说：「我明白，你是不想让军人住进 来，也不打算去慰劳军人，加上这一大堆头疼的事，所以你让秘书把这份通知给我送来了，意思是让党委去决定。若在平时，老副书记会马上把它当成头等大事来办 的，可现在你知道，他的心情不好，他只留下了一份复印件，什么也没说。这一下可把我给夹在当中了。你说我可怎么办呢？所以我还得找你，别忘了，你是党委代 理书记，这件事办还是不办，还得你拿主意的。」说到这里，他停住了，两眼看着我。我问他：「你有没有主意？我是考虑我们没有空房间的，而且我认为中央既然 调了这么多的兵来北京，当然事先已经准备好了食宿的，所以我们可以不必担心这些事的。」

阿 同笑了一下，问我：「那为什么市政府又发这个通知呢？」我说：「这也不过是市政府略尽地主之谊，客套一下而已。」阿同出声笑了起来，对我说：「我真没想到 你是这么难对付。相信我，我是在帮助你，你可以想想，到现在为止，所里已经有了超过二十个人死伤，这个数字可是不小的，按中央的话说，这里可以算是个『重 灾区』了，这几天的电视你也看到了吧，全是慰军的，有的单位甚至整车地给军队送美国香烟，你想想为什么，如果一个单位在这两件事上表现得好一些的话，这个 单位的职工们就多少安全些，可如果一个单位被列为『重灾区』的话，全体职工是不是要倒霉的……」

我马上明白了，他是对的，这些都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放下了碗，对他说：「你是对的，你也一定有个打算了，告诉我，我们马上开始。」说到这里，我走到门

口，对正在吃饭的秘书说：「请阿宗副所长来，有急事商量。」午饭时间结束后，事情也基本上决定了。

首 先，可以让军人住进来，我们把一楼的大会议室、二楼的小会议室和接待室腾出来，估计可以住下两三百个军人的，至于劳军的费用应从哪一个项目中开支，由我去 向上级请示。阿同具体负责对军人的事，力争本周内安排好一切，下周让军人住进来。经过了几天的调查、了解，终于确定了全所共有七个人死于六月三日和四日的大屠杀中，另有九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枪伤，十人下落不明，包括阿学和阿聪。我立即召开了党政各部门负责人的特别会议，宣布这三个数字。

然 后，我以肯定的态度说：「到目前为止，经过大家的努力工作，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职工参与反革命暴乱活动。这二十六个死、伤和失 踪的人实际上是暴乱的受害者。」接下来，我提到对于死亡者，应按国家的因公死亡的条例对待，使他们的亲属享有一切规定的待遇和福利。对于受伤的九人，也应 按照因公受伤的一切条款对待，经常去探望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祝他们早日痊愈，早日上班。对于失踪的人，各部门要抽出一两个人继续寻找，生要见 人，死要见尸，在他们下落未明之前，仍然作为他们正常上班对待，工资福利照发。接着，我又提到经济损失，除去两部卡车的损失外，所里无任何其它损失，被烧 的卡车是暴乱份子所为，至于那辆被打出十个枪洞的卡车，马上修补、重新喷漆，在修理记录中可以提到是由于交通意外所致。

最后我说：「由于中央三令五申一再的强调，军队并没有开枪，那么各部门负责人在本部门伤亡、失踪、损失的报告中，就不要提到枪伤及与枪有关的字或词，希望下周一能看到这些报告。」

下 午，来到我的上级、这位副主任委员的办公室。他看起来苍老了许多，精神也不是很好，不时地看着窗外，端着茶杯的手也有些抖。听完我的汇报后，他看着我，声 音不大地对我说：「我还能说什么呢？一场大屠杀后，你所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不可能再多了。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凭着良心去做你认为应该做的事就可以了。 同时，在这个特别时期，我希望你能经常来我这里，告诉我所里的一切事，我考虑事情并不是就此结束，一场全民性的大清查、大搜捕免不掉的，你我都还有许多事 要做的。」

我 认真地听着，告诉他两三百军人马上就要住进来，市政府又一再逼着去劳军，请示他这笔钱应怎么支出才好。他看着我，声音缓和了，对我说：「你始终是个知识分 子，这种事你应该和你的财务处长商量去，怎么也来问我呢？我也没有这项开支的。」我马上说：「这笔开支可不是个小数目，若是几千或一万的话，

财务处是有办 法的，可是现在物价上涨，不知军人会待多久，日积月累，开支不知道会弄到多大。研究经费已严格地控制，没有结余去劳军的，另外就只有那笔扶贫款了，大约有 一千万块钱在账上，但下半年肯定还会有不少合同定出去的，估计也没有结余……」

他 打断说：「那就少定几份合同，用这笔钱去劳军，大胆地去做，不管用出多少，只要你不往自己的口袋里装，又怕什么，年底你交来工作报告，我是不会给你麻烦 的。」我放心了，站起来向他告辞。他握着我的手说：「替我向全所的知识分子和职工问候，有机会我会去看望大家。」他在我的肩上拍了一下说：「做你认为该做 的事，不要怕错，即使错了，我也会帮助你。」

刚 回到所里，我就看到了大门的两边都站上了一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我压着火气走进保卫处，问他们知道不知道军人在楼外站岗的事。处长不在，一个工作人员对我说 这是军人的事，他们不知道。又说住在这里的军人们的长官是一位少校，提出来要拜访我，我马上说：「让他有事找阿同，不必找我。」回到办公室，我立即请来阿 宗、老君、胖处长、阿同。向他们传达了上级的指示，那就是劳军的费用可以从扶贫款中支出。然后把我在回来的路上的一个并不成熟的想法向他们谈了出来，那就 是设立一个小金库。目的有两个，第一，我已对七名死亡的人做出了因公死亡的决定，那就牵扯到一笔抚恤金，为了避免今后困难出现的麻烦，这笔抚恤金的开支最 好不要在财务处的账上出现；第二，今年全所职工的奖金、钱从哪里来？就从劳军的开支中来，加大劳军的开支，从中省出钱来，放入小金库。

我 想可能是由于我的直率的缘故，使得他们可以放心地谈出各自的想法。最后决定，小金库就设在我的办公室，由我负责。阿宗负责小金库的账目，每次动用小金库的 钱，都要由我们五个人共同决定，同时对外严格保密，议题结束。我始终考虑着阿同向我提到的那个重灾区，也基本上有了打算。我请阿宗对各研究室的各个专题研 究小组和人员做详细的了解，平衡研究经费，力争今年的研究项目基本上完成；也请阿同尽量去扩大劳军的范围，不仅是对即将住进来的两、三百军人，对周围借住 在小单位里的军人和岗哨都慰劳，并且造出声势和影响，同时在阿聪被找到前，请阿同暂时代理一下行政办公室主任的工作。胖处长协助阿同劳军，同时尽快申请建 造住宅楼的手续，然后立即开工，并由他负责这个工程。最后请老君督促查账小组尽快工作，并且尽快完成三百多万的全部清查工作。

说 完后，可以看出来他们都明白我的意思，也没有异议。散会后，我叫住阿同，问他为什么军人还没住进来，就先在有人楼外站岗。阿同一愣，对我说：「我已

告诉过 那个少校，这里是学术机构，不要设岗，同时我们负责他们的安全，他答应了，怎么……，我去找他。」当天下班时，我下楼走到大门口，仍看到在大门里边的两侧 各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我立时火冒三丈，正要回楼上去找阿同，只见他和一个军官正从食堂里走出来。我向他打了个手势，阿同走近了我，我指着这两个军人 对他说：「请你告诉他们，既然我们请他们来住，当然对他们的安全负责，请他们把岗哨撤掉！」阿同为难地说：他们这已经是对我们让步了，把岗哨从门外挪到门 里，要他们撤掉恐怕不容易。我说：「你再去试试，告诉他们，在这个非常时期，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十分容易造成老百姓的心理上的紧张和慌乱，请他们考虑。」阿 同点点头，对我说：「那好，我去找他们上司谈谈。」

军 人在我们这里住了将近五个月，与职工的关系始终处于敌对、紧张的状态。职工们是敢怒不敢言，尽量避免看到军人，大多数职工们每天上下班都不进出大楼的正 门，而是走侧门和后门。在我的坚持下，岗哨撤销了，但三百多军人住在这里，吃在这里，争执、摩擦时常发生，阿同忙坏了，调解纠纷，解决矛盾几乎成了他每天 的工作，也多亏了胖处长的帮助，又以不时的改善军人的伙食等无形中缓解了军人的不快。他与阿同的配合是相当成功的，可即便如此，那位少校军官还是敲了几次 我办公室的门，其中有两件事变成我鼓动职工，反对戒严军人的罪证，至今每当我想起这两件事时，仍感到很可笑。

第 一件事，似乎是把那位少校气坏了，站在我的办公室里嚎叫着：「我们是来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的，我们不是来搞暴乱的，骂我们搞暴乱的，就是反革命暴乱 份子，我要求追查。」我让阿同去了解，两个小时不到，阿同就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军人每天六点起床，然后把楼外的院子清扫一遍，而所里的清洁工人们是在 七点上班，当他们上班时，楼外已经清扫干净了，一连几个星期，清洁工人们并没有表示出任何军人们所期待的谢意，反而对军人视而不见，理也不理军人的问候。 那天军人们刚扫完院子，看到清洁工人上班了，他们仍是问候，同以往一样毫无反应。一个军人说：『我们刚帮 你扫完院子……』没等他说完，一位约三十岁的女清洁工指着他大声说：『你们是干什么？谁让你们来扫院子了？这是我的工作，如果我的上司知道了把我开除，我 没有了收入，我吃什么？你们想到没有，你们这么干和搞暴乱有什么区别？』」阿同讲完了这些，笑着摇了一下头说：「这当中隔着一道事实的墙，谁也不敢去推倒 它，军人想干点事讨好百姓，结果反而引起更大的反感，这事不大，我去向军人解释一下就可以了。」

第 二件事就确实是笑话了。所里的食堂安排了三个炊事员在半夜十二点以后给在周围地区站岗的军人们送饭。每次当他们推着饭车走到朝阳门外的立交桥时，都大声喊 着：「解放军同志，千万不要开枪，我们是给你们送饭的。」这条街的两边都是居民住宅楼，又是夏天，家家都开着窗子，加上自从戒严后，每晚八

点以后，街上就 已经没有行人了，连车辆都难得见到。到了午夜，就更是静得怕人，可以想象，三个炊事员的喊叫是可以传出很远的。开始的几天，军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什么，但一 段时间以后，他们可能也听到了六四大屠杀，于是感到不舒服了。一个小军官要求炊事员不要这样的喊叫，而炊事员的回答是：「大半夜的，街上又这么静，难道我们不害怕？我们这是在告诉你们，我们是给你们送饭的，别打错了人。」为了这件事少校来找我，我让胖处长去解决。那时起，每晚都有两个军人护送炊事员送饭。

我 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了，没想到一个多星期后，少校由保卫处长陪着又来敲我的门了。这一次，少校没说话，保卫处长小题大做地向我讲述，原来三个炊事员又干出了 新的恶作剧。照例，每晚他们把白天剩下的饭菜热好，同时做了肉馅的饺子，装在饭盒里，然后去送饭。当军人们吃饭时，他们拿出饭盒吃饺子。一连几天，终于一 个站岗的小军官发问了，这三个炊事员终于等来了这个发问，于是不慌不忙地说：「你们吃的东西，都是我们招待的，你们是不用花钱的，可我们就不同了，无论吃 什么，我们是要去买的，当然就不一样了。」

保 卫处长想把这三个炊事员停职，并向军人道歉。我问他为什么，没等他说话，我当着少校的面对他说：「为了慰劳军人，我曾向上级要求拨款，可上级没有这一项开 支。我们现在是在使用研究经费去招待军人的，每天几千块钱的开支，已经用出很多了，上级又要我们必须完成今年的研究任务，所以所里在资金上是很困难的。关 于炊事员说吃饺子，那根本不是个事，他们有钱，想吃什么都是可以的，尤其是在夜里工作，吃好一些也是应该的，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问题。」少校和保卫处长似 乎还想说什么，但是没说出来。最后，保卫处长说：「可不可以把军人的伙食提高一些，尤其是夜里站岗的军人？」我看着他，对他说：「总不能让我每天给军人们安排菜单吧？你最好去找阿同和胖处长商量去。」

六 月下旬，大搜捕开始。每天半夜，军人们到一些人家去抓人，带到什么地方没人知道。仅我住的那个居民大院里，一个星期之内军人两次半夜光顾，抓走两个人。紧 接着，中共中央又发下了通知，命令所有的单位清查十七种人：第一种人是策划组织暴乱的，第二种人是积极参与暴乱的；依此类推，直到第十六种人是看到别人游 行时，用两根手指做出「V」字；第十七种人是在看到有人在游行时，没有立即走开，而是站在那里看的，这都是反革命份子，必须一个不落地清查出来。北京市政府和公安局及戒严部队指挥部又发下通知，要各单位将清查出来的十七种人的名单报上去。

七 月初，去党校学习的书记郭突然提前回来了。他来我办公室与我打招呼，说是由于要搞大清查，所有在党校学习的书记们都奉命立即回原单位主持清查工作，然后匆 匆离去。以后一个多星期就再没见到他，直到一天的下午，阿同叫我立刻到楼上的党委办公室开会，但却不知道会议的内容。我来到党委会，七个常委都到齐了后， 书记郭让保卫处长发给每个人一张名单这是一张要向公安局上交的黑名单。

总共一百三十九个人。我仔细地看着名单，连副所长阿宗的名字也在上面，阿学、阿聪也不例外，令我想不到的是连资料室主任阿建、车队书记阿强都在这份名单上。会议室里静静的，书记郭开始说话了。

首 先他讲到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份名单，立即上交。接着又几次强调当前的清查十七种人的工作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恢复所里的秩序和正常工作，并保证 在戒严期间不发生任何事。他最后说：「在北京的三次大游行中，共有六百万人参加，而北京市的人口是一千一百万，已经超过半数了，这份名单上仅一百三十九 人，比起全所职工的总数，比例是很小的，我们还将有第二份、第三份名单的，因为参加反革命暴乱的职工绝不止这个人数。」

他 转向我，问我是什么看法，我笑了问：「你是凭什么搞出这份名单来的？」他说是和保卫处长一个星期来商量出来的。我马上问保卫处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这 份名单的？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的回答是，这份名单在他的头脑中已经形成几个星期，因看到我太忙，故而没有找到机会和我商量。我点一下头，又问他： 「既然在你的头脑中早已形成这份名单，那么你是一定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而且也一定有具体的调查报告了，可以证明这些人确实是暴乱份子的，能不能把你的调 查材料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呢？」他犹豫一下，说：「我一个人不可能在几个星期内搞出一百三十九个人的调查报告，但在我的日记本里有记录，所以我才可以提出这个名单。」我问他能不能把日记本中的记录在这个会上公开出来，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应该被逮捕。他没回答，两眼看着低头在看名单的书记郭。

保 卫处长说，他的日记太简单，通常是用一个符号或一个字代替一件事，只有他自己明白，别人看不懂的。他说到这里，一位常委马上说：「既没有调查，又没有事 实，等于毫无根据地把一个人送进监狱，这样做不妥当。」会场上又静了一阵，书记郭抬起头看着大家，慢慢地说：「我回来一个多星期了，也多少了解一些事，首 先是三次大游行，所里有人参加，七死、九伤、十个人下落不明也是事实，卡车被烧毁也不可否认。仅这些就足以证明所里有人参与了暴乱，究竟这一百三十多人是 不是真的是暴乱份子，我想公安局和戒严部队会搞清楚，

我们的工作就是配合形势，把可能参与暴乱的人名单交上去，然后迅速稳定所里的局面，恢复正常工作，这 是我们正在做的。」

他刚说完，老副书记突然说：「自六月十二日上 班以来，我由于家事，心情身体都不好，虽然每天上班来，但却干不了事，整个所里的全部工作都是由副所长一个人承担起来的，仅一个星期，全所就恢复了正常工 作，而且即使在暴乱前和暴乱后，所里的情形始终稳定，同时副所长在死、伤、失踪人员的处理上也是得当的。目前人心刚刚平稳下来，加上军人又住在这里，每天 劳军的开支又大，财务上十分困难，可又要保证今年工作的完成，如果公安局一下子抓走一百三十九个人的话，所里会马上大乱，人心惶惶，工作项目一定完不成， 明年的拨款一定减少，到时真的发不出工资又怎么办？我建议，由党委的政工、保卫两处共同调查，有了证据再上报也不晚的。」

他 的这番话不但使我吃惊，我相信书记郭也大吃一惊。我看了阿同一眼，他也在看我，不动声色地向我点了一下头，然后他说：「看起来，大家的意见并不统一，我建 议举手表决一下，究竟该不该上交这份名单。」我表示同意这个提议，郭是不太同意的，他又用了十分钟的时间讲述了当前形势和清楚工作的重要性，他说完后，老 副书记马上进行表决，郭看了他一眼，也只好同意了。表决结果：四比三，这份名单不上报。阿同后来悄悄地告诉我，老副书记的小儿子有下落了，他是在市民的帮 助下和几个学生逃到了香港，很快在香港民运组织的帮助下，又把他们送到了法国。老副书记放心了，更主要的是他儿子的事也使他转变。阿同问我有没有注意到， 在六四以后，老副书记一直极力支持我工作，又要我以后多与他接触，尽量搞好关系。

两 个星期后，党委第二次开会，讨论第一批五十人的名单，看来书记郭和保卫处长接受上次的教训，不等问，就对每一个在名单上的人说出一件到两件事去证明这个人 是参加了暴乱的。那天的会议几乎开了一天，其中也发生了几次争执，最后有十多个人被从名单上拿掉了，对剩下的不到四十人，书记郭说：「既然这些人是党委会 一致的同意去调查，那么我们也减少一些程序，搞出一个人的材料就上报，绝不拖延，也不再开党委会讨论。」

书 记郭是恶毒的，我没有理由反对，更令人着急的是阿宗的名字仍在这张名单上。会议在下班前结束了，我赶快回到办公室，要秘书请阿宗来。阿宗仍是那副不慌不忙 的样子。我关紧了门，坐在阿宗的对面，把纸和笔摆到了他的面前。我低下头，闭上眼，将四十人的名字一个一个地说了出来，最后的一个是他的名字。然后我抬起 头，告诉了他今天党委会上的一切。

他 并没有惊慌，我放了心，对他说：「我是有办法可以保你的，为了更保险一些，你还是应该马上通知政协，他们也会为你出面说话的。他很有信心似的点点头，我接 着说：你和书记郭历来有矛盾，还发生过几次口角，大家都知道的。书记郭现在是利用形势，搞打击报复，你马上抓个机会与郭再发生一次口角，我马上就有了借口 扣住你的材料不上报，然后转送到上级那里，并且告他利用形势把平时的同僚不和说成是政治问题，搞打击报复，于是就什么事也没有了。问题是这剩下的不到四十 人，我们怎么办？我不能不管，你也不能不管，所以我想求你一件事。」

他 马上说：「别说求，告诉我是什么，我马上去做。」我说出了我的想法，让他把阿军、阿生、阿润这几个可靠的人找到，成立一个快速行动小组，在绝对保密的情况 下，让他们能走的快走，一时走不了的，先躲避，任何事让他们转告阿宗，我和阿宗去办。阿宗握了一下我的手说：「我马上去找他们到我家去，今晚就开始，我来 做这件事，你可以放心。」我马上说：「不对，是他们办，你不要出头。而且你明天必须来上班，你还要对付郭呢。」他答应着，转身出去。

后 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一行动是正确的。第一份名单中的二十七个人及时地走掉，避免了被捕、刑讯和酷刑的折磨。其中有四个在得到快速行动小组的通知后，立即 离开了住处，使得就在当晚去抓他们的警察和军人扑了空。但不幸的是仍有十多个人不听劝告，结果被捕。在这次以后的两三个月里，又有几份名单经党委讨论后通 过了。

尽管我尽了力，但是，仍有将近四十人被捕。直到同年底年和一九九零年初，所里出面向公安局担保，使得二十多人被释放，还有一些被捕的人的家属向公安局拖人情，买礼物、送钱，也得到了释放。但仍有十几个人，一直在监狱，有的被关了长达七年之久。

至 于阿宗，就在第二天抓住个借口，与书记郭在走廊中大声争吵了起来，等到我得知赶去劝解时，整座建筑物里的人都已知道了。我把郭拉回他的办公室，又劝解了一 会儿，我才离开。两天后，阿同告诉我阿宗的调查已搞完。我马上让秘书把保卫处长找了来，告诉他一旦阿宗的调查完成后立即送来，我要看。可能就在隔天，保卫 处长来请我去书记郭的办公室，商量对阿宗的调查报告。在报告中提到阿宗组织全所职工参加三次大游行，组织对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学生们的捐款，并宣扬军人开枪 打死一家人的事。

由 于事实不符，证据不足，我立即否认了这份报告，并且说：「对于阿宗这样一个级别的干部，你们如果拿不出十分有力的证据去说明他参与暴乱的话，你们是会有麻 烦的，何况他又与书记郭历来不和，有过多次的争吵，如果把这份报告送给公安局，十分容易让人们认为，原本是党政干部之间的不和，而导致政治上的报复，这对 党委书记的名声也是有影响的。我作为党委第一副书记，是有权来处理这件事而不需要去征求任何人的同意的。」他们都不说话了。半天，书记郭无可奈何地说： 「那就这样吧，这份材料先不要送交了，等以后调查来的东西更多一些，再决定吧。」阿宗的事从此就被放下， 再没有提起过。

大 屠杀的百日快到了，愚蠢的北京市政府又发下一个紧急通知，要求人们在那天不准搞悼念活动，不准游行，不准集会，不准穿黑色、白色或灰色的衣服，不准戴黑纱 和白花。这个通知反倒提醒了人们，就在那一天，全市的人都穿上了这三不准颜色的衣服，各大学学生们和市民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校园或街头，举行着无声的追悼 会，也可以说是抗议的集会，既没有演说，也没有口号、传单，所以军人也没有理由抓人。据说抓了几个戴黑纱的人，但后来证明这几个人都有亲属在当天去世，只 好放了。

全 城戒严已三、四个月，军人仍没有走的迹象，所有大学生都被送到外地的军营去接受军训，清查还在搞着。中央内部正忙着争权夺势，物色代替赵紫阳的人选，而市 民们已习惯这种到处站满持枪军人的生活。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无耻之徒无处不在，借机大捞政治资本。一个据说是唱歌挺有名的人主动去给军人 慰问演出，回家后发现家里被什么人进去打碎了一切家具。文人当中也有败类，就在那个时期，有人写了一首歌，名字是《党啊，像妈妈》，中央大有受宠若惊之 感，不知去哪儿找来个三流女歌手，整天在电视和广播中嚎叫着。刽子手李鹏也整天在嚎叫着：「军队戒严，是符合人民的愿望。」人民这个神圣的词，永远是共产 党强奸的对象。十月一号是共产党立国四十周年，市民们不准离家，街上不准有人走动，整整三十六个小时，一小撮共产党头子要搞个大庆祝，与民同乐。

军 队悄悄地忙了起来，到处去接收有盈利的工厂和企业。据说是要补上那不足的军费，后来又听说是缓解军人的不满情绪，士兵的待遇低下，军官们厌烦了与太太孩子 长年分居的生活，希望把太太孩子搬到大城市定居，不但可以天天见面，更可以在转业后，留在大城市工作生活，不想再回到那贫困的农村老家去。就在北京的通县 的一个小村子里，一位四十多岁的农民，在几年之内，白手起家，发展起一个由四个工厂组成的企业公司，雇佣了近三百工人，每年的纯利润达到几百万元，成为了 轰动一时的人物。其实这个农民的文化水平不足六年，但他却极有头脑，与北京市的几个科学研究机构有着密切的联 系，也包括了我

们所的两个研究室，他的四个工厂都是生产一些与通讯、电子、遥控有关的产品，由于这类的厂家并不多，所以他的生意极好。一支军队看中了他的 公司，只经过两次的接洽，就以一个少校、两个上尉和六个中尉的军衔买通了这个农民和他的两个儿子，于是将这个公司收编为军队所有，尽管当地政府极力反对， 无奈军队势大，又正得宠，抗争不过，也只有看着军队拿走了这个公司。

前 任副所长阿成的一个老同学阿江所在的单位，是一个研究和生产并举的机构，每年接受政府的拨款作为研究经费，同时又生产自己研究出来的实用产品，利润是很可 观的，也让军队看中了，正在谈判接收。阿江和他的两三个同事一起来找过我几次，希望我能接受他们来工作，我也实在是为了他们努力地上下奔走了一番，但得不 到上级的批准，科技人员的档案又是市政府管着，更是难办了，最后阿江几个人竟然辞去了工作，去了外省的一家工厂工作去了。也正是在阿江他们走不久，一个可 怕的消息传来，说是军队去了上级那里，正在商讨接收一个单位，阿宗催我去上级那里打听一下，可千万不要是我 们才好。我对阿宗讲：「我是不相信军队会接收我们的，每年上千万的花钱，一分钱也不挣，要我们干什么？虽然我们有两个工厂一个车间，但却不生产任何东西， 完全是为了研究为目的的实验工厂。军队是要钱的，我们是花钱的，放心吧，我们对军队来讲是无利可图的。」阿宗认为我分析的对，我也认为我是对的，所以没再 去注意。

邓 小平把江泽民调来北京，授予大权，替代赵紫阳的职位，又把李瑞环也调了来。对这两个人，我是陌生的，但不久就听到人们对他们的评论，开始明白这两个人与邓 小平同样残酷。李瑞环是天津的书记，他的高升是因为当天津的学生们响应北京的民主运动时，他曾接见了天津的学生与代表，并讲了这样的一段话：「我告诉你 们，这个江山是共产党用人头换来的，无论谁想要，也必须准备好用人头来换。」至于天津的学生们是否被这番血腥的话吓倒，就不得而知了。

据 说邓小平听到他的这番话后，赞扬得不得了，正好合了他讲的那句「借二十万人头，保二十年江山」的话，于是把他调来主持全国的宣传恐吓工作。江泽民又是个什 么样的人，我实在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上海市的书记，关于他的人品、才学、能力如何，在他上台后二十天左右开始暴露出来。他第一次公开露面，召开一个记者 会，在会上一位法国记者向他发问说：「据我知道，有一个女学生因参加民主运动而被捕，送到四川省的一个监狱里，在一个星期之内，这个女学生被强奸了两次。 请问总书记如何看待这件事？」只见这位总书记不慌不忙，面带笑容，口音浓重却清楚地说：「那是罪有应得。」

第二天上午再次回放这个记者招待会时，电视台将这段内容删掉了。越是这样，越是激怒民心。一个上午没有人工作，人们都群伙地聚集着。有人号召上街游行，请总书记解释「罪有应得」一语之意。

阿 同匆匆地进来，告诉我书记郭请我马上去一起商量一下，万一出事怎么办。我和阿同来到书记郭的办公室，老副书记已在座了。郭毫不犹豫地说：「只要有人敢走出 这个院子，我就去要求住在这里的军人把他追回来逮捕，并押送公安局。」我还没说话，老副书记马上接上来说：「军人是不会听你的，他们只服从他们上司的命 令，而且我们也无权要求军人去抓人是。我认为，抓人、杀人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刚才回放的记者会的电视上，已把昨天晚上这个总书记的话删掉了。这就 等于他说的话是有问题的。」

郭马上反驳道：「上级出错，那是上级的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保证这个单位不能出事，出了事，我们三个人都有责任。老副书记用手拍了一下桌子，说：那也要看是什么事，上边出事，社会上出事，难道我们这里是真空地带？不是我们搞出来的事，我们负什么责任？」

气 氛紧张起来。书记郭看着我，问我怎么想。我摇了一下头说：「我既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更不知该怎么办，如果出了事，那也是江泽民搞出来的，他应该有办法去平 息的。」郭问为什么是江泽民搞出来的。我笑了一下，说：「那法国记者的问题很清楚，我分析是两点，一是参加民主运动被捕，二是被捕的女学生被强奸。总书记 的回答更清楚，等于是向全世界宣布了两件事，第一是中国不是个民主国家，第二中国没有法律，至少是法律奇特。这是违背党的宗旨的。面对如此一个复杂的局 面，最好的办法是等上级的指示，我们不要贸然去做什么。」我刚说完，保卫处长推门进来了，看着书记郭说：「许多人已经在院子里集合了，看起来要上街，怎么 办？」

书记郭站起来，表情严肃地说：「我是党委书记，我有权作紧急决定的，我坚持我的意见，我现在就给驻军打电话。」说完，他走向电话机。

老副书记坐在那里没动，但却大声地说：「我是党委第二副书记，我不同意你的做法，更不能眼看着在这个院子里发生军人抓人或杀人的事。我相信第一副书记也是不赞成你的做法的。」我没说话，只是对仍站在那里的保卫处长挥了一下手，示意他出去。然后我走到书记郭面前，对他说：「这件事让我来办，我现在就出去，劝大家回来，这是我们所里的事，与军人无关，请你不要打电话。」书记郭

看着我，想说什么，我马上转身向门口走去。刚到门口，门又被推开了，这次是阿同。他对我说：「你的秘书刚收到 了市政府的紧急电话通知，让全市所有单位现在就放假，下星期一再来上班。」边说边递给我那份通知。我递给了书记郭，老副书记说：「这就全解决了，按上级指 示办事，马上放假，让大家都回家。」我没等郭说话，马上说：「我现在就去发出这个通知，估计半个小时候，这个大楼就会空荡下来了。」说完，我拉着阿同一块 离开了书记郭的办公室。

五 分钟后，通知发了出去。我没有回到我的办公室，而是在每一层楼的走廊中慢慢地走着，与人们打着招呼，问候着，并催促着大家早点回家。在楼梯上，我被一群职 工包围。他们向我喊着：「民主无罪！杀人有罪！强奸有罪！罪该万死！」我笑着做着手势，请大家平静，又把食指放在嘴唇上，示意大家少说话，并请大家赶快回 家。一些老专家、工程师们出来帮我解围，对着这些人说：「你们难为他干什么？这话又不是他说的，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都清楚，不要难为他，快回家吧。」 人们开始散开了。阿宗、阿同听到我被围，也赶了来，见到人们已经散了，于是陪着我一起慢慢地走着，检查着每一间办公室和实验室，一块劝说着人们尽快离去。

不 知不觉，竟胡里胡涂地下到了二楼，看到了那些军人。我自己对自己说：「真胡涂，我来这里干什么。」正要转身上楼，几个小军官快步向我走来，其中一个上尉对 我说他收到了书记郭的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让他们包围大院，不准一个人出去；刚又收到第二个电话，是让人们出去，并请军人在一小时后检查整座大楼，不许一 个人留在这里。这个上尉说：「我已下令做好准备，但我必须等上级的命令才可以行动。」我没说话，只是看着阿宗。阿宗对那个上尉说：「我们是这里的主人，你 们住在这里是客人，我们希望你们尊重我们，不要干涉我们的事，就像我们从不干预你们的事一样。任何事发生，报告你们的上级与我们联系，你看好不好？」他说完，我们一起回到楼上，请他们到我的办公室坐一坐。从办公室的窗户向外看，职工们已经走的差不多了，我松了一口气，转身忙着给他们沏茶，刚坐下点燃了烟，保卫处长和那个少校进来了。

少 校对我说，他已经得到了上级的命令，可以帮助我们共同负责这座大楼的安全检查工作，可是由于听到了上尉向他转达的阿宗的话，所以来问我是不是还需要他们的 帮助。我还没说话，保卫处长马上说：「我刚检查了一下，还有一些人待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没有走。所以来请示一下，是不是让军人出面，要这些人马上离开。」 听了他的话，我立时火冒三丈，提高了声音对他说：「这里是研究机构，下班后有人留在实验室和图书馆继续工作是正常的事，难道这也犯了法，而需要军人来抓他 们？什么罪名呢？」我刚说完，少校马上说：我接到的命令是要他们马上离开，而不是把他们抓起来。

我 转向少校，用同样的声调说：我根本不想知道你得到的是什么命令，我给保卫处长的命令是：「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军人进入到第三层楼。同时转告你的上级，这里 不需要帮助，而且希望你们给一个机会，能让保卫处长独立行使他的职责。」说完，我并没有让他们再说什么了，请他们出去。阿宗马上站起来说：「我马上再到个 研究室去看一下，如果负责人还没走的话，我请他们留下，再多待一小时，只是防备万一。」说完，他匆匆出去了。阿同也说去各行政部门再检查一下，阿军也要马 上回去看看，他们也都走了。

办 公室里静静的，我的脑子空空的。我点燃支烟，拿出了纸笔，趴在桌子上匆匆地写了起来。大约半小时后，我放下了笔，头靠在椅子的靠背上，心情似乎好了一些， 自言自语地说：「江泽民，我不知道你是谁，可却要为你写文章了。你若是个聪明人，最好辞职，刚上台二十天就胡说八道，险些酿成暴乱。女人犯法就要被强奸， 这就是你需要实行的政策？共产党是有本事，不用说干出的事了，连说出的话都没有一点人味。」门外有人敲门，我马上把这篇文章藏了起来。

进 来的是阿润，他只是来看看我，问我还有什么事没有。我马上让他坐下，拿出刚写好的文章给他看，又问他能不能马上送去刊登。他匆匆地看着文章，任何笑着对我 说：「我要到那里去，正好带去。我看没事了，军人们都在睡午觉，书记郭也走了，你也早点回家吧。」我和阿润一起走出办公室，又约上阿宗，在每层楼又看了一 遍，除去负责人外已经没有人了。我请这些负责人都回家。我和阿宗也离开了。

第十六章　被军队收编无异于羊落虎口

事 情往往发生得那么突然，尤其是坏事。想都没想到过的坏事的发生，更是无可预期。大概在江泽民的「罪有应得论」发表不到一个月后的一天上午，阿同来叫我立即 到楼上书记郭的办公室去，说上级的几位大员来了。我放下手上工作去到那里，上级党组的一位副书记、政治部主任和一位资格很老的主任委员都在座。书记郭似乎 很激动，正在殷勤地沏茶，见我进来后，兴奋地和我打招呼，又将我一一介绍给这三位大员。

对 这三个人，我是认识的，只是从没和他们说过话。看起来，他们是知道我的。坐下后，我接过书记递给我的一支美国香烟，书记郭对我说：「我们已经被军队接收 了，马上就要变成军队的新技术研究所了。今天几位领导来，就是来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并且讨论如何配合军队做好收编的工作。」我一愣，拿烟的手也抖了一 下，心猛地往下沉，茫然地问了一句：「怎么可能？」那位副书记转向我，对我说：「军队已与我们接触了多次了，我们也几次专门研究了此事，军队打算搞一些实 用新技术的研究，并且投入生产，赚些钱，贴补开支。我们考虑你们所是适合军队要求的，军方也很满意。于是事情就定下来了。书记郭知道这件事，并且也积极地促成了这次接收。面前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我们来是想和你们一起商量一下如何做好收编工作。我相信有不少细节问题，尤其是人的问题，总之，这是一个很大的工作，你们两个人负责，保证收编的顺利进行……」

我努力去集中精神听他在说什么，可就是没有办法。我知道全所上下对这事的抵制肯定非常大。军队进来后的大清洗、大裁员，不知多数人又要倒霉，最可怕的是全所两百多名高级科技人员将面临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我 始终记得北京邮电大学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一直是由军队管制的。文革结束后，军人撤出，邮电大学老校长在清点人员时发现，在文革开始之际，该校九位一级 教授、十九位二级教授，仅有三个人还活着。一级教授已经没有了，这三个人全是二级教授，其中一人长年住医院，另一位被打成残废，已不能工作了，只在家里写 书，只有一位还可以继续教书。与全大学少了的那一百多位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们一样，这二十五位著名的一、二级教授也是被打死，或者被逼无奈而自杀 的。文革结束了十二年半，又是军队制造了这场大屠杀，现在大搜捕大清洗还在进行着，我们这个机构在这个时候被军队收编，无异于羊落虎口。

政 治部主任注意到我的沉默，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勉强地说：「这么一件大事，事先并没有与我们商量一下就做决定，我确实不知该说什么，更不知道收编后，这个所 还能不能存在。我们都不是军人，是不是能适应军队的管理？我们是个花钱的单位，军队没钱，接收我们是为了什么？今后的研究经费又从哪儿来？而上级既然已经 决定了，还问我干什么，我是不同意的，而且保留这个想法。」我说完，书记郭马上笑着说：「这应该怪我，我早就应该告诉你，但上级考虑更周全，一再强调事情 没有决定前，不要露出风声，以免引起不安。江总书记又一再要求，当前以安定团结为第一，所以我对谁也没说。」听了他的话，我想说什么，但忍住没说，只是狠 狠吸两口烟。

那 位副书记说话了，先是责备书记郭应该早些告诉我，然后又用了一种极温和的口气对我讲了许多与军队谈判上的细节内容，等于回答了我刚提出的问题；又一再向我 表示军队会十分尊重我的意见，他们将派一位所长来，但此人是搞政治工作的，所以全所的行政工作仍将依靠我。他最后提到此事已定，要我全力配合，顺利完成收 编工作。接下来那位资深的主任委员对我说，他们已多次向军队介绍我，军方很是器重，并一再提到将派来的所长不懂行政管理，要我代理所长的工作，并说要我相 信军队会对我做出适当的安排。

他 刚说完，书记郭就插话说：「快到午饭时间了，几位领导亲自来了，表示了对我们的关心，请一定吃顿饭，下午还要把老副书记和阿宗副所长请来，请几位领导当面 向他们宣布这件事。」说到这里，他转向我，笑着说：「党政分工嘛，安排客饭是行政上的事，不可以越权的，还得请你通知他们准备了。」我真想狠狠地回敬他几 句，但终究忍着。

我站了起来，说：「好吧，我去安排。」我并没有打电话通知后勤，而是借机走了出去。我直接去了阿宗的办公室，在那里打电话告诉后勤，准备特等客饭一桌。阿宗笑着问我：「是什么大人物来了，要用特等客饭招待？」我拉他坐在了沙发上，低声告诉了他这一切。

他 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半天，才问我打算怎么办。我摇了摇头，对他说：「别问我，太突然了，我只是在想，这里是不是还能有个机会去阻止这件事。」阿宗马 上说：「即便是垂死前的挣扎，我们也要挣扎一下的，我是不会给军队干事的。」我们就这样相对坐着，吸着烟，谁也没有个办法，直到他的秘书进来，告诉他马上 去小餐厅与上级领导共进午餐。我对他说：「也好，你先听听他们怎么说，我们再找时间商量吧。」

一 顿豪华的午餐，三位大官员十分满意。在饭桌上，书记郭已经向老副书记和阿宗讲了收编的事，三位上司又向他们重复了上午对我和书记郭说过的话。饭后，又回到 书记郭的办公室。书记郭是兴奋的，一直在不停地说话。但三位上司看出来了，老副书记、阿宗和我从午餐开始到现在，几乎就没说过话，一直低调地保持沉默。上 级的那位副书记说：「看来，关于收编的事，你们党委是要好好地开个会，不是讨论同意不同意，而是要统一思想，党委成员的思想统一，再给行政干部们开会，也 是统一思想。」说到这里，他看着书记郭、我和老副书记，又说：「最好你们三个人先开会，统一思想，然后才能说服别人。」送走了三位上司后，书记郭邀请我们 到他的办公室继续商量此事。阿宗马上说：「上级的指示是，让你们三位书记先开会，我就不打扰了。」说完，他转身走了。

老副书记好像是自言自语，但声音又很大，而且一点不客气地说：「这么大的一件事，我作为党委副书记，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就做了决定。我老了，没用了，该退休了，还有什么可商量的，已经决定了的事，那就执行吧。」说完，他也走了。

书 记郭显得很不自然，脸上露出极勉强的笑容，对我说：「我知道，你是所里的第一个大忙人，但在这件事上，我需要你的合作，我们两个人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才能 把这件事办好。」我没说话。他又说：「这是件好事，无论对这个单位还是对职工都是有利的。就拿工资来说吧，同样的级别，可军队的工资就比我们高出几十块钱 呢，这不仅是你和我，对全所每个职工也是一样的，等于长上两三级工资呢，工资提高了，生活好一些，谁又会不高兴？仅这一点，我相信全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职 工是欢迎的。所以，我认为上级的决定是正确的。」说到这里，他显得很热情，但又很坚决地一定要我去他的办公室再谈谈。我想也好，今天一天你也说够了，也兴奋够了，该我说几句了。在他的办公室里，我直率地向他摆出了几个问题，显然是他没想过的。他匆匆回到办公桌后，取出纸和笔，边记边听我说。

我 第一个问题就提到他刚刚说的，每人每月工资增长几十元的事，这样一来，等于全所全年仅工资部份的开支就增加至少四十万块钱。接下来，我又说：「我们是每年 一两千万的花钱的机构，军队又从哪儿去弄这笔钱来。他们要的是钱，而不是花钱，我们被收编后，也等于是军队的单位了，一切开支都是将是从军费中来，就是因 为军费不够，他们才要收编有利润的单位，收编我们，他们图的是什么呢？」接下来，我又分析了军队的第二个目的，那就是大量安插、派调人员来这里，军队不可 能只为了一个目的而每年花这么多钱。至于他们提到的要生产民用产品去赚钱，这是个好的想法；我也一直在计画 着这样做，所以才下大力气去追回那三百多万。生产产品首先要投资，我不相信军队有这笔钱的。他们要安插人进来，那么就一定会同时大裁员，在这个单位里，除 去党、政、后勤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外，都是高科技人员，如果仅从这三个部门裁员，肯定满足不了军队的要求，可是裁减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这个研究所也就不存 在了。

最 后我提到，这个研究所的九个研究室，共进行着两三百个项目的专题研究，没用一项是与军事有关的。为什么要收编我们？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实在弄不懂，所以也 帮不上忙。天知道，可能我的名字也在裁员的名单上了，我也许也该考虑一下我自己的去向问题。书记郭一直在听着，记录着。我说完后，他用了一种低沉而又带有 相当压力的语调对我说：「在这种时候，你是走不了的，对别人可能行，对你是不行的，作为一个党员、干部，服从上级的决定，这是原则也是纪律，同时也是不带 任何条件的……」我打断了他：「就像文化大革命那

十年，明知道是场浩劫，也要服从，去把国家和民心毁掉？」他不说话了。一阵沉默后，他突然问我：「你是不 是反对收编？」我点点头，说：「是的，反收编并不是反对军队，更不是反党，我是做具体工作的人，具体问题不解决，光喊口号有什么用？上级的指示是让我全力 配合你，你是一直在全力促成此事的，当然知道该怎么做了。」说到这里，我站了起来，准备告辞。书记郭也马上站起来，急促地对我说：「无论如何，这件事已经 定了，无论我们是同意或是反对，我们也要执行的，我对你讲实话吧，在这件事上，需要你的帮助和配合，过两天，我还是要找你商量这件事。」

离开书记郭的办公室，我去找阿宗，他的秘书说阿宗已坐车出去了。我回到办公室，让秘书通知司机，我收拾了一下办公桌，马上下楼，坐车直接去见我的上司去。十分巧，他正在办公室。我没顾上问候，马上就告诉他这一切。他听着，脸色阴暗下来。他站起来， 走到窗口那里，看着窗外。片刻后，他平静了，又坐回到办公桌后面，仍亲切地对我说：「我实在不知道这件事这么快就决定了。我参加过两次会议，都是专门讨论 这件事的，我是极力反对的，并提出了一些问题，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我确实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就决定了这件事。我要弄清楚，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给我两天 的时间，我会尽快地弄清楚一切，你先不要发布收编的消息，以免人心浮动，两三天内，我会找你去的。」说完，他看着我。我犹豫了一下，站了起来，在与他握手 时，终于说：「我请求你把我调离这个单位，我不想……」他打断了我说：「现在谈这些还太早，给我两天的时间，好吗？」我点点头告辞。

回到家，我立即给阿宗家打电话，他也是刚到家。他告诉我，他去了政协，但政协的回答更干脆，因为政协不是个权力机构，所以根本无权插手或阻止这件事。他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了他关于副主任委员的话，他叹了口气，我也叹了口气。

第二天，老副书记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赶紧招待他；这恐怕还是第一次我们俩个人单独坐在一起。他很客气，我也极力表现出欢迎的态度。一支烟吸完后，他把话题转到收编这件事上来。我认真听着。看起来虽然他与书记郭共事二十多年，但相处并不愉快，矛盾极深。

书 记郭一惯独断专行，无论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同时又要求所有人服从配合，很少听取他的意见看法。二十多年，已经形成了习惯。这次的收编使老副书记格外恼 火；书记郭在事先竟对他也保密，看来是深深地伤了他的自尊心。他重复了几遍：「二十多年在一起工作，他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

看 他的样子，又愤怒，又激动。片刻沉默后，他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不同意这个决定的，可能还想做些事去阻止或拖延收编。我告诉你，已经太晚，没有可能了。你 虽然年轻，但十分有能力，在这个所里，上上下下的人都拥护你，书记郭看出来了，所以他也恨你，他看出了这个形势，一手制造出了收编这件事，一是为了巩固他 自己的权势，二是为了压制你。我老了，该退休了，在这件事上，我不参与了，但是如果你需要我，我会帮助你。这一次，我是不会再帮书记郭的。同时，我要告诉 你，一件上级已经决定的事，通常是扭转不过来的了，硬要坚持反对的话，会丢官罢职，甚至还会惹来一身大祸，你要小心！」

他 能对我讲这样的一番话，我很感激。我一边感谢他，同时也对他明白地表示：「我反对收编，但看起来大势已去，不太可能挽回。我只想离开这里，卸去这一身的职 务，重回专业。」他点燃了一支烟，对我说：「太晚了，人事关系已经冻结，这个时候是不可能有人调出或者调入的了。况且人事上的调动历来是件难办的事，即使 是夫妻两地工作、分居几十年都很难调到一起的，你最好打消这个想法。面对这个变动，做你该做的事，你年轻，书记郭也老了，再有几年也该退休了，他独断专行 了一辈子，你也顺从他一些，避免矛盾。人在一起工作，搞好关系还是很重要的。我相信，上级对你很器重。」我知道他的话都是经验之谈，他能对我说这些话，已是把我当知己了，我除了认真地听着并表示感激外，不断地给他倒茶让烟，四十分钟后，他走了。

我刚回到办公桌边还没坐下，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阿宗，第一句话就问我老副书记来干什么。我请他坐下，详细地告诉他我和老副书记的谈话内容。阿宗很吃惊老副书记竟然会对我谈出这样一番话，但马上又责备我为什么想要调走，尤其在这个时候，已是不可能了。

我 给他沏上茶，又向他苦笑了一下，没有解释什么。他提到，他刚从一个什么大人物那里回来，所得到的消息是，目前军队的势力太大，后台又是邓小平，阻止收编是 不可能的。他叹了口气，说：「现在看起来，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等收编了。只是不知道今后会是什么样，又会发生什么事。」

我 提到了副主任委员的话，告诉他这里可能还有一线希望的。他摇了摇头说：「别抱希望。他也和你一样，党组决定的事，他同样也推翻不了。我只想对你说，事情来 了，千万要面对现实，一切反抗只会招来大祸的。让他们收编，至少你我的职务还保留着，军方派来的所长不了解这里，也是需要你我的合作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机会，把这个所保存下来。大清洗仍在进行，天知道军队又会在这里干些什么，你我的责任并没有结束。不知你是怎么想的？」我无可奈何地说：「我和你不一样 的。你比我年长，有经验，修养也深，许多事你是可以接受并

忍受的，我却不行。这种天天作戏般的生活，我实在过够了。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我明白人是应该改变的，但绝不是这种样子的改变，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整天说着违心的话，做着违心的事，我不是演员，我不知道我整天都在干什么……」我一口气喝干一杯茶，又狠狠地吸了一大口烟。还想说什么，却说不下去。

第 三天，上司副主任委员来了。我刚要叫秘书去打开水准备沏茶招待，他摆了摆手对我说：「不必了，我来这里别人不知道，也没人认出我来。我坐一坐就走，只是想 当面告诉你，收编一事已定，没有任何的转机了。我要求你听我一句话，配合收编，协助新所长工作。军队对你很是器重，这一边对你的评价也是很高的，听我的 话，撑过去这一关，以后有机会再考虑退下来，也不迟；但我想可能性是不大的。现在，你必须服从这个决定并且配合工作，这是我对你的最后要求，我想你是明白 的。」说完，他平和地看着我，等待着我的回答。

我 也看着他，却什么也说不上来。他接着告诉我，就在我去找他的当天，他就去了党组询问，得到了一大堆解释和道歉，最后证实此事已定，无可挽回了。昨天下午， 那位资深的主任委员和党组书记找到他，请求他给我做工作，要我服从决定，配合工作，如果我有要求或条件可以提出来，他们会考虑接受的。但他拒绝了，他对他 们讲，他与我的关系只是上下级工作关系，无任何私人交情，既然军队要收编这个所，那么他和我的这种上下级关系也不再存在，所以他没有权力再来要求我什么。 同时，他又告诉我，书记郭这两个月来，几乎天天都待在党组办公室，收编的事确实是他一手促成的。但是，书记郭没想到，收编的决定仅在我们四个人之间公布 后，竟就受到如此大的阻力。

书 记郭很清楚，在收编这件事上，他不在乎没有老副书记和阿宗的支持；但如果没有我的支持和配合，他根本办不了这件事。副主任委员接着说：「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我来这里，但我又要当面嘱咐你，事情已是如此了，反对是不明智的。听我的话，配合收编，同时显示你的工作能力。上级党组也知道书记郭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 才要我劝说你。你应该让军队知道你的能力，以后你说话他们会重视的。千万记住，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反对或顶着干，永远是没用的，而且你会吃亏。这是我由衷 地嘱咐你的话。」我看着他，还是没说话。

他 笑了一下，又很亲切地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要说了，听我的话。如果不嫌我老，就时常来看看我。我要走了。明天或后天，你和书记郭就会被召去的，与军 方第一次见面，但我要提醒你，慎思，少说话，并且服从，你能不能做到？」我点了点头。他马上说：「不行，我要你回答我。」我苦笑了一下，看着他说：「放 心，我一定听你的话，多想、少说话、并配合。」他笑了一下，

在我肩上拍了一下，说：「我知道是难，但你一定要做到，想想你的前任阿成，仅是为了一件小事， 我几乎使出了全部的力量，才保住了他没大事，可还是降了级，去了外省。收编后若出事，谁又能保你？」

我 刚要说什么，门被意外地推开了，书记郭走了进来。他与副主任委员亲热地握手问候，又抱怨我上级来了为什么不去通知他。他边絮叨着边坐下，老上级很客气地与 他寒暄着，又说他正与我说完话，要去看他。书记郭马上兴奋起来，又要去准备客饭招待。老上级拒绝了，他对书记郭说：「收编的事，马上就要对职工宣布了，你 们两个人一定要合作，互相尊重，不要有矛盾，把收编一事顺利完成，同时不要影响正常的工作。有人不同意或反对收编，要慢慢去开导，发布不同的意见是正常 的，不要把他们当成敌人。应该团结好所有的职工，一个能做出成绩的单位，才是个好单位，才变成一块肥肉，谁都想要。要有成绩，就要尊重人才、爱护人才，搞 四个现代化，没有科学技术是不行的……」

这 些话实际上都是对书记郭说的。副主任委员看了一下手表，站了起来要走。书记郭又一再挽留他吃饭，老上级拒绝了。我和书记郭把他送出来，看着车开走了，才又 一起走进了大楼。在楼梯上，书记郭告诉我，他刚刚收到上级的通知，让我们后天上午去上级那里与收编部队会面。他皱着眉头对我说：「上级是要求我们四个人都 去，但恐怕只有我们两个人去了。」我马上说：「上级要求四个人都去，那就应该四个人都去的，你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们。」书记郭只是点了一下头，反应不是那么 肯定。我没容他说话，拉他去老副书记的办公室。不到十分钟，我们出来了，老副书记同意去。我们又去找阿宗，阿宗也同意去参加。我坐下来，要和阿宗商量着会面中可能出现的话题，书记郭似乎不感兴趣，借口有事走了。

那 天下午快下班时，阿同来到我的办公室，小声地提醒要我特别小心我的秘书。他告诉我，书记郭已经把她拉过去，许诺她在收编后可以得到上尉军衔，又告诉我今天 副主任委员来，就是她向书记郭报告的。我倒吸一口气，说不出话来。阿同马上说：「你不要紧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什么事呢，但以后要小心点了。」我问 他：「你已经知道收编的事？」他点了点头，低声告诉我，在几天前，书记郭找他谈话，同样许诺给他中校军衔，并保留他的党委委员的职务，条件是要他支持书记 郭的工作。我马上问，关于收编的事到目前为止有多少人知道。阿同想了一下说：「我也不清楚，但我相信所有党务部门的人都知道了，可能相当一部分行政负责人 也知道。书记郭利用这个机会收买人心，但似乎还没有做出对你不利的事来，放心吧，我会随时注意这些，并告诉你的。」

说 到这里，他笑了一下，又说：「其实你站在书记郭的角度上去想想，他也是不得不如此的。他在这里工作了这么多年，拥护他的人找不出几个，恨他的人却不少。你 刚上任，他就去党校八、九个月，回来后看到你把这里的一切都弄得十分好，又得到大部份中级干部们的拥护，他当然嫉妒。如果他在这个时候去攻击你、抬高他自 己，是不会生效的，反而对他更不利，正好利用收编机会去封官许愿拉拢一部分人心，也是自然的。我只希望他不与你作对就可以了，更不希望他像以前搞掉阿成副 所长那样搞掉你……」我笑了一下说：「调又调不走，退又退不下来，搞掉又怎么样？我倒自由了。」阿同马上严肃地说：「你不应该有这个想法。想想你付出的心血，再想想这些支持你工作的人们，你必须坚持在这个岗位上。」我没有回答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转身出去了。

与 军方会面的那天，上级的五位高层人物都出席了，加上我们四个人，军方是以一位中将政委为首和六名高级军官参加，其中一位王姓的大校级军官就是即将派来担任 所长的。在会面中，军方一再表示：第一，研究所仍按现在的工作程序运转，军方不改变他的性质；第二，收编后，绝不会裁减任何人；第三，研究所将逐步扩大， 增加民用产品的生产项目，军队投资并增派技术军人，领导权仍归研究所；第四，收编后的经费由军方负责，并保证不会减少拨款。最后提到收编后所有职工的待遇 改为军队待遇。言外之意就是说，全体职工的原有级别不变，工资却提高了不少。在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中，军方几位代表又保证，又许愿，全只提好事，没有半点坏 事。上级的几位高层和书记郭都兴奋，纷纷地都说了不少赞扬的话，唯有我的上司、那位副主任委员没有说话。最后，那位中将政委问我们有什么问题。

书 记郭又是大赞一场，说了不少废话。中将看着我，要我说几句话。我知道这是避免不了的，也有所准备，于是根据他们刚提出的四点，进一步更具体地问了几个问 题。有几个得到回答，但很多个问题显然是他们没准备或没想到的。尽管他们一时回答不出来，但仍做了保证和许愿。中饭时间到了，两桌高标准的酒席已准备好。 下午的内容就简单了，上司和军方对我们正式宣布，收编工作从下周正式开始，王大校将在一周后正式到任。明年二月初收编工作结束，正式挂出新技术研究所的牌 子。几位高层要求我们最迟在后天要向全体职工正式公布这个消息，又特别嘱咐我们要一再地向职工宣传、解释军队的四点保证，尽力使每个职工都愉快接受收编， 同时稳住局面，保证所里各项工作正常进行。

我 们回到所里后，书记郭邀请我们去他的办公室，商量如何向职工宣布这个消息的细节。商量的结果是明天先召开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后天上午召开全体职工大会，由 书记郭向大家宣布这个消息。下午各部门开会，讨论并统一职工的思想。书记郭高兴了。但马上提出一定要我在职工大会上将几句话，我既没表示同意，也没拒绝， 只是装作在考虑问题，没听到他的话。书记郭也算知趣，没再

说什么。后来，令书记郭失望的是，在会上，人们对收编一事的反映竟是那么的冷淡，我也感到出乎意 外。会上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提问题，人们的脸上都是那么死板板的，会场上静得出奇，连咳嗽声都听不到。

在 下午各部门召开的讨论会上，情形大不同了。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些上了年纪的职工问：「我们都快六十岁了，还要当兵？」而提出的最普遍的问题是：「恐怕军队的有些命令，我们接受不了，更执行不了的。」下午下班前，各部门负责人交来人们提出的问题，大约共有一百多个。书记郭立时就不高兴，对我说：「各部门开会的目的是让大家统一思想，拥护收编，谁让他们提出这么多问题来了？」我看着他，笑了一下说：「这么大的一件事，你刚宣布完了，人们马上就喊着 口号的拥护，那不又成了文化革命？人们问问题是正常的，不把事情弄明白了，又怎么去表示拥护或反对？事前保密，事后开个会，人们马上就拥护，不成了演戏？」

书 记郭看了我一眼，慢慢地坐了下来，不无感慨地说：「在五零到六零年代，每年的十一国庆大游行，从上午十点开始，凡是参加游行的人必须在凌晨三点钟到达指定 的位置等候，人们都乖乖地准时到达，站在那里等着，没有人提问题的。可现在，要求人们这样做还行吗？」我也坐了下来，点燃了一支烟后，说：「当然不行，既 然十点钟游行，为什么让人们三点钟就等在那里？如果是我话，我会在九点半到达，我不会让自己在寒冷中忍受七个小时。」

书 记郭也点了一支烟，慢慢地说：「现在的政治工作难做呀，所以我认为让军人收编也是好事，命令就是命令，就要执行，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也不让你提问题，不执 行就处罚。」我立时就火了，提高了声音对他说：「这就是我们被收编的原因和目的？如果是的话，我反对。我可以告诉你一句实话，到现在为止，我始终不明白收 编我们的目的和原因，以及收编后我们将面临的是什么。我现在就可以去上级和军队那里，提出问题和我的看法。」听了我的话，书记郭有些慌乱了，马上做出一副 笑脸，对我说：「你毕竟年轻，火气这么大，我们只是在闲聊，又不是谈什么事，何必那么认真呢？」我没理他，他又说：「好吧，让我们谈公事吧。看来职工们的思想一时还统一不了。你说得对，不是一、两个会就可以解决的。我看这几天，我们组织不同的大小会议，去尽量说服大家，统一认识，拥护收编，你看怎么样？」我冷冷地说：「这是党委的工作，我太忙，就不参加了。」

连 续几天，书记郭真的组织了不同的会议，声嘶力竭地说着。整座大楼里秩序大乱，一会儿一群人走进大会议室，一会儿又是几小群人走进几个小会议室，走廊上乱哄 哄的，人来人往，声音嘈杂；民主运动期间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现在

这样的大乱，工作都陷入停顿。阿宗要我出面制止，我反问他，怎么制止？书记郭所要的是人们 统一思想，百分之百地说拥护收编，而我认为是应该让人们提出问题，让军队来回答，人们得到了回答，放心了，不说话也就等于拥护了，书记郭自己愿意把火往他 身上引，我能怎么办？反正他得有点事干吧。以后的一个多星期，书记郭似乎也感觉到要去统一职工们的思想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也同意了我们的看法，就是让军队 来向职工当面解答这些问题。经过两次的与军方的联系，他们都以忙为借口拖延没有来。

收编的进程并没有停顿，那位王大校按时到任了，随他同来的除去一名女秘书，一名司机外，还有三个军官。据介绍都是做行政和技术工作的，一个是他的办公室主任，另外两个是来做所长助理的。

我组织了一个由党、政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欢迎会，然后又是一顿公款的小宴会，但参加的却不足二十人。书记郭作主把名誉所长李教授的办公室给了王大校作办公室。我问书记郭：「李教授还没有宣布退休，怎么可以把他的办公室给了别人了呢？」书记郭的回答是：「军队已对李教授做出了安排。」

这位大校先生确实不是作行政工作的，上任后似乎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大约一个星期，整天待在书记郭的办公室里。我准备一大堆的材料想向他汇报，但始终见不到他的影子；同时后勤处长却送来了四张单子让我签字，都是这位大校请客吃饭的账单。阿同告诉我，几乎每天都有军官来这里向大校道贺，于是接待餐厅就又忙起来。他们酒足饭饱之后，账单就送到我这里来了。我想说招待朋友同事吃饭是不可以用公款的，但后勤处长对我使了个眼色，于是，我什么也没说，签了字。

一天上午，秘书进来说新任所长王大校来了。我刚说请还没站起来，这位身材矮小、军服笔挺的大校已经进来。握手寒暄后，请他坐下，我又沏茶、让烟，忙乱一阵，然后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

他 说话带有很重的四川或湖南那一带的地方口音，由几句闲谈转到公事。我把已准备好的一迭公文拿了出来，放在他的面前。他马上摆了一下手，说：「我刚到任，正 在熟悉情况，在我来之前，上级对我讲过几次，你一直是在代理所长职务，尽管我来了，仍请你代理，上级以后是有安排。我没读过多少书，是个大老粗，让我来这 里工作，领导知识分子，我还挺害怕的。我从来没和知识分子在一起工作过，怕搞不好关系，在这一点上，我希望你多帮助我。」我笑了一下，

对他说：「其实，我 们所谓『知识分子』们也是一样的，从没有和军人一起工作过，所以也感到不安。我希望相处一段时间后，大家都成为朋友才好。」接着，我又提到准备召开一个行 政报告会，帮助他熟悉一下这里的工作情况。他又摆了一下手，说：「在上级做出最后安排之前，我是不插手行政工作的。」

接着，他像是若有所思的样子，但又是相当认真地说，自从他到任一周以来，了解到了三件事使他十分重视并不安。我马上振作一下，听他继续往下讲。

他 首先提到，这次的收编，他认为到现在为止职工们的思想并没有统一起来，许多人反对，有不同看法，或有抵触情绪。他本人认为，军队收编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职 工们并不拥护呢？他认为这里面是有问题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应该查清。他又提到六四大屠杀后，全所死伤失踪共二十六人，这足以说明这个所是有问题的。在大清 查中，至今对「十七种人」的追查工作进行的不顺利，有阻力，更有不少暴乱份子跑掉了。他引用了中共一再提出的这次暴乱的起因是来自两院一所一公司的说法， 并指出这个所里大部份的科研人员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他认为这里应有大量问题有待查清。

他 问我，党委内部是不是不团结，或者有派系，党委要通过个决议都是很难，而且党委在职工中的威信也不高。他结束这番话之后，脸上出现了一点笑容，很认真地对 我说：「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我和书记郭交换过看法，他没有表示意见，但看起来他与我有着相同的看法，所以我来找你，希望听听你对这三件事的看法。」

他 的这番话实际上都是书记郭的看法。我也有些吃惊，想不到这么几天，书记郭就把他说服了，并拉了过去。阿成说的对，对这种人你不能不理他，该说的要说出来， 否则他们会兴风作浪的。看来这个大校也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既然他想听听我的看法，那我正好说说，让他听些不同的意见。我点了支烟，学着他的样子，不慌 不忙，态度认真地说出我对这三个问题的看法。

首 先，我谈到了这次的收编。我明白地告诉他，至今我对收编的目的和意图仍不明白，更是担心这个所的今后发展。实际上我也赞成收编，又把上次与军方会面时提出 的几个实际问题又再次提出来，并告诉他，这几个问题在会面时我没有得到答案，至今半个多月过去了，仍没有回音，这正是我担心的。在这么大的一件事上，究竟 是如何开始的，具体的过程以及最后做出的决定，我一概不知道，根本没有给一个机会让职工们、负责人们商量、讨论。决定做出来了后，才让大家知道，于是又要 职工们统一思想，全然拥护收编，太突然了。职工们自然会提出不少的问题，我和书记郭两次要求军队来人向职工们解释，人们的顾虑

消除了，自然就拥护了，可军 队并没有派人来。连我都不明白的事，又怎么让我去对职工们讲清楚？我请他不要去责怪职工们，要怪就怪我。

我 没容大校说话，马上又转到第二个问题。我十分肯定地告诉他，本所至今还没有查出一个是确有证据的暴乱份子，尽管十几个人被捕，但公安局至今也没有查清或宣 布任何一个人是暴乱份子，至于二十六个人的死、伤和失踪，那只能说明社会上的暴乱给本所造成的人员损失。中央一再强调，军队并没有开枪，那么我按因公死伤 去处理这个问题应该是正确的。同时，全所的工作进行得十分好，到现在为止已完成预计工作任务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估计在年底可以完成全部工作，这也证明了本 所不存在任何暴乱和暴乱份子。查「十七种人」的工作仍在进行，党委通过了一个决议，那就是在把一个人送交公安局前，先搞出确实的证据，证明这个人就是暴乱份子，这样做是为了负责，同时不给公安局增大压力，这个决议还是对的。

最 后我提到，大部份科技人员是来自两院的，这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两院发生了暴乱，并不代表这些来自两院的人都是暴乱份子，而且两院是中国的两个最高的最 有权威的学术机构，集中了中国的尖端人才。搞四个现代化，就是需要这些人才，拿不出确实的证据，就没有理由去怀疑他们的。在提到党委工作时，我否认党委不 团结有分歧或有派系的说法，提到了在书记郭去学习的八、九个月中，所里的大事我都及时地召开党委会讨论，并做出决定后才去执行，没有一件事是不通过党委而 自己作主的。为什么书记郭刚回来四个月就有不同的感觉？就这次收编，除了书记知道，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这是 不对的。我提到书记郭从党校回来，一个星期就提出了一张一百三十九个人的名单，遭到党委的否决的事。我说：「党委的作用就是用集体的智慧去决定事情，避免 出错。如果一个人的建议在党委会上被否决了，于是就认为党委不团结、有派系，那就错了。威信是建立在公正和忘我的工作上，由于职工提出党委解答不了的问 题，就认为党委威信不高，也是十分错误的。」

大校一直不断地吸烟，但确实认真地听着。我意识到这是个机会，干脆把该说的都说出来。于是我一点也不浪费时间地提出了几个我认为是当前所里的主要问题。首先是贪污问题。我告诉他，两个清查小组工作一年了，两份报告已经完成了，基本上查清了二十九位督导员应对三百四十万元 公 款负有责任的。几份报告交到上边去了，但至今无回音，我们也不知该怎么办，可是实在需要这笔钱。职工们的反应很大，认为这些贪污嫌疑的人背后一定是有后 台，否则不会迟迟处理不了。我又提到本所的资金问题，还有一个多月到年底，但经费上已超支几十万元，这笔钱的百分之八十用于劳军上，但百分之二十是公款吃 喝开支，已超出十万元，这直接影响到今年工作任务的完成。用公款大吃大喝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职工们知道有这种事，意见是很大的，公开地说共产党腐败了。

我 也告诉他关于正在建造的这座职工住宅楼的事，提到我的前任阿成曾搞出了一份职工居住情况的调查报告，其中提到全所共有六百多名职工有居住上的困难，许多知 识分子和职工至今一家三代人挤在一间仅十几平米的小屋里，尤其夏天天热，屋子又小，许多职工在夜晚都睡在大街上。阿成努力奋斗了两年，筹集到了一部分的 钱，我接任后又是七、八个月的筹款、办手续，四个月前，这座住宅楼开工，预计明年三月份完工可以解决九十个职工的住房问题了。我还没顾上高兴，事情就一个 又一个接着来了。首先是党委，在我筹划这件事中一直不闻不问，也不帮助，等事情办成了，书记郭第一个提出要分配住房。我至今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据听说书记 郭已有了住房达五处之多了，连他的小儿子将来结婚的房子都准备好了。在他这句话的带动下，不少干部又提出，分配住房应按资历、级别、党龄、工龄为条件。有 些干部开始给我送礼，要为儿子、女儿、亲戚要一套房，谁又考虑到了职工和这个所的今后呢？面前各个中小企业都在拼命地搜罗人才，所里的这些人都是他们的目标，条件很简单，通常是一套房，每月多加一百元的工资，就把一个科技人才拉走了，如果我们再不去干点事去挽留的话，用不了几年，这个所就不存在了，又有谁考虑这些呢？看到好处都伸手，又怎能建立威信？

我 又提到在使用国务院拨给我们的扶助贫困地区款上的问题。我听到在几次与贫困县签字合同的同时，有人向接受方伸手索取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的回扣，正在派人调 查。年底快到了，我正急着想办法给职工发年终奖金，可这几个败类竟利用工作之便成万地往自己的兜里揽钱，而且都是干部，党委应该插手调查。党委并没有管， 连那三百四十万的款子一样，党委的书记郭从来未说过一句话，也没干过一点事。我告诉大校，我早就有过一个计划，盖一个工厂，包括五、六个车间，生产自己的 新技术产品，几年后可以不需要上级拨款，完全变成一个自负盈亏的科学研究机构，同时有了钱，多盖几座住宅楼，力争在三、四年内把六百多名住房困难的职工都搬入新居，所以我们需要钱，上级是不会给我们这笔钱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追回这三百四十万元。最后，我又告诉他，有人利用这次收编去拉拢人心，扩大自己的势力，已经封了一些职工上尉和中校的军衔。

我 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不正之风，用这种方法是建立不起威信的，反而对工作有害。」说到这里，我注意到大校点了一下头。我没有停顿，而是继续说道：「我从不 在乎级别职位，上级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我尽力去做我认为是该做的事，做事就难免出错，或者得罪人，我做了错事，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引咎辞职，也可以罢免 我，我也确实筋疲力尽了，实在没有精力去对付这些闲言碎语。最好你去对上级说，派一个副所长来，给我点时间让我重回到我的专业上去，会干得更好的。」大校 看了我一眼，但仍是没说话。

我 的秘书进来了，用一个大提盒装了四盒菜来，又一个一个地放在了茶几上，然后笑着对我说：「已经一点钟了，午饭时间过去了，我看你们谈工作这么投入，所以就 让厨房做了几个菜，反正是公事；王所长是第一次谈工作，干脆吃顿公家的招待饭吧。」听了她的话，我立时火就冒了出来，但碍于大校在这里，我忍住了，冷冷地 说：「麻烦去厨房拿瓶酒来，同时向他们要账单来，我顿饭算是我招待王所长的。」秘书看着我，又看看大校，我挥了一下手让她出去。在吃饭时，大校仍是一副若 有所思的样子，说话很少，但酒没少喝，菜也没少吃，同时又几次十分小心地问我一些行政事务上的问题。我尽可能详细地回答他，直到下午三点多种，他才离开。 看得出来，他是心事重重地离开的，肯定会去他的上司那里报告。

送 走了大校，我把秘书叫进来，问她是谁给他这个权力可以去食堂叫招待饭。她犹犹豫豫地说：「自从收编后，书记郭和大校几乎天天都是这样做的……」我没再说什 么，要过账单，拿出钱，然后对她说：「马上给财务处长送去，给我写张收据来，今后没有我的话，不准再这么做。」她答应着出去了。与大校的那次谈话后，足有 两三个星期没有再见到他。

已 是十二月中旬了，照例的又是年终的工作总结、报告、财务报告、预算，整天是一堆一堆的报表、数字堆在我的面前，加上人来人往，电话不断，每年到了这个时间 是最忙的，但最重要的事是职工的年终奖金。几次与老君、阿宗、胖处长和阿同商量，一致同意多发一些，因为从劳军的过程中确实省出了一些钱，可以让职工们高 兴一下了。胖处长又提出不少职工要求在年终的职工大会上加上聚餐的内容，许多单位已经这样做了。好几年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住在所里的军人刚走，大小会 议室已空了出来，有足够的地方。我问了他们四个人的看法，他们都同意。阿宗说；「想想这一年发生多少事，天知道明年又会发生什么，这个要求不过份，让大家 高兴一下吧。」

大 概是在十二月二十号左右，一天清晨的三点多钟，司机开着车来，叫醒了我，说接到市政府的紧急通知，要我去参加紧急会议。我有些紧张，不知又发生了什么。来 到了市政府的会议厅，里面已是挤满了人，都是被召来参加紧急会议的各单位的党政负责人。当时的市长陈希同（就是后来被查出贪污了一百八十三亿的人）主持会 议。他告诉大家，罗马尼亚发生了政变，独裁者奇奥塞斯库和太 太同时已被处决，共产政权垮台了，人民要求的一个民主政府即将出现。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但参加会议的人们的脸上都表现出了一副如同死了亲娘老 子般的凄哀的样子。市长接着说，这条消息将在天亮后的新闻中发布，他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召开这个紧急会议的，要统一大家的思想和口径。中央在这件事上的规定 说法是：「无论罗马尼亚发生了什么，都是罗马尼亚人民的选择，中共的立场是尊重罗马尼亚人民的决定。」听到这里，我差点没笑了出来，这是什么逻辑？中国人 民的要求要不要尊重呢？

十 分钟后，会议结束。回到了家，我兴奋得不能再睡。半年来，心中的那种压抑似乎马上减轻不少，六四大屠杀的鲜血，擦亮全世界共产国家人民的眼睛；推翻暴政， 实行民主，是世界的大趋势，也是不可阻挡的。天亮后，这条消息在新闻时间里发布。半年了，人们脸上第一次显出了真正的笑容。上班后，人们都在互相握手，小 声地说着什么。阿生马上来告诉我，许多大学的学生正在摔小瓶子，许多大学和单位都挂出大横幅的标语，写着：「向罗马尼亚人民学习、向罗马尼亚人民致敬，更 有一些标语比较激进，写着独裁者的下场、不要向奇奥塞斯库学。」

所 里仍很安静，但看得出来，一个上午几乎没有人在工作，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小声地交谈着，不到午饭的时间，人们就去食堂买菜买酒，然后几个人聚在一起 碰杯、庆贺、交谈着，更有不少到外面的小饭馆去。阿宗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个小电炉子，上面座着一个铝制的饭盒，里面的水已经烧开，他要 请我吃涮羊肉庆贺。我给了他的秘书钱，请她替我们到外面买瓶酒来。秘书刚走，阿军进来了，我们一起分析罗马尼亚今后的局势，苏共和中共的反应，以及今年春 天的这场持续五十天的学生民主运动，在国际上可能产生的影响。六四的这场血腥大屠杀，我们推测国际社会一定知道得比我们更清楚、更详细，而且也会引起许多 国家的政府指责或制裁中共政府。

我 们都有些激动了，喝光一瓶酒。阿宗突然说：「我们高兴些什么呀？是罗马尼亚开始了民主，又不是我们。」阿军马上止住了他，小声说：「你喝了酒，说话小心 些。」我对阿宗说：「今天是罗马尼亚，明天就是我们。民主政体是一个大趋势，谁也阻挡不住的。军人不是家丁，也不是打手，没有一个军人愿意做狗腿子，给他 们些时间，他们会觉悟的。今天，我突然感到我对军人不是那么恨了，把他们当作和我们是一样的人看待，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力量去影响军队。」阿宗大声说： 「有！我们有这个能力的！」阿军又马上制止了他。看来阿宗有些醉了。我对阿军说：「最好你马上送他回家，这个时候太敏感，别惹出事来才好。」阿军说：「我 也是这么想。我去叫他的司机备车。」我的阿军扶着阿宗出来，让他坐进了停在楼后面的车里，车开走了。我一个人走进楼里，在楼道上恰巧遇上了不知从哪儿回来 的书记郭。他站在那里，笑着和我打招呼，然后问：「怎么？中午喝酒？」我也笑着说：「今天是阿军的生日，几个朋友喝杯酒为他祝寿。阿宗空着肚子喝酒，有些 不舒服，送他回家休息去了。」书记郭笑一下，又问道：「今天所里好像有什么事，是不是与罗马尼亚的那条新闻有关？」我马上说：「这你倒不妨去问问，我是不 知道的，依我看是一切正常，罗马尼亚在欧洲，又是个小国，不太可能对大家产生太大影响。」书记郭又笑了一下，对我说：「上次，你与王大校的四个半小时的谈 话倒是很有影响的。军队的上级决定明天上午来我们这里，与我们谈话，交换看法，同时商量实际问题，然后召开党政干部会议，继续听取大家的意见和看法，同时 会和职工们分头解答问题，统一思想。最后会在适当的时机再次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宣布一系列收

编后的制度和待遇问题，你能不能来我的办公室，我们两个人先商 量一下明天要和上级谈什么和怎么谈。」我没有理由拒绝，只是提议请老副书记也参加，书记郭同意了。

整 个一个下午在书记郭的办公室里，从说话中可以知道，大校并没有把与我谈话的内容告诉书记郭，这一点似乎使书记郭感到不安，几次试探着问我，希望我能透露一 些，但都被我转换了话题。老副书记一点不客气地指责了书记郭在六四和收编上的一些做法，又提到由书记郭送进监狱的几十个人至今没有定案结论，问书记郭打算 怎么办？并直率地说：「你搞的材料不属实，公安局又定不了案，总不能把这些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关下去吧，谁都有父母、老婆孩子的，快到年底了，你总该干点 什么吧，把他们保释出来，回家团圆。」

我 完全支持老副书记的建议，并且给书记郭施加压力。书记郭被动了，一再地说这些人都是经过调查证实的暴乱份子，我当即提出了几个具体的人的名字，被书记郭指 控的罪名与事实不符，那些罪名根本不能成立的。同时也给公安局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最后，书记郭没话说了，勉强同意重新审查，争取公安局的同意，先保释放几 个人。

我知道书记郭也仅是这样说说而已，他不会去做的。我提议，由于目前收编的事务繁多，书记郭是没有时间来办理这件事的，不如请老副书记全权办理此事。

书 记郭显然是不同意，正在犹豫着找借口回绝，老副书记表示了态度，说他会尽全力去办这件事的，并要求书记郭马上把具体办理大清查工作的保卫和政工两个处的处 长找来，当面告诉他们，这是书记会上的决定，要两个处长服从老副书记的指挥。这个要求真的使书记郭犹豫了，又是二十分钟的争论，最后书记郭再也找不出理由 反对了，只好打电话把两位处长请了来，我向他们宣布了这个决定后，又说：「从现在开始，一切有关清查的工作由老副书记负责，你们直接向他汇报工作并听取他 的指示。」然后问他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他们两个人看着书记郭，书记郭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两个人退出去了。

老 副书记站了起来，说：「新年快到了，既然由我负责这个工作，我看最好我马上开始，我失陪了。我也站起来说：年底是我最忙的时间，如果没有别的事了，我必须 回去工作了。」书记郭也马上说要去安排明天的会面，于是会议结束。那天傍晚我很高兴，相信老副书记是会把那几十个人保释出来的。回到家，我有说有笑地吃过 饭，与女儿玩，也沉沉地睡了一个好觉。

照 例的一个上午的忙碌。十一点钟左右，军方的上司们来了。我始终不明白，共产党总是说要反对不良作风，可每次上级来都是在午饭前，于是形成的惯例是寒暄、喝 茶、抽烟，然后是酒宴款待，酒足饭饱之后，又是喝茶、抽烟，最后才开始谈工作。且不论这种作风正确与否，书记郭忙坏了，几次去后勤处和食堂修改菜单，说是 要符合将军级别的客饭标准，又跑到食堂去监督每一道菜。后勤处长给我打来电话，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真的有将军要来，我回答他，并让他按书记郭的意 思去做。后来据说书记郭知道这件事，对后勤处长十分不满意，说我独揽大权，搞得他无法工作。

这 次来的，又是那位中将政委，带着军政治部主任和军后勤部长，包括王大校在内的两位大校和四名上校，好像浩浩荡荡地开来一支军队，午饭时又整整坐满了两桌 人。不知书记郭是从哪儿打听来的，中将的伙食标准是每餐十二道菜，为表示欢迎，他搞了十六道菜，更不知道又是从哪里找来了几个漂亮的女孩子当招待。这顿豪 华午餐用了一个半小时，把价值三百元一瓶的茅台酒喝干五瓶。好不容易这套过程走完，回到了接待室坐下，又是一阵聊天后才开始了公事。政委先讲了话，首先讲 到的是这个集团军的军长是现在中央军委秘书长洪学智上将的老部下、老战友，这两个人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四十多年前，洪学智上将又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也是邓小 平一手提拔起来的人，言外之意就是告诉我们，无论三九军想干什么，都可以得到中央和邓小平本人的直接支持。

接 下来，他讲了一件似乎比较重要的事。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也提出要收编我们，而洪学智上将的看法是，我们这个所可以同时受到双重领导，接受一些科工委的研究 项目，同时科工委也会给我们拨一部分钱的。这个意思是在告诉我们，两个大部门在争夺我们，我们是可以得到两个部门的拨款的。今后在资金方面是绝对不成问题 的，但至于今后会怎么样，政委讲，他现在不敢预测，但他说很可能我们会归属于国防科工委的，但现在我们属于三九军，明年科工委会介入的。接下来，他宣布了 军党委的任命，书记郭仍担任党委书记，王大校担任所长，我仍担任副所长并兼任第一副书记，老副书记为党委第 二副书记，阿宗仍担任副所长，下属各部门负责人仍保持原职务不变。接下来，他又提到，我们所的党政部门要补充一些人，将由三九军选派进来，所里的两个实验 厂要扩大，也将由三九军选派技术人员来充实。他说：「希望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个所将不是完全依靠上级拨款了，也可以产生利润，自己解决一部分资金，最后达 到自给自足的目的。」

他 表示了对这个研究所在过去和现在的工作成绩和贡献给予肯定和赞扬，又特别提到了这个所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够保持正常的运转、毫不混乱的局面，首先 应该归功于我们四个人团结镇定、管理有方，接着又说，据他的了解，

这个所的全体职工和研究人员都是最好的，每年出现的大量的研究新成绩，无疑是对四个现代 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希望我们安定人心，一切按照我们的运作方式继续进行。军队是不会干预的，最后他提到，从明年一月一日开始，所有职工的工资待遇将按照 军队的现行工资标准执行，讲到这里，他说：「面对这么好的专家们、教授们，和这么好的职工们，我问我自己，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我是没有权力去提升他们 的工资和待遇的，我们能做的就是马上执行军队的工资标准，让每个人每月收入多一点钱，我会感到高兴些的。」书记郭带头鼓起了掌，政委摆了一下手，看了我一 眼后又继续说：「已经听到了很多关于这个人的事了，年轻、有能力，又有专业，正是我们需要的，他一直是代行所长的职务，虽然我们派来了王大校担任所长，但 王大校刚来，不熟悉这里的工作，他又一直是做政治工作的，在行政管理上是需要时间去学习的，所以，军党委决定，仍由他代理所长工作。」

说到这里，他转向了我，对我说：「放心地去干你的工作，不会有人干涉你的工作的，王大校会全力支持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来找我，你看怎么样？」他笑着看着我，又伸出一只手，我只好站起来与他握了一下，但他握住我的手没放开，又说：「我会很快地安排个时间，请你去我那里，让我们好好聊聊，互相了解一下，你同意吗？」我点点头。

接 下来是两位少将，两位大校和书记郭说话，无非都是表示坚决拥护军党委的决定和政委刚讲的话，并坚决地相信这个所在收编后会比以前更好，更有发展。接下来是 老副书记，他很冷淡地感谢了军队对他的任命，但他坚持自己的年龄大了，身体不好，希望军队考虑让他提前退休。政治部主任马上挽留，希望老副书记再多工作几 年。接下来是阿宗表示态度，阿宗到底是个文人，嬉笑怒骂般的一篇话，竟使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明白他说的究竟是什么。我赶紧带头鼓掌，也知道该轮到我表示态度 了，所以我没等他们点我的名，马上就提到职工们有顾虑，在收编一事上始终有许多问题不明白，希望军队派人来向职工们解释，而不要马上就认为这些职工有问 题，或是反党，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变动，光靠本所党委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很快地做好职工们的思想工作的，需要军队派负责人来协助的。然后提到再有十多天，一切 年底的工作将会结束，各项总结报告、报表会及时地交上去的，至于明年的预算拨款一事，我希望现在就得到明确的指示。

政 委马上说：「我会让后勤部立即批准预算，并马上拨款的，绝不会影响你们的工作的。」后勤部长马上点头表示并保证。政委又问我年底职工们有没有奖金，我刚点 了一下头，他马上又说：「要想办法尽量多发一些。」又转身对王大校说，要他在拨款和奖金两件事上，一定要全力配合我，又对政治部主任说：「由你负责，多带 些人来，今后的一段时间里，你要常来，配合党委做好职工们的思想工作。」下午三点多钟，军人们走了，书记郭似乎还要继续召开个什么会，讨论如何执行政委的 指示。我拒绝了，理由是年底已近，我是最忙的人，千万

不要打扰我。老副书记说根据政委的指示，要安定人心，他必须加紧保释工作。阿宗提到要去核实几个数 字，只好请王大校和书记郭讨论政委的指示，大校点头，表示赞成。

我 又一头栽进了那堆报告、总结、数字和报表中，至于书记郭和大校又召开了多少会，和如何去解答职工们的问题，我一概不知。据说，政治部的那位少将主任带了不 少人来帮忙，他本人也几乎天天来，并在大、小会上也没少说话。但据阿宗、阿同说，职工们的反应仍然是冷淡的。政治部主任来过我的办公室两次，第一次他没有 惊动我，他看到了我的办公桌上那一堆档，进进出出的人和坐在沙发上等着和我说话的人。阿同这段时间一直在我办公室里工作，帮助我查对和核实数字，我又把阿 生也请了来。他写的一手好文章，帮我改写一些部门交上来的报告。少将明白了我为什么没有参加那些大大小小的会议。第二次，他来是在午饭时间，想邀我一起参 加书记郭为他准备的午宴招待。我正在和老君、 阿同、胖处长边吃饭，边商量奖金的事，他坐下来马上表示他将向政委报告并讨论如何改变我的工作环境，并说政委会同意他给我派一位办公室主任和几名办公人员 来缓解我的工作压力的。我立即谢绝，并告诉他阿同现在正代理着行政办公室主任的工作，我也考虑到阿同有党委办公室的工作，所以准备委任阿生做行政办公室副 主任。少将似乎是同意了，但马上提到应该至少给我增加一名秘书和两个办公室人员。我告诉他，我也有过这个打

算， 并已有了人选。一支烟抽完后，他站起来告辞，握着我的手，又说：「我会马上向政委报告的，一定要尽快地改善你的工作条件。」令我没想到的是，两天后，王大 校带着一位少校军官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介绍说这位少校是派来担任行政办公室主任的。我愣了一下，只好表示欢迎，接着我马上提到这一摊的工作事情多又杂，新 主任需要时间熟悉和适应。为了不影响工作，我打算请阿同担任我的助理，阿生担任副主任。出乎我意料的是，大校马上就同意，我对他说：「你是所长，你应找他 们两个人谈话。他们同意后，你再通知我，然后签发档公布出去，就合乎手续了。」大校说马上办，果然在第二天下班前，对三个人的任命公布出来。

离 年底一天一天近了，我的办公桌上的那一堆东西终于被消灭，并及时地全部交了上去。大校又给我带来了政委的口讯，说是关于预算拨款一事，将在一月中旬先拨百 分之三十，以后每个季度处拨款，这等于说，我们的预算是通过了，这使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一切事都办完了，只剩下发奖金一事还没有定。我把阿宗、阿同、胖 处长、老君请了来，共同商议到底发多少。政委的意思是尽量多发，当然是想以此收买人心了，我们已经积下了钱，那么就多发一些，让大家实惠一些，所以决定这 次奖金每人一百元。一个月后的春节，每人可以发到二百元。胖处长又提到了正在筹办年底的大聚餐的事，大家一致同意再多给胖处长拨些钱，尽量把宴会搞得好一些，让大家高兴一下。最后又决定，不妨让大家轻松一下，宴会和年终总结大会同时在二十九日举行。二十九号下午四点开总结大

会，一小时后举行宴会，然后十二月三十、三十一日和一月一日放假三天，让大家多休息一天，但各部门的负责人在三十号那天必须仍然按时来工作。

一 切该办的事都办完了。整整一个多月的忙碌过去了，我们都放松了一下，同时也感到疲劳。大家都坐在那里没有动，似乎都还想说些什么。阿同站起来说：「大家都 别走，那天招待军政委，书记郭让我买了不少的好香烟和好茶叶，我去拿点来，咱们也享受一下。」然后又对我说：「事情都办完了，你也不忙了，坐着别动，我们 都有话对你说。」

他转身出去了。我茫然地看着大家说：「怎么了？是不是我干错了什么事？」老君马上说：「不是，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干错什么事的。胖处长是个实在人，他接触的人也多，让他告诉你。」

我 转向了胖处长，胖处长说：「快两个月了，让收编这件事闹的人心不安，书记郭和王大校加上那个少将主任和他带来的一群政工人员召开了有大约一百次的大会小会 了，尽管他们说的天花乱坠，但到现在为止，职工们并不相信他们，表面上看是态度冷淡，可实际上人们的抗拒心理一点儿也没减少。原因很清楚，两个月了，无论 什么会上，你都没有参加。一个月一次的工作调度会上，你又绝口不提收编的事，职工们听不到你说话，不明白你是什么态度，于是传出了不少的猜想和谣言，说你 整天被军人包围着，干着军人让你干的事，更有人说你变了，不是从前的你了，现在的你是一心一意只想升官，出卖灵魂……」

我 打断了他，十分冒火地问：「这是谁说的？我干着我的事，我没干出任何出卖灵魂和出卖我的人格的事。我尽力的去抵制收编，但大势所趋，我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于是我尽我的所能保持这个所，在人事和权力的平衡上，我尽力的做了，至少到目前为止，所里还没有任何人被捕或遇上麻烦的，而且在七、八、九三个月里被捕的 人，已经保释出一半人来了……」

阿 宗笑着打断了我，说：「这些我们都知道，各部门的负责人们也都知道。我可以说，自从今年春天天安门的民主运动开始后，你开始建立威信了。在大屠杀后，你的 一系列的做法正式确立了你的威信，受到了真正的尊敬，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军队也不傻，他们也了解到了这一点，他们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去运转这个所，并且 有威信，受尊敬，这就是为什么在军队派了王大校当所长后，你的权力一点没受影响，仍代理所长工作。这一点，人们可以理解为王大校刚到任，还不熟悉这里。但 在党委里，第一副书记应该由所长兼任的，但大校却没

有，你仍兼任着，仅这一点就使书记郭大为不解，也不满，他一直认为你的权力过大。尤其在与军政委见面那天，政委又特别对你表示好感，这不仅使书记郭失望和妒恨你，同时也使大部份的职工认为是你促成的这次收编，是你出卖了这个所和全体职工，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阿 同回来了，递给我一支烟，转身沏茶时，他声调平稳地说：「我们都知道你反对收编，所以你不出席会议，也不说话。可到今天为止，军队已是下了大力气的宣传收 编后的好处，大势已去，收编已是定了的事。而且从下个月开始，每个职工的工资将增加二十几元到四十几元。面对着这么实际的好处，为什么职工们的态度仍是那 么冷淡呢？阿宗说的对，那就是你在这个所的威信，相当一部分的职工认为你对收编冷淡，于是他们也冷淡，还有一部分职工认为是你变了，出卖了大家，于是不仅 抗拒收编，而且恨你。对于这两部分的职工在今后军人的管理下，他们的处境很危险，同时也给了书记郭机会。」

我 似乎明白了，马上问道：「那我应该做什么呢？」老君说：「二十九号的大会，第一，你必须参加；第二，你必须讲话。至于讲什么，你当然知道了。就像我们刚才 提到的那些，这一年来，大家的经历太多了，心理和精神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人们需要安慰、平抚一下，至少心理上平静一下。同时让人们知道，你仍是 你，你没有变，这样会好一些的，同时也可以避免万一激怒了军方而召来他们的过激的行动，可就不好办了。」我点了一下头，还没说话，胖处长接着说：「就按你 平时在会上讲话的风格，另外不要避开民主运动、大屠杀和这次的收编，前两件事你处理得很好，职工们是满意的，在收编这件事上你也干了你该做的事，让大家知 道你现在的态度，应该是对的。」

阿 宗马上说：「让大家知道是对的，消除大家的猜疑，让大家心情舒畅一些，避免和军方发生任何不快。让我们希望明年再不要发生什么大事了，让我们团结一致，好 好工作一年，多出几项成绩，也让军方知道我们的实力而不敢小看我们，可能以后的日子我们会好过一些。」我完全明白了大家的意思，并真诚地感激他们对我的提 醒。

我 笑着说：「我实在是感激你们对我说了这些。我已明白，打算在二十九号的大会上作一个年终总结讲话。这两个多月来，他们说的太多了，也该我说几句话了。让大 家听几句舒心的话，我确实是这么想的，只是恐怕一个书记郭和一个大校，这一个小时时间还不够他俩占用呢，所以想尽力缩短我的内容……」

阿 同打断了我说：「不，你准备你该讲的内容，告诉我你需要多长时间。我想让书记郭先讲，给他时至十五分钟。大校第二，他说不出什么的，给他十分钟。剩下的时 间全给你，如果不够的话，大会再延长十分钟是没问题的，你讲话时是没人睡觉的。」他说完，大家都笑了，我喝了一口茶，笑着说：「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有 这么大的威信，我会尽力去安抚大家的情绪。阿宗说的对，希望明年不发生大事，我们实在太累了，对付不了这么多事了，幸亏有你们在帮助和支持我，否则我真不 知道该怎么办，恐怕只有出家做和尚一条路好走了。」说到这里，我以茶代酒，举起茶杯，与大家碰杯，共祝明年。

二 十九号大会上，我足足用去四十分钟的时间。首先列举出一连串的数字去说明，通过每一个人的辛勤工作，今年的工作任务是按计划完成了。接下来提到了这一年的 经历，再次地强调了经过了对十七种人的清查，本所至今尚未发现任何一个人是暴乱份子，对于死、伤和失踪人员的抚恤工作已经结束，基本上得到了家属们的满 意，至于错被抓走的几十个人，经过党委的努力，已有百分之四十的人被释放出来。对剩下的人的保释工作，仍将在老副书记的领导下继续进行。

接 下来，我提到这次的收编，我简单地讲述了一下这件事的发生的过程，坦白地说出了我的看法，提到军队的承诺和意图。我真心的希望全体职工留下来，让我们一起 在军队的帮助下，把这个研究所改变为一个又搞研究、又搞新产品的企业，最终过渡到完全自给自足、不需要上级拨款的单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目标，没有在 座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来实现的。

我 真诚地向每一个职工致谢，感激大家这一年中的辛勤工作和对我的支持。接下来，我十分直率地提到了本所的几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贪污、收回扣、占用公款和用 公款大吃大喝的坏风气。并提到这些都将列入明年的工作计划，继续追讨三百四十万元的公款，惩办贪污者，严格规章制度，杜绝坏风气。最后预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中健康愉快，工作顺利，合家欢乐。然后向全体职工鞠躬，结束我的讲话。使我没想到的是，全场爆发出持续很长时间的掌声。

我 已经坐下来，又被阿同拉到麦克风前，我用手势请大家停止鼓掌，待静下来后，我说：「福利处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迎新年宴会，我已经闻到了香味，口水也流出来 了，让我们结束这个会，我想大家和我一样都饿得不能再等了。」在一片笑声中，大会结束了。会场上响起了史特劳斯圆舞曲，胖处长和阿同指挥着一群人将一盘一 盘的菜端了上来，会场变成了宴会厅，气氛热烈起来。在阿同的安排下，书记郭、大校、我、老副书记和阿宗互相握手，碰杯，然后又共同向全场职工们举杯祝了 酒，宴会正式开始了。一群一群的人，端着酒杯，向我走

来，要与我碰杯。我马上站了起来，高兴地与每一个来到我面前的人碰杯，问候着。

我 看到阿宗和老副书记端着酒杯走到各个餐桌上，与大家敬酒、谈笑着。而书记郭和王大校的餐桌上却是冷清清的。我马上对坐在我旁边的阿生小声说：「快想个办 法，我得马上脱身。」阿生对他旁边的一个人说了一句什么，马上站了起来，拉着我离开了餐桌。向正在等着与我碰杯的人流走去，我一边与人们敬酒，一边被阿生 拉着，终于走到门口。

刚来到门外，又被一群一手拿着酒杯，一手夹着烟的职工围住了，阿生马上对大家说：「谢谢大家的好意，副所长实在是工作得太疲劳了，已经支持不住了，请大家帮我送他上车，他需要休息，谢谢！」人们让开了一条路，但大家又蜂拥着我走出了大楼。我走到汽车边，转过身来，向大家举起了酒杯祝酒，又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将酒杯递给了阿生，坐进了汽车。对阿生小声说：「对书记郭和大校解释一下。」阿生示意司机快开车，并对我说：「放心。」

车 子开出去了院子，我问司机吃过了没有。他笑着说：「干这个工作是不可以喝酒的，所以我只能拼命多吃。我看你是什么也没吃，酒也没喝，光是碰杯就碰了二十分 钟。看那个情形，我知道你得走，所以我吃饱了马上就把车子发动了，一直在等着你。」我笑了，开着玩笑说：「吃饱了的司机，拉着个饿肚子的官，这个世道有时 也真不公平。」

他 没有笑，很认真地对我说：「看看今天的大会，你讲话时，大家是那么认真地在听，又发自内心地鼓掌，大家都想和你碰碰杯、说句话，职工们是拥护你的，我也明 白了，威信不是靠吓唬、威胁、训斥或者许愿而建立的，你是以辛勤的工作、实事求是、主持公道才受到拥护的，给你开车，我都受到了尊敬。」我真诚地向他表示 了感谢。不到六点钟，我到了家。下车前我对司机讲，请他回去对阿宗讲，由于仍在戒严期间，宴会务必在七点半前结束，让大家尽早回家。司机答应着开车走了。

第 二天，由于放假，所里静静的，只有各部门负责人在值班。实际上是没什么事可做的，只是由于时局不平静，怕突然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也是不得已而要求负责人们 牺牲一天的休假。在办公室里，我正想给自己沏杯茶，发现暖壶是空的。我拿起暖壶要去打点开水回来，阿生推门进来，告诉我不少人正在阿宗的办公室里聊天，让 我也过去。我随着他来到了阿宗的办公室，一进门就受到一阵

哄笑声，有说我逃席的，说我不打招呼就跑了，又说要罚我的……，阿同、阿军、胖处长、老君都在。 我坐下后，问阿生昨天是不是对书记郭和大校解释过了。阿同马上详细的叙述了一切，大意就是他们两个人并不介意我的离开，阿宗和阿同又引着几个人向他们俩人 敬酒，一切正常，并无不愉快的事发生。我向阿宗和阿同道了谢。

老 君慢慢地说：「不愉快是一定有的。昨天你的讲话就使有些人不愉快的，可那是全所一年工作的总结，只有你能做这个总结，别人是无法代替的。你逃席走了是对 的，避免不必要的不愉快。」我笑着说：「我是饿着肚子走的，那么丰盛的一桌菜，竟没时间去尝到一口。」胖处长说：「这几个月来，我才真正发现咱们这个所实 在是人才济济。别的不提，自从收编工作开始以来，几乎每天酒席不断，又是将军宴、又是特殊客饭的，全都备办的十分得体。咱们这里有三个厨师，无论什么标准 的酒席都能做，昨天的宴会上，可以说每一道菜都做的相当有水平的。我是为了防备万一突然又来了军人，所以准备 的多，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让厨房给你准备几个菜。」我说：「既然这样，我们中午聚餐，这一年多来，如果没有你们，没有这些处长主任们的共同努力，我们是度 不过这一个又一个难关的。中午大家聚聚，都说说心里话，多少也痛快些。」大家都同意。胖处长马上出去安排了，我们仍在那里喝茶、抽烟，说笑着。可以看得出 每个人都很珍惜这一刻；也难怪，整年的忙碌，确实也难得有这一刻。

正 当我们轻松地聊天时，门外有人敲门，进来的是那位少校行政主任。他对我说：「刚接到军政委的电话，问你今天是否有空，政委想请你到他那里去坐坐。」我刚要 拒绝，阿同马上说：「今天没什么事，副所长可以去，什么时候去？」少校说：「政委的意思是最好现在，由我陪副所长去。」坐在我旁边的阿宗轻轻地推了我一 下，又向我点了一下头。我只好对少校说：「请你通知一下司机，我马上下去。」少校出去了。

我 对大家说：「不知道又有什么事，希望没有坏事才好。」阿宗认为不会有事，政委曾说过要请我去的，正好利用这个新年的机会，也不过是联络感情而已。老君也认 为如此，并对我说：「他们需要搞好关系，你上不可以拒绝的。为了今后，你也要做出笑脸，多磕头，少说话。一般来讲，在这个时候，除非有重大的事，一般是不 谈公事的。」坐在车里，我问少校书记郭和王大校是不是已经先走了。少校的回答是：「政委只邀请我。」同时又告诉我大校和书记郭今天没来上班。

政 委办公室在海淀区的一座小楼房里，看来这里也是他来北京后的下榻处。楼下是一间相当大的客厅，足足摆放着三套沙发。一位年轻的女中尉可能是个女秘

书，招待 我坐下，又端来了茶和烟，并告诉我政委会马上下来见我。我刚点燃了烟，政委从楼上下来了，他没有穿军装，只是穿着家常的衣服和便鞋，加上他白白胖胖的，使 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在机关工作的老职员。他笑着与我握了手表示着欢迎。

坐 下后，他提到虽然只见我几面，但他已听到不少关于我的事，所以请我来，希望我们之间加深理解，而且能成为朋友。他说：「我喜欢与年轻人交朋友，人们说年龄 的差异通常形成了代沟，阻碍了两代人之间的交流，我是不相信的。老了就多向年轻人学习，多交青年朋友，自己也会变得年轻了。你说对不对呀？」他大声地笑了 起来。这种家例程的交谈又约持续了二十分钟。最后我把话题转到近来的工作上，向他报告了年终的各项总结工作，明年的计划和工作任务、财务上的一些数字等 等，又提到根据他的指示，奖金已经发了，而且比原计划多发了一倍。最后告诉他昨天的职工大会和聚餐的情形。

他 注意地听着，特别对昨天的聚餐感兴趣，问我职工们的情绪如何，我并没有回答他的这个问题，而他似乎并未介意，只是笑着对我说：「我相信你，一定是被一群人 包围着敬酒，什么也没吃，对不？」我笑着点了点头。他说：「今天请你和我一起吃午饭，尝尝我厨师的手艺。」我刚要谢绝。他笑着用手制止了我，说：「以后， 你要学会服从命令的。今天，你留下，和我一起吃午饭，就算是我给你的第一个命令，你应该说『是』才对。」说到这里，他笑着看着我。

我 没有说是，而是直率地对他说：「这正是使我们感到不安的事。自从收编以来，我们担心的事就是能不能适应军队的管理。科学和学术上的事，一般都不是凭着长官 的一道命令就可以解决的，这里面是有理论、有逻辑、也有规律的，必须依从这些去研究和寻找出结果。过了年，我就四十岁了，让一个四十岁的人再去当兵，学会 服从命令，我恐怕是不容易了。」政委笑了起来，说：「我喜欢你的直率，放心吧，我们是不会按照军队的方式去管理收编单位的，至少现在是不会的。另外我请你 吃饭，即使是个命令，也不是个坏命令吧？」我没说话，只是点了一下头，我不想与他争论。这种人养尊处优、自以为是惯了，而且又固执、愚蠢得不得了。

他 接着说：「政治部主任和后勤部长马上就来，因王大校是从政治部派到你们那里去的，所以暂时你们归政治部领导，以后军党委会再次做出更适当的安排的。后勤部 长是一位为党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人也是很好的，你们以后会经常接触的。这一次就是他在开支很紧张的情况下，一下子批给你们六百万元的。」我马上问：「这笔 钱什么时候能拨下来？」他说在一月中旬我们会收到的。我们正

说着话，两位少将进来，握手寒暄后，政委笑着对我说：「今天你是客人，我请了他们两个人来做 陪。」然后指着政治部主任对我说：他就是你的直接上司。

他 又指着后勤部长对我介绍说，他是掌管全军的财务和物资的，这次对我们的拨款就是他经手办理的。我马上对部长表示感谢。政治部主任对我说：「我们反复地考察 了你们几个负责人，最后一致的看法是，这个研究所可以没有书记郭，也可以没有老副书记，但绝不可以没有你。我们把你向政委做了特别报告，上次我们和政委去 你们那里，政委对你的印象十分好。以后，我们曾再次的研究了你们所的情况，我对政委说过，不如直接委任王大校为所党委书记，你作所长。政委也很同意，但考虑到任命刚下不久，又下新任命，怕引起混乱，所以政委指示，到明年适当的时候，再下新任命。今天政委又特地请你来吃饭，你应该明白这个意思，千万不要辜负首长的期望呀。」

他 刚说完，后勤部长接上来说：「政委特别告诉我，今后对你们需要的资金、物资一定要优先发放，还要我时常到你们那里去，及时发现你们的需要。当然了，你们的 仪器设备我们没有，但其它方面，尤其是办公生活用品，我们是充足的。任何特殊需要，告诉我，我会想办法满足你们。」政委笑着对我说：「怎么样？你有任何要 求、问题或是建议，现在就当着我的面向他们提出来，我马上下令让他们去做，你看好不好？」我笑着表示感谢。但是，我深深地明白，他们这是又在用那一套封官 许愿的办法迫使我就范，完全听从他们的指挥。

从他们的谈话中看，他们认为他们了解我，其实他们并不了解的。我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不是他们认为的那种人。我发现他们三个人正在看着我，显然是在期待着我说出他们已经预料到的那一套话来。

但 我没有。我用十分认真的态度对他们说：「我是个实事求是的人，我请求三位首长从实际出发考虑选派适当的干部接替我的工作，我是个搞学术研究的人，所以做事 过份认真，我不懂官场上的事，更不善于交往上的辞令，而且也没有能力去应付上下左右的人事关系。这些弱点，不但在工作上会造成损失，同时也使不少的人恨 我，而我自己竟不知是因为什么。在我担任这个工作之前，我曾是个出色的研究人员，做出过成绩和贡献，我爱我的专业，更是渴望着再回到专业上去。我认为专业 人员改行做行政工作，本身就是人才上的浪费，对四个现代化也是不利的。所以我真诚地请求首长选派干部接替我的工作，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回到专业上去，我会 做出更大的成绩来。」我说完后，出现一个小小的冷场局面。这一番话是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

仅几秒钟，政委打破冷场，他笑着说：「今天是怎么了？怎么有人跑到我这里来辞职了？」他转向了两个少将说：「这件事，你们两个是要负责任的。」两个少将也笑了起来，似乎我刚讲完了一个笑话。我马上又认真地说：「我讲的都是实话，我一直都在寻找机会，向首长们提出这个请求，如果需要的话，我会马上写来书面报告的。」两位少将再次地出声地笑起来。

我 感到被侮辱，于是有些生气了。政委摆了一下手，笑声停止。他说：「我这一辈子都工作在军队，所以说惯了『是』，也听惯了『是』，几十年了，还是第一次听到 有人说『不』，而且还提出一大堆理由来。好吧，你有你的理由，可是，我对你的任命已经下了，给我一些时间，让我重新考虑你的要求，好不好？」我正要说什 么。那个女秘书进来了，对政委说午餐已经就绪，政委马上打断话题，我们在女秘书的引导下，走到这间大客厅后面的餐厅。一张大圆桌上已经摆满了盘子，正散发 着诱人的香气。

我 被安排坐在了政委的旁边，政委笑着问女秘书是否多备了几个菜？有客人。女秘书恭敬地回答：「是，政委，已经多准备了四个菜，如果不够，我去告诉厨房再 添。」我马上对政委说：「已是太丰富了，千万不要添了。」政委笑着对秘书说：「告诉厨房，再加两个他们的拿手菜来。」女秘书答应着走了。后勤部长说：「我 最喜欢来政委这里吃饭，每次都吃个酒足饭饱的。」他又问我：「你喜欢喝什么酒？政委这里名酒极多，随你想喝什么都有的。」政治部主任马上说：「政委爱喝茅 台，我也爱喝茅台。」我只好说：「茅台太好了。」于是两瓶茅台被摆上了桌子。那一天是我平生第一次尝到燕窝、鱼翅、鲍鱼这些名贵的东西，好酒好菜立时使三 位将军的心情大好，政委正讲着一个愚蠢的笑话。

我 看了一眼窗外，天阴了起来，空中正飘着零星的雪花。屋里很暖，但我却突然打了个冷战，在这个戒备森严的地方，我正与一群屠杀人民、妇女和儿童的凶手们共进 着一顿至少要花费一千元的午餐。我怎么了？为什么要来这里？我不认识他们，为什么要请我吃饭？难道还要我帮他们杀人？那十七具尸体，还有阿朋的断成两截的 尸体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酒是那么苦辣，在的嘴里打转，竟咽不下去。我拿起餐巾，将酒吐在餐巾上，强烈的酒气又使我咳嗽起来，赶紧用餐 巾捂住了嘴。我的脸一定是由于咳嗽而红了起来，政委很关心地说：「是不是不舒服？不要喝酒了，多吃点菜吧。」我马上表示我不会喝酒，加上一个月的劳累，身体感到不适。

政 治部主任马上对政委说：「他说的是实话，我看到过每次他在工作时的情形，就好像是作战指挥部一样繁忙，所以我给他派了一名行政副主任去。」说到这里，他对 我说：「不要喝了，要不要去躺一会儿？」我摇了摇头说：「我已是酒足

饭饱了，请首长们慢用，我是有些支持不住了，我要告退了。」后勤部长马上说：「政委还 没吃完，你怎么能走呢？！再坐一会儿，陪政委吃完饭再走。」我还没说话，就听政委说：「我听到不止一个人讲过这个人工作起来不要命的精神。我喜欢，但是看 起来，他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你们两个部门考虑给他派一个好秘书，兼顾起照料他的生活和工作……」听他说到这里，我马上说：「这倒不需要了，感谢首长的 关心，我的工作也只是忙在年底的这段时间，过了这段时间就正常了，加上天气不太好，所以我可能是受凉了。」政委点了一下头，说：「那我就不留你了，回去休 息吧。」

在 站起来的同时，我有意地摇晃了一下身体，表示确实也喝多了。我又向他们道歉我的失态，他们送我到客厅，我请他们留步，在与政委握手道别时，我又再次的请求 他考虑我在饭前提出的辞职要求。政委没有说话，只是笑着点了一下头，对已经走进来，正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的少校行政主任说：「路上小心照顾所长。」少校敬 礼说是后，过来搀扶我，走了出来，坐进汽车。汽车开动后，少校问我是回家还是回所里。我说回所里看看，如果没事再回家。我做出醉态对少校说，我很荣幸能与 将军们共进午餐，又夸赞了将军们的好酒量，又抱歉地提到我喝多失态了，请他有机会在将军们面前替我道歉。

少 校马上毕恭毕敬地对我说，这不需要道歉的，军队作风历来如此，将军们不但不会认为我失礼，反而会认为我直爽实在，而且以后会另眼看待我的。他又说：「在军 队里，对职务的称呼是很严格的，政委刚才称呼你为所长，这就是个好兆头。」我嘴上说我没注意到，但是那时在政委说这话的时候，确实使我的心往下沉了一下。

回 到所里，看到聚餐还在进行。我支开了少校参加进来，与大家说笑着，互相敬酒，又品尝每一道菜，极力地赞扬着厨师的技艺，最后与大家回顾了这一年的经历，每 个人都叹了口气。我真诚地感激了大家的团结合作和辛苦的工作，至于明年如何，没有人表示乐观，每个人都希望明年不要发生这么多的事才好。尽管如此，我还是 向大家祝愿新年快乐，但盼明年一切顺利些。聚餐结束了，我对大家说都早点回家吧，我与每个人握手，有几个人还拥抱了我，不少人在与我握手的同时还用手在我 的肩上和胳膊上拍了拍。可怜的中国人啊，永远怀有美好的愿望，可又时时在挣扎忍受。

从 新年到春节的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事情似乎还说不上太坏。军队的第一笔拨款到了，各项工作开展的顺利，职工们的工资也按照军队的工资标准执行了，被书记郭送 进监狱的人已保释出来一大部份，每个职工又得到了二百元奖金。刽子手李鹏宣布对北京的戒严令取消了，顿时满街的军人也消失了。只有人事处长

却急得疯，几次 找我商量那些被不断派来的军人家属们的工作安排问题，总人数已接近一百人。每个党政办公室都已塞满了人，仍有几十个人无法安排。我责成后勤、福利两处去安 排这些人的工作。不久，两处的处长也跑来诉苦说人太多，实在没那么多的工作可以安排。这些家属们是军官太太，都想坐办公室，尽管有几个部门需要人，但这些 太太们都不愿意去。

我 没办法了，请王大校帮忙，但看起来大校也无法对付这几个太太们，又把球踢了回来。我只好让人事处强行把这些人分派到实验工厂、运输队、食堂和清洁队去工 作。福利处又新设立了为职工日托小孩子的服务，解决了十多个人的工作。我把这些部门的负责人找来，要求他们不要把拒绝接受新人，并派有经验的人教给他们技 术，即使如此，还是几乎每天都有手持公文的新人来报导。我要求大校去对上级讲，我们已经承受不住了，大校对我耸耸肩表示，他也没办法。

第十七章　这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正 当我们焦头烂额地应付着这股人潮的时候，一份来自书记郭的文件送到了我的办公桌上。这份档是发于国防科工委给第三十九军政治部的，政治部批示送到我们这 里，内容是关于一个三十岁的叫阿红的女人安排工作的事，文件上盖了机密的印章，政治部的批示是：「监督劳动」。书记郭批示派做体力劳动，责成保卫处监督。 这个阿红的档案没有转来，我一时无法知道这个女人究竟是因为什么而遭贬的。我到来了保卫处长，请他安排这个女人的工作。我对这事有过怀疑，也想到过把这个 女人找来谈话，但由于忙忙碌碌的一直没有时间，所以也就把这件事放下了。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秘书进来告诉我，有一个叫阿红的女清洁工要见我。我马上就想 到这一定就是那个阿红。告诉秘书请她进来。

这 是一个刚进中年的女人，身材比一般女人高，穿着一身工作服，头上戴着帽子，盖住了她的头发，只露出白净、大气的脸，这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我请她坐下，问她 有什么事。她很谨慎地看了一下四周，然后轻声说：「可能我不该到这里来，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不知该怎么办。有人对我说，让我来找你，你会帮助我的，我没 想到你会接见我，希望不会因为我来这里而给你找麻烦的。」我马上说：「任何一个在这里工作的职工，我都接待，放心吧，没有麻烦的。」她犹豫了一下，仍是轻 声地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我是个犯了错误

的人，被下放到这里监督劳动的，尽管我是个女人，可我是个人，至少目前我还不是个犯人，我不应该受到这 种对待的……」

说 到这里，她似乎要哭，但强忍着没有哭出来。我赶紧站了起来，给她倒了杯水，并请她坐到沙发上，我对她说：「我们这里不是监狱，妳也不是犯人。如果有人侵犯 妳，请告诉我是谁，我不允许这种事发生在这里。」看来，我的话使她放心，她端起水杯喝一口水，然后告诉我自从她来到这里后所发生的事。」

她 来到这里，就去了保卫处报到。当天就被派去食堂作清洁工，保卫处长要求她每天上班后和下班前两次去保卫处报告，接受监督和训练。在第四天的上午，保卫处长 要她去书记郭的办公室谈话，她去了。谈话持续了一个小时，从她个人到家庭，又从生活到工作，最后书记郭问起了她遭贬的原因。由于她曾被严厉的命令过，绝不 准对任何人提出她的案情，所以只好对书记郭说：「如果你实在想知道的话，可以去国防科工委查档案。」书记郭说他早已查过了，只是想听听阿红本人的说法。书 记郭并且说：「我知道军队内部是很黑暗的，像妳这样漂亮的女人是很容易惹出是非来的。」书记郭又安慰她，说他会照顾她的，又说厨房的工作很累，让她不要去厨房了，每天只清理书记郭的办公室。

说 到这里，书记郭开始对她动手动脚。阿红挣扎抵抗着，好不容易跑到门口，对书记郭说：「谢谢你的好意，我想我还是去厨房工作好。」说完便跑了出去。当天下 午，她被保卫处长提前召去。在办公室里，她被保卫处长严厉地训斥着，并强迫她跪在地上承认违抗上级、不服从工作安排。不知保卫处长当时是为什么竟是如此的 愤怒，竟用一只手揪住她的头发拼命摇动，又用另一只手握拳，在她面前挥舞着，直到阿红保证明天去书记郭的办公室上班，才被允许站起来。

从 那以后的两个星期里，阿红在书记郭的办公室里，除去遭受书记郭的侵犯以外，根本无事可做。每次当她挣脱书记郭的侵犯后，则立即被叫到保卫处长的办公室，强 迫她跪在地上承认错误。由于她的拒绝，她四次被保卫处长将她的双手反绑在背后，并捆上了她的双脚，长时间地跪在水泥地面上。一个多星期前，作为惩罚，阿红 被派去清扫全楼的厕所。但书记郭并没有放弃，三次在厕所里调戏她，但均未得逞。而第三次就发生在昨天，书记郭又遭到激烈的反抗后，竟然狠狠地向阿红脸上打 了一巴掌。阿红当即晕倒在地，在她清醒后，又被闯进来的保卫处长拉到办公室去，再次把她捆绑起来，跪在地上达两个多小时，听着保卫处长的嚎叫。昨天晚上， 阿红几乎考虑了一夜，才决定今天来找我。

听了阿红的话，我并不吃惊，书记郭在这方面的丑闻一直是不断的。据说全所上下不少于二十个女人都与书记郭有过性关系。并用公家派的车送不少女人去医院打胎。但令我震怒的是保卫处长的所为。

几 十年来所谓的政治运动不断，一方面造成上亿人惨死，另一方面也造就出一批嗜血的魔鬼，把整人、折磨人当成生活的乐趣和刺激，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机会去满足 他们的虐待狂欲。这种事竟然发生在科学的殿堂里，光天化日下对一个女人进行捆绑、体罚，以逼迫她去满足一个畜生的兽欲，这让人不能容忍。我打电话把后勤处 长找了来，问他能不能把阿红暂时安排在外面的仓库里工作一段时间，同时尽量不要让人知道。后勤处长看阿红一眼，似乎马上明白了，一口答应下来，带阿红走 了。

我 分别与老副书记和大校谈到阿红的事，并主张召开党委会，要书记郭在会上做出检查和保证。同时提出撤销保卫处长的职务。王大校主张不要召开党委会，只开书记 会，他也参加。我和老副书记同意。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我们在书记郭的办公室里，进行了一场唇枪舌剑的争论。两个小时后，书记郭软了下来，检讨他的错误，并 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然后又讨论了保卫处长的问题，又是一番激烈的争论后，在大校的主张下，将保卫处长撤职，并按党纪给其记大过处分。在讨论新的保 卫处长的人选时，大校表示，军队会马上派一个人来接替。看得出来，书记郭是明显地不满了，他声音不高，但却是很强硬地说：「本所人才济济，并不缺乏保卫处 长人选。」大校马上说：「我的这个提议是为了党委内部不出现派系，别忘了，我们都是为党工作，不允许本位主义思想的。」书记郭还要说什么，但老副书记马上 表示同意。我也反对大校这个提议，但同时也明白老副书记同意的原因；书记郭把本所出卖给了军队，自以为对军队立了大功，可军队并不买他的账，同样抓住机会 削弱他的权势，为防止节外生枝，我也表示同意，于是也通过了。

散 会后，老副书记拉我去他的办公室，关上门后低声对我说：「以前是党委书记说了算，党领导一切。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又提出党政分工，但党领导一切说法仍没有 变，所以你的工作仍十分难做。现在又是军队收编，等于是党政军都在抓权，事情就更复杂。我也看出来了，书记郭出卖了这个所，但他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王大校 早晚会取代书记郭的职务的，所以大校才会这么痛快地同意处罚保卫处长，就是要在党委里安插自己人。我想你也明白这一点的。」

我 点了点头，他又说：「我想我可能办了件蠢事。我没告诉你，我已向军方递交了退休报告。从今天的情形看，我退休，军队会马上派个副书记来的，对你就更不利 了。我建议你今后要在人事安排上多用心，不要再想现在这个样子，把

精力都用在工作上，你会吃亏的。」我明白他说的都是实话，马上劝他放弃退休的打算，至少 再帮我一到两年，并说如果书记郭和军队完全控制党委的话，我绝对无法工作。

如 果老副书记坚持退休，我也想马上打报告请求辞职。我问他：「如果我们拱手把这个所送给书记郭和军队的话，你可以想象将会是什么情形的。」他叹了口气，半天 才说：「实际上在这种情形下，我是同意你辞去这个职务的，但肯定是不容易的。我去想办法收回我的退休报告，争取再帮你一段时间，把几件该办的事办完了，你 看呢？」我马上说：「你不要收回你的退休报告，刚才大校已经提到派系的问题，我看还是我出面说服党委的几个成员，写一份挽留你的报告，我想阿同是可以把这 事办好的。」他想了一下，终于点了一下头。我握住他的手表示感谢，他看着我，说：「你也要想想自己的今后呀。」我表示，我会找个时机提出辞职。

刚进入三月份，王大校宣布了一道命令，把所里的平静又打乱了。命令中说，从四月一日起， 全所职工必须身着军服上班。从现在起，政工、人事两处将根据每个职工现任的工作和职务评定军衔。我马上去找大校，问他是不是有这个必要。他的回答是干脆 的：「这是规定。」我对他说：「所里刚刚恢复了平静，又出来了这件事，至少又是一个月职工没情绪工作。今年的工作量大，任务很重，我不希望任何事打扰这里 的正常工作，你最好去听听职工们的意见。」他没说话，但似乎是在考虑我的建议。几天后，大校来找我，提到他在职工中做了调查，坚决反对穿军装的人占三分之 一，拥护的人也占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的职工不表示态度。他认为不表示态度就是同意。我摇摇头对他说：「我认为不表示态度实际上就是不同意，我没有表 示过态度，也没有人问过我的看法，可我是不同意的。一个与军事根本无关的研究机构被收编了，这本身就令人不可思议，又要职工穿上军服，下一步又是什么呢？ 难道把我们派出去打仗？」

大 校没有说话，而是交给了我一份名单。这是一份一百八十多个人的名单，在七十多人的名字上都打有记号。大校解释说，这是一份退休人员的名单，打有记号的七十 多人属于暴乱嫌疑份子。需要进一步审查，暂时是不符合穿军服的条件的，要待审查清楚后才可以决定。他让我看一下名单，过两天我们再仔细讨论。我仔细看过这 份名单后，竟气得手都抖了起来。在退休名单中，不但有老副书记，而且还有老君在内的十几名正副处长和正副主任，其中还包括几十位老专家和工程师，那三十几 位督导员也在退休名单上。在审查名单上，第一名就是阿宗，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在去年书记郭第一份一百三十九个人要送监狱的名单中，凡是被我否定的人，都在这份名单上。

我 立即把阿同找来，让他看了后，问他是什么看法。阿同说：「最近两个多月来，总共有将近一百八十名军官家属和军人被派来这里工作，仅工资的开支每个月就增加 了五、六万块钱，让一批人退休也是他们不得已的做法。但是这一次他们太过份了，让有用的人和贪污犯全退了休，今后这么多工作让谁来做？那三百四十万元又找 谁去要？这完全是书记郭的意图。我们必须公开的据理力争，否则所里的损失就大了。」

我 问他，我们能不能全部推翻这个名单？他摇了一下头，说：「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在一些人的具体的事上去争，保住一批人。他们又会拿出另一份名单，反正退 休人数要和进来的人数大致相等，他们才会罢手。大校现在是站在你和书记郭的中间，你应该去向大校说出你的意图，大校会在你和书记郭之间搞个平衡的。他的分 析是对的，我们赶紧坐下来，按照这个名单一个一个的分析，要赶快向大校提出我们的看法。」

这 是我第一次来大校的办公室，真没想到竟布置得这么漂亮，地上还铺着一张大地毯。看来像是他的秘书的两个女军人又沏茶，又点烟的，然后悄悄地退出去，屋里只 剩下大校、书记郭、老副书记和我。大校请我们发表对这两份名单的看法。书记郭第一个表示他完全同意，没有任何异议。在平时书记郭说完后，我都是请老副书记 先说，以表示我对他的尊敬。但今天我是在书记郭刚说完后，马上就提出了我的看法。首先我提出的是，在当前正是大批的军官家属和军人如流水般地调进来的时 候，竟让十几位工作能力极强、又有着丰富经验的行政主要负责干部退休，这是不符合适宜的。

我 拿财务处长老君为例，提到老君是一个有着将近四十年工作经验的会计师，又是全所唯一的一位持有高级财务师证书的人，按照现行的政策，对于这些高级专业人员 即使到了退休年龄，单位是可以以每月多加补助金的方式去挽留他们多工作几年的。几十位老专家、老工程师们目前都有自己的专题研究，突然让他们退休，这几十 个正在进行的专题怎么办，钱已花了，没搞完，这个项目的损失谁来承担，谁又去继续完成这些专题呢。接着我就提到了三十几位督导员退休，我表示同意，但其中 二十九位督导员有着直接的责任牵扯到了三百四十万元的公款。为此事，两个调查小组已经搞出确实的报告，我也催促上级，但至今没有回音。

我不在乎上级是处罚还是奖励这二十九个人，我关心的是这三百四十万元，人退休了，这笔钱怎么办，这个责任又由谁来承担呢。对于那七十多个暴乱嫌疑份子的名单，我问道：「自从六.四 到现在已是九个月了，党委究竟做了多少工作证

明这些人是暴乱份子呢？党委在去年就已经将四十多人送进了监狱，五、六个月过去了，警方根本查不出证据，最后 还是老副书记建议去保释，结果几乎都保出来了。如果党委当初搞的材料稍微有些证据的话，警方是不会轻易放人的。已经办错了的事，难道还要重复吗？」

我 又提到阿宗和书记郭长期意见不和，争吵时有发生，这是人人皆知的事，以阿宗的身份和目前的职务，如果党委拿不出确实的证据，而总以暴乱嫌疑来看待他，早晚 会惹出麻烦的，书记郭也会背上利用社会上发生的事去打击、排挤与自己意见不和的人的嫌疑。最后，我又提到穿军服的事。既然所里有这么多的人不符合穿军服的 条件，当初在收编前为什么不考虑呢？现在提出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是想把全体职工分成不同等级，就好像又回到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中去了一样。文化大革命已经被 否定了，我们为什么又要去重复错误呢？穿不穿军服只是个形式，这个单位已经被军队收编了，既然当初没有考虑得详细、全面，现在又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就不要 发军服，等到党委把这七十多个人的问题全部搞清楚了以后再说。我提高了声音问书记郭：「为什么在莫须有的事情上花费这么多时间，对已有证据的三百四十万元 贪污，党委不闻不问也不处理，甚至还让他们退休？」

我 说完后，办公室里静了一刻。书记郭做出了一副笑脸，但没有说话，也不反驳我。大校请老副书记发表一下看法。老副书记熄灭了香烟，不急不忙地说：「自从改革 开放以来，中央提出党政分工、各负其责的要求。从那以后，这个所就开始了党委和行政之间的纠纷，主要是党委改变不了以前的那种『党领导一切、党委书记说了 算』的作风，致使在这几年的改革中，党委不能全力地配合行政和技术部门工作，故而威信下降，其实许多事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党委不经常开会去研究 问题，又不征求意见，于是造成党委做出的决定不符合实际，就是存在着极大的偏差。这个问题充分地反映在这两个名单上，而且这样大的一件事，我作为党委的副 书记事先不知道，名单出来了，马上就开会表决？事情太突然，更不明白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我又能说什么？我提出过退休的要求，但是在把我的名字放在名单 上之前，应该有个人和我谈谈，打个招呼，我辛辛苦苦为党工作了四十年，难道一句话都不对我说，就这样一脚踢出去吗？我改变了决定，我还有一年零几个月才到六十岁，加上所里目前又正处于多事之秋，我决定留下来工作，到退休年龄再退休。」

他 刚说完，书记郭马上笑着鼓掌，对老副书记说：「你我在一起工作了二十多年了，我是了解你的，只是试探你一下，我知道，你是不会在这个时候退休的。」显然， 老副书记更了解书记郭，他板着脸对书记郭说：「这次算你说对了，二十多年了，我一直支持你的建议决定，在这个时候，没有我的支持，你又怎么工作？」大校似 乎察觉到了什么，马上说：「看起来，这两份名单存在着不少问

题，如果现在表决的话，也不会通过的。我马上向上级报告，并请示办法，你们的意见呢？」我们三 个人都点了头，会议结束。

我 回到办公室后，立即找来阿生，让他通知阿润马上到阿宗的办公室等我。我收拾了一下桌上的公文，也去了阿宗那里。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商议后，在那份七十多人的 待审查名单中，确定了三十多人在去年的民主运动中十分活跃的，而且几乎是完全暴露了自己，如果军方强行追查的话，这些人是十分危险。必须通知他们，让他们 有所准备。请阿润利用他父亲在警界的影响，尽量把这些人的护照办出来，以备不时之需。阿宗也会去通知名单上其它的人，告诉他们不要慌，也不要出走，准备自 我辩护的材料，问题应不大。

至 于阿宗本人，我和阿润都认为他是应该有本护照在手，以防万一。但阿宗很自信地认为，他是不会出事的，并准备和书记郭较量一下。我费了很大的力气劝说他打消 这个想法，并请他多用一些精力去调查在技术转让和扶助贫困的工作中贪污、受贿问题，阿宗同意了。我又要阿生立即找出以前几次呈交上去的关于三百四十万元的 存档报告，再形成汇总报告，上交军方，要求军方彻查、追究。我们分析，军队缺钱，三百四十万不是个小数目，只要军队追查，不管能追回多少钱，也不管追回的 钱归谁，总可以转移一下军方追查暴乱份子的注意力，平抚一下职工们的情绪，同时也可以打击一下书记郭的气焰。

他要保住这二十九个督导员，顾不上再去害别人。当我再次回到办公室后，马上让阿生找出了关于三百四十万元的存盘报告，然后，我把这几份报告交给了秘书，要她尽快地写出一份综合报告。我知道她已经倒向了书记郭，她会去向书记郭报告的。

大 概在第二天的上午，财务处长老君来了。我站起来欢迎他，他小心地把门关上，又示意我坐下，然后走到我身边，小声地问我：「你知道不知道那笔一千四百万元的 扶贫款的事？」我摇了摇头，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仍是小声地说：这笔钱在一个星期前被军队转走了，转到哪里不知道，军队的银行账号是保密的，无法去查找。 他告诉我，他是昨天下午才发现的，原因是在十天前，所里与贵州省的两个县签定了一项技术转让的协议，连同一项一百三十万元的投资。这事我是知道的，而且那 张支票是我签的字。昨天老君收到了两个县退回来的支票，理由是无法兑现。老君马上去了银行，银行的回答是这个账户已经被撤销了。老君说：「我想你是不知道 这件事的，大校或书记郭应该知道的。你不要着急，这笔钱是不会丢的，你去问问他们，不管是谁转走的，只要他签了字，符合财务手续就行了。」说完，他匆匆走 了。

我 坐在那里双眼发黑，两只手抖动着。动用一千四百万的巨款，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我和财务处长竟一点儿不知道，就让人家转走巨款，撤销账户。看起来，军队 是知道这笔钱的，而且一直在打这笔钱的主意，我怎么会一点儿也没想到？我做了几口深呼吸，极力地镇定住自己的心情，去找书记郭。书记郭正躺在沙发上看报纸 呢。见我进来，他马上放下报纸要站起来，我示意他不要动，并快走几步，不等他让，就坐在了沙发上。我对他说：「我们的扶贫款的账户被撤销了，钱也被转走 了，其只想问你一句话，你知不知道这件事？请你千万告诉我实话，我不想找麻烦，但我必须把这件事弄清。」书记郭似乎也吃了惊，连连地说：「相信我，我确实 一点儿也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呢？是谁干的？」看他的样子，他可能是真的不知道，但我是永远不相信这种人的。他问我一共有多少钱被转走了，我告诉了他。这一 回，他真的吃惊了，再次地说：「这件事，我确实不知道，我想可能与军队有关，你是否问一下王大校。」我当即给大校办公室打电话，他的秘书说大校今天没来上班。

我 放下电话，正要离开，书记郭笑着挽留我，似乎有什么事要说，我只好又坐下，并接过他递给我的香烟。他以一副十分诚恳的声调对我说：「近来，我一直想，自你 到任所长后，我们两个人合作共同管理这个所已是一年半了。去年发生了许多事，可我又偏偏九个多月不在这里，所有的工作都压在你一个人的肩上。暴乱过后，我 回来了，许多事情不了解，也没能主动地与你多谈谈，这是我不对。加上发生的事又多，难免在你我之间产生了一些误会，误会又很容易变成矛盾，使得你我在近一 段实际好像是各唱各的戏一样，在职工中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我一直想找个时间，你我坐下来，心换心地好好谈谈。尤其近来，军队大量地调人来，大事小事不断 地发生，你我之间的团结就更重要了。虽然我比你年长十几岁，但这并不妨碍你我成为好搭档、好朋友的，我可以告诉你实话，以我这个年龄，再提拔已是不可能 了，我只想安安稳稳地再为党工作几年，也就该退休了……」

我 不管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更无心去揣测，所以打断他，对他说：「过去的一切就不要提了，一千四百万让人家转走了，做为一二把手的你和我竟然事前一点不知 道，事后也没人向我们提起，我不知你是怎么想的，为党工作也不能像这样胡里胡涂地工作吧？天知道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你想和我心换心地谈谈，我现在就可以告 诉你我的心里话，是时候了，我该考虑辞去职务了。如果你真想保住我的话，就请帮我辞去这个职务，我会真心地感谢你的。」

书 记郭笑着摇了一下头，递给我一根烟，说：「这不是你的真心话，这是你的气话，我完全理解，这确实是件大事，明天大校来了，我去问他，至少应该给我们一个解 释吧。你太激动了，再抽支烟，我还想和你商量一下分配住房的事。」

我没有理他，马上说：「一个月前，我已责成行政办公室成立一个由职工选出来的代表的分房 小组，方案也已经出来，应该在这个月底，九十个职工就可以搬入新居。我已两次提出，在这件事上党委和行政部门都不要插手，让分房小组公正的把这九十套房子 分给住房最困难的职工，也算我们为职工干了一件好事。」书记郭没说话。他的秘书进来说，她刚接到我秘书的电话，要我马上回办公室。我马上告辞。

第 二天上午，我去敲大校办公室的门，进去看到大校、书记郭和两个秘书在玩扑克牌。我的到来，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玩兴，一定也要我加入，我拒绝了。两个秘书退出 去后，我马上就问大校关于那一千四百万元的事。他马上笑着说：「真对不起，我没告诉你，上级急需一笔钱，让我想办法，只是暂借一下，会还给我们的。」我对 他说：「这恐怕不是借的，连账户都撤销了，上级也没有明确地讲一下，如果是借，要借多久。这么大的事，之前不商量，搞得我非常被动。合同定出去了，现在无 法兑现，我们怎么向人家解释。转让和扶贫两个部门已经扩大了，多安置了几十名军人和军人家属，这个项目今后我们还做不做，做，钱没了。不做，两个部门五、 六十人怎么安排？」

大 校犹豫了一下，然后说：「上级自然是有考虑的，而且也会做出安排的。我们不可以问太多。动用这笔钱时，我没告诉你是我的责任，但上级要用钱，我们又有这笔 钱，怎么能拒绝呢？我是军人，当然要服从了。」我正要说话，「书记郭突然插进来说：我现在才明白，原来去年在扶贫这个项目上，我们并没有完成任务的。可我 记得在年底的工作总结上，我们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六的全年工作任务的，现在看起来，这个数字是有问题的。」

听 了他的话，我的火立时就冒了起来。我克制着自己，对他说：「我们的工作任务是指接受的研究项目而言的，并不包括花用这笔扶贫款的。而且从去年六月到今年二 月北京戒严，谁又敢来北京，当然这笔钱就剩下了，这根本就不是问题。而现在这笔钱突然没了，这才是个问题呢？」大校马上说：「这笔钱不是突然没了，是上级 借用了，这不是问题。下级服从上级这是原则，总之一句话，相信上级，上级会有安排的。」我冷笑了一下，说：「在上级做出安排之前，我又怎么去对那两个县去 解释？这两个部门又该怎么办？上级的安排什么时候能够做出来？我需要知道，也好安排这里的工作。」大校笑

了一下说：「这就是军队的不同地方，上级的话就是命令，我们要服从，上级没说的，我们就不能去问，上级是有安排的，相信我。」书记郭这时做出一副假作风趣的神情，说：「看来，我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今后也要学会服从命令了。」说完大笑。

我 对大校说：「我早就有这个顾虑，恐怕军队的管理方式不适用于这里，我本人也不太适于接受命令，我是个学者，所以凡事总要问个为什么，这恐怕就要与军队的原 则相冲突了。我又在做着实际的工作，很容易与突然而来的一道简单的命令冲突，在我相信上级会做出安排之前，三件事急需要办：首先，大校应补办一份手续，同 时给财务处一份收据，证明这笔钱是经你的手转走的，无论转到哪里，拿来一张收据，证明收到了，这才符合财务手续；第二，这份合同怎么办？这是要马上决定的 事；第三，转让和扶贫这两个办公室的五、六十人怎么办？总不能让他们待在那里没事干吧。」说完，我点了支烟，等着他们两个人的回答。

半 天，大校才说：「第一件事，我可以办。其它两件事，我们要商量，我不太熟悉这些，需要听听你的意见。」我还没说话，书记郭马上站起来，说：「这些都是行政 上的事，你们两个都是行政官，你们商量吧，我还有事，我得走了。」大校把书记郭强留了下来，并且说：「党领导一切，出了问题，你是跑不掉的。」书记郭马上 反驳说：「党政分工，各负其责嘛。」但还是坐下了。整个一个上午浪费了，什么也没讨论出来。大校坚持等上级安排，书记郭同意最后我提出我要去找政委或政治 部主任当面去谈这件事。大校的回答是：「他们现在全不在北京，大约下个月回来。」我的火又冒出来了，冷冷地对大校说：「这个样子、这个工作我干不了，等你 的上级回来后，请你转告他们另派个所长来吧。」大校马上用质问的口气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的上级也是你的上级……」

我一点不客气地打断了他，说：「想做我的上级，就要随时帮我解决问题，不能制造问题后，又让我找不着他，这算什么上级？」大校冷冷地说：「上级很忙，我们应该体谅……」我再次打断了他：「解决问题才忙，不解决问题又忙什么？难道只有他们忙，我们不忙？干 出一件事，不考虑后果，又没有相应的措施，留下一大堆问题给属下，这就是你说的忙？」大校猛地动了一下身子，似乎想要跳起来，但他没有，重又坐下了。沙发 在他的身子下发出了很大的声响，他用了一种极高的声音和训斥的口吻对我说：「你应该首先学会尊敬上级，相信上级，上级是不会错的。」我冷笑了一下，说： 「是呀，在这方面你比我做得好，我会去学的，但需要时间，在我还没有学到像你这么好之前，这两件事就请你解决一下吧。午饭时间到了，我得走了。」我站了起 来，向门口走去，在我伸手拉开门之前，大校突然大声说：「站住！回来！」我一手握住门把手，一边转过身来，对着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请你记住，永远不要 用这种方式对我讲话，我不习惯。」说完，我拉开门出去。

回 到办公室，我就打电话给老君，让他去大校那里补办手续。下午，老君拿着大校的签字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大校说收据会马上送来的。他又问我是不是与大校发 生了争吵。我把上午的事告诉了他，他默默地听着，对我说：「我已经听到了，他们想让我退休。你千万不要与他们争，在这种情形下，我想还是回

家抱孙子好。」 我一愣，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是我的秘书告诉他的。我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对他说：「退休是自愿的，没有人可以强迫你。但是，我请求你不要退休，你知 道我是离不开你的，至少你也要找到一位像你一样的人能代替你的工作才行的。」老君叹了口气，对我说：「这些你不要说，我也想到了，我只是嘱咐你千万记住， 在我的退与留的问题上，你不要与他们争，对你今后不利。我工作快四十年了，也该给自己留几年时间了。」我点了点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老君在我的胳膊上拍 了两下，告辞走了。

老君刚走，那个叫阿红的女人来了。告诉我，书记郭找到了她，并要她必须每天一次向书记郭报告，已是一个星期了。这两天来，书记郭又强迫她在书记郭的办公室工作，并且又有动手动脚的事发生。

阿红这次来找我是要问我，如果坚决不去书记郭的办公室工作，算不算是违抗上级？我还没顾上回答，秘书进来了，把那份三百四十万元的综合报告交给了我。我无意中翻看了一下，立时我的火就冒了出来。这份综合报告不但主题不明，而且内容混乱，完全面目全非。

我 指着报告问她：「这就是妳写的报告？」她犹豫了一下，低声说：「我从来没有写过综合报告，我知道写得不好。」我说：「写不了，可以早一点告诉我，我明天就 要用，今天这个时候妳给我这么一份东西，让我怎么办？今后，干不了的事，就直接说出来，不要耽误事。还有，不该妳说的事，也不要说，这是做秘书的职业道 德。」她低声答应了一个是，就退了出去。我转向了阿红，对她说：「真是对不住，妳能不能明天来，我要忙几个小时，把这份报告写出来。」阿红站了起来，对我 说：「如果这份报告不是机密的话，我可以写，明天一早交给你。我做过秘书工作，我知道秘书的职业道德。」

我 有点吃惊地看着她，发现她看着我的眼神是那么诚恳，又带有一点哀求的样子。我什么也没说，把报告堆给了她。她接了过去，轻声说了句「明早见」，就快步走了 出去。第二天早上，我走进办公室，见到阿红已经在那里等我。我接过报告匆匆地看着大约十分钟后，放下报告，惊奇地看着阿红。我从来就盲目地不相信一个女人 能写出这么漂亮的文章来，不但字迹漂亮，而且遣词精确，内容组织十分得体，整份报告的水平相当高。我当即签了字，又把阿生找来，让他立即复印给上级、大校、书记郭、老副书记、阿宗和我一人一份，并要少校本人把报告给上级的一份送去。

阿 生答应着出去了。阿红站起来，要去工作，我留住了她。对她说：「我不知道妳犯了什么事，妳不讲我也不问，只想知道能不能把妳自己向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她没有犹豫，告诉了我她的学历和专业。原来她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被派到国防科工委做文职工作，一年前被提升为上尉，不久被派去给一位中将做机要秘 书，再下面的事，就没再讲了。我想了一下，打电话又把阿生找了来。我对阿生说：「你能不能在行政办公室里为阿红安排一个工作，她是学中文专业的，极有才 华，写得一手极好的文章。只是遇上麻烦，每天要去保卫处报告。保卫处长撤职后，书记郭让她去向他本人报告，又安排她在书记郭办公室工作。书记郭这个人你知 道的……」

阿生马上说：「我当然知道，我可以安排她工作的。书记郭可以把她安排在他的办公室，你为什么不可以安排她在行政办公室呢？现在都什么时代，还搞那套『早请罪晚忏悔』的形式，如果必要，就让她每天向你报告。」我笑了一下，小声对阿生说：「你想个办法，名正言顺地把她调过来，尽量不要让书记郭又抓住借口背后攻击我。」阿生想了一下，说：「放心吧，我让那个少校主任出面办理，公开把她调过来。这事你就让我来对付好了，你一点儿也不知道，好不好?」我笑着点了点头，阿生转向阿红说：「跟我走吧，妳都听到了，这件事与所长无关，是我们行政办公室需要妳。」阿红很激动地向我道谢，我摇了摇手。阿生说：「要谢就谢我吧。别谢他，他的麻烦已够多了。」

可 能是阿生最后这句话的原因吧，当天下班后，阿红又来到我的办公室问我有没有时间，她想告诉我她所犯的错误。并且说：「恐怕我不适合在办公室工作的，我不想 给你找麻烦的。」我请她坐下，说她如果她愿意告诉我，我是很愿意听的。我又给她沏了一杯茶，她开始向我讲出她「犯错误」的真相。

她 一直单身，既不交男友，更不想结婚。她在大学里初恋的男友在出国继承了一笔遗产后把她抛弃了，致使她在感情上受了伤，从此立志独身，埋头学习。大学毕业后 被派到国防科工委做文书官，由于有才华，工作也出色，几年后就被提升为上尉军衔。不久，被政治部找去谈话，要她接受一项保密性很强的新工作。对阿红来讲是 无所谓的，她有能力，而且自信无论什么样的工作，她都能做好，于是很痛快地同意。她的新工作是给一位中将作机要秘书，而阿红形容她的新工作就像个女佣，就 是给将军沏茶、点烟，伺候将军的吃喝和生活。

几个月后，将军开始骚扰她，哄、骗、许愿、威胁接连而来，目的无非就是一个：拉她上床。阿红屡次拒绝，也曾几次在将军的暴力下，拼命地挣扎逃脱。不久后，将军的注意力又转向另一个女人。

这 个女人年轻漂亮，是做技术工作的，而且正处在热恋中，男方是一位三十八岁的工程师，由于技术好，工作出色，在三十六岁时就被授予上校军衔，成为科工委最年 轻的技术官。也可能是缘份，从没接触过异性的她，深深地陷在热恋中，不久两个人就宣布订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将军发现了这个女技术官，时常以关心和指导这 个设计项目为由，把这个女人叫到办公室「长谈」。阿红几次看到这个女人蓬乱着头发，用手遮掩着衣服、满脸泪水得从将军办公室里跑出来。

阿红想到自己也曾有过同样的遭遇，她同情这个女人，可又不敢做任何事，因为每次有女人去将军的办公室，阿红都接到将军的严厉命令，不准任何人进来打扰。

就 在三个月前的一天下午，女技术官又被召到将军办公室，阿红也再次接到将军不准打扰的命令。时间不长，阿红就听到了女人的尖叫声从办公室里传出来。她明知里 面发生了什么，但却不敢做任何事去阻止将军或帮助那个女人。正在这时，那位上校技术官突然出现问阿红，他的未婚妻是不是在这里。阿红点了一下头，但马上 说：「将军命令不准任何人进去打扰的。」这时，又一声女人尖叫传了出来，上校推开了她，向办公室的门冲击，阿红跑去阻挡，但门还是被撞开，两个人同时跌进 将军办公室。

阿 红立时被办公室里的景象惊呆了，那位平时看起威严的将军，此时正全裸着骑坐在上身已是赤裸的女技术官身上，撕扯着她的裤子。上校立即把阿红推出去，并关上 门。大约二十分钟后，上校带着未婚妻走了出来，并对阿红说，将军说请不要进去打扰他。直到下班，将军没有叫他。阿红匆匆回家了。以后几天，似乎很平静，将 军仍和以往一样，不时在阿红脸上或身上摸一把，但阿红相信将军不会就此罢手，她格外担心的就是这对未婚夫妇的命运。

通 过同事和朋友提供的零星消息，阿红大致地明白了一些实情。上校把她推出来后，即让将军亲笔写一份悔过书，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经过一番争执，将军 软下来，写出悔过书并签上名字。可就在当天夜里，上校被几个闯进家里的军人带走，那份将军的悔过书也被撕成碎片并烧毁。一个多星期后，有消息说上校已在几 天前在监狱里畏罪自杀。几乎就在同一时间，那位女技术官失踪。很快消息就传来，她被送到很远的一个军队监狱里去，至于定什么罪和要关多久，就无法知道了。 一位上校技术官的好友曾找过阿红，要她讲出她所知道的一切，但阿红否认她知道任何事。即使如此，阿红也没能逃脱厄运，事情发生的两周后的一个夜晚，她也被 几个闯进家里来的军人带走，关进监狱。在连续一个星期的严厉的审讯中，阿红始终矢口否认自己知道、看到或听到任何事。最

后监狱当局没办法，只是逼她承认没 有阻止上校进入将军的办公室，违抗了将军的命令。

十 天后，阿红被释放，要她去政治部谈话。在政治部，一个军官对她说，由于她违抗命令，几乎造成泄密的重大事件，所幸是后果不严重，加上阿红本人认罪态度又 好，免于处罚，但不适于再做机要工作，将予调离。这个军官最后说：「不管把妳派到那里去工作，妳的事情不准对任何人讲，如果有人逼问，妳让他们来这里调 查，记住，如果违背了这一条，会马上进监狱的。」听了阿红的叙述，我分析国防科工委那方面也确实抓不到阿红的什么把柄，只是为了顾全那位将军的面子，把她 调离而已。估计那位将军与三十九军有着某种特殊关系，所以三十九军政治部在档加上了监督劳动的批示，书记郭当然就更是唯恐天下不乱。我劝阿红回去工作，不 要想太多。

第 二天上午，我把阿同找来，让他以党委办公室的身份去国防科工委政治部调查他们对阿红的最后结论。午饭之前，阿同回来了，给我看了他们的结论。十分简单，只 是说阿红不适合做机要工作，所以调离，仍可做文书官工作，根本没有什么又是错误，又是监督劳动的说法。我放心了。阿同建议把这份调查结果给书记郭送去看 看，然后交政工处保存。我同意。当即又把阿红找了来，告诉了她这个调查结果，她又惊又喜，竟哭了起来。我劝慰她，并告诉她，从今以后可以轻松地像以前一样 地生活和工作了。

那 天下午，王大校来到我的办公室。寒暄了几句后，对我说：「我知道你整天忙，几次想邀请你到我的办公室去谈谈，可是书记郭几乎整天待在我那里，所以我想还是 我来你这里好。你有时间吗？」我一边给他沏茶，一边说：「我的办公室的门是对所有的人开的，无论谁来找我，都是有事，我的工作就是解决问题，所以无论谁来 我都欢迎，而且也有时间。」大校笑着说：「所以我才决定来找你的，我也遇上麻烦事了。我也来了半年了，夹在你和书记郭当中，我的日子难过呀。」我坐了下 来，点了支烟，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大校品了一口茶，对我说：「你喜欢花茶，我也喜欢，但我最喜欢的是湖南茶，因为我是湖南人。我听说你是江苏人，书记郭 是河北人，这就好像是军队，由来自全国各个地方的人组成。在军队里，大家应要团结得好像是一个人，我想了解的是你和书记郭之间究竟有什么矛盾？焦点在哪 里？你想想，两个人不和，工作怎么办？我难受不？」

听 了他的话，我很认真地对他说：「既然你提到矛盾，我可以想象，他在背后一定没少说我。但我不在乎，这么多年了，不做事的人批评做事的人已经成为了风气，我 又能怎么办？举个例子说，那个由国防科工委派来的女文书官阿红，

自己都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误，又是监督劳动，又是体罚被捆绑的，差点被强奸了。我派阿同去调 查，结果阿红根本就没犯过错误，调查结果就在政工处保存，你可以去看看。本来这是党委的工作，可为什么不做呢？我可以想象为了这件事，书记郭会有一大堆理 由恨我，可能这就是你说的矛盾。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大 校没说话，我也没再说话。半天，大校才开口，谈起了搞政治工作和行政工作不同，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复杂难做，工作的性质不同，所以工作的方式方法也不 同，他认为我和书记郭之间没有矛盾的，只是有误会，可以通过交谈和多接触来消除。听着他的这篇冗长的话，我明白了一点，他听书记郭说太多了；来了半年，既 不接触实际工作，又不去接触职工，在他的头脑中已经形成偏见，但又实在说不出我有错或错在什么地方。

在 他说完后，我笑着对他说：「我的日子比你的更难过。我年轻，又没有经验，我只是干着我认为是对的事，实际上，我需要有人指导我、教我、帮助我，而不是监视 我、指责我和攻击我。我干错事，当面告诉我，我会很高兴，而且会很乐意地引咎辞职。现在的情形是，我拼命地工作，而有人却什么也不做，反而处处制造障碍， 无中生有地背后攻击我。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人才有的是，有人会干得比我要好得多的。我早有辞职的想法，已向政委提出过了。」

大 校对我摆了一下手，说：「你想不干？不要说上级，连我都不会让你走的，我来了半年了，多少也了解一些实际情况，我感到我有责任。上级要我多支持你的工作， 我做不够，今后我会多用些精力帮助你，至于你和书记郭的关系，我想找他谈谈。目前来讲，咱们五个负责人必须团结。另外，我还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我想让资料 室主任阿建做我的助理，我听说以前他做过阿成的助理，我想让他帮我熟悉这里的工作，同时也可以帮你一些忙。」

听 到他的这个建议，我没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没有理由去反对。去年的民主运动，阿建是个积极参加者，但在大屠杀后，他很快就转变了，尤其在书记 郭从党校回来后，他与书记郭接触频繁，已经有好几个人提醒过我要小心他。收编开始后，他更是彻底变了，他的父亲就是进京部队的一个军长，与收编为名的这个 军的军长又是朋友。我明白，阿建这种人所想的本不是工作，而是追求着职位和虚荣，尤其在评定军衔和发军装前，对他的这次提拔，无非是为了在他的军服的肩章 上多钉上一颗星而已。真实的能力，他根本没有，上次政委请我吃饭时，政治部主任说我会成为所长，现在看起来接替我工作的将是阿建了。我敢说，阿建根本干不 这一摊子工作。

大 校看我同意了，很高兴，于是又提到那天对我的态度不好，并表示歉意。我马上借机问他收据的事。他讲，还要等几天。我问到两个办公室人员去留和那份执行不了 的合同的事时，他一愣，但马上想起来了，嗯了几声后，说：「还没有考虑呢？」我有些冒火，但忍住了，只是冷冷地说：「那好吧，我等你的决定。」大校声音放 低了说：「为什么要等我的决定呢？你完全可以决定。」我马上说：「我决定不了，在收编时，你们没有提到我们是不是还继续接受国务院这个扶贫委托的。你们不 说，我以为是继续做。如果你们说不做了，我马上把这笔钱给国务院退回去，也不会有这个不愉快和麻烦。」

大 校说：「我是军人，永远只做两件事，一是服从命令，二是执行命令……」我打断了他，说：「所以，我们只有等上级的决定了。两个部门撤销，五六十人重新安排 工作也实在是件头疼的事，军队原来说要投资建厂，可至今没个动静，但人却调来了两百多，工资部分的支出至今也没个回音。在这种情况下能怎么办，只有等上级 的安排了。」我说完，大校半天没说话，最后才说：「上级现在全不在北京，我可以去打听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一旦他们回来了，我去请求上级尽快做出安排。」说 完，他站了起来要走。我也站了起来，笑了一下说：「几乎没有人愿意来我的办公室，头疼的事太多，而且永远没完没了。」大校仅点了一下头，什么也没说。

第十八章 军人在我们这里制造的又一起恶行

那天，福利处的胖处长来了，高兴地对我说那座住宅楼已经完工，建筑公司正在作最后的清理，几天后就可以验收。分房小组已经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九十个住房最困难的职工将在验收当天拿到钥匙，搬入新居。

胖 处长很兴奋，要我去参加验收。我也高兴，但告诉他我最好不去，并要他催促建筑公司尽快清理，马上交付使用，并尽快地把房子分到职工手里。胖处长点着头，对 我说：「职工们十分高兴，对这次分房基本上是满意的，认为还公平，只是住房困难的人太多了，所以这次没分到房子的人都在问什么时候盖第二座楼。」其实，这 件事我早已想过，也和财务处长老君商量了几次。老君的意思是如果我打算开工第二座楼的话，他可以想办法的。直 到最近老君告诉我，他可以准备出第一笔工程款来。所以我高兴地告诉胖处长，让他尽快地买块地，胖处长说：「我已看了几处，地价太高，没有谈成，有一处正在 谈，价钱还可以，只是稍微远了一些。」我对他说：「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只要价钱便宜，远一

点就远一点吧。这件事仍由你负责，马上买下这块地，通知建筑公 司就按原图纸马上开工。我只是恐怕你工作的太辛苦，你身体吃得消不？如果你感到疲劳的话，我就让后勤处基建科接过这个工作去。」

胖 处长摆了一下手，说：「我没问题的，我喜欢这种让大家高兴的事。」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两眼看着我说：「自从阿成和你主持这里的工作以来，我感到最大的 不同就是你们两个人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新的风气，那就是尊敬和体谅。其实只是一个问候，一个笑容或一句话就可以温暖一个人的心的，这是拿钱换不来的。在这种 气氛下，职工们愿意多干工作，而且发自内心的想干好。整人的那一套吃不开了，这么多年了，人们也不怕了，也学会了怎么去对付了，更何况现在……」

他停住了，笑了一下，马上转移了话题，说：「在这座楼动工之前，我曾做了一个预算，大约三万多块钱，我是想修一个漂亮的围墙，并在楼的西南角建个花园，现在，你既然要马上开工第二座楼，钱肯定不够，我把这个计划取消，把这笔钱转到下一个工程上吧。」

我 想了一下，对他说：「也好，你重新做个计划吧，如果以大量种树和花草去布置环境的话，大约要花多少钱，你按你的意思去做，剩下的钱就转到下一个工程上 吧。」他马上说：「我去安排，现在我就告诉你，下一个工程你就少着三万块钱的急吧。」说完，他站起来要走，我也站了起来，向他伸出了手，说：「谢谢你这一 年多的辛苦，九十个职工和他们的家属也会感谢你的。」他握着我的手似乎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只是突然说：「我明天就把那块地买下来。」说完转身出去了。

我 走到窗前，看着窗外，心情好了一些。这件事的完成，可以说是自进入今年以来第一件让我高兴的事，我真想告诉阿成。阿宗推门进来，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对我说 起几天后要去参加的那个由国家科委召开的大会。我几乎把这件事给忘了。我们所共收到了十几份邀请，都是在过去的两年中在学术研究上有重大突破和有显着成绩 的科学家和学者们。阿宗收到邀请，他是主管研究工作的副所长，又是知名的剧作家，收到邀请是理所应当的。没想到我也收到邀请，理由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 被调到行政管理的岗位，做出优异的成绩……」

会 议将进行两天。我对阿宗说：「你看，我这一大堆的事，能离开吗？！你去了也就代表我了……」阿宗马上说：「那可不行，这是你的荣誉，谁也代表不了。我看你 是变了，以前你是一年总有半年在外地考察，可现在你就像是个管家婆一样，我就不信你离开了这里会地震。出去散散心，说不定还会遇见老同学、老朋友呢。」我 说：「那好吧，我把工作安排一下，现在你最好回到你的办公室去，我正忙着呢。」阿宗笑着大声说：「什么！岂有此理！老大哥来了，不说沏茶敬烟，还要轰我 走？你也坐，让我们聊聊，轻松一下。」没办法了，我只好请秘书打来开水，又沏上茶，听他讲起经济研究室最近做出的国际和国内的经济预测。正说着，阿生推门 进来，递给我一封信。我看了信后，递给阿宗。我站起来，走到了窗前，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然后对阿生说：「请你把技术转让和扶贫两个办公室的负责人请到 我的办公室里来。告诉他们，马上。」阿生答应着出去了。

阿 宗对我说：「你不要生气，这种要回扣的事已经发生了几次了。可我们只是听说，从没有抓住过证据。这一次是因为贵州省的这两个县的合同们没能兑现，他们又付 出了现金回扣，当然人家不干了，才写来这封信，这是个机会，可以逼出是谁干的，把钱逼出来，给人家退回去……」我打断了他说：「不要劝我别生气，这么多人 辛辛苦苦地工作，挣着可怜的工资，我们想给大家发点奖金都是绞尽脑汁，东拼西凑。可这些人什么都不做，专抓这种机会给自己成万地往口袋里装钱。我们认为这 是犯罪，可在共产党的眼里却不认为是个事，反而拿着这群人渣子当宝贝似的宠着。可对学生、对百姓杀起来却一点不手软的。」阿宗打断了我，小声说：「别说这 些了，小心门外有人。你控制一下情绪，两个办公室的主任马上要来了。你要不要我留在这里？」我点了点头，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阿 生带着两个办公室的六位主任来了，其中四个军人全是副主任。我请他们坐下，又让他们看了那封信。一位叫阿超的主任对我讲：这件事已经发生不少次了，我早知 道，也曾试图去调查，但由于牵扯着其它部门的干部，我又没有证据，只好停止了。我给你写过一份报告，但至今未见你的批文，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没有看到 过他说的那份报告，所以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写的。阿超说：「去年年底交来的，你不在，我给你的秘书了。」我马上说：「我会找到这份报告的。关于现在发生的这 件事，我想请你们六位正副主任力争在一周之内把这个人查出来，三万九千块钱一分不少地追出来，然后给那两个县送去，并向人家道歉，你们同意不？」阿超说：「如果认真地去查，当然可以查出来的。我是怕查出来后，上级不处理，就像那些督导员们的三百四十万一样，结果是我把人得罪，给自己树敌，我图的是什么？」

我 还没说话，阿宗接上来说：「贪污腐败已经成为了一股强风或是一种大趋势，天知道几年后，也可能变成好人饿死活该，贪官有理，贪官光荣了？但我们做人总要有 个准则，明白是非，既然有人贪污，又是发生在你们两个部门，你们有责任去查出来的。至于怎么处理，那是上级的事，或许上级给贪污犯发勋章、发奖金，你们也 不要去管，你们只是凭着你们的良心去做你们该做的事，你看呢？」他最后的这句话是在问我，我马上表示了同意，并说：「请你们立即着手，我让你们做的事，我 承担责任。无论是什么结果，不会让你们有麻烦的，怎么样？」他们全都点了头，退出去了。

门 被关上。我对阿宗说：「真没想到，两个办公室增加了四位军人副主任，而我却一点不知道，这些人都是谁任命的？」阿宗没有回答我，只是走到我的身边，小声 说：「阿超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他是个很正直的人，他是不会撒谎的，你能保证你没有收到他的报告？」我说：「我看档是很仔细的，看过的东西不会忘记的。你的 意思我明白，该换秘书了。」阿宗说：「这你可要好好考虑一下，她是上级派来的，撤换她的话是要经过上级同意的。」我说：「考虑什么？早晚我会毁在她手里。 况且，他们已经换了上级了，还怕个什么？」阿宗没说话。阿宗走后，我把那位少校行政主任找了来，告诉他把阿红派来接替我的秘书工作，把秘书安排在行政办公 室工作，并让他马上就去办，立即交接工作。少校马上回答了几个是，就出去了。看来秘书小姐似乎很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做，所以并没有来打扰我。

隔 天一早我来上班时，就看到阿红坐在那张秘书办公室的后面。阿红告诉我，她实在找不到阿超主任的那份报告。我笑着对她说：「不要找了，当然找不到的。」所幸 的是，仅两天，阿超就把四个人的名单交到了我的手里，还有那三百九十万的现金。这四个收回扣的人中有两人是党务干部，另外的两个人是行政干部，令我吃惊的 是，其中一位行政干部竟然是刚派来不久的上尉军官。阿超对我说，他已经打开了缺口，如果继续追查的话，他可以把以前的几次要回扣的事也弄清楚并追回赃款 的。

我 想了一下后，对他说：「你已经掌握了线索，但不要对任何人说，暂时也不要再追查了。什么时候再开始，我会告诉你的。这件事你办的好，但我不能公开表彰你， 我希望你能明白为什么，如果有人问你，你只说是我给你的线索，并让你帮忙调查的，你只是奉命行事，一切责任我来承担。但请你相信我，我会再找你帮忙，把这 些混蛋们一个一个地查出来的。现在我是要看一下这件事的后果会是怎么样，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我想你明白。」阿超马上说：「我当然明白了，我会按你说的去做 的。但是，到了有一天，我非要站出来说话时，我会的。为了防备万一，我已经让四个人写下了书面的东西，白纸黑子，并有他们的签字。

我马上去复印，原件给 你，我保留复印件……。」我马上说：「你不要复印，也不要保留任何这方面的档，只把原件给我的秘书，放心，我已换了秘书，她知道该怎么做的。」

我 握住了他的手，再次感谢了他在此事上的迅速办理，然后送他到门口。当我打开门时，看到阿建正坐在阿红的办公桌上，和阿红说着什么。看到我打开门，阿建跳下 了桌子，向我走来，对我说：「我想找你说点事，被这位漂亮小姐挡住了，说你正忙，让我等一等。」我让他进来，又请他坐下。他对我说：「大校知道你后天要去 开会，要开两天。所以派我来问问你有什么事要我办或要交待的，我可以代你办理的。」我马上感谢了他，又对他说：「我已做了安排，应该没什么事的。而且阿同 在这里，两天的会期，时间不长，即使有什么事也可以回来再办的。」

阿 建说：「大校还让我问问你，打算你开会回来后派我在你的办公室里工作，大校已经暗示我了，意思是早晚你会高升的，我将接替你的工作的。」听了他的话，我一 愣，对他说：「我倒没听说这些的，不过既然大校让你接替我的工作，我倒希望你能从今天开始，我巴不得马上离开这间办公室。」阿建似乎并没有听到我的话，他 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这间办公室太老，太土气了，也太跟不上时代了。看看书记郭和大校的办公室布置的多好，也有气派。」他又对我说：「我去找后勤处，让 他们把你的办公室重新布置一下，等你开会回来，你会大吃一惊的，怎么样？」

我 马上说：「还是等你坐进了这间办公室后再布置吧，我不需要的。」他说：「你当然不需要，你会坐进大校的办公室。」我有点不耐烦，不太客气地对他说：「我不 想坐进大校的办公室，可这间办公室，我在一天就保持这个样子，没有我的同意，谁也不可以去改变它的。至于你来我这里工作的事，我还要和大校去商量，因为你 是大校的助理，而我已经有了阿同在这里帮我了。」阿建好像根本不在乎我说什么。仍坐在那里，说着一堆无聊的话，又大赞阿红漂亮。对这种人我也没办法，只好 一边工作一边哼哈答应着他，直到他离去。

阿 宗是对的，参加大会的第一天确实遇到两位老同学，都与我同龄，但都已是卓有成绩的人了。我真是十分羡慕他们，同时也感到自愧不如人。转眼毕业快十年，人这 一生有几个十年！自己也四十岁了，再不好好利用时间的话，老将至矣。我不怕老，怕的是一生无所作为。我一定要尽快地回到专业上去，再不能这样浪费时间了。 休会时，我对阿宗讲了这个想法，他看着我，笑了一下，什么

也没说。他可能以为我只是说说而已，即便是朋友，有时也是很难了解对方的真实心理的。第一天的会 议结束了，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感到一阵心慌，好像有什么事发生了一样，又好像我忘了什么事似的。我对自己说可能是平日忙惯了的缘故，乍一闲下来，不习惯了。

在 第二天中午大会休会前，一个工作人员找到我，要我接一个电话。我随着他匆匆来到电话机房，听到了阿红的声音。她什么也没讲，只是一再的问我能不能马上回 去。我答应着，放下了电话，又马上找到了阿宗。阿宗说：「最好我们两个人一起回去。」没容我说话，他就催促着和我一起离开了会场。在车子里，我们猜测着可 能会发生什么事，但没个头绪。阿宗和我匆匆地来到我的办公室。阿红也跟着进来，阿同在办公室里翻看着一堆东西，见我们进来，他站起来对我说：「有几件意想 不到的事发生了。你们先坐下，我一件一件告诉你们。」我和阿宗坐下，阿同也坐下来，对我们说：「第一件事是昨天胖处长去验收住宅楼，九十户分到房的职工也去了。按计划，双方签字后，职工才可以搬入，但是昨天胖处长到达那里后，发现三十套三居室和六套二居室已经住进了人了。」我大吃一惊，马上问：「住进了人了？什么人？」阿红说：「是派来这里工作的军官们。」

阿 同接上来说：「据建筑公司的人讲，军人应该是在建筑公司的人下班后搬入的。于是昨天在新楼前有一场大吵闹。，是可以想到的。胖处长当时气得犯了高血压，送 医院急救，现在仍在医院。我听说后马上赶了去，和福利处副处长一起劝阻着大家回来，又去医院探望了胖处长。今天一早，阿红就收到了近五十份辞职和请调报 告。」

说到这里，他用手指着他刚才看的那堆东西，又说：「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所里气氛紧张，我找书记郭和大校，可他们都不在，所以我只好让阿红在上午十点钟发了一个通知，让全体职工放假回家。但走的人并不多，只好让阿红打电话给你了。」

听 他说到这里，我已气得双手发抖了。刚要问阿宗的看法，阿同又接着说：「第二件事，也是发生在昨天上午，书记郭和大校召集了一个有一百七十人参加的会议，会 上宣布这批人退休。基本上就是上次他们提出的那份名单，但把老君和不到二十名专家从名单上划掉了，另补上了其它二十个名字。他告诉这些人，三月三十一日将是他们最后的工作日，四月一日就退休，那三十几个督导员和老副书记也在退休名单上。老副书记在会上当时就反驳了，说情愿受处罚，也不退休，四月一日仍上班。今天，这批人有一多半没来上班，老君和另外几名教授今天打来了报告，要马上退休。」阿宗问：「书记郭和大 校在不在？」阿红说：「在你们回来的前二十分钟，他们才来上班。」阿宗对我说：「你和我现在就去找他

们。」我坐着没动，对阿宗说：「找他们干什么？这是预 谋好了的，趁你我不在搞出这两件事来，既然他们干出来了，当然也准备好怎么对付我们的。这事我要想想，请阿红通知司机，我要先去医院看望胖处长。」阿同立 即去找各部门负责人，一起劝职工回家，有什么事明天再讲。说完，我站起来，请他和我一起去看看胖处长。

坐 进车里，我竟然控制不住自己哭了起来。阿宗没有劝我，可司机吓坏了，他把车停下来，回头望着我。阿宗对司机说：「没事的，继续开，他是太激动了。」见到了 胖处长后，没想到胖处长竟也哭了起来。他拉着我和阿宗的手，连连地说：「对不起，我把事情办坏了，我实在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让我怎么向职工们交待？人们 盼了几年，好不容易盼到了这一天，又发生了这种事——真卑鄙呀！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大家！」我握着他的手，对他说：「没有人会责怪你的，你没错，不要想 太多，你必须好好养病，我还指望着你把第二座楼交给我呢……」

胖 处长打断了我，说：「别提第二座楼了，我不想干了。我想退休。我工作一辈子，也伤了一辈子的心，可这次伤我最苦，我干够了，不想再伤心了。昨晚我就想好 了。我退休了，唯一感到对不起的就是你们两个人，请你们原谅我。」我马上说：「不要这样说，无论你怎么想，我都同意，但首先你要好起来，把病治好，你想退 休，我给你开欢送会，让你高高兴兴地退休。」问候了胖处长的家人，又向医生询问了他的病情。医生要胖处长留在医院里继续观察几天。待到胖处长的情绪平静了 下来后，他才简单地提到了昨天上午的情形。约好的九点钟，建筑公司和胖处长，以及所里的两位工程师和九十个职工都到了。但马上发现情形不对，已经有人住了 进去。这座楼共有三居室、二居室和一居室的单元房各三十套。时间不长，马上就弄清楚了，所有的三十套三居室和六套二居室的单元全被占用，而且全是最近派来 的军官。建筑公司的人讲，在昨天中午，全部的清理工作和搬出工作就已经结束，并且他们把门也锁好了。很清楚军人们是在下午或傍晚搬入的。职工们已被激怒， 由于正是上班时间，不少被侵占的房门是锁着的，从几个其它家属的嘴里又问不出什么。职工们喊的、叫的、骂的，养尊处优惯了的军人家属们也回骂。胖处长给书 记郭打电话，书记郭的回答是：「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更没有提出任何的解决办法。」胖处长又给大校打电话，连打几次都是秘书接的，回答是：「大校正在开会，不能打扰。」胖处长又给阿同打电话，问阿同是不是我同意让军人这么做的，阿同也吃了一惊，马上说不可能。他让胖处长尽力平息职工的情绪，他马上去找大校。

胖 处长放下电话，回到现场。这时现场的气氛已是剑拔弩张，一些窗户和门被打破。建筑公司的人催促着验收签字，憋了一肚子火的胖处长拒绝签字，指责建筑公司的 保卫工作有问题，应对这次的抢房一事负责。而建筑公司的人说：「这件事发生你们内部，我们怎么负责？」双方正在争执，阿同和阿生赶到了。阿同

告诉胖处长， 他找到大校，大校说与我商量过，我同意。阿同争执着说这是不可能的，大校笑了一下，双手一摊，做出了一副信不信由你的样子，就又回到会议室去了。胖处长也 说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不验收，并劝说职工回去，但劝说这九十个被激怒的职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建筑公司逼着胖处长验收，胖处 长支持不住了，眼前一黑，便晕倒在地。这一下也使那个火爆的场面马上冷静下来。

之 后我和阿宗来到老君的家。老君正和他的两个小孙子在沙发上玩，老君的夫人带走了两个孩子，留下我们说话。老君开门见山地说：「实在对不起了，我要求退休是 个抗议，这次抢占住房的事，可以说是继天安门大屠杀后，军人在我们这里制造的又一起暴行。我工作快四十年了，始终保持清白的名声。一个多星期后，就要发军 服了。如果我穿上那身衣服，我这一生的清白就全部付之东流了。我不该对你们说这个话的，对不起了，我老了，给我几年的时间，让我清静一下吧。你们也看到 了，我的两个小孙子是多么的可爱，他们是我唯一的乐趣和希望。」我刚想说什么，阿宗开口了。他说：「我们两个人是来探望你的，向你问个好，绝不是想劝说你再在那个环境下多工作。你刚才说的，我们都理解，你家的环境我们也都看到了。我是真羡慕你，我们完全尊敬你的决定，对不？」

阿 宗的最后这句话是在问我，我忍住了叹息，对老君说：「当然了，你已经做的太多了，我没有权力再要求你什么了。只是想请求你一件事，几天后，你会接到一份通 知的，是邀请你参加欢送会，请你千万不要拒绝，我是不能让工作了几十年的人就这样寒着心走了，可以吗？」老君点了点头，看得出来，他有些激动，拉着我和阿 宗的手说：「我知道你们两个人也难，原谅我不能再多帮你们干几年了。千万不要生我的气，我是实在看不下去，也受不了了。」

他 停了一下，又说：「这个所不会存在很长时间了，你们可要小心，保重呀。如果有机会的话，赶紧离开，你们都是聪明人，应该明白这个形势的。」说到这里，他转 向了我，对我说：「你做事太认真，你已经尽了力了，做了你应该做的一切，职工们拥护你，但你要明白一点，大环境如此，你是没办法去改变的，你一定知道那句 话：『激流勇退』。」

从老君家出来，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阿宗又拉我去两位交了退休报告的老教授的家。他们都是有名望的学者，在其它机构和大学都有兼职，又有名誉头衔，所以即使从这里退休，也不妨碍他们继续从事研究和写书。他们的说法和老君 大同小异，并说自从听到收编的消息后，他们就有了退休的想法，近来又说要发军装了，更是坚定了那个念头，恰好又发生了军人抢占住房的事，实在是气不过，感 到这里一天也不可以多待。一位老教授甚至对我和阿宗说：「我老了，可以

退休。可你们怎么办呢？与他们顶着干，早晚是要有祸的，与他们同流合污，恐怕你们又 不肯出卖自己的良心和准则。好好考虑一下，现在不是你们来关心、体谅我了，而是我在担心你们了，从上至下，风气就不正。」

结 束了对两位老教授的拜访后，我让司机把我和阿宗送回所里。阿宗对我说：「已是下班时间了，回家吧，冷静地考虑，一切等明天再说。」我还没说话，司机插进来 说：「我刚才给阿生打电话，阿生说大约两个小时前，一份由七百多人签字的抗议书，已经交到大校的手里。阿生给你留下一份复印件，交完抗议书后，人们都散 了，所里已没有人。」我说：「那也好，阿宗，我们找个地方去喝杯酒，你同意不？」阿宗摇摇头说：「我需要冷静，要考虑问题。我也劝你回家，不知道明天又会 发生什么，你累了，先送你回家。」

到 了家，太太也是刚把女儿接回来。看到我回来的这么早，有点吃惊。可能是我的脸色不好看，太太连问我是不是病了，我只是简单地说：「心情不好，要喝杯酒，不 要打扰我。」说完，我走进了起居室，并关上门，然后坐在沙发上大口地喝了几口酒。我千方百计地想要集中精力，但脑子里乱乱的，这两件事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可 想象的，老君的预测是对的，这个所不会存在很久了，民心哪！共产党自己在做着丧失民心的事，这就是大局。我闭上了眼睛，可能是由于一天没吃东西的缘故，空 着肚子喝了几口酒，我有些迷糊。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被父亲叫醒了，他正关切地看着我，我想要做出个笑容，但我没有作出来。我点了支烟，平静地告诉父亲这两 天发生的一切，又尽可能详细地分析了一下这个局面，最后告诉父亲：「凭我的力量是不可能挽回来了，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辞去职务，但上级肯定是不会批准的，所以最好是连工作一块辞去……」

父 亲打断我，对我说：「我还没有听到过辞职的先例呢。这一两年是有几个人离开了工作，他们提出了辞职，但都没有被同意，他们是扔下了辞职书，然后就离开了。 我是老了，给共产党干了一辈子，遵规蹈矩，小小心心，可历次的运动它们也没少找我的麻烦，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奇迹了。你们这一代人与我们不同，无论是在 看法上，做法上都比我们大胆多了，尤其是现在又是改革开放时期，但是我要提醒你一点，那就是在政治上、人事制度上并没有改革，所以事情就变得格外复杂，当 它们需要你时，无论你怎么做都是对的，可是一旦你让它们感到不满意了，它们就会用它们那一套所谓的原则标准衡量你，那么你就等于犯了大罪、死罪一样。我在想，你可以找他们去谈谈，做一些让步，缓和一下紧张，同时也争取一些时间，你再想办法退下来。」父亲提到的两代人不同是对的，他不明白的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比他们更恨共产党。当晚，我写了辞去职务和辞去工作的两份报告。

隔 天上班后，我去找老副书记提出我的看法。他很同意，于是我们两人一起去找书记郭。书记郭马上又把大校找了来。我开诚布公地提出了三件事，首先，大校下令给 那三十六户军人及其家属，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搬出新楼，并公开向全体职工道歉；第二，把被下令退休的人请回来开会，向大家讲明退休是自愿的，而不是强迫的， 努力挽留专业科技人员并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安定人心，同时宣布任何人如愿意退休，可以提出申请；第三，那批督导员不可以退休，如果上级仍不打算去追查这三百 四十万元的话，所党委应成立项目小组，确定调查报告的可信性，如认为属实，立即将此案移交司法处理。这三件事当然引起争议。我又提出现在就召开党委会，书记郭提出由于保卫处长已被撤职，所以他的党委委员的职务也自动免除了，党委只有 6 位委员，不利于表决。于是他建议让大校参加党委会，我同意。分钟后，党委会召开了。我再次地提出了我的三点主张，引起了将近两个小时的争论而无结果，最后直到表决，被以三比四否决了。

老 副书记马上提出，大校只是参加党委会议，但他不是党委委员，所以无表决权。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于是第一次表决无效，第二次的表决结果是三比三，既不能通 过，又不能否决，我的这个主张只好留待以后研究解决了。这是文字上的说法，实际上就等于这件事不存在了。大校松了口气，书记郭脸上出现了笑容，我什么也没 有讲，只是向大校要了那份有七百多人签字的抗议书后，就回到我的办公室。老副书记和阿同也跟着来了，我劝老副书记退休，然后又要求阿同在我以后的行动中不 要参与，他们似乎明白了。马上劝我不要采取过激行动。我表示了感谢，然后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就强行把他们送 出了办公室。随后，我把那位少校副主任、阿生和阿红请了来，要他们马上发出通知，下午三点半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内容是我向大家讲话。第二，除去三十多名督 导员外，凡是被下令退休的人，马上发出邀请信，请他们在周末来参加欢送会。通知人事、后勤、福利三处准备退休礼物和欢送宴会，又让阿红通知司机，我马上要 出去。

车 子开出大门，我告诉司机去政委的那座小楼。收编半年了，我竟说不出上司们的办公地点。司机说他还记得那个地方，就是新年前政委请我去吃饭的那个小楼。他终 于把车停在了这座小楼前，一位下级军官说政委不在北京，又说，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司机问他政委现在在哪里，他又不说。司机又问他政治部主任在哪里，回答也 是一样的。我问他这里有没有其它负责人，回答是所有可以做决定的首长全不在。只有一位少校副官处理一般事务。于是我被带去见这位少校副官，向他讲了我的来 意。他表示他可以向上级报告，我要求与政委或政治部主任通电话，电话接通了，但回答的是秘书，上司们全不在，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没办法了，放下电 话，我请副官向上司转达。副官不耐烦了，马上拒绝了。我的火气也冒了出来，对他大声说：「下个月的一号，我就要穿上和 你一样的衣服了，所不同的是，听说我的肩章上是三颗星。」副官马上立正了，并说我可以把要向上级汇报的事写下来，他会一字不差地读给上司听的，同时他也会 把上司的话一字不差地记下来，并立即送给我。我只好坐下来，写了一份简

要的报告交给可副官，他立正说是，又保证一旦得到指示会马上告诉我，一边又把我送上 了车，并向我举手敬礼。我看着这个机械工具，感到又烦又悲。

上 司是指望不上了，回到办公室，我开始准备大会上的讲话稿，直到阿红进来告诉我开会时间到了。我正要起来，阿宗进来了，告诉我他准备在会上也要讲几句话的。 我摇了摇头对他说：「是我召开的这个会，事先我并没有与任何人商量过，所以这个会也与任何人无关，我做事我负责，你的话留到以后有机会再说，现在我只请你 做一件事，去请大校和书记郭参加大会，来不来由他们，至于你去不去请，也是你的自愿。」阿宗看着我，说：「我明白了，我不讲话，也不坐在台上，我和职工们 坐在一起。现在我就去请他们俩参加大会。」我点了一下头，他出去了。

当 我走进会场的时候，立时就感到了会场力的紧张气氛，台上则只有大校和书记郭坐在那里。我走上了讲台，大校马上站了起来，快步向我走来，低声问我：「召开这 样一个大会怎么事先不你也不告诉我呢？」我笑了一下说：「我也是临时决定的，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书记郭也凑了上来，对我小声说：」党委会上没通过的 事，我希望你不要对职工讲，否则你是要负责任的。」我仍是笑着对他说：「这就是和我你不同的地方，至少我还敢负责任的。」看来，他们还想说什么，但我已转 向了麦克风，对会场里的职工们说：「十分抱歉打扰了各位的工作，临时召开这个大会，我是想把这两天发生的、大家都知道了的事做一个我个人的表态，且不论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与否，至少我认为职工们有知道的权力。」会场上静极了，一千多双的眼睛盯住我。我首先讲到了军人抢占新楼的事，提到了这是有预谋的行 动，我叙述为了建造这座楼是如何的经过了阿成和我两任副所长的努力才完成的，又是如何地经历了民主的程序，公正而又令职工们满意地选出九十个首先应分到住 房的职工。又提到，我曾三次强调过，在分房一事上一定要发扬民主，绝不允许党、政权力的干扰。我感激由职工代表组成的分房小组的辛勤和公正的工作。并深表遗憾地提到，绝没想到军人们会公然干出这种不顾群众利益、抢占住房的行为来，又对事件发生后当天，分到房的职工和家属们表现出的克制精神表示钦佩和感激，致使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事件。

提 到了上午的党委会及表决的结果时，我说：「职工表决的结果就等于把这件事永远的搁置了起来，在这件事关原则的事情上，党委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个黑白不分的表 决结果，实在令我惊讶。召开职工大会完全是我个人决定的，我要告诉大家这一切，但我目前仍然是这个所的副所长，并代行所长的工作的，所以我仍然有权力做出 以下的决定，那就是从现在开始，二十四小时之内，住进新楼的军人及家属搬出来，让该住进去的职工搬进去。这些军人必须向全体职工公开道歉，策划这次抢房的 人必须受到处罚。如果他们仍属于『人民的军队』并且还『爱人民』的话，就请立即搬出。」

说到这里，我拿出那份职工联名的抗议书，并宣读了内容，然后，我又在抗议书的最后签上了我的名字。我走到大校的面前，郑重地把抗议书交给他。他仍坐在那里，没有动，也没有接。我把抗议书放在了他的面前。会场上出现了掌声。我立刻摆手制止，又说：「如果我的行政命令没有被执行，或者军人们拒绝搬出的话，我辞职。这里是我昨晚写好的辞职和辞去这里工作的两份报告。」我向职工们宣读了我的两份报告后，又转向了大校和书记郭，郑重地把两份报告放在了他们两人的面前。

我知道，这又会引起一阵掌声的，于是我马上转回到麦克风前，及时地制止住了掌声。我提到了自从收编以后，所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和现象。面对着会场里九百多名职工和新近调进来的两百多名军人及军官家属们，我提到了我们是如何地克服困难安置了这两百个派来的军官和军人家属们，而且提到了这两百人的到来并没有给所里创造哪怕一分钱的价值，反而使每个月的工资开支上凭空增加了五万块钱，一年就六十万元的额外开支，可在我们今年的财务预算中，并没有这六十万元的额外项目。

我又提到去年剩下的一千四百万元的扶贫款，也在不久前不翼而飞，经过追查才知道是军人拿走了，说是借用，但并没有给我们写下借据，更没有提到什么时候归还。我们连这一千四百万元的借据都没见到。一份已经订出去的合同只好作废，而我们又不知道该如何向对方去解释。我们更感到对不起人家的是，在这个一百三十万元的合同订出去后，我们所里竟有人向人家收取了一个百分之三的现金回扣，总计三万九千元，四个干部分了这笔现金，其中一个是刚调来工作三个月的上尉军官，也往自己的口袋里装了九千七百五十块钱。收编不到半年，全所在请客吃饭上的开支已超十万元了，而收编之前，全所在这方面的开支全年也花不到一万元的。

接下来，我提到当初军方的许愿是，派技术人员投资建厂，使本所逐渐地成为研究和生产并举的单位，但目前毫无迹象表明这个许愿会成为真的。人是派来了两百多，但技术人员一个没有。为了解决人多开支大的问题，前不久提出了一个名单，让一百多人提前退休，另外七十多人也归入了退休名单，又在我外出开会期间，强行下令这一百七十多人退休，这其中包括十几名高级科技人员，严重违反了现行的知识分子退休政策。我又说到了两个调查组辛苦工作了将近一年，终于将三百四十万元的下落找了出来，总共二十九个督导员负有直接责任的，我们几次请求上级处理追查，但没有回音，而这次这二十九个督导员也在退休名单上，那么谁又来负责这三百四十万元？我建议将此案移送司法处理，也在今天上午的表决中被搁置。我说：「正是由于这些现象，加上贪污腐败，以权

谋私，无视职工的困难和要求，使广大 职工寒心，仅这一两天之内，我就收到了五、六十个职工写来的辞职和请求调走的报告。

我 完全理解，因为我也刚刚交了辞职报告。但是我希望大家稍安勿躁，由于人事制度并未改革，所以无论是请调还是辞职的要求，仍要上级的批准，在获准之前，我们 仍要尽职尽责地工作，同时也让我们盼望或许事情会得到圆满的解决。」说到这里，我停了一下，又说：「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因为这是我召开的会，所以我可 以宣布散会了。可是由于所里的其它几位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出于礼貌的关系，我必须说，如果他们要说几句话的话，现在正是个好时机。而我是要回办公室去工 作了。再次感谢大家参加这个会。」说完，向大家鞠躬，走下讲台，走出会场。

阿 红拿着开水跟着我回到办公室，又给我沏上了茶，我坐在沙发上，点了一支烟。阿红把茶杯放在了我面前，也坐了下来。她看着我，很真诚地说：「我是第一次听到 像你这种级别的干部，在大会上如此实事求是地讲话的，王大校和书记郭的脸上可不好看，你不怕他们会报复吗？我可是有点担心的，你考虑到了可能的后果了 吗？」我笑了一下，说：「如果因为我讲了实话而被枪毙了的话，那么在这一千多人当中，至少会有几个醒悟的，那不是也挺好的吗？我已提出辞职，他们可以点个 头，让我离开也就完了，还非把我弄死才解气？」

正 说着，阿宗进来了，他笑着和我握手，赞扬着我既让职工们知道了真情，又揭露了一些内部的丑事。他问我：「我没想到你会公开提出辞职。告诉我，你是在给他们 施加压力还是真的要辞职？」我认真地说：「当然是真的了，我不是搞政治的，也不会耍手腕，他们在我背后不断地制造事端，搞得我无法工作，我当然可以不干 了。」阿宗说：「假如他们做出让步，让三十六个军人搬出来，你会不会收回辞呈？」我还没说话，阿同、阿生进来了，告诉我职工们已经回家，又说在我离开会场 后，大校也离开了。书记郭走到麦克风前，对着不断离去的职工大声说：「会开得很好，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党委会马上开会商讨解决办法，我以我个人的名义表 示，一切都会解决的，我也不会让所长辞职……」

第二天午饭时间，我把福利处的副处长和财务处的总会计师请到我的办公室。我们边吃饭边讨论第二座楼的事。胖处长已经把地买了下来，开工的手续也办得差不多了。建筑公司的业务清淡，一再催促着我们马上开工。第一笔的工程款老君已经准备好了，四个月后要交第二笔工程款，总会计师讲，问题不大，到时可以拿得出来的。

他们两个人劝我同意马上开工，否则不是这块地让军队占有，就是把工程款又调走了。至于楼盖好后又会发生什么，谁也无法预料，但做事总比不做事好，也只好心到神知了。所以最后决定，由他们两个人负责，马上开工。副处长又提到建筑公司希望我们马上验收， 他说胖处长也同意马上验收，让五十四个职工立即搬入，以免夜长梦多。总会计师也认为验收是对的，至少可以让这几户人家立即搬进新房。最后我又请求他们俩 人，说服老君和胖处长一定要来参加欢送会。副处长告诉我，他已接到通知，准备给每个退休的人买一件礼物，同时正在安排一个比一般客饭标准稍高的欢送宴会。 我打断了他，对他说：「这些军官自从来到这里后，用公款请上级、请下级、请老朋友、请同乡，甚至请亲属吃高标准的招待餐，我们阻挡不住。

可是这些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辈子的人，又是在这种情况下退休的，难道他们就不可以享受到高标准招待餐吗？你去安排好厨师和好的菜单，要让这些退休的人们感到我们对他们的尊敬、感激和珍惜之情，要让他们高兴，礼物也要买好一些的。」

已 两天了，军人们并没有搬出来，少校军官没有给我送来上级的指示，大校和书记郭也没有来上班。楼房验收了，五十四个职工给假一天搬入新居，车队组织了运输力 量帮助他们搬家。当天的下午，第二座住宅楼开工了。那三十六户该搬入新房的人们在新楼前抗议了一整天，那三十六户抢占公房的军人们紧闭门窗，几天前的那种 嚣张的气焰已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据说，又有八十块玻璃被打碎了。在所里，职工们自发地写了一封敦促书，内容是敦促党委，正视我在职工大会上提出的问题，查 处贪污违纪的人，要求党委站到广大职工们的立场上来，同时挽留我继续工作，正发起一个签名运动。

大 会后的第四天的上午，我正在准备一会儿就要用的对退休人员的讲话稿，书记郭进来了，问我是不是可以到他的办公室去谈谈。我告诉他，一个多小时后我要参加欢 送会，他马上说：「我们先谈，到点我们一起参加欢送会，好不好？」我只好让阿红完成讲话稿，和书记郭来到了他的办公室。看来他是有所准备的，茶已沏好，只 有两杯。我坐下后，他把一杯茶推到我面前，说：「你召开的那个大会搞得我太被动了，把我夹在了你和大校的中间，我又收到了职工们送来的敦促书，把这个难题 踢给了党委，你说，我可怎么办？」我呷了一口茶，对他说：「任何事都有个是非对错，做你认为是对的事。」他笑了一下说：「看看，你也把球踢给了我。别忘 了，在党委会除了我就是你了，要难咱俩一起难，我可不给你擦屁股的。」

他 的最后的这句话激怒了我，我放下了茶杯，质问他：「那我就应该永远没完没了地给你们擦屁股吗？！这几个乱子是谁造成的？我应付不了了，找你和大校

商量，并 提出解决办法，可党委会上又被搁置了，对不起，这样的事我干不了，只好请求辞职了。」书记郭马上说：「事情发生了，我们总会有办法解决的，你不必那么匆匆 忙忙地召开大会，讲了那么多，又是签字，又是辞职的，你给我造成了压力，想让我怎么办？」我站了起来，对他说：「如果你找我来是想解决问题的话，我欢迎， 如果你只是想责备我的话，我不接受。」书记郭马上换了一副笑脸，对我说：「别发火嘛，我又没说你什么，我请你来，只是想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大校对我说，他曾打算和你谈谈分房的事，可刚一张口就让你给堵回来……」我马上说：「于是他们就抢，对不？」

书 记郭没有马上说话，半天才说：「这样去抢房当然是不对的了，可是……」我打断了他说：「可是什么？既然不对马上改，党委有权下令让军人搬出来，然后给予党 纪政纪处分，以此来表明党委的立场，建立威信，如果你想做，是一点儿都不难做的。」我说完，屋里出现了片刻的沉静。书记郭打破了沉静，他说：「原谅我说这 句话，你还年轻，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其实，许多事情都不是可以简单的以对和错来划分的。现在的事都讲关系，这也可能就是你说的风气不正，可我们又有什么 办法呢？他们是军人，关系直通中央。我们没有这种关系，可这个所总得存在吧，既然归属了军队，总要忍让一些，搞好关系的。」

我 抽了口烟，说：「当初，促成收编的是你，现在你可以想想了，收编后还不到半年，军队从我们这里得到了多少的好处，而我们又从军队哪里得到了什么？你以为这 所还能存在很久吗？我敢说，到明年或者后年，这里将塞满了军人和军人家属，研究人员全会走光了，牌子可以仍旧挂着，你也可以坐在这里当书记，可我，对不起 了，我伺候不了他们的。」

书 记郭点了支烟，吸两口后，用试探的口气对我说：「你看在房子的问题上，我们可不可以做一步的退让，比方说，让十八或二十家军人搬出来……」我马上打断他， 说：「不行！」书记郭说：「我们正在想办法，你也考虑一下，你和大校有矛盾，我是帮你们调解的，双方都让一步，事情不就解决了？」

我 冷笑了一下说：「这就奇怪了，大校说我和你有矛盾，你说我和大校有矛盾，这是事实吗？大校不声不响地转走了一千四百万元，我没说话；两百多军人和军人家属 的工作，我安排了；五个多月军人们请客吃饭十多万花出去了，我也没说话；还要我咱们退让？这次又公然抢房，我已是退到无路可退的地步了。现在我不明白的 是，在这些事情上你为什么怎么软弱，可以假装没看到，没听到，牺牲本所和职工的利益去讨好军人，你是不是与军队有什么默契，想达到什么个人的目的？如果不 是的话，你为什么对这些辛辛苦苦工作的职工们又是那么恨呢？几次三番地搞出『暴乱嫌疑』的名单，事实证明你错了， 可你仍坚持。现

在又迫使一批正在发挥作用的职工们提前退休，你明知我不同意，却在我外出开会期间突然行动。我最不明白的是，明明是你该做的工作你却不做， 就拿那三百四十万来讲，既不追查也不做任何事，反而把与这笔公款有关联的二十九个人退休，可不可以认为，你也与这笔钱有关？！」

他 用手重重地拍在了沙发的扶手上，大声地说：「你认为我有贪污吗？我为党工作了几十年，还没有人敢怀疑我贪污呢。你刚爬上这个位置几天，竟敢对我这样讲话。 告诉你，我也就是没什么文化，否则我今天绝不止只在这个位置上的。当初是赵紫阳的主意，把你们这批人提拔了上来，现在赵紫阳完蛋了，你还有什么可神气！」

听 了他的话，我的火气也冒了起来，同样大声地说：「我不知道是谁提拔了我，但不管是谁，我并不感谢。我有我的专业，不干这个，我仍可重回专业。而你不同，你 必须拼命地保住你的职位，因为除此之外，你什么也不会。什么也干不了。你张嘴闭嘴地为党工作，可党口口声声地说要为人民服务，人民的三百四十万被贪污，你 不管，还包庇，这就是你的为党工作。我说过，对共产党的这群所谓的政工干部们，我永远也理解不了的」

我 以为我说完这番话后，和书记郭必将有一场大吵的。但书记郭很平静，脸上现出笑容，慢慢地对我说：「你到底年轻，容易冲动。不过，你对我的批评。我会好好地 考虑的。看来，今天我们只好先谈到这里了，不过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还会请你来的。」说到这里，他站了起来，对我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一起去参加欢送会 吧。」

我也站了起来，对他说：「我看我们没必要再谈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太大，谈不到一起的。」他马上说：「没距离，我们都是在为党工作，而且想把工作做好。」我说：「那好吧，但我有个条件，我提出的这些问题，若不能至少迅速解决一件的话，我是不会再与你或大校谈的。」

书 记郭马上笑着说：「你不要逼我好不好？事情发生，总要谈才能解决。」我冷冷地对他说：「我的两份辞职报告在你和大校的手里，请不要拖延马上送交上级，我既 然提出了辞呈，我是下了决心的。你们拖延了，我可不会拖延的。一段时间没有回音，我会采取下一步行动的。」书记郭假装着没听到我的话，看看表，又催促着我 想和我一起参加欢送会，我借口要回办公室拿讲话稿先走了。

欢 送会开得并不好，气氛很压抑。我在讲话中完全没有提到最近发生的事，以极其尊敬的心情感激和赞美了他们的工作，又以轻松愉快的口气祝愿了他们在退休后的儿 孙绕膝，轻松愉快，健康愉快的生活，但似乎作用并不大。在书记郭讲话时，一道一道菜端了上来，那种沉闷的气氛打破了，人们互相交谈起来。至于书记郭都说了 些什么，估计也没人听到。

菜 已上满了桌子，我站起来，向大家祝了酒后，老副书记突然地向书记郭提出了问题。他要书记郭向大家明确地表示态度，对于所里最近发生的几件事究竟站在哪一个 立场上。书记郭笑嘻嘻地说：「我当然是站在广大职工的立场上的，这是原则问题嘛。」老副书记又问：「那么这封要我们参加欢送会的邀请信为什么发自行政而不 是党委呢？书记郭」指着我对大家说：「我是党委第一副书记，他发的邀请，当然也代表党委了。」老副书记马上又问：「既然如此，那天副所长在大会上讲到那些 问题，是不是也代表了党委的意思？那么这几天来党委采取什么措施？军人搬出来没有？」书记郭迟疑了一下说：「党委很重视，正采取措施，在参加这个会前，我 们还在商量呢。」

我 正要站起来，想转移话题。另一位退休干部大声问书记郭：「既然副所长的讲话能代表党委的立场，那就证明党委内部不存在一件分歧，已经几天了，为什么还没见 到党委采取任何措施呢？」书记郭没有回答。我慢慢的站起来，笑着对大家说：「我十分感激你们，仍在关心所里的事情，但现在在美酒佳肴面前，讨论这些事是不 太适宜的。你们工作了一辈子，经历的酸甜苦辣太多了。可是从今天开始，你们解脱了，面临着新生活，除了欢乐、愉快以外，再不要有别的了。让我们再干一杯 吧，为什么呢？为天下太平干一杯吧！好不好？」我举起了酒杯，大家都举起酒杯，不少人重复地说着：天下太平，天下太平。

王 大校大约有一个星期没来上班了。一百四十多人退休了，所里好像空了一大块。但同时也显得军人多了起来。我没有批准那二十九个督导员的退休，至于他们每天是 否来上班，我就不清楚，其实他们来上班也是没事可做的。据阿同讲，他们经常聚在书记郭的办公室里。阿宗忙得晕头转向，因为退休和辞职的研究人员留下了很多 研究项目无法进行，更有不少项目只进行了一半，他几乎每天都来找我商量怎么办。而我面对着五、六十人的辞呈报告也已经焦头烂额。

我 让人事处去查辞职的条文，他们还真的查出来了，那还是五十年代初，劳动部的条文，但都从来没用过的，条文中明确第规定，辞呈是允许的，而且还要根据辞职人 的工作年限，发一笔为数不多的辞职费。我去找书记郭商量此事。书

记郭大怒，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辞呈的，并大骂这些人忘恩负义，忘记了是党培养他们上大学 的，是党让他们学会了科学技术，结果一点小事的发生，影响了个人的利益，就要辞职，这实质上就是对党不满，弃党就是反党。我只说了一句：「不要讲五、六套 的住房了，这些人所要的仅仅是一套像点样子的房子，这与反党联系不上吧？」书记郭不说话了。我逼他马上召开党委 会研究怎么办，可他却认为这是小事，不值得召开党委会，并说：「不要理睬这些人，看他们还能怎么办。」我告诉他，不少人已在写下辞职信的当天就走了。他们 并不想怎么办，只是想离开这块是非之地。书记郭不说话了。最后又是那句话：「你主管行政，这是行政上的事，你作主看着办吧。」

我 召开了一个要求辞职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主题是讨论一下继续留下来工作的可能性。同时，我还把党委和行政各部门的负责人都请了来，我也邀请了书记郭，但他没 敢来，只派了他的秘书来作记录。座谈会开的很热烈，由于决心离开，不存在在以后的运动中被整的顾虑，所以大家说话十分直率，普遍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工资待 遇太低，加上住房在物价上的失控导致了所有生活必需品涨价，现有的工资无法维持生活；第二点是住房的严重困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政府几乎就没有为百姓建 造民房，十年文革后，人口却增加了近两亿，尽管政府开始认识到了这是个大问题了，也开始为百姓建造民房了，但 腐败风也刮了起来，作为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是根本无望去得到住房的；第三，经济的改革，如果不能导致政治上的相应改革的话，经济的改革就是一句空话，这种 矛盾已经在国有的企事业单位中明显地出现了，而且相当激烈，最终很可能又回到政治斗争中去的。人们厌恶政治运动，要求政治清明，国泰民安，安静的生活，安 心地工作，更希望受到尊敬，享有做人的权力。他们都已被一些地方或集体性质的企事业邀请去了，工资增加了两三倍，又可以得到住房，生活上可以无后顾之忧。 这些企事业单位要生存，要发展，那就要尊重人才，同时贪污腐败的现象也很少存在，因为他们也是贪污腐败的受害者。

当 我再次的试图劝说大家留下来时，反应相当冷淡。最后我几乎是含着眼泪对大家说：「各位的去意已决，我尊重你们的决定，尤其理解你们的境况，现在我所能说 的，就是我同意你们的辞职。同时人事处也找到有关辞职的一些规定，但却是从来还没有人使用过的，这次就从我们这里开个先例吧。根据你们每个人工作年龄的长 短，每个人都应该得到一笔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的辞职费。这笔钱已为大家准备好了，散会后可以到劳资处领取，这是我们能为你们做的最后一点事了。我只希望 各位在今后与我、与阿宗副所长保持联系，今后在你们的事业中凡是许愿我们帮助的地方，我们会尽力的。同时也不排除一个可能，那就是几年后，如果我们能把这 个所办得更好一些的话，仍希望各位能回来。」

一 一握手，送走了这批辞职的人后，我对在座的党政部门的负责人说：「我希望各位能从今天的座谈会上学到些什么，我们应当感到羞愧的，让这么多这么好

的科技人 才离我们而去，我们留不住他们，为什么？我们在工作中存在着问题，我们对职工们的生活关心的不够，我们对他们也尊重的不够，贪污腐败的风气在我们这里也蔓 延开了，职工们痛恨这个的。另外，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自从一周前一百四十多人的退休，加上今天的五十多人的辞职，总数中的将近百分之四十是科技专业 人员，占全所科技专业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八，这就等于从第二季度开始，研究项目也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八，连带的就是上级的拨款也会减少百分之二十八，而职 工总数仍有继续上升的趋势，那么今后的工资是否还发得出来？如果发不出来，我们又该怎么办。这是我希望大家关心的一个当务之急。」

散 会后，阿宗跟着我回到我的办公室。他开门见山地提出要我马上把刚开工的第二座楼停下来，理由是他已预算到了今年全所职工的工资的危机了，要我把盖楼的钱留 下，至少可以解决两三个月的工资问题的。我苦笑着问他：如「果这笔钱又被军队悄悄地转走了，你又怎么办呢？」他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呆呆地坐在那里。我 给他沏了杯茶，对他说：「我不是没有仔细地考虑过，我原想用这笔钱盖工厂，里面包括六至八个车间，我找工程师计算过，盖一个厂房和盖一座住宅楼的造价基本 上差不多的，但问题是，这几个车间里的机器设备的费用，是要几倍的高于盖工厂的钱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拼命地追查那三百四十万的原因。

在 我也看出来，追回这三百四十万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了。我改变了主意，与其盖好了工厂让它空着，不如盖住宅楼，先让一部分职工住进去更实际些。」阿宗点了点 头，表示同意。接着他又与我商量如何采取一些奖励措施，以刺激研究人员多接受一至两个研究项目，这样减少的项目会少一点，如果人员不再增加的话，还是可以 勉强维持的。现在的问题是，他需要几万块钱的奖金，问我有没有办法。

我 马上点点头，对他说：「无论你需要多少钱，我都会想出办法的。我只要求你一件事，在你制定奖励制度时，把奖金的标准定高一些，这些留下来的人够苦的了，还 要多干工作。钱，我们最好大方些，否则到年底，军人们请客吃饭的费用至少又是十几万的，真不如让我们的科技人员拿走这笔钱的。」阿宗高兴了，但马上又心事 重重地说：「你仍坚持要辞职吗？你走了后，我怎么办呢？」我笑了一下，对他说：「首先，我劝你千万不要与他们顶着干，你仍是副所长，也可以学他们的样子什 么也不干，或者你也可以辞职。你以为今天这些辞职的人是最后一批吗？我敢说，这仅是刚刚开始，一年或两年后，这批人工作得开心，会再到这里来拉人走的。他 们都是有专长、有本领的人，心情愉快了，很快会做出成绩来，当他们回来现身说法，再以每月多出三百或五百的工资和一套住房的条件拉人走时，你想想，还有什 么主义或路线可以阻止这里的人不跟他们走？」

第十九章 记住绝不戴这种帽子

阿宗点了点头，对我说：「你说的这些其实我也想过了。我快五十岁了，对我的今后一点信心都没有，更 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正要告诉你另一件头疼的事。昨天，书记郭找我，说是经过上级的同意，我也要穿军服了，军衔和你一样，也是上校。当然了，书记郭也没少表 白，他为了这事是如何的奔走，说服上级的。其实，我是真恨那身衣服的，我是不会穿的。可书记郭说了，命令马上就下来，必须穿，我可怎么办，这是我想和你商 量的。另外，从他们让我穿军服这件事上看，我认为他们很可能是要集中精力对付你了。你想想，我是两次上了黑名单的人，现在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书记郭不 可能联合你我共同对付大校的。所以你要小心，大校一个多星期没来上班了，书记郭在军衔一事上大做文章，拼命地拉拢一部分人。你分析得对，这个所不会维持太久了，而且我敢说，这个所就是毁在了军队的手里。」听了他的话，我忍不住叹口气。由于刚送走一批辞职的人，我们两个人的心情都不好，见我叹气，他也叹说他感到心里憋闷。

当 天下午，已到了快下班的时候，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大校。他笑着向我问候着，而我却没有像以往那样站起来表示欢迎。我仍坐在那里，冷冷地看着他， 他坐在沙发上，又把拿在手里的一个塑料袋放在了茶几上，告诉我，他去了上级那里，向上级汇报了一切，上级也收到了我托那位副官转送的报告，这次他回来，上 级托他带给我一封信，说到这里，他让进来正在给他沏茶的阿红把信递给了我。我打开了信封看信，信的内容十分简单，大意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一切，只是目前事务 繁忙，仍要大约一个月后可来北京。研究所的事将会优先解决，要我尽一切努力保持工作的正常进行，最后提到第二季度的拨款已经签发，不日即可收到。

我把信放下。大校又说：「军装已经运到了，最迟明天就可以发到每个人的手里了。我这次回来，也把命令带来了。两天后就是四月一日了， 全体职工要穿军装上班了，这里是转达这个命令的通知，我和书记郭已经签了字，你也要签字的。」说到这里，他把那个通知递给我，同时又用手指着那个大塑料 袋，对我说：「我特别到后勤部仓库里为你挑选了这一套军服，肩章我也替你戴上了。这次上级比较明确地提到说时间不会太长，你的肩章上会再多一颗星的。」我 并没有去看那份通知，冷冷地问他是否将我的辞职报告交给上级了，他马上点头说：「上级看到你的辞职报告后都笑了，让我转告你，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他们是 不会让你走的。」

我问他，那几十个军人什么时候搬出来。他的回答是：「上级来了后，会解决这件事的。」我对他说，我没有同意督导员们的退休，问他向上级报告了这件事没有。他回答：「他向上级详细报告了一切，上级一再表示，一旦回来后，将一次性解决全部问题。」我又问他这次穿军服的命令是不是也包括这二十九位督导员。大校很郑重地说：「当然，既然没有退休，那么就仍是本所的职工，当然要服从这个命令了。」我马上说：「那就对不起了，我是不能与这些有贪污嫌疑的人穿一样的衣服的，这是一。第二，在我提出的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是不会穿上这身衣服的。同时也请你转告上级，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多几颗星或少几颗星的。第三，我的辞呈已经提出一个多星期了，而这个穿军装的命令是刚下来的，我就更没有必要去服从这个命令了。我等待上级批准我的辞职，只是表示一下我对上级和这套工作程序的尊敬而已。我不想在这里干了，难道还要这里的上司批准吗？我完全可以现在就站起来走出去，无须什么人同意或批准。」

大校马上说：「可是，作为一个军人……」我立即打断了他，大声说：「我不是军人，我和这个所已经为你们军人做的太多太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你们军人为这个所，或为职工们做点什么！」大校站了起来，对我说：「这是不同的，上级说要解决问题，那就一定会解决问题的，在解决问题之前，上级的命令还是必须服从的。」

我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拿起了那份我并没有签字的通知递给了他，他犹豫了一下，接过通知走了出去。大校刚出去，阿红推门进来了，对我说：「你这样做是不是太生硬了，恐怕对解决问题不利，反而……」我打断了她，说：「不要讲了，妳以为问题会解决吗？请现在马上把这个塑料袋给大校送去，同时通知司机，我要回家了。」

那天晚饭后，我正在看电视新闻，女儿嘻嘻哈哈地跑了进来，头上戴着那顶好像王八盖子似的军帽给我看。我大声地对女儿说：「摘下来！」女儿看着我，脸上露出了要哭的样子。我马上把她搂在怀里说：「我的女儿是世界上最美的小公主，戴上这个帽子，人家就看不到妳的头发和脸，所以也就不知道妳有多好看了，对不？记住，绝不戴这种帽子，好吗？」我正和女儿说着话，太太进来了，手里竟就拿着军服上衣，要我穿上试试合身不，又告诉我是司机依大校的命令偷偷交给她的。我对太太说，我不想看到这身皮，请把它放到床底下去。太太似乎还想说什么，我已把脸转向电视。

第 二天去上班，马上就发现所里的气氛不对。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正在议论着什么。当我走进我的办公室时，看到有几个人等在这里了，他们见到我，马上就纷 纷地抱怨关于这次军衔评定的不合理。听着他们的投诉，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书记郭在军衔的评定上要了手腕，对于他的三十几个亲信都授到了比规定高出一级的军 衔，对于他怀疑是有问题的人或他不喜欢的人以及和他有过矛盾的人，在这次的评定军衔上都比规定的要低。一批人走了，又来了一批。听着人们的这些反映，我的 火气就控制不住地往上冒，我极力地控制住自己，耐心地听着。一个多小时，我接待了十多个人。我告诉他们详细地写出他们认为不满意的理由，形成正式的报告交给我。我也毫不隐瞒地告诉大家，恐怕我解决不了这件事，结果很可能就像以前发生的几件事一样，根本就没有结果，但不管如何，我会尽力去办。

这 些人都走了以后，我让阿红把行政办公室的两位主任找了来。阿同恰好也来了，手里拿着两三份报告，对我说：「今天一早，就有人来找我，让我转交给你这几份报 告，内容都是对这次军衔评定的不满意和有看法的投诉报告。」我告诉他我已经接待了十几个人了，都是同样的问题。阿同又说，书记郭和大校的办公室里也都有投 诉的职工。我对少校和阿生说：「你们在行政办公室里挑选一个人，专门接待这些投诉的职工，你们两个人要详细分析每一份投诉，彻底搞清在这次评定军衔中的问 题，然后搞出一份总结报告给我，我要求你们在七至十天内完成，可以不？」两个人点着头答应了。待他们两个人离开后，阿同叹了口气，对我说：「你的事情还少 吗？怎么又去管这件事呢？风气已经是这样了，你是改变不了的，我实在是担心你。」我看他一眼，什么也没说。

四月一日早上八点三十分，司机正点来接我上班。看到我仍是穿着平时的衣服，已是穿上了一身崭新的军服的司机犹豫了一下，然后低声对我说：「可能你忘了，今天是四月一日，全体职工要穿军服上班的。」我说：「我知道。」然后坐进了车，司机也坐进来，扭过身来对我说：「这样可能不太好，如果想换衣服的话，我可以等，时间有富裕。」我向他挥一下手，简单地说：「开车。」他没再说话，开动车子。

当 汽车停在了所的门前，我首先看到大门两边各站立着一名持枪的士兵，就在门口和门外站着大约二、三十个职工，似乎是在等什么，但又不像。当我下车后，他们都 热情地与我打招呼、问候，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一下天空，意外地发现这座八层楼的建筑物的所有窗户都有人在向外张望着。我看到他们时，他们都向我挥手，我只好 后退几步，也举起一只手向大家挥了挥。走进大门，两个士兵向我敬礼，我没有理他们。

进 了门，看到大厅中和楼梯上都站着不少的人，看我进来了，都向我打招呼、问候，我一边走上了楼梯，一边与大家问候着。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无论是门 外、大厅和楼梯上的人们都没有穿军服。在楼道里，其只看到两个人是穿上了军裤，但没有穿上衣。我明白了，职工们是在看我是否穿军服。令我惊奇的是，真正穿 军服的人仅是几个，而大部份职工仍是穿便装来的，这比我预料将会有三分之一的职工不会穿军服的数字要大的多。我不禁感动了，大屠杀已过去十个月了，可人们 并没有忘记，正是那群穿着这身衣服的畜生们向人民开的枪。

我 走进我的办公室，看到阿红穿着军服。这我并不奇怪，她一直在军队做文职官的。阿红看到我时吃了一惊，马上跟进了办公室，又关上了门，小声问我：「你怎么穿 便服来了？是不是你忘了？我让司机去把军服给你取来。」我摇了摇头，马上把话题转到公事上。正说着，阿宗进来了。他穿着军裤，但上身是便装。看到我，他笑 了。等阿红走出去后，我对阿宗说：「看来你是做了两手准备的。」他笑着说：「这八个民主党派必须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原则，所以我必须看风使舵，不得 不小心点。现在我看见你没穿军服，我也可以把军裤脱了，你以为我愿意穿吗？」我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就 在这天下午下班前，大校和书记郭一块来到我的办公室。我是不想看到他们的，也知道他们来干什么。阿红跟进来，给他们沏上了茶。书记郭穿着崭新的军装，肩上 佩带着大校的肩章，满脸得意的神情，吸了几口烟后，对我说：「今天，我做了个调查，大约有四分之三的职工今天没有穿军装来上班。所以我约了大校来找你，咱 们商量一下怎么办。」我问他：「你没调查一下原因吗？」我的这句话显然是让他抓住了，他马上说：「凡事都要领导带头，好比今天，四个主要负责人，两个没穿 军服，我们又怎么去要求职工呢？」这时，大校插进来问我：「我忘了问你了，你那套军服合身不？如果不合适，我 马上给你去换。」我笑了一下说：「那倒不必，我根本没试过，我也不会穿的。」大校马上问为什么？我生硬地说了一句：「不想解释。」书记郭马上像劝架似的 说：「问题归问题，而去一定会解决的，穿军服又是另一件事，这是件光荣的事，不要把两件事硬拉到一起，要让职工们看到，我们四个人是团结的。」我冷笑了一 下说：「你所要的是表面上的东西，而实质呢？我不说你也知道的，职工们更清楚，现在有这么多实际问题不去解决，反倒管起穿什么衣服。这么个小事也来找我， 简直是浪费时间。」

大 校一脸郑重地说：「这可不是小事，这是命令，命令是必须执行，不执行就是违反军纪，违反军纪就要受处罚……」我打断他说：「抢占民房是不是违反军纪？要不 要受处罚？我已经命令纳三十六个军人在二十四小时内搬出来，他们为什么不执行呢？你有没有给他们处罚呢？」书记郭马上笑着对我说：「这就扯太远了，我们现 在先不谈这些，我和大校发现有很多职工没穿军装，所以我们

是想请你带个头。」我摇了一下头，说：「四个主要负责人，你们两个带动了四分之一的职工穿军服， 难道我一个人就可以带动四分之三的职工吗？我可不这么认为。」书记郭不说话了。大校接上来说：「我的军阶是大校，你的军阶是上校，在军队里军阶高的就可以 给军阶低的下命令，所以现在我命令你，明天穿军服，这是命令！」我站了起来，走回办公桌后坐下，冷笑着说：「我已经对你解释过了，现在又对我下命令。你似 乎就是不明白，明知我不会接受，更不会执行，你这不是更被动了？如果没有别的事，对不起，我还有工作要做。」说完，我低下头看公文。

没 想到，大校猛地站了起来，几步走到我的办公桌前，大声地对我：「我是所长，我是你的上级，你要服从我！」我抬起了头，但并没有看他，把办公桌上的几份档迭 放在一起，然后扔到了他的面前，对他说：「那好吧，这些公文正是所长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请你拿去处理吧。」他愣了一下，什么也没说，突然转身，大步走出了 办公室。我说：「都想当上司，又不想工作，做官神气，工作可就难了。」书记郭假装没听到我的话，片刻的沉静后，他轻声对我说：「你这样对他说话不好，他到 底是你的上级，你应该给他留点面子，你把他气走了，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了。」我反问说：「解决什么问题？穿衣服也是个问题？我看应该解决的问题是，在这次 的军衔评定上的不公正，伤了不少职工的情绪，我已责成办公室去搞个报告，等他们搞完，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必要召开党委会讨论一下，看看这究竟是什么样的问 题，是不是属于不正之风。」书记郭马上说：「第一次搞这种事，没经验，时间又紧，难免出点差错的。是可以更正的。」我马上说：「太好了，既然可以更正，我 催他们快点搞完。」

又 是片刻的沉静，书记郭熄灭了烟，站了起来，对我说：「我还是想说，请你考虑一下明天穿军服的事，不要把事情搞太僵，对以后解决问题是不利的。」我冷笑说： 「你以为那些问题真的会解决？如果他们真的想解决，不会拖到今天的，至少，对于那三百四十万的贪污，你就不想解决，你在大会上对职工说『单位会解决的』， 可是，作为副书记的我，却一点儿也没感觉到单位做了任何事，尤其这件事发生在收编前，我们自己不去解决，难道还要等军队来决定追查或者不追查？我不知道中 国现在有多富，难道已经富得不在乎三百四十万元了？」书记郭慢慢说：「好吧，我考虑召开党委会商量这件事。」

第 二天是星期六。我刚到办公室，大校的一名秘书来请我到大校的办公室。当我走进大校的办公室后，秘书轻轻从外面关上了门。大校坐在办公桌后，没有站起来，也 没有请我坐下。他冷冷地看着我，对我说：「今天你又没穿军装，我想请你现在就回家穿上军装再来上班。」我马上问他：「如果我不穿，是不是就不要来上班了 呢？」他没有回答，我转身刚要走，只听他在我背后大喝了一声：「回来！」

我 立时火就冒了上来，转过身子向他走去。令我没想到的是，他马上站了起来，对我说：「对不起，我是想请你坐下……请坐。」我走近了他，盯着他对他说：「等军 官搬出来，还有那个刚来工作三个月就贪污了九千七百五十元的上尉受了处罚之后，你请我坐，我会坐下的，但不是现在。我刚才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我想，我还 是回家的好。」说完，我扭头走了出来，大校追我到门口，大声地说：「你再坐一坐，我还有事和你商量呢。」我没有理他，下了楼。

星 期一我也没去上班。下午，我一个人正静静地在读一本古书，门外有人敲门，我以为是母亲，马上打开门，没想到是大校和书记郭站在我的面前。我收起笑容，不情 愿地让他们进来。坐下后，照例是由几句聊家常开始，书记郭便把话题转到主题上来了。他提到，星期六那天，我走了以后，大校就向上级汇报了，上级在电话中批 评了大校，又要求书记郭从中调解，一定要劝说我回去工作。

书 记郭说完了，大校向我道歉，说对我的态度不好，不该对我那样讲话，希望我能原谅他。接着他又提到上级在电话中已经讲到了，对所里发生的问题非常重视。一旦 他们来北京，首要的大事就是解决这些问题，并向我转达了上级的话，那就是问题的解决一定会使我满意的，请我立即回去主持工作。最后，他们两个人好像开玩笑 似地说，他们以为我今天会去上班，没想到我「犯了小孩子脾气」，所以只好登门拜访了。

我 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也没有沏茶招待。直到他们表演完了，又都堆出了笑容期待地看着我时，我才慢慢地说：「我早就说过，我干不了这个工作，到了今 天，已是快一年半了，事实也证明了我确实是干不了的，我自己也感觉到了，我是越干越吃力，而且越干越伤心。这两天在家里，我也仔细地想过了，我决定我不再 去上班了，尤其刚才听到你们转达上级的话，说是问题的解决一定会使我满意，更是使我坚定了辞职的想法。我从来没有为自己向上级要求过任何事的，由于不正之 风，贪污腐败的出现，而伤害了职工们的利益，于是才出现了许多连锁反应的问题，上级要解决这些问题，那就应该让职工们满意，所以我不理解什么是让我满意， 如果上级想让我满意的话，那就是批准我的辞职报告，让我从这一堆头疼的公文中解脱出来，让我重回我的专业，或干脆让我离开这个所。可实际上，上级也为难， 从来都是下级和职工们被整、被斗、被处罚，甚至被送进监狱。可这回却相反，是我辞了你们，所以这个决定对上级来讲是难做的，我也不想让上级为难，我决定不 去上班了。」

听 了我的这番话，显然是出乎他们俩的意料。片刻沉静后，两个人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对我劝说着，讲着那套几十年不变的陈腐的大道理，直到我太太下班，女儿放学， 他们仍然没有要走的意思。在交谈中，只要我一提到退房、追查贪污、请回被迫退休和辞职的科技人员，和重新更正在授军阶中的错误时，他们就以等上级来解决推 托，唯一他们妥协的一点是不再坚持穿军装上班和那道穿军服的命令了。

太太进来了，笑着挽留他们在这里吃饭，并问他们喜欢吃什么。没等他们俩说话，我马上对太太说：「不必了，他们马上就走的。」他们并没有要走的意思。看起来，如果不答应明天上班的话，他们会一直这样待下去。

我 想了一下。刚进入第二季度，原来的工作安排已被二百多人的退休和辞职打乱了，财务上也要重新作计划，八十多位研究人员的离去，扔下了不少的研究项目。这些 事，这两个人是根本做不到的，阿宗也不可能一个人按这一切的。想到这里，我对他们两个人说：「我明天去上班，用两三个星期的时间，尽力去把这个摊子收拾一 下，做出这个季度和今年的大致的工作安排。你们要派个人来，我尽量把工作向这个人详细交待清楚，然后我离开。如果这个提议你们还不能接受的话，我们也不要 谈了，明天我也不会去上班的。」他们俩马上笑了，一再点头表示同意。我站起来，他们也只好站了起来，我走到门口打开门，他们只好告辞。关上门才发现母亲来 了，正在厨房里。

见他们走了，母亲和太 太马上从厨房出来，太太对我说：「我知道你不高兴，我也不愿意招待他们，可他们又坐着不走，我只好把妈请来，做几个菜打发他们吃了快走。」母亲开始说话 了，她又提起了文化大革命，说：「从文革开始，我只要看到这些穿军服的人就又恨又怕，你父亲是从不准这些人来家的。他们走了好，我是实在不愿意招待他们 的。」

没容我说话，母亲和太太一块逼问我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去上班。我简单地对她们讲了。母亲马上说：「去年的六月四号我就说了，咱们这家人今后都不给这个政府工作了。你想辞职，我同意，你爸爸也不会反对的。你还年轻，即便找不到研究或者教学的工作，去干体力工作也没关系，经济上有问题，我可以支持你。你是搞历史的，你应该知道，自古以来哪个清官有好下场。」母亲的话对我的鼓励很大，我一边帮她们准备晚饭，一边对她们提到我辞职后的打算。

我 有一份兼职的工作，尽管收入很少，但维持生活也够了。我可以帮恩师完成那本书，稿费的收入也不太坏。弟弟和妹夫都已辞了职，正在筹备开办一个小工厂，我也 有点积蓄，可以入股和他们一块干的。实在全不行了，我会开汽车，找一个卡车司机的工作还不是太难的，收入也是不坏的。总之，我还年轻，干什么都可以，重新 学什么也不算晚。我一直说着种种可能，直到她们脸上出现笑容。我让女儿去把父亲也请来，晚饭的气氛很好。可以看出来，父亲知道我决定辞职后，也显得很轻 松，搂着他的孙女又说又笑的。我珍惜这一刻，我太少享受这种甜美的家庭气氛了。

隔 天，回到了这间办公室，又被成堆的文件埋起来，被大大小小的会议占据着，被进进出出的人们包围，努力地驱使这部残旧了的机器运转着。我着手安排了尽可能详 细的季度工作安排和大致的年度工作安排计划。与阿宗用了几天的时间重新安排了研究项目，对那些被搁置的项目提出了从一千元到五千元不等的奖金，以鼓励科技 人员在完成计划项目后，再接受额外的研究项目。就在这个决定公布的当天下午，就有大约一半的被搁置和未完成的项目被人们接走了。接下来的事就是要想办法找 出这笔奖金。经过几次的商量，一致认为应杜绝大吃大喝，这方面的花钱如流水一般。我们制定了客饭和招待费的标准和规定，其中提到普通客饭的标准为三块钱一 人，由后勤处长负责批准，超过五块钱的招待标准必须由我批准，同时提到今后招待亲友、同事、同乡，一律不准使用公款。

这 个规定的公布，又得罪了本所的一批负责干部和这些新调来的军官们。但好处是到年底以前至少十万元是可以节省出来的。解决了对研究人员的奖金问题，接下来我 又与后勤处、设备器材处、供应处、两个实验厂及个部门仓库负责人用了几天的时间，共同商讨了如何节省资金，减少浪费，拍卖长期积压而又用不着的物资等办 法，又通过了几条新措施新规定，初步计算了一下，在年底前可以节省出将近四十万元，至此我完全放心了。

第 二座住宅楼的工程费用已经够了，而且还有些富裕。于是我又与福利处和几位工程师商量，考虑第三座住宅楼的兴建的可行性，最后一致同意，在年底前完成第三座 楼的选址和买地两件事。住房困难是个普遍的大问题，当职工们听到了又要盖第三座楼了时，都显得很兴奋，但同时又不无担心地提出；如果再次发生军人抢占住房 的事怎么办？职工们选出来的分房小组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所领导对于侵害职工利益的行为究竟有没有具体的惩罚措施？听到职工们的这些问题，我根本回答 不出来，我所能说的，也仅仅是：我做我认为是我该做的事，但是，到了任何时候，混蛋总是有的，只盼不要太多才好。尽管说是这样说，但三十六个军官抢占了三 十六套房始终是件事，深深地伤害并触疼我。回到办公室，我立即起草了一份通知，又以代理所长工作的副所长头衔签了字。我找来了行政办公室的那个少校和阿 生，要阿生马上把这份通知修改一下，然

后打印出来，立即公布出去，我写的原稿存档。少校犹豫了一下，想说什么。但阿生接过了通知，并说马上照办。

几 个小时后，通知公布出来。在这份通知中，我写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对那三十六名抢占民房至今仍不搬出的军官，从这一天开始，停止工作、停发工资，直到他 们搬出房子、公开道歉并受到应得的处罚后，再考虑恢复工作和工资；第二件事是涉嫌贪污了三百四十万公款的二十九人，从这一天起到党委政工处报到，接受调 查，同时停发工资，直到有了最后结果为止；第三，关于在扶助贫困县的拨款中索要回扣三万九千元的案子已查明，四名索要回扣的干部停止工作，停发工资，并到 党委政工处报到，直到党委做出相应的处罚后，再考虑恢复工作和工资。经过几次催促，行政办公室终于将一份长达百 页的报告交到我的手里。报告中详细地提到，两百多职工在军衔的评定上存在着错误，其中四十余人的军阶过高，其余的大部份职工的军阶低于他们的实际级别。为 了这份报告，我与阿宗、阿同整整商讨了一天，最后一致同意了这份报告的内容。我又把报告交给行政办公室，要他们打印，并立即送到党、政各部门负责人手里， 原稿存档。

第 二天，书记郭和大校手里拿着这份报告的复印件，到我的办公室来。两个人十分和气地说：「绝对没想到在评定军衔这件事上竟会出现这么大的失误，同时又隐隐约 约的表示，怀疑这份报告有夸张和失实之处。」我一点不客气地说：「那好吧，党委可以成立一个项目小组，彻底调查这份报告的内容。」大校没说话，书记郭却做 出了一副苦笑的神情，对我说：「你的一份通知，给党委找了不少麻烦，每天几十个人待在党委，你也是党委成员，我要听听你的意见，对这些人怎么办才好。」我 看着他，对他说：「你不要忘了，我现在是在把我手上未了结的工作做个处理，该我办的我把它办完，该党委办的转交给党委，交待清楚后我就走了。另外，我们已 经说了，你们派个人来接替我的工作的，为什么还没派来？」

大 校接过来说：「我已经向上级报告过了，上级说他们是不会同意让你辞职的。昨天我又接到上级的电话，说是两个星期后，他们来北京，会马上见我们，共同商讨问 题的。上级是很重视我们的，你可以不必考虑走的事了。」我笑了一下说：「这是什么逻辑？上级来解决问题和我要走是两件事。上级来解决问题那是他们的工作， 我辞职是我的决定，并不等于上级做了他们该做的事，于是我就应该改变我个人的决定。」

大 校马上说：「改革和开放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西方的腐朽的东西，例如辞职。你考虑过没有，你辞去了工作，是不是等于辞去了党，也辞去了革命呢？因

为你所做 的工作是党的工作，你是为党工作，这是革命的工作。你想想，辞党是不是反党？辞去工作是不是反革命？这可是个原则问题，你要想清楚，不要犯错呀！」

听 了他的话，我笑了起来，对他说：「我真弄不懂，你这又是什么概念？这块地方是共产党的天下，任何地方的任何工作都是党的工作。按照你的意思，只有这个研究 所的工作是党和革命的工作，去了另一个单位工作，就是在干着反党、反革命的工作了，这是什么概念？可笑不？」大校的脸马上拉长了，接着又说：「可是，党认 为你在这里能发挥作用，你可以在这里干得很好。」我反问他一句：「你认为是党了解一个人，还是这个人更了解他自己呢？党想得到那个上尉军官刚来两三个月就 收受回扣九千七百五十元吗？放着问题你不去解决，和我争论这些又有什么用？我是搞学术研究的人，讲究的就是实事求是，事实摆在那里，你让我去否认它，我做 不到」。

书 记郭马上插话进来说：「不说这些了，反正两个星期后上级就来了，我是相信一切问题都会圆满解决的。」他又转向了我，对我说：「我希望你再多待两个星期，见 见上级，看看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再决定去留，你看怎么样？」我点了一下头说：「这个建议合情合理，况且再过一个星期就要发工资了，如果我现在就走，这 个月的工资我就拿不到了，岂不太吃亏？」我说完，书记郭笑了，气氛放松了。书记郭马上又对我说：「这份报告中的事，你打算怎么办？」我冷冷地对他说：「你 对我说过这是可以更正的，为什么又问我？」书记郭转向大校，对他说：「我看是不是召开党委会，商量一下这件事。」大校点了点头。我冷笑了一下说：「现在又 开党委会干什么，不是说等上级来吗？」书记郭犹豫了，好像自言自语似的说：「我还要再考虑一下。」

第二十章 四十而不惑

两 个星期后的一天早上，刚到办公室，阿红就告诉我要马上去党委开会，上级来了几位大首长，说是来解决问题的。我马上来到了书记郭的办公室，看到军政治部主 任、后勤部长和三、四位上、大校军官，已经坐在那里抽烟喝茶了。书记郭和大校正在殷勤地招待着，看到我进来了，又是一阵握手、问候和寒暄，待到重又坐下 后，后勤部长宣布开会了。然后他就开始讲到，很长时间以来，这个所就存在着党政干部不和的问题，尤其是主要干部之间有矛盾不团结引起了他

的极大的不安，几 次要解决这个问题，但都因为他的工作太忙，而抽不出时间。现在他听说问题严重了，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工作，所以他马上赶来想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有没有 原则问题存在。

他 说着这番话时，我就感到事情不对头。他说完后，会场上静了片刻，只听大校对书记郭说：「我看，就由你开始吧。」书记郭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迭纸展开，又 清了清嗓子，就开始了他的讲话。我马上振作自己，用心听书记郭说些什么，就在书记郭开始讲话不到一分钟，我就明白了，这个会是事先预谋好的，而且完全针对 我而来。我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了纸笔，极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做着重点记录。书记郭正放大嗓门狠狠攻击着我。他讲的几个要点是：一、我目中无党，忘记了党 领导一切的原则，妄图以行政取代党的领导，利用了身兼党政职务之便，把党委当作了为行政开路的工具。二、我制造派系，打击党务干部，在党委内部制造分裂， 以致使他在九个月的党校学习回来后，他已经指挥党委不灵了。他奉命提前结束党校学习，就是要回来执行中央提出的清查十七种人的决定，由于我已控制了党委， 使得中央的决定在所里无法执行。他指出，本所存在着为数很大的一批有暴乱嫌疑的人，更有不少人是证据确凿的暴乱份子，但都被我包庇了。时至今日，他指责我 矢口否认本所有暴乱份子，更指责我利用党委名义将已被送公安局的暴乱份子又保释出来。三、我独断专行，凡是我的提案，我就要迫使党委通过，凡是我反对的党 委就不能通过。提到我的提案被党委搁置后，我就擅自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暴露领导层内部的矛盾，挑动职工对党委不满的情绪，使党委处于极被动的无法工作的地 位。四、我挑拨关系，把与他共同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老副书记弄到最后反对他。又说我把一群辛辛苦苦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干部至于死地，因为我凭空怀疑这些人 有贪污。五、我在工作上欺上瞒下。去年全所并未完成预定的工作，至少在扶助贫困县的项目上名义完成，剩下一千万元，他直到今年初才知道的。六、他怀疑我在 处理本所的财务上存在问题，在以前的几年的财务预算中并未报请住宅楼的项目，可一座楼已经完成，第二座楼又开工了，钱是从哪里来的，他建议上级成立专案小 组调查我。七、我从一开始就反对军队进城，反对戒严，反对劳军，更是公开反对这次的收编，他攻击我对新近派来的两百多军官和军人家属态度冷淡，百般挑剔， 制造障碍，使他们不能安心工作。书记郭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捏造歪曲事实，肆意诽谤攻击我。他说完后，后勤部长马上又让大校讲话。大校也是准备好了 的，马上大声讲了起来，除了一些与书记郭所讲大同小异的事。他提到，经他半年的调查，在去年的暴乱期间，全所职工中的百分之九十参加了三次大游行，十几个人死伤，几十个人失踪、外逃，并有一步卡车被烧。另据不确实消息，全所为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总共捐款达五十万之多，他说我是当时全所唯一最高领导人，应对 这一切负责，并追究我的政治责任。他与书记郭几次计划要追查「十七种人」，名单都被我驳回了；他们又提出了一批有暴乱嫌疑的人不符合穿军服的外逃，也被我 驳回了。最后，他和书记郭采取妥协办法，提出让这批人提前退休，也被我大做文章。他指责我利用这批人退休的机会，又鼓动一大批年富力强的研究人员辞职，使 所里的研究工作受到巨大的损失。又指责我滥用公款，给这批人放了辞职费，他说他查了，国家劳动部的档，那是五零年代的档，从来没有实行过。他再以大量的时 间指责我拒绝穿军服，造成极坏的影响，致使至今全所

百分之七十的职工不穿军服，就是效仿我；又指控我利用工作上的误解，公然带头违抗军队的命令和纪律。他 指责，我以辞职来威胁上级和党委，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又指责我专横，盛气凌人，已达到了不顾党纪、国法和军纪的地步了。另外，他也完全同意书记郭的建 议，要求上级同意成立项目小组，调查我的财务问题。

大 校讲完，我已是气得要发疯了。在他们两人的讲话中，绝口不提他们的所作所为，绝口不提矛盾所在，绝口不提所发生的事实。我明白这是他们事先导演好的，因为 后勤部长没有让我说话，而先下了结论。他说：「会开得很好，都十分坦诚地谈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看起来，问题确实存在，而且比我想的还要严重。但不管问 题有多么严重，我们都会解决的。」说到这里，他转向了我说：「你要考虑一下他们两个人所讲的问题，看来问题是因你而起的，也都集中在了你的身上。你要准备 说几句话的，否则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我 摇了摇头说：「不用浪费时间，我辞职，问题就解决了。」我的话使后勤部长一愣。但马上以威胁的口气对我说：「这里现在是军队单位，没有命令，你是辞不了 的，以你现在的职务级别，如果你不得批准而擅离职守的话，党纪、军纪是饶不了你的，你想想吧。」说到这里，他不等我说话，马上转过头去，对大家说：「午饭 时间已到，下午继续开会。」王大校这时笑嘻嘻地对我说：「尽管你发布了个规定，但今天是我招待我的老上级，可顾不上你的那些规定， 你得给我点面子呀。」说完，他笑了起来。书记郭也跟着笑了起来。我一句话没说，回到办公室。

我 刚点了支烟，门就被推开了。进来的是政治部主任，坐在我身边，对我低声说：「事情看起来对你不利，这是我没想到的，下午你一定要说话，这是个机会，也是个 非常重要的机会，你可一定要听我的话呀」。我笑了一声，说：「你让说我什么，这一个上午的气味，就好像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那个时候我还小，不懂 事，所以我害怕。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又用出那一套来对付我，我可不在乎了。离开这里，无论我做什么，谋生是没问题的」。

他 马上打断我：「不要这样讲，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来了几天了，因为我有些事要办，所以耽搁了两天，但王大校和书记郭已经与后勤部长接触了几次了。看来他们是 事先商量过了，所以今天上午会上的情形我也是没有想到的。但是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上级已决定这个所归属于后勤部，但正式的命令还没有下来，至于为什么 会有这个变动，我能说的是，政委和后勤部长、后勤部长和王大校，他们是有着极特殊的关系的，再多我就不能讲了。在这个命令还没有下来

之前，我还是你们的上 级，你应该明白了，下午你必须说话，把你该说的话都说出来，至少你应该让我知道这里都发生了什么，政委问我时，我也有话可讲的。」

听 了他的话，我也有些感到意外，尽管政治部主任的话听起来还算真诚，但我马上感到军队高层之间的权力之争，通常也会把一些不相干的人夹在当中做替死鬼的，从 上午会上的情形看，他们是想把我当替死鬼，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只要我离开，应该不会有政治上的麻烦的。可是既然他们敢于无中生有，歪曲事实地攻击我，如果 我不说话，反而会让别人认为书记郭和大校说的都对，一切错误都是我的。想到这里，我对自己说：这「是个机会，我要狠狠揭露他们，把他们干的这些坏事、丑事 说出来，我要回击。」我对政治部主任说：「下午我一定说话，我不去参加午餐了，我准备一下。」他点了点头，站了起来，说：「这就对了，我想一个半小时对你 来讲应该够了吧。我去告诉他们，下午一点准时复会。记住，把该说的都说出来。」

下 午一点，会议准时开始。政治部主任首先讲话，他说：「上午的会开的很好，王大校和书记郭都十分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现在，我们希望听听副所长的 看法和意见，他是做具体工作的，当然更了解所里发生的事，我们希望他也能像大校和书记郭一样，开诚布公地讲出来，是有助于解决问题的。你说呢？」他最后这 句话是在问后勤部长，满脸喝的通红的后勤部长喷出了一口烟后，点了点头，于是政治部主任示意我可以开始。我没有讲话稿，也没有拿出笔记本来，我点了一支 烟，吸了一口后，便开始了。

我回顾可我在任这一年半中所里所发生的一切后，提出了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违法乱纪我列举了一系列的事实，去说明这些问题。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关键是领导层的作风不正，本身也存在着上述的问题。

我 强调，本所根本不存在什么不团结问题，实质上是很久以来形成的派系和党政之间的权力斗争，经过了我的前任阿成副所长的几年的努力，派系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 决，但党政之间的权力斗争始终存在。关键在于党委越权，干涉一切，但工作和管理方式又基本上是五、六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的那套强制、高压和说教式的，对职 工们面临的生活、工作中的困难和需要，从来不闻不问。与此同时，黑暗腐败现象在随处可见，这本应该是党委的工作，可党委又不去做，即使现在再把一切权力归 党委，党委也指挥不了这个所了，原因是党委内部已经率先腐败。

我 没有点名，但说出了许多事实，例如与女秘书女职员通奸、用暴力和体罚迫使女职工就范、用公款旅游、每天午饭用公款大吃大喝、收受回扣、包庇贪污犯、利用本 所与其它单位的合作关系，向对方要好处、要房子、党委负责人一家五口有住房六处，更有人为自己未成年的儿子准备好三居室住房等等。接下来，我又提到，自从 收编以后，派系的问题重又出现，大量派进来的军官们抢占了各部门的负责人的职务，而原先承诺的要派技术人员却没有实现，这不但使本所的党政部门变得庞大臃 肿，而且加剧了党政之间的矛盾，在原来的党务干部和行政干部之外，又加上了军队干部这个新派系，互不配合，各干各的，矛盾和摩擦时时发生。我狠狠地驳斥了本所有暴乱份子存在的说法，例举了十几个人的实例说明了这些人社会暴乱的受害者。

我 又明确地说出了要求中央惩办贪污腐败不是暴乱，又以讽刺挖苦的口吻说出了三十六个军官抢占住房是暴乱，是目无法纪，而且背后有人指使。我提出，为了安排两 百多名军官和军官家属的工作，迫使一大批科技人员和有高级专业证书的人提前退休；军人的违法乱纪，又使一批十分有能力的人才辞职。

我 公开表示欢迎上级来查账，财务上确实存在着一笔一千四百万元的亏空，一笔三百四十万元的短缺。收编半年，一笔十多万元的公款被吃掉、喝掉了，这些都是急待 解决的实际问题。在这次评定军衔上也存在着重大的问题，问题的实质是有人利用这个机会拉帮结派，完全是有意的，绝不是工作上的失误。职工们有意见、不满 意，不穿军服就等于是个无声的抗议，作为一个领导层的人不马上去道歉更正，反而给什么人扣上反党反军的罪名，企图置人于死地，这又是什么作风？能使职工满 意？我的讲话大约用了一个半小时，讲完后办公室瑞安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没人说话。两位上司和随来的几个军官都低着头，匆忙地记录着。书记郭和大校则是低 着头。

后 勤部长放下了笔，咳了一声，慢慢地说：「看来，今天我们没有白来，你们三个人把该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我要向上级汇报，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都会解决的，我 个人的看法是，你们的团结真是个问题……」听他说到这里，我打断他说：「这恐怕不是个团结问题那么简单，从上午他们两个人的讲话中，可以发现是要完全置我 于反党的死地。这不是个什么团结的问题，而是个原则的问题，你在上午的会议结束前，也说过『问题是严重的』。我的确认为问题严重，所以我请求上级这次一定 要解决这些问题才好。」

看 来，我的话使后勤部长既难堪又生气，所以半天他没说出话来。政治部主任马上打破了这个僵局。他也不愧是个耍滑头的老手，几次表示他和后勤部长是来做调查了 解的，感激我们三个人都说实话，使他们终于知道了一些实际情况，

他们将向政委如实汇报一切，他相信问题的彻底解决不会拖得太久。说到这里，他又和后勤部长 耳语了一阵，然后宣布散会。送他们出来后，政治部主任与我紧紧地握了一下手。形成对比的是后勤部长只是与我的手指碰了一下。我注意到后勤部长根本没有与书 记郭握手，而是握着大校的手，同时又在不断地小声说着什么。回到我的办公室，看到阿宗和阿同已在那里等我，我关上门，马上告诉他们会上发生的一切。他俩认 真地听着，我说完后，他们分别发表各自的看法，同时一致认为在这个阶段我不可以走，因为很快会有一个大结局，也是人事上的大变动，他们认为书记郭会失势 的，但我并没有告诉他们，大校已经暴露他的残暴和冷酷，比书记郭更难对付。

就 在那天回家的路上，傍晚的春风似乎突然使我清醒了许多，我突然想到了阿成。尽管我不知道阿成究竟得罪了谁，但他得到了那位副主任委员的保护和帮助，而我现 在的情形是根本没有一个可以了解或保护我的上司，而我又正处在最后的决战阶段上，后果未卜。实际上我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上，最后的结果一个是好，一个是坏。 如果我胜了，那么今后无论是书记郭或大校继续工作，都将意味着矛盾和斗争，仍将继续下去，直到有一方彻底获胜为止。

我 相信，我是没有这种政治手段的，而且在那种情况下，我也无法工作。如果失败了，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我实在无法去想象的。无论胜与败，都不是我期望的，我 还是要想办法辞职，离开这块是非之地，他们在我的档案上写下什么，我都不在乎。我会努力挣钱，存钱，然后给自己留几年的时间重回专业，会再做出成绩来的。 想到这里，我心里轻松许多。回到家，看到母亲也来了，正在与太太商量着要给我做四十岁寿。母亲从来重视逢十的大生日，坚持一定要好好的操办一切。若不是她 们的提醒，我根本记不住哪天是我的生日。迷迷糊糊地四十岁了，人生的一大半已经过去，孔子言：「四十而不惑。」是呀，我该走自己的路了，也实在不愿意为一个我所痛恨的政权工作了。我高兴地加入了她们的谈话。

以 后的几天，我把在会上所讲的话，更加详细地写成了一篇材料，又把关于三百四十万元的汇总报告复印了一份，把职工们抗议军人抢房的抗议书、我在前不久发出的 关于三十六个军人停止工作、二十九个督导员停发工资和那四个收要回扣的干部停止停发工资的通知、及关于客饭和招待费标准规定都做了复印件，又把账目中至今 仍是空白的那一千四百万元的一页也复印了。我还复印了我以前写的辞职和辞去工作的两份报告，并且又重新写了一份辞呈。总之，我尽可能详细地准备好了一切。 可以想到，在下一次的会议上，将是一场苦斗、恶斗，但我决定尽量采取低调，只举事实，不做任何评论，把全部 精力用在辞职上。即使他们攻击我，我也尽量不做回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量使自己能安全撤退、几天后，上级来了通知，要大校、书记郭和我在第二天上去八 点钟去参加由政委出席的会议，我准备好了全部的材料。隔天，司机比平日早了一小时来接

我，车子行驶在郊外的公路上，我呼吸着新鲜空气，心情很平静。我还是 嘱咐自己，少说话、不争论、不生气。当到达了指定的地点时，司机根据站岗士兵的指示，将车子停在大门外。

很快，一位少尉军官从大门里走出来，司机将头伸出了车外，与少尉说着什么，我知道这是例行的盘查，并未介意。没想到少尉走到我的车窗外，先敬礼，然后弯下腰，将头凑近车窗，两眼看着我，十分认真地对我说：「对不起，我接到后勤部长的命令，请你穿上军服，才可放行。」

这 是我没想到的。我愣了一下，我知道如果我马上瞪眼，并对他大声喝斥几句的话，他是不敢阻止我的，但我没有这样做。这是后勤部长在做我的上司以前想给我一个 下马威，由此也可以推断，他们根本没有诚意解决问题的。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打开公文包，拿出了那一堆我已经准备好的材料，交给那位少尉，并对他说：「请你 把这一堆东西直接交给政委或政治部主任。」然后，又对司机说：「回去。」少尉接过那堆材料后，茫然了，似乎要说什么。司机已经开动车子，调了车头飞快往回 开。

车 子开到颐和园大门外。我让司机把车停在一家专卖馄饨和包子的小饭馆前，司机不解地看着我。我笑着对他说：「我已经快两年没吃馄饨和包子了，今天我起得早， 没顾上吃东西，我请你吃早点好不？」不等他说话，我就下了车，进到里面找了个地方坐下。司机也跟了进来，坐在我对面，对我说：「其实我也是什么都没吃过 呢。」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我以为你是要回家换衣服的，看来我错了。

这 个会议你总要参加吧？耽误时间太长，恐怕不好。」馄饨已经端上来，鲜气扑鼻，我尝了一口汤，也十分清香可口。我胃口大开，边吃才边对司机说：「什么会？我 们不是已经去了回来了？工作得太辛苦了，好不容易才抓住了机会享受一下。吃完了，你送我回家，回去过我的四十岁生日，你没事干就放假一天，你看怎样？」他 明显地是要说什么，我止住他，尽情享受着这顿老北京早点。

第二十一章 无论哪一条罪名都足以使你被关进监狱至少十年

大 约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已经过了下班时间，我正在在准备着两天后那个每月一次例行的工作现场调度会的内容，阿润推门进来。他走到我面前，递给我一本赴港 澳探亲的证件。我不解地看着他，阿润说：「看着我干什么？该是你了，至于为什么，你去问阿同，阿同是一个好人，只是一点不好，对我不肯把话说明白。」

我 马上问他，阿同说了些什么。阿润说：「也没说什么。前天下班前，他到我们研究室找我说，你决定代替你父亲去香港，与分别四十年的叔叔见面。他又催我快办， 我说我从来没听你提起过这事，我最好先问问你。」阿同马上对我又是摆手，又是使眼色。然后又催我越快办越好。我马上明白，他不说我也不问了。这份证件是合 法的，你欠我两千块钱，你想什么时候走，我去给你买飞机票。我马上说：「先别忙，还不知道究竟这事怎么回事呢，总得让我把事情弄清楚了再说。」阿润马上 说：「只怕时间不多了，所幸你不是在北京出关，我办的是让你到深圳出关，安全系数大一些。我去打听飞机的航班，明天我来告诉你，你最好快些准备。」

阿 润走了。我到处找阿同，但找不到他。直到第二天中午，阿同端着饭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坐下后，小声对我说，他已告诉了阿红，不准任何人来打扰。我点了一下 头，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已经到了我非走不可的地步了？他轻轻地点了点头，小声地说了一句大势已去。接下来，他告诉我，就在两天前，党委召开了一个特 别会议，大校参加并主持了这个会议。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确定了一份三十多个人的名单，都是与去年的所谓的暴乱有关的人，列在名单上的第 一个人就是我，并说我是幕后煽动、策划和组织者，根据上级的指示，军政治部已经和本所的政工、保卫两处成立了专门调查我的项目小组，并限期交出调查材料报 告。从大校和书记郭在会议上的态度可以看出，上级相信了他们的话，他们至少是奉了上级的暗示这次非要搞垮我不可。

就 在那天的特别会议上，大校和书记郭已经罗列出了我的几大罪行，阿同说：「无论哪一条罪名都足以使你被关进监狱至少十年。」我问他都是什么，他死活不告诉 我。他听说我提起过，与我父亲失散四十年的台湾叔叔已经打听到我们一家下落，并来了信，于是他才去暗示阿润。我告诉他阿润已把证件拿来了。他马上说：「这 就好了。谢天谢地，你马上走，千万不要耽误，有什么事交待给我，我会办到。」我想了一下，对他说：「我想知道名单上的每一个名字，如果来得及，我想尽一切 可能去帮助这些人离开。」阿同马上说：「我已经把名单给了阿宗副所长，你说怪不怪，阿宗这次却不在名单上。他又把那个『快速行动小组』组织起来了，正在发 挥著作用。现在已经不是你去想着别人的时候了，

该想你自己。」我说：「那好吧，在保险柜里，大约还有十一万块钱的现金，这一两天你把钱拿走。老君和胖处长 都不在了，你和阿宗负责这笔钱吧。你们当然知道该怎么用这笔钱的。」

阿 同点着头，问我什么时候动身，我回答他说：「不忙，后天就是调度现场会了，我主持完这个会再考虑。」阿同马上说：「不行，每个月的这个工作会议是件大事， 我同意你主持这个会议，但会后必须马上走，你没有时间再考虑了，相信我。另外，我还要说的是，工作调度会就是工作调度会，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但千万不要在 会上说别的事，控制住你的情绪，千万不要暴露自己。下午，我就去找阿润，阿宗副所长已经为你制定了一个计划，我与他们再去商量，这次，希望你一定服从我们 的安排，你能做到吗？」

我 看着他，有些激动了，紧紧地握了一下他的手，又向他点了点头。那天下班后，我去了弟弟家，将一切都告诉他。没想到的是他一点儿也不紧张，而且极冷静地对我 说：「我想到了，也有预感。依我看，这是好事。我马上联系我在深圳的朋友，让他保证你的安全出关。至于家里的事，你是不用担心的，但是不要对家里人提到这 件事，只说去和叔叔见面，顺便散散心。你走后的一切，我都会安排的，现在你唯一要考虑的就是你今后的出路。你能在香港待多久？叔叔能不能把你弄到台湾去？ 或者是哪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接受你这种情况的人？另外就是你要有思想准备，这一走短期内不太可能回来，这个心理准备一定要有，否则今后是无法生存的。」

他 说的正是我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我离开了弟弟家，去向父母要叔叔的信，记下了在香港落脚、见面的地址、电话，然后才告诉父母我这几天要去香港一趟，大约一个 月左右回来。母亲很高兴地问这问那，但是我注意到父亲脸上露出了怀疑和担忧的神情。趁着母亲在厨房的机会，父亲低声地问我：「告诉我实话，是不是有什么 事？」我马上笑着说：「没事，也不过是借着阿润父亲的势力，近水楼台先得月而已。去见见叔叔旅游一趟，权当是休息休息，散散心吧。」父亲显然是不太相信我 的话，但他没再多问我什么，只是两眼一直在看着我，半天才说：「也好，出去走走，见见世面，这个世界大了，只是自己要一切当心。」我点着头，听着。

阿 宗、阿同和弟弟共同拟定了一个计划，同意我主持工作调度会，隔天星期五上午，要我称病回家，星期六一早飞深圳，住进弟弟朋友安排好的旅店，他会安排我在周 日下午出关高峰时出国，可以减少些注意力，在所里也不会引起怀疑，请一两天假是极正常的事。待到下周一或周二，书记郭与大校去家里探望我时，我已在香港 了。对于这个计划，我当然是同意。阿宗、阿同已送走了不少人，

他们是有经验的。当晚，我又在阿宗的家里与阿同、阿生、阿军、阿超聚会，分析了我出走后，所 里可能出现的局面。最后一致的认为是，书记郭和大校搬倒了我以后，不太可能马上做出多大的变动，他们会用一段时 间去注意职工们的反应，至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权力派系之争不会停止，但会短期内暂时平静的，他们会把阿建暂时放在我的职位上。阿建的为人和能力，书记郭与 大校是清楚的，所以无形中他们要更多地依靠阿宗和阿同，也等于行政大权实际上落在了他们两个人的手里。于是，所里的工作仍会像现在一样运行一段时间的。当 晚分手时，阿宗递给我一些钱，并解释说他们一直是对每一个被通知走掉的人，都是根据不同情形分别帮助几百到一千块钱的。我拒绝了，对他们说：「钱，我还是有一些的，你们捐钱也不容易，用这些钱去帮助别人吧。」告别时，他们一一与我拥抱，搞得我很激动，我实在是不舍得离开这些朋友。

第 二天就是工作调度会，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准时到会了。出人意料的是，从不参加调度会的书记郭和大校也来了。我没理他们，自从上次的会议后，我一直不理他们， 他们也没找过我。有一次在楼梯上我正好与书记郭走对脸，他冲我笑着，正要说什么，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便转移目光继续上楼，他马上收回了笑脸，咽回了想说 的话，也不知他上有意还是无意的，他把身子闪到了一边，让我走了过去。今天他们来参加会，也无非是想学习一下如何主持这种繁琐的行政事务的工作会，否则在 我被关进监狱后，谁又来主持这种行之有效的现场工作调度会？

一 个上午，各部门的负责人一个一个地汇报了工作，提出了问题和具体困难。总的讲起来，上一个月的工作尽管问题不少，但一切进行得并不坏，至少是在按照计划进 行着。但是各个研究室的工作计划都没有完成，我是不能责备这些主任和副主任的，几十位研究人员的提前退休和辞职，影响当然是巨大的。我和阿宗制定的鼓励研 究人员多接受研究项目的奖励办法正在实施中，而且已经见到了效果，我感到松了一口气。看了阿宗一眼，他也正在看着我，我们不动声色地互相点了一下头。

下 午的会议，通常是对各部门在上午提出的问题和实际问题、困难进行现场协调和解决，一个多小时后，会议进入了尾声，就在我要做总结的时候，政工处长要求讲 话。他提出应该让三十六个军官回来工作，等上级做出决定后，我们才能对他们做出处理。他又提到上个月就没有发给他们工资，如果这个月再不发的话，他们的生 活就成问题了。

他 的话正好给了我一个发挥的题目，我当即否定了他的提议，并声色俱厉地说：「对于侵犯职工权益、公然抢占公房的三十六个军官和在扶助贫困县拨款中收受

回扣的 四位干部，还有涉嫌贪污、侵吞了三百四十万研究经费的二十九位督导员们，我们是不能姑息的，否则，我们就是置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和职工的利益于不顾， 那我们就是在犯罪。我们等上级的决定已经太久了，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上级的决定是否做得出来，或者什么时候能做出来。现在，如果我们再不对这些人做点什么 的话，那我们的罪状就大了，这些人明知自己做错了事，但又拒绝改正，那就是坚持错误，我不管他们的后台是谁，我坚持我的做法，而且我也相信，今天在座的任何人处在我的位置上，也不可能对这些事情置若罔闻，而任由他们继续胡作非为。没有我的同意，任何部门不准接受这些人回去工作。」

我 转向劳资处长说：「没有我的签字，不准给这些人发工资。」由于书记郭和大校的在场，会场气氛紧张了，但不少人向我点头。我又要求财务处副处长马上追回那一 千四百万的收据，并说：无论谁拿走了钱，写个收据，这是常识，就是邓小平也不能例外的，否则这笔亏空谁负责？同时，我又要求财务处副处长散会后，带着工程 款支票来我的办公室。我又转向大家说：「只有很少的几个人知道，我们的第二座住宅楼的基础工程已经完成了。就在年底，又将有九十位职工与他们的家属可以搬 入新房了。同时，我已经指示了福利处，要在年底前完成第三座住宅楼的选址和买地的工作。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没有盖住宅楼的专项开支的，钱完全是挤出来的。 所以我希望各个部门一定要严格财务开支，照新规定执行，以便节省出钱来，使第三座楼能在明春开工。当然，我也明白，在将来分配住房时，可能还会出现问题 的，所以我要求在座的每一位负责人，一定要支持职工们推选出来的分房小组的工作，同时考虑如何使这个分房小组得到更大的权力，以防止这类公然抢房事件再次 发生，职工的困难就要去解决，职工的利益绝不容侵犯，贪污腐败违法乱纪必须严惩，这是原则，也是常识，更是我们工作中的重点。所以我要求各位在今后的工作 中要特注意这个问题。」

在 我宣布散会之前，我转向书记郭和大校，冷冷地问他们还有什么事没有。显然我这一问是出乎他们意料的，大校马上说：「没有了，我是来向大家学习的。」我又看 了一眼书记郭，他放下了香烟，笑着说：「会开得很好，解决了不少问题。看来每月一次的现场工作调度会是十分必要的，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大家就按照副所长 的要求去做吧。」

听了他们两个人的话，我真想挖苦他们几句，但坐在我旁边的阿同捅了我一下，我只好宣布散会，但马上又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我实在是感激他们二位对这个会议给予的肯定，大家都听见了，书记要大家按照我的要求去做，那我就要再加上一句，下个月的会议上，我是要听到你们的汇报的。」

说 到这里，我站了起来，用很诚恳的态度对大家说：「我很感激你们的工作，没有你们我是什么也干不了的，同样，没有了职工，你们也是什么也干不了的。让我与你 们每个人都握握手，你们回去再与你们部门的职工们握握手，代表我向他们表示感谢吧。」说完，我首先走到会议室的门口，与每一位离开会场的人握手并寒暄着。 我知道我有些激动了，尽量地控制着自己。当书记郭和大校走出来时，我也握了一下他们伸向我的手，冷冷地说：「谢谢来参加会议。」两个人的回答是一样的： 「会开得很好。」同时又都对我做出了笑脸，但我对他们却笑不出来。

回 到办公室，阿宗、阿同和阿生已经坐在这里。首先他们表示，我在下午的会议上的强硬态度是对的，表现得很自然，不会引起书记郭和大校的怀疑。接着又提到了大 校，一致认为他已经不可能在所里建立威信了，他已经到任七个多月了，至今连各部门的处长和主任好认识不了几个呢，又怎么去开展工作呢。阿宗又笑着提到了书 记郭在会上的那几句话，说书记郭可能走神了，结果把自己放在了被动的位置上。阿同立时说：「下个月的调度会无论是大校还是阿建，或者是他们两个人一起，都 不能主持这种会议的，昨天咱们的分析是对的，也只有阿宗副所长和我才能主持下月的会议，所以只好请阿生尽快整理出今天会议的记录，并尽快给阿宗副所长和我 送来一份复印件。」阿生答应着，又对阿同说：「下月会议前，我们三个人可以商量一下，确定会议的内容和几个重点问题。」

坐 在我旁边的阿宗，突然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真想和你一起走……」我马上打断他，说：「别胡说了，正直的和精英的人都走了光了，这里还是个研究所吗？想想 吧，书记郭和大校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带着一帮人公开的为所欲为，绝大多数的职工只有忍气吞声地受煎熬了，那么这个所也就存在不了几天了。」

正 说到这里，阿红进来，告诉我财务处副处长来了，我马上让阿红请他进来。副处长是带着支付工程款的支票来让我签字的。签好了字，我对他说：「这座楼的资金已 经不成问题了，关键是明春的第三座楼的资金，到目前为止仍是零。这就要看从现在到年底了，各部门是否能严格执行财务规定，只要按照新规定做到了，这第三座 楼的基础部分的工程款就有了，明春开工就没问题了。其实大家都知道，住房紧张是个全国性的大问题，解决了职工们的住房问题，就是我们唯一的办法使职工们能 留下来并安心工作，否则，人们很快就会走光，这个所也就不存在了。」

我 的话，他们是赞同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对贪污腐败的议论。这时，阿宗对大家说：「所长身体不好，让他早点回家休息吧。」于是大家都站起来告辞出去了。我把 阿宗和阿同留下，又关好门。这时，我让阿同打开了现金保险柜的门，

我们把里面的现金拿了出来，又用报纸把现金包了两包，他们一人带着一包回到办公室。

隔 天上午十点钟左右，阿同把医务室的一位医生请到了我的办公室，这位医生是个十分认真的人，一番检查之后，对我说：「你是由于工作压力太大，睡眠不足而引起 的神经衰弱，我给你些药，你最好现在回家，明天休息一天，过了周末，会好一些。」阿同已把阿红叫进来，要她跟着医生去医务室取药，医生在与我握手告别时又 说：「我去医院安排个日子，你应该做个全面检查，一个中年知识分子，负担重，压力大，十分容易患上心脏病、高血压和癌症的，我安排好了日子，你可一定要去 啊。」我笑着并答应了。

办 公桌我已经整理好，一个一个地锁好抽屉，把一串钥匙放在办公桌右上角的一个小抽屉里。我坐在那里，环视着这间办公室，自己也说不清自己究竟是什么心情，最 后不自禁地对自己说：「走了，走吧。」我站了起来，走到了门口又站住了，转过身来又看了一眼，然后打开门走了出去。在门外，阿红看到了我，马上站起来告诉 我，车已经停在楼下，又问我还需要什么。我笑着对她摇了摇头说：「可能是病了，感觉不太好，休息两天会好的，星期一见吧。没什么事的话也早点回家吧，不要 工作得太辛苦。」

阿 红答应着，又坚持要送我到下楼，我谢绝了，对她说我还要去行政办公室，有些事要交待给他们。行政办公室的人都在，我对少校和阿生说了一下我的病情，准备遵 照医嘱休息两天，要他们尽快整理出昨天会议记录存档，又交待几件其它的事要他们尽快办。我与每个人都握了手，最后握的是阿生，他握着我的手不放，坚持送我 下楼。在走廊和楼梯上走遇到了职工们，阿生对他们说我病了，于是引来了一阵阵的问候和关心。到了楼外，阿生又握住我的手，小声地问我还有什么事要交待给他 的，我摇了摇头，他又说：「你一切要小心，我们会记住你的。」我笑了，也小声对他说：「我还没死呢，说这话不是太早了点吗？替我向同志们道个别吧，请他们 原谅我近来事情太多，一直没有时间帮大家写些东西。」他马上又说：「放心吧，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又很郑重地说：「一路平安，千万多保重。」说完，转身走 进楼去了。

坐 在车里，司机也关切地问候我。我告诉他医生让我休息两天，让他星期一来接我上班。他答应着，说实话，这个司机还是不错的，尽管他负有监视我和报告我的一切 言行的特殊使命。可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他给过我任何麻烦。车子开到了家，我请他进屋喝杯茶，他谢绝了，开车走了。

我没进家门，而是向女儿的学校走去，这是我的计划，因为全家人今晚都去父母家吃饭，这是母亲的主意，说是要给我送行。所以我想把这个下午完全留给女儿。女儿见到我十分高兴，我向老 师请了假，便和女儿走出了校园。女儿搂着我，撒娇地说她想去颐和园划船，还要去那家饭馆吃鸡。我搂着她的小肩膀答应着，心里感到实在是太对不起女儿了。上 次带她去玩是在一年半之前，那次是我上任前，而这次是我要逃走前，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既知如此，何必当初。不想了。当初和现在，我都是身不由己，想来是我 命该如此。现在对我来讲，与家人的每一分钟都如千金之贵。

我 叫了一辆出租车，女儿惊喜极了，这是她第一次坐小汽车，她爬了进去，然后又紧紧地靠在我的身边。十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了颐和园，先去了那家饭馆吃饭，然后 又去划船，陪女儿玩了整整一个下午。看着我的女儿，我忘了一切，我们玩得痛快淋漓，筋疲力尽，直到傍晚才满头大汗地赶到父母家。

弟 弟和妹妹两家人都来了，一共十一口人，挤在小饭厅里，气氛的热闹是不用说了，都为我能有个机会去香港看看而高兴。知道真相的只有弟弟，而父亲的心里肯定是 矛盾的，他可能感到了不祥，可又不愿意相信是真的。他经历的苦难太多了，年纪也大了，他不想多问，也不想多知道。他已经变得和大多数人一样了，得过且过， 哪怕明天天塌下来，今晚也先要吃饱饭睡好觉的。

第二天，我早早就起来了，女儿很郑重地要求我在香港给她买个大娃娃，我答应了，然后送她去上学。回来后又和太 太吻别，她去上班，我送她去车站，看着她上了车。然后来到父母家，与父亲拥抱了一下，他似乎很激动，但却是什么都没说。母亲让我吃早点，正在和我说着什么 的时候，弟弟来了，他要送我去机场。趁着母亲不在的时候，他轻声问我：「准备好了吗？」我点了点头，他用食指指着自己的头发又说：「我问的是这里，你准备 好了没有？」我又点了一下头，但马上又摇摇头，小声对他说：「虽然我早就想到了会有这么一天的，但仍然感觉发生的太突然，而且不太相信这是真的。」这次是 他摇头了。他笑着对我说：「你太累了，到了香港后，好好休息，把自己好好放松一下，然后反思总结，千万记住，要永远保持自己头脑是清醒的。」我们兄弟俩的 感情是极深的，他的学识扎实，看问题尖锐透彻，为人正派。但对待政治，他似乎总是有一种玩世不恭和讽刺挖苦的态度。若不是六四的发生，我根本就不可能知道 他的真实的政治态度。但六四后，我们兄弟成了同志，他对局势的看法、分析，对我相当有影响。

汽 车的喇叭响了两声，阿润来接我们了。我匆匆拥抱了母亲，与弟弟钻进汽车。这是阿润父亲的车，这种车是只有部长这一级的干部才可以坐的。司机看上去与

我的年 纪差不多，很有礼貌地称呼我首长，又道了早安。阿润和弟弟都笑了，我赶紧向司机解释我不是首长，只是阿润的朋友。阿润插进来了，说道：「我就弄不懂，共产 党的官，屁本事没有，可官架子却大得不得了，喜欢听老百姓叫他们首长，然后就忘了自己姓什么了。」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在说我？我可从来都不是那样子 的。」他没理我，仍是那一副不急不忙、自说自话的样子接着说：「我就对我父亲说过，我说其实你们想坐这个天下，从来也没有想过老百姓同意不同意，你们就拼 命地去打天下。坐了天下后，你们又觉得自己有多么的了不起，好像立了多大的功劳似的，幻想着老百姓是多么的尊敬你们，其实从来就没有人希望你们坐天下，在 我接触的所有的人当中，我就从来没有听到过哪怕有一个人说共产党好的。你们有什么可威风的？还要逼着人民叫你们首长。」

我弟弟问他：「令尊大人是怎么回答你的呢？」阿润说：「没有回答，我说完就得赶快跑，否则就得挨上一巴掌。共产党无法无天，我挨了打都没处告状去，

在我十五、六岁时，我父亲就说我是五.七的漏网右派了，到了十八、九岁时，

我父亲就把我定为反党分子了。」说到这里，我们都笑了。我对司机说：「你的日子可不好过，老子是坚定分子，儿子是反党分子，把你夹在当中了。」司机笑着说：「我给他父亲开车快二十年了，已经听惯了，而且干这个工作有一条纪律，那就是只听不说。」

这 时，阿润转过身来，对我说：「其实，我早就知道你干不长，早晚会和阿成一样被搞掉，只是没想到你比阿成的结局还惨……」我马上向他使眼色，打手势希望他不 要说了，可他仍满不在乎地继续说：「怕什么？我告诉司机了，他知道你是逃跑的。快一年了，我和他已经不知道送走了多少人了。」我看了一眼司机，他伸出右手 举到头边向我敬了个礼。我对阿润说：「你说话可要小心，这些话在自己人当中可以说，但在外面是要惹祸的，我和你是这种关系，可有时我听你说话都害怕。」阿 润冲我翻了个白眼，说：「小心什么？明摆着的事，即使我整天喊万岁，有人想暗算我，我是躲不开的，你够小心了吧，不也出事了吗？依我看，你完全是自找的， 俗话说『装鸡像鸡，装狗像狗』，既作了共产党的官，就要像个共产党的官，否则不让共产党搞掉你还等什么？」

我 刚要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又接着说：「就说你吧，你反贪污，可哪个共产党的官不贪污？咱们不提中央和北京市，就说咱们所里，书记郭一家五口人可占了公房 六套，钱是至少弄了五十万，这还是最保守的估计。连那个退了休的老副书记至少也弄了三十几万，你不信？我有证据，他儿子逃到法国后，语言不通，找不到工 作，老副书记求我帮忙，一次就拿出十五万，求我换成美元又给他儿子寄去。你说说你有什么？人家又弄钱，又弄房，这就是新形势下共产党的新潮流。你不去随潮 流，反而追查那三百四十万。告诉你吧，他们早分了，也快花光了。一年半了，你都没追出来，还给自己惹了祸，你说该怪谁吧。再说那

个大校，钱弄了多少我不知 道，屁大的事不会干，可刚上任就带来了两个漂亮的女秘书，还不够，最近他又在勾搭医务室的一个护士。书记郭就不用说了，全所上下至少勾搭了二、三十个女人 了，你难道就阳痿？就拿你的车来说吧，哪个当官的车不是全家用？上学、买东西、探亲访友、郊游，只有那你的司机最舒服，每天一接一送就没事了。现在我可以 告诉你，他没少用你的车挣外快，我就没少用过你的车，也给过你的司机几百块钱的。你不知道吧？所以人家都说，学哲学的人呆板，学历史的人迂腐，阿成和你都 跟不上形势，两个人都被他们搞掉了。」

听 着他的话，我开始冒火。可阿润仍在说：「阿成两袖清风去了江西做县长，还算是有碗饭吃，你在这个位置上也快两年了，可结果不但丢了饭碗，还得出走，又是两 袖空空的，你的大脑是不是有问题了，到了香港后，找个医生好好检查一下。」阿润给自己点燃了一支烟，而我已是被他的话激怒了。以为他会就此打住了。没想到 他抽了口烟后又说：「话还得说回来，你是好人。我是在替你发愁，两手空空，又一个人出去，今后你可怎么办呢？人家中央一级的官儿都是成亿、几个亿的美元在 外国银行存着。北京市这一级的也至少几千万、上亿的美元进口袋了，你这一级的也该有几万到十几万美元了。我们是朋友，你愿不愿意告诉我，你身上有多少外 币。」

弟 弟接上来说：「他带了五百元人民币，我给他换了两百港币，还没给他呢。你的话有道理，我哥哥是该开开窍了。」我火了，冲着弟弟说：「开什么窍？」又对阿润 说：「你对我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的美德让你抨击的一钱不值，我的今后是不用别人担心的，有命活，没命死，反正谁也逃不掉一个死的。」

看 到我发火了，阿润反倒笑了，仍是那个样子对我说：「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对你们这些学究们我是真没办法了。我并没有说以权谋私、贪污搞女人是对的，我也恨 这些。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些都是这块天下的潮流，你不随，我并没有说你错了，可是到了外面，那是一个全新而又是陌生的世界，肯定也有各式各样的潮流，你是 搞历史的人，千万别搬出孔夫子的那一套去衡量外面的世界，多看，多听，再多想，记住了，你再也不是共产党的官了，流亡海外，只是一个无名之辈，一切都要从 零开始，那是很苦的，适者生存，这才是今天我想对你说的话。原谅我不是高学术的人，所以在表达方式上伤害了你，但你不要忘了，我们是朋友，朋友之间说什么 都可以，否则你就真成了共产党了，那我就让司机停车，你下去吧，我不帮共产党。」

说到这里，他笑着看着我，又加上一句：「对你说话真累人，幸亏你走了，否则我就要走了。」这个阿润和阿天是一个类型的人，谁拿他们也是没办法。我点了烟，看着窗外，听着他和我弟弟继续拿我开玩笑。

第二十二章 证件是真的

足足十个小时的睡眠，使我感到精神好极了。心里也极平静。我一边喝着茶，一边从窗口望着海关大楼。门外有人轻轻地敲门，并叫了两声大哥，是阿丹来了。打开门，果然是那个高高的阿丹。几年没见，他一点儿也没变，仍是那娃娃脸。他一步跨进了屋里，马上紧紧地拥抱我。

阿 丹与弟弟同龄，都已三十二岁了。两个人的友情始于七岁的时候，同一天两个人被母亲送进了同一所小学。他们俩与我和阿聪不一样，我和阿聪是断断续续，保持了 三十多年的友情，后来这几年又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关系。他们两个人在二十多年里是从没分开过的，从小学到中学又到高中，后又在同一个小工厂里做工，最后又一 起考入了同一所大 学，不同的是学科不同，毕业后两个人又被分派到同一个研究机构工作，以后又在同一天两个人都获得两工程师的证书。可令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个永远长着一张娃 娃脸的阿丹竟然在几年前成为了第一个敢于向研究机构递交辞职书的人，而且就在当天南下深圳自谋生路。几个月后，终于被这家英国公司录用，月薪两千元，把弟 弟羡慕得不得了，这是他月薪的八倍。尽管两人这几年分隔两地，但通信通话不断，每年阿丹回北京，探亲时，两个人仍是形影不离地整天泡在一起。弟弟一定是告 诉了阿丹一些关于我的事，所以当我们坐下后，阿丹马上告诉我说：「在广东，你可以放心。广东人只晓得一件事那就是钱，除此之外就没有他们关心的事了。我知 道你有些麻烦，相信我，我在这里几年了，也认识了一些人，我是可以负责你的安全的。

自 从六四后，海关上严了，国家安全部又派来不少人在海关盘查。现在我只想知道你的证件是不是真的。」我马上把证件递给了他，并说：「证件是真的，一位朋友的 父亲是警界的高层，通过这个关系搞出来的，当然是走后门了。」阿丹仔细的看过后，对我说：「这就不用担心了，证件不是伪造的，你的名字至少现在还不在通缉 的名单上，我们再利用下午出关高峰时间，我想是不会有问题的，即便出了事我也有办法在广东境内把你保出来。」

看 着他说话时认真的样子，我放心了，同时也笑了。我是早就把他当作弟弟了，在我的印象里，仍是他和我弟弟在一起胡闹时的样子，而且总认为他们长不大，

把他们 和妹妹都置于我的羽翼下保护，还不时的教诲和训斥。可现在，坐在我面前的这个阿丹，身材高大，举止得体，谈吐文雅，又当上了工程师。他们的生活经历太苦， 太不正常，他们已经过早地长大和成熟。

阿 丹背上我的背包，我们来到了街上，又在他的引导下来到了一家离海关最近的饭馆的楼上。阿丹点的几道菜味道不错，他又要了两杯酒，借口是祝我一路平安。时间 还早，出关的人不多，于是我们尽情地享受这顿午餐。然后又喝着茶，闲聊着打发时间。直到海关上的人多起来了，我开始准备离开这里去海关大楼了。

这 时的海关，正是人多的时间，大厅里挤满了等待出关的人。阿丹示意我站在了队尾，我开始仔细地观察周围的一切。十几个出关的信道，每个信道都有两个警察站在 那里仔细地盯着、看着排队出关的队伍里的每个人。这我倒不介意，我想发现的是那些国家安全部的便衣们。我敢保证，便衣的数量肯定多于警察，尽管我相信阿 同、阿宗和弟弟对我这次出关的安排是可靠的，至少在明天中午以前是不会有人发现我已出走了的，同时即使他们已经对我立了案，也不太可能在抓我之前通知机场 和海关，否则昨天在我上下飞机时就已经被捕了。

但 是有一点我必须要承认，就是研究所已经被军队接收了几个月了，可对于军队内部的运作和管理，我不了解，会不会我已经被跟踪或被监视？如果是的话，那么到现 在为止我的出走的意图已经暴露无疑，眼前的这道海关我是过不去的。想到这里，我有些紧张，马上考虑到是不是应该让阿丹想办法用船把我偷运进香港。不！我对 自己摇了摇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已经太晚了，我走不出这个大厅了。我马上低声对阿丹说：「你离开我，到大厅的入口处去，如果我被捕了，你千万要想办 法保护自己，同时想办法通知北京。走，离开我，快！」

我 说完后，阿丹马上笑着与站了另一队中的一个中年男人大声地说着广东话，又用手拍了拍那人的肩后，不慌不忙地离开了我。他是那么自然，让我松了一口气。看来 以前是我错了，我就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成年人看待过，可事实上他们确实都长大了，既有头脑又能干，又是我志同道合的好兄弟们。

我 没有试图用眼睛去寻找阿丹在哪里，但我相信他的眼睛是一刻不离地在注视着我。我开始思考着万一被捕后，他们可能会对我提出的问题，我应如何答辩。终于轮到 我了。我向那个关员递上通行证，他既没问我为什么甚至也没抬头看我，盖了章，又把通行证推给了我。我马上走出了海关，然后转过身来用眼睛寻

找着阿丹，他正 向我挥着手，又在努力地通过拥挤的人群向我走来。我笑着，用右手的两个手指在头上挥了一下，便转身向香港海关大步走去。

第二十三章 难怪那么多中国人拼着命往外跑

古叔胖胖的，个子不高，服装考究，相貌严肃，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当他说话和微笑时，我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忠厚的长者。待我们坐进了他的汽车后，我一点儿没犹豫地马上告诉了他我的实际情况，又告诉他香港海关只给了我二十天居留期，该怎么办，我一点儿主意也没有。

他 十分认真地听完我的话后，问我：「你叔叔知道这些吗？」我摇了摇头说：「他一点儿也不知道，无法通知他，打电话要被窃听，写信要被拆检，况且事情发生得太 突然，什么也来不及，先走出来要紧。」他点了点头说：「不要慌。我马上通知你叔叔，要他尽快来香港，我们会商量个办法的，暂时你是安全的。至于以后，你放 心，办法是很多的。」听他说话，可以断定这个人很实际也很实在，所以我又马上把话题进入到第二个主题上，那就是请求他允许我为他做工，而且无论做什么都可 以，只是为了在逗留期间维持一个最低的生活而已。他笑了起来，对我说：「这恐怕就没必要了吧。你叔叔也不会同意的。虽然他没想到你出了这件事，他把你托付给我，我完全负担得起你的一切开支。」

我 没笑，反而用极认真和严肃的口吻对他说：「你没理解我的意思，这次我来香港不是为了旅游，我从来就没想过来香港旅游。我们一家人都是挣政府工资的，尽管挣 的是所谓高工资，实际上也花不起这个钱来香港的。我这次是被迫出走，从刚才跨进香港的那一刻开始，我的学历、副教授的职称，副所长的级位就都成了历史，我 现在是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我知道你和我叔叔都是有钱的人，我不是拒绝你们的好意，现在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帮助我去到一个可以收留我的国家

和地方。至于生存 和谋生那是我自己的事了，也应该我自己去做。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而且我也会对我叔叔说同样的话。」

古叔沉默了一会儿后，微笑着对我说：「你的意思我完全明白。现在和我去吃饭，然后我送你去旅馆休息，明天我去接你，同意不？」

古 叔过海去九龙上班去了。我站在旅馆的窗边看着夜香港的灯光，想着刚才和在晚饭时畅谈的情形。我相信，古叔对我的印象很好，所以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晚饭中，他 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向我谈起了不少关于他自己的事。古叔经营一个由他自己艰难创建起来的集团公司，专门从事饭店、酒廊和歌厅生意，将近三十间生意分布 在香港各处，总产值接近一亿港币。所有的生意场地都装修得豪华漂亮，而且都很大，可以同时容纳四到五百个顾客。现在他去的九龙的这家饭馆，据说是仅有不到 二十张桌子的小饭馆，这里就是三十年前古叔游泳偷渡香港后工作的地方。几年的省吃俭用积下些钱，从老板手里买下了这个饭馆，又经过二十多年的经营，终于从 这一间小饭馆发展到今天的集团公司，而这个集团公司的总部就设在这个小饭馆里的几小间办公室里。我想古叔这样做的意思是在纪念着什么，这个小饭店不但是他 来港后生活的起始点和现在这个规模的开始点，而且也标志着这三十年的艰辛，同时也有个不忘本的意思。

古 叔出生在广东省东部的一个贫穷的小村子里，祖上世代务农。他没有读过多少书，而是早早地承担起生存的重任。在一九六零年初，已是二十岁出头的古叔实在忍受 不住那种没完没了的忍饥挨饿的日子了，就在村里人一个一个的饿得昏倒、生病和死去的时候，他决定要偷渡去香港寻求生存的机会。他没有对任何人说，更不敢让 当村支部书记的母亲知道，就在一天的早晨，他独自一个人上路了。几天后，他来到了海边，加入一群正在计划偷渡的年轻人。至于计划，也不过就是要想办法去偷 一些足够填饱肚子的食物，才有力气游水渡过海峡，至于能否成功地到达香港，大家并不去想。因为每个人都明白，大陆的边防军只要发现海里有人，就会毫不犹豫地用机关枪向海里扫射，没有被打死的人最后也会由于体力不支而在中途沉入海底。

只有一少部分的人成功地到达对岸。那一次，古叔是七个进入香港的偷渡者们中的一个。其 实，大部份香港人都有过一次或者两次的偷渡经历。一位我后来认识、与我同龄、在香港一家银行做会计主任的人就告诉过我关于他的偷渡的冒险经历。那是文革开 始的第二年，他才十七岁，父母已经自杀了，他不堪忍受对他的折磨，与几个同样是在运动中被称作是狗崽子的伙伴来到海边。他回忆，那天的晚上本应该是个偷渡 的好机会，没有月亮，海上漆黑一片。当时有大约两千人先后跳进了海里，很快突然刮风了，风不大，但海上起了浪头。大家知道，

在这种情形下，渡过去的可能性 就更低，于是很多人调转了方向开始往回游。但是不久岸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他顾不得回头去看，拼命地挥动着胳膊游着，直到听不到枪声。他感到体力不支，头 晕、浑身发冷，而且颤抖。他停止游水，将一块他牢牢地捆在腰后的生地瓜解下来，大口地啃着、吞咽着，并继续地游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他的双脚终于踏到地 面。

他 叹息着告诉我，那天活着到香港的人最多不过五、六百人，绝大部分人们不是死在枪口下，就是中途沉入海底。那晚还不是人数最多的，如果是个风平浪静又没有月 亮的日子，通常人数可以达到三、四千，最多的时候可以有六、七千人。但是能成功地来到香港的人，永远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在我后来接触到的所有的香港人当 中，真正的本土人很少，外来人是绝大多数。带着身家财产来的人基本上都是在一九五零年以前来香港的。

一 九五零年后共产党关上了国门，从此人们只可进而不准出，于是偷渡便从此开始了，而且从没有停止过。真正的频繁的大规模的偷渡高峰期，正是在大陆上人为地造 成的两个最残酷的时期：一个是三年多的所谓大饥荒时期，另一个就是长达十年半的文化大浩劫运动。这期间先后有百万人成功地偷渡到香港，这些人都是一无所有 的，但这个有自由又尊重人权的小社会给他们提供希望、机会和空间，最终可以过上一个体面的生活，甚至大有作为。就在我来到香港的第三天，古叔终于同意我的 要求，把我安排在了他的一间可以同时容纳四百人的酒廊兼歌厅里工作。这里的经理阿景又把厨房后面的一间不到四平方米的小储藏室清理了出来，并安装了空调、 床铺，让我可以住进去。我当天就搬了进去，同时也开始了工作。在这间功能齐全的大酒廊里，雇佣着具有不同的专业技术的雇员达五十多人，有两位专职的保养维 修工人，他们使用的工具都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更不用提维修保养了。这个酒廊里的中心位置是一个巨大的旋转舞台，是为唱歌表演用的，还有十多间的卡拉 OK 的隔音房，当然就要有音响和灯光方面的技术人员了，对 这方面我一窍不通，厨房工作就更甭提了，厨师们都是有执照的，十几个厨师们工作起来配合得是那么的默契、协调，我却是从出生到现在从未做过饭，显然这个大 厨房里的工作也插不进手。那么做个跑堂的怎么样？当然了，这里的跑堂的是被称作侍者，听起来文明些，但香港人讲的是广东话，我听不懂，另外做侍者也有独特 的技艺，他们用双手同时拿起六个大盘子，然后还要在一排排的座位之间飞快地走来走去，动作自如，令人羡慕，我干不了这个工作。最后一个部门就是那个大酒吧 了，有五、六个人在里面工作，巨大、漂亮的酒柜里摆放着上百种西方的酒，我只知道几种酒的名字，但却从没尝过它们的味道，当然也更不知道怎么样去调制鸡尾 酒，虽然这算不什么学问，但也要经过专业训练。

经 理阿景是个才三十岁的高大的年轻人，为人诚恳，工作热情。他是看在古叔这个大老板的面子上，极力想要给我安排一个体面些的工作，而我却遵循着「知之为知 之，不知为不知」的古训，一一拒绝了他的好意的安排。阿景只好去和古叔商量，决定让我在中午工作在酒吧，清洗各种饮料的杯子。下午则和其它的侍者一道去做 清洁整理工作，并为晚餐、酒吧和歌厅的服务做做准备。每天工作五个小时，一周工作六天，每周工资七百港币。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份工作，但拒绝接受任何报酬。 古叔周到，阿景为我安排的一切都好，我的食宿都是免费的，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这样对待我，我感激都来不及，只是想着知恩图报，又怎么能去接受钱？

大 约十天后，想必是阿景向古叔报告了，古叔对我说：「这里和大陆不同，不但有自由同时也有健全的法律，你工作了，就要有报酬，这也是法律规定的，况且每周七 百块钱是很低的工作。香港又是个花钱很容易的地方，在你合法留在这里的日子里，尽量多出去走走看看。一个星期后，你就不能出去了，否则警察发现你，会马上 送你回去的，香港政府是保护不了从大陆跑出来的政治异见者的。我已经告诉了阿景，到了你不能出去以后，他会保护你，你利用这段时间去买一些西方的关于政 治、经济和司法制度方面的书，好好读读，同时多出去接触人，听听所谓香港人是如何评论大屠杀和民主、自由的，再了解一下香港政府是如何保障人权的。其实，香港政府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但比起大陆来，已经好出一百倍都不止了，这些对你今后都会有帮助。」

古 叔所说的都是为我好，我只有加倍努力地工作去报答了。从第一天开始，我每天早上提早一、两个小时工作，别人干什么，我也干什么，一直干到吃晚饭为止。而且 是做完一件事情后，马上又主动去做另一件事。我卖力地做着，又与职工们说笑着，使这里的雇员们对我的表现都很吃惊，都夸我能干。而我心里却在想，这又算什 么，比起我在北京的工作，每天忙忙碌碌工作十个小时，回家后还要看书，写东西至少四、五个小时，就这样辛苦地干着，每天的烦恼、压力不断，攻击、指责从没 停止过，还要承担着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政治风险，被迫干着我根本不想干的事，结果到头来还是被立案调查，后果就不必问了，监狱正等着我呢。对于现在我所干 的这点事，真是我一生中最轻松、最愉快的时候。何况一周七百港币的收入，等于我在北京的一个半月的工资，难怪有那么多中国人拼着命往外跑，宁可在外国洗盘 子也不回来。

雇 员们告诉我，多年来，古叔都是每天下午三点钟左右来到这里，从不对任何人说话，只是坐在那里看档，直到晚饭前才走。自从我来了后，每天他来都把我叫过去， 和他坐在一起说话聊天。我表示过几次，我在工作，不能陪他说话。他都是微笑着对我说：「你坐嘛，让他们干去。」时间长了，他也慢慢地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 了，加上阿景和雇员们对我的评论，他可能是又怕我工作得过份辛苦，所以这每天下午的聊天渐渐地变成了规律，聊天的内容也变得越来越广泛，

各自家庭的背景， 个人的身世、经历、爱好，他尤其喜欢我的专业，爱听我在考察和发掘过程中的所有细节。他也对我讲到了他初到香港的艰难，后来又是如何用自己辛苦存下的几千 块钱开始一步一步地发展到今天的这个局面的酸甜苦辣。他说的不少事对我都很有感触的。我与古叔有不少的共同之处，互相投缘，无话不谈，不知不觉之中，我觉 得他像我的亲叔叔一样了。

第二十四章　**一介百姓 无意与任何人为敌**

叔 叔终于来香港看我了。在动身之前，他已经在一家大饭店里定了几桌酒席，并通知了他在香港的所有的朋友们。古叔带他来见我时，我们互相端详着对方，又互相地 问候着。「我和你父亲已经分别四十一年了，你都四十岁了。天啊，转眼我们都老了。不过，从你的脸上我还能找出你父亲二十几岁的样子来。你父亲有了你这样的 一个大儿子，我有了一个体面的大侄子，我真是高兴啊。」

不等我说话，他又说：「我找你们找了十年呀。我先是托人在福建老家打听你父亲，我认 为像我们这种家庭背景的人，你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定会被遣送回老家批斗的，共产党讲究阶级斗争嘛。结果我没找到。后来我又托人在苏州找你母亲，这回有了 点线索，说你父母结婚后住在上海。我马上托人在上海打听，后来才知道你父亲在一九五零年被派到天津修复南开大学，我又请人找你们，这才知道，你们已经在北 京定居三十多年了。又费了很大的劲才得到你们的地址，我马上给你们写了信。因为我不好去，所以请你父亲来香港见面。希望这信没给你们家带来麻烦。古叔打电话告诉我你来了，当时我吓了一跳以为我哥哥出事了呢！你的事我已经知道了，我们慢慢商量。现在，我要郑重地把你介绍给我在香港的朋友们。然后，我要你把你们这四十年中大大小小的事都详细地说给我听，好不好？」

车 子停了下来，一位侍者从外面打开了车门，然后又引导着步入宴会厅。叔叔的朋友们已经到了，见到我们进来，都站了起来。在叔叔的介绍下，我与这些商人们、中 学校长、教授们、政府官员们、台湾军政界退休的人士们握手、寒暄。由于都是叔叔的挚友们，我是晚辈，只能遵循着常规礼貌把他们都称叔叔，其中七、八位年纪 明显地大于叔叔的人，则称他们伯父。

叔 叔是我父亲这一辈人所有的兄弟、堂兄弟中唯一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他年轻时很早就从军，到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时，他已是少尉军官了。到了 六十年代初，他改行从政，做过县长、市党部书记长。按照国民党政府的规定，政府的公务人员干满三十年就可以退休，叔叔从军时才十几岁，所以在他还不到五十 岁时就退休了。以后他又开始经商，据说在台北的总公司很小，子公司却分布在亚洲和西方的一些国家，生意经营得很不错。

我 父亲讲，叔叔从小就不爱读书，他喜欢接触人，为人开朗，但又争强好胜，热心于社会公益，又喜好政治，可能正是因为这些，尽管他已退休多年了，但仍担任着不 少社会、民间甚至政治团体的工作，这从他那一堆委员、主席、秘书长、书记长的头衔中就可以知道了。从今天的宴会上，他邀请来的这些朋友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几位从台湾退休军政界人士想必都是叔叔过去的同事们，其它三十几位都是工作在不同领域中的包括香港政界、学界、商界和社会民间团体等等。看起来，叔叔无论 在过去或是现在都很成功，颇有一定名声。宴会开始了，我与叔叔和古叔坐在一起，同桌的其它六、七位老先生们都是国民党方面退休的前高官们。酒过三循后，叔 叔向他们简单地说了我的真实身份及目前的麻烦和处境。一位柱着拐杖、我称他为金伯的老先生对我欠了欠身，又开玩笑似的再次与我握了握手，说：「这么说，你 原来竟是我的政敌了？」我笑着说：「一介百姓，无意与任何人为敌，是共产党把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老百姓推向了敌对方。」

这 时，叔叔开始用闽南话对他们说着什么，我不懂这些地方方言，只好静静地坐着。待他们这场闽南话的交谈过后，金伯笑着对我说：「希望你能站到我们这边来，你 还年轻，有许多事情是可以做的，有机会我们好好谈谈。」叔叔接上来说：「我是要把侄子接到台湾去的。我知道很难，但是我一定要这么做。他是不能再回大陆去 了，还望各位帮我想想办法才好。」一位我称为季伯的老先生说：「这事不好办，以他的政治身份是可不能合法地进台湾的，除非以特殊的目的，但定居是不太可能 的」。季伯是国家安全局退休的高官，相当熟悉法律和政策，所以他的话我是相信的。国共两党对立了七十年，两三个星期前我还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台湾方面当 然要警惕。

叔 叔还在说着什么，古叔打断了他，说：「我看现在就决定这件事还太早，他刚来香港不久，也要让他静下心来多看看，多听听，也多想想。一段时间后，我们再商量 这件事也不迟的。」看来大家都赞成古叔的话，于是话题又转到其它方面去。叔叔靠近我，把的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小声说：「不管他们怎么说，我是一定要把你 弄到台湾去的。你一个人出来，不和我在一起还去哪里？在台湾我有一所大房子，你就和我们住在一起。」

叔 叔对我说话，我必须毕恭毕敬地听着，这是我们这个大家族的传统，也是经历了十多年的大浩劫也变不了的规矩。但我此时已有了不同的想法，那是在几天前，我反 复地看了古叔从香港民阵那里借来的六四大屠杀的录像后，想法开始有了转变。共产党以几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用暴力夺得了政权，然后又以同样的暴力去统治人 民。四十年当政，恐怕接近一亿人民死于这个政权下，那么就不应当排除去使用暴力手段推翻这个暴政的可能性。我想在香港暂避一段时间，让事态冷淡下来，利用 这段时间我正好多读一些书，然后偷渡进入大陆，专门从事地下反共活动。这样的秘密组织在大陆不少，今天遇到的这位金伯引起了我的注意。叔叔在向我介绍他时说，金伯在国防部情报局工作了四十年，退休前是中将。

叔 叔是个大忙人，事情多，与我仅待了两天就又匆匆走了。这两天中，我们白天、黑夜地在一起，他要知道所有的事，尤其是我们怎么渡过这四十年中共产党大大小小 的运动的。他几次流泪，时而愤怒，时而高兴地听着我的讲述。在送他走之前，他还再再地对我说：「既然把共产党得罪了，那就不要回去了，我是一定要把你办到 台湾去的，你不跟着我还去哪里？我的公司有二十几个子公司在世界各地，我实在忙不过来。你就在我的公司力工作，你是我的亲侄子，我不相信你还相信谁？你不 要听古叔的话，想着去外国，中国人还是待在自己的土地上好些。共产党长不了，将来我和你一起回去。现在，你安心等着我去办你的事，千万不要到外国，听到没有？」

第二十五章 我的孩子 你们都是好孩子

就 在我来到香港三个月后的一天的傍晚，古叔来到了我住的这间小屋，告诉我有一个叫阿东的年轻人找到了古叔，提出了要求见我。古叔问我认不认识这个人。说实 话，我实在是不知道这个名字，但是，既然他能找到古叔要求见我，就证明这个人是受我父母之托而来的，因为除了我们家的人以外，没有人知道古叔的名字和电 话。

所 以我请求古叔让我见这个人。古叔犹豫了一下同意了。半个小时后，古叔带来了一个高大的年轻人，古叔没有进来，只从外面轻轻关上门。我端详着这个年轻人，他 跨进一步，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说：「所长，我叫阿东，我是一九八八年北京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的，在所里工作已经两年了。」他又提到了他所在的研究室正、 副主任的名字和他的那个小组的研究专案后，我放心了。马上请他坐下，并为自己刚才对他的怀疑道了歉。他有些不安，但立刻就对我说：「我这是去日本学习电子 专业，为期两年。原来指定的是从上海出关，是阿宗副所长安排我来见你，所以让阿润把我的出关地点改在了深圳，为的是不会引起任何的怀疑。」听了他的话，我 有些紧张，会不会有人出事了？阿东没有回答我，只是从背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我，信封上是我父亲的笔迹。我正要拆开，阿东做了个手势阻止了我，说：「六个小 时后我就要上飞机了，我只能待二十分钟，要亲口告诉你几件事。」我放下了信。阿东告诉了我，在我出走后所里发生的一些事。

就 在我出走的大约一个月左右，研究所党委召开了一个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仅是党委成员，还有军政治部、后勤部也都派来了人，以及所里各部门、各研究室的 党政正、副负责人也都参加了会议。会上由书记郭和王大校分别宣读了对我的调查报告，及报告内容的一些解释，接着又由军方来的少将对会议宣布我已被隔离审查 了，同时要求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人都要主动帮助调查组的工作和揭露我的问题，最后宣布在上级的任命没有到达之前，暂时由阿建代理副所长的职务。这次会议的几 天后，所里出现了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是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军人去所里报到，成队的军人被派到所里来。第二个现象是所里研究人员、技术荣誉和职工们开始辞职离开和提前退休。

两 个星期前，研究所召开了一次全体职工都参加的大会，书记郭在会上宣布了我的总罪行，共有三条：一、我是一九八九年春夏之际，在北京发生的那场反革命暴乱的 幕后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同时又是研究所在暴乱期间及以后，所发生的一切不正常的现象和事件的主要和直接的负责人。二、反对军队对北京的戒严，反对军队对 研究所的接收，从他们已掌握的一系列的证据显示，我的反军的行为，实质上是反党。三、指控我掩盖事实真相，反对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包庇暴乱份子。然后书记 郭又说出我已出走的事实，并且提到了军方和警方将会

密切合作将我逮捕归案。最后，他又代表上级党组宣布开除我 的党籍，解除我的党委委员和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接下来由王大校代表军队上级宣布解除我的副所长职务并开除公职。至于人事上是否有否其它变动和会后是否有 人被捕，阿东不知道。只是告诉我阿宗有封亲笔信给我，就在这个信封里，又说他听到有十几个被宣布停职，检查交待问题。他说出了几个人的名字，我放心了。他 们都不是主要或关键的人物，阿宗、阿同他们是会有办法保护这些人过关的。

阿 东又告诉我，昨天晚上阿宗带他去我父母的家，坐了不到二十分钟，便带着这封信离开了。阿东对我说：「你放心吧，你的父母都很好，我估计阿宗副所长已经告诉 了他们关于你的事，你母亲一直在哭，告别时她一再嘱咐我一定要转告你，任凭你去天涯海角，也千万不要回去，同时要你注意身体。」说到这里，阿东站了起来， 我知道他就要去赶飞机，实在不能留他多坐一会儿。他从背包中拿出一本《英汉字典》送到了我面前，说：「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认为你是对的，你做的没有错。 你可以考虑去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英国，他们都会保护像你这样的人的，所以请你接受这本字典，学一点英语，会有用的。阿宗副所长要我转告你，香港已被大陆渗透，绝不是个久留之地，这里不安全，这个政府保护不了任何人的。」

我 坐了下来，拆开了这封信的信封。第一页是父亲写给我的，他提到在两个多月前，阿宗曾让他的女儿送口信给我的父母，说我的事情震怒了上级，结局是不会好的， 要他们想办法通知我不要回去，我父母才知道我出事了，但他们考虑到通信的不安全，所以并没有告诉我。两周前的一天的上午，书记郭、王大校和另外两个军人去 了我父母家，向他们宣布了我的罪行以及一系列的开除和解除后，又要求我父母转告我三件事：一、无论我在哪里，不许参加民运组织。二、不准公开发表讲话和演 讲。三、不准发表文章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他们并提到，只要我遵守了这三条，父母和我的家人都不会有任何麻烦的，否则而引起的一切后果，我是要负一切责 任的。看到这里，我气得手有些抖，这是威胁，以我父母和家人来要挟我，以前我就说过，共产党就是一帮无道的土匪，难道我说错了？

父 亲的信中又告诉我，我太太已接到上级要在一个月里收回我们的住房的通知。而且电话公司已经拆除了我的电话。父亲说仍让我太太和女儿搬回来与我父母一起住， 并保证她们的生活绝不会因为没有了收入而降低。收房子拆电话倒是我预料之中的，当初就是在我到任后的第二天，上级的福利部门就把这套房子的钥匙送来了，那 时，我是坚决不同意搬进去的，并把钥匙交给了所里的福利处，让他们转交上级。可令我没想到的是，几天后，我太太在福利处派来的几个人的帮助下，竟一点儿没 让我知道，就把家搬了进去。

父 亲在信的结尾中写道：「走到哪儿都好，只是不要回来，哪怕你在外边要了饭，也比在监狱里好。这个世界是大的，应该去走走、看看，学习新东西，事已至此，那 就忘掉过去，面对今后吧。」母亲在父亲的这封信的背后写道：「我的孩子，你们都是好孩子，尽管他们来说了一大堆你的罪名，你仍是我的好孩子，听妈一句话， 去到哪里都好，就是不要回来，你刚四十岁，重新开始生活并不晚，不用担心你的老婆孩子，我会照顾好她们的。要注意身体，一切小心。」第二页就是阿宗写给我 的信，内容与阿东所说的基本相同。目前尚无人被捕，但有近二十人被停职反省，至于是否还会有一个大清洗，或者正在酝酿着什么阴谋，目前还不敢肯定。他肯定 了一件事，就是近来研究人员的流失，他预感这个研究所不会存在很久了。最后再再地嘱咐我：「尽快离开香港，你已届不惑之年，应当知道何去何从的。」信的背 面，弟弟写了几句话，他没想到对我的决定会做这么快，但他以为这是好事，可以使我立即面对现实，一切从零开始。

我 再次读了信，又检查了信封，奇怪为什么我太太没给我写几个字来。这次我的出走，尤其是它们对我的定罪，对我太太来说是个极大的打击，而且是绝对出乎她意料 的，因为许多事情我从来就没让她知道过。这并不是说我不爱她，只是我不能告诉她。近十年的共同生活，我了解她，她不了解我，她相信我，我也相信她，但我绝 对不相信她的家庭，尤其是她的姐姐、哥哥和弟弟。在文化浩劫的年代里，我太太是她们家四个孩子中唯一一个去了内蒙古的农场的人，在那里一待就是八年。其它 三个全是红卫兵、造反派，后 来都被留在了城市分配了工作，又结婚成家，从未受过颠沛流离之苦，所受到的教育的程度，仅仅是能看报纸而已。我太太受教育的程度同样低下，但她总归是经历 了八年农村之苦，又与我生活了近十年，在平时的点点滴滴的小事上，她受到不少我的影响。同时在物质上以及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她是十分满足的。去年大屠杀 发生后，她可以说在思想上完全倒向了我这边，她主动去领了几个学生藏在我们家。尽管这次我的出走没有告诉她实情，但我半生的积蓄都留给了她，足够她和女儿 用几年了。上级要收回住房，似乎也不应该成为个多大的事的，在住进这套房子之前，我们有八年是与我父母生活在一起的，而且相处很好。

她 没写几个字来，确实让我不能不多想，夫妇感情好坏，我要承担至少一半责任。自从我被任命在这个职务上后，工作忙，压力大，头疼的事不断。一年半了，几乎没 有过夫妻间的那种谈话，更没有一起出去散散步，看场电影或下饭馆，阿洪的那个裸体聚会也不去了，做爱倒是每周一次，但也越来越像是例行公事了。其实太太也 有变化，我也注意到，以前凡是我的朋友、同事或同志来我家，她都很热情地招待，有说有笑无拘无束，可自从我到了这个职务上以后，她对他们的招待不像以往， 有时就干脆躲在屋里不出来。

但对书记郭和王大校的那次到访，她却显示出了不必要的热情，在这之前，曾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了她与邻居太太的闲谈，她指着对方的孩子问这位太太：「她

爸爸是多少级的干部？」那位太 太回答了她，她马上就在对方并没有问她的情形下，告诉了对方我的级别和职务。我没想到她的虚荣心竟会膨胀到这种地步，我感到我有责任与她进行一次谈话，仍 因为忙，一拖再拖没能谈成。后来的一次就是那个军政委请我去吃中饭，她有几天不爱理我，我也注意到，想必是因为没有邀请她的缘故。这次在我出走前，她表现 得很兴奋，又给我一张长长的单子，上面开列着她要我在香港买的衣物，当晚我曾暗示她这次的分别恐怕会相当长时间，但她马上表示时间长也没关系，出去的人都 挣大钱，而且回来时还能带回许多外国的好东西。到了这时，我才感到问题严重了，但我已经没有时间。

她 与她的姐姐、哥哥和弟弟的来往十分密切，基本上每个月聚一次。自从我们搬进那套房子，他们聚会的地点就改在我们家了。我倒并不介意，问题是她姐姐和哥哥的 为人行事，实在是提不到有什么准则的。是是非非、胡说八道，大有共产党的唯恐天下不乱的作风。我提醒过她两次，但她并不说话，所以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但是，我老早就有预感，如果我们夫妇间在感情上出现问题的话，她的哥哥姐姐就会是这个危机的制造人。至于为什么，我只能解释为我们两个家庭是属于两个不同 的阶层的，按共产党的话讲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他们家所属的那个阶级是共产党一再吹捧、肆意利用而又任意强奸 的阶级，而我们家是属于共产党整天喊叫着要消灭掉的阶级。四十年来，这道莫名其妙的人为鸿沟已变得更宽更深了，只要共产党再搞个运动，他们一家人会毫不犹 豫地再次跳出来大喊大叫，待到运动过后，他们也丝毫没有上当、被利用了的感觉。在我们结婚后的近两年的时间里，多少个晚上我们同坐在灯光下，我给她朗读名 着中的一些篇章，又从家里的藏书中挑出几本适合她看的书让她阅读，但后来我不得不承认，读书和学习并不适合所有的人。

没有太太的信息，使我有些担心。我并不担心她会因我的定罪而受到迫害，因为我父亲的名望和影响仍在，保护一家人还是足够的。我担心的是，她的哥哥姐姐如果想在我的这件事上去谋求某种利益或好处的话，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军 方和上级政工部门会找我太太去谈话，那是例行公事的谈话，无非是要她同意他们对我的定罪，也会要求她对我做些揭发，但她是绝对不知道我参加的那个沙龙和刊 物的事，至于她哥哥姐姐应当是不会插手。几年前他们的父亲患癌症，我叔叔是当今大陆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癌症专家之一，曾给周恩来治疗癌病，后来专门从事肿瘤 研究工作。我父亲去求他为我岳父做检查，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并指派了他的一个助手负责治疗，因此而使我岳父多活了一年半。在他去世时，我的父母和我都分 别给予了他们经济上的帮助，这些事都曾使他们一家人大为感动。现在我被定了一大堆的罪，事情至此也就结束了，再想在我的事情上做文章的话，第一没有必要 了，第二更找不到什么油水了。担心是没必要了，但太太没写几个字来，始终在我的脑子里划着问号。

那 天晚上我就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古叔，并给他看了信。他有些紧张了，说马上给我叔叔打电话商量此事，同时他又去找阿景，安排了一系列对我的保护措施，从那天开 始，我那本来就不多的一点点自由就变得少得可怜了，除去几个小时的工作外，其余的十七、八个小时，我都是被阿景反锁在这间小屋里。香港不安全，因为共产党 已经渗透进香港政府的各个部门里了，对于这一点，我是毫不怀疑的，所以每当阿景笑着向我打手势时，我便一声不响地走回小屋，由他在外面锁上门。从那以后， 我与金伯和季伯的来往也断了，只有几次，当两位老人来喝酒时，阿景便开了门，让我去和他们坐上一阵说说话，两 位老人仍然不同意我的潜回大陆的想法，极力主张我应该去台湾，并要我考虑发表个与共产党一刀两断的公开声明。台湾方面是会有所反应的，当我提出那样做是会 给父母和家庭带来麻烦时，他们要我考虑这种麻烦可能会有多大，他们的共同看法是，这样做会使共产党把我看做是它们的威胁，反而不敢给我的家人找麻烦。我尊 敬他们，但却不敢认同这一点，共产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绝不拿我们一家人性命去冒险。

在 以后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叔叔给我寄来了两封信，内容都是一个，那就是让我安心等待，他正在办理能让我合法进入台湾和定居的手续。我在给他的回信中强调了一 点，那就是我合法进入台湾，同时不给家里人带来任何麻烦，否则我不如去其它国家寻求政治保护。同时我也告诉他，我仍然打算返回大陆，专门从事地下反共活 动。我的这个最后的想法使叔叔大为紧张，并几次打电话告诉了古叔，古叔倒并不紧张，只是对我的这个打算不以为然。于是，古叔与我就这件事有过几次长谈，并 给我两本介绍加拿大的书。古叔的看法是，金伯、季伯和我叔叔都是已经与共产党打了一辈子的人，已经打出了仇，所以在他们的思维上，和做事的动机上，都已经 不知不觉地带有政治目的。古叔提到我也是一样的，会不顾一切地做任何事去推翻共产党。所以他坚决反对我潜回大陆的想法，同时他也不同意我去台湾。他要我以 退为进，慎重考虑，他说：「你只是个教授、学者，或许你还是个能干的行政官，但你绝对不是个政治家，尤其海峡两岸之间的政治更是复杂、肮脏，你不是那种 人，你是对付不了的。听我的话，去加拿大，好好学习人家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共产党一定会倒台的，你一定看得到那一天，你马上回来，用你学到的东西去管 理国家，不好吗？」

古 叔对我的这几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对我起了很关键的作用。长期劳心、劳力的工作所积存起来的疲劳、压抑、愤恨，甚至委屈，都使我在目前这个关键时刻，无法冷 静地思考问题，而且头脑混乱纷杂。我开始调理自己的心态，清除脑中一切暂不该有的东西，静心寡欲地认真考虑面前的这三条路，同时也认真读完了那两本介绍加 拿大的书，尽管一时还决定不了究竟走哪条路，我已经开始学英语。

第二十六章　我们母女俩会被他们逼死

一 天，阿景给我送来了一封信，是我太太写给我的。几个月前我的那种不祥的感觉终于变成了现实。她已经搬到我父母家几个月了，在这封长达三张纸的信中，所讲的 都是我父母和妹妹如何虐待她和女儿，使她们母女忍无可忍无法再活下去。信中以大篇幅述说这些家庭纠纷的发生，及她受到虐待的事实。但我马上就清醒地感觉到 了她是在有人授意的情形下制造这些事端，有意地挑起家庭矛盾和不和睦。她在信的结尾写道：「事已至此，我实在受不了了，请你赶快回来解决问题，否则我们母 女俩会被他们逼死。」

这是共产党的几十年不变的做法，整倒一个人以后，还要想方设法去撕碎这个人的家庭。通 常是从这个家庭的内部去分化瓦解，使家宅不宁，人人自危，使这个家庭中的每个人整天生活在极度的高压、紧张与恐惧当中。再由于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事端与争 吵，使这个家庭中的老人或病人生闷气。只要反复循环，不断地这样去做一段时间，这个家庭中就一定会有人死掉或者自杀的。二十多年前那场文化浩劫中，几千万 家庭就这样被毁掉。

我 们的家庭是个例外，我们兄弟几次被鼓动去和父母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并要我们站出来去揭发父母的罪行，监督汇报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那年弟弟才八 岁，妹妹十三岁，我已十六岁了，他们俩都听我的。我说：「我们宁可承认我们是狗崽子，也绝不做违反人伦的事。我们是读书人家的子弟，不应当去淌这个浑 水。」弟弟妹妹都同意，我们一起顶住各种压力和威胁。两年后，我被送去内蒙古的农村，妹妹便面临两个选择，揭发父母、断绝关系，可以留在北京分配工作；或 者就像我一样去农村。妹妹选择了后者，就在她刚刚十六岁时，就被送去了黑龙江的农场，一待就是八年多。在那险恶的十多年中，我们凭着家庭的团结，一致对外地顶住精神和肉体的摧残，赢得最后全家人的团聚。

使 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共产党故计重演，仍然想在我们家庭内部打开缺口，与我共同生活了近十年的太太，已经走上了背叛家庭的道路。我实在不 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了入党？有可能，弄张党票就会有个小官职去做的，这在她娘家的历史上将是史无前例的，可她在学识和能力上几乎等于零呀。但这是不 重要的，共产党历来是要奴才而不要人才；或者她是为了要一

套房子？这个可能性就更小了。北京的住房那么紧张，即便她入了党，做了官，也达不到可以享受一套 房子的级别；或许是为了我父母的这套房子？更不可能了，这套房子也是由于我父亲的职位而配给的，害死了我父母，政府仍会把房子收回，轮不到她的手里。难道 入党，当个小小的班、组长，对她就那么重要？一个快四十岁的女人了，为了一个未入流的小职务，竟会出卖自己的丈夫？这不但不应该，也是不可能的。或者是她 受到了什么样的压力或者威胁？这倒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父亲仍在位，他的影响力足够保证这个家庭，何况我还有弟弟，他既有头脑、也有办法去对付这种事，不 会让自己的嫂子受到刁难。我反复分析，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得不情愿地去从我太太的心理上去找原因了。我们结婚十年，在别人看来我是一帆风顺的十年，太太也一定是这样认为的。结婚那年，我还是个没毕业的大学生，后来做到副教授，又做上了研究室副主任，后来副所长，这在我来说是不情不愿的，但对她来讲正是满足且还助长了她的虚荣心。

这 次，突然地失去了一切，我有准备，但她却没有，她一定是承受不住这个打击，也加上她根本就没有这种心理准备，但即便这样，与接受共产党的利用也是两回事 的，后果她应该明白的。我决定好好给太太写封信去，向她表达我的歉意，并用心地劝慰她。现在，我已是个明牌的反党分子，所以我开诚布公地告诉她，不要上 当，不要被利用，这几年我的工资高，兼职多，已积下一笔可观的存款，在信中我郑重宣布全部归她所有，并告诉她即便因为我的缘故失去工作，这笔钱也足够她用 几年。一旦我被一个民主国家接受后，基于人道立场，人家也会允许我们夫妻、父女团聚。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挫折是一定要有的，度过这一段时间，我们会见到柳暗花明的。封上信封之前，我将两百港币夹进了信里，古叔向我点头笑了一下，把信给了阿景，对他说：「请你拜托个朋友把这封信带进大陆，然后用一个新的信封，写上我们家的地址和在大陆发出这封信的地 址，再把这封信装进去寄走。」我对阿景说：「你已经看出来了，我太太已经站到那一边去了。也就是说，北京的军、警方面正在等这封信。你也看了我写的回信， 内容肯定是不合他们的胃口的，这意思就是这封信到不了我太太的手里。可是，如果这封信发出的地址既不是香港又不是这个地方，而是大陆的任何一个地址的话， 被截获和检查的机会就很小。」阿景明白了，他在我的肩上拍了一下说：「放心吧，明天中午前，这封信会从深圳发出。」

古 叔笑了，对我说：「你待了半年多了，我不知道你对香港又是个什么看法，我来了三十多年了，我是太了解他们了。香港人自以为聪明，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高高 在上而看不起几乎所有的人，这种盲目的自我优越性，使得香港人越来越愚蠢，越来越让人看不起，而且越来越孤立。香港的经济好起来，也是这十多年，由于大陆 的改革开放的政策，香港人才挣了几个钱，吃了几年的饱饭，于是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只承认自己是香港人，他们不懂国的历史，也不懂中国的 文化，却在标榜着什么香港文化，让我说这种所谓的香港文化其实就是殖民地文化。几十年了，是共产党把大陆搞 得一片赤贫，血流成河。原来的香港只是一个小渔村，是英国人的政策稳定，管理有方，香港才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现在人口暴涨到六百万，还不都是从大陆逃荒 躲灾跑来的，

刚过上安定日子，于是马上就不认母亲，看不起同胞了。我常对我的雇员们说，你们可不能有这种想法，那是毫无道理的。」

古 叔的这番话我是赞成的，尽管我接触的人不那么多，但这种地方优越感已经使我烦不胜烦。我还听到过几个人的谈话，他们是广东独立的坚决拥护者，我一点不客气 地对他们说：「广东省表面繁华，是所有省份勒紧裤腰带挤出来的一千多亿的结果。刚吃饱饭就想独立，那么饿肚子的又怎么办呢？」从那次谈话以后，我也开始感 觉到，这个问题并不是可以简单地认为是中国人内斗的传统。自从外国人的殖民地和租界地在中国出现以后，这种发展上的不平衡现象就出现了，随之又形成了一些 人的地方优越性，于是看不起落后地区和贫困地区及那里的人们。几十年来，共产党不但对这种不平衡视而不见，还要去搞什么重点建设，再加上工业布局的不合 理，反而更加大加深这种不平衡。教育上的愚民政策又至少造成了两代人的文盲和半文盲。于是富的地区不一定真富，穷的地区确实更穷，如果再出现独立或分裂的 现象，那真是国将不国。

在 新年和春节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我收到太太的第二封信。信中仍述说着其父母对她的虐待。但令我吃惊处是，她向我传达了军方对我提出的条件，首先是军方并不打 算处罚我，希望我主动回去，讲清问题，协助调查。又说军方是很看重我的工作能力的，仍会让我继续担任副所长的职务，只要我能主动配合，至于配合什么，信里 没提。

看 完这封信，我对太太已经彻底绝望了。我知道，无论现在我再对她说什么已是没用，而且也太晚，只好这样了。两天以后，在古叔的一再劝说下，我给太太写了一封 长信，在信中我直率地写道：「共产党的一惯的手段就是用封官许愿、满足要求去挑动子女出卖父母、妻子背叛丈夫，只要目的达到了，这些封官许愿是不会兑现 的，因为他们也清楚，能为蝇头小利出卖亲人的人，当然也会出卖共产党。文革中出卖亲人的人不少，可至今没听到有一个人入党升官的，是不是当着妳的面我被捕 了，妳才能认识到妳上当受骗了？告诉我，他们都许了妳什么好处，如果这真是妳一生追求的话，我可以牺牲我自己，让妳的梦想成真。」在信的最后，我请求她停 止这种所谓的家庭纠纷，并写道，「我的父母再不好，也到不了要被处死的地步，如果是非死不可的话，那就让政府出面去做，妳是个清白人，双手千万不要沾上鲜 血，哪怕有人告诉妳这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敌人，妳也不要去杀他，因为没人给过妳杀人的权力，那是政府的事，让政府去做，一旦发现杀错了人，就让政府去背罪 名，不会有人恨妳的⋯⋯」

发 出了信，我的心情仍然痛苦极了。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事态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我太太正在兴头上，我的一两封信是阻止不了她的，所以又心疼父母，

我完全 知道他们的处境，他们在忍受着，可又不给我写信。幸好春节将近，酒廊里早早地开始了大清扫和张灯结彩的大布置，足足忙了一个多星期，我拼着命地干活，有意 使自己忙碌和疲劳，这样心情反而好一些。古叔看出来了，于是安排阿景夫妇陪我出去吃顿晚饭。这个阿景，竟带我去了一家豪华得不得了的大饭店，使我第一次品 尝到生蚝和鱼子酱。阿景夫妇尽量使我高兴，结果那顿饭花出去八百多块钱，我抢着去付费，这两口子又千方百计地阻挡了我。他们是把我当成了真朋友、真大哥般 的看待和尊敬，这种情义，我一辈子都感激不尽。

古 叔又把长途电话卡给了我，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弄清情况。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安全的。一定会被监听。于是，我给妹妹打通了电话，她正在办公室，听到我的声 音，她很吃惊。我直截了当地问我太太究竟都干了什么，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我太太的所为对家里造成的危害有多大，父母的身体如何及他们对此事的看法是什 么……。

妹 妹一直没说话，等我问完所有问题后，她才缓缓地说，她不知道我太太给我写来了信，但不管信上写了什么，她要我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去多想，并告诉我，我太太 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而且背后有人指使她，让我对太太不要抱任何希望了。她提到家里的情形十分糟糕，但是她和弟弟完全可以控制住这个局面，他们已 经计划了几个步骤，根据事态的继续发展，他们采取措施。最后她对我提出三个要求，一是自己保重；二是快走；三是一旦安定下来，考虑办理离婚。说完，她把电 话挂断了。

我 妹妹与大多数女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她遇事冷静，不多几句话就能道出事情的关键和重点，处理事情果断，但有时方法太简单。在这件事上，我弟弟是不会袖手旁观 的，他们姐弟俩对付这件事应该是没问题的。电话中妹妹说的话，至少让我明白了两件事：一，太太背叛了我，已经在家里造成了危害，并提到办理离婚。二，无论 是军方或警方，仍在想把我捉拿归案，太太的背叛，给他们带来一线的希望。香港不是个可以久留之地，我应当尽快离开。

新 年刚过完，我就给台湾的叔叔发出了一封信，然后又和古叔做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古叔完全同意我的看法，问题是我叔叔太固执，一口咬定非要把我弄到台湾去不 可。古叔打算马上与我叔叔通话，如果必要他会飞往台湾，与我叔叔面谈的。古叔说：「如果你叔叔当初听了我的建议，你现在已经在加拿大了，他是你的叔叔，我 又能怎么办……。」

我 马上说：「现在该是您说话的时候了，否则就太晚了。」他点了点头说：「放心吧，我也认为是时候。」新年过后，马上就又是传统的春节。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向父母和全家人恭贺新春。这是我出走后给家里的第一封信，所以写的较多，先向他们报告了我现在的情形，提到叔叔春节后会从台湾飞来，决定我的最终去向。然 后我比较详细地分析了我太太背叛后可能会给家里造成的几种麻烦，并提出了应对和解决办法，再再的劝慰父母保重自己并祈请原谅，因为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拖 累全家人。请他们一定要愉快地过节，待我一切稳定下来后，我会立即着手解决我太太的事。最后嘱咐全家人不要给我写信。阿景用同样的办法把这封信发了出去。

整 天我心里就像压着块巨大石头似的，但我的脸上还要做出高兴和样子来。古叔和阿景又分别送给我春节的礼物，他们是要使我高兴，我不能让他们失望，于是说着笑 着，与同事们开着玩笑。同时拼命地工作着，使自己尽量地疲劳。可是一回到我的那间小屋，愤恨、焦虑和苦恼就紧紧地缠住了我。恰在春节前的两天，阿景送来了 我太太的第三封信，并告诉我，同时收到了一封我太 太给古叔的信，已派人给古叔送去了。我急忙打开了读。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她在信中，以极其下流和野蛮的词句，侮辱我的父母。又说她的哥哥姐姐实在 看不下去我父母对她的欺凌，登门与我父母讲理，没想到我父母竟抱起鱼缸摔向他们。我的妹妹也蛮不讲理，并与他们扭打在一起，于是我太太就被我妹妹打得浑身是伤，多少天卧床不起。信中六、七处要我马上回去解决问题，否则她与女儿将死于我父母之手。

我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她的那一哥一姐插手了。这两个曾在文革浩劫中大显身手的红卫兵，至今也没有掏到任何的好处，更没有受到共产党的任何青睐，但是这 并不妨碍他们寻找任何机会，去争取乱中受益。我完全可以想象到我太太他们三个人是如何破门而入，完全一副文革架势，对我父母大喊大叫或打碎鱼缸，我妹妹必 然会与他们理论，这就成了他们动手的理由，直到邻居们赶来劝开。我开始担心父母受到惊吓后，会不会引发心脏病和高血压，同时又心疼妹妹，一定会在他们三个 人的攻击下受伤。

从 这一刻起，我开始恨我的太太。尽管她信中没提，但我知道，这场事情过后，她无法再在我父母家住，只能回娘家，今后一段时间是平静的。但她一定会把我的女儿 带到她娘家去的，在那个环境下，我的八岁的女儿不会受到任何好的影响，她的一生会毁在那个环境里。我马上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安慰了父母和妹妹，并提出了今 后的几个防范措施。又要弟弟想办法采取以守为攻的做法，必须防止这种事情的重演。然后又给我太太写信，我完全改变态度。首先，我一点儿不客气地揭穿了她在 信中的谎言，指出了事实的经过，并严厉地指责她的这种行为，并且提出她的所为已经是对我的公开背叛。

我 明白地告诉她，她的哥哥姐姐在那场十年文革中没能掏到的东西，同样在我的这件事上也掏不到，我既不出名，又不在那二十二人的通缉名单上。我告诉她：「妳已 经做了政府要妳做的事，而且干得很卖力，如果现在还没见到政府对妳的还愿的话，可以停止了。再做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在信的最后，我写道：「对于六四 大屠杀，妳也是有看法的，我与妳在这件事情上不矛盾，但也正是为此，我才背上了反党、反军的罪名，是给妳带来了些麻烦，但这绝不是妳恨我、我父母的原因， 是时候妳该好好想想。」

刚 写完信，古叔推门进来了，把我太太给他的信递给我。这封信的内容则完全不同了，我被她形容成一个自私自利已极的人，不惜抛妻舍女投奔海外去寻求个人名利， 又说我是在编造故事，以博得古叔和叔叔的同情，以达到出国和去海外定居的目的。并说我根本没有学历，在研究所里只是一个不学无术、又不得志的小职员，被上 司和同事看不起，由于我实在混不下去了，才产生了向海外去碰运气的打算，最后她在信中请求古叔劝说我打消出国发财的想法，让我尽快回去，以便夫妻、父女团 聚，等等。我看完信，对古叔笑了一下，把她写给我的信和我刚写完的两封信，送到了古叔的手上。古叔抽着烟，认真地在读着信。我则考虑着我太太不是有头脑的人，给古叔写来这样一封信，必然是有人出主意，很可能就是她那一哥一姐。尽管下流，但也反映出他们的无知。

古 叔放下信，对我说：「我刚才和你叔叔通话，他说四天后来香港，对你的事做出决定。你太太写给我的这封信不是个好讯号，你要小心。我已嘱咐阿景特别注意你的 安全。」我点点头。古叔又说：「从刚才你叔叔说话上分析，我估计他在办你去台湾这件事上极不顺手，我也没问他，我想你还是抓紧时间学英文，准备去加拿大 吧。」

我说：「我早有这个打算了，必须尽快了。」古叔说：「我很理解你的处境和心情，不要想太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休息吧。我把这两封信带走，明天有人回大陆，我托他把信发出。」我马上写好信封，把信给了古叔。

叔 叔终于来了，把我从未见过面的婶婶也带来了。古叔在一家饭店里包了一个小单间，又把金伯和季伯也请来了。叔叔的情绪不好，简单地讲了一下他在办理我去台湾 一事上的几个过程。看得出来，他是下了大力气的，最后他提到，除了偷渡，再无其它办法。金伯、季伯、古叔和我都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叔叔苦笑了一下，又讲 起前不久，他的一位在军界任职的朋友曾经拜访过他，十分郑

重地对叔叔说：「我们知道你正在办理侄子来台湾的事，请务必按合法途径来台，千万不要想其它办 法，否则会给你和你的侄子都带来麻烦的。」

讲 到这里，叔叔显然生气了，脸也红了起来，提高了声音说：「我给国民党干了大半辈子，我用得着你来警告我。他妈的，我当时就问他，合法办不来，偷渡又不行， 你说我该怎么办？难道就看着我侄子让共产党抓去坐牢吗？」说到这里，叔叔一口气喝干了杯子里的茶，我赶快站起来，给他又倒满茶。

叔 叔看着我说：「你肯定不愿意偷渡，答应他们的条件我是不会同意的，没办法了，只好把你送到其它国家去了，你住满五年，我再把你接来台湾。其实，我是真的需 要你，把你放在公司，我就省了一大半的心，就像现在这样，我别的事做不了，哪儿也不能去，每天就是陷在公司里的一大堆事务里，你考虑过去加拿大没有？」我 还没有说话，古叔就接下来说：「现在他的处境已经没有时间考虑了，既然台湾不能去，那就按我原来的打算，把他送到加拿大去。在电话里我已经告诉了你他太太 的事，这是他太太写给我的信，你可以看看。」古叔拿出了那封信递给了叔叔。

叔叔看着信的时候，金伯问我：「怎么了？太太倒向了政府？」我告诉了他关于我太 太三封信的内容，又简单地说了一下我对这件事的分析。季伯接上来说：「现在，不可以让任何事分心，遇上了这样的一个太太也是你的命，所以你不要想、更不要 试图去做什么，到你一切都安定下来了，再去对付这件事也不迟的。」叔叔把信递给了金伯和季伯，又对古叔说：「这个情形，他是不能多待了，只好按你的想法把 他送到加拿大去，请你马上着手办吧，用多少钱我来负责。」

古 叔说：「半年多了，我等的就是你的这句话。他是你的侄子，当然要你做决定。钱的问题不大，他在我这里已经七、八个月，天天工作，又把每周的工资都交给我存 着，两三万块钱是有了，既然你同意让他去加拿大，那我就马上办吧。」金伯和季伯也都点着头说：「是要赶快办了，不要让他在香港出事，这里对他是不安全 的。」到晚饭时间，侍者们端上了一道道的菜。一直没有说话的婶婶，突然指着我对叔叔说：「他是不是有病呀？怎么他的脸色那么苍白呢？你最好请个医生给他检 查一下。」叔叔转过头来看看我，我马上笑着说：「我已经七、八个月没有见到太阳了，每天除去五、六个小时工作以外，古叔就让阿景把我锁在屋里，我真不知道 以后我出去了，还能不能在太阳下睁开眼睛。」

叔叔还没说话，季伯接上来说：「要的！尤其你太 太也倒向了中共，对采取这些保护的措施是不过份的。何况你现在在香港也是非法超期居住，警察抓到你是不会问什么青红皂白，马上就把你送回大陆，那你可就完 了。」古叔笑了一下，说：「这都要怪他叔叔，拖了那么长的时间，他在我这里，我是要负责的。」叔叔一只手放在了我的手上，紧紧地握了一下，另一只手挥动着 筷子给我夹菜。

大 家都看着我，我有些不好意思了，对大家说：「近几个月来，我读了几本关于加拿大的书，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都很成熟的。我去了以后，会很好地学习 这些，共产党是一定要完蛋的，十年、二十年，我等得到的，我会把学到的东西带回来，用于中国大陆。」金伯问我：「如果将来就是你们这一代去管理一个民主的 大陆的话，你们会是如何对待两岸统一问题呢？」

我 想了一下，说：「只要大陆实行民主，统一的最大障碍就已经不存在了，经济的不平衡就会成为统一过程中的主要话题了。但那时，国际社会就会把大陆当作真正的 朋友和经济伙伴来对待了，台湾也是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统一的问题也会自然而然地列入日程了。」古叔向婶婶欠了欠身，并举起了酒杯，向婶婶敬酒让菜。然后 对金伯说：「你不是搞政治的人，怎么有那么多的政治话题呢？大过年的，我们不谈这些行不行？」金伯和季伯马上笑着向婶婶举起了酒杯。这顿饭持续了足足三个 小时，大家一直在说着笑着，有些话题我和婶婶都很难加入的，只好听他们聊着。

晚 饭结束后，送走金伯和季伯后，古叔打电话叫来阿景，让他伴我回去，古叔要和叔叔婶婶去旅店商量我的事。叔叔对我说：「明天，我和你婶婶还要去拜会几位老朋 友，傍晚我们就回台湾了，恐怕没有时间再来看你了。今晚我们会把你的是商量好，你要安心地等一等，在你动身前，我会来看你的。」我答应着。他又问我缺钱用 不，我摇着头告诉他，我没有用钱的地方。他又说：「我有个想法，打算把你送走以后，我去北京和我哥哥嫂子见见面。我现在是商人，大陆方面应该不会给我麻烦 的。」古叔的车来了，我和叔叔婶婶道别，送他们进了车，随阿景回去了。

回 到我的小屋，阿景一屁股坐在我的床上，点了支烟抽着，然后看着我。他似乎是有话想说，但又在犹豫着。我笑着说：「有什么话就说吧，我们是朋友。」他吸了一 口烟，才像是下了决心，对我说：「你是个共产党的通缉犯，可是你知道吗？你在你叔叔的眼里，你是他手里的一张政治牌。你叔叔已经来香港两三次了，古叔就是 不让他见你，也嘱咐我不要告诉你。古叔是了解你叔叔的为人的，可同时也看出来了，你是个好人，所以一直反对你去台湾。古叔是个好人，我想你也看出来了，他 是不想让你去淌这个浑水，更不想让你父母遭罪。两个

月前，你叔叔来了，非要见你，古叔又拦住了，两个人说了半 天，后来几乎吵了起来。从那以后的大约一个月左右，古叔几次打电话，你叔叔都不接，古叔去找了金伯，不知是金伯还是季伯去台湾找你叔叔去了，才把事情缓和 下来。可你叔叔坚持要把你偷渡进台湾，这一下把金伯和季伯全激怒了，你叔叔才不说话了。告诉我，刚才是不是决定了由古叔来办理你的事？」

我 点了点头，阿景马上说：「这就好了，说实话吧，连我也放心了，你到加拿大后，也不要有去台湾的打算，即使你真想去，也要在加拿大住满五年后，那时你再去台 湾就完全合法了。」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接下来我又胡涂了，真搞不明白我叔叔究竟想干什么。我来了七、八个月了，总共只见了他两次，加起来也不过六、七和 小时，对于他的过去和为人，我确实知道得很少。但他到底是我父亲的亲弟弟呀，怎么会抱有这么一种企图？

我 去问阿景，阿景也无法回答，只是告诉我：「上次你叔叔和古叔发生争吵后，我问过古叔，可他什么也不说。后来几次打电话，你叔叔不接，他真的火了，对我说： 『这个人就从来没有知足过，先是从军，后来从政，现在做着生意，生意他做的也不小了，六十多岁的人了什么都有了，怎么还是抓着个机会就不放手呢？人家现在 是在难中，万一出点事，还不把人家一家子都害了，他们不是你哥哥，你侄子呀？』这时我才知道他们还在为你的事争吵着。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古叔不让我对你 讲，你可千万别去问他，他在办你的事，你就完全可以放心了。」他站起来要去工作了，走出去关上了门，接着又是锁门的声音。

那 天晚上，我失眠。想了很多，但理不出个头绪，甚至感到自己是那么的委屈，我没有做错事，怎么会落到这么个下场？很多人说加拿大好，可加拿大那么遥远，又是 那么陌生，我不知道我将面对的是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重重的困难。我刚四十岁，精力、体力都充沛，苦与难我都不怕，怕的是人与人之间复杂、冷酷 的关系。谁又能想到我的亲叔叔会在我落难的时候竟还想利用我；与我朝夕与共近十年的太太竟然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背叛我；我从没有与她的哥哥姐姐来往过，他们 也企图利用我的事情去捞到些好处。中国之大，人世间的真情实意还有多少？不能说没有，也是不多了的。十年浩劫过去后，那么多中国人跑去西方，多少人带着支 离破碎的心和满腹冤屈，一去便不再回来。人心不古，世风也不再，倒不如去个尊重人权的国家过几天像个人一样的生活。

人们说加拿大的生活水平高，说实话，我确实不在乎这个，我是吃过苦、受过累的人，我 始终相信个人的努力，认认真真地苦干上十年二十年，一切都会好起来。边工作边读书，学懂民主与法制的真谛，总有一天，我会把所学与仁人志士们一起建立一个 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年过完了，一切又恢复正常，日子一天

天地飞快过着，我努力地学着英语。阿景带我出去照相，后来又陪我出去修理头发，过了不久，又拉我去 试衣服，买皮鞋，他什么也不对我说，我也不问，但我知道离我动身的日子不远了。古叔还是那样每天来，每来必和我聊天，但绝口不提我动身的事。终于有一天， 我忍不住问了他这个问题，他点了点头，说：「你没有护照，我要想办法给搞一个这并不难。难的是我要找一个可靠的人，把你护送到加拿大，路上要转两次飞机， 这个人必须懂英语，而且能应付进关、出关的事，这些你不需要懂，只是跟着他走就可以了。现在你要专心在两件事上，第一，你要多学一点英语；同时你要准备一 下你的难民申请的内容。」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显然是看出了我脸上表现出来的茫然的神情，于是他问我：「你没有听到过难民这个说法吗？」我马上说：「我 知道难民，但我不是难民，我是与共产党持相反意见的不同政见者，我不是吃不饱饭、需要救济的难民。」古叔笑了起来，又把阿景叫过来，把我刚才说的话告诉阿 景，他们俩都笑起来。

我 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笑，这时阿景问我：「你为什么要去加拿大？是什么原因要去加拿大？」我说：「申请政治避难，或者说请求政治保护，我是由于政治原因，不是 由于贫困或者饥饿去向加拿大恳求慈悲的，难道错了吗？」古叔笑着对阿景说:「这就是他们这些学者教授们与别人不同的地方，这要怪我没讲清楚。」

说 到这里，古叔转向了我说：「在西方国家，据我所知，他们是不常用持不同政见者这个说法的，常用的说法就是难民。难民分两种，一种是经济难民，就是你说的那 种吃不饱的难民，另一种是政治难民，就是你的这种情况。经济难民来自于非洲和贫穷国家，但不包括中国大陆，所以你就是想做经济难民，人家也不会接受你的。 你是从独裁政权、共产国家出来的人，又因此而遭了难，所以也叫难民，但你不是去讨慈悲要饭吃的难民，人家是知道的，所以对你会用政治难民的条文来处理 的。」

他 讲完了，我也明白了，但我总觉得难民这个叫法，还是不太能够接受的。在我的意识里，难民就是那些骨瘦如柴、衣不蔽体，流落在街头向人们行乞的叫化子们。古 叔可能知道我在想什么，所以他又对我说：「你刚才讲的政治避难、保护的提法是没有错的，等到了人家问你时，你就把发生过的一切都告诉他们。放心，他们不会 认为你是因为吃不饱才去加拿大。」

一天，阿景的太太来了，送来了两件给我买的新衬衫，她非要我穿上试试，当然合 身了，女人们天生就有这个本领。收起了衬衫后，她拿出了一个新手表给我，又一定非让我戴上，然后说：「在路上，你需要表的，手腕上戴着表，别人就不会认为你是吃不饱饭的难民了。」我从不戴手表，

可偏偏有人送表；我从来不买不用日本制造的任何东西，而这偏偏是一只日本表。

第二十七章 查身份证的全是特警

转眼已是四月中旬，香港热得让人难过。在北京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离家十一个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家里的近况。春节前给父母和太 太发出的信至今也已两个多月，太太至今没来信，是不是她已经冷静下来了，或是感到做得太过份了？其实，在政府的导演和指挥下，我太太已是很努力地做到了一 切，这场暴乱应该结束了。我相信我的弟弟和妹妹，他们有能力和办法去对付这种事情。一开始，他们会顾忌到我，而对这个嫂子的反常行为做出退让，但他们会很 快发觉到我太太的背后有一只手，于是从退让到僵持。他们不会进攻，因为我的罪行使他们处在不利的位置上，他们会有办法避免激化矛盾，一方面拖延时间，为了 让我离开香港，另一方面他们也在观察着事态的动向和发展，并会有些行动。在这段时间里，我问过自己几次，如果我太太明白她的做法是错的，希望我原谅她，我该怎么办？说实话，明确的答复我没有，但我的大脑里总有一个声音在说：「她不是孩子，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谁又敢保证她不会第二次、第三次地重复同样的错 误呢？就像她的哥哥和姐姐，同样的错误，二十多年后，不仍是不假思索，急不可待地又出现了吗？」

四月二十二日晚上九点多钟，正是歌厅里最忙的时间，我住的这间小屋依旧被乐队和唱歌声、以及厨房和洗碗间的嘈杂声包围着，我已经习惯，丝毫也不影响我看书和学英文。突然，门外有人敲门，接着是阿景的声音说：「把灯关掉，不要出声，警察来查身份证了。」

我 马上关掉灯，静静地坐在那里，仔细地听着外面的动静，这大概已是第五次或第六次了。可能是从广东偷渡来港的人越来越多，这种突袭式的检查也频繁了。上一次 警察来，就从歌厅抓走了两个广东人。这种检查通常要十分钟左右，只要乐队一开始演奏，就证明警察们已经走了。阿景会马上来告诉我，而且会和我坐一会儿聊聊 天。但这一次不同，仅几分钟，屋门外的锁被打开了，阿景小声地叫我出来，指着一个站在楼梯下面的人对我说：「跟他走，快！」那人是这里的一个侍者，马上拉 着我的手，我们飞快地下到底层，推开门，另一个已经等在门外的侍者抓住我的胳膊，拉我出了楼门。我们在两座大楼之间的狭窄的小夹

道里，没有灯光，我什么也 看不见，只是随着他们一脚高一脚低疾走到尽头，一个侍者用身子挡着我，另一个跑到街上拦住一辆出租车。

我 们坐进车里，司机在一个侍者的指点下，拐了几个弯，把车停在了一座住宅大楼的门厅外。下了车，两个侍者拥着我穿过门厅进了电梯，其中一个人才对我说：「现 在没事了，阿景住在这里，我们把你送到他家，你不要出来。」电梯停在了第十六层，另一个人打开了一个门锁，进到里面后，我才发现这是一个一套一居室的单元 房，房间很小，但布置得很好，也很整洁。我刚坐下，电话响起来，一个侍者过去接电话。他讲广东话，我听不懂，我问另一个坐在我旁边的侍者，今晚发生了什 么。他结结巴巴地用普通话说：「兰帽子来查人，不是警察，所以不一样。」我实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那个接电话的侍者挂上电话，对我说：「是阿景打来的，知道我们已经到了，他放心了。你不懂兰帽子，兰帽子又叫飞虎队，其实就是特警，特警是从不查身份证的，可今晚奇怪了，来查身份证的六、七个人全是特警，不知他们想干什么。阿景说他们还没走，让你待在这里。我们要回去工作了。」

我 正在津津有味地看着英语频道播放的一部美国动作片时，阿景回来了。见到我就笑着说：「哈，你倒轻松，在看电视，你知道今天是怎么回事吗？」我关上了电视， 问道：「我正要问你是怎么回事？那两个人给我解释了半天，又是兰帽子，又是特警的，我始终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阿景点了支烟，说：「我一看上来的 全是特警，马上决定把你送走，我做对了。他们没有检查任何人的身份证，只是到各个房间去查看。我对他们说我是这里的经理，你们有什么公干。他们没有回答 我，只是让我把古叔请来，我给古叔打电话，幸亏他没去九龙。我又陪特警各处查着，两个特警发现了你住的小屋，幸亏我锁上了门，他们要我开门，我告诉他们这间屋子大概有两年没有人进去了，钥匙也不知在什么人的手里。我又说，如果你们想砸开锁进去检查，也要等老板来才可以的。他们又问我里面有什么，我说是些坏了的桌子、椅子和地毯，他们也没有坚持要检查……」

我 打断了他，说：「如果他们看到了里面的情形，马上就知道有个人住在这里，那就麻烦了。」阿景笑了一下，说：「那也不麻烦，借口总是有的。你听我说呀，古叔 来了后，我才知道这个麻烦是你惹出来的。那个带队的特警见到古叔时的第一句话就提到了你的名字，问你是不是住在这里，古叔说你在半年前就已经走了，走到哪 儿去了就不知道了。特警又问，你是不是在这里住过，古叔说你是住在你的亲戚家，又说他认识你的亲戚，可是不知道他在哪儿住。你和你的亲戚来我们这里吃饭唱 歌，是有过几次的，其它的来往就没有了……」

我 又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估计这可能是谁干的？」阿景看着我反问道：「你认为是谁干的？」我马上说：「是老对？」阿景摇了一下头说：「在你住进来之前，古 叔就让我对大家说你是新移民，除非你对老对讲了你是来探亲的。」我说：「也是在我住进来前，古叔告诉我无论对什么人都说我是新迁入香港的，尽管你是知道我 的一切的，但是从我的嘴里是从来没有对你说过我是来探亲的。对老对这种人，我是有足够的警惕的。」

阿景的脸色严肃了起来，看得出来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对我说：「你考虑一下，是否有这种可能，古叔的看法是，这一次都是由于你太太的所为而引起的，理由是她给你写了三封信，你都收到了。虽然说是这样说，但我们没有证据。古叔的分析是，你太太把这个地址给了大陆警方，大陆又通知了香港警方，九七年香港就回归了，你知道……。」

说实话，警察来抓我，我并不感到吃惊，像我这种情形的人，除非被一个国家接受了，否则的话，无论我走到哪儿，都是不受欢迎的人，当然就是警方搜捕的对象了。令我恼火的是，我太太怎么会干出这种事，如果真的就是她干的，我永远不会原谅她。

或许古叔的分析是对的，但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我太 太会做出这种事？坦白讲，在婚姻上我是不美满的，但我的太太竟会是埋在我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庆幸的是我的嘴严，工作上的事我从不对她讲，更不要提沙龙和 那份地下刊物的事了。六四大屠杀后，我的心情当然坏极了，但在她面前我没有讲过任何过激的话，藏在家里的两个学生，也是她主动领来的，后来是我的主意，我 妹夫办的，把那两个学生安全转移出北京，如果她在这件事上做文章的话，她是抓不住我的把柄的，只能给我妹夫带来麻烦，但我是毫不怀疑我的妹夫会对付得很好 的。他曾是一个拥有几百个工人的小工厂的厂长。

手 稿！我怎么忘得干干净净？我狠狠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头，由于刚刚想到了地下刊物，才猛然想起了手稿。我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地走着。我怎么会这么大意！留 手稿是我的一个习惯，但不应该是坏习惯，写文章的人都是在有思路以后搭出框架才写出了底稿，然后再进行修改后一篇文章才出来了。我就把底稿保留起来了，无 论是论文、讲课、讲话还是给地下刊物的文章，我都保留底稿，糟就糟在地下刊物的那批手稿上了，有多少？我不知道，几十页总是有的。那还是从一九八二年开始 的，从那以后的几年可以说是我的辉煌时期，论文写得多，发表的也多，这种反共的文章也多。但这种文章都是很短的，几百字一篇底稿，也不过半页纸，或者一 页，不像论文都是成千上万字的底稿，都是十几页到几十页，还要把论文中引用的资料也一同保留，所以每一篇论文的手稿都是厚厚的

一堆。我也知道刊物文章的手 稿不该保留，但就是舍不得毁掉，总认为这也是我辛勤工作的一部分的结果。所以就把这些手稿分别加进了论文的手稿里，保留了下来，就在这次我出走前，弟弟还问过我，有没有不适宜的东西该毁掉的，我当时根本就没想到这批手稿。我加入沙龙和地下刊物的事，弟弟根本不知道，所以把这件事整个给忽略了。

我 的心砰砰地跳，汗都出来了。可是，这批手稿怎么会到了共产党的手里？书记郭和王大校搬倒了我，他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我当然知道共产党的一惯做法，搞掉一 个人后再去把这个人的家搞乱、毁掉。他们很高兴打开了我太太这个缺口，当然希望从她嘴里得到更多的东西，从她的几封信里，我相信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的太 太确实走上一条大义灭亲之路。但她实在提供不出什么对当局有价值的东西来，加上我父亲的声望和影响仍在，当局还不太好意思派员警去搜查或抄了我的家，我太 太不是个有头脑的人，但她的背后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这两个人可都曾经在那场文化大革命中出过锋头，恐怕是懂得证据这两个字。这次算是他们想对了，我的 疏忽大意，使他们立了大功。正是这批手稿的发现，才使得共产党的当权者们恨上了我，于是才会大动公文，让香港的特警来抓我，若不是这批手稿的发现，像我这 样的不出名的小人物，又怎么会使当局如此大动干戈呢？这一次，我的太太确实是立了功，真该当面祝贺她。

我洗了个澡，又点了支烟。阿景夫妇回来了。我郑重地拥抱阿景一下，嘴里连声地说着谢谢。阿景笑着说：「你有病呀！谢什么！哈，我看你是饿了，我们带来了东西，咱们吃宵夜吧。」阿景太太也笑着说：「你饿了好，告诉我现在你承认不承认你是难民？」

他 们把买来的食物摆放在桌子上，我对阿景说我想喝口酒，他找出来半瓶白兰地，我倒满了两个杯子，又向阿景举了一下杯子，就一口喝干了，然后又给自己倒满，阿 景说：「你好像很高兴，告诉我是什么事。」我笑着说：「这是我的习惯，每次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后，都要兴奋一阵。快喝，陪我一块高兴。」他的酒量很好，一 口喝干了后，又给杯子倒满。我开始把刚才的分析一点一点地都说了出来，他边听边点头，最后才说：「你怎么会这么大意，既然保留了底稿，可又把它给忘了。依 我说，你也别怪你太太出卖了你，这简直就是你自己出卖了你自己，难怪刚才你说了那么多谢谢，你是该感谢我的，否则现在你已经在他们手里了，等不到明天，他们就把你枪毙了。确实是我救了你的命。」

我说：「他们不会马上枪毙我的，他们先要从我嘴里得到一切后，才会毙我的。」阿景开着玩笑说：「那你就对他们说，我什么都告诉你们，你们千万不要枪毙我。」阿景太太插进来说：「我们总是提到大陆天天在枪毙人。其实你太太才该枪毙呢，

一个女人出卖丈夫，她是怎么想的，我要是嫁了一个像你这样的丈夫，你坐牢，我给你送饭，你被枪毙，我也死。」阿景马上笑着问他太太：「这么说，你既不给我送饭，也不会为我死？」阿景太太说：「你不配，你也没有那个胆量去惹出这样的大祸来。」这句话把我也逗笑了。我问她说：「照你的这个说法，我就是惹祸精、捣蛋鬼了，连难民的资格都不够了，对吗？」我们全笑了。

第二天，古叔来了，阿景夫妇才匆匆忙忙地赶去上班。古叔笑着问我是不是受惊吓了。然后他才告诉我：「其实，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下个星期你就可以登飞机了离开了，可是昨晚的事情太突然了，也打乱了一切，我昨晚和今天都在和金伯商量这件事，现在的问题是，你已经不能在香港上飞机了。」我点了点头，然后把昨晚我想到的手稿的事，以及我的分析都详细地讲给了他听。

古 叔用手拍了一下前额，对我说：「难怪我和金伯怎么也搞不明白为什么特警在寻找你？现在可以解释开了，你的麻烦并不仅仅是什么反党、六四或是反军，这些事都 是可大可小。你已走了，他们叫嚷一阵也就过去，你真正的麻烦是来自这些手稿，抓到了你，他们就可以破获这个地下刊物。我明白了，在这件事情上，你对他们是 太重要了，这也就是特警来抓你的原因。」停了一下，他又说：「这话我不该说，可事实应该是：这场麻烦的起因是来自你们家。昨晚我就想到你太太，但金伯认为 你太太是根本没有这个力量，让大陆通过香港警方抓你回去的，可是除了你太太，还可能有谁会把手稿交出去？你太太恐怕也没想到这件事会有多么严重。你必须马 上离开香港，香港的这个特警队是经过英国人和美国人训练出来的，尽管香港现有六百万人口，但他们要找你的话，他们就一定找得到。你太太这回可是祸惹大了。 我马上去找金伯商量怎么办，你要做好随时动身准备。同时记住，千万不要出去，不要接电话，更不要打电话，无论什么人敲门也不要开，这里有吃的东西吗？」我 指一下冰箱，他说：「一会儿我让阿景送饭来，你可要记住我的话呀！」说完，他匆匆地走了，在门口示意我锁上门。

第 二天的傍晚前，古叔给阿景打来电话，要他马上去歌厅为我拿几件换洗的衣服，并说要快去快回。阿景对我使了个眼色就匆匆地走了。一小时后，阿景和古叔同时来 了，古叔让阿景把我的衣服放进一个小旅行包里，然后对我说：「我马上带你去码头，送你上一条渔船，明天上午你就到了广州了。我的一个侄子会去接你的，你就 住在他家。我会在十天之内安排好一切的，你要从大陆出境，这条路是很辛苦的，所以在广州，你要好好休息。」我问为什么要送我去广州。

古 叔说：「这几天双方的警察正把注意力放在香港，所以把你转移进大陆更安全，他们想不到你会这么快回到大陆，即便想到了也只是认为你可能会在深圳躲避，不太 可能会想到你会去广州。我同意金伯的这个分析，所以才这么决定，

你明天到了广州，我侄子会通知我，然后我再告诉你叔叔这一切。」古叔又说：「下一步的计划 我已经有了，十天之内会有人去带你上路。我既答应了你叔叔，我就一定把你送到加拿大，你来我这里也快一年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就是没有你叔叔这层关系， 我也会帮你。」

第二十八章 如果搞政治能挣钱的话

阿海家离码头步行只要十几分钟，太太在一家国营工厂上班，他自己开了一间卖百货的小店，有一个儿子正在读中学，家里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阿芝，高中毕业，正在找工作。阿海家是一座三层小楼，进门就是客厅，同时也做饭厅用，后面就是一间小厨房，屋里陈设极简单。

他 带我上三楼，推开一间屋门，帮我放下东西。我洗了澡，换好衣服走下楼时，看到阿海已沏好茶，桌子上摆着水果和点心，正看着电视等我。我们喝着茶，抽着烟， 不等我问，他就讲起了这座房子的历史。原来，他们家几代人都曾是水上人家，直到他爷爷赚了几个钱，才上岸盖了间平房，他父亲又省吃俭用地大半辈子，又在这 间平房的基础上加盖了第二层，但仅两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所房子被没收充公，他父亲以房产主的身份受到了批斗，看着经过了两代人的艰辛才盖起来的房子 被政府没收了，老人一口气没上来便去世了。文革结束后，阿海用了几年的时间才又争回了房子的所有权。两三年前，他拆掉旧房，在原址上盖起了这座三层小楼。

阿 海把一只脚跷在椅子，对我说：「古叔都对我说了，我让他放心，你在这里绝对安全，不要说住十天，就是住一年也没问题。我们广东人不问政治，只是挣钱，有了 钱好享受，不挣钱的事我们是不关心的。不信的话，你现在就去站在街上，喊一声打倒共产党，我保证准没人理你，大家会认为你有神经病。我告诉你一句实话，如 果搞政治能挣钱的话，就轮不上你们搞了，我们广东人早就垄

断，不挣钱的事我们广东人是不做的。」说完，他又在我肩上拍了一下，并笑着看着我，我也报以微 笑。他高兴了，转身打开了一个小柜子的门，里面都是美国香烟和中国名酒。他脸上流露出颇为得意的神色，但又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对我说：「不要客气，喜欢抽什么烟，喝什么酒，你就自己拿，你在我这里一定要吃好，休息好。」他站了起来，又说：「饭后让我妹妹阿芝带你出去走走。我要去工作了，还要打电话告诉古叔你已平安到达了。」

阿 芝也是个爱说话的姑娘。阿海刚出门，她就从厨房里出来了，对我说：「我哥哥对你胡说八道了半天，你可千万不要介意呀，他连小学都没读完就赶上了文化大革 命，他什么都不懂，还爱胡说八道。什么又是广东人，又是政治，又是挣钱不挣钱的，也就是这几年，古叔帮了他两万块钱，才勉强开了个杂货店，因为地点好，靠 近长途汽车站，他才挣了点钱，否则还不是流落街头。他雇了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帮他日夜的干，他才给人家每月 120 块钱。我毕业了，他让我顶替那个女孩子，说给我两百块钱一个月，我才不帮他干呢。没文化，又整天胡说八道的，好像他什么都懂似的，我可忍不了。」

傍 晚时，阿海太太回来了。阿芝没有说错，这是一个贤妻良母，瘦小的身材，衣着朴素，而且是个十分能干的女人。与我客气地寒暄了几句，便进到厨房与阿芝一起忙 活起了晚饭。晚饭是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吃的。直到九点钟，阿海的儿子才回来，他长着一张与他父亲几乎一模一样的脸，大约十五、六岁的年龄，衣着入时，扔下书 包就去开冰箱，拿出一罐可口可乐大口地喝着。阿海太太马上跑过来问长问短，又用毛巾给儿子擦着汗。

这时我听到阿海太太在说：「你怎么又喝酒了，不是说好了以后不喝酒吗？」儿子一脸不耐烦的样子，一把推开了母亲上楼去了。阿海太太也紧跟了上去。

隔 天，我起得早，帮着阿芝清理房间卫生。吃过早饭后，阿芝一定要拉我和她一起去买菜，我不便对她明说，只是笑着指着一本我刚发现的清朝的残缺不全的书，她走 了。我看着书，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阿海从楼上下来，笑着和我打招呼，问我睡得好不好。然后告诉我，他昨天已与古叔通了电话，古叔让他转告我，很可能一个星 期后我就可以动身了。他坐在饭桌边，边吃早饭，边问我看的什么书，然后告诉我这曾是他爷爷和他父亲看的书，以前他们家也有过不少书，文革时都烧掉了，仅剩 下几本残缺不全的。他父亲一直翻看着，到他死后就再也没有人碰它们。说着他跳上楼，又拿来几本还要残破的书来给了我，对我说：「你喜欢就全拿走，反正我们 家没人看的。」

阿 芝一头大汗地回来了，见到我就抱怨说：「让你跟我买菜你不去，看把我累的，好重啊。」我帮她把菜篮提进厨房，又把菜一样一样拿出来摆在桌子上。阿海进来一 把把我拉了出来，说：「这不是我们男人的事，别管她，你坐。」又问我昨天出去走走没有，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昨天喝酒了没有。说着打开了那个小柜子，拿出了 两包烟和一瓶酒。一边抱怨我太客气，一边打开了酒瓶的盖，我忙去拦他，他已打开了。对我说：「盖子打开了，你不喝味就跑掉了，这可是名酒，好贵了。」我只 好感谢了他。他又掏出了钱夹子，数出了两百块钱给了我，说：「你先拿着用，不够再向我要，广州是个花钱的地方，出去走走玩玩。我已经告诉你了，在广州是出不了大事的。」我也拿出了钱夹子，数出了三百块港币给了他，他推让一下就接受了。

总 的来讲，阿海是个很好的人，如果他能多读几年书的话，他会更好一些的。那场十年半的大浩劫实际上是毁掉了两代人，现在是继续在僵死的政治环境下，在继续破 坏传统文化和教育的情形下，鼓励人民去发家致富，单纯地一切向钱看。表面上看是解决了一部分的贫穷问题，但往深层去分析，中华民族的素质仍在快速地下滑， 在国民党时代，有识之士们可以大声地喊出人心不古。但在共产党时代，有识之士只能战战兢兢地小声议论着人心坏透了。文革中有人骂毛泽东误人子弟、缺德，其 实毛泽东根本就无德，是个祸国殃民的罪犯。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救国救民，它们所要的就是政权，也就是毛泽东的「有了权就有了一切」，为了他们有一 切，就把中华民族毁到了道德沦丧、人性泯灭的地步上，又妄图以这样的一个群体去立于世界之林。

午 饭后，阿芝非要拉我出去走走。外面的热浪顺着门窗缝隙一阵阵地扑了进来，搞得我汗流不止。我对她说：「我生长在北方，实在受不了这种热，除非有事必须出 去，否则的话，我是宁愿待在屋子里的。」阿芝反驳我说：「那么多的北方人来广东，就是因为广东好，能够挣到钱，难道他们不怕热？」我没有回答她，只是问她 这些北方人都干什么样的工作，为什么他们能挣到钱，而她却找不到工作。阿芝说：「他们干的都是我们广东人不愿意干的活儿，就是那些又脏又累、挣钱又少的工 作。」我问她：「所以你们看不起这些北方人，对吗？」阿芝点点头说：「他们什么都不懂，也没见过什么，又穷又脏。」 她 叹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又说：「都一年了，我连个工作都找不到，现在给我哥哥当保姆，过几年嫁个老公，再给老公当保姆。」我马上对她说：「去学个技术， 或者学个手艺，比方说去学电脑。我在香港时看到所有的中学生都在学计算机，据说并不难学，可以试试。」她说：「这我已经想过了，可是学计算机太贵，一个小 时就要几十块钱，我哥哥肯定不同意。」听她这样说，我只好鼓励她：「妳哥哥是聪明人，妳告诉他计算机的用途，他明白了，一定会支持的。」

做 晚饭时，我在阿芝的指挥下，笨手笨脚地洗米洗菜，那条活鱼几次我都抓不住，好不容易抓住了放在案板上，却不知道该如何去收拾它。阿芝嘻嘻哈哈地笑着，问我 是不是从小到大都是吃现成饭的，于是断定我一定有一位好太太，所以我才会被惯成这样。她的话让我感到我的心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刺了一下，我强作出笑脸，勉强 地应付着她提出的关于我太太的话题。终于阿海太太下班回来了，我才喘出了一口长气。

阿 海太太从一家有名气的饭馆买回一只熟鸡，说是阿海让她去买的。她把鸡切开，摆放在盘子里，一定要我坐下先吃。又很抱歉地表示，昨天晚饭时忘记了让我喝酒， 边说着她打开了那个小柜子，我马上拦住了她，又指着阿海在上午已打开的那瓶酒给她看，她抱怨阿芝为什么中饭没有请我喝酒。阿芝在厨房大声地说：「我从不喝 酒，所以也想不起来招待别人喝酒。」我也解释说，我是不常喝酒的。阿海太太已经把酒倒进了杯子，阿芝端着一盘刚炒好的菜从厨房里出来，对我说：「我们不喝 酒，吃饭快，你先吃，慢慢喝，今天你让我明白了不少事，一会儿我要敬你一杯，表示感谢。」说着她把我推到桌子边，让我坐下，饭桌上的酒香，鸡味儿加上这道 热菜的味混在了一起，已经使我有些飘飘然了。我不再谦让，端起了酒杯，一口喝下了半杯，然后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体会着酒流进我的食道、穿过我的胸腔、慢 慢地进入了我的胃，跟着一股热气带着酒的芳香贯穿着我的全身，我从头到脚产生了一种久违了的舒适感觉，我陶醉着。

第 二天，阿芝早早买回了菜，打发着阿海太太和阿海的儿子吃早饭，他们走了后，又催促着我和她一起清理卫生。她的心情特别好，嘴里不停地说着话，唱着歌，直到 我们坐下吃早点时，她才告诉我，昨晚她和阿海有过一次长谈，阿海已经同意了让她去学计算机。所以她对今天的安排作了一个计划，那就是要带我去广州最热闹的 中山路逛逛，因为在那里有两家教 授计算机技术的学校，我们去了解和比较一下教学质量和费用，中午就在那里的一家风味十足的饭馆吃午饭。说完了，她兴奋地看着我。我当然为她高兴了。但是在 让我陪她出去这件事上，我是犹豫的，我很清楚我现在面对的是什么，或许阿海是对的，那就是广东人只认钱，但广东仍然是共产党治下，我不应该去冒这个险。阿 芝看出了我在犹豫，就对我说：「广东的治安坏极了，员警们抓小偷都抓不过来。况且，六四已过去快两年了，人们都忘了，应该是没问题的。中山路上人多极了， 谁会注意你呀。」阿芝的话我是不同意的，我的看法是警方对我的注意力集中在香港和深圳，广州已是远离那个地区的，偶尔出去一次，小心一点，应该问题不大。

阿 芝回房间换衣服，我把身上的口袋都掏空了，钱包、证件都留下，只带了两百块钱，烟和打火机。说实话，我是不太情愿出去的。天气不错，阴天，仍然很热，但还 不是那么太热，可能是清晨的缘故。阿芝建议走着去，权当锻炼身体。这个时候街上的人很少，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已经过去，走在街上的老人多，都是起早做晨练或 者喝完早茶的，还有几个提着菜篮子，刚买完菜的女人。广州的

外地人多，也看到了几个有的在匆匆忙忙地赶路，有的像我们一样在散着步，浏览着这个城市。我和 阿芝说笑着走过了一个十字路口，我站住，想给自己点支烟抽，由于有风，我侧过身子，用身体挡着风才点着了烟。我抽了一口烟，抬起头，无意中看到了两个穿白衬衫的男人，在我们后面四、五十米左右也在散步，我并没有介意，转过身来，仍和阿芝慢慢地走着。

又 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阿芝拉着我拐进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街道，她介绍说这条街上两边的房子都是一百多年前英国人和法国人建造的，虽然已经残破，但这条街上的 欧洲味道仍然十足，两边的大树枝叶茂盛，街上几乎没有行人。我们指点着不同式样的建筑物评论着，不知不觉地来到了这条街的尽头，拐弯往北走，就在这一瞬 间，我眼睛的余光突然显现出那两个穿白衬衫的人，他们也在这条街上。马上一个想法跃入了我的大脑：「我被跟踪了！」或许是我神经过敏，但没功夫多想了，金 伯说过：「一不要慌，二不准跑，三要马上证实是不是真的被跟踪。具体的做法是多拐弯，走不同方向的路。」

问 了阿芝，我知道第三个十字路口就是中山路，往西走，越走越热闹，就进入了商业区了。于是我建议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往东拐，理由是这一带房子的式样好，想多看 看。当我们往东走到十字路口往北拐时，我看到那两个人仍然在我们的后面。往北走了几十米又是一个十字路口，我拉着阿芝往西拐，走了两百多米，就又是十字路 口，该往北拐了。我小心地回了一下头，那两个人仍然在我们的后面，现在可以基本断定，我被跟踪了。好在几十米外就是中山路了，往西进入热闹街区，尽快抓住 机会甩掉跟踪。

在我们走到中山路向西拐时，我又看到了那两个人，我拉着阿芝横过马路，走上中山路北边的人行道上，又催促着阿芝加快脚步，大约走出一两百米后，我在一个街头小摊前站住，注意到后面跟着的只剩下了一个，我扫视着周围，没有找到第二个人。

按 金伯的说法，这是他们要马上动手了，这第二个人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现在我必须让阿芝离开我。我抓着她的手，把她拉近身边，小声对她说：「听清楚我的 话，并马上照办，第一不准回头看，前边十字路口，妳马上沿着往南的那条街走，不准回头看我，也不准跑，马上去告诉妳哥哥，十二点前如果我没有回到妳们家， 那就是被捕了，让他马上通知香港，想办法救我。现在就离开我，走自己的路。」她显然是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正要问时，我低声而严厉地说：「走！」然后我加 快了脚步向前走去，在我穿过十字路口十几步后，我站住了，侧过身点一支烟，眼睛的余光看到了那个跟踪我的人已经过了十字路口，离我已经很近。

转 身时看到阿芝也已经走进了中山路南边的那条往南去的小街了，我放心了，加快脚步向西走去，一边走一边打量这路边的商店和小巷，寻找着脱身的机会。可惜的是 商店不少，但都极小，又没有小巷或小街道，我只能继续向西走。我知道我现在是在中山路上，前面就又是一个十字路口了，跨过马路就是中山五路，阿芝说中山五 路就是闹市区了，就是我的机会，要快，否则就来不及了。我鼓励着自己，快速地走过十字路口，走上了中山五路，远远地看到一个大招牌，肯定是一家大商店，只 要走进大商店，就有机会脱身的。

我 现在的情形完全被动，我感到有些紧张，离大招牌越来越近，我吸了一口烟，突然感到有什么事不对，几乎同时我看到另一个穿白衬衫的人，站在我前面不足二十米 远正面对着我。没容我反应过来，我的一只手和另一侧的肩头就被紧紧抓住了，我侧过头去看，就是那个一直在跟在我后面的人，没有说话，也没有停住，他推着我 向人行道边走，迎面的人飞快地向人行道边走去，打开了停在路边的一辆吉普车的车门，我顺从地坐了进去，那个抓我的人几乎同时也坐了进来，又闪电般地铐住了 我的一只手。我没做任何的反抗，把夹着半支烟的另一只手伸向了他。车子开动了，仍然是没人说话，车子拐了几个弯后，我就完全迷失方向了。我大口吸了两口烟，扔掉了烟头，问那个坐在我身边的人：「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抓我？」回答是：「安全部，想找你谈谈。」

第二十九章 突然触到那个女人的肉体

车子开进一个大门，我只看到门外牌子下边派出所三个字。进了一间不大的屋子，只看到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就被两个人推到墙角举起双手，他们摸了我的身，除了两百块钱半包烟和一个打火机外再无其它了。他们让我坐下，又打开手铐，于是谈话开始了。

那个看上去有三十多岁的人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找你很久了，我们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他停住了，想看看我有什么反应。我只是看着他们并不说话。

片刻沉默后，另一个年轻一些的人说：「你的特征太明显了，老远就可以认出来。你的 那套脱衣术对警察去使，可能有用，对我们就没用了。告诉我，和你一块走的那个女的是谁？」这个问题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暂时避开主话题。我指了一下桌上的 烟盒，他们点了一下头，于是我点了一支烟。对他们说：「我不知道你们想找谁，我昨天才到广州，就在中山路上被人掏了钱包。今早我想找负责中山路的派出所， 钱丢了只好怪我自己不小心，我想请他们帮我找回证件，因为我不认识路，才请那个女人把我带到中山路。」我看着那个年轻一些的人，又说：「你说得对，我个子 高，所以才成了目标，被人偷走了钱包。」屋里又静了下来。屋门突然被推开了，一个警察站在门口向他们两个人作了个手势，那个年纪大些的人出去了。这个年轻 人坐在那里，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突然问我：「从北京来？」我点了点头。他们讲纯正的普通话，又是安全部的人，当然是从北京来的了，我也讲纯正的普通 话，这瞒不住他们。

年 轻人笑了一下，可能是认为他已经打开了我的缺口。于是他又问：「在哪个部工作？是不是社科院？」我摇了摇头。他刚想说什么，门又被推开了，是那个年纪大的 人招手让他们出去。门关上了，我马上把那两百块钱和香烟打火机放进了口袋。大约半分钟左右，两个人都走了进来，年纪大的人对我说：「今天先到这里，今晚或 明天我们还会找你谈的。你最好想想，坦白，你还有出路，抗拒是死路一条，我们是有办法让你说实话的。」他边说边从桌子上拿起手铐，但并没用铐我，而是放进 了口袋。然后两个人同时一人抓住我一只胳膊，推我出了这间屋，又推我到旁边的一间门上有个铁栓的屋外，他们拉开铁栓，打开了门，把我推了进去。这间屋子里被关着三男一女，加上我共五个人。三个男的都是二十岁上下，衣着入时，一看就知道不是正经人。那个女的约三十岁，从穿着看不太像广州本地人。

一 个年轻人问我，因为什么被抓。我愣住了，没有人告诉我我为什么被抓，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一个人看到我衬衫口袋里的香烟，向我要烟抽。我给了他们 一人一支，我又递给那个女人一支，她摇了摇头。抽了我的烟，三个人对我不那么冷淡了。其中一个对我说，一会儿我们就都被送到拘留所去，关上几天，最多一周 就会被送到劳改农场去，然后就放了。我问他这是为什么。回答是：「人人都要赚钱的。」我胡涂了。

另 一个解释说：「农场让每个人都给家里打电话或写信，让家里人给农场送两三百块钱，人马上就放了。」这间屋子里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我的头剧烈地疼了起来， 我把头靠在墙上闭上了眼睛。我要遍一个故事，与他们周旋，就可以为古叔和阿景争取时间来救我。只要没把我送回北京，我就有活的希望。可是，如果他们找的就 是我的话，那就不用编故事了，反正是个死，倒不如堂堂正正地去死。这么一想，我又不知该怎么办了，刚才我已经承认了我是从北京来的，被人偷了钱包，可他们 提出了社科院？是不是我说多了，已经被动了？他们究竟知道我多少？他们有多大把握？我能周旋的余地有多大？

我 脑子全乱了，头疼，喘不过气，神智也不清醒了。不知过了多久，门被打开，几个警察嚎叫着走了进来，连踢带打地把我们推出屋外，走廊的门被一部打开了后门的 车堵着，车里黑乎乎的，三个年轻人被推进去后，车里就已没地方了，我被推进去坐在车门边。那个女人被两个警察抬了起来，脚前头后扔进来，她的头重重地落在 我的腿上。车门被关上了，里面马上漆黑一片。从那三个人的交谈中，我知道这是去拘留所，但究竟是哪个拘留所就没人知道了，据说广州市大大小小的不知道有多 少拘留所，我想那两个便衣一定在那边等着我要继续他们的审问，可我还一点准备都没有。

车 里被外边的太阳烤得像个蒸笼，又密不透风，汽车颠簸着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噪音，汗水湿透了我的全身，呼吸也急促了起来，头更昏沉沉了。那三个人一直在说话， 这时又发出了笑声。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口袋，钱还在，但香烟不见了。我用手在周围摸索着，我很可能要和香烟永别了，所以就更是珍惜这儿几支烟了。我的手向 前伸去，突然触到的是那个女人的肉体－－ 乳房，她没穿衣服，我缩回手，掏出打火机，刚打着那三个人就乱叫着让我熄灭。可我已经看到了，那个女人一丝不挂地躺着，正被一个蹲骑在她身上的人奸污着。

我 大声说：「停下！大家都是落难的人，你们欺负一个女人做什么？」一个声音说：「关你什么事，她是妓女，警察拿走了我们的钱，才把她给我们玩的。」我马上 说：「胡说！我要你们停下。听到没有？」又一个声音说：「好啦！好啦！下一个就轮到你，大家都开心一回。」我愤怒了，面对这种下流的无赖们，警告是没用 的，必须以力去制服它们。我刚动了一下身子，一只手抓住了我的手腕，是那个女人的手。我甩了一下，竟没挣开，由于刚才的一动，头马上疼得像要裂开似的，这 女人仍紧紧地抓着我的手腕，我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明白我现在的状态绝对对付不了那三个人，可是一个女人就在我身边被三个下流痞子轮奸着，我竟然保护不了 她。

我 从口袋里掏出了钱，对他们说：「你们马上停止，我给你们一百块钱。」一个声音马上又说：「一百五。」我把一张钞票放回口袋，打亮了打火机，向他们扬了扬三 张钞票。一只手伸过来抢，我灭掉打火机，缩回了拿着钞票的手，对他们说：「让这女人坐在我身边，你们不准再动她。把你们偷的香烟还给我，钱就是你们的。」 这回管用了，女人被猛一下推到我身边，跟着一只手啪的一下拍在我胸前，我抓住了那只手，原来我的烟盒真是他们偷的。另又一只手在我胸前乱抓着，一个声音在 说：「拿钱来！」我又抓住了这只手，把钱塞进去，接下来便是一阵叽里咕噜的广东话。女人摸索着她的衣服，匆忙地穿着，然后就把头和身子紧紧地贴在我的胸 前，但我已经不能对她说什么或劝慰，因为憋闷已经使我快要失去知觉，我闭上了眼睛，垂下了头。

一 阵剧烈的摇动惊醒了我，车门猛地被打开了，阳光刺得我马上闭上眼睛。同时我被什么给拖出了车，并扔到了地上，腰上又被踢了一脚。一个声音大声嚎叫着：「起 来！」那女人拼命地拉我站了起来。离我几步远，就是铁丝网的高大围墙，一道小铁门开着，两边站着五、六个手持大木棒的看守在嚎叫着。女人挟着我走进了小铁 门，由于头疼，浑身无力，我又坐到了地上。汽车开走了，铁门关上了，一个拿木棒的人冲我喊：「站起来！」又向我挥舞着大棒。我勉强地站了起来，头顶的毒日 曝晒着，我试着做深呼吸，但吸进的也是浑浊的热气。一个中年男人出现了，手里拿着一个本子，他先走到那三个畜生面前，对每一个说出了一串数字。又走到了我的面前，也同时说出了一串数字，他口音太重，我实在听不清楚，于是要求他再重复一遍并说慢一点，他瞪了我一眼，显然是故意地凑到我的耳边大声喊：「5311」，然后转向了女人，说：「5312。」

这 时，几个看守正推着三个畜生走向三个不同的方向。我转过身去看，这个院子里共有四间大房子，南北各两间，两个畜生被送到北边，一个进了东边的一间，一个进 了西边的一间。另一个被关进南边的西面的那间。我回头看到那个女人正在向刚才那个喊号的人说着什么，那个人挥了一下手，一个看守向我走来，他用大木棒指着 南边东面的那个门，女人跑过来扶着我走近了那个不足一点五米高的小门。看守打开了门，我弯着腰跨进门，没想到那女人也跟着我进来了，门被关上了，屋里发出 了一阵阵兴奋的声响和笑声。

这 是间大约十五米长，五米宽的房子，总共关押着连我在内的九十四个人。屋里挤得满满的，南北两边是用水泥做出的高台约三十公寸高，看来是作为睡觉用的。上面 已经是人挤人地挤满了人。中间是一条一米多宽的通道，两边的高台边上坐满了人，通道的地面上也坐满了人。这女人一边推着我往里走，一边高声对大家说：「他 有病，已经站不住了，请让个地方让他躺下，谢谢了。」她连说了两遍，不但没有人让路，而且引来的是一阵阵的下流的话和笑声。

这 时，从屋子里的西南角传来了女人的声音，是在招呼我们过去。顺着声音我看到两个女人在向我们挥手，突然我身后的女人尖叫了一声，我回头看到她正在用手揉着 屁股，屋里又是一片哄堂大笑。我大声而且严厉地问：「谁干的？站出来！混蛋！」笑声马上停止了，但没有人站出来。这女人使劲地推着我，坐在通道上的人马上 给我让开了路，角落里的两个女人让出个位置，我躺了下来。周围的人开始问长问短，我闭上眼睛不回答。这女人用她的衣袖擦着我头上、脖子上的汗水，一边应酬 着交谈着，一边问着这里的种种情形。后来，渐渐变成三个女人的小声谈话了。

当 我听到那两个女人告诉她，所有的女人晚上都要被带出去陪看守们睡觉，不服从就被吊起来打时，我睁开眼睛，把她的手紧紧地抓在手里。她趴在我的耳边小声地 说：「你不要担心，他们玩不死我的。」我知道了，她是个妓女。尽管人们都在小声说话，但毕竟屋里人太多，嗡嗡的声音仍很吵人。偌大的屋里却只有一个 40 公 寸见方的窗户和门上的一个更小的窗子，闷热、不通风，这么多的汗味和体臭混在一起，刺鼻的难闻。开门放风每天两次，一次是上午八点半，另一次是下午四点 半，每次半个小时，但要做三件事，吃饭、喝水、上厕所。我口渴的厉害，可能是汗出太多了，但我必须等到第二次放风才能喝到水。这女人对着我的耳朵问我好些 没有，又从我的衬衫口袋里取出一支烟放在我的嘴上，又掏出打火机点燃它，我大口地吸了几口，她把烟从我嘴上拿开并熄灭了它，又把剩下的半支烟放进了烟盒， 连同打火机一道放进了我裤子的口袋。对我说：「省着点抽吧，只有几支烟了。」她很温柔地看着我，微笑着。

院子里一阵骚乱，看守们手提大棒各就各位，门被打开，人们蜂拥了出去。墙边的地上摆着一碗碗的饭，肮脏的小铁腕里装着小半碗米饭，上面有四、五块咸菜。在这些碗的旁边有一个筐，里面是长短粗细不等的树枝，看来是用来当筷子用的。我不饿，也不想吃，便直接走向了水龙头。一群人正围在那里，争抢着用嘴对着龙头喝水，我只好等着。那个女人急冲冲来到我面前，把一碗饭和两根树枝塞在我的手上，说：「吃不下也要吃，为了活着出去。」

我 把一团饭放进嘴里，马上就发现饭里又是沙子又是小石块，根本无法咀嚼，只能生吞活咽，好在饭只有一点点，三、四口就吞完了。我大口地喝了几口水，刺耳的哨 子声响了，我撩了些水在脸上和胳膊上，马上往牢房走去，慢一点就会挨上一棒子。喝了水，我感觉好一些了，头也不那么疼，坐在这里没事干，只好听着周围的人 们的谈话。我发现落到了这个地步的人们，似乎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剥掉了伪装，说出些实话。一个人在介绍着贩卖走私品的利润，另一个就讲述着各种商品的现行价 格，最后这个人在详细地叙述着他是如何用手枪与警察

对峙，发现自己所处的位置不利，于是缴枪投降，被警察打了一顿后送到这里来。几个人问我是为什么被抓 的，我仍回答不上来。他们指着那个女人问我是不是因为嫖妓，我摇了摇头，他们都笑了，带出不相信的神色。

院 里传来了叫卖的声音，人们一下子蜂拥到了窗口，烟酒食品都有，只是价钱吓死人，一包三毛多钱的烟，他们买四块钱，两毛钱一个面包，他们要三块，啤酒要十块 一瓶。尽管如此，买的人仍不少，乘此机会我拿出了那半支烟抽了起来，一个女人小声对我说：「他们一会儿就来提我们了，你马上躺下，千万别坐起来，不然的 话，你就只好坐一夜了。」我对着她的耳朵问道：「夜里有几个看守？」她说：「三四个或者四五个。」我又问她这里一共关了多少女人？她说十三、四个。我问 她，这些女人是不是都要被带出去，她点点头。我对着她的耳朵说：「用十个女人缠住他们，一个女人偷出钥匙，一共 六个锁，一分钟全打开，这些人一出去，就……」她摇着手，打断了我，小声说：「不行！不行！你不知道。」我马上说：「为什么不行，他们没有枪的。」停了一 下，她声音更低地说：「你不知道，他们不让我们穿衣服，还用铁链锁我们的手脚，一动就有声，连屋门都走出不去的。」说完，她低下了头。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又问她：「你们把这些都告诉了那个跟我一起来的女人没有？」她点了一下头。

我愣愣地坐在那里，刚好一些的头又疼了起来。院子里再次传来了嚎叫声，开门关门声，声音从北到南，门被打开了。一个看守进来喊叫着，他是在喊数字，其中包括 5312， 那个和我一起来的女人。她答应着，一边把我推倒躺下，一边急促地说：「好好睡觉，明天你就好了。」然后匆匆挤过人群出去了。院子里再次静了下来。一个人 说：「好了，他们玩女人，我们没得盼，睡觉吧。」他的话引起了一阵不大的笑声和议论。然后，屋子里的嗡嗡声也渐渐小了，消失了。

我 闭上了眼睛，仔细地分析着与两个便衣的那场简短的交锋，有三点是很关键的：一，他们说已经找我很久了；二，他们说我的特征太明显；最后一点是他们提到了社 科院。从这三点上分析，他们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就是他们要找的人。没有试探，也不存在着猜测的成份，最不利的一点是，我已经承认了我是北京来的。从这 四点上看，他们已经赢了一百分中的七十五分，剩下的四分之一，也就是我唯一可以周旋的问题，那就是我在什么地方工作；可他们已经提到了社科院，如果他们下 功夫取追究询问的话，我周旋的余地也就实在没什么了。如果他们明天直接说出了我的名字和职务的话，怎么办？承认？还是否认？共产党历来是有错抓，没错放， 承认是个死，不承认这个罪也不是好受的。这个故事该怎么编，凭空猜想。我真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脑子又乱了，不如好好睡一觉，明天清醒了再做打算。

嗡 嗡的说话声吵醒了我。我不知睡了多久，但睡得很好，头不疼了，精神恢复了，我仍躺着没有起来，坐牢的人起来又能干什么。闭上眼睛就着昨晚的思路继续想我的 事。我正在试图推翻昨晚的一些想法时，门开了，吃饭时间到了。我走了出来，但不想去碰那些脏碗和树枝。我去了厕所，可里面的恶臭和污秽使我无法迈步进去， 只好在外边对着墙撒尿，然后又等在水龙头边。突然背后传来杂乱的喧嚣、嚎叫声，打人声和被打的人的尖叫声。人们都拥过去，这里没人了，我从容地喝水，洗 脸，用手指擦牙，又撩起水洗着身体。这时一个看守又喊着问：「谁没吃饭？站出来！」我走了过去，看到两个看守正在把一个双手被反绑在背后的人吊在铁丝网 上，这个人脸上流着血，正在挣扎着，喊叫着，我问旁边的人，才知道这个人是因为多吃了一份饭而被打被吊的。

哨声响了，看守们又嚎叫着赶着人们进屋，我走到那个高个子中年人面前，对他说：「我有病，吃不下东西，所以把饭给他吃了。」院子里突然静了下来，他瞪着眼睛问我：「你是谁？」我没必要告诉他我是谁，只以 5311 这 个号回答了他。他看着我，突然对一个看守说：「把他带来！」说完，转身走了。人们正在被踢打着向屋里赶着，那个看守走到我面前大喊着：「走。」推着我走出 小铁门，走进了一个门洞，就是昨天我们下车的地方，走出门洞就是一个不大的小院子，东边是高墙大门，西边是一排小房子。我被推到第一间屋子的门口，这是一 间办公室，看守推我进去，那个中年人已经坐在了办公桌的后边，正在看着一份公文夹子。

他 让我重复了一遍号码，跟着就问我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张口嘴就说出了：「我叫阿尹。」又问我的年龄，我说我四十五岁。我有意把自己说老一些。第 三个问题是从哪儿来的。我回答：「上海。」他马上瞪起眼睛，拍着桌子喊道：「胡说！上海人说话不是这样！」几乎同时我的腿被踢了一脚，我跪在地上，我的胳 膊又被拧着拉到了背后，站不起来了。这时我用上海话对他说：「我讲的都是实话，请你让我站起来。」他相信了，在本子上写着什么，然后对我笑着说：「我会提 审你，但我先警告你，你最好对我说实话，把你的事将清楚，否则我这一关你是过不去的。」接着，他又是喊着说：「你有病，要报告，不报告就要吃饭，这里是监狱，有监规。你不报告，又把饭给别人吃了，你犯了监规要受惩罚。」

没 容我说话，他冲门外喊了一声，喊的是什么我没听清，他又转过来对我说：「第一次，我不吊你。再犯，绝不客气。」他刚说完，一个看守从外面进来，一把拉住我 的另一边胳膊，拉到背后，既没用绳子捆我，也不是用手铐铐我，而是把一根铁链的两端绕在我的两个手腕上，用锁头锁住。他的动作熟练极了，一个看守在我头上 重重地打了一下，说：「没把你吊起来，还不谢谢李所长。」

我还没说出话，只听到这位李所长喊了一声：「带走！」两个看守拉起我，又顺原路把我推进小铁门， 那个多吃了一份饭的人仍在烈日下被吊着。

通道中的人们给我让开了路，那女人快步走来，扶着我又回到那个靠墙的角落里。屋里的人对我有问候的，有表示关切的，也有责备我不该多说话的，有说这个麻烦是我自找的，有的说我运气，没有被吊起来，不少人在估计着我会被锁多久。

当 这阵注意力消失后，那个昨天和我一起来的女人对着我的耳朵说：「我给你带来了吃的和烟，我看见你被带出去了，你为什么不吃饭呢？」说着，她从胸罩里掏出一 小块饼，放进我嘴里，我让她也吃，她轻声说：「他们给我们吃得也好，也让我们吃饱，就是罪不好受。整个晚上就像你一样被反锁着手。你忍着，别多说话，我伺 候你，晚上我去求他们放开你。我摇着头对她说：不要！这里不是讲理的地方，我是想去救那个多吃了一份饭的人，结果不但没救成他，我自己也受了罚。人们说： 有享不完的福，可没有受不了的苦。我什么都能受，你不要管。」

她 轻轻叹了口气，一边喂我一边小声说：「我不怕你看不起我，我是妓女，见过的男人多了，可像你这样的男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和这些人不一样，你是好人，一 看就知道你有学问，像个当官的……」她的话猛得提醒了我，正是我没想到的。她说的对，在这群人中，我是不一样，倒不是我个子高，从我说话、举动上，别人马 上就知道我是个受过教育的人，而且是做文职工作的。我敢说活，又不怕事，也就使别人不难推测出我是他们想象的那种当官的人。她是妓女，只是接触的人多，绝 不像是个受过教育的人，连她都能看出的东西，难道这些专业抓人、整人的人不懂？

那 个李所长说要审问我，想必是受了安全部那两个人之托，他下令锁我，并不是因为我违反什么监规，他是要给我个下马威，让我怕了他，到审问我时，他一定会让手 下人打我，那我是不怕的。刚才突然的灵感，可能就是老天给我的机会，让我去拖延时间，去与他们周旋，至于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现在无法猜想，但我可以想到 的是古叔和阿景现在正在想办法。我马上接着「阿尹，四十五岁，从上海来」的构架，编一个完整的故事。

天 气热得让人喘不出气，汗水湿透我的衣服，锁在背后的胳膊和双手沉沉的有些麻木了，我感到烦闷急躁，几次用力试图去挣脱铁链，结果划破了手腕上的皮肤，血流 出来了，头上也流出了大滴地汗水，汗水流到脸上，又流进了眼睛里，

又没有手去擦，只好闭上眼睛用力地甩着头上、脸上的汗水。那个女人马上推开了别人挤到了 我的身边，用袖子擦去了我脸上的汗水，然后一只手揪住袖口，把整只胳膊伸进我的衬衫里，去擦我前胸、后背的汗，又把流着血的手腕放在她的嘴上吸吮着。

那 种焦躁的感觉仍使我不由自主地又挣扎了几下。她一把抱住了我的头，又贴在她的胸前，她低下头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快不要这样，你把自己弄伤了。你刚才还 说你能受的，这才几个钟头，你就受不了了。不就是锁着手吗？！又不打你，又不吊你，让他们锁，反正不能锁一辈子。」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她用一只手掏出 半截烟放在我嘴上，我狠狠地吸几口。旁边挤过来一个男人的头，求我让他吸口烟，我用眼睛示意这女人，她把烟从我嘴上拿开，递给那个人。

我 的半边脸贴在她的一只乳房上，我动了动头，她马上把我的头抱得更紧。小声对我说：「这有什么，昨天你还摸了呢。」我马上说：「我可不是故意的。」她笑着 说：「就是有意的，我也不怪你，你是个正经人，你保护我。我叫阿莲，从广西来，你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反而问她：「有家没有？为 什么做妓女？」这是个很直爽的女人，而且很诚实、爱说话，不用我多问，她就把自己的身世遭遇全讲给我听——地地道道的一个苦命女人的真实经历。

第三十章 她用一只手揉着刚解开绳子的乳房

阿 莲。三十二岁。十五岁结婚，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现在也都十五、六岁了。她在一个小城市的中学里读书，已经四年没见到他们。她的丈夫在七年前的一次炸山修 路的事故中丧生后，政府发了两千块钱的抚恤金；家乡是个穷地方，这两千块引起整个家族的人都来争分这笔钱，最后是村里头人出面作主分了钱，她

和两个孩子分 得了八百元。两年后，这笔钱用光了。当地又发生了一次洪水，房子冲没了，地也淹了。她带着孩子投奔到一个住在小镇上的亲戚家，亲戚很是帮忙安排他们住下， 送两个孩子上学，又给她找了份工作。但仅十个月，亲戚与人合伙的生意倒闭，欠下债务，法院判卖房子还债，她只好带着孩子租房子住，负担大了，她的那几十块 钱的工资艰难地维持着娘儿三人的生活。

但 是，她喜悦、自豪，因为这两个从未进过学校的孩子的天资竟然那么好，来到小镇仅上学十个月，就被破格升进四年级。孩子成了她全部的期望和安慰。但是恶运并 没有结束，由于她又一次拒绝了老板的调戏，盛怒的老板解雇了她。这本来就是个小镇，屈指可数的几个小商店和小作坊，亲戚倒了台，面子都不好使了，奔波求告 毫无希望，她陷入绝境。几天后，完全绝望的她又出现在那个小作坊，在老板的办公桌前，她一件一件脱光自己的衣服。

老 板高兴了，让她回来工作，而且在作坊里腾出一间屋子让她和孩子们搬去住，工资也给她升了几块钱。对她来讲，那就是代表从此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老板给她一个 眼色，她就得顺服，再也不违抗。这样的日子过了大约有半年，一天她又被叫进了办公室。正要脱衣服时，老板让她坐下，对她说，他正在努力与一个广东商人签一 份合同，需要她帮忙；只要签下合同，老板答应给她五十块钱。说完，老板拿出一套衣服和化妆品，让她去打扮，然后带她去和广东人吃晚饭，晚饭后就送她去旅 馆，让她陪广东人睡觉。她刚一犹豫，老板就严厉地说：「敢说个不字，就马上给我滚蛋！」她害怕了，老板的计画一步一步地实行了。第二天早上，那个广东人满意地扔给她三百块钱。她刚把自己梳洗好，老板就高兴地进来了，把她带回作坊后马上就给了她五十块钱。这项合同的签成，足足让老板高兴了好些日子。

不久以后，阿莲就频繁地被老板带出去，与各种各样的客人吃饭，然后又陪客人去旅馆。再后来，就变成了老板直接命令她几点钟、到哪个旅馆去陪客人睡觉。最后，就又变成了几乎天天晚上都要去旅馆陪人睡觉，第二天回到作坊。只是老板准给她的钱越来越少了， 从一开始的二十块，到十五块，到十块，到最后的五块。终于有一天，儿子问她：「妈妈，妳告诉我，妳是不是妓女？」她打了儿子一个耳光，儿子哭着说：「同学 们都骂我是婊子养的，一个同学还说，他爸爸花了五十块钱睡了你一夜。老师都知道了，他要找妳去谈话。」她惊住。那晚，她问那个刚在他身上发泄完的男人是做 什么生意的，与这个小工厂是什么关系。那男人笑着说：「我既不做生意，也不是老板，更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工厂，我只知道这家旅店住一晚五十块，有漂亮女人陪 睡。」她再次惊住，她做了妓女，老板骗了她。

几 天后，她被校长请了去。校长很客气，但很坚决地表示为了学校的名誉，两个孩子必须退学；这对孩子不公正，但没办法。她哭着对校长讲出了一切，校长震惊了， 最后校长看在两个孩子读书的天份上，决定把他们转学到北边一个中等城市的寄宿学校，校长的一个同学在那里做主任，可以照料孩子。但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心理和 名声，她必须保证在孩子们毕业前，不得去探望他们，如果她做不到，校长也就不想管这件事了。她咬着牙同意了。最后一个问题是，寄宿学校的费用很贵，她能不 能负担得起。她咬着牙，拼命地点头。校长是个好人，仅两个星期就办好了一切手续，又亲自把两个孩子送到那个学校并安顿好了一切。又恐怕阿莲不放心，在一个 周末，校长又带着阿莲去了那个学校去见她的孩子。他们都穿着整洁，体面的制服，干净舒适的宿舍，相当不坏的伙食，健康而且愉快，因为这里没人知道他们的母 亲的事情。两个孩子见到母亲时，似乎都有些惊慌，四只眼睛不时地四处看着。她明白了，她给孩子们带来了伤害；匆匆地搂抱了他们后，便跑了出来。跟着出来的 校长安慰她说：「孩子们是不会不认自己的母亲的，等他们长大，有了分析事物的能力后，他们一定会回到妳的怀抱的。」阿莲擦干了眼泪，拿出了四百块钱放在了 校长的手里，对校长说：「这是两个孩子下个月的食宿费，请你给学校寄去。以后我每个月给你寄钱，你用你的身份给这个学校寄钱，我不会与这个学校有任何联系 的。」校长叹了口气，握住了她的手说：「妳的意思我懂，我们都是为了孩子。」那天，阿莲回到作坊，收拾几件衣服带在身上，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打老板一个耳 刮子，转身离开作坊，直奔广州。

我 问她为什么要来广州。她看着我说：「我们那儿的人都往广州跑，这里人多挣钱容易。你想想，两个孩子一个月就是四百块钱，我一个女人在那个穷地方，有什么办 法去挣出这四百块呀。老板用我的身体给他挣钱，我又为什么不用我的身体给孩子们挣钱？我什么也不会，不干这个能干什么？如果还在那个镇上干这个，挣不出这 四百块钱不说，我的坏名声会传到学校影响孩子。来广州已四年多了，那边早把我忘了，我也挣了不少钱，如果孩子们能上大学，也供得起。」

我 闭上眼睛。阿莲让我抽了几口烟，又问我是不是锁得难受，为什么不说话。我摇了摇头说：「妳说得对，既锁不死我，也不会锁我一辈子的。只是第一次坐牢，不习 惯，我会让自己习惯的。」她凑近我耳边说：「我也是第一次，你不信吧？哪个贩毒、走私、当妓女的不都是几进几出多少次了。我运气好，四年多了，这是第一 次。我听别人说妓女被抓后都要受什么罪，我早有准备，可是在这里连听都没听说过的事这帮看守们都干得出来，吓死人哪。」我问她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她不说话 了，半天才叹了口气，轻声说：「做女人苦哇。」

我 问她，派出所里的情形是不是比这里要好一些。她马上摇着头说：「那群警察狗子们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他们还用我的身体做交易挣钱呢。」听她这么说，我一点儿 也不吃惊，任何权力不论大小，只要是不受控制，没有监督，就一定

腐败。各地的公安局就是由警察们组成的黑社会，如果他们再与社会上的帮会勾结，中国就彻底 变成了在中共独裁专制下的黑社会国家了。

法律中的规定是，派出所关押人不应超过二十四小时，或把人放了，或者起诉。阿莲在那个派出所里足足被关押了四天，直到那里的十几个警察们轮流奸污了她以后，才决定把她送拘留所去。前天晚上，阿莲最后一次被带到楼上供三个值班的警察淫乐了一夜。

昨 天清晨，天还黑着的时候，她被强制着赤身裸体地送回到楼下的那间小屋。进了屋，她愣住了，前天晚上空无一人的小屋，这时多出那三个半夜被抓进来的年轻人。 下面的事也就可想而知了。直到天大亮以后，警察才把她的衣服扔进来。这三个人还有些不情不愿，一再说一会儿上车后还要在车里继续玩，并且说一千块钱不能只 玩一次。且不论这三个人是怎么弄来的这一千块钱，警察搜走这钱，装进自己的口袋，才把阿莲推出去堵那三个人的嘴。

知 道了她的这段经历，我才明白昨天在车上她既不反抗也不出声的原因。那三个被搜走钱的畜牲以掐死来她威胁她。在这种制度下，女人永远是处在社会边缘的群体。 我抬起头，第一次仔细地端详着她的脸。这是一张秀气的脸，两只眼睛在看人时很温柔，也很实在。皮肤有些黑，额头和眼角已经出现皱纹，显出过早的苍老。一个 孤独无靠的小女人，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为了自己的儿女，勇敢地淌进了这个浑水社会，忍受着，挣扎着。可以断定，她这一生注定要做这个制度的牺牲品。「你 想什么呢？」她的脸凑近了我，问着。「想说什么？别憋着，告诉我。」我看着她的眼睛，慢慢地说：「如果我的手不是被锁着的话，我真想现在就抱着妳，让妳在 我的胸前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她看着我，眼睛有些红，扭过头去一下子搂着我的头，紧紧地贴在她的胸前。

院子里突然传来了喊叫声。人们挤向了窗口。门开了，那个被足足吊了四、五个小时的人被推了进来。两个看守也进来了，其中一个喊着「5311」。 喊了两遍，我才听清楚，连忙答应着坐了起来。一个看守踢打着通道中的人向我走来，他抓住我的胳膊，让我转过身去，我以为对我的惩罚也结束了，等着他打开锁 头，但他只检查了两个锁头，又转身走了。我叫住他，对他说：「吃了我的饭的人都结束了惩罚，我这个饿肚子的人，难道比偷饭吃的人的罪还大吗？」他马上瞪眼嚎叫着：「你说什么？你想干什么？造反啦！」我笑了一下说：「我是说，你忘了打开我的锁了。」他又叫着：「不行！你们这种臭知识分子，不给你点厉害，你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喊完，他转身要走，我刚要张开的嘴被阿莲紧紧地

捂住了，另外的两个女人在拼命地拉着我的衣服。那个看守走到门口，又转过身对我喊：「你记住了，有你跪着向我求饶的时候。」

屋 门关上了。屋里静静的，一位五十多岁左右，像是农民的人对我说：「看你也有四十多岁了吧，你是真不懂？还说真不怕呀？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你和他们 争，能有你什么好？」我向他点了一下头。另一个坐在离我不远的人，像是在发表评论似的对大伙说：「我原先估计傍晚前后他们会放开他的手，因为他要用这根链 子去锁女人。现在依我看，他们非把他锁到明晚不可。今晚，他们得用绳子去捆一个女人了。」

他 的话引起可笑声和议论，注意力离开了我。阿莲和那两个女人对我抱怨着，但我却没有听见，我陷入沉思，分析着这个新的情况。他们进来检查锁，不是来开锁的， 又说什么知识分子，看来他们知道我是谁了，只是把我暂时关在这里，等买到了车票后就把我送回北京了。我听到不少人讲过，只有重要的嫌犯才整天整夜地锁着 手，这里没有手铐，所以才用链子锁我，什么违犯监规，全是借口。我用不着费脑筋去编什么故事。回到北京后，我知道等着我的是什么，是酷刑、是折磨，是让我 招供，是让我出卖同志，但我不会的。结果很简单，或秘密处决或死于酷刑下，我就解脱了，本来就是生不如死，死又 有什么可怕的？这些人巴望着快点被送去农场，到了农场后他们可以花钱买来自由。我去不了农场，我是去北京死。其实死和自由又有什么不同。想到这里，我反而 平静了，而且还有点兴奋，对阿莲说：「他们是不会放开我的。」阿莲又抱着我的头，低声说：「我原来也想今晚他们会放开你的，现在麻烦了，多说话有什么好， 你不说话行不行？不是我捂住你的嘴，不知道你又会说出什么来。」

我 对她笑了笑，说：「我们快要分手了，不过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我会记住的，而且感觉挺美好的。」她马上说：「你说什么那？看着你的样子我都心疼，你还说 美好。分手？你去哪儿？我早想好了，我们一块儿去农场，写封信或打个电话给在广州的姐妹们，让她们带着钱连你带我一起赎出去。」

看 着她那认真的样子，我笑了，请她帮我点了支烟，然后问她：「出去以后，还干不干那个行当了？」她摇了摇头。我接着说：「这就对了。妳已说了，孩子们上学的 钱也有了，钱这个东西，多少是多？该想想妳自己了，孩子们一上大学，就要离开家，妳是跟不去的，他们毕了业就该各自成家立业，妳一个人孤伶伶的，往后的日 子怎么过呢。女人和男人不同，女人总要有个家，该做的妳都做了，也该是妳过个安稳正常日子的时候了。」

我说完，半天没听到她的反应。我正想问她，一滴水珠掉在了我的脸上。我抬头去看她，她正在用袖子擦眼睛，又努力地做出微笑，对我说：「我总是在想，我这一辈子只遇上两个好男人，一个是我丈夫，可惜他命不长；另一个是校长，成全了两个孩子。现在遇上你，没有人对我说过这些话，他们都不拿我当人看的。」我提高声音对她说：「重要的是妳要把自己当人看，懂吗？」

院子里有人在走动，十来个人在放碗，分饭。据说，他们都是旁边监狱里的年轻罪犯。屋子里的人们兴奋了，阿莲对我说：「一会儿出去后，我先喂你吃饭，然后上厕所，最后喝水。不管谁找麻烦，你都不要说话，行不行？」我点了点头。半个多小时后，门开了，人们争抢着往外挤，我差不多是最后一个走出来，刚到门外就见到下午那个对我喊叫的看守，一手叉着腰，一手拿着一碗饭，正等着我。看到我，他狞笑着把那碗饭端到我面前。我们互相对视着有几秒钟，他突然瞪起了眼睛，又是那样喊叫着说：「接过去！难道要我喂你吗？」

跟着他举起了碗，做出了要砸过来的样子。阿莲一步挤进在我和看守之间，双手接过了碗，对看守说：「他可没那个胆子让你喂他，别生气，别跟他呕气。」说着她拉我走到墙边，把一团饭送进我的嘴里，又催着我快吃。我刚费力的吞下这口饭，那个叉家伙走过来了，一副流氓腔调对我说：「这个臭婊子是你相好的，她是你老婆，你他妈的是个吃软饭的。」阿莲笑着对着他耳朵说了句什么。这混蛋笑了，对我说：「你老婆求我今晚好好收拾她呢。」

阿莲马上把一大团饭塞进我嘴里，放下饭碗，推我进了厕所。她蹲下来解我裤子，我对她说：「不必了，早晨的水早变成汗流光了，赶快喝水去吧。」她刚拉上我裤子的拉链，还没站起来，那个混蛋猛的出现了。他一把揪住阿莲的头发，喊叫着：「你这个臭婊子，跑到这儿卖来了，违反监规，吊起来！」他揪着阿莲的头发往外拖。我叹了口气，知道我是犯了小人，可又不得不去对付。我几步迈到这混蛋面前，他本能地举起了木棒，我缓慢跪了下去，对他说：「她一个女人知道什么，是我的错，饶了她，吊我吧」。马上，他那流氓腔又出来了：「她还真是你的女人，这么护着？」几乎同时，嚎叫声也迸发出来了：「不行！违反监规非吊不行！」他又去揪阿莲的头发，我站了起来，大声地说：「下午是你对我说的，让我向你下跪求饶，我也跪了，也求饶了，你还想怎么样？我求你吊我，你非吊这个女人干什么？走！见你们李所长去，让他下令吊我，走！」

人群一下子围了上来，我的话肯定是出乎这混蛋的意料，他松开了阿莲，扑上来推我，嚎叫着：「想造反？吊你还不容易，走！」我没等他推到我，便一转身大步地走到上午那个被吊的地方。我这一举动整个打乱了院子里的秩序，十几

个看守喊叫着推打着围上来的人群，那个混蛋指手划脚地对一个看守在说着什么，阿莲也在对一 个看守说着什么。

刺耳的哨声突然响了起来，人们又被踢打着轰回屋去，一个看守指着我，说：「你站在那里不要动。」大约两分钟以后，院子里变得空荡荡的，一个大约三、四十岁的看守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还没张嘴，那混蛋抢上来说：「他让这臭婊子给他。」

我没理他，对问我话的看守说：「我被锁着手，所以需要帮助，我求这女人帮我，这位先生就说我又违反了监规，还要吊我，我也没话可说。既然又错了，只好接受惩罚了。」 这 个人看着我，突然对其它看守们说：「把他们关回去。」说完，转身向小铁门走去。我提高了声音对他说：「先生，我可不可以请求你两件事？」他站住了，转身问 我什么事。我说：「偷吃了我的早饭的人，已经在几个小时前结束了惩罚。我是受害人，可仍在受惩罚，我请求松开我的手。第二，由于刚才的误会，我没能喝到 水，我请求让的喝水。」他想了一下，说：「喝水可以，上厕所也可以，手不能放，你的情况不同，必须锁着。」

我 从容地喝够了水，任阿莲脱下了我的鞋袜，从头到脚地擦洗着我。远处只有一个看守在指挥着那十来个犯人正在清理着院子。对刚才发生的那场事，我说不出胜负， 但事情肯定还没有完，更难以去预料还会发生什么。但至少证实了一件事，他们不放开我的手，说我的情况不同必须锁着；他们不知道我是什么情况，只是遵照便衣 的嘱咐去做。那两个便衣已经知道我是谁了，看来我既拖延不了时间，也没有周旋的机会了。只等那两个便衣出现把我押上火车送回北京了。阿莲推了我一下，又匆 忙地揉搓着我的袜子和一块白布。我抬头看到那个看守在向我招手，我跨出水槽蹬上鞋，与阿莲走回了那间臭哄哄的屋子。她把湿袜子搭在我的腿上，又展开了那块 布，原来是她的胸罩。她面对着我，又让那两个女人遮掩在她的背后，迅速地解开了衬衫戴上胸罩。我正抽着烟，听到那个五十多岁像农民的人对我说：「你是真不 怕呀，真把你吊起来，你可怎么办呀？」我冷笑了一下说：「我能怎么办？我又没干错事，不也被锁起来了吗。」她又说：「刚才的事放在谁身上，打一顿、吊起来 那是一定的。哨子一响，进屋慢一点儿都得挨打，从没见过有人像你一样，留在院子里又喝又洗的，我也说不清，反正你是和我们不一样。」

不 少人都在看着我。我笑了一下，说：「我有什么不一样的？没锁你们，就锁我，天知道一会儿还有什么呀，没准半夜来收拾我呢。」一个声音从角落里冒出来说： 「半夜没人来收拾你，他们都忙着玩女人呢。」一阵笑声起来了，人们对我的注意力转移了。我把头靠在墙上，看到阿莲她们三个女人正在说话，似乎

是在讨论着什 么，一会儿，听到阿莲说：「妳们想让我怎么办，他的手锁着，妳们又不管……」我凑过身子去问她们在说些什么，一个女人说：「那个和你作对的看守今晚值班， 再过一会儿，别的看守就下班了，他准来报复你；再跟他顶着干，阿莲准倒霉。」我说：「这和阿莲有什么关系？要报复就冲我来好了。」另一个女人说：「你们俩是一块被送进来的，整天在一起说话，你又总护着她，不用说他们，连我们都认为你们俩有关系。」

这 话提醒了我，阿莲处处照顾我，又一直和我在一起，确实引起了不少人的闲话和嫉恨。那个来了快两个星期的女人下午还对我说，我来了一天多，她们可放心了，因 为再没人对她们动手动脚，或上来撕扯她们的衣服了。我小声对阿莲说：「她们说的对，是我连累了你，其实咱俩既没关系，妳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一会儿我 找着机会向看守解释一下……」她打断了我，说：「你能不能就不要说话，我求求你，他们要来报复你，你就让他们报复，他们丢了脸，就是想出这口气。你什么也 别说，有话回来对我说，行不行？」我点着头，但接着说：「那两个女人说，那个混蛋会报复妳，这事我要想一想……」她又打断了我说：「你别管，这是我们女人的事，与你没关系。都是我们女人该忍的、该受的，不是你的事，你也管不了，你听见没有？」

我 没回答她，只是在想着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仅仅是让十几个女人都裸体并且用铁链锁住她们的手脚，至于还有什么，女人们不说，外人无法知道，倒霉、受罪是 什么意思？难道会用刑罚去折磨她们？不过我可以断定一点，这些看守们心理都不正常，而且有强烈的虐待倾向。人性中的善已经完全泯灭了，而恶的一面，却是淋 漓尽致地占有了他们的全部人性。嚎叫、尖叫、喊叫，因为他们已经不会正常说话了；打人、折磨人、侮辱人，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社会行为，他们日复一日的言语行 为，早已构成了罪行的事实，但他们却响当当地说是为党工作。一点儿不错！这个党是与人民为敌的。他们执行着党的这个宗旨，终于使他们的心理彻底反常，影响 到性心理的错乱，造成他们行为的异常，女人们自然成了直接受害者。

阿 莲推了推我，又把一支点燃的烟放在我的嘴上，问我在想什么。我看着她想说话，但又说不出来。她把头靠在了我的肩上，一只手伸到我的背后，握住了我的手，轻 声说：「我妈就对我说过，做女人不好，天生就是受罪的。这么多年了，没人把我当人待，没人对我说句体贴的话。就为你今天的那几句体贴我的话，今晚受罪我愿 意，等我们出去以后，如果你不嫌弃我，你想怎么玩我，我都让，只怕那时，你也要骂我臭婊子了。」

我摇着头，闭上了眼睛。刚抽完烟，就听到了开门的声音，那个混蛋进来喊着阿莲的号，阿莲一下子把我推倒，一边答应着，一边示意着让那两个女人按住我，她快步地向门口走 去，那个混蛋仍在喊着：「你那个野老公呢？死啦？让他等着，我收拾完你就来找他算账。」一个女人捂住了我的嘴，门又关上了。我猛地坐起来，看到人们向我投 来的麻木神情，其中也夹杂着不多的同情和幸灾乐祸。我控制不住了，大声说：「这里还有没有一个真男人敢站出来说句话的？就这样看着一个女人被带去侮辱，竟 没人说句话，在你们眼里，女人就该受辱，理所当然，天经地义？」－

－我 想起了江泽民的那句胡话，接着说：「是罪有应得，对吗？」屋里静极了。半天，一个广东口音的人说：「我们有什么办法，祸还不是你惹出来的，你都没办法，让 我们怎么办？」我马上大声说：「谢谢你！我正是要听这样的一句话，一句责备的话。是我连累了她，她才被带去受辱的。是真男人的，站出来！骂我，打我吧，我 不会还手的。」

说 完，我环视着大家，大多数的人转移了他们的目光。这时，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人说话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人。他很缓慢地说：「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但是， 我和你一样，愤怒却做不出任何事。因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们，只被给予了动物的生存权，动物界里是根本不存在道义和良知的，只有弱肉强食。今天早上你是 要去解救那个吃了你的饭的人，你饿着肚子，又被锁上了手，一个下午过去了，那个人对你说过个谢字吗？或者只是一个表示？这个女人一直在照顾你，我认为她是 个好女人，可再好的女人到了这种地方，也逃不掉受侮辱的命运的。你以为这是你的错吗？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又怎么能去保护别人。生存权在使中国人退化、变质，同时腐化着社会，说起来悲哀，但这确是现实。虽然这个生存权是对中国人的侮辱，可你现在必须要考虑它，如何使用它，渡过今晚的难关。」

说 完，他微笑着又对我点了一下头，我也认真地微笑点头感激了他。这时，听到那个农民在大声的说：「这位先生也一定是个知识份子，说出的话就是不一样。谁家没 有姐妹老婆，看着女人们天天晚上被带出去糟蹋谁也有个同情心，这里就是这么个地方，谁也没办法，这位先生说得对，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那个家伙一会儿准找 你来。」那个已被关在这里两个星期的女人，把我的头放在她的腿上让我躺着，用袖子擦着我脸上、头上的汗水，又点了一支烟让我抽，然后低声说：「难怪阿莲说 你是好人，你有同情心，为我们女人说话……」我打断了她，问：「他们会怎么折磨阿莲？求求你告诉我。」她没有回答我，只是对我说：「你别问了，反正都是女 人该受的罪，我们是不会说的。」

我 问为什么不说出来？她说：「他们做得出来，可我们说不出口，你不用问，我们谁也不会告诉你的。」两个女人互相看了一眼，都不说话了。谁说女人们保不住密， 当她们守口如瓶时，任你是谁，她们也不告诉你的。胡涂呀！什么是女人该受的罪？没有人该受罪的。院里传来了叫卖声，屋里又是一阵骚动，两个女人怔怔地坐 着，这阵叫卖声过后，就该提她们出去了。我试图去安慰她们，但我张不开嘴，是安慰她们，女人被强奸了以后就成了圣女？还是鼓励她们勇敢的去被侮辱，然后就 有了好生活了？或者让她们渴望共产党会救她们？反正半个多小时后，她们还是被带走了，去充当共产党兽性的发泄物。「那个臭婊子的野老公，你给我滚出来！」 门还没打开，喊声就先进来了。我坐了起来，知道这是冲着我来的。门打开了，那混蛋走进来，又喊：「我刚收拾了那个臭婊子，现在轮到你了，出来！」我向门口 走去，走到他面前，我闻到强烈的酒气。来到了院子里，他推我到铁丝网边，上边已经挂着一根绳子。他喘着粗气，抓起绳子绕在我的手上，用力地捆着。我对他 说：「你吊我，甚至收拾了我，对你也没有好处，我给你钱，你买杯酒喝，算我向你赔礼了，你看怎么样？」

他 马上就伸手摸我的裤子口袋，我躲开了；对他说：「这不好，这么多人看着，影响你的清名。」他狠命地拉了几下绳子，我的两个胳膊立时被高高地吊起来了。他得 意地说：「我就这么吊着你到天亮，你信不信？」我说：「信。可你有什么好处？你要我下跪求饶，我可以再做一次，你放了我，我再给你五十块钱，你把阿莲也放 了，好不好？」他大笑着问我：「你求饶了？」他是喝多了，十分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说：「你向我跪两次，这儿跪一次，让大家都看到，再去前院跪一次，让那群 臭婊子们也看到，然后你给我一百块钱，我就饶了你。」我接上说「：也饶了阿莲。」他喊：「行！」他放下我，但没有解开我手上的绳子，拉我走到院子当中，让我跪下，他绕这院子跑了一圈，对着八个窗子喊着：「你们都看着，这个臭知识分子向我求饶了。」其实，八个窗口一直挤满了人头。我把他叫过来，小声说：「你去打开那三个门，喊出 5308、5309、5310 这三个人来，他们手里有我的钱，准够一百块。」

我 的话立时被他付诸行动。一阵开关门和嚎叫的噪音过后，三个畜牲跪在了院子西北的角落里，被踢打着，又被搜着口袋。当三个畜牲又被关回去后，这个混蛋脸上带 着笑向我走来，说：「不错，你没骗我，走，到前院在给我跪一次去。」他把绳子抓在手里，然后低头点了一支烟。我对他说：「你折腾我半天了，怎么也得让我抽 几口烟吧。」他看着我，突然说：「行，你够朋友，我也够朋友。」说着把手上的烟放在我的嘴上，我吸着烟，慢慢地向小铁门走出，心里却在念叨：「你是个什么 东西，也配和我交朋友？」穿过铁门又走进了门洞，快出门洞时他用绳子拉住了我。他没有完全醉，把我嘴上的烟拿走，然后又推了我一下，喊道：「走！」进了前院，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这个小院北屋前面的长水池边，四个赤身裸体的女人正背对着我，在那里洗头、洗身子，每个人的双脚都被一根铁链和两个锁头锁着。当她们小心地移动双脚时，铁链碰撞在水泥地面上，发出了很响的声音。

我 问这个混蛋要让我跪在哪里。他推着我走过李所长的办公室，来到第二间屋的门外，离门几步远有一棵矮树。他让我跪在树边，又把绳子的另一端捆在树干上，然后 才喊叫着：「妳们这群臭婊子们，都出来！这个臭知识分子向我求饶了。」他拉开了旁边这间屋子的门，又喊叫着进了北屋。水池边的女人们都回头看我，但我一个 也不认识。旁边这间屋子是吃饭的地方，里面四个裸体女人正在吃饭。一个女人向我嘘了几声，是和我同屋的一个女人，她端着碗，小心地迈着小步走到门口，急急 地对我说：「阿莲没事，在北屋陪他们喝酒呢。」这时，北屋的门开了，陆续出来了三个搂着女人的看守。一个又 瘦又矮的看守，横着脖子扬着头，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对我说：「应该给你点厉害尝尝，就这么着太便宜你了。」他回头对屋里叫着：「四哥，四哥！」那个混 蛋答应着出来了，他对混蛋说：「不能光让他跪着，把他的手吊到树上去，让他知道，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说着，两个人过来，解开了捆在树干上的绳子，把它扔 在了高处的树杈上，又用力往下拉绳子。我的双手被拉得高高的，上身向前倾，头也低了下来，然后两个人又催促这水池边的女人去吃饭，那个出主意吊我的人把在 屋里吃饭的女人拉出来，那个和我同屋的女人被拉了出来，主动的把两手放到了背后，被那个看守锁上了铁链。当那个看守背过身去锁另一个女人时，她小声地对我 说：「忍着，千万别说话。」

那 个混蛋抱着一个女人快步走到我身边，把那个女人扔在了地上，又一把揪住了女人的头发，让她与我几乎是面对面地跪了起来，是阿莲。她看了我一眼，不好意思地 低下了头，她也是一丝不挂的被锁着手脚，但引起我注意的是，她的乳头被一根细白的线绳系住，白绳的另一端在她的大腿前飘动着。那个混蛋又喊又叫着进了北 屋。

我 马上问阿莲他们怎么样折磨她了？她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匆匆对我说：「没有，你记着，他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千万别说别的。」没有听到我的回答，她 又说：「为了我，好吗？」我点了一下头。那个混蛋推着两个女人又出来了，喊着说：「人都齐了，你们都看着，现在我要当着大家的面，审问他们。」说着，他又 揪住了阿莲的头发，迫使她扬起了脸，问她：「说！这个男人是不是你的野汉子？」阿莲马上说「是。」

他转向了我，狞笑着问我：「说！这个臭婊子是不是你相好的？我也马上说：「是。」他高兴了，又对阿莲说：「告诉你老公，说你是个臭婊子。」阿莲看着我说：「我是臭婊 子。」这混蛋大笑了起来，又喊叫着让她再说大声点。阿莲提高了声音又重复了一遍，这混蛋兴奋了，问我：「你干了这个臭婊子没有？」我回答：「没有。」他马 上又喊叫着，把与我同屋的两个女人拉了过来，又推倒在地上，然后又一只手揪她们的乳头，问她们：「说！他们俩个干到一块没有？」

两个女人尖叫着说：「是， 是，他们干到一块儿了。」他又大声的问周围的女人们：「你们这群臭婊子们，说！看见他们干到一块儿没有？」女人们回答：「是，看到了。」这混蛋又高兴了， 一把抓住了阿莲乳头上的绳子，然后揪紧了绳子问我：「说！你干了她没有？」阿莲看着我，我只好说：「是。」

他 又对阿莲说：「告诉他我刚才把你干了，说！」阿莲低下了头，对我说：「这位先生把我干了。」这混蛋狂笑了起来。一个看守说：「四哥，把他关回去吧，没意思 的，别耽误了咱们。」说着，他搂着两个女人转身往北屋走去。那个出主意吊我的看守说：「我也不看了。回屋喝酒去。别放他，吊着他。」说完，他出声地在几个 女人的屁股上拍打着，嘻嘻哈哈地转身走了。另一个看守在吃饭的屋里，正在锁一个女人的手，听他说话至少还没有喝多了，他对那混蛋说：「四哥，算了吧。让女 人们都进屋，你帮我把这几个女人都锁上。」这混蛋喊叫着把女人们轰进屋，铁链碰撞着地面，发出了一阵的响声。

阿 莲看着我，站了起来，转身向北屋慢慢地走去，那个混蛋走进了吃饭的屋子，揪住一个女人的乳头，用绳子捆着，院子里没有人了。那个看守又说：「把他关回去 吧，他的脚又没锁着，跑了怎么办？」混蛋马上说：「他敢，我打断他的腿！」又瞪着我，喊着问：「你是不是真的求饶？」我说：「真的，四百多人都看到了。」 他嘴里咕噜着什么，可又说不清。另一个看守又说：「这两个女人我来捆，你赶快把他关回去，别忘了把铁门锁上，咱们就可以放心地玩了。」这混蛋走了出来，费 力地解开我的绳子，我站了起来，他推我一下，我们往回走。

进 了小铁门，我站住了，对他说：「你满意了吧，你让我跪了两次，我跪了。你吊了我有半个多钟头，又当众人侮辱了我一场，我都受了，给足了你面子。我说给你五 十块钱，你要一百，我也办到了。其实，你得到的肯定比一百多，对不？」他马上说：「怎么，多出来的你还想要回去？我摇着头，笑着对他说：四哥，咱们都是男 人，说话要算数。你答应的，连阿莲一块儿放，你忘了？」他是忘了，想了一下，又看着我，没说话，接着又点了支烟抽。我又说：「阿莲你也玩了，交易是交易， 那么多女人，你还非要阿莲干什么？你刚才说了，我够朋友，你也够朋友。」这回他没喊，点着头说：「好吧，我把你先关进去，再把她放回来。」我笑着说：「我锁着手呢，还能怎么样？你折腾了我半天，总得让我抽口烟，放松一下吧。」这回，他什么也没说，把烟放在我嘴上，转身出去了，门也没锁。

我 在院子里走了几步，又使劲地抻着浑身的筋骨，刚才吊得我全身都僵直了，而且浑身是汗水。各个窗口都有人对我说话，我一律以微笑和点头响应。我知道，还有三 个畜牲正恨我呢。抽完了烟，我走到水池边去喝水，让水冲洗着头、脸

和脖子，清水使我感到好过不少。然后我背过身去，一边用力地甩着头发上的水，一边让水冲 着我的胳膊和双手。阿莲回来了，那混蛋把她推进了屋，却拦住了我，小声对我说：「你敢把钱的事说出来，我就有办法弄死你，你信不信？」我说：「这是咱们两 个人的交易，没必要告诉别人，这话你应该对那三个人说去。」他说：「那三个人明早就送农场，露出了风声，你就死定了，听清了没有？」我笑着说：「那得有个 条件，把你那包烟给我，我就不说。」他一句话不说，把烟放进了我衬衫口袋，然后推我了一把，喊道：「进去！」

天 已经黑了，屋里更黑。借着院里的灯透进一点光亮，我小心地走到了墙角。阿莲已经推开了占住了我们的位置的几个人，让我靠墙坐下。很多人已经睡了，但仍有不 少人向我问这问那的，但大多数问题都是下流的。我躺了下来，不再去搭理他们了。阿莲用手梳理着我的头发，又把头靠在了我的胸前。她从傍晚到现在，受得太多 太多了，她委屈、冤枉，她想哭，想发泄出来，但在这间有近一百人的屋子里，连这么一点可能都没有的。

我 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她，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们就这样静静地躺着，不知过了多久，除了偶尔看到几个烟头发出的火光外，屋里已是寂静无声了。我感觉 到阿莲的手在做着什么事。于是低声问她，她凑在我脸上说：「我乳头上还系着绳子呢，我把它解开。」我问她：「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轻声地叹了口气，告 诉我那群看守们在乳头上拴上铃铛、小瓶子甚至酒瓶子取乐，把不服从不听话的女人拉到树下站着，把乳头上的两根绳子吊到头顶上的树杈上。到夜里睡觉时，把两 三个女人乳头上的绳子系在一起，或单独系在床头或床脚上，防备女人逃跑。「为什么放我回来？他打你没有？伤在哪儿了？」阿莲问我。「我吓坏了，一个看守告 诉我，就是那个混蛋一棍子把一个人的腰打断了。我真担心你这一夜，不知怎么过呢，他喝醉，我不敢求他，他把你送走又回来说要放我，我不信，他真的解开我的 手脚，我才害怕，以为他们把你打坏了，回来看见你在院子里，我才放心。」

一 个乳头上的绳子解开了，她伸手到我的口袋里掏烟，意外地发现了那包烟，问我是从哪儿弄来的，我说是那混蛋给我的，她不信。点了支烟给我后，她用一只手揉着 刚解开绳子的乳房，一边告诉我，她知道我只有一两支烟了，本想在那个混蛋进屋去拿她的衣服时，去吃饭的屋子里为我拿些食物和几支烟回来，但一个看守正和两 三个女人在屋里胡闹。她又去解着另一个乳头上的绳子，又追问我那个混蛋为什么给我烟，我对她说：「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也得把你被带走后的事都告诉我，同 意不？」她点了点头。当我讲完了以后，她突然抱住了我，在我的脸上亲了几下。我对她说：「该妳讲了。像我一样实事求是地说。」她不说话，只是把头贴在我的 脸上。我知道她是开不了口，但是我希望她能说

出来。我能活着的希望已经很渺茫了，但是万一，也就是说万一我能活着出去，我会把这一切都说出去，都揭露、写 出去，让共产运动的死灰永远不能复燃。

终 于，她讲出来了。她被揪着头发被带到前院，被推进北屋里的一个小房间。由于有了昨天的经验，她自己脱光了衣服，然后从一个小柜子里拿出了一长一短两根铁链 和四只锁头，用长链把自己的双脚锁上，规定是：如果没有锁上脚或锁得不紧就走出小屋的话，要挨打或受惩罚的。下一件事，就是拿着短链子和另外的两个锁头走 出去，到院子里的水池边去洗澡。但是，今天不同，她是被提前了两个多小时提了出来的，而这个时间正是小院子最忙，也是人最多的时候。门洞的南边是个大厨 房，那十多个囚徒正在进进出出地刷锅洗碗，扫地倒垃圾，又在给看守们准备着晚饭，大部份看守都已经下班回家了，只有值夜班的四哥看守留在这里，他们都在院子的北边坐着，抽烟喝茶聊天，还时不时地大喊大叫着，给那些干着活的囚徒们下着命令。

昨 天，她和十几个女人一同被提出来的，天仍亮着，但太阳已经下山了，院子里除去四个值班的看守以外，只有两个囚徒仍留在那里，这两个人是伺候看守们喝酒吃饭 和被差遣驱使的。十几个女人同时脱光了衣服，然后轮流着在水池边洗澡，轮流着进小屋去吃饭。尽管阿莲是第一次，但与一群女人在一起，大家又全都一样，所以 还不是感到太难堪。

今 天不同了，将近二十个男人，太阳仍在西边的天空照耀着。尽管她做了几年妓女，但就这样让她赤身裸体地出现在大庭广众之前，她仍是做不出来的。她站在屋子 里，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那个混蛋在院子里叫她了。她答应着，但没有走出去，那个混蛋进来了，一眼看到阿莲赤裸的身体，他高兴了，兴致勃勃地找来了绳子 系在了阿莲的两个乳头上，又锁上一只手，然后让阿莲出去。阿莲用手指着院子里走来走去的人群，低下了头。那混蛋马上喊叫了起来，又用一只胳膊夹起了她走到 屋外，把她扔在了水池边的地上，又嚎叫着命令她站起来。这混蛋拉过一个凳子，坐在阿莲的旁边，又用一根木棒触击着她的私处，喊叫着指挥阿莲洗澡。院子里所 有的视线都集中了过来，另外的两个看守哈哈大笑着，说着极下流的话。

阿 莲实在忍不住了，双手捂着脸哭了起来，这一下触怒了那个混蛋，他抡起木棒重重地打在了阿莲的屁股上；阿莲摔倒，哭声更大了，混蛋又举起了木棒，另一个看守 在他耳边说了几句什么，于是，两个混蛋蹲下来把阿莲的双手拉到背后锁了起来，又一起夹着阿莲走到那棵刚才吊过我的小树前，让她面向南站着，然后把她两个乳 头上的绳子高高地系吊在两根树杈上。就这样，阿莲的身体正面一览无余地展现在那十几个囚犯们的面前。直到囚犯们干完了活儿，被送回监

狱才放下阿莲。说到这 里，阿莲停住了。我问她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她搂着我的头无可奈何地说：「别问了，反正都是女人受的罪。」我冒火了，想问问她，这个罪究竟是天下女人都该 受，还是只有中国女人该受。阿莲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事，她坐起来，伸手到我背后去摸我的手和胳膊，又把脸贴在我的脸上，半天才轻声问我：「要是这样锁你十 天的话，你受得了吗？」我知道她一定是听到什么，且肯定不是好事，我振作一下，听她继续说下去。

就 在我受了那场侮辱后，她回到了北屋，一个喜欢她的看守把她拉到桌边坐下，一边安慰着她，一边大骂我，说阿莲是受了我的牵连，并且提到我可能有什么背景，或 者是牵扯着什么大案，现在正在调查；午饭后李所长就是为了我的事出去了，临走前还嘱咐看守们不要放开我。这看守又问阿莲听到过我说过些什么没有，又让阿莲 想办法套出我的实话，随时报告给他，于是阿莲就立了功，不但马上释放，而且还有奖励。阿莲问他大约要调查多久，回答是三、五天，十天、八天没准儿。下边的 话是只要没把他押送到别处，就得锁着他，否则出点什么事，谁敢负这个责任？

阿 莲告诉我这些，我一点儿也不吃惊，我已经想到了，就在这一两天，只要那两个便衣一露面，就是押解我去北京，最多我还有三、四天这样的日子，比较到了北京以 后的情形，这三、四天就是我最后的好日子了。阿莲看我没说话，为我点了支烟，又趴在我耳边说：「我不会帮他们做事的。」我笑了一下，点了点头。虽然我们认 识不过四十个小时，但这个女人绝不是那种类型的人，这个把握我是有的。

阿 莲很难过，不断地抚摸着我，又喃喃地说：「锁锁女人还可以，整天整夜地把个男人这么锁着，会锁出毛病的。」听她这样一说，好像提醒了我似的，立时两肩的酸 疼、两条胳膊沉沉的和麻木的双手都一起向我袭来，我忍住没有去挣扎。阿莲又说，明天她去求看守把我的手锁在前面，或者白天不锁，只在晚上锁我。我对着她的 耳朵严厉地说：「胡说！你不知道我是谁，更不知道我的事，你多说话只能帮倒忙，记住没有？」她睁大眼睛看着我，点着头。看到她有些慌乱，我的心软了，她这 一晚上受的太多了，我应该安慰她，对她好一些。我想起了那个混蛋说的，明早有一批人送农场的事。我告诉了她，问她是不是也走，她叹了口气说：「我知道。他们不让我走，他们说一屋必须留一个女人，正好我可以照顾你，女人到哪儿都受欺负，跟着你，起码白天没人敢欺负我们。

那 两个女人说，咱们俩来之前，她们天天都受这屋里人的欺负，还有几次被一群人扒光了衣服……。」屋里已是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尽管不知道时间，估计也该是 午夜了，我让阿莲睡觉，她没有动，仍把头放在我的胸前。突然她问

我：「你为什么要那个混蛋把我放了？你怎么不要他把那两个女人也一块儿放了呢？」我以为她 在抱怨我为什么不去帮助别的女人们，我马上向她解释说：「我一个人面对一个庞大的体系，只好做力所能及的事了，妳是受了我的牵连，那个混蛋已经不是人了， 加上又喝了酒，妳又死活不告诉我那个罪是什么，会怎么折磨妳，所以我有责任去想办法解脱妳。帮助妳，也能使我心里多少好过一点儿。其实，我也没想到那个混 蛋会这么痛快就把妳放了。刚才妳已经告诉我了，我也看到了，今晚妳受的太多，肯定还有些什么没告诉我，我只想说，今晚你受的一切都是因我而起，是我对不起 妳。假如有一天，妳我还能再见面的话，我会求妳一件事，给我个机会让我弥补妳今晚受过的这些，妳同意吗？」

我 刚说完，她抬起了头，移动了一下身体，一下子抱住了我的头，并紧紧地贴在了她的胸前，又在我的头上亲着。我不知所措地要把头移开，但她搂得更紧了。她的身 体发热，心脏跳动得很快。我明白，她是女人，受了委屈，受了痛苦，她需要安慰、抚爱、同情和温柔。这个时候，如果我能给她一个拥抱，或者去抚摸她的头发、 双肩和后背的话，她会平静下来的，如果她能再哭出来，她会觉得好一些的。我本能地动了一下双手，但那根铁链无情地提醒我，就是这么一点点抚慰都给不了她。

她 发觉了我的这一动作，马上用一只手去抚摸我的双手，手腕和胳膊，并凑在我的耳边，劝我不要想着被锁着的双手，忘掉它，就不会感到难受了，不会锁一辈子的。 我感动了，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小女人，现在需要安慰的是她，可她却反过来安慰我，把我刚想到的几句安慰她的话也忘了。我仰起了头，想对她说我不难受，我 会习惯的。我还没张口，发现她收回了抚摸着我的那只手，把手放进了衬衫里，在胸前轻轻地揉动着。我问她：「怎么了？是不是他们折磨你？伤了你？」她没有回 答，我又问了她一遍，她轻轻地撩起了衬衫，松开了胸罩，用手指着她的一个乳头说：「看，肿了。」

屋 里黑乎乎的，我根本看不清。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是绳子勒的，那个混蛋捆得太紧。我问她是不是很疼，她说现在不太疼了，只是肿，痒得难受。刚才她解绳子时用 了很长时间，而且很费力，一定捆得很紧，血液不能流通，神经也麻木了，当绳子松开后，血液慢慢可以流通，神经也逐渐恢复了，当然有不适的反应的。我对医学 是一窍不通，不禁有些担心起来，怕她今后会落下什么残疾。

她 把身体移近了我的脸，突然把乳头放进了我的嘴里，又紧紧地用手搂住了我的头。然后在我耳边说：「吃它，我会好过一些。」我没想到她会这样做，一时有些慌 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又怕被别人看到，本能地要抬头去四周看看。我的头刚一动，她马上松开了那只抱着我的头的手，乳头也从我的嘴里滑落了出

来。她对着我 的耳朵说：「你嫌我下贱，因为我是妓女。」我愣住了，马上仰起了头，对着她的脸说：「你错了，让我对你说句实话吧，在那群畜牲混蛋们的眼里，天下女人都是 妓女。在我的眼里，妳是一个好女人，一个伟大的母亲。」说完，我低下头去，用嘴去寻找那乳头，含在了嘴里。

她的手又搂住了我的头，过了一会儿，低声问我：「你说的是真话？真的认为我是个好女人，好母亲？我认真地点着头。」她的身体轻轻地颤抖了起来，几滴水珠掉在了我的脸上和头上，她无声地哭了。我没有动，仍含着乳头，没有说话，也不想去劝她。让她哭吧，哭 出来，她会感到好一些的。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她轻轻地移动了一下身体，把另一个乳头放进了我的嘴里，并开始不停地抚摸我的头和脸。我感到她已平静下来 了，心里轻松了一些，渐渐地，我忘掉了我是在什么地方，也忘掉了被锁在背后的双手，睡意笼罩了我，我就这样含着乳头睡着了。

睁 开眼睛时，阿莲正看着我。见我醒了，她笑着说：「睡得真好呀，再不醒的话，我就要叫你了。刚才看守来说今天开饭早，汽车来了，所有人都要送到农场去。」我 似乎没有听懂她说什么，刚想举手伸个懒腰，那根铁链阻止了我。立时我的情绪变得坏极了，我使劲地挣扎了几下，阿莲马上一边拉我起来，一边去握住了我的手， 低声地劝着我，又嘱咐我说：「一会儿到了院子里，如果那个看守找你麻烦，还是千万别说话，什么也别说，让我对付他。」这时屋里乱哄哄的，人们都大声地说着 话、笑着。他们盼着去农场，去了农场就自由了。阿莲把一支烟放在我嘴上，猛吸几口后，我平静下来了。

门 开了，我们来到院子里。阿莲拿着两碗饭，一边喂我，一边往她自己嘴里扒着饭。然后又匆匆推我去厕所，她解开我的裤子让我撒尿，帮我穿上裤子后，她让我用身 子挡着她，她极快地蹲下撒了尿，又迅速地站起来系上裤子。她又推着我去了水池边，匆忙地刚喝了一口水，那刺耳的哨子声又响了起来，人们便在一片嚎叫声中又 被赶进屋子。这次屋门没有关，每个屋门外边都站着两三个看守，一个看守走了进来，喊叫出一个又一个的号码，被叫到的人高兴地一个一个地到院子里排队，估计 喊了三十个号后，门被关上。院子里又响起了一阵嚎叫声，于是站在院子里的人就一个一个地从那个小铁门消失了。

同 屋的那两个女人已经回来了，正匆匆地和阿莲说着什么。我问她们是不是也走，两个女人高兴地点着头。阿莲马上为我点了支烟，我问那两个女人阿莲是不是也一起 走，那个来了两个星期的女人似乎是叹了口气，低声对我说：「凡是来到这里的女人至少也要被留住一个星期不让走，阿莲是好人，她会照顾你。」阿莲凑上来说： 「她们给你拿来几支烟，还有些吃的。」我只是摇摇头，什么

也说不出来。一个人走近了我，要求我让他抽几口烟，我点点头示意他把烟拿去，他刚伸手，一个女人 一把把烟从我嘴上拿开，对这个男人说：「你这种人，就不给！」然后又对我说：「就是他，一天几次伸手到我 衣服里摸我，还有一次他把我按在墙上，几个男人上来扒光了我的衣服，幸亏有个人上来劝阻，否则我就被他们轮奸了」。我看着这个人，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这 个人却说话了，他对三个女人说：「妳们这群臭婊子，想我干都不干你们，我出去找好的干。」我猛得站了起来，大声地对这个人喝道：「你这个混蛋！给我住 嘴……」

突 然门碰的一声又打开了，一个看守进来喊号，一场冲突避免了。又是三十多人走了出去，那两个女人也在内。门关上后，屋里顿时显得空荡了。我数了数，仅剩下不 到三十个人，他们都显出了失望的神色，躺倒在炕上谁也不说话了。只有那个五十岁左右像农民的人，大声地咳了一声，说又要等两三天，都快饿死了。阿莲和我靠 墙坐着，她的手一直握着我的。我知道她的心情与这些人是一样的，巴不得离开这个地方，这些人仅是个饿肚子的问题，而阿莲是要每天晚上被糟蹋。想到这里，我 握住了她的手，她看着我，笑了笑。

我 犹豫着，想不出该对她说些什么才好，突然问她：「好一点儿没有？还疼吗？」她不明白地看着我，我用眼睛向她胸前示意着，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对我的耳朵说： 「你睡着了都不松嘴，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拔出来的。」说完，她像是想起什么事似的，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包子，是那两个女人带来的，一边喂我吃，一边告诉我那 两个女人的身世和遭遇。阿莲以前并不认识她们，可仅两天的时间，她就能像是在讲述着自己的事一样地说着她们的事。

气 温升上来了，屋里又闷热起来，光坐在这里，我就已经开始出汗。门又被打开了，屋里的人被一个一个地喊到院子里，最后只剩下我和阿莲，看守出去了，门没有 关，院里乱哄哄的。我对阿莲说：「敢不敢出去？混到人群里，去试试。」她惊慌地看着我，拼命地摇着头。如果我不是被锁着，我肯定会的。女人胆小，在这种事 上，她不敢，我也不能再多说什么了。

那 个刚才喊号的看守又进来喊了阿莲的号，我赶紧用身体去推她，催她快走，她看了我一眼出去了。立时我感到一身的轻松。这四百人一会儿到了农场后会马上通知在 广州的亲朋好友，快的今天傍晚，慢的明天清晨，钱送到了他们就全自由了。每人二百，就是八万块呀。可是，在这四百人中，有多少无辜的人，有多少是真正的罪 犯，那就不去管了。无辜的人只好自认倒霉，犯罪的人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好年代，因为政府人员都贪赃枉法，钱这个东西的力量已变得无穷无尽。

门 开了，阿莲进来，手里拿着一把扫帚，一个看守也跟了进来走到我面前，对我说：「现在打扫卫生，门要开一会儿，你不准出去，我就在门外，你不要给我找麻烦， 我也不给你麻烦，怎么样？」这是这两天来，我第一次听到一个看守是在说话而不是在喊叫。我冲着他笑了一下，答应了。阿莲已经在动手清扫着炕上、地上的垃圾 和脏物。看到看守出去了，她对我说：「他们不放我走，每屋都留下一个女人，把我们叫出去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清理屋子，等我把垃圾扫出去后，他们就锁门，然后 从窗口送进胶皮水管把屋里用水冲干净，正好我给你洗澡洗衣服，你身上都有味了。我偷了他们一块肥皂头，我给你好好洗洗。」

说 着，她让我坐到已打扫干净的地方，看着她利落认真地干活的样子，我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感觉。屋里尘土飞扬，垃圾被清理到门外。阿莲脸上淌着汗水回 来，那个看守伸进头，看到我仍在，于是锁上门。阿莲给我点了一支烟，坐在我背后，用手摆弄着那根铁链，对我说：「我真不知道怎么才能脱下你的衬衫。」

一 根水管从窗口伸了进来。阿莲跳起来去接，又和窗外的人说着什么，然后把水管拉了进来，管子里喷出了清水，阿莲脱下鞋子，一只手拿着水管，另一只手拿着扫 帚，冲刷着墙、炕面和地面。清水终于冲走了屋里的臭气，同时也带来了一阵清凉。阿莲脱下我的鞋袜，又掏出烟和那五十块钱放在鞋里，脱下我的长裤，让我站在 门边，她站在了炕上，褪下我的衬衫，然后我从头到脚都被水浇透，接着又被涂满了肥皂，又用同样涂满了肥皂的衬衫搓洗着。皮肤上的油脂洗净了，马上就感到清 爽了。阿莲从我背后一把拉下我的内裤，我拒绝着，她不理我，用涂满肥皂的内裤擦洗我的下身，洗净内裤后，又从背后帮我穿上，我难堪极了。可她自始至终一句 话不说。终于她抬起了头，上下打量着我，满意地说：「好了，总算把你洗干净了。」她把衬衫拉到我的肩上，然后蹲在地上洗我的裤子和袜子，洗好后，又帮我穿 上，湿衣服穿在身上并不好受，但在这种环境里，又加上如此的气候，能够得到这样的一次彻底的清洗，确有如上天堂之感。

阿 莲让我背过身坐在炕上把水管放在了我的手里，对我说：「坐着别动，也不许回头看，如果你回头偷看我，我一定打你。」我笑着向她做了保证。水从我手中的管子 流出，地面上的水顺着门缝流到了屋外。我看着这屋子，第一次发觉它是那么大，那么空旷，墙上的水迹已经干了，外边的热浪一阵阵地向屋里扑来，炕面上的水也 快干了。背后阿莲那哗啦哗啦、没完没了的水声也终于停止了。

穿 着一身湿衣服的她，一手梳理着湿头发，一手接过水管，让我尽量地喝水，然后走到窗口叫着什么人，我也走近窗口。院里有四个囚犯也在用水清洗地面，一个看守 站在对面屋子的窗前，正嬉皮笑脸的对里面说话。一个囚犯来到我们的窗前，一边往外拉着水管，一边小声告诉我，今早两个警察用手铐把一个与我同屋的人带走 了，还有大约四十多人是集体送到监狱去的。据他说监狱也一样收钱放人，只是比农场要的钱多好几倍，阿莲问他这里还剩下多少人，他说现在就只有我们五个人， 中午就会再有一两百人送来，反正两三天这里的人满了，再往农场送，整年都是这样。

院 里静了，小铁门也锁上了。坐在我身边的阿莲轻轻地叹了口气，对我说：「女人总有吃不完的苦，受不完的罪。你说的对，等我出去后，什么也不干了，回家和儿子 女儿过日子，过上几年，能遇上个好男人就再结婚，没那个命，我就一个人过了。」马上，我由衷地赞扬她的这个想法，并肯定她会遇上一个好男人的。她很认真地 问我：「你说，我是好女人。我是妓女，你为什么说我是好女人？」我对她讲起了做人难，做好人更难的道理。做好人就不能做坏事，这很难，可好人做好事也不容 易，好人做了他认为是好的事，可有的人就不这么认为，就说他做了坏事，于是好人也要遭殃。只要凭良心去做的事，就是好事，这个人也一定有好结果。说着这番话的时候，我注意到她听得很认真，而且不断地点头。我知道她全听懂了。

我 又提到了她所在的当地政府，在处理她丈夫死亡一事上的不负责任的做法：没有给她安排一份工作，可以让她自立；又不负责把两个孩子抚养到十八岁；加上一场洪 水，政府不救济，逼着她带着两个孩子外出逃荒。她一心要把孩子养大成人，可又被那个老板坑骗利用，被逼良为娼。幸亏遇上了校长，校长可以帮助解救两个孩 子，但却不可能帮她解决工作、收入和经济问题，为了孩子们的教育，也为了孩子们不受影响，她毅然远离孩子们，以身挣钱。一个孤独的小女人为了这个目的，做 了妓女又怎么样，是社会和环境把一个好女人、一个伟大的母亲逼做了妓女。最后我对她说，像这样的妓女是好女人，更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把这一点牢记在心里，不要管别人说什么和怎么看待她，相信自己的心，就什么都不怕。

我说完后，阿莲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对我说：「从来没有人说出的话能说到我心里去的，你说的我都懂。这么说，我是个好女人，我是个好母亲？」我肯定地向她点了点头。她有些激动，两眼看着前方，又在沉思着什么。我没有去打扰她，享受着这一刻的宁静。

一会儿这屋里又会充满着嗡嗡的人声，又会臭气熏天。想不到我也会坐牢；其实想是想到过，只是没有把想象变成现实，更没有想到在我的生命走向终结前，还会遇上了一个女人，受到她的关心和照顾，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这时，我听到阿莲像是自言自语似的说：「我真不知道，是希望中午有女人被送来好，还是没有女人被送来好。」我问她为什么想这个问题。她叹了口气，告诉我，今早看守们让那两个女人传话给她，那就是如果有女人被送来，她必须告诉她们该怎么做，怎么去服从，否则受什么样的惩罚。如果她不告诉，看守们就惩罚她；她告诉了，而新来的女人不服从，那就只惩罚新来的女人。她发愁的是，一会儿有女人被送来了，她怎么对她们说？即便女人之间是无话不说的，但这些事是说不出口的。我想了想，只好对她说：「咱俩来的那天，这间屋子里挤着九十二个人，那天那两个女人是怎么告诉你的，今天你也只好怎么告诉别的女人了。」她沉默了一下，又问我：「你刚才说，我做妓女是被逼的，所以我还是个好女人。可我告诉了她们这些，那不就是帮坏人做坏事了？我不就成了坏女人了吗？」

她的话证实了我对她的评价：她是个好女人。她默默地忍受着侮辱，由于没什么文化，于是把这一切都归结到命不好，命中该受的。同时，她又不愿意别的女人受到这些，谁又能说这不是贤良者的思维？人性中的善良？我有些感动了，举了一个例子去问她：「如果这时一个看守把一根铁链和两个锁放在妳面前，命令妳把我的脚锁上，妳锁不锁？」

她摇着头说不。我接着说：「妳不锁我，他们会惩罚妳，同时他们仍会把我锁上，妳没有给他们出主意教他们或让他们来锁我，妳没有想锁我的打算，可他们是打定主意要锁我，妳是被逼来锁我的，不是帮他们来锁我，就如同做了妓女是被逼的，而不是妳自愿的，所以你仍是个好人。」她听懂了，她对我说：「我明白，坏人逼我做坏事，我自己永远也不会去做那种事的，所以我不是坏人，对吗？」我笑着，点着头对她说：「都是受害、受苦，再没有互相同情，互相帮助，这个世界不就全由着坏人折腾了？」阿莲让我侧着身子躺在她的腿上，她从我的肩头开始，一下一下地做着按摩直到每个手指头。已经一天一夜了，我的双肩已经麻木，胳膊也是沉甸甸的，我自己也摸得出来，手和手指头有些肿大，那种急躁与烦闷的窒息时时地侵袭着我，尽管我在努力地抑制它，但仍然不由自主地挣扎着双手。她摸着我的脸，柔和地说：「让他们锁，反正不能锁一辈子。善良的人永远想象不出恶人的心理，所以恶人的阴谋总能得逞。」我看着她正要说话，院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口哨声。阿莲跳起来跑到窗口，双手伸向窗外打着手势，一会儿回过头来，对我说：「那三个女人问你走了没有，又问你的手是不是还锁着。」说完，她又转过头去，一边打着手势，一边笑着，听着她的笑声，我的那种烦躁和窒息的感觉开始消失了。

恢 复了平静后，我开始注视着她正在挥打着手势的背影。这时的她，就像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一样，她那瘦小但却是结识而俏丽的身材，使人不难猜想到她是个生长于 农家的女人，如果不是她那丰满的臀部和那对坚挺诱人的乳房，是不会让人想到她已是个做了母亲的女人了。这个时间，她应该在家里，正在为两个马上要放学回家 的孩子准备着午饭。她根本就不属于这种地方，她应该有家，有丈夫，一家人过着虽然清苦但却是欢快的日子。夜晚，她应该依偎着丈夫，向他展现自己的那诱人的 胴体，而绝不是在这里被那群畜牲们侮辱、折磨和糟蹋。

我 突然想到了我的大阿姨。她还不到二十岁时，就被投进监狱，整整被侮辱和折磨了十五年。女人生活在这种制度下，所遭受的苦难更大。可是我的太太应该是幸运 的，为什么她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呢。尽管我没有证据，但我相信我现在的处境完全是她一手造成的，她不配做我的太太，更是玷污了副教授夫人这个受人尊敬的称 呼。我还想起在阿海家的第二个傍晚，我和阿海太 太、阿芝正在边说笑边吃饭，由于快到新闻时间，阿海太太打开电视，正好又是那个三流嚎歌的女人正在尖叫着：「党啊，就像妈妈一样……」我当时也不知是怎么 回事，对着电视机喊了一句：「住嘴！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阿海太太惊慌地看着我，马上关掉电视。天哪，共产党哪一点能够比得上阿莲这一个女人？

这 场女人间的打手势的聊天结束了。阿莲为我点了支烟，坐在我的身边，对我说：「她们知道你被锁着手不好受，让我好好照顾你，尽量让你高兴。告诉我，怎样才能 让你高兴？不管你让我干什么，我都会做的。」我看着她，对她说：「看到妳刚才那么高兴，我就已经很高兴了；妳又为我点了支烟，我就更高兴了；我什么也不让 妳做，能和妳说说话，我已经满足。」她笑了，又让我侧身躺下，把我的头放在了她的腿上，又用袖子擦去我头上和脸上的汗水，然后把手伸到我的背后去抚摸着我 的双手和手腕。我闭上眼睛，享受着这种爱抚和她身上发出的女人的气息。她突然把脸贴近我，几乎是耳语般地对我说：「告诉我，你想不想玩我？现在这里只有我 们两个人，想的话就玩。」我大声地说：「不！」她马上紧紧地搂住了我的头，并在我头上亲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她又安慰我说，反正不能这样锁我一辈子的，要 我不可以急躁，也不要挣扎以免伤了自己，又说我身上已经没有汗臭味了，肥皂味仍很重。她突然问我会不会唱歌，没等我回答，她就告诉我，在她的家乡，几乎人人都会唱歌，她从小怕羞，所以从不唱的，待到长大了想唱歌时，却又早早嫁了人，做媳妇就要守做媳妇的规矩，否则就会被相邻们说出不好听的话来的，所以她一直都不会唱歌。

当 我笑着问她，做媳妇应该守些什么规矩，她马上很正经地说：「爱丈夫、帮助丈夫多干活，让丈夫高兴。」我又问：「妳说的这个让丈夫高兴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刚 才说的让丈夫『玩』妳？」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并在我的胳膊上打了

几下。我开始教给她夫妻、感情、爱、夫妻生活、性生活和做爱，这些字词的意思，并要她以后 再也不要用「玩」这个字。玩女人，是对女人的轻贱、侮辱，也就是以为女人应该受折磨和被糟蹋，就如同那群畜牲对待女人一样，那是错的。

当我看到她的脸红了时，我知道她懂。我又给她讲做女人也是有权利的，即使是做妓女也同样，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花钱买的，如果一个男人有病，或太脏，或神经和行为不正常，哪怕给再多的钱，妓女可以拒绝提供服务。

我又告诉她，以后也再不要说什么都是「女人该受的罪」这种话了。对于一个女人不喜欢或不愿意的事，就可以拒绝，不要认为做了女人就应该忍受一切，这是绝对错误的，人有人的尊严。我问她，像我这样被锁着双手是不是就是我该受的罪呢？她马上摇头。

我 又接着讲，像她们在前院所受到的一切也同样不是女人就该受的罪，那些看守都是畜牲，所以人们受罪。从她的眼里，我知道她也明白了。于是我再次建议她在获得 自由后，不要再干了，马上回家与儿女团圆，有时间学读书认字，等她能读书后她就会知道我说的这些书里都有的。她高兴了，又亲了我一下。我也高兴了，坐了起 来，笑着让她叫我一声老师。她马上高兴地叫了一声老师，又双手抱住我的头，在我脸上亲了一下。我马上板起了脸，做出生气的样子，说她这是对老师不尊敬，并 要她给我点支烟，请求我原谅她。她笑着把半支烟放在我的嘴上，点燃后，又亲了我一下。

她 把两只手搭在我的脖子后边，把头紧贴在我的胸前，不时地轻轻地移动着，她也在享受这一刻。我不想去打扰她，所以我把头轻轻地靠在了墙上。不知过了多久，她 抬起头来看我，当我们的目光接触时，我看到她的双眼含着泪，我笑着问她在想什么，她一下子扑到我的肩上哭了起来，这一次是出声地哭，我知道她经受的太多 了。我用我的脸贴在她的头发上轻轻移动着，并亲吻着，轻声对她说：「哭吧，哭出来就好了，痛痛快快地哭吧。」

她 哭得浑身颤抖，而我竟不能搂抱她。终于哭声停止了，又经过一段时间不长的抽泣后，她抬起了头，两眼直直地看着窗外。我轻轻地问：「感觉好一点儿了吗？愿不 愿意告诉我，在想什么呢？」问了几遍，她才把视线转向了我，小声地说：「我怕……，我是怕今天晚上……，我真受不了那个罪。」说到这里，她又趴在我肩上哭 了起来，边哭边断断续续地说着什么，但她讲的是家乡话，我一个字也没听懂。我几次要她告诉我是什么样的罪使她如此害怕，她都没回答。

最 后一次，她用力地在我肩上摇着头，女人有时就是这么难对付，我开始不耐烦。在她恢复平静后，我又一次问她，她仍摇头，我冒火了，用严厉地声音对她说：「站 起来！站在我面前，把衣服脱光！」她抬起了头，惊慌地看着我，慢慢地站了起来开始脱衣服，在她一件一件地脱掉衣服的同时，我用眼睛在她身体的每个部位搜索 着，直到她完全裸体后，我完全明白了，她的乳房、肚子、阴部周围和大腿的里侧布满紫红色的印子。转过身子，屁股上、后腰部也都是同样的印子，这些印子都是 被手掐、拧、抓出的，绝不像只是受刑、被打而造成的。当我问她时，她点头同意我的猜测是正确的。我又仔细地看了她的两个手腕和脚踝，让她穿上衣服，坐在我身边。

我 开始坦白地对她承认，我从没有接触过虐待狂或心理变态的人，而且也从没有读过这方面的书，我所知道的也不过是从小说中的一言半语中透露的一点东西。确实有 这种不正常的人，对女性有反常的情结，不是想去爱抚、触摸，而是去折磨，直到造成伤害后，他们才得到满足。为了欲望，他们会做出许多正常人根本无法理解的 事情来，尤其这群人天天接触不同女人，仅仅是强奸或轮奸女人在他们已是极平常的事，根本构不成刺激，于是就不断发明新的方法。他们都这样做了几年了，甚至 更长，他们把这些做法已不知不觉地认为是正常的，而且还不断地追求刺激和更新奇的满足方法。他们越这样做，就越不正常，也等于他们病得越厉害，就更接近疯 狂了。而阿莲这些女人们都是正常人，理解不了当然就害怕，感到恐惧，也受不了这些，这是一定的。比如，让女人们光着身体，女人们能理解，但把手脚都用铁链 锁起来，女人们不理解，当然吓坏了。

这 群看守的工作就是关人、锁人、捆人，强迫人们待在这里不准逃跑，这是他们的职业特征。尽管她每晚被锁，但她的手腕、脚踝上并没有被铁链勒出的伤痕和印记， 这就证明那群畜牲不是以此来折磨女人，只是出于职业敏感怕女人们逃跑的一种手段。如能明白这一点，也就不会感到恐惧了。但是把女人的乳头栓上绳子，又是挂 铃铛，又是挂瓶子，甚至吊在树上，这不正常，把女人浑身都掐出伤来，更不正常。这些人是畜牲，干出的事当然不同，怎么办？只好忍。当知道是落在一群畜牲们 的手里时，就没有害怕的必要。就好像我现在一样，三、四百个人只有我被锁着手，为什么？不知道，也没人告诉我，我能怎么办，只好忍。但该说话的时候一定要 说话，就好像昨天傍晚发生的那些事，如果我不说话的话，那个混蛋很可能吊我一夜。

阿 莲冲着我点了点头。我相信她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了，于是我又对她说：「如果他们掐你，或像昨天把妳的乳头捆得那么紧，妳可以说话，告诉他们你感到疼，不一定 准有用，但可能会有用的。我们到了这个地步，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尽量去忍受，二是忍受不了，只好去死了，对不？」她没有回答我，而是扑上

来抱住我的头 亲了我一下，然后好像是自言自语似的说：「我还是希望你少说话，不知为什么，你对他们说话我就害怕。」

也不知是什么时候，院里的小铁门打开了。接着就是看守们嚎叫的声音及嘈杂的人声。阿莲跑到窗口去看，一会儿她告诉我有二十个人进来了，一会儿又说有五十个，一会儿告诉我说没有女人；但很快她跑回来紧张地告诉我说有两个女人，然后又回到窗口去看。

终 于门被打开了。在一片叫声中，一群人涌了进来，总共十七个人，其中包括一个女人。一个男人拉着她，向我这里走来，在离我大约一米远坐下了，那女人把头靠在 了那男人肩上。阿莲紧紧靠在我的身边，一只手在我的背后抓着我的手。我正在打量着这些人时，一个满脸带着一副浑不讲理的样子的年轻人，声音拉高了对我说： 「给我一支烟。」我看看他还没说话，阿莲已经对他说：「晚上这里有人来卖烟，四块钱一包，你可以买。」这个年轻人站了起来，指着我衬衫口袋里的烟盒，又 说：「给我一支就好。」我示意阿莲拿支烟给他，阿莲摇摇头，坐着不动。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冲着我瞪起了眼睛，大声地对我说：「我找你要烟，没找她要，你给不给？」全屋子的人都看着我。阿莲动了动身子，我抓紧她的手，然后问那位年轻人：「如果我不想给你，你打算怎么办？」

那 人马上向我跨近一步说：「那我就自己动手，反正我已在这里了，再抢包烟也加不了我什么罪。」说完，又向我迈近一步。我慢慢站起来，又转过身去，把被锁着的 双手向人们动了动，然后我又转过身对着这位想抢烟的英雄说：「如果你也想被锁起来的话，太容易了。」我转向阿莲，对她说：「去叫看守，就说这里有人抢东 西！」

阿 莲刚一迈步，这年轻人马上挡住了她。我又对大家说：「我已经这样被锁两天了，什么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开我也不知道。我劝各位都小心一点，一定都看到院 里的铁丝网了吧，昨天一个人被吊在那里差点没被吊死，既然来了这种地方，谁也不要充什么英雄好汉，最好多想想怎么早点出去才好。」

我 又转向那年轻人说：「看起来，你是英雄，不在乎。那好吧，你告诉我，你是想象我一样被锁着？还是想被吊到铁丝网上去？我成全你。」说完，我坐下，对阿莲 说：「给我点支烟，我等着他来抢。」阿莲点了烟放在我的嘴上，又把那年轻人推开说：「大家来到这里，就都是一样的人了，谁也不比谁强。你以为大家都该怕你 吗？还有比你厉害的呢。」这位英雄一句话没说，就走回去坐下了。屋里刚才的那种紧张气氛立时松弛下来，阿莲也坐在我身边，用一只手抓着

我的手。那个带着女 人来的年轻男人突然问我是因为什么被抓进来的、已被关在这里多久、究竟是为什么被锁住双手等等一连串问题。

听 他说话就知道他是上海人。他的问题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等待着我回答。我笑了一下，告诉他我已来了两天了。同时又说这里有规定， 不准互相问对方的案情，我更希望大家谁也不要惹事，都争取早一点送到农场去。因为我听说到农场后，只要花点钱，马上就自由了。听了我的话，不少人都向我点 点头，于是人们又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说起话来。

坐 在水泥炕上时间长了，我的屁股都麻了。我趴在炕上，又把头转向了墙。我看到这对上海男女单独地坐在那里，不与别人交谈，也没有人与他们交谈，两个人都年 轻，看上去不会超过二十五岁；衣着十分入时，在这群人中很显眼。从那个男的刚才问一大堆问题时的态度上看，他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又做出一副完全与他无 关、只是随便问问的样子，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极不诚实、不成熟、可又相当自以为是的当代年轻人。我发现他在看我且似乎想要过来和我说话，马上把脸转向了 墙。阿莲仍坐在我的身边，不停地用双手抚摸着我的胳膊和手，同时又在与几个围过来的人说着话。阿莲长得不难看，说话又和气，男人们是喜欢与这样的女人说话 的。

我 闭上了眼睛，开始考虑一会儿开饭时要不要找那个李所长谈谈。他说他要审问我，我确实需要他的审问；我想从他的话中分析一下他们究竟都知道我些什么。是打算 送我回北京？或者我还有机会留在这里？关在这里实在不好受，但送回北京我就一定没命。至今我的故事还没编出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编才好。我已经给他们两份 不同的说辞了，这对我是极不利的，不能这样胡里胡涂地等待。李所长这种人头脑极简单，只要他审问我，我就可以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全搞到手里，只有这样我才能 决定我究竟该怎么办。

我 决定了，一会儿去找李所长，接着我开始分析在审问中可能提出的问题。阿莲以为我睡着了，摇我让我起来说快要到吃饭的时间了，又把一支点燃的烟放在我的嘴 上。几个人看到我坐起来了，显然是想过来和我说话，我马上又躺下并闭上了眼，继续想我的事。吃饭的时候，我一直在用眼睛寻找李所长，但没发现他。就在我喝 完水的时候，哨子也响了，我正要往屋里走时看到李所长正从我们屋里出来，快步地向小铁门走去。我马上追了上去并叫住他。他有些惊奇地看着我，我不等他说话 马上就问他准备在什么时候审问我。他看看我，又低头想了一下，对我说：「你看到了我是多忙的。送走那么多人，又接来这么多人，明天我又要开一天会。这样 吧，我尽量争取明天晚上审问你，如果不行只好后天

了。」听到他的话我反而高兴，他知道的不多。我谢了他后，又表示希望他能在明天审问我。他点了一下头说他 会尽量安排时间，便匆匆走出去了。

人 们都已进了屋，一个看守站在屋门外正等我，看到李所长走了，他向我喊叫，催促着我。我向他笑了笑，还说了声谢谢。我刚进屋，那位要抢烟的英雄一把把我拉了 过去，有些紧张地问我是不是对看守讲了他要抢我烟的事。我笑了，和他一起坐下，对他说：「事情没发生，我也不想多事，你可以放心的。」他马上对我说了两遍 谢谢，然后又骂看守，就在一分钟前他已经挨了看守的一棒，就因为进屋慢了一点。刚被关进来才几个小时，他的英雄气已全没了。我叫阿莲给我点支烟，她正和上 海女人说话，马上走过来；我又让她给英雄一支。她不情不愿地扔给他一支，又回去和上海女人说话去，英雄脸上露出笑容，又马上殷勤地为我点燃了烟。抽着烟 时，我又嘱咐他千万不要找麻烦，争取早一些去农场，他频频地点着头。

几 个人围了上来。我明白都是要烟抽的，我让一个人从我嘴上把烟拿去，那人马上对我笑，我又让英雄把他的烟传给其它人让每人都抽两口，于是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 笑容。我对大家解释说，烟我还有几支，但我不能再多给大家了。我的手让我难受，我指望着这几支烟帮我度过这段日子的。大家都笑着点头表示完全理解，有几个 人说他们已经问了看守，一会儿有人来卖烟，他们都表示会请我抽烟的。

交 谈到了这一步，实际上就很无聊了。我实在对他们再说不出什么来，于是把头靠在墙上，开始揣测这这些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一个个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可又都像 很有钱的样子，穿着都很入时；那些名牌衬衣、名牌裤子、名牌运动鞋，穿到他们身上，就再也看不出那些都是名牌了。这些人很可能都是干走私的，也可能是贩毒 的。按道理讲无论走私还是贩毒，在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里都是大罪。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些人在这里关几天送到农场后，多花一些钱就又放了，出去继续再干， 再被抓住，就用几天时间把这个程序再走一遍，于是又自由了。国家继续损失，人们继续受害，司法人员却大赚黑钱。政府整天宣传「改革开放政策使一部分人富 裕」，这富裕起来的人民都是些什么人？是贪官污吏，是罪犯，是「执法」人员；真正有知识、技术，辛苦遵规守矩的广大劳动者们怎么可能真正富裕？

第三十一章　江泽民是从我们上海升到中央去的

太 阳还高高的，院里就传来了叫卖声。人们一下子涌向了窗口，我借这个机会回到了我的墙角。上海女人正坐在那里，看到我来，给我挪出了地方。我坐下后才发现， 阿莲也挤在窗口。我问上海女人：「阿莲挤在那里做什么？」她声音很低地说：「她去问问，今晚是不是要提早提我们出去。」我一愣，马上想到阿莲已经告诉她晚 上要受辱的事。

我 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默默地坐了一会儿。那个上海男人买了啤酒和面包回来了，他一边喝，一边吃，又劝女人吃。显然这女人吃不下。窗口已经没人了，只有阿莲 还对着外面的人说着。刚才与我说话的那伙人过来拉我与他们一块喝啤酒，这些人有钱，买的东西堆了一堆。我实在不想去，推辞着。阿莲回来了，推开他们，坐在 我身边趴在我耳朵上告诉我，那个卖烟的囚犯对她说，由于这里关的人不多，李所长让看守们都早回家，只有李所长和另外两个看守值班，催着干活的囚犯们快干，要早锁大门。卖烟酒的囚犯告诉阿莲，每次有新女人送来，只要里面人不多，都是这样。

阿 莲又告诉我，那上海女人不信她的话，因为上海女人说在刚才吃饭时，一个看守已经告诉她今晚要审问她。阿莲这一说，我马上想起李所长在吹哨关门时，是从这个 屋里走出去的，想必这个李所长看中这上海女人了。我没有告诉阿莲。她催我去劝说上海女人，我摇头拒绝。阿莲看看我，又到上海女人面前说着什么。那个男人边 喝酒边对阿莲说着，显然他也知道了。突然听到那个男的声音挺大

地说：「对他们讲，这是违法的……，好了，你们就问问，他们要多少钱，我们付钱好了，……等 我们出去，就去告他们。」

我 一点都没看错这个男人。我借口抽烟把阿莲叫回来说，已告诉那女人了，那个男人又胡出主意，我们没必要再多说什么。我告诉她去了前院后，多照顾一下那上海女 人也就是了。我也安慰了一下阿莲，几个小时前她还在为害怕今晚而哭呢。我说完这些，阿莲很感动，用手在我的胳膊上不停地抚摸着，但女人对女人的同情心终于 占了上风，不顾我的阻拦，她还是把那女人拉了过来。那女人看了我一眼，便低下了头小声问我：「怎么办呢？」没等我说话，那个男人喝酒喝得满脸通红地也过来 了，对我说：「我已经对她们讲了，不要怕，现在社会人人都要钱，我付钱好了，随他们要多少，反正我不能让他们睡我的女人。」我问他：「如果他们非要做，你 打算怎么办？」这人马上说：「我可以和他们讲理，我也可以去告他们。」

听 了他的话，我实在打不起精神再对他多说什么了；没想到他指着阿莲，突然问我：「她是你的什么人？她一定不是你的女人，所以别的男人睡她，你不在乎，对不 对？」我的火气冒上来，对他说：「你错了，她是我太太，正因为你太太也要受到这个侮辱，所以我太太才要我劝劝你太太。既然你已经有了办法去对付这件事了， 非常好，请把你太太带走。现在我要安慰一下我的太太了。」这男人似乎还要讲什么，那女人拦住了他，又问我：「你看我该怎么办才好？」那男人突然把她拉了起 来对她说：「问他做什么？不要问他！」

我 握着阿莲的手刚说了几句话，就听到院里小铁门响了。我赶紧对阿莲说：「记住我中午说的话，同时尽力照顾一下这个女人。」她看着我点点头，又嘱咐我好好睡 觉。屋门被打开了，一个看守喊出了两组号码。阿莲马上拉着那个女人的手，正要走，却被那男人推开了。阿莲回头看着我，我马上对她说：「妳走。」阿莲向门口 走去。

那 男人拉着女人的手，跟在阿莲的后面也向门口走。阿莲出去了，那男人拉着女人在和看守说着什么，只听看守大喊一声：「滚一边去！」接着一巴掌重重地打到男人 的脸上，他向后退了几步，身子靠在了墙上才没有摔倒。那看守一把揪住女人的胳膊，把她拉了出去。当院里的小铁门锁上后，这男人才一手捂着脸，小声说：「我 告你们去。」屋里的人都笑了，但我却开始为他的女人担心了。

我看着窗外的天空，太阳仍在照射着，估计这时也不过五点半到六点之间，到明天早上七点钟，女人们要被整整锁着手脚 13 个小时的，尤其阿莲的一个乳头仍有些肿，也不知道她敢不敢对畜牲们说不要捆得太紧。我真是心疼，没有她在我的身边，我就像缺少了什么一样，心里空荡荡的不好受。自从我的手被锁上后，已是 30 多 个小时了，除了昨晚不到三个小时她不在我身边外，她一直寸步不离地陪着我，照顾我；在她被锁的时候，我却一点儿也照顾不了她。想到这里，我难过极了，那股 烦躁的感觉开始侵袭，我不自觉地两只手又在拼命挣扎，企图挣断那条铁链。但仅几秒钟后，无情的事实使我停止挣扎，头上滴着大滴的汗水。我不想让人看到我现 在这个样子。脸对着墙，我侧身躺下。

那 群人仍在喝酒。由于酒精作用，他们说话音量都很大，我极力地使自己平静，把注意力转向他们的说话声音上。时间不长，一个人把头凑到我的脸前，喷着酒气地劝 我去和他们喝酒，我借口头疼推辞了。那人又把一支点燃的烟放在我的嘴上，我想坐起来向他表示感谢，他拍拍我的肩按住了我，又告诉我如果我想抽烟就叫他，他 会帮我。我刚吸了几口烟，那位英雄走过来，坐在我身边，十分客气地问我，能不能让他也抽两口。我点了点头，他拿过烟去狠狠地抽了两口后，又把烟放回我嘴 上。看起来，他很孤独，仍坐在我的旁边；我抽两口后，让他把烟拿去。他拿去了，很仔细地抽着，但仍没有离去的意思，我实在没有心情和别人说话，于是闭上眼 睛，继续听那些喝酒的人们交谈。

也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人摇着我的肩，还是那个上海男人。他坐在我身边问：「你说，我可不可以去告他们？」我故意问他打算去告谁，他马上说告那些看守们。我冷 笑了一下问他：「那你不等于把江泽民也告了吗？」他似乎没听懂我的话，马上说：「对，对，我可以向江泽民去告他们。江泽民是从我们上海升到中央去的，我们 上海人有什么事都找他，他会帮忙。」我笑着对他说，他的这个主意很好，不妨可以试试。他高兴了，过了一会儿，又问我：「我付钱给看守，让他们替我发封信， 你看行不行？」我仍是笑说这个主意也不错，不妨一试。

他 又高兴了，把头靠在墙上。显然他的情绪好起来了，面对着我，坐了起来很认真地告诉我，他是上海的一家百货商店的经理。在上任以前，那家店总是赔钱；管理混 乱，职工们又懒，而且又偷店里的商品。上级很着急，派出几个经理去这个店，但这些经理又一个一个地走掉了，没有一个人可以管这个店的，最后上级找他去。他 又是如何不想去，致使上级多次请求他后，他终于答应去试一试。他上任后，为职工们买了象棋与一张乒乓球的台子，并派人四处去买了一百多本书，成立一个小图 书馆，职工们大满意，再也不懒，从此也不偷店里的商品，于是商店就开始赚钱了。职工们拥护他，上级又嘉奖他，在上海也出了名，于是许多漂亮的女孩子都在追 求他，尤其这个跟他来到这里的这个女人对她紧追不

放。他没办法，只好放弃其它的女人。所幸的是，他与这女人仍只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并无正式订婚，如果这女 人今晚被奸污的事实被他的亲朋们知道，他是无法再见人的了，而且如果他的上级知道的话，对他今后的提升都会有影响。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又说：「谢天谢 地，幸亏当初没有订婚，否则我这一生就全毁了。」我一直不作声地在听着他这胡言乱语，先是笑，后是气。

这 时，我慢慢地坐了起来，对他的第一句话是：「我真是荣幸得很，能在这里遇到你这样一个大才。」我的挖苦得到了他的感谢和一番谦虚。我的第二句话则是问他， 如果他的女友今晚被强奸了，他打算怎么办？回答是干脆的：回到上海，把她甩了，再找一个。没容我说话，他马上又说他不太相信他的女友会被强奸，理由是这女 人大学毕业，在上海的一家外国人大公司做计算机工程师，这样的女人懂得如何保护贞洁。说到这里，他的话题立即转向阿莲。「你太太一看就是个无知无识的女 人，这种女人是没有什么贞操观念的。」不等我说话，他又开始评论：「你看起来像个教书的，怎么娶了这样的太太？你太太已是被强奸几次了，你打算怎么办？」又是不等我说话，他就已经为我做出了决定：「看来，你只有离婚这一条路可走了。」

面对这样的一个人，我心里为他的女友悲哀着。屋里开始暗起来，可外面才是黄昏，仍是亮的。这个男人的胡说八道，我已无心去听了。突然，我好像听到院子里小铁门响了一下；我正注意听着，屋门打开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看守伸进头来，叫出了我的号码。

我 一愣，在他第二次喊叫时，我才答应，并向门口走去。他喷了我一脸的酒气后告诉我，李所长要审问我。我又一愣，但马上高兴地点着头跟着走出去，同时有些奇 怪，为什么李所长急着找我？走出小铁门穿过了过道，来到前院，我第一眼就看见了那个上海女人一丝不挂地站在那棵小树下，两个乳头被绳子系在她头上的树杈 上。她看到了我，马上低下了眼睛。看守推我走到李所长办公室外面，门是开着的，但里面没人。看守让我站在门外，他向北屋走去。

北 屋的门打开，李所长出来了。当他一只脚还在屋子里时，他回过头对屋里的人笑着说了一些吃红烧肉之类的话，然后就向我走来。他在上海女人面前站住一下，对她 喊说：「想好了没有？」这女人马上向他点点头。他又喊了一句：「不行！再想！」几步进了办公室，待到他坐下后才把我叫进去。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示意我在一 张靠墙的椅子上坐下，也没有对我喊叫，而是以说话的方式，对我讲由于他明天要去开一天的会，不知什么时候结束，所以不如现在找我谈一谈我的案子。我马上笑 着向他表示感谢。他没喝醉，但也没少喝。他打着嗝，小小的办公室马上充满酒气。

他 抽着烟对我讲说我的事情复杂了，原因是每一个被送到这里的人，都有一份随着而来的案情说明；他的工作就是收人和同时接收案情说明，把人看好不要跑掉，然后 等上级通知，再把这里的人一批一批地分别送到不同的农场或监狱。我没有案情说明。他讲这种情况以前发生过，一般是两种情形；一种是往这里送人的部门忘了或 丢了，通常发现后让送人的部门马上补送上来；而另一种情形则是被便衣警察逮捕后送来的人一般没有案情说明，因为案件重大或需要保密的原因，这样的人送来这 里不过半天或一天就马上会被转送走。在我被转来的当天，他就已经发现我没有案情说明，他立即打电话问派出所， 对方说马上查找，但很快打回电话来说他们找不到，而且也不记得抓过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让他去便衣部门去问问。说到这里，他告诉我，凡是牵扯到便衣部门的案 子，按规定这个被捕的人必须单独关押，而且必须戴手铐。由于当天他忙，把我给忘了。隔天一早我找他谈话，等于是提醒了他，他马上下令锁我。下午，他去便衣 部门同样也没找到我的案情，于是便衣又通知派出所，两边都在找。

说 到这里，他问我是在什么地方被捕的和被什么人抓的。我告诉他中山路，但没说是中山五路，并告诉他是便衣抓我的，但没告诉他抓我的原因。他马上又接过来说， 昨天在便衣部门就有人建议他去安全局查问一下，但由于他今天忙，明天开一天的会，所以只好后天去安全局查找我的案情。当他说到这里，我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我知道那两个抓我的人是国家安全部的便衣，而李所长要去的是广东省安全局或广州市安全局，我给他们的个人资料是：阿尹。四十五岁。从上海来。所以即便他通 过市和省的安全局去查我，也查不出来的。我的目的是在广州拖时间，现在可以说这个情形正在拖着时间。至于最后他们全查不到时会如何对待我，现在考虑还太 早。那两个安全部的便衣也一定正在找我。这场游戏还没有结束，我倒宁愿就被关在这里一段时间。

想 到这里，心情好了起来。再次对他表示感谢，并又极力地赞扬了他对工作的认真和负责精神，也表示为了我的事而使他到处奔波受累的不安和内疚。尽管他脸上作出 了满不在乎的样子，但我的这几句话正是他想听、爱听而又听不到的。他的脸上出现了笑容并对我说，他的这个拘留所的条件太差，总是人满为患，像我这种情况的 人本应单独关押，那么我的手就可以锁在前面了。但这里没有单人牢房，所以只好把我反锁着。说到这里，他又带出一副关切的样子对我说：「我知道你现在不好 受，可是在这个拘留所里还从来没发生过逃跑的事呢，我不想麻烦，所以你只好受些委屈了。」

说 到这里，他用手指着窗外的上海女人，对我说：「你看到了，我们对于不服从改造，拒绝接受教育的女人都绝不心慈手软，该处罚的就坚决处罚，所以你仅仅是反锁 着手，不算什么。」我点了一下头，简单地表示了一下，希望他尽力

查到我的案情，尽快将我的事做一了断。尽管他认为不算什么，但长时间反锁着双手确实不好 受。他笑了一下说：「我是怕你给我找麻烦。这件事就这样了。你还有什么要求，现在就对我说，我能办的就没问题。」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可既然他说了， 我倒不妨试试，反正他不给我松开手，我就要求点别的事。我做出一副吞吞吐吐的样子对他说：「我刚才听到你说红烧肉，我实在是有点饿，不知能不能给我点东西吃？」他马上笑了，痛快地说：「吃东西没问题，可我不知道红烧肉还有没有了。」

说 着他站起来，让我和他一起进入了他办公室隔壁的屋子，也就是昨天我看到的那间女人们吃饭的屋子。桌上还有些饭菜。李所长说他要去北屋看看还有没有红烧肉， 我马上对他说：「我已经三十六小时没有手了，一直都是阿莲照顾我，尤其今天屋里来的都是新人，我连抽烟都没人帮我。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下令让阿莲早些回 去，至少也请你让阿莲来喂我吃些东西，我会很感激你的。」我说完后本想等着他的拒绝，没想到他给了我一个大吃惊。他笑着把脸凑近我问我：「今天白天，你们 俩一定痛痛快快地干了半天吧？」然后是一阵下流的大笑。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笑完了又说：「你玩过的女人，今天晚上没人要她，让她陪你回去。现在我让她 来喂你吃饭。」我马上谢了他，他向北屋走去了。

我 站在屋门口，这里与那上海女人不过两米远。我问她吊了多久了，她回答说可能有半个小时，要我想办法救她。她说她害怕。我当然理解，马上对她说这些畜牲们都 是性变态的虐待狂，他们不认为这不正常，他们追求刺激。我要她不必害怕，该对他们说话就说话，如可能的话就对他们笑笑，这样可以少受些罪。我对她说，无论 男人女人来到这种地方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忍受，二是忍受不了只有死。她还年轻，不能就这样死了。所以只好忍。她应该明白她面前的是一群畜牲，畜牲对待女 人就不能等同于人，所以只好去忍受。应该把胆子放大些，明白这个道理，也就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们了。我刚说完，她 马上就点点头，又要求我千万不要把我看到的这些告诉她的未婚夫，并说这会刺伤他的心的。她的话使我重重叹了口气，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好女人呀。我看着她， 她低下眼睛。我对她说：「如果妳向我保证，明天妳自己原原本本把这一切都对妳未婚夫讲，我就保证今晚什么都不说。」她看我一眼，轻轻说好。

北 屋传出了大声的说笑声。门开了一下，但没人出来。我马上又问她疼不疼，她摇了摇头说：「只是不好受，这像什么样子？」听她的说话声好像在哭。我马上要她不 要哭，又对她说：「李所长那个人头脑简单，爱听吹捧的话，妳是完全可以对付他的。」说到这里，北屋门又开了，李所长端着一碗肉笑着对我说：「你是有口福 的，今天让你吃个够。」我赶紧笑着并感谢着。他进屋把碗放在桌子上，这时我才看到阿莲赤裸着身体，背着双手，迈着小步从北屋出来，铁链的声响伴随着她向我 走来。我放心了，我本担心李所长喝多了酒变卦。

李所长从屋里出来，走到阿莲的背后，松开了她的双手后又在她的屁股上抓了一把，笑嘻嘻地说：「进屋喂你老公吃饭，吃完饭我给妳松脚。」我又连声说着谢谢，随阿莲进了屋。

阿 莲用手指拿起一块肉放进我的嘴里。她盛了一碗饭，马上大口地吃饭。我低声问她：「没吃？」她摇摇头，马上向我嘴里又塞进两块肉，她却大口快速地吃着饭。我 也极力地咀嚼，快速地吃着。阿莲用脚轻轻地踢了我一下，又向我做了个眼色，我马上回头向外看，李所长从后面双手抱着上海女人，又把头放在她肩上，那女人仰 着头，正对着他的耳朵说着什么。我放心一些，这女人比起她未婚夫可聪明多了。阿莲又催促我尽量多吃一点，最后她端着半碗汤给我。我一口气喝光了后，就让阿 莲马上出去，趁着李所长正在院子里让他松开脚，然后穿上衣服快走。阿莲站了起来，刚一迈步，脚上的链子发出了响声，我注意到李所长立时警觉地转过头来，并 松开了搂抱上海女人的手，对阿莲说让她去北屋等他。我以为他变卦了，马上站起来走到屋外，发现他正在兴致勃勃地看着阿莲走路的样子，直到阿莲进了北屋，他 才转过身来，对我说这个上海女人的未婚夫实在可恶，竟想对他行贿，又让这女人来和他谈条件。今晚先惩罚女人，明天再找那个男的算账。

我 看他的酒意仍浓，但情绪依然好，于是请求他把这个女人放下来，并把她也送回去，让她对未婚夫去讲她所受到的惩罚，那个男的听了后一定会害怕，于是就再不敢 胡说八道了。他马上摆了摆手说：「不行！放她可没那么容易，让她再多吊会儿，我去叫个人把你们先送回去。」说完，他去了北屋。这女人向我说：「他不会放我 回去的，你快带阿莲走吧。」停了一下，她又小声说：「真没想到，这里比地狱还可怕，我怎么会受到这个……」眼泪已经充满了她的双眼，我马上劝她千万不要 哭，这群畜牲们已经醉了，不可激怒他们。我对她说：「两件事妳要记住，第一，这绝不是妳的错。第二，不仅是妳，所有关在这里的女人都不应当受到这些。另外，明天一定要如实地对妳未婚夫讲出一切。不管会发生什么，就让它发生，总比给将来留个隐患好。」我想她明白我这番话的意思，因为她没有避开我的眼光，认真地看着我。

阿 莲从北屋匆匆地出来，后边是那个看守。直到我们进了屋，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阿莲才松了口气。上海男人过来问我是否看见他的女朋友，我仅是点了一下头。阿 莲一点不客气地说：「都是你出的主意，让你女朋友受了苦，还带累得我也受了苦。亏你还是个男人，明天问你女朋友去。」说着把他推开。直到夜深人们都睡了 后，阿莲开始向我讲述在她们到了前院后发生的事。每次有女人被送来，都是由李所长先挑选。阿莲来的第一晚就是被他奸污的。今天李所长看中的是这个上海女 人。一定是听了男朋友的话，这个女人一到前院就打听谁是

负责人，李所长当时正坐在院子，她以为李所长是个看守，所以向他打听负责人是谁，李所长仅对她说一 句：「无论什么事，也不要紧，一会儿可以谈。」于是挥手让阿莲带她进屋。进屋后，无论几个女人怎么说，她也不脱衣服，而李所长正坐在院子里等着要看她洗 澡，喊叫着催女人们快出去。不知哪个女人告诉她坐在院子里的那个人就是李所长，这女人一下子跑出去对李所长不知说了什么，等女人们走到院子里时，只看到李 所长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按在地上，又叫来了一个看守，一块把她的衣服扒光，然后又拉她起来，命令她和女人们一块洗澡。

这 女人洗着澡，突然喊了一句：「我告你们去。」李所长被激怒，一把揪住她把她拖进了北屋。时间不久，还在洗澡的女人都被叫进了北屋，看到这个上海女人已被像 马爬着似的被捆在了床上，李所长正在奸污着她。看到女人们都进来了，李所长问她们还有谁想去告他们，当然没人敢说话。李所长又对大家说：「这个女人想来贿 赂共产党的干部，胆子太大，今天非好好收拾她不可！」直到奸污完了这女人，女人们才被允许离开。李所长把上海女人拖到他的办公室，将她双手反绑了起来，并 吊在屋顶上。女人们刚走进饭房，李所长又冲了进来，把阿莲又拖进了办公室，同样反绑了双手吊了起来，然后大骂 阿莲违抗命令，没有告诉上海女人应当如何遵守监规，接着又大骂上海女人竟敢对他行贿，他喊叫着说：「一百五十块钱，就想让我把你们两个人都放了，就是一只 猪，一百五也买不来，妳们两个人还不如一只猪！敢威胁我，不放就去告我。妳们现在就在我手里，从今天开始，晚上吊女人，白天吊那男的。我非把你们关够三个 月！」李所长骂够了后就去了北屋。

这 时那上海女人才由于受辱和害怕而哭了起来，阿莲还要忍着疼去劝慰她，当然也免不了把那个上海男人大骂一顿。好在时间不长，一个看守进来把阿莲放了下来，说 是李所长要她去陪喝酒。阿莲知道李所长喜欢她，所以在喝酒时让李所长看她手腕上的绳子印，求李所长放下那上海女人来，并说了一句：「这个罪可不是女人能受 的。」

没想到这句话反而提醒了李所长，他放下了酒杯跑出去，把上海女人从屋顶上放了下来，又拖到院子里，把她的乳头吊在树上。阿莲感到一种负罪感，她认为是她多说了一句话，才使得上海女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光着身体受辱的，所以在放她出来经过上海女人身边时，匆匆跑过不敢看她。

第 二天，上海女人被送回来。我一直在注意她和男友的举动，她几次无声地哭泣着，而那男人的头扭向一边。阿莲几次过去和那女人说话，后来又抱怨我不该让那女人 把什么都向男朋友说了。我反问她如果将来遇上一个男人，也打算与

他结婚，该不该把在这里所受到的一切告诉他？她看着我，回答不出来。我替她回答，那是必要 的如果那个男人听到这一切就离她而去了，她应该感到幸运，因为没有误嫁给一个极端自私而又没头脑的人。如果那个男人听完后，马上抱住她，安慰她并仍要与她 结婚，她应该庆祝，因为她遇到的是一个真正爱她的人。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逻辑，我向她解释了两遍后，她的眼睛开始充满泪水，我知道她明白。她平静后，为我点 了支烟，趴在我的耳朵上叫了我一声老师。

中 午时，屋里的人数增加到了四十一人。人多了，说话的嗡嗡声大了。阿莲一直坚持让我躺在她的腿上，不时地为我擦汗和抚摸我的双手和手腕。下午，那上海女人坐 到我的面前，要求和我谈谈。她十分平静地告诉我，她和她的未婚夫是从小学到中学的老同学。毕业后两个人都找不到工作，于是两人向双方亲友们借一点钱，租一 个小铺位，开了一个小小的杂货店。生意小，赚不出多少钱，

但维持生活还是可以的。几次谈到婚事，由于两个人都刚 23 岁，打算再推迟两

年，所以订了婚，两个人的感情一直都很好。昨晚的事她对未婚夫都讲了，确实伤了他的自尊心，他受不了这个打击。可在她这方面，她认为应该讲出来，讲出来后她并不后悔，因为今后只要被关在这里一天，她就会受一天的侮辱，这是事实。这个事实，她的未婚夫一时还接受不了，她希望我今天晚上能与她的未婚夫长谈，向他讲清这个现实并安慰他，让他不要太伤心。

听 了她的这番话，我不知该说什么。按情理讲，现在需要安慰的是她，而不是那个未婚夫。想到她昨晚那个样子，我今天一天心里都不好受。看着她现在这副平静诚恳 的表情，而她的未婚夫正在和新来的人聊天呢。我理解不了这个男人，明知道自己的女人一会儿又要被带走去受辱，怎么还有心情与陌生人闲谈呢？在我面前的这两 个女人都伟大，可为什么偏偏让她们受到这些呢？两个女人都看着我，等着我的回答。我对她们说：「妳们可能并不知道自己，但我要让妳们知道，妳们两个都是了 不起的好女人，根本就不应该受到这些，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女人受到这些。所以无论受到了什么或任何人是如何议论妳们，要记住一点，那就是这不是妳们的错。 妳们首先不应该有负罪感，更不必去请求什么人的原谅，因为妳们没错。在这种地方，男人们都保护不了自己，何况女人。」说到这里，我对上海女人说：「今晚， 我会和妳未婚夫谈谈的。」她高兴地对我笑了一下，可我的心里说着：「只是因为妳是个了不起的人，我才同意的，否则……」

那 天晚上，直到夜深人静后我的心情才恢复了些。我轻轻地叫醒那已经进入梦乡的未婚夫，请他帮我点了支烟，他坐到我身边。傍晚两个女人被带走后，我看出来他有 几次想过来和我说话，但我心情不好，所以没有给他机会。现在他看到是我在主动说话，显出了很愿意的样子；看得出来他的心情是很矛盾的，不知道该怎样对我说 或说什么，所以在等待着我。我开始向他讲述昨晚我见到的他太太的样子，又告诉他在那之前，他太太是如何被李所长揪住头发按在地上，和

另一个看守一起扒光她 的衣服；又是因为什么被捆绑在床上，当着五、六个女人的面，像狗一样被强奸；如何又被反绑着双手吊在屋顶上。

接下来，我又对他讲述阿莲是如何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大约二十个男人的面裸体受辱，又在十几个女人面前跪在地上受辱的情节，阿莲始终不肯告诉我的那个究竟是什么。女人们受了侮辱是绝不说出来的。她们自己忍受着，同时还要做出平静的样子。我告诉他昨晚我和他太太两次说话的内容，是我逼她太太保证今天由她自己告诉他一切，但我仍然相信他太太是不会像我这样详细地告诉他一切的。为什么？因为害怕会伤了他的心，他的自尊心，怕他受不了、受刺激，而没有一个字提到她自己。

我 告诉他，就是现在，女人们不但手脚都被锁着，而且乳头还要被绳子系住固定，她们可能彻夜难眠，但当早上被放回来时，她们的脸上是那么平静，就好像一夜什么 事都没有发生。今早他太太脸上还带着微笑，我听到她太太问他昨晚睡得好不好。当她看到还有半个面包剩在那里时，又关切地问他为什么不吃，是不是不舒服，又 伸手去摸他的前额，是不是有热度。我却没有听到他对太太的问候，更没见到他对太太的亲切和抚慰。

这完全与阿莲遭受一夜折磨后第二天回来的情形一样，只字不提她们所受的一切。她们是人！这不是她们的错！受到了如此的伤害、屈辱和刺激后，她们需要扑进最亲近的人的怀抱大哭一场，需要得到发泄，需要得到安慰和爱抚，去平复她们受伤了的心。

当 说到这里时，我的眼睛酸酸热热的，我极力控制着自己，又告诉他下午他太太找我，要求我安慰他。我开始气愤，对他说：「受了一夜的强奸和折磨的人得不到安 慰，反而去安慰一个喝足了酒，睡了一晚安稳觉的人？这个天下还有没有公理了？别忘了，昨夜你太太受到的一切都是由于你的主意，今天白天没人来把你吊起来， 天知道你太太昨晚又加倍地受到了什么，才把你解脱出来的。我问你几个问题，你不必回答我，但你必须用心去考虑，你是不是认为这些都是你太太的错？你究竟爱不爱你太太？最后一个问题，从一个做人最基本的品格和感情上讲，你哪一点配得上她？」

说 到这里，我认为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不指望着这个人能明白什么，我闭上了眼睛。这个男人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但这时我听到他在哭。我对他的印象立时转变，刚 才还沉痛的心也马上轻松了一点点。我转过身准备睡觉。他哭得很沉

痛。男人不轻易流泪，真的哭起来会哭很长时间的。我没有打扰他，希望他已明白了些什么。终 于他平静下来了。把半支点燃的烟放到我的嘴上，然后问我：「你说，我该怎么做才好？」声音是诚恳的。我转过身，对他说：「首先做个男人，做个诚实实在的男 人，于是你就知道还怎么做了。」他没说话，但很重地点着头。

这 时我才告诉他，阿莲不是我太太，我认识阿莲也不过才三天多，但我发现她有许多极可贵的质量；通过昨晚和今天，我在他太太身上也同样发现了这些极可贵的质 量。只要我今后还有机会，我会娶阿莲做我的太太。身体被糟蹋，但人的质量是不会改变的。以前或许还发现不了，但通过现在的事她们的品行和天性全会表现出 来。人们说坐牢也是学习，能使人变聪明些，这些都是我以前不懂的。从这两个伟大的小女人身上学到的东西，足以改变我的后半生。他打断我，对我说：「我爱我 的太太，但我不敢用伟大这个词形容她。我知道她爱我，对我好。都是我的错，这次来广州也是我的主意，没想到让她受了这些，都是我错。明天我请她原谅我，我 要爱她，就像她爱我。我不等了，我们一回上海马上结婚。你给我个地址，我给你写信，请你喝喜酒。你不知道我们上海办婚事好热闹的……」

隔 天上午开饭时间，我刚走出屋子，女人们也正好回来。阿莲向我跑过来，抓起碗开始喂我饭，我笑着让阿莲回头看，那上海男人抱着太太从看守的背后溜进后屋去。 阿莲告诉我，昨晚睡觉时她听到那上海女人足足哭了有一个小时。一个上午，这对夫妇都在亲密地交谈着，一点儿也不在乎地亲嘴、搂抱。阿莲几次要过去，我都拦 住了她。阿莲的眼睛也红红的。我对她笑，她不好意思地擦干了眼睛，笑着把我的头放在了她的腿上，又把我的脸紧贴在她的胸前，一只手在我后背和胳膊上抚摸 着。在这间乱哄哄的屋子里，两对恋人正沉浸在他们的二人世界中。

接近中午时分，屋门突然被打开，一个看守伸进头来喊出了我的号，我感到很意外。当我走到门外时，看到一个警察正站在那里，我问他要把我送到哪里去，回答很简短：监狱。看守打开我手上的锁，警察拿出了手铐，熟练地将我的双手在前面铐住。75 个小时双手被锁在背后，尽管这时又戴上手铐，但我马上感到轻松多了。看守推了我一下，我问他，能不能让我和我太太说句话。看守还没说话，那个警察便又是简短地说：「一分钟。」我走到窗口，窗口已经挤满了人头，阿莲在。我向她举起双手说：「看我的手自由了。」她哭了起来，问我：「他们要把你送到哪里去？我们还能不能见面？」里面的人动了动，让阿莲来了窗口，她向我伸出了双手。我把手伸进裤子口袋，拿出了那张五十块钱的钞票，又从衬衣口袋里拿出打火机和还剩几支的烟盒，一齐交给阿莲。她哭着抓着我的手不放。我笑着对她说：「妳出来早，找我；我出来早，找妳。我们一定能见面的。」

阿莲已是哭得说不出话来了。不知是谁，从窗口递出一支烟来，我接过来，大声地说着谢谢。又对挤在窗口的人们说：「请各位多照顾我太太，别让人欺负她，她是个好女人。」警察在我胳膊上拍了一下，说了一个走字。我又看了阿莲一眼，挣开了她的手，转身快步地向小铁门走去。我听到阿莲已经哭出了声，同时又在叫着：「喂！喂！」相处了四天四夜，她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呢。

来 到前院看到另一个警察，李所长也在，我马上向他走去，请求他多照顾一下阿莲。他点着头说：「好说，好说。」然后又马上对我说：「你的案情仍找不到，所以只 好把你送监狱了，让他们把你的事弄清。」我点了点头，走到大门口。开门的看守正是那个混蛋，我笑着对他说：「四哥，我阿莲就多拜托你照顾了。」他马上说： 「放心，放心。」

第三十二章 上海采购员

走 出大门，我把烟放在嘴上，随着两个警察快步地走着，一边看着四周。周围空荡荡的，全是农田，只有在远远的地方才可以看见几户农家的房子和树。从拘留所出来 向北走不多远，就到了这条土路的尽头。我们又向西，沿着拘留所的北墙向前走。这里根本没有路，我们走在田间人们踩出的路上。走出不远，拘留所的土墙到了尽 头，紧接着土墙的就是高高的灰色的砖墙，墙上有铁丝网，我才想起来有人告诉我拘留所的西边就是监狱。

他 们就是把我送到这个监狱来，难怪不需要汽车呢。这个监狱相当大，从外墙的长度上看，至少比拘留所外墙长出五倍。在走到距大墙的尽头还有十几米远时，我们站 住了。这里有一个小铁门，一个警察在拍门，我趁机向空旷的周围极目远望，我恐怕一踏进这个门，短时间内是出不来的了。这座监狱里的看守都穿着警察的制服， 倒没听到他们大喊大叫，也没见到他们手里拿着大木棒，但一个一个的都面无表情，又像是如临大敌似的搜了我的身，拿走我的腰带和鞋带，然

后才拿掉手铐。一个 看守带着我拐来拐去，到了一间大饭房，人们正在吃饭。看守用手指着一个长桌子让我过去，两个站在桌子后面的人给了我一碗饭和一碗菜，又示意我可以随便找着 地方坐下。这间屋子有两个长长的桌子，两边都是木凳。我坐了下来，看到碗和匙子还算干净，于是吃了起来。饭量比拘留所多了一倍，但里面的沙石不比拘留所的 少。那碗菜实际上是汤，只有几片菜叶飘在上面，正好饭仍是要吞，汤可以使我吞起来不费力。人们都低着头默默吃饭，没有人交谈，我数了数，不过才三十几个 人，仅占了半间屋子。

饭 后，我随着人们来到一个小院里，人们都在走动着散步，但没人说话，几个看守站在那里也不说话。拘留所里是整天乱哄哄，而这里却是静得让人感到那么反常。小 院的靠墙处也有一个长长的水池，上面有七、八个水管的开关，与拘留所前院的水池一样。我走过去，喝了几口水，又洗了脸和头，一个看守拍了一下我的后背，示 意我跟他走。我们来到了一个十分小的办公室里，一位三、四十岁的人坐在办公桌后，向我说了一大堆不准的监规后，也不问我记住没有，就一挥手让我出来。

刚出来就听到哨子响。那个看守马上双手抓住我的胳膊，推着我走到一排监房前，又推我进了一间小心的屋子。屋子大约有 4 平方米，两边有两块矮矮的大木板，这一定就是床了。中间的空地正对着门，门是用粗钢筋焊的，没有遮挡，正对着门的墙上在高处有一个极小的洞，洞上有个用钢筋焊出的 T 字， 从洞口可以看到外面的一小块天。这时，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人走了进来，门便立刻被关上了。这个人与我握手后，又示意我在木板上坐下，然后以很重的口音对 我说，根据这里的规定，他这个先来的人是必须要向我这个后来的人讲解监规。我只好听着。从他的介绍中，我知道这里每天有三顿饭吃，并有三个小时的放风时 间，以及这里起床睡觉时间，接下来便是什么吃饭、放风时间不准说话、互相之间不准谈案情、不准喊叫、不准高声说笑、不准打架、不准唱歌、不准抽烟、不准吸毒、不准有性行为、不准……

听着这些，我笑了，向后仰面躺在了床上，把双手举得高高地身来个懒腰。然后我打断了他，对他说：「现在我的手自由了，又可以用后背躺下了，肚子也不饿了，这里又通风，没有恶臭味，所以我心情也好了，我现在就好像是在天堂里一样。」

他 笑了，问我为什么把监狱比作天堂。我开始详细地向他讲述了拘留所的一切。我说的这些使他吃惊，而我并没有告诉他女人们所受的一切。他已是摇着头表示

出不可 思议了。我又告诉他，拘留所的格局，一间八十平方米的屋子关了九十四个人等等。最后他在吃惊之余告诉我，他已被关在这里快三个月了，从没听说任何一个人能 讲清这里的格局。他所能知道的是这里关着的人都是等待判决的人，一旦判决了就送到前边去，至于这个前边是哪个方向、在哪里，他就说不出来了，只听说前边关 了八百多犯人。然后他又对我讲解着这里的程序，新来的人要经过审讯，审讯室在哪里他是知道的，审讯期可能几天， 也可能几个月，既没有法官，也没有律师，这里审，这里判，等到把人送到前边去时，告诉你两年就是两年，告诉你五年就是五年，既省事又简单，如果喊冤，就再 多加你两年。说到这里，他放低了声音说，贪污腐败也等于给了关在这里的人们一个机会，可以通知家属、朋友在外面和他们谈条件，根据案件的大小，给他们三百 五百一千两千元，马上可以放出去。我问他是不是也要这样做，他点点头，十分有信心地说可能就在最近十天或八天的。

这 时，我开始打量起这个人，他是中等个子，瘦瘦的，说话很文气，他的手指短粗，但皮肤很白，应该是个知识分子。从他看人时的眼睛上看，这是个真诚而且热情的 人。他的相貌也说不上难看，只是嘴太大了，一口牙又向外突出来。其实，他也正在打量着我，我知道是该互相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了，但我是不能，真名字万万不能 讲，而假的我还没编好呢。我正在犹豫着，这个人开始了自我介绍，他叫阿齐，是南京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与我一样也是一九八一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建筑工程 系，四年前晋升的工程师，比我大一岁，被捕前担任着一个设计室的主任的职务，曾结婚六年，后离婚了，没有小孩。这次是他第二次被捕，他第一次被捕是在深圳，由于当时身上有三百块钱，贿赂派出所，当天就放了。这次被捕是在广州，由于当时身边没钱，所以事情变复杂了。他很诚实很坦率，该轮到我了。

我只好抱歉地对他笑着说：「我的名字叫 5311，你还想知道什么就问吧，但有些问题，我可能是不能回答的。」他也笑了，并表示他完全可以理解。又告诉我，由于他已经有十天都是一个人待在这里，没人说话，都快憋出病了，希望我不介意和他随便说说话。

我 感到对不住他，马上向他道了歉。又告诉他，其实我是个爱说话的人，只是目前麻烦太多，脑子里至今没个头绪，又是第一次被捕，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对付这些事 情。他点点头，马上转话题问我去过南京没有，这一下气氛马上高涨起来。他是南京生、南京长的老南京，我也出生在长江地区，以后又没少去那一地区，于是我们 从名胜古迹聊到当地特产，一个下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又到了晚饭时间，阿齐引导着我去厕所，又去了饭厅吃饭。然后又在水池边洗脸洗脚，最后还有时间在院子 里散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足以让人们不慌不忙地做完许

多事，不像在拘留所，说是半小时，其实连五分钟都不到，人们就被连踢带打地关进屋去。

当 我们又回到这间小屋后，阿齐对我说：「现在你该考虑一下今晚的审问了，你不愿对我讲可以，但如果你不对他们讲的话，你是要吃大苦的，相信我，是吃大苦的。 不等我问，他就告诉我，在这里审问人一般都是在夜晚，可能八点多、十点多，也可能在午夜，而且被审的人一定要挨打的。」他讲起第一次被审的情况，他说： 「审讯官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我叫阿齐，刚说完，一个站在我身边的看守打了我两个嘴巴，我愣了，不知做错了什么事，这时审讯官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以 为可能刚才我回答的声音小，他没听见，于是我提高了声音回答，我叫阿齐。马上另一个看守在我的胸上重重打了一拳，我仰着身体向后摔到了地上，我爬起来，刚坐下，审讯官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当时也急，大声地说我叫阿齐呀！这次没挨打。」

听 他说到这里，我确实大吃一惊。阿齐接着告诉我，在最先提出的姓名、年龄、职业、从哪儿来的这些问题上，通常都要问三遍，前两遍的回答都要挨打的。这种审讯 方式完全是从日本人那里学来的，不但可以压垮一个人的精神和心理，而且可以以此来试探被审的人说的是不是实话。他提到，他曾看见一个人在吃早饭时脸是肿 的，吃饭时嘴都张不开。后来听说这个人在审问时说出几个不同的名字后，审讯官站起来出去，几个看守把这个人足足打了有半个小时。说到这里，阿齐很郑重地对 我说：「我看得出来，到现在为止你并没有一个完整思路和办法，现在你该是思考的时候了。同时记住一件事，在审问中，如果回答错了问题，也不要去更正，就让 它错下去，留待以后找机会再去更正，明白吗？」我十分郑重地感谢了他，通过他说的这些，我才明白审讯实在就是心理学，这是我以前根本不知道的，尤其我不能 讲实话，所以这个认识就尤其重要。阿齐建议我躺下闭上眼睛好好准备，我听从了。

天 已经很晚，我仍陷在一大堆凌乱思绪中。但已经没时间了，一个看守打开了门，要我跟他走。天黑黑的，我也分不清方向，跟着他拐了几个弯后，就进了一间屋子。 这是一间很小的屋子，只有一条长凳，看守让我坐下，我好像听到了里面有人叫唤的声音，就像是有人受到了伤害的那种叫声，我并不感到恐惧，也不惊慌。当我明 白审问过程里考验的不仅是语言文字和思绪逻辑的严谨，而且还包括人的心理和精神韧力上的较量后，我感到我手里多了一件武器，真要感谢阿齐。又是一声叫声传 了出来，看守看着我，我也看看他，并对他笑了一下，他把眼光转开了。坐在那里约有五分钟，一道门开了，我被叫进去。审讯室不大，但灯光极暗，只有办公桌上 的那盏台灯的光，清楚地显现出办公桌后面的那张脸，那一定是审讯官了。这张脸看上去不过三十多岁，而且极文气，尽管毫无表情，但与电影里或书里所表示出的 那张面目狰狞、穷凶极恶的审讯官是绝不一样的，尽管我已做好了挨打的准备，但我实在不相信这张脸会发出打人的命令。

我 被推坐在一张椅子上，审讯官始终在低着头看着什么东西，两个人影就在我的两边，屋里十分静。过了一会儿，审讯官仍没抬头，但一个极平静的声音传了出来：「你叫什么名字？」我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我叫阿尹。」我刚说完，几乎就在同时，我的脸上和头上受到了重重的一击。我的头马上晕了起来，我马上保持住镇 定，等待他的第二次发问。片刻的寂静，审讯官仍没抬头，又是那个声音传来同样的问题，我仍是同样的声音回答。马上，我的后腰被重重地踢了一脚，我被踢出了 座位，向前扑着摔倒在地上，但立刻就被两个人拉了起来，按回到座位上。说实话，这时的我已经被激怒了，若不是阿齐事先告诉了我，我一定会大声质问他们。我 吐了一口气，这时那个声音第三次出现了：「你叫什么名字？」我第三次回答了他。第二个问题紧接着我的话音提出来，年龄。我回答四十五，前胸与背后刚被打过 的部位又受到比刚才更重的两拳，我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转过头去想看看这两个打我的都是什么人，但灯光太暗，只能看到两个人影，而看不清他们的脸。

我 已准备好第三次说四十五岁，但问题变了。「什么职业？」我回答：「采购员。」立刻我的脖子被一只胳膊紧紧地勾住并往后拉，肚子上被重重地打了两拳，胳膊松 开了，我双手抱着肚子弯下了腰，感到要呕吐。那个声音又传了过来：「什么职业？」这一次，我没有马上回答，我抬起身子，坐正了，又咽下了一口口水后，才回 答：「采购员。」

我的脖子又被勾住到后边，胸前挨两拳，我咳嗽起来，并忍不住要吐，当那只胳膊松开我脖子时，我向前弯下了腰，吐了一口。我站了起来，提高了声音说：「审讯官先生，如果这不是你的主意的话，就请你立即下令停止他们的这种做法。」

他 仍没抬头，好像没有听到我的话一样，问出「从哪儿来？」的问题。我还没回答，两个人把我按着坐下，同时一人抓住我的一只手拉到了我的背后，并使劲地往上 抬，迫使我向前弯下了腰，前胸贴在了大腿上。这一次我决定不回答，以示抗议。屋里静了下来，我绷紧了全身的肌肉准备承受身体任何部位马上受到的打击。但没 人打我，局面仍僵持着，看来这位审讯官是受过很好的训练的，他并没有被我激怒。过了一会儿，他第二次平静地问我：「从哪儿来？」我回答：「上海。」立刻两 个人开始拧我手腕，我的上身完全紧贴在膝盖上。他们仍拧着，我的手腕、肘关节和双肩剧烈地疼起来。他们正在用力地拧我，想让我大声叫唤，让我喊疼，向他们 求饶，因为他们听惯，他们以为他们是胜利者，永远高高在上地征服一切人，人人都哀求他们，求他们开恩，放一条生路。但他们这套东西对我没用，我不是罪犯， 我有我的尊严，我是个学者，一年前也是政府官员。我宁愿让他们拧断我的胳膊。除非是失去神智，否则我不叫喊，更不求饶。

僵 持了一阵后，审讯官那平静的声音又传来了：「从哪儿来？」我也以同样的声音说：「不让我坐好，我拒绝重复！」马上两个人又向相反的方向拧我的双手，迫使得 我抬起了上身并又向后仰去。他们仍在拧着，我咬紧牙承受着疼痛，这样又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我听到了审讯官说：「下一个。」我还没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两只手 被松开了，马上两个人又揪着我的胳膊拉我起来，并把我很快地推了出来。

外 面的院子里有一盏灯，我刚想回头看一下这两个打我的人的脸时，门已关上了。等在外面的看守对我做了手势，我只好跟他走了。我以为由于我在审讯中的对抗态 度，而会被带到其它什么地方去受处罚，没想到跟着看守转来转去，也不知怎么回事竟又站在了我和阿齐的囚室的门外。我走了进去，阿齐坐了起来，待看守走远 了，阿齐马上问我打得重不重。我脱下衬衫，困难地挥动着胳膊，用衬衫擦着头上、脸上和身上的汗水。

阿 齐站了起来，借着院子里的灯光，前后地查看着我的身体，然后说：「打的不重，没什么伤痕，看来这一关你是过来了。」我坐了下来，憋了一肚子的气开始爆发出 来了。我对阿齐讲述着整个过程，阿齐几次向我做着手势让我放低声音。我一口气讲完了，躺在床上，不断地活动着两条胳膊。阿齐以为我发泄完了，心情也就该平 静了，所以这时他开始慢慢对我说，要我学会忍耐，因为每个人都要过这一关的，要我以后千万小心，不要去激怒他们。听他说到这里，我马上坐了起来，看着他 说：「是他们在激怒我，而不是我在激怒他们。你要我怎么小心？他们这样对待罪犯可以，但我不是罪犯，这样对待我不行！」阿齐马上笑着说：「好了，好了，今 天什么也别不要讲了，躺下睡觉，明天有的是时间，让我们慢慢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都躺下了，周围静得一点儿声音都没有，我强迫自己什么也不想，又强迫自己 闭上眼睛，努力了几次都失败。浑身都在疼，无论我身体的哪个部位动一动，马上就牵扯着哪儿都疼，我只好一动不动地躺着。

也 不知过了多久，我平静了一些，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阿莲，我的心往下沉下去。阿莲现在正在被锁着手脚受着欺辱，她不是也在忍受吗？而且我也劝她忍的，怎么 我自己反倒不能忍了呢？看来人都一样，劝说别人时都能说出一整套的理由来，可轮到自己就全不是一回事了，我也不例外。今后，我还是要尽量的冷静，我来到这 里不是要与他们对抗，是要寻找机会等待被救或自救出去的。想到这里，我马上心情就平静下来，可却丝毫没有睡意。我想把阿尹的故事继续编下去，可半天也找不 出个思路来，脑子里仍是甩不掉的阿莲。

今 天分手时，阿莲哭得很厉害，不知那对上海夫妇会不会安慰她，没有我在那里，她就是一个可怜的小女人。我当着大家的面说她是我的太太，求大家照顾她，又托了 李所长和那个混蛋，但他们是畜牲，没用的。总有一天，我会给阿莲出这口气，不仅是为了阿莲，还有上海女人，还有所有被他们糟蹋过的女人出气。我现在多想在 阿莲的腿上躺一会儿啊，让她搂着我的头把我的脸贴在她的胸前，用另一只手去摸我的后背，我相信只要她抚摸我，我全身的疼痛会马上消失的，尽管她是个小女 人，但她有魔力。没有她，反锁着双手三天三夜，我不会那么舒服就过来的。只要有机会再见到她，我一定娶她做老婆，副教授娶个没文化的老婆，不行？我可以教她认字读书，我相信这个小女人天生就是个好太太，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她，我娶她。

有 人在我耳边说：「尹老兄，上海采购员，该起床了。」我惊得坐起来，看到是阿齐正笑着看着我。他对我说：「是你昨天晚上告诉我的，你叫阿尹，四十五岁，上海 来的采购员，对不对？所以我才这么叫你，没错吧？！」我迷迷糊糊地点一下头。他说：「起来吧，该到早饭时间了。」我把腿放在地上，刚要站起来，浑身疼痛使 我又坐下。我对他说：「你还说我被打得不重，我现在还浑身疼。」他看着我说：「后来你告诉了我整个的经过后，我就知道你准吃了苦头了。这群打手们打人都打 出经验来了，往往把人打出内伤，但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一会儿，你散散步，活动一下，过几天就没事了。」

我站起来，正要穿衬衫，一股汗臭味从衬衫上冒出来，正在这时门被打开，我只好穿上它，和阿齐出去了。

这 里的规定是，早上开了门后，人们可以先去厕所，洗脸，然后才吃早饭。所以我去到水池边，用衬衫当毛巾，沾上水，浑身上下地擦洗着，最后又洗净了衬衫穿在了 身上，然后我又快速地吞下了饭，马上来到了小院子里，咬着牙，忍着疼，拼命地踢腿、抡胳膊、弯腰地活动起来，直到哨子响了。回到囚室后，阿齐问我活动了一 下是不是感到好一点了。不等我回答，他又笑着告诉我说，当我在院里活动时，屋里的人们和几个看守都在看我。我马上问他，这是不是违反监规的行为。他摇着 头，笑着说：「大家都感到奇怪，因为从来没有看到有人像你那样运动的，人们关在这里都懒了，连走路都是慢了。」

我 由于洗净了浑身粘糊糊的汗渍，身上舒服了许多，心情也好了一些，便也笑着说：「我是在锻炼身体，准备挨打。」阿齐马上说：「我希望你不是锻炼身体，准备还 击吧？你的那种大动作的运动方式，搞得几个看守都很紧张的，你的那种快速的吞饭的吃饭法也特别引人注意。你个子高，本身就容易引人注意，你被关在这里，就 与大家一样，都是囚犯，尽量想办法和大家一样，不要让人看到

你有什么不同，那么麻烦就会少一点，我也是在这里三个月才逐渐明白到这一点的，这种地方可是什 么人都有的。」我知道他讲得这些都对，可还是忍不住开玩笑地说：「你信不信，在这三十多人中，我可以在十分钟之内，一个一个告诉你他们都是什么人。至于 你，我只需五秒钟就知道是个知识分子，你现在和我说话的举止神情就和你放风吃饭时不太一样，那是装出来的，你不想让人们看出不同，但你仍与他们不同，再装 也看得出来。」

他 笑了，半天没说话。我又问他像这种审讯一般要持续多少天，我当然知道审讯是要一段时间的，我问这话的意思是指那种挨打式的审问。他说他只是在第一次审问中 挨了打，以后就没有再被打过，但也不是人人都如此。他提到那个一直与他关在这间囚室的毒品贩子就被打过三、四次，至于其它人，他就不知道了。因为在放风和 吃饭时是不准说话的。说到这里，他也以开玩笑的方式告诉我：「你不必急于锻炼身体准备挨打的，因为通常第二次审问是要等一周或两周的，你会有充足的时间做 准备的。」

听 了他的话，我放心了。昨天傍晚我匆匆编出来的故事，连我自己都知道是漏洞百出，根本禁不住推敲的，这样的话我就有时间去修饰并充实它。阿齐是一个爱说话的 人，也可能是由于十天没人和他说话的缘故，这一个上午，他就一直在告诉着我关于那个贩卖毒品的人的事。他告诉我，搞毒品的人分成两种，一种是走私毒品的 人，一种是毒品贩子。走私毒品的人已从原来偷偷摸摸地夹带毒品发展到武装公开把毒品带进来了。由于这些人在武器装备上的精良程度已远远地高出于警察和边防 军的装备了，所以在多少次的双方交火中，警察和军人们伤亡惨重，落荒而逃。走私的人可以一路无阻地把毒品运进来，而且数量越来越大，由原来的几公斤、几十 公斤到后来的几百、上千公斤的大干了起来。

公 安方面没办法了，于是请来了黑社会的头子们商量，要求给个面子，于是协议就达成，那就是警察装不知道，让这些走私的人大大方方地走几次，然后给警察一次截 获毒品的机会。从此以后双方相安无事，走私的大胆地走，成吨地往里运，没人阻拦。警察方面也时常捷报频仍，一公斤、两公斤的时有截获，不显得那么无能了。 但对于毒品贩子来说，则是一件风险较大的行当了。他们都是单枪匹马的个人跑到云南、广西的某个接头站，直接或间接地从走私毒品的人手里买，然后一路火车、 汽车地兼程把毒品带回广州，再卖给吸毒的人，据说至少有三、四倍的利钱好赚。如果能把毒品带进香港的话，据说可以赚到十倍的利钱，但同时风险就相应着大，每十次中至少有两、三次是会被连人带毒一齐抓获的。

尽管如此，这种买卖仍然吸引着不少的亡命之徒去铤而走险。这个毒贩子在被抓获时，他身上正带着三百克的白粉，在许多国家超出十克的白粉就会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的，至少也要判处十五到二十年的监禁的，但这个毒贩子只在这里关了不到三个月，那是因为他的家里人付出了五千块钱的贿赂，于是这个人自由了。阿齐曾问他出去以后还干不干了，回答是肯定的。理由很简单，一个二十五岁，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年轻人，贩了几年毒，现在在广州市拥有一所价值五十万元的花园洋房，内部的布置、装饰加上全套的意大利家具又是三十万元。他生活阔气，吃穿讲究，并且花钱长期包着两个女人。

说到这里，阿齐对我说：「以我现在的工资来计算，干到六十岁退休，我还能赚到六万块钱，可别忘了这六万块钱是我还要工作十八年才能赚到。可对于这些贩毒的人来讲，恐怕也就是贩一趟毒的利钱，即便被抓住了，关上三个月，花掉五千块钱，对于这些人又算什么？这个毒贩子已经进了三、四次监狱了，都有经验了，所以一点儿也不在乎。」说完，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笑着对他说：「这都不是什么新闻了，政府腐败，当然无奇不有了。这是你看到的，还有的你不知道的，说出来就更会让你接受不了。」

接着，我向他提到就在不久前，我从香港的一份报纸上看到的一篇报导，提到广州市的一个人是全国通缉的大毒品贩子，我记不清是在云南还是在广西，终于把他抓住押送回广州等待被枪毙。一天晚上，这个人对巡查的监狱官说：「把我枪毙了，你什么好处也没有，不如你去找我妹妹来，我让她给你一百万块钱，你放我一条生路。」

当时这个监狱官并不相信他，但还是去找了他的妹妹，当这个人的妹妹第二次来，把一百万块钱放在他面前时，协定达成了，当晚放人。就在当晚放这个人时，监狱官还给他出主意，要他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广东省，走得越远越好，否则再被抓住就一定活不成。这个人心领神会，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讲到这里，阿齐又深深叹一口气。

阿齐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们在一起相处的这五个白天和四个夜晚的时间里，可以说几乎无话不谈。但他对于我所知道的仍然是：阿尹，四十五岁，上海采购员。我知道他是不相信的，几次他提到我说话的口音像北京人，又说我是一副十足的知识分子的样子，甚至说我不像个四十五岁的人。但我都一口咬定我就是阿尹，四十五岁，从上海来。有几次，我们小心谈到一些涉及到政治方面的问题，但也仅是刚接触到皮毛，便谁也不再多说什么了。我自以为我是很小心了，但有一次阿齐还是提醒我，说我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太过于暴露自己。

我知道，他是出于好意才说这些，我也深深地感激他，同时更感到对不起他。有过两次我想要对他讲出实话，结果话到嘴边，还是没有说出来，不是不相信他，而是不相信这个环境。

有 两次在夜晚，我被一种刺鼻难闻的烟味熏得头疼，我问过阿齐，他告诉我这里总是有人在吸毒，他甚至怀疑有人在这里嫖妓，因为有几次在半夜他失眠睡不着觉，看 到有女人无声地走过，有的囚室里经常传出说笑的声音，甚至酒气和香烟的气味。囚室之前通过敲墙和敲打门上的钢筋声，就可以互相联络。阿齐在这里快三个月， 都听不懂这些信号是什么意思，这种种现象告诉我，这个环境远比拘留所复杂得多了，还是要加倍地小心。

在 我被关到这里的第五天的下午，阿齐突然被看守带走了，但时间不长就被送回来了，看守走远了，他兴奋地凑在我耳边说，一会儿他就要被放出去了。我高兴地握住 他的手，连声地向他道贺。他确实是很兴奋，不停地站起来，坐下，又站起来，终于他平静了下来，坐在我的身边，小声地对我说：「这几天来，我一直就想要给你 一点建议，但总是时机不对，现在是时候了。我只想告诉你一点，不论你是什么原因被抓来的，千万小心不要让他们把你与政治上的事情挂上钩，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明白凡事一旦与政治或六四牵扯上，几年之内是出不去的。我早就看出来了，无论你是从上海来，或是从北京来，你的事一定是与六四有关的，所以在审问的时 候，你必须要想办法避开这个问题。」说到这里，他笑了一下，又说：「你不要紧张，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外边的朋友花了些钱，我才可以 放出去，否则的话，一旦把我送回南京，至少我也要坐两、三年牢的，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怎么做的了。」

阿 齐是在前年的春天因公务出差去的北京，并回到了他毕业的清华大学去探望他过去的教授。当时正是北京的民主运动刚开始不久，他又见到几位老同学，并且和几个 同学领袖见面，然后他便立即返回了南京。至于他回到南京后的事情，他略去了，但我也是能想象到的。在六四大屠杀发生后，他对共产党彻底地失去希望，决定投 奔西方民主国家，再也不想生活在这个血腥政权下了。他开始寻找关系和机会出走。在大清洗开始后，他遇到了麻烦，他已经没有时间了，他马上回到家，装了几件 衣服，带上自己的积蓄便南下广东，寻求偷渡的途径。他先去香港，去年秋天的第一次偷渡香港失败，被捕后花了点钱，当时就放出来了。他立即来到广州，找到朋 友继续想办法，终于搞到了一本假护照，在今年一月份出关登机时，又被识破了，于是被关到这里来。在审问他时，他的口供是：多年的女友出国去继承了一笔财 产，给他来了信。信中说，如他能很快地出来，他们仍将结婚，如果在一年之内他出不来的话，那就只好断绝关系了。他几次向公安局申请护照，但公安局认为不是 正式夫妻关系就不能发护照，几经交涉无

效。他既不想放弃女友，更不想放弃女友继承的那笔财产，所以才走此下策的。今天已经证明了，他的想法是成功的了。我 感谢他告诉我这些，并问他出去后打算怎么办。阿齐的回答是坚定的：「已经有了两次失败的教训了，第三次我会成功的。」

我 由衷地祝福他，他很高兴地握住了我的手，又告诉我，刚才看守叫他出去，告诉他一会儿有人来接他出去时，还把他威胁了一顿，警告他出去之后闭上嘴，如果胡说 八道的话，至少判你两年徒刑的。他马上点头称是，其实他根本不明白为什么要威胁他，他要求发还他的提包，但马上就被推了出来。他摇摇头，叹了口气说：「那 几件衣服也就算了，关键是我还有两百美元也在那个提包里，那是我的全部财产了。」我对他说：「我估计这就是他们威胁你的原因，他们想要贪污那两百美元，这 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魏京生还不就是被扣上这个罪名，判了十五年吗？」

我刚说完，阿齐看着我，一个劲地摇头，然后说：「我刚才还嘱咐你，你怎么就一点儿不注意呢？！你知不知道你的弱点？人家一看到你，马上就认定你是个知识分子，听你的口音，人们就可判定你从北方来，如果你再说出这种有讽刺意味的话来，就全暴露了。」

我 吐了一下舌头，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时候我已决定将我的真实身份告诉他，并请他出去后去找阿海，告诉阿海我在这里并通知香港派人来营救我。我正要张嘴，看守 来开门了，我以为到晚饭时间了，刚站起来要往外走，看守简短地对我说：「不是你！」阿齐好像跳起来一样，几步迈到门外，看守锁门时，他笑着向我挥了挥手， 就消失了。

我后悔应当早点向他讲出实话。但后悔也晚了。那天晚上我失眠， 一个人静静地编着阿尹的故事， 看守又来开门了，说是提审。几分钟后，我又坐在了那间审讯室的椅子上。

第三十三章 你电死我我也是这句话

仍 是那个审讯官，仍有两个打手的身影。我做好了再次挨打的准备，同时告诫着自己，一定要忍，绝不对抗。审讯官仍是不抬头，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哪个工作 单位工作？」我平静地回答：「在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工作。」没挨打。审讯官在写着什么，屋里十分静，接下来他问我来广州做什么，我回答他是来采购百货，又没 挨打。第三个问题是：「知道为什么抓你吗？」我回答说：「不知道。」话声刚落，我的脖子又被一只胳膊紧紧地勒住，另一个人抓住了我的一只手，又开始拧了起 来。我相信至少有二十秒钟后，同样的问题又被提出来。我仍是平静地说：「这里一定有误会。」马上脖子被勒 得更紧，使我几乎喘不上气来，胳膊也被拧得更疼了。审讯官可能是想让我吃些苦，我相信又是至少二十秒钟过去，他抬了一下头，我马上被放开。这一次他的问题 是：「能不能向我解释一下是什么样的误会？」我知道这是我的一个说话的机会，于是我开始讲我是如何被两个便衣推进车里，他们既没有出示证件，也没有告诉我 他们是什么人，更没人告诉我为什么抓我，把我送到个什么地方后，没人审问我，也没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更没人向我解释我为什么来到这里和这是什么地方，就把 我关起来，然后又把我送到了拘留所。直到第二天，拘留所的李所长在问了我的名字、年龄和从哪儿来三个问题后，、马上就把我的双手锁到了背后，既没有解释，也没告诉我原因，我几次请求见他，直到我被锁了三十六个小时后，他才见我，告诉我，说是因为没有我的案情说明，他也很头疼，只好按照规定把我当成重犯对待了。

我被整整锁了七十五个小时后，又被送来这里，至今我也不知道那两个抓我的是什么人和为什么抓我，所以我认为这里一定有误会，并请求他尽快查清。我说完后，他还在写着。半天，他问我，你当时在做什么？我说：「我在走路，想到前面一家商店去看看。」

又 是半天，听他说了一句：「明天再审。」于是我又被推了出来。回到囚室后，我再次分析了我的供词，我认为没什么漏洞。我也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仍然危险，那两个 便衣在回到那个派出所后发现不在了，当然要找我了，他们也知道警察们卖放犯人，可能知道再想找到我是不容易了。当我在拘留所时，我一直担心他们会突然出 现，但由于第二天我变成了从上海来的阿尹了，这可能是个原因。在来到这个监狱的当天，我又担心这两个便衣会出现在审讯室，今天也曾有同样的担心，既然他们 仍没有出现，那么我今天的供词正是时候，我相信这十天来，拘留所为了我没有那份案情说明，到处查找找不到，搞得拘留所胡里胡涂的。监狱这方面也一定是由于 没有那份东西而对我无从下手，趁着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我否认一切，反正他们也没少错抓过人，他们也知道的。

我 明白这样是会吃些苦头的，他们错了，也要往我头上硬扣个什么罪名，以证明他们没错，他们的面子是保住了，最后还是要放我的。只要在今后的审讯中，那两个便 衣不出现，我就没有多大的危险，顶多就是多挨几次打，非要扣个罪名给逼我认罪，我也有个原则，扣个小罪名，马上放了我，我可以认同，若非要关上我两年，我 宁愿挨打，也绝不认罪。我已经感觉到，被关在这里受审、挨打，不会好受，但我必须要受，在我面前是清清楚楚的生和死两条路，这里再不好受，我有活着和出去 的希望，如果我暴露了自己，被送回北京的话，我首先要受的是阿聪和不少人告诉我的那些酷刑的折磨，逼我说出地下刊物的人名单，即使我没有死在酷刑下，最后也会被秘密处决，然后共产党还会在出售我的器官上挣笔钱。

隔 天晚上，我受到第三次审问。是在一间完全不同的审讯室里，我还没顾上看清楚这是一间什么样的审讯室时，就被几个人推到了一张椅子上，我的双手被背铐在椅子 的靠背上，两只脚也被分别用绳子捆在椅子的两条前腿上，然后是一张长着尖尖的下巴、鼓鼓鼻子的脸出现在我面前。他瞪着眼睛看了我了一会儿，又走回到办公桌 后面。

这 是个矮个子，又有些发胖的人，但看不出他的年龄，他坐下后，打开一个大本子，看了一下，然后抬头，瞪着我说：「你说你不知道为什么被抓来，是吗？你说你正 在走路，什么也没干，我们就把你抓来了，是吗？告诉你，我们是不会抓错人的，既然抓住你，就一定有原因，说！因为什么被抓？」听到他的这番话，我确信我昨 天晚上的分析是对的。于是我又把昨晚对那个审讯官的话，又对他详细地重复了一遍。我刚说完，他拍着桌子喊叫起来：「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仍然坚持说你 什么也没干，我们就把你抓来了？这可能吗？」

我 差点没说他们可从没少抓错人的，但马上把这句话吞了回去，极平静地对他说：「不管你信或不信，这是事实，我被胡里胡涂地关了十天了，我比任何人都更想知道 为什么？」他马上又喊着说：「你还是在说你不知道，而且还想知道事实，是吗？我做给你看，什么是事实。」喊叫完，这个人好像马上变了一个人似演起戏来。他 先用他自己的声音问：「为什么抓你？」然后，马上移动身体转过头来学着我的声音说：「我不知道呀。」他又转过去，用他自己的声音问：「你干了什么事没 有？」然后他又转过来，学我的声音说：「我什么也没干。」又是他的声音：「你真的什么也没干吗。」我的声音回答：「我真的什么也没干，我正在走路，他们就 抓我。」他坐正了身子，看着我说：「你什么也没干，我们能抓你吗？你正走着路，我们就把你抓来，一定有原因，没有原因，我们能抓？」他的戏已经演完了，这 最后一句话是在问我。他刚才扮演的对话完全是三段论的逻辑，但立论的点是错误的，我不敢去否认他的立论，所以我一时倒说不出话来了。

他 从办公桌后快步地走到我的面前，几乎是脸对脸地问我：「这就是你所说的事实吗？你是说？还是不说？」说完，他的两眼直盯着我的两只眼睛，我没有避开他的视 线，我必须打乱他的那个逻辑。于是，我对他说：「李所长对我讲，根本找不到我的案情，这就证明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所以这里一定有误会。」他走回到办公 桌后，对我说：「拘留所是替我们暂时关押犯人的地方，他们是不管案情的。你提到的那个李所长问没问过你是因为什么被抓的？」我回答：「没有。」他马上说：　「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工作，案情在我们手里，我们负责调查定案，所以你最好放明白点，这里不是拘留所。」他是在打乱我的逻辑，否定我的证据。趁他说到这里停顿一下的机会，我马上问：「能不能请你告诉我那两个便衣为什么要抓我？」

他 马上拍了一下桌子喊道：「是我在问你，不是你问我。」然后，他放低了声音对我说：「无论你犯了什么罪，只要你态度好，一定会轻判的。反过来说，如果你只犯 了很轻的罪，但态度不好，那是会被重判的。罪行大小没关系，关键看认罪的态度，认罪态度好，又能主动配合我们，就可以放出去，不判刑了。这就是党的政策，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明白了没有？现在告诉我，为什么被抓。」我对他说：「我实在想不起来做错了什么，我告诉你的都是实话，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我一边走路 一边在抽烟，或许那条街上不许抽烟？……」

他拍着桌子打断了我，喊叫着说：「你知道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我问你为什么被抓，你说是不说？」他跑到我的面前，揪住我的衣领，再次地问我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我注意到他的另一只手已经抬了起来，于是我说：「这里是个讲道理的地方。」

他 的手没有打下来，但仍揪着我的衣领，又问我：「说！为什么抓你？」我一时想不出来用什么其它方法去回答他，只好又说不知道。那只抬起来的手，重重地打在了 我的脸上，我的右耳除了嗡嗡的声响外，什么也听不见。他没有再打我第二下，而是转身从一个我看不见的门出去了。可能这是个暗号，站在我身后的三、四个打手 立即行动起来，我的脖子又被一只胳膊勒住并往后拉，一个人掐住了我的两腮，迫使我张开嘴，一个人把一根棍子塞进了我的嘴里。这时我听到一个人小声说：「留 着他的嘴招供。」于是这根棍子又从我的嘴里挪到了我的肩膀上。突然，我的身子剧烈地抖动了起来，我才知道这是电棍，他们在使用对付暴徒的电棍对付我。我想 大声抗议，但我说不出话来，电棍又挪到另一个肩膀，然后又挪回到刚才已被电击过的肩膀，又挪到另一个。当两根电棍紧紧地顶在的我两个肘关节上时，一个声音 在问我：「说是不说！是不是想尝尝电这里的味道？」

这 时，我头晕、恶心，浑身仍在颤抖着，根本说不出话来。他们也不想等我说话，两只电棍同时放出了电流，我的胳膊剧烈地抖动起来，我好像听到手铐上的铁链都发 出了不时的颤动的声音，我的头和脸好像全都麻木了一样。我试图去挣扎，但发现身体和四肢根本不听我的，电流完全控制了我。等到他们停下来时，我已有些失去 知觉似的，两眼看不见东西，一股烟气喷到了我的脸上，听到那个审讯官的声音：「不太好受吧？这回该说了？」我是想说话，但我的嘴仍在抖动着，我根本控制不 住，我放弃说话的打算，摇了一下头。屋子里好像突然变得那么静，过了一会儿，又听到他说：「现在你能说话了，说是不说？一句话，我不是光你一个案子，说 吧，我听着呢？」他说对了，我试了一下我的嘴，已经不太抖了。我睁开眼睛，又能看见东西了，我尽力控制着我的嘴，对他说：「你电死我，我也是这句话。我告 诉你的都是实话，你不信，我也没办法。」

刚 说完，只见他拍了一下桌子，还没听到他的喊叫，两只电棍紧紧地顶在我的两个膝盖上并放出了电流。我的腿和整个身体都在一挺一挺地剧烈地抖动着，被电的感觉 实在痛苦难受，但难受也得忍。时间不长，我就失去知觉了。电流停止了，一个声音对我说：「快说吧，再多电你一会儿，你的皮就烧焦了。」我是想说话，但又说 不出来了，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而且呼吸短促，我试了两次，仍然嘴里发不出音来。这时听到那个审讯官在说：「知道厉害了吧？！今天也够你受的了，明天我再 问你，再不说，我还让他们电你。」我的手脚被放开，两个人拉我站起来，我身体软得好像站不住，好像身体里仍有电流似的，也说不清是肌肉还是神经，仍在不时 抽搐着，尤其两条腿好像不是我的一样，我根本控制不住它们。

第 二天早上醒来后，我的头仍在疼，浑身都难受。清洗我的身体时，我发现我的两个膝盖和一个肘关节的皮肤上都出现了烧黄了的印子。我不管别人注意我，我又在院 子里做起了大动作的活动，而且一边活动着一边还自己对自己说着：锻炼身体，准备挨打；锻炼身体，绝不还击；锻炼身体，坚强意志。回到囚室里，回想起昨晚审 讯的一个一个情节，我感到我犯了几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当审讯官在用三段论的方法逼我时，我不应该去打乱他的逻辑；第二个错误是，我抓住了他说话上的漏 洞而反问他抓我的原因；第三个错误是，以开玩笑的方式说出了或许在那条街上不准抽烟的这句话。尽管我觉得我是在尽力的去忍受了，但这三件事仍然激怒了对 方，而且暴露了自己。

今 后一定要少说话或者不说话，必须非说不可时就说短话，而且要装胡涂，无论他们再用什么方式和逻辑来，我都不懂也不明白，反正无论明白人还是傻子，在这里都 挨打，或许傻子会少挨几下打的，阿莲的那个反正不能一辈子的理论，还是有些道理。既然我的手没有被锁一辈子，那么在这里他们也反正不能打我一

辈子的。咬咬 牙忍一忍，再受到什么，也不会比送回北京更可怕。不知为什么，我真想阿莲。

晚 饭后不久，天还亮着，我就又被带到这位审讯官的面前。他都没让我坐下，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想好没有？能不能告诉我，你是为什么被抓来的。」我回答说： 「我确实真的不知道。」立时，两个人抓住我的两只手并拉到我的背后捆了起来，然后又推我到了墙角，一个人熟练地把一根从屋顶上悬挂下来的绳子套在了我的双 手上，两个打手拉动着绳子的另一端，我的两只手被吊起来，不得不弯下了腰。他们还在拉着绳子，我的身体被拉直，两只脚被拉得离开地面后，他们才把绳子固 定。我以为审讯还要继续进行，但当我抬起头时，发现屋里竟然连一个人都没有了。天已经黑了很久，审讯官和他的四个打手回来。随后一个中年人被带进来，被铐 到那张椅子上。

审 讯开始。从他们的一问一答中，我开始明白，这是一件偷车案。两个人偷了一辆小汽车，又用船把车偷运去了香港，中间情节挺多，像是后来分赃不均，又被什么人 告发了，于是两个人全被捕了在审问这个人的全过程中，这个审讯官使用了一个诈一个骗的两个方法，再加上四个打手的连踢带打，两次电击，我被吊在这里不能说 对被审的人不是个威吓作用。

一 个多钟头后，这个人的口供已经令审讯官大为满意了。于是同伙作案的另一个人被铐在了椅子上，这个人似乎顽固了些，被打得很重，又被电击了几次，但审讯官里 已有了前一个人的口供，似乎是胸有成竹，任凭这个人挨打受刑，然后用出了真真假假的手法去威胁逼供，终于这个人受不住拷打，于是说出更多的令审讯官满意的 情节，不到三个小时，在一片尖叫哭喊声中，一个案子圆满结束。

审 讯官显然很得意，当第三个人被铐在了那张椅子上后，他走到我的面前，大声地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想过我这一关，可没那么容易。我有的是办法让他说出实 话的。」说完，他大步地回到了办公桌后面，开始审问这第三个人。这个人可能有五十多岁，是个广东人，说话时口音又重，声调又高。当他被铐在椅子上时，就已 经吓得浑身颤抖了，在回答问题时，吓得声音都结巴了。一个打手拿起了电棍在他面前晃了晃，他马上又尖叫又求饶，便问什么回答什么了。

原 来这个人是专门做贩卖女人勾当，他从广东省的北部的山区和湖南、江西省南部的山区，去骗女人，告诉她们到广州市来，可以有工作，有工资，又有好的

待遇。他 把女人带回来后，就卖给黑社会，他每提供一个女人就可以得到至少五百到一千块钱。几年时间，他已经卖掉了几十个女人了。审问进行得非常顺利，但由于牵扯到 的女人太多，所以审问的时间很长。我发现，审讯官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了这些被卖的女人们的姓名、住址，以及这个人是如何把这些女人从她们的家乡带到广州来 的和卖多少钱，绝口不问这个人把女人们都卖给谁、交易的地点以及这个人与黑社会卖淫集团的关系和联络方法。

我 相信我被吊了至少有六到七小时，已经感觉不出什么，全身都已麻木无知觉了。刚一被吊起来的那种疼痛的感觉早已经没有，而可能是身体内的水份早已耗干，所以 也没有汗水流出来，虽然被汗水完全浸透的的衣服仍然是湿的。腰和腿有时抽搐，身体不由自主地有些晃动；我不知道还要被吊多久，估计已是凌晨了。审讯官合上 大本子，大声地问我：「你招是不招？快说！」我对他说：「我已经告诉你几遍了，你不信，我也没办法。」他没喊叫，打手们也没打我。只听他又说：「今天我不 多问你了，明天我找你算账，现在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在广州住在哪里？」

这个问题我是有准备的。那天和阿芝出来散步时，在离她家不远的地方，我看到有两个相隔不远的旅店，那个小旅店的名字很新奇有趣，所以记住了；我用这个旅店的名字回答了他，他马上大声说：「不错，你到底回答了一个问题，总比昨天你一个问题都不回答强。」

两个打手放下了我，正在解开我双手上的绳子时，我看到审讯官从抽屉里拿出一副手铐放在桌子上。两个打手推我站到办公桌前，将手铐戴在了我的双手上。庆幸的是，不是背铐。

审 讯官说：「这是给你的警告，明天我是不会客气的，别以为你是个知识分子，你过不了我这一关的。」我没有去反驳这个知识份子的说法，那反而会显得我心虚，所 以我什么也没说。在回囚室的路上，我走得很慢。由于长时间被吊的缘故，我浑身关节和肌肉都变得僵硬，看守没有催我。我要求让我喝些水，他没有回答，但拐了 几个弯后，他把我带到了放风的那个院子里，我说了声谢谢，就奔到水池边打开水管拼命地大口喝水，又把头伸到水管下冲着凉。看守把一块肥皂放在水池边上，简 短地说：「五分钟。」我再次地感谢他。已经十多天了，这是第二次有肥皂。周围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看守回到了那间小办公室，我脱下鞋袜，又脱下长裤和内 裤，把它们扔在水池里，又把衬衫从头上脱下来拿到手上，用它当毛巾尽情地清洗着自己和衣服。凉水加上夜晚的空气使我清醒，同时也使我感到好过多了。

第 二天放风时，我手上的手铐引起了囚徒们的注意。他们默默地看着我，或做出个眼神、或极轻微地做出个动作，向我表示着什么，但没有人和我说话，回到囚室又是 我一个人。阿齐走了两天了，时间实在是难打发，这副手铐倒像成了我的玩具。审讯官说是要给我一个警告，其实是给关在这里的这三十多个人警告。就像昨晚把我 吊在那里是给那三个被审的人看的，那三个人都犯了罪，却没有戴手铐，反倒把我铐了起来。这可能就是那个审讯官所讲的态度问题有罪态度好，花点钱就放人，这 就是党的政策，我也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正当我无聊地摆弄着我的手铐时，我听到有人在敲墙。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是等着。一会儿墙上又传来声音，我也敲 了两下，但没有反应，我走到门边，向西边张望着。突然一个声音在说：「接着，给你的。」一个火柴盒上面斜插着两支烟被仍到了门外，我拿了并道了谢。一个星 期没烟抽了，我赶紧点燃一支，大口地抽了两口。

这是两只美国烟，我并不奇怪，既然毒品和女人都能带进来，还能有什么不能带进来的？那一整天，我有事干了，我一直都在用火柴棍拨弄手铐上的钥匙孔。

晚 上，我刚走进审讯室，就被审讯官劈头盖脸大骂了一顿，我莫名其妙地听着，他又叫喊着问我知不知道欺骗司法人员是什么罪，待到他发作后才告诉我，经过它们的 调查，我根本就没在那家旅店住过。对这个问题，我当然是有准备的。那还是研究所车队首先开始实行承包以后，不但改变了服务，而且拿到奖金，于是设备器材处 的采购员们也向他们的处长提交了一份承包方案。处长拿来与我商量，采购员们在这份方案中提出，要求所里把全年的设备器材的采购项目和预算交给他们，他们用 预算中的这笔钱去支付旅费、请客送礼费、住店费，以及包装托运费等，并保证及时把所需要的一切运到。预算中的结余部分就属于他们的了，多剩多分，少剩少 分。同时提出今后不要出差补助费和津贴。这份方案搞得很详细，每个题目都有细节的分析和说明，其中提到住店费用上的一些弊病是我以前根本不知道的，例如住 国营旅店，每晚收费十元，采购员可以让旅店开出一张二十元的收据，采购员仍付十元，多出的十元则由采购员和旅店开这张收据的人平分装进了个人的口袋。而住 私营旅店则不同了，同样与国营十块钱的住宿标准，私人旅店无论多招徕客人，他们只收五到六块钱，可问题是私人旅店为了逃税，通常是不会给收据的，而根据财 务制度，采购员没有收据是无法报销旅店费用的。如果承包了，就不同了，也不存在收据问题，采购员们可以住最便宜的旅店，省出的钱大家都可以多分。这份方案 我后来签字同意了。

我 告诉审讯官，由于我们是承包的，为了省钱，所以一般都是住在私营旅店，当然不需要收据了，旅店为了少缴税自然不登记，他们去调查，旅店怕惹事，当然要否 认。看来这位审讯官也是知道这种事的，所以他没有再问，但他却换了

另一种口气，既像无可奈何地与我商量、又带威胁地对我说：「咱们该好好谈谈了。两天了， 我一直就是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抓你？你的回答是绝对交待不过去的。如果你什么都没做，我们就不会抓你。我们既抓了你就一定有原因，因为我们是不会随便抓 人的，看你像个知识分子，我不想对你做这个，可如果你把我逼得没办法了，那可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他 又在使用那个逻辑，我无法正面回答他，从他的话里，我感到他要对我做什么事了。尽管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我觉得这是我最后的说话的机会，所以我又把对前一个 审讯官和对他在第一次审问我时说的话再次重复一遍，并强调这里一定有误会，我一定是被误当做什么人抓来的，并请求他去找那两个抓我的便衣，让他们说出抓我 的理由，我被关了十多天了，我更想知道为什么。

我 说完了后，奇怪的是他没有叫喊，打手们也没打我。只见他抬起了身子靠在了椅子上，但没有抬头看我，只是用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口吻说：「我真也没办法了，该做 的我都做了，你非要走那条路，也只好由你了。」我以为他还会再说些什么，但两个打手抓着我，把我从另一个小门推了出来，外面是一条极窄的通道。他们推着我 向右走出十几步远，便进了一个小门，里面是一间空屋子。他们又推我进了屋子里左边的一个小门。

第三十四章 惩罚监

这是一间相当大的审讯室，一张大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黑黑胖胖的人，屋里站着、坐着的共五个打手。我被推到一张粗大的木椅前，但没有让我坐下，那个推我来的人对办公桌后面的那黑胖子说：「给他点颜色看看。」然后解开我的手铐就出去了。

屋 里的几个人都在打量着我。我看看他们，又看看屋子四周，开始明白了「给我点颜色看看」的意思：在那张大椅子后面的墙上，有几条绳子和铁链从屋顶垂下来，两 边还有大粗木凳，大粗木架子，上面挂着绳子、铁链，墙上挂着手铐、脚镣、棍子、皮带、绳子。这一切确实地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加上屋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腥臭 味儿，我知道今晚要吃大苦头了。说实话，这个时候我并不感到害怕；如果被送回北京的话，我将面临的也许也是这些吧，而且肯定会更残酷的。

我只是紧张，不知 道他们要做什么。终于，那个黑胖子说话了。很重的口音，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他没有喊叫，但说话的声音很低沉，你这副样子挺文绉绉，先给你来点轻的。」他喊了一声：「来人。」

几个打手扑了上来，我还没搞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眨眼间我发现我的衣服被扒掉，浑身赤条条地一丝不挂了。没容我有任何反应，我又被推坐在木椅上，双手被铐在椅子的靠背后，双脚也被分别被捆到两根椅子腿上，几秒钟前那种紧张的心情立时被难堪和无地自容的感觉代替。

我 马上镇定自己；我读过一本关于苏联用刑的书，就是让被审的人裸体被围在一群人中间，这是心理学上的方法，没想到他们今天用到我的身上。我对自己说这不可 怕，不要有自卑感，看着他们。我尽力地平静着自己，抬起头看了看两个站在我前面的打手，又看看那个黑胖子。突然一盏光线极强的大灯在我的头前亮了，强光使 我睁不开眼睛，灯一定离我很近，发出的热量烤人，我浑身马上就被汗水湿透。我紧闭双眼，调理呼吸，我知道虽然屋里静静的，但有六双眼睛正看着我。

不 知过了多久，我早已流不出汗水了，身上的汗水也早被烤干。我口渴得厉害，似乎口水也都干竭了。努力了半天，我才费力地说出：「请给我一点儿水喝。」一只碗 放到了我的嘴上，但仅有几滴水倒在我的嘴里，一个声音问我：「说不说？」我仍紧闭着双眼，慢慢地说：「我已经反复地说过了，可你们不信，最好你们告诉我， 想让我说什么？」

那 个黑胖子说话了：「这个家伙是顽固，给他来点厉害的。」他刚说完，我的两个乳头感到一股剧痛。我努力睁开眼睛去看，但在强光下也看不清楚，好像是什么东西 夹在乳头上，还感到有电线在我身上动。我马上深深吸口气，但不等我吸完这口气，电流就已进入了我的身体，我全身剧烈地抖动着。他们用强弱不同的电流，有时 候我整个头都发木，头发好像也立起来，有时候就只感到胸前的肌肉在抖动着，而有时候全身和四肢都不由自主地好像要跳起来似的。他们一直在不停地这样做着， 我已开始支持不住，而且出现了一阵一阵的昏迷感。

突 然一阵剧痛使我清醒，事后我才知道，不知是谁把一个仍在燃烧的香烟头按在我的右手虎口上。长时间钻心的疼痛，渐渐耗尽我的精力。我可能是有过一个短暂的休 克，但很快又清醒；他们仍在不停地电着我，我隐隐听到黑胖子说什么「给他换个新的」，于是电刑结束，两个夹子拿掉，手铐也解开了，但马上就

被人把我的上身 紧紧地按在膝盖上，两只手被拉到背后捆了起来，脚也被松开，大灯关上。我什么也看不见，他们推着我走到一个什么地方站住，有人在我的手上套着绳子，马上我 又像昨晚那样被吊了起来。

我 已是筋疲力尽，长时间的电刑已搞得我浑身软弱无力，心跳气短，头疼口干，右手被烫的地方钻心地疼，两眼什么也看不见，现在又被高高地吊了起来。我开始怀疑 我是否能承受得住这种折磨了，不知道下边他们还要做什么，而这折磨又要持续多少天，如果是两、三天，我可以受得了，可如果是十天，一个月两个月？我不敢 想。这时，我感到那种腥臭味没有了，我试着深呼吸，发现空气是新鲜、凉爽的，那种闷热气也消失了。我又做了几次深呼吸，似乎头脑清醒些了。我一定是在屋 外，拼命睁大眼睛，虽仍什么也看不见，但我相信是到了屋外了。这群打手们竟把我光着身子吊在外面？这里是什么地方？有没有人看见我？听不到任何声音，我放 心了一些，开始继续思考我的问题。由于头脑清醒了些，答案一个一个地出来了：我现在受不了了，就告诉他们实话吧，回到北京如果仍要受这些，又受不了的话， 那……这时，阿才、阿洁、阿青几个人出现在我的眼前，他们好像在和我说话，又好像在和我讨论问题。我突然颤抖了，浑身冒出了冷汗。我不能！我宁愿死，也不 能！读书人有的是骨气。我犯错误，我承担后果。现在就是对我所犯的错误的惩罚，是我该受的。

突 然一个声音在我身边问我：「你这是第几次？」我一惊，立刻闭上了眼睛，全身的肌肉绷紧。我不知身边有人，更不知这是什么人，我正赤身裸体地被吊在这里，一 种难堪的感觉占据了我；又怕他也是个打手，又要对我施什么刑。尽管不太明白他究竟在问什么，想到这是我第二次被吊着，所以回答：「两次了。」那个声音没有 再问，而我又是绝对不想在这种情形下与人对话。这时传来了几声尖叫，与昨晚审讯那三个罪犯时的尖叫声是一样的。我不明白，难道尖叫哭喊能减轻受刑时的痛 苦，或者使这些打手们心慈手软而停止用刑？我的看法正相反，受刑的人越是尖叫哭喊，打手们就越得意，哭喊求饶声音越大，越证明你怕这个刑；于是稍微不按他 们的意思做，他们就一定还施这个刑，又是一阵哭喊。我开始怀疑，在酷刑下招的供，可信程度有多少？

我 的眼睛能看得到了。一点一点地我知道我是在一个十分小的院子里，四周全是墙，院子中间是一棵非常粗大的树，根部被砌出的砖和水泥高台包围，地面也是水泥 的，小院的上空完全被树枝和树叶覆盖，最后看到的是在我身后有一个人也被吊在大树的另一端，似乎还有另一个人也在吊着。又过了一会儿，我看出树另一边两个 被吊的身影，他们至少还都穿着内裤，只有我是完全赤条条的。我闭上了眼睛，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四个打手进来。我身后的这个人被放下来带出去，没人来放下 我。大树另一端也放下一个人，但那人已经开始哭着求说他宁愿就这样被吊着，他再也受不住了；结果在打手们的喊叫声中，还是被拉出去。我对一个打手说要喝 水，回答是：「不行！」

小 院里立时又静下来。我想今晚的情形很可能和昨晚一样，要等到他们把这三个人全审完了才会放我下来的。只是不知他们是送我回囚室，还是要继续折磨我？这时又 是几声尖叫声，夹杂着叫骂及笑声一起传了来，让人感到极不好受。树那边的人用很重的广东口音问我从哪儿来，被抓来多久了？我闭着眼、低着头，没有回答他。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我：这是第几次？我仍没有理他。

几 声惨叫声传来，我开始同情这些人。他们是真的犯了罪？即使是罪犯，该受到这种折磨吗？这时我听到那人说：「叫什么，该你受的罪，就得去受，谁叫你落到他们 手里？叫也得受，不叫也得受，咬咬牙，受过去也就完了，反正不能受一辈子的。」这个人说话挺有骨气，我喜欢这种人。而终于这人也被放下来带走。小院里只剩 下我，我反而感到轻松些了。等他们审完这个人，也就该把我放下来，估计现在已是凌晨，审讯室和打手们也该下班了。尽管我已被吊得浑身麻木酸疼，但那种对遥 遥无期的忍受的恐惧感消失，我反而希望他们多审一会儿这个人，不要又继续又折磨我。

终 于我听到脚步声走近我，但没有放我下来，睁开眼睛看到一个人正看着我，马上又闭上。在我的印象里不记得见过这个人。他对我说话了，声音并不凶恶，但说出的 话却是恶狠狠的：「听着，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否则我就打你！听到没有？」我没有答话，仍闭着眼。他又说：「现在，我给你戴脚镣，你不准动，如果你 动一动，我就用脚镣抽你。」说完，他一定是在故意地抖动着脚镣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

我 仍没有说话。现在的这副样子，无论他要做什么，我也丝毫没有反抗能力。他很快地把脚镣戴到我的两只脚上，所幸并不太紧，但却相当沉重。接着，我听到了一阵 水声，马上一股凉水喷到我的头和脸上。我以为他是用高压水喷我，全身开始一阵紧张，因为我听说高压水是可以伤人的。但很快就感觉到这不是，只是一般水管的 水。

我 已经忍着口渴一整夜，请求他给我一些水喝。他把胶皮水管放在我嘴上，我就大口大口地喝起来，一阵子后我向他摇摇头表示已经喝够了，他把水管拿开。我刚要张 嘴说谢谢，他突然对我说：「别动！否则我让他们收拾你！」说着，他用一只胳膊突然紧紧抱住我的肚子，根本还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时，我突然觉得一股凉水 猛地从的肛门灌进我的肚子。就在我刚反应过来时，肚子胀大了，好像胸膛里也被灌进了水一样。我惊慌地挣扎起来，他把水管拿开了。水——

我想一定也夹杂着粪便—— 开始从我的身体向外喷流；我根本控制不住自己，也顾不上难堪，惊慌得大口地喘息。水继续地排出来。

我实在吓坏了，再也不敢闭上眼睛，紧张地注视着他的每个动作。他站在我背后，一直不停地用水冲着我的后背、屁股、腿和地面。我看不见他的脸，因为他留着长发。有两次他稍微靠近，我马上就紧张极了，直到他拉着水管子离远一些，我才吐出一口气，心却还砰砰地跳着。

审 讯室里的说话声仍不时地隐隐约约地传来。我已非常疲劳，巴不得马上就躺下来。天已亮，我有些着急，这个样子如果让别人看到像个什么。时间过得真慢，终于听 到有人来了，不止一个。我闻到了烟味，跟着就听到那个黑胖子的声音在问我：「吊了一夜了，滋味怎么样？要不要把你再吊高一点？」一口烟喷到了我的脸上，他 又接着说：「到底是知识分子，就是不一样，这身皮肤都这么白白细细的。」突然一只手在我的前胸摸了几下，然后摸到我的后背，又滑落到我的腰和屁股上。我挣 扎了一下，这手仍没拿开。我提高声音说：「要打、要电、要吊随你，我是让你随便摸的吗？把手拿开！」手离开了，但同时我也听到他喊叫着让人去拿皮带，对我说：「今天晚上我收拾你，现在先给你个教训，让你学学以后怎么说话。」

皮 带来了。不知是谁在打我，但一下一下全是很重地抽打在屁股上。我既不动，也不出声，仍然紧闭着双眼，一开始的几下抽打并不感到太疼，但越往后就越疼，疼得 好像皮肤破裂了似的。抽打还在继续着，我已被激怒，咬紧牙极力地平息着自己的情绪。那个黑胖子一直在和什么人说笑着。我的汗已经出来，也不知道打了多久 了，估计二十几、三十下是有的。终于抽打停止，我听到黑胖子说：「这几下不算什么，今天晚上我要听听你是怎么求饶的。」然后他们走了，没把我放下来。

一 直到太阳出来了仍然没有人来，我睁开眼向周围看了几眼，阳光透过树阴照射到墙上、地上，我动了动身体，换了一下脚的位置，脚镣上的铁链与地面发出了声响。 一个声音说：「还早呢，把你吊到八点钟才会放。」我吓了一跳，并不知道有人在这里，马上又闭上了眼睛，听声音这个人就是那个给我灌水的人。我是有点怕这人 的。只听他又说：「这一夜，也够你受的了。又是电，又是大灯烤，又是吊着，也没听你说句话。天都亮了，让你一句话，又是打，又接着吊，非要把你吊够十个钟 头不可。你是聪明还是傻？人到了这种地方就少说话、说好话，你没进过监狱吧？看你就是第一次。告诉你，不管在外面是干什么的，多有钱，多有势力，进了监狱 你就不是人。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让你吃屎

也得吃，这里有的是办法收拾你，让你不死不活地受。到受不了的那天时，不管再去求谁都晚了。」

听他说这些话，似乎人并不坏。而且这是个爱说话的人。尽管我不理他，他仍不停地说着。最后他说：「看来你是没有早饭了，只好等着吃午饭了。我去看看有什么东西拿点来让你吃。」他出去了，时间不久又回来了，说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找着几支烟，问我抽烟不。

我 没说话。我确实是想抽烟，但在光天化日之下光着身子，我实在感到太难堪。他走近我，把一支点燃的烟放在我嘴上，我大口地抽了两口，他又说：「我知道你是不 好意思，你是想抽烟，可我问你时你不说话。我告诉你，每个送到这里的人都要这样的，不光是你，全一样。有时也有女人被送来，一样扒光衣服吊着，慢慢会习惯 的。告诉我，你是不是知识分子？他们都说你是知识分子，上过大学没有？是什么文化程度？高中？中专？前边关过不少知识分子，听说还是大知识分子，有几个也 送到我们这边来，和你一样都不说话，怎么打也不出声。我就不明白，知识分子不是都是聪明人，怎么也犯罪？而且犯的是大罪，都是判七、八年十几年的，没文化 的人都判的轻，一两年，最多判四、五年……」

太 阳已经很高了，气温升上去，我又开始出汗，头上脸上的汗水汇集在下巴，然后又一滴一滴地淌到地上。这个人仍说着：「你还是不说话，我问你，你也不理 我……」突然我又听到水声，一股凉水喷到我的身上，我马上睁开眼睛注意他。说实话，我真怕这个人。他把我全身冲洗了一遍，又把水管送到我的嘴上让我喝水， 然后拉着水管走了。功夫不大，他又回来站在我面前说：「他们都走了，我提前放下你。但你必须戴手铐，我松开你的手的时候，如果你反抗，我就用手铐抽你，听 见没有？」他开始放松绳子，我已经站不住，身体倒向一边，当绳子完全放松后，我已是侧身躺倒地上。他解开我手上的绳子，我的手和胳膊根本没有知觉，也动不 了，他把我的双手拉到了前边铐了起来。

我 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二十分钟，才慢慢地支撑着坐起来，被打过的屁股马上像针刺般地疼，马上转过身跪起来。这个人过来扶着我，我向他要衣服，他摇摇头 说我是被关在「小号」的人，没有衣服。我不明白他的话，更不懂什么是「关小号」，但我没有问。他拉着我站了起来，这副脚镣使我不会走路，不知应该先迈哪一 脚。刚迈出一步就差点摔倒，我用两手扶着墙，一步一步地挪进了那个小门。这个人扶着我穿过一间屋子，又走出一个门，就是一个极小的小院子，宽不过两米，长 约十米，右边共有五间极小的囚室，五个用钢筋焊成极小的门全向外打开着。看来这里没有人，他指了指第一间小囚室让我进去，我弯着腰走去。囚室小得仅可容一 人躺着，什么也没有，没有床也没有窗户，只有

水泥四壁和地面。靠近门的角落地面上有一个小小的下水道口，从里边散发着恶臭气。

这 个人告诉我，「关小号」的人是没有放风的，大小便就用这个口。他锁上门走了。我慢慢地跪下来，尽量使自己去适应这个环境。我努力地移动着仍然麻木和僵硬的 身体，想侧着身体躺下，脚镣上的铁链发出了一阵响声。这个人又来了，给了我一小块草席让我放在地上，既可坐又可躺在上面睡觉，同时还有块褪了色的蓝布，说 是让我遮羞。我看着他，他解释说：「关小号的人必须戴手铐脚镣，这是规定，所以没法穿衣服。我是看你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才找来这块布让你挡挡，别人我是不 管的。」

我 马上把这块布盖住下身，并向他道了谢。他听到我谢他很高兴，告诉我中午和晚上看守会送饭来。临走前，又给我一支烟。这就是小号。我躺下，根本伸不直腿，翻 个身脸几乎贴在墙上。院子小，见不到阳光，而且也不透风，屋里闷热。我看着院子里那堵距离我两米远的灰砖墙，抽着烟以驱赶屋里的恶臭气，不断对自己说：我 会活着出去；然后就这样睡去了。

一 会儿，我被摇醒。一个声音说：吃饭。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刚想移动一下身体，脚上发出铁链的声响。我一惊，猛地坐了起来，一眼看到自己赤条条的身体，马上抓 起那块布盖住了下身。这时我才清醒过来，右手被烫的地方仍然非常疼，我抬起手看了看，发现有淡黄色的脓水从伤口处流了出来。屁股也仍疼，但已不是太疼，至 少可以坐了。门外地上放着两碗饭和两碗汤，苍蝇在上面飞来飞去。现在已是晚饭时间，那么大概已是五点半了，等于我足足睡了八个多小时。

我 感到口渴，伸手去端那碗汤，但手抖得厉害，只好用两只手去捧着碗，一口气把一碗汤喝下去。两只手腕上被绳子勒出来的可怕印记，使我又想起了昨晚的事，心里 紧张起来。他们说今晚要好好收拾我，还要让我哭着向他们求饶，不知他们要对我干什么。怕吗？我摇摇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上，还有什么可怕的？我突然笑了一 下，想给那群打手们提个建议，建议他们把这里的刑罚一项一项地写下来，就好像饭馆里的菜单一样，并且注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哪几种，使人一目了然，心里 有准备就不会紧张了。我轰走苍蝇，拿过那两碗饭费力地吞咽着。这就是我唯一能做的准备：吃东西，恢复体力，去应付未知的今晚。

第三十五章 奸刑

天黑了，一个看守来开门，跟在他后面的一个打手喊叫着让我出来。我弯着腰走出去，那个打手又推我一下，我被脚镣绊住几乎摔倒。我扶住墙，回头看他一眼，把要说的话又 咽了回去。这个打手应该有三十多岁，小个子，一脸混蛋样，对这种人没有和他多说话的必要。他没有带我去那间审讯室，而是到那个吊了我一夜的小院子里，两个 打手已在等那里。他们打开手铐，把我的双手拉到背后捆起来，然后又把我吊起来直到两脚完全悬空。我的身体来回晃动着，铁链拖在地上发出声响。

一个打手用一只脚踩在铁链上，不知是谁一把扯掉我围在腰间的那块布。我马上闭上了眼 睛，几乎在同时，一股凉水又从肛门猛地灌进了我的肚子，我惊恐得马上张开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的肛门就像马上要炸开了一样。水管拿开后，水从我的身体里 喷了出来，几个打手笑着，用水继续喷着我全身。我顾不上难堪，拼着命把的水挤出。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最害怕的刑，却偏偏受到了两次。我睁开眼睛注意着他们的 一举一动；他们仍说笑着，向我身上喷着水，然后松开绳子把我放下来，但手上的绳子没有被解开。

空 气闷热，我浑身是汗水。我把那块布系在腰上，然后站起来尽力地活动身体。我做了一个深呼吸，把那股恶臭气也吸进肺里，恶心得要吐。我又坐下，两眼望着对面 的灰砖墙，心里默默地反复对自己说：如果受不了这里的刑，那我就更受不了北京的；那么不但是我死，还要连累至少三、四个人一块死，那我的罪可就大了。我宁 可死在这里，也不能死在北京；何况这里的人不知道我是谁，他们也没有必要非把我弄死不可，我想。

他 们把我带进一间屋子，推我站在一张粗大的木桌前；一个打手解开我一只脚上的铁链，又踢我的脚让我两腿分开站着，两个人迅速地把我的两条腿和两只脚分别捆在 两条桌子腿上，然后又按着我让我的上身趴在桌子上。一个人把我的手又吊起来，两个人用绳子把我的上身与桌子紧紧地捆在一起。他们都是干熟了的，真是只有一 眨眼的时间，我就被捆得一动都不能动。打手们都走了，剩我一个人在屋里。我想他们一定是去拿皮带想抽打我，那我倒不怕，打屁股打不死人的。正想着，有人进 来了，带来一股烟味。这个人没有说话，但却用一只手在我的后背、腰部来回地摸着，然后又去摸我的屁股。我挣扎了一下，听到黑胖子的低音在对我说：「早上我就说了，今天晚上我会让你哭叫着向我求饶，可我不收拾完了你，求饶也没用。」我咬紧牙准备挨打，没有什么打下来。他的手在

我的屁股上晃动，但又感觉那不是手；那个东西挪到我的肛门开始往里面顶，力量越来越大。

我 疼起来，拼命地收缩着。我开始紧张，那个东西顶进来了，带给我一阵撕裂般的剧痛，我仍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突然他趴在了我的后背上，喘息着在我耳边说：「你 是第一次，还真紧，我喜欢。」他在对我做什么，我立时明白了。我拼命地挣扎起来，试图滚动身体，但绳子太紧。我顾不上难堪，猛烈地移动着屁股想要甩脱。我 就像疯了一样，没命地移动着身体上任何一块可以活动的部位抵抗着，几次的甩脱后，他用双手掐住我的脖子，又打我的头和脸，我没有停止挣扎。几次那东西几乎 再进来，但又被我挣脱了。他掐住我的脖子，掐得我眼前发黑，但他一松手，我又挣扎起来。这场搏斗不知持续了多久， 我听到他在点烟，同时也听到他在喘息着，利用这个间隙，我尽力地放松试图恢复体力。近不到半分钟，他又上来了，把仍在燃烧着的香烟按在我的后背上，刺心般 的疼痛使我一愣，就在这一刹那那个东西再一次进入我，又是一阵钻心一样的剧痛，使我眼前发黑，浑身无力。这个畜牲笑了一声，马上开始大动，疼得我浑身哆 嗦，我咬着牙聚积力量，猛地又开始挣扎甩脱那个东西。这个畜牲显然没想到我还会继续挣扎，他马上用双手紧紧地抱住我的肚子，把那东西顶进来，疼得我又一阵头晕无力。他拼命地大动，我拼命地挣扎，移动着身体。我不知道这场耻辱持续了多久，终于他发泄了。我挣扎，但没有甩脱，他把那脏东西喷在了我的体内。我恨 极了。终于用足了力气狠狠地对他喊道：「畜牲，早晚我杀了你！」他发出笑声，拔出了那东西，喘息着对我说：「也就是我，换了别人还真弄不了你。你有种，不 哭不喊不叫也不求饶，我喜欢。」他点了支烟，又把烟送到我嘴边。我没有接那只烟，而是对他说：「你记住，你早晚死在我的手里！」

他 瞪起眼，我却闭上了眼睛，等着他来打我或掐我的脖子。但他没有，而是喊道：「你们几个都进来，我让你们也尝尝知识分子的味道。」一群人进来了，一边笑着一 边说着极下流的话。又一个人把他的东西顶进来，疼得我浑身一震，引起一阵大笑和一片脏话来。难堪使我感到无地自容，失去了挣扎反抗的勇气。这个人借机抽动 起来，撕裂般的疼痛使我浑身颤抖喘不出气。我突然问自己，我在干什么？我不是在受刑，我是在受侮辱糟蹋。我是男人，怎么可以受这个？我突然开始又挣扎起 来，并马上甩掉了那东西，那个人几次想进来，却没再成功。周围的打手们有笑有骂的，也有出主意的。刚才的那种无地自容的难堪感觉没有了，我在保卫我的尊 严，尽管我已经被侮辱，但只要这种侮辱还在继续，我就不能停止反抗。终于周围的笑声消失，几个打手在黑畜牲的指挥下全扑到我身上，把我压得紧紧的不能动。 一个人从后面掐住了我的脖子，那个东西又进来了，我仍拼命地挣扎，但这一次却一点用没有了，这个人也把他那脏东西发泄在我的身体里。黑畜牲指挥着又一个人 插进来，我的任何的挣扎与抗全被那几个按在我身上的打手们的力量抵消去，现在这个人在毫无阻力的情况下，顺利地强奸着我，他持续不断的抽动造成我几次疼 得失去知觉。我绝望了，我等于是只能完全任由他对我为所欲为了。

终于，这个人也把那东西喷在我的身体里。又换另一个人时，我已经昏迷。醒来时，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脏的人。

昏 迷中隐约感觉有人解开我身上的绳子，把我扶着躺到地上。被喂喝了几口水后，我清醒了，眼前正是那个我之前最怕的人。扶我坐起来后，又撑着我站起来，我努力 地去移动脚，但却像不会走路了一样。他把我的身体靠在墙上，马上叫来了一个老看守来，两个人架着我，把我送回到小号里。然后，这个人又拿来了水管，先是用 他给我的那块布洗净浑身汗水，然后推我侧过身去要清洗我的屁股。我向他摆了摆手，他马上说：「不行！里面的血和脏东西不清洗干净会发炎化脓，你的命就保不 住了。」不容我反对，老看守打着手电筒，他扒开我的屁股开始清洗起来。我把双手捂在脸上，忍受着这令人难堪羞耻的时刻。我听到看守对这个人说，他知道我躲 不过这一关。

他们走了。临走前老看守对我说：「明早我下班前给你戴手铐，今晚就不铐你了。」我没理他。给了我一支点燃的烟，我也没谢他。

刚 才的一幕幕仍清楚地在我眼前，屈辱和恨交织在一起，不知道该怎么样才可以发泄出来。我不懂这群畜牲们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更不明白为什么这事会发生在我的身 上。我是个男人，这不是我该受的。打、电、烫、吊我都行，杀了我也可以，但我受不了这个。我的家庭及父母弟妹的名誉，我的过去，我的教授学者职称全被玷污 了。今后亲戚们会看不起我，朋友们会疏远我，太太已经出卖了我，政府又在抓我，我活着有什么意思？一群人对我做了这种事，又把他们那些脏东西全发泄在我的 身体里；我已是这个世界上最下贱的人。我还有什么脸去见人？阿莲如果知道，也会看不起我的。我活着还要干什么？环视四周，这间囚室里什么也没有，想自杀都 找不到件东西的。我要绝食，明天就开始。

当 决心要死时，我的心情马上就平静下来。我想起阿聪的话：「记住，千万不能进监狱啊！」现在我明白了。阿聪的性情变得那么古怪，是不是当他在北京监狱也受到 这个？他几次提到的那一个奇耻大辱，又说只能让他一个人受，不是这个又是什么？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还有什么样的奇耻大辱比这一个还大？我佩服阿聪，居然没 想到死，还再去上大学，又到处跑去搞调查。我不如他坚强。我受不住。

那 一晚我几乎没睡。老看守下班前来给我戴手铐，说了几句安慰的话，我没理他。他给我一支烟，摇了摇头走了。白班看守来送早饭，把我的手铐在前面，他转身刚 走，我就把两个碗扔到院子里。一个上午我靠着墙半睡半醒地过去了。中午看守又送饭来，看到我扔出去的两个碗，马上问为什么不吃，又说他要去报告，而且我会 因此而受惩罚。我冷笑一下，当着他的面把这两个碗也扔出去。他看看我，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时间不久，他和那个我最怕的人一块来了。那人又拖着个水管子。看 守边开门边说要背铐惩罚；他打开我一只手上的铐，我马上把双手放到背后并自己扣上。

第三十六章 灌水不是用刑而是为了干那事

这 个人拖着水管走近我，我马上脸面向墙躺下，屁股冲着他。他把一支点燃的烟放进我的嘴，然后很平静地对我说：「几天之内，是不会有人对你做那事的了。你伤太 重，我不是来折磨你的，我要来再给你清洗一次，否则会发炎化脓的。你不知道，前天晚上你正被吊在树上的那晚他们就要对你干这事，所以才要我给你灌水的，后 来又说留你到昨晚。我已经看出来你这个人有点不一样，受刑挨打从不出声，所以昨天晚上他们要找我给你灌水时，我躲开了。我一直是躲在窗外看着，什么都看到 了。来照顾你完全是我自愿的，刚才正要来时碰上看守，我对他说我来劝劝你。没想到你会这样，饭不吃，又自己把自己的手铐上，还把屁股对着我。我是不会对你干那种事的，也不会折磨你。但是你还是要忍着点，我必须向你屁股里冲水，因为里面必须保持清洁，你的伤才好得快，好不？」

听他说完我才明白，原来灌水不是用刑而是为了干那事。这人说话上不像个坏人，但我仍没他 清洗了伤口后，又用水清洗我的后背和虎口上的两块烫伤，然后便开始洗我的身体。当我转过身让他清洗前身时，我才第一次正式看到这个人的面相。一副白白净净 的脸，头发长长的好像烫过，有几个大弯。大眼睛，双眼皮，小鼻子小嘴，这副脸型有点像女人，看年龄也应该在三十岁上下。他发现我在看他，笑了一下对我说： 「看不出我是个什么人吧？告诉你实话，我也是这里的罪犯，判三年，已经在这里待了快两年了。」看起来他像是找到了话题，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我才知道了那 个黑畜牲原来也是个罪犯，被判二十年，在入狱

前曾是广州黑社会的一个小头子，大家都叫他龙哥。在他周围的人和前边那两个审讯室的打手们也都是罪犯，在入狱 判刑后都被黑畜牲收买拉拢过去，至于这个黑畜牲为什么会在监狱里有这么大的势力，他也说不清。

他 的名字叫阿华。他丝毫也不忌讳地他说，他是同性恋，且是专门伺候男人的那种人。他认为他应该是女人，只是错生了个男人的身体，所以一直想做变性手术，但手 术费要五万块；他从浙江省到广州挣钱，打算挣够手术费去上海做手术。下面的话他虽然没说出来，但想必是做了些不公不法的事，于是成了罪犯。自从入狱后他就 从没受过苦，因为几位监狱当局十分喜好龙阳之幸，所以对他甚是宠爱。那个黑畜牲对他也有意，但却从来不敢碰他。黑畜牲那群人不是真正的同性恋，凡有女人被 送来时，对他们来说是女人第一。大多数时间这里是没有女人的，所以就对被送到这里来的男人做这种事。他们喜欢的，就多做几次，就是对不喜欢的人也至少要做 一次的。他提到在那晚我被吊在大树上时，与我同时被吊的还有四个人，都被那群畜牲做了，正因为他们可以弄的人多了，所以决定留我到昨天晚上。

原 来这里叫做「惩罚监」。离我所在的这个小号不远还有五间大囚室，可以关三十多人，现在只有不到二十人关在那里。那五间大囚室，加上这五间小号，加上那个审 讯室，还有那个有大树的小院就是全部规模。黑畜牲是负责人，这个惩罚监就是监狱里的监狱，专门惩罚那些违反监规的犯人。我所待的小号则是专为惩罚那些违反 了惩罚监监规的人的地方，所以我不但要戴手铐，还要戴脚镣。所以我现在是在监狱里的监狱里的监狱，全监狱一千多个犯人中最底层的一个。

他 告诉我，那个黑畜牲昨晚和今天两次提到我，说我是条汉子，受刑时从来听不到我一声吭；在昨晚无论什么人也会又哭又喊又求的，唯有我仍是一声不吭，一直挣扎 着到昏过去，所以让他时常过来照看我。阿华说这话的意思等于在告诉我，黑畜牲是不会仅对我做一、两次就罢手，他是要告诉我看开一些，不要反抗，主动迎合一 点的话，不但可以立即不关小号，拿掉刑具，而且可以和那些打手一样，可以自由地在惩罚监的范围里活动，可以抽烟、喝酒、吃肉，甚至吸毒。

他的话似乎说完了。他看着我，而我仍一径望着那堵墙。他看我没理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捡起了那四个碗，又用水冲净地上的饭菜，然后拖着水管出去了，但却没有锁门。

我背过身去用手抓着门，把门锁上。时间不久，他拿着一罐可口可乐和两块蛋糕又来了，打开了门。他松开我一只手上的铐子，我马上又自己把它扣上。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突然问我是不是看不起他。我摇摇头。他马上高兴了，点燃了一支烟放在了我的嘴上，告诉我他从小就喜欢和女孩子们一起玩，又喜欢穿女孩子衣服。他曾去过上海的医院做过检查，医生说整个手术过程并不复杂，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再几个星期伤口愈合，他就成为一个女人了。就在不久前，一个送来关小号的女人由于必须戴手铐脚镣，所以照例要脱光衣服；他把那女人的衣服拿来穿了几天，大家都说好看。他一直说到有人来叫他，才走了。看守又送来晚饭。看到我踢到院子里的可口可乐和蛋糕，他放下两个碗去捡那可口可乐，我又当着他的面把两个碗踢到院子去。他打开可口可乐喝着，看看我，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

天刚黑，两个打手来提我。我那块布也没围，就这样光着身子跟他们出去。一个打手推我一下，我站住对他大声说：「推什么？」他吓一跳，愣在那里。另一个打手说：「他让你快走，你喊什么？」我又大声说：「把我脚上的东西拿掉，我就走快了；你不拿掉，我怎么快？」两个混蛋都不说话了。这次他们带我来审讯室，照例又是把我双手背铐在椅子靠背后，两只脚分别捆在两个椅子腿上。办公桌后没有人，大家似乎都在等那个黑畜牲。我发现屋里的墙上挂着一个钟，时间是八点差五分。我又看看这群打手，一个个全是一副地痞无赖的样子。我昨晚是被这样的一群王八蛋们糟蹋了。一股无名怒火开始涌到头上，一个打手正在看着我，我两眼直直地看着他，他也向我瞪起了眼，但不到十秒钟他就把视线转开了。邪不压正，我虽然是赤身裸体地被捆绑在这里，但我仍是有着正气的一方。这群畜牲若是一个人根本连与我对视都不敢，如果结成一团一伙，就是扰乱社会的渣子。

在共产党统治下，他们要进监狱，在民主国家，更是得进监狱的。直到八点十分，那个黑畜牲才来，坐下后对我说：「上级把我找了去，因为看守报告说你在搞绝食，上级要我重重处罚你。这里是监狱，有监规的。」说完，他看着我，不说话了。我说：「既然上级让你处罚我，那就开始啊。」他一定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屋里一片沉静。过了一会儿，他假作没听见过我说的话，又说：「我对上级说了，让我先去查查是什么原因，可能是病了吃不下，查清楚了再来报告。你看一会儿我怎么去向上级说呢？」我说：「如实报告。」停了一下他又说：「如实报告的话，你确实是一天没吃饭了，那就要处罚你了。」我马上说：「还等什么？开始。」他也马上说：「那我只好让他们把你吊起来了。」我摇摇头说：「太轻。你还有别的处罚没有？上级让你重重地处罚我。」显然他下不来台了，用他那低嗓音大声的问我：「想干什么？收拾你还不容易，我是怕把你收拾坏了，留你还有用呢。」说完，他笑了。几个打手也笑。

我 的火气立时爆发，大声地对他说：「还记得昨晚我对你说的话吗？现在我再重复一遍：『畜牲！我早晚杀了你！』」屋里马上又静下来。一个站在我身后的打手说： 「我现在就先杀了你，你信不信？」我转过头去看着他说：「动手。还等什么？」这时，那个黑畜牲从办公桌后面跑到我面前，并把他的鞋后跟踩在我左边光着脚的 大脚趾上，说：「想死可没那么容易，我还没收拾够你呢！」说完，他更加用力地踩下去，我疼得有一阵说不出话来。大约有半分钟，他松开了我的脚趾，把脸贴近 我并看着我，我对他说：「一件事你记住了，你想收拾我，最好收拾死我，只要我不死，早晚换我收拾死你。」说完，我以为他会喊叫或动手打我，但他没有，仍看 着我。大约两三秒钟后，他把脸离开了我面前，但突然他用脚跟重重地又向我左脚大趾踩下来，然后一碾。那疼痛使我全身一震，猛吸一口气后便眼前发黑昏迷了。

足 足一、两分钟后，我恢复知觉。疼痛一定使我的脸上样子不同了。已经坐回到办公桌后的黑畜牲像是在打趣似的问我：「怎么样？不太好受吧？我再让你尝点新 的。」他的话音刚落，两个站在我两侧的打手几乎是同时把他们手里的那种电工用的尖嘴的钳子夹在我的两个乳头上，一松一紧地捏着钳子，然后又这样夹着乳头上 下左右地移动。其它打手们发出了笑声，拿着钳子的打手似乎是得到了鼓励，动作快起来，尤其是在我左边的这个，一边这样做着一边从嘴里发出打鼓的节奏声，他 的手就随着这个节奏动了起来。又引来一阵笑声后，他更得意了，嘴里发出的节奏声加快，于是手的动作也加快了。在有些节点上他手用了劲力，我疼得倒吸冷气， 打手们的笑声反而更大。

我 听到黑畜牲说：「夹女人时，她们大哭大叫倒没意思，这家伙死不吭声，比夹女人好玩多了。」原来他们在对我用女人的刑，我在让他们开心取乐。我不能受这个侮 辱，我转过头去，对左边这个正在得意的打手高声说：「畜牲，你早晚也死在我的手里！你敢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屋里的笑声马上停止，这个打手愣在那里并且松 开钳子。我又转向右边的打手，还没容我张嘴说话，突然左边打手好像骂了一句什么，钳子又夹住乳头。我还没转过神来，他用力地捏下了钳子，我只觉得我张嘴吸 一口气，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疼 痛使我苏醒了过来。我仍然在那张椅子上，我看到左胸一片血肉模糊，我不敢再多看，费力抬起头靠在椅子的靠背上。只有两个打手在屋里。可能是看到我的头在 动，一个人过来看我，用广东话对另一个打手说着什么，于是两人过来把我的头从椅子上解下来，又拉我站了起来。两个打手分别把我的两只胳膊搭在他们的肩上， 想这样扶着我走，但左脚的扎心疼痛使我双脚发抖，根本迈不出步，于是两个打手只好手搭着手地把我抬起来走。走出审讯室，我就听到哭喊声和笑骂声从隔壁屋子 里传出来。门是开着的，两个打手抬着我走进去，里面灯火通明，我马上就认出了这间屋子，和那一个大木桌。一个人的躯体就像我昨晚一样被捆绑着，一个打手正 站在这个躯体被分开的两腿间动着。黑畜牲叼着烟

向我走来，笑着看着我，那个被捆绑的人仍哭叫着，几个打手在笑。我拼命地用足了力，用颤抖的嘴喊道：「畜 牲！早晚一个一个地死到我手里！」我想可能我是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喊完后，就昏迷过去了。

我 再次醒来时，已经在小号里了。手被铐在背后。一动也不能动地，我就这样半躺着，哪怕是个轻微的小动作也会招致使我几乎又昏过去的剧痛。门开了，那个老看守 打着手电筒进来。他蹲下来解开我的手铐，又把手电筒放在地上，双手轻轻地扶着我坐了起来，然后抱着我的头，让我半躺半坐地靠在墙上。他拿起手电筒在我身上 查看，对我说：「你忍一忍，我已经告诉阿华去前边找药，一会儿就来。」

说 着，他点了一支烟放到我嘴上，我的嘴唇颤抖，呼吸短促，我把烟放在手里。他又说：「我听见你对他们说的话了。你是在找死。他们弄死你是太容易了，死了都没 处告状去。」他停了一下又说：「阿华对我说了，那个他们叫龙哥的人喜欢你，按理说，我不应该对你说这话，你顺从他一点，最多两三个星期就又把你送回前边 去，也就不再受那个了。」

他看我没说话，站了起来说要去看看阿华来了没，便出去了。疼痛使我第一次不想抽烟，于是把半支烟扔出去，这个扔烟动作竟又引来使我眼前发黑的一阵剧痛。

阿 华跑进来了，拿起地上的手电筒照看着我的胸膛。当他看着我的脚时，我听到老看守小声地说：「指甲是保不住了，千万不要再去碰，让它慢慢掉下来吧。」他们两 个人把我抬到院子里的灯光下，阿华拉来水管，一边用水冲着我的身体，一边又让看守去找肥皂来，同时对我说：「再疼你也要忍了，医生说这里既没有药也无法治 疗，唯一能做的是让尽量清洗干净，不让汗水和脏东西进入到伤处，只要不发炎不化脓，就死不了的。」

老看守拿着肥皂回来，于是两人一起动手把我从头到脚地涂满肥皂，阿华又特意在我的左胸上涂了几层肥皂，嘴里说着肥皂是杀菌的，要我忍着。冲洗干净后，他从口袋里掏出 一小瓶酒精，对我说：「这是我偷来的，你可忍住了。」说着他把几滴酒精倒在左胸的伤口处，疼得我浑身都颤抖起来。之后他把老看守轰了出去，开始冲洗我的直 肠和肛门，最后又把一粒不知是什么的药放在我的嘴里，同时又说着什么也只有他去了才可以拿到这一粒药，若是别人的话什么也拿不到的。

这 时，听到了脚镣声，接着看到一个打手押着一个人进到我隔壁的小号，然后打手走了。阿华叫来老看守，又把我抬回囚室。阿华对我说那个是新来的人，要过去照顾 一下他，一会儿再过来看我。他出去了。我听到他和那个人的说话声、拉水管的声音、和那个人的哭声。但很快这些声音开始离我越来越邈远，是那粒药的作用吧， 我睡着了。醒来时，手铐已经戴回我的手上，两只碗放在地上。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转动了一下身体，一阵剧痛立刻使我不敢再动。过一会儿我开始试探着一 点一点地移动，把头靠在墙上。一阵喘息后才看到我的左胸整个肿了起来，左肩和左胳膊简直一点不能动，稍一动就是一阵撕裂的疼痛。同时左脚趾也肿大得吓人，脚背也肿，高高地鼓了起来。没想到昨晚的一踩一夹竟然会造成这么重的后果。不知他们今晚会不会对右边也这样一踩一夹，那我终于就离死不远了。

我 用右脚踢倒那两个碗，脚镣发出响声，一个声音在「喂，喂」地叫着。我忘了隔壁有人，吓了我一跳。我想他一定是在叫我，想回答他，但不知为什么却说不出话 了，好像声音在嗓子里可就是发不出音来。又是两声「喂，喂」传来，我动了一下左脚，让铁链发出声音代替我回答他。他可能懂了，他说：「我叫阿工，昨天晚上 被送来的。你叫什么名字？关在这里多久了？」停了一下，他又说：「你就是昨晚骂他们是畜牲，又说要一个一个地杀死他们的人吧。你的胆子可也真够大了。那个 叫阿华的人告诉我，昨晚他们把你伤得很重，好一点没有？是不是还不能说话？听得见我说话吗？」我又动了动右脚，他马上明白，说：「你还是不能说话，你一定伤得很重，是不是因为他们要对你干那事，你不干，才把你打成这样的？」这次，我没有让铁链发出声音。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他带着哭声说：「昨晚他们把我 X 了。」说着就哭了起来。

我 叹了口气。当然我理解并同情他，但我不喜欢他说的那个动词，那个字只可用在对女人的身上，是男人对女人的行为。一群畜牲对一个男人干出那种事也用这个字， 既是耻辱，又让人恶心。听到他的哭声，我想安慰他，可我做不到。正在这时，阿华拉着水管子来了。他一看到我就吓得惊叫了一声，马上开门进来，蹲下来看我的 胸和脚。用手摸着我的前额后说我有热度，站起来要去找医生。我拉住他，把脸凑近，费力地告诉他隔壁的那个人在哭，要他先过去照顾一下。于是他把一包烟和火 柴放在我手上，便拉着水管子过去。接着传来了说话声，水声和那个人喊疼的声音。

天 气热得让我喘不出气，稍微喘口大气，左胸就疼得让人受不了。也不过一分半钟，阿华拉着管子回来，后面跟着那个人，浑身上下一丝不挂，戴着手铐和脚镣。阿华 让他进来，把水管子放在他手里，让他不停地在我的胸上和脚上冲凉

水，阿华自己跑出去请医生去了。这个人看到我手上的烟，马上给自己点了一支，大口地吸起 来。

我确实感到两个光着身子的男人挤在如此小的一间屋里很不习惯，而且也不舒服。我闭上眼睛，要他回到他的屋里去，我自己可以拿水管让凉水在胸前流着。这个人仍不动，继续在我面前抽烟，直到我大声地对他说：「走。」他才站到外面去。

我 口渴，但没有喝水。听说一个人不吃不喝七天左右就可以死掉；不吃东西，仅喝水，还能活三十天。我绝不喝。我闭着眼睛让凉水流过我的胸部，确实感到减轻了一 些疼痛。院子里传来了铁链声，原来那个人正在院里散步呢。有些人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过了一会儿，他进来向我又要烟。我把烟盒给了他，叫他回到他的屋里把门 关上，并告诉他这个白班的看守不是个好东西。他出去了，站在门外对我说：「昨晚那个看守还有阿华都对我说了，只要我顺从一点，最多在这里关两、三天，就会 把我送回到前边去的。」

天。 我暗暗地叫着。人和人真是不一样；这种事也能顺从？我宁可死。我动了动手，让他回去，他还是蛩进院里散步。阿华回来了，看到那个人抽着烟在漫步，一顿连推 带骂地把他关了回去，然后进来一边帮我洗着一边告诉我，医生也是犯人，正在干活，监狱工厂新接到了合同，犯人们日夜加班，谁也不准离开。医生给了他药丸和 一点碘酒，并告诉他明后天也许会肿得更大，但只要不感染便问题不大，慢慢会消去的。阿华发愁的是药只有四粒，最后他决定只能每晚给我吃一粒，帮助我止疼和 和入睡，白天我只好忍一忍了。

中 午，我的双手又被铐到背后，这是对我不吃饭的惩罚。下午，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警察来了，后面跟着看守、两个打手、还有一个穿囚服的中年犯人和阿华。看守打 开门，两个打手把我拖到外面，那警察厉声地问我：「为什么不吃饭？」我回答：「我受到了侮辱，在强奸犯没有受到惩罚前，我绝不吃。」警察马上问我：「你报 告了没有？」我问他：「我被关在这里，向谁报告去？」他没回答我，又厉声地问：「我问你吃饭不吃饭，再不吃饭，马上惩罚。」我马上大声说：「那就开始吧！ 把我右边的乳头也夹烂，右脚趾也踩烂，还有什么？打我、电我、吊我、烫我，来吧！我准备好了！」被拖出来后，我是侧着身子靠在墙上用右脚站着的。我说完 后，他走近我，双手抓着我的胳膊把我拉向他，与他面对面站着。阿华马上走上来，向他们指着我的左胸和左脚趾。其实不用指，肿得那么大，皮肤的颜色已变成紫 色了，一眼就看到的。

那 犯人对警察耳语着什么，那警察厉声地说：「不行！然后对我说：你的事情我会汇报的，现在你必须吃饭！」我马上说：「不惩办强奸犯，我绝不吃！」他马上也 说：「那好吧，动手！」立刻两个打手和那个看守上来把我按到了地上，那个犯人一定就是阿华说的医生，手里拿着一支粗大管子的注射器，什么人把我的胳膊抓得 紧紧的，针头扎了进去。我拼命挣扎着，但丝毫不起作用。我被按得死死的，一动也动不了。足有半分钟了，仍没注射完。我对那警察说：「请你让他们不要把我按 得那么紧，我浑身都是伤，已经喘不出气了。」他没说话，但明显地我马上被放松了，我立即滚动身体，针头脱出来。几个人马上扑上来又死死地按住我，不知道是谁突然把膝盖猛一下压在我的后背上，我左胸重重地贴在地面上，一种像是要炸开般的剧痛，使我连呼吸都顾不上便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 过来后，我发现自己仍在院子里，阿华和那个犯人医生在我的面前，我的双手被铐在前面。我问他发生了什么，那个医生用很重的广东口音对我说：「没事了，他们 让我给你注射葡萄糖，结果又把你弄伤了。你太虚弱，休息吧，我和阿华刚给你洗净了身体，千万不能让伤口感染。一会儿我给你打一针，你会觉得好一点的。」我 摇了一下头，对他说：「你把我治好了，晚上他们还是要把我打伤的。」

阿 华马上说：「我找龙哥说去，他们不会的。」说着，他跑了出去，只剩下医生在这里。我马上闭上眼睛。在警察、看守和那群打手面前这样赤身裸体，我一点都不在 乎，但在一位医生面前我仍感到十分难堪。医生小声地问我：「他们为什么把你伤成这样？是不是为了性要求？你刚才对他们提到强奸，我就有点明白了，你是不是 受到了侵害？」我没说话，也没睁开眼睛，但却摇头否认了。他没有再问，只是在我身上一处一处地擦碘酒，又教我该如何摩擦两个手腕，慢慢地让那些被绳子勒出 的印子消去。

阿 华回来了。听到医生又小声把刚才他问我的问题去问阿华，我马上再说：「没有。」阿华没说话，但却点了点头。医生马上要检查，我拒绝了。他们把我抬进屋，又 扶着我侧身躺下，医生掀开我的屁股看了看，摇着头对我说：「一般来讲，第一次都会受伤的，但不会是这样严重。我以前检查过一个被强奸的女人，也是由于拼命 反抗而造成很严重的伤害，但也没有像你这样严重。我没有药，监狱也不会同意到外面去买这种药的，唯一办法就是用肥皂和清水，每天里外清洗几次，慢慢会好 的。」说完，他让阿华拉进水管来，他要给我清洗，我摇摇头。阿华知道我是不好意思，所以他请医生到隔壁去看一下， 那个人也受了点伤。当医生回来时，我们已经清洗完了。这时看守进来催医生回去，他匆忙地给我打了一针，便离去了。这时阿华对我说：「刚才你不该对警察说什 么强奸的事，这话已经传到龙哥的耳朵里去了，他一定会报复你的。记住，下次见到他时，你千万不要再多说话了。」我看看他，没说话。

看 守送晚饭来。他刚把碗放下，就被我踢翻了。他抬头看我，我把手向他伸去，但他并没有把我背铐起来，而是给隔壁那个人送饭去了。晚上我一直在等着他们来提 我，天已经黑了很久了。阿华来了，说是今天那群畜牲们很忙，因为又有几个人被送来，但关在惩罚监大囚室的人今晚都送回到前边去了，明后天会又送来不少人， 可能连这个小号都会关满人的。他把一粒药放在我嘴里，让我放心睡觉，然后他匆匆地走了。过不久那个夜班老看守悄悄进来了，给我一支烟，又解下了我的手铐， 小声地对我说：「明天下班前再给你戴上。」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怪，在不该有坏人的地方坏人成堆，可在这种坏人成堆的地方，却又遇见好人。

第 二天傍晚，天已经黑了，那个把我送到这里来的审讯官突然带着一群人出现在小院里。两个打手把我拉到院子里，按着我背靠着墙坐在那里。这个审讯官用手电筒照 着我的胸部和脚，两处都肿得比昨天还大。看完后，他问我：「今天吃饭了没有？」我没理他，他是明知故问。他又问了一遍，我仍没有理。他马上喊叫着说：「我 马上下令，让他们把你吊起来！」我还是不理他。他用手电筒照着我的脸，又凑近了我喊着说：「这里是监狱，你懂不懂？你想干什么？」这次我回答了：「我要见 你们的上司。」他又喊着问我：「见上司，想干什么？」我也学着他的样子喊着说：「我要告诉他，我是被你们错抓来的。我还要告你，明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还 把我送到这里，你有什么理由对我喊叫？」他不说话了。

一 个打手突然对我说：「他就是上级，你喊什么？再喊，揍你！」我马上对这个打手喊着说：「畜牲！你又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和我说话？滚一边去！」这个打手扑了 上来，但被审讯官喝退了。这回，审讯官不嚷了，对我说：「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我有权对你做决定，也有权下令让你吃饭；你不服从，我就下令让他们灌你。」说 完，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说：「我明白了，是你下令让这群畜牲们强奸我，是你下令让他们把我伤害成这个样子。现在你又下令让我吃饭，为什么？等我吃了饭， 你再下令他们折磨我？强奸我？我不见你的上司，绝不吃！」他说：「明天我向上级报告，现在你先吃饭，你看 好不好？」我摇摇头说：「见了你上司后，我才吃饭。」他马上说：「你有伤，我实在不想这么做，但我没办法了。」接着，他喊了一声：「给他灌。」几个人上来 按住，一个人用双手捏我的下巴和喉咙，迫使我张大嘴。这时我才看到那个医生把一根管子从我的嘴里插进了食道，由于脸被手电筒照着，我看不见他在我头上边做 什么。

一 会儿，我就觉得有什么凉凉的东西进到我的胃里，立刻胃像是被撑大了似的感觉，我挣扎了一下，知道没有用，直到他们灌完拔出管子后，我突然控制不住吐了起 来，把他们几个按着我的人吐了一身一脸。我听到审讯官喊着说：「不

行！再灌！」我吐完后，又咳起来，这一下不但引起左胸一阵剧痛，而且又开始吐。我看到医 生对审讯官说着什么，审讯官又喊着说：「明天不吃饭，还灌你，听到没有？」说完，他走了。医生、打手们也走了。

看 守正要拉我进屋，阿华拉着水管子来了。他把看守打发走，一边在用水冲洗着我吐出来的苦水，一边伸过头去对关在隔壁的那个人说：「一会儿他们就来提你了，今 晚你是第一个，你要是不想让他们把你吊起来灌水的话，我现在就在这儿给你灌水，今天晚上你好好的，一两天后就送你回前边去了。」那个人马上说：「别吊，别 吊，我服从。」阿华把烟和火柴放在我的手里，对我说：「我先打发走了他，回来再给你好好的洗。」

阿 华人好，肯帮助人，对我很是照顾和体谅。在这里的活动范围又很广，很吃得开，什么都搞得来，黑畜牲的人脉大概都不如他。上午来看我时他还给我带了一块鱼 来，后来我让给隔壁那个人吃了。但让我反感的地方是他劝说被关在这里的人去顺从那群畜牲们，加上今天上午的这次，他已隐隐约约地劝说我三次了，我都没理 他；他劝说隔壁的那个人时就不隐约了，他是干惯这种事的人，所以在说话上也不忌讳，实话实说。听到他在昨天和今天劝说隔壁那个人的话，真令我恶心。那个人 显然是听了他的话，表示会去主动迎合和顺从。对于他的这种顺服，我是能了解的；看到我这个样子，谁见了也害怕。

隔 壁那个人是个爱说话的人，和阿华一样，整天地找着话和我说；我不理他，他也说。可昨天来人给我注射时可把他吓坏了，后来和我说话时他的声音都是发抖的。我 是不想活了，所以才敢这么干。他不同，他有家小，巴望早点出去和家人团圆。现在听到他和阿华有说有笑地聊天，我替那个人难过，也更对阿华反感。两个人出来 了，阿华让那个人自己去，他拉过水管帮我洗着。那个人还居然对我笑着，打招呼后真的自己走出去了。我真的不理解。

阿 华是聪明人，他看出我是在找死，也不管我理或不理他，总有说不完的话，又想让我高兴，对我照顾得好。他仍试图找机会劝说我，但无论他说什么，我也不想说 话。想让我也像那个人一样，高高兴兴地走出去让畜牲们对我干那种事，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他给我点了支烟后，便出去说是要看看隔壁那个人现在怎么样了。过 了一会儿，他跑回来高兴得不得了，正要对我说什么，我给了他一个难看的脸。他马上转了话题，一直和我说到老看守来上班，才把一粒药放进我的嘴里走了。

在 我绝食第四天的晚饭前，那个审讯官又来了。这次是他一个人来，连看守也没带。他蹲在门外看着我，然后又给我一支烟。我没有接。我已经很虚弱，他抽

着烟，看 着我。他当然看到我左胸被夹的地方已经溃烂，两处烫伤也化脓了，大脚趾上不断地有血水流出。这一次，他没喊叫，反而用一种很平和的声调，问我有什么要求没 有。我没理他。

他又表示现在他是代表上级来的，接着他说：「第一，上级同意立即调查你被捕的原因，但需要时间，你要安心等待；第二，我已下令今后停止对你用任何刑，而你只做两件事——马上吃饭，然后接受治疗。你同意，咱们就马上开始做，你看怎样？」

我 坚持要求惩办强奸犯，他马上做出很吃惊的样子来，并表示他不太相信会有这种事发生。我扭过头去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我向上级报告要求调查此 事，如果确有其事，那是一定惩办的，你同意不？」我没说话，他又说了一遍，并表示他以他的名誉担保，会尽快做到这三件事，我则必须做到那两件事。尽管我根 本不相信这个人会有什么名誉，但事情到了这个程度，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也实在没有理由说不同意，所以只好点点头。

他 马上对我笑了一下，并把看守叫了进来，对他说：「在没有接到我的新命令前，免除他的手铐。」看守马上给我解下手铐。他又让看守把水管子拉进来，宣布今后对 我全天供水，不用水时就让水流入下水道，既可清除污物，也要减少屋内的恶臭气。下完这些命令后，他又蹲在门口，伸进一只手拉起我那只化脓的手看了看，对我 说：「我让看守现在就去端饭，你吃完饭，医生也就来了。你做到这两件事，我就保证把那三件事办到，怎么样？」我只好又点点头。他走了后，看守端来了饭，蹲 在门外不走，说是要看着我吃。饭仍是只能吞不能嚼，我的食道可能由于插管子灌水后发炎，甚至吞不下东西了，只好用汤泡饭去喝。胃可能也收缩了，仅喝了几口就胀满了。我告诉看守我实在吃不下了，他没有强迫我，要把剩下的饭和汤端走。我请求他能不能把我的剩饭给隔壁那个人吃，因为他总说吃不饱。看守没说话，把两个碗推了过去后就走了。这个人对我说了不少感谢的话。

不 久后，阿华和那个医生来了，还背来了一个小药箱，看守也没跟过来监视。医生马上与我握握手，祝贺我的「胜利」。听了他的话我差点哭出来，只是当着阿华的面 不好说就是了。我已经成了最下贱肮脏的人，还有什么胜利？我忍着自己的情绪，向他谢了这几天对我的照料；他用手拍了一下小药箱说：「再好的医生没有药也是 无用的。他们买来了药，现在我才可以真正帮助你了。」他们两人把我抬到院子里，医生拿出了一块医用肥皂，和阿华一块儿帮我从头到脚洗了一遍后，医生便开始 对我检查、治疗和用药。阿华则用刷子和水，把我的囚房从屋顶到四壁及地面全部刷洗了一遍，然后又在屋里和下水道周围撒上消毒

水，苍蝇、蚊子全跑了。医生用 纱布和绷带包裹住我所有的伤口，最后又给我打了针。都做完了后，医生摇头叹道药品仍不全，这只是草率了事的应付。

而我、阿华和隔壁的那个人却已都是满足得不得了。在以后的十天中，医生每天来一次。伤口结疤了，肿也在减小。二十多天没人来提审我，也没人来铐我的手，但脚镣仍戴着。除了腰间那块布，仍没衣服，而且仍关小号。

伤 处逐渐平复，体力也开始恢复后，想的事情就多了。首先是这种像动物一样，二十四个小时被关在如此小屋里，滋味越来越难受。我好像是被世界遗忘了一样，开始 怀疑古叔和我叔叔已忘了我，或他们是根本没有能力救我出去的。那个审讯官说会去调查我的被捕原因，至今也没有消息。我相信他们根本就找不到那两个便衣，否 则那两个便衣早就在这里出现了。这样下去，结果又会是什么呢？难道他们就这样把我关下去？关多久？我开始失去信心，而且变得烦躁；不知道机会在哪里，甚至 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

这 副脚镣更是让我时时感到绝望，只要我一动它就发出响声，好像总是在提醒着我什么似的。所幸阿华对我始终像个朋友一样，他也和那个医生一样认为我是那四天绝 食的胜利者，所以很是佩服我。每天一定会带烟来看我几次，有时又带吃的东西来。每当关在这里的人又被送回到前边去，我心里总是么不舒服，无法不羡慕他们， 又对自己感到无望。

这 个小院里总是不断有人被送来，最多的时候四间小号里都有人。有哭的，有叫的，整天说话声不断，日日都是人声嘈杂、乱哄哄的。晚饭后就是把手铐在背后的时间 了。看守的喊骂声，人们的哀叹声、抱怨声不断。天黑以后是提审时间，于是杂乱的脚步声、喝叫声、脚镣声又混成一片。有的受了刑，有的被那群畜牲们干了那种 事半夜被送回来，又喊疼又哭骂的，一整天都没有清静的时候。

我 从不对任何人说话，无论任何人问我问题我都不回答，这一点首先就等于得罪了人。我受到不戴手铐的优待；阿华总是来和我说话，我的屋里也总是香烟味飘出去， 这些人开始认为我和阿华是一样的人，于是挖苦或咒骂我的各样的话都有，而且公开地大声说，刻意让我听到。阿华一来，他们就不说了，因为他们是需要阿华的帮 助的；但阿华不在时，我就成了他们发泄的对象。他们对我最文明的称呼是「卖屁股的」。其它多到十种以上的不同叫法我都说不出口，更不敢告诉阿华，因为等于 是在骂他。我忍着。这里人来人往，一个传一个，于是我的名声越来越坏，甚至有人刚来几个小时就开始骂我。

一 天，一个广州的大学生被送来，他是那么年轻，看上去可能刚二十岁，整天也是一句话不说。是阿华告诉我，他是大学生，前年七、八月被捕。监狱的人们一点儿也 不知道外面的事情，例如前年的民主运动、六四天安门事件等等，他们根本不知道的。阿华说这个大学生是前年七、八月份被捕的，那时期正是大屠杀后的大清洗、 大搜捕时期，由此我立即对这个学生抱有好感与极大的同情心，总是让阿华过去照顾他。这个大学生被带出去提审时，当夜是被两个打手抬回来的。当时我的心都碎 了。隔天我让阿华去求求黑畜牲，千万不要糟蹋了这个年轻人，差点说出「我愿代替年轻人去受辱」的这种话。

阿华去找黑畜牲去，但不知他是怎么说的。他告诉我，已经太迟了。昨晚这个年轻人已被糟蹋；然后告诉我黑畜牲让他带着口讯给我，只要我顺从，一切事情都好商量。我托阿华把我的回答带给黑畜牲，叫他只要记住：我早晚杀了他。

一 天晚上，这个大学生又被带出去提审；在路过我的门口时我对他说了一句：「要坚强！」他站住，转过脸向我吐了一口口水，然后说：「你不配和我说话！」然后扭 头走了。我站在那里差点没有哭出来。我不怪他，他听了太多关于我的坏话。大约十天左右，这个大学生的惩罚结束，看守押着他经过我门前时，我笑着对他说： 「多保重自己。」他对我冷笑了一下说：「这几天让你失宠了，真对不起。」

阿华当时正在我屋里坐着，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多说。我心里很难过，但喜欢这个有骨气的年轻人。又一天，一个大约四十岁的女人被送进来，关在这里的另外两个男 人兴奋了。整天和那个女人说下流话，又互相打趣开心。这个女人简直就是一个泼妇，什么难听的话也说的出口，什么样下流动作也做得出来。每次她被带走和送回 来时，路过每个小号的门口，她都站住转过身让小号里的人看她的正面的全裸体。黑畜牲和那群打手们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女人，每天几次提出去送回时她是喝得醉 醉醺醺的。

后 来那两个关在这里的男人也被提前送到前边去，有两天时间这个小院里只有我和这个女人。她失去说话的对象，于是就与我说话。我不说话的，所以只是她一个人在 说；她也是听过了足够关于我的坏话，所以说出的话都难听极了。她说我和阿华都是靠卖屁股吃饭，我不如阿华会卖，所以受罪。她说阿华在这个监狱里又自由又不 吃苦，无论这个监狱的前边还是后面都吃得开，因为阿华有诀窍。她说她本人也是前边、后面都卖，所以她懂阿华的这个诀窍。正当她讲到最

难听、最下流的地方 时，正巧阿华进来，也听到了，立时去开她的小号的门，进去用水管子抽打了她一顿，打得她的嗓子都喊哑了。

打完阿华把她的手铐在了背后。当天这女人被提出去后当然要向黑畜牲告阿华的状了。但看起来阿华与黑畜牲似乎各人有各人的后台和势力，且互相有默契，谁也不得罪谁。这女人算是败在阿华的手里，从此绝口不提阿华名字，但恨起我来，认为是我挑唆阿华去打她。

隔 天上午，突然来了两、三个打手。我在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情形下被用绳子套住脖子，捆在门的钢筋上。这女人得意了，开始对我破口大骂起来，骂出的话下流极 了。刚巧阿华正好进来，一句话没说松开了我的绳子，又跑出去把打手们骂了一顿。这女人正骂得高兴，不知道阿华已经松开了我。阿华回来听到女人正在骂，他拉 着水管子又要过去了，我拉他没拉住，叫他也叫不回来。他开锁进了女人的小号，说要给女人洗洗脏嘴，那女人先是骂，后来尖叫，再后来是哭，最后开始求饶。阿 华又把她的手背铐起来，那一天和晚上都没有人来提这女人出去，直到第二天下午打手们才来带她，她双手仍被铐在背后。这次以后，这女人再不敢公开骂我，与新送进来的人说话时提到我都是小声地说。

阿 华笑着告诉我，他拿那女人的肛门当嘴，向她的肛门里灌了五次水。我没笑，问他知不知道这样做是要出人命的？无论是灌水或是灌气，都会死人，以后千万不要这 样做了。他愣愣地看着我，点点头说他确实不知道，这是第一次有人告诉他。到这时我才对他说，就是因为这样，他曾是我最害怕的人。他听后，反而得意了。

第三十七章 在我死前先玩够你

一 天晚上，两个打手叫我出去。他们没有把我带到审讯室去，而是把我带到了那个有大树的小院里，并迅速地把我又高高地吊起来。我问为什么，得到的是几个打手们 的哈哈笑声。一个打手迅速踩着我脚上的铁链，当我听到水从水管流到地面上发出的声音时，我立时明白他们又要做那事了。同是那张大木桌子，我又是那种姿势被 捆到桌子上去。所不同的是我被捆得更紧了，身上布满一道又一道的绳子。不要提根本没有余地去动，就连喘气都感到困难了。打手们都出去了，我感到绝望。我之 前向警察和审讯官告了这群 畜牲们的状。他们是要报复我，所以才把我捆成这样。阿华也告诉我，要小心已经知道我告了他状的黑畜牲。现在怎么办？就这样老老实实地再让他们糟蹋？绝对 不。这时黑畜牲进来了，凑近我的脸，对我说：「照你的说法，我是早晚会死在你的手里啊，所以我在死之前，先玩够你！」他这话已是说绝了，倒让我不知说什么 好。软下来去求他？也不可能。不对我干完那事，求不但没用，反而他会用这事时时威胁我。正感到没办法时，我感觉他已经把那东西对着我的屁股了，手又在我身上乱摸起来。

我 急了，突然对他说：「我知道你是黑社会老大，道上的人都讲义气，不干这种下三滥的事，你是条汉子就放了我，随你怎么折磨都行，若叫唤一声我就不是个男 人。」他笑了起来说：「谁告诉你黑道上的人不×屁股的？你好好让我玩，我准对你讲义气，以后你的事都在我身上。」我马上说：「你讲义气就好办，你放了我， 咱们一对一正当地打一场，一分钟之内我准打残你……」我没说完，他猛地一下插了进来，疼得我咬紧牙吸着气。他又笑了，对我说：「在你打残我之前，我要先干 残了你。」说着，大力抽动了起来，疼得我眼前一阵阵发黑，又拼命挣扎了几下，不但毫无用处，反引起他的得意大笑。

突 然，之前那个泼妇骂过我的话从我嘴里滚了出来。他愣住了，显然这是他没想到的。这也是我没想到的，也许是真的急得没办法了。他马上笑了一下，表示不在乎， 我继续把刚才没骂完的话又接着骂下去；由于被捆得太紧，不能高声骂出来，就用了刚才说话时的那种声音骂他，那泼妇怎么骂我的，我就怎么骂。

他 仍大动着，可是当我骂到他父母时，仅几句他就受不了了，马上停止，跑到我面前大喊着问我想干什么？我停止了骂。但他一回到我的身后，我又骂起来。他开始有 意弄疼我，我忍着疼，把我听过的话一再反复骂出来。谁说这种人不怕被骂？估计也就是半分钟，黑畜牲吼叫着跑出去拿了皮带回来，在我的屁股、大腿上抽打。我 不骂了，任他打、烫我。他抽打一阵，可能是火气消了些，扔下皮带又干了起来，而我马上也再开始骂起来了。这回他不行了，尽管我一动都

动不了，他那个东西出 来一次后半天都再插不进去了。他暴怒，跳到我的面前，在我的两边脸上打了两拳，当即三个牙被打掉，满嘴的血。

我拼命将血沫对他吐去，仅吐到他的手上和衣角。他出去了。这两拳打得我晕晕的，我振作自己，等着他回来折磨我。但黑畜牲没有回来，打手们也没来，没有人来打我，也没有人来放了我。

屋 里静静的只有我一个人，我想足有一个钟头过后吧，黑畜牲来了；喝了酒，酒气很大。他一句话不说，走到我身后就狠命地一下又进入我。顾不上疼，我马上就又大 骂起来，把最肮脏、最下流的话都骂了出来。这回他也改变战术，也马上高声骂我，但没半分钟左右，他又不行了。他一边骂一边拣起皮带重重地抽打着我的屁股， 我马上就不骂了。

等 消了气他又想继续时我又骂起来，他也骂着我；这一次足足有半分钟，他那东西都再插不进来。他跑到门外，大喊了一句什么，马上一群打手跑来，黑畜牲喊叫着指 挥着，几个畜牲轮流地上来，我提高声音不停地骂着，终于我的嗓子全哑，疼痛也使我有些昏迷了。又一个畜牲上来，我听到黑畜牲喊叫着说：「骂，别停呀，怎么 不骂了？是不是开始觉得舒服了？」马上一阵令人恶心的笑声，我用足了力气喊道：「我非把你们都杀了不可！」但我知道声音并没有发出来，引来又一阵的笑声。

这 一晚对我的侮辱和糟蹋仍没能让黑畜牲消了气。他们把我又吊到了树上，也没有人来给我冲洗，那些喷入我身体里的脏东西开始流出来，流到腿上。耻辱、恶心加上 憎恨，使我有要哭的感觉。这时黑畜牲来了，牵来了一条黑狗，对我说：「你敢说能在一分钟之内把我打残废，我能在一分钟之内让狗把你咬残废。」说着，他把狗 放过来，在我的两条小腿上又咬又抓。我试着用脚去踢牠，但脚镣限制了我。这时黑畜牲高兴地说：「我就想听你叫唤，你求一声，我就不让狗咬你。」我咽了一口 口水，大喊一声：「畜牲！滚开！」那狗竟马上跑回到黑畜牲的身边。这一声大喊引起我一阵剧烈咳嗽，本来那狗还要再扑上来，但这阵咳嗽声使牠不敢靠近。黑畜牲看了看，竟一点反应也没有，转身走了。

由 于天黑，我看不清腿被咬成什么样，但我能感觉到有血水在顺着腿向下滴淌。小院里没有人，审讯室也没有任何的声音，周围极静，只有我一人被吊在这里。不知道 人都到哪儿去了，尤其不知道阿华为什么一个下午都没去看阿山，不知他知不知道这群畜牲今晚又糟蹋我，或许阿华知道并有意躲开了；或是这群畜牲

专挑今晚阿华 不在，才又糟蹋我。不管怎么样，我想我现在需要阿华，需要人。那个关在小号里的泼妇原来是个妓女，这两个星期来这些畜牲们每个人至少与她有过十次的性行 为，天晓得这女人有没有性病或艾滋病。这次的疼与第一次的疼一样，证明我又受伤了，如果喷进去的脏东西进了伤口的话—— 我不敢想了。被狗咬也是必须去医院打伤风针，狗嘴脏，至少需要个人来给我冲一冲。但是没有人，一切静得怕人。

渐 渐地我没有思想，也没有感觉了，脑子空空，不知是不是睡过去了。突然脚上铁链响了一下，我惊得睁开眼睛看着四周，没有人，周围仍静，天好像发亮了，我又开 始有点昏沉沉的。也不知道是睡着还是醒着，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了似的，甚至并不感觉我正被吊着；可又好像我什么都知道，知道太阳出来，知道是中午了，知道我 极口渴，知道眼前不断冒金星。终于听到有人来了，接着有人和我说话。突然，有人扒开我的屁股，马上惊得我浑身一震，惊醒了。是那个泼妇的声音。她明知故问地问我昨晚干什么去了，又在我身上到处乱摸；又站在我前面用手摆弄着我的生殖器。

我 睁开眼，但立刻又闭上；她赤裸着身体，脸上那种笑既下流又恶毒，下流的语言好像流水一样从她的嘴里流出来。她赤脚跑出去，但很快又跑了回来，下流话马上变 成了恶毒的咒骂。她竟拿来皮带开始抽打我，一边骂着一边数着打我的次数。她仍记恨阿华刑罚她的那几顿，所以加倍地向我报复着。打累了，她抽烟，又走近我， 用香烟在我胳膊上一下下地划动想烫我。我不觉疼了，全身早已没有知觉。

一 个人影跑进来，一下子推倒了那女人，马上放下了我。躺到了地上我才看清是阿华，他揪着那女人的头发大声喊叫着。两个打手也跑进来，阿华命令他们把那女人吊 起来，我向阿华张了张嘴，但没说出话来。阿华拉来了水管子送到我嘴边，我拼命地喝着水，然后对阿华说，叫他放了那女人。他一边解我手上的绳子，一边喊着 说：「不行！你还不知道她对阿山都说了什么呢？」说着，他转过头开始骂那女人，真没想到阿华骂起人来竟一点儿也不比这泼妇逊色。松开了我手上的绳子后，他 让打手送我回去，他捡起地上的皮带要去打这泼妇。我大声地叫住了他，然后要求他先别管那个泼妇了；我全身没有了知觉，希望请他帮我洗干净。

原 来，昨晚黑畜牲打掉我三颗牙后，就把这个女人提出来。刚才这泼妇告诉我，她是如何帮助黑畜牲重新又恢复了性欲，致使一小时后黑畜牲第二次又来对我做那种 事。阿华把一支烟放在我的嘴上，对我讲述他如何收拾那个泼妇的经过。我几次打断他，问他昨天和今天白天到那里去了；他支吾两声不肯说，我也就不

再问。他一 再保证他确实不知道我被吊在那里十六个半小时，他今天下午来找我，见我不在，跑出去找这才发现我被吊着。

他 尽力洗净我身上遍处的污秽与脓血，我早已奄奄一息。阿华坐下，开始提及他对我的状况的一些分析。他对于有关我被错抓的一些问题，态度一向很犹豫、不明朗， 这种态度反而让我一直更想知道他的真实看法。终于他现在要讲出来了，尽管我已经虚弱疲困得睁不开眼，但马上振作起来；阿华是我入狱以来第一个想要听听对我 这件事的意见的人。他说，即使我是无辜的、百分之百是被错抓的，也要根据我的态度，至少被关在这里一到两年，非把我折磨到完全沉默，忘了是被错抓来的，然 后送我到农场，由农场再放我。

阿 华说：「抓你来了，你就是有错，如果你没错那就是他们错了，那还了得，公安局能错吗？其实公安局错抓的多了，可有那个人出去以后敢说他是被错抓的？都是在 监狱里被打服了，折磨怕了。到再审问你的时候，审讯官一问你为什么被抓，你马上吓得浑身哆嗦地说：『我有罪，我有罪，抓我是对的。』这种态度就没问题的。 你听过一句话没有？『罪行不在大小』，只看你的态度，等说出了他们想听的话以后，再关你几个月收拾你两顿送去农场，家里人再送几百块钱去，就自由了。像你 现在的这个态度和对他们说话的方法，我敢说一年两年之内，你不但去不了农场，连被送到前边去都不可能，只能被关在这个小号里不停地挨打受刑。事情总得有个 结果，或者打服你，或者打残、关疯了你。公安局就是个大黑社会，比真正的黑社会还要坏上十倍。为什么现在黑社会的势力越来越大，就是因为警察太坏。所以我 劝你几次，顺从些，让龙哥喜欢你，马上就可以不戴刑具，不被整天关着，抽烟喝酒吃肉也不是问题；然后请龙哥去对他们说说，早点送你去农场，黑社会和公安局 都是一环环勾着的。」老看守也来了，一边解下我的手铐一边说：「那个叫龙哥的人原来判的是死刑，后来不但改成二十年，还让他在这里管事；我敢保证最后他连 十年也待不够就会被放了。你知道为什么？一个字：钱。

阿华说的对，我也劝过你服从，别顶着干。文化大革命后，人心全都坏了，没人再讲气节、道德。我知道他们昨晚又对你干了那事，别自己又想不开，该吃亏就吃亏，该软就软一点，才是真大丈夫。」一会儿，他拉着阿华走了。我想着他们的话，没有几分钟后就沉沉睡去。

早 上醒来时，手铐已经在我手上。除了嘴边的肿消下去了些，浑身都在疼，被打的屁股仍让我无法坐，只好侧着身半躺着。阿华说那个黑畜牲对我感到抱歉，因为那天 晚上他吊起我后就去喝酒，结果喝醉把我给忘了。我问阿华这话是什么意思，抱什么歉？一个人做出了一件令人受伤一辈子的事后，就表示一个抱

歉？阿华马上就笑 着打断我，问我对他昨晚说的话是怎么想的，要我说说，他想办法帮助我。这半天多来，还没抽出时间考虑，所以对他说我需要想几天；我也说，无论如何我认为他 对我说的话都是他心里话，所以我很感激他。他马上又高兴了。

以 后几天，这个小院瑞安静了。那女人斯文了一些，听不到下流的脏话了；没人打扰阿山，也听不到有人骂我。阿华每天都来几次，每次都带来吃的东西，有时是肉， 有时是鱼，而且还拿来挺多。我不喝啤酒，他用杯子拿来白酒，可以舒经活血；我浑身始终疼，因为被吊的时间太长了。烟也不像以前一样来一趟给我一两支，这几 天他整盒整盒地拿来给我。我嘱咐他不要这样经常拿东西来，一旦被发现他会有麻烦的吧。他满不在乎地说：「怕什么？龙哥也说要我常过来照顾你的。」听了这 话，我也明白了我与黑畜牲之间的斗争远没有结束。我该考虑一下主动去与黑畜牲谈话，暂时缓解一下关系，看情形再想下一步的办法。

有 了与黑畜牲做一次谈话的想法后，还不及考虑怎么说和谈什么，就在被吊了十六个小时后的第六天晚上，门开了，两个打手让我出去；老看守还没来上班，我的手还 在背后铐着。当他们推着我又进到那个有大树的小院里时，我知道已经太迟了，没能走在黑畜牲报复意念的前面。我拼命地想着补救办法，或者今晚谈？怎么谈？当 我又被像上次那样紧紧地捆到桌子上时，我在脑子里已有个大概。打手们出去后，阿华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说他已经和黑畜牲谈过，同意今后在他的势力范围内我可 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几个月或半年后黑畜牲会与审讯官商量把我送去农场。他告诉我这是他为我想出来的最好办法，也是唯一办法，要我从此一定要顺从，忍一 忍，让黑畜牲满意。

事情的改变就在今晚，最多半年可以获得自由。听了他的话，我很是生他的气。他怎么可以代替我与黑畜牲做这个交易？看到他与我说话时的那副认真的样子，我又不能对他真生气；他就是这种人，就是干这种事的，当然他不在乎，所以他才理解不了我的心理和对这种事的厌恶看法。

我 左脚被捆得太紧，受着伤的大脚趾不知被挤在什么地方疼得厉害，我请他看看，帮我活动一下。他松开绳子摆正我的脚，又重新捆上，嘴里还在不停地说着。我刚想 叫他住嘴时黑畜牲进来了，推开阿华，命令一个跟他进来的打手堵住我的嘴，那打手用一块散发着浓烈汗臭味的毛巾拼命地往我嘴里塞，顶到了我的喉咙，连咳嗽都 咳不出来了。黑畜牲笑着对我说：「对不住，上次你把我骂苦了，今天只好堵上你的嘴，你若老老实实的，今晚我绝不会收拾你。」说完他又问阿华：「都对他说 了？」阿华回答：「放心吧，都告诉他了，捆得这么紧，他还

能怎么办？」他拍了一下我的肩，低声对我说：「记住我刚才的话啊。」然后就和打手一块出去了。

屋 里只剩下我和黑畜牲。他拉了一张椅子坐在我身后，一边乱摸着我一边像是在吃着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今天，你老老实实地让我×，然后我就不堵 你的嘴了，你哼个两声中听的让我听听，我就放你去睡觉。从明天起你归我，谁也不敢碰你，要想放出去的事就包在我身上，而且在我的这块地盘上你也自由了，想 干什么干什么，都由你。」听他今天说话很平和，我想这正是个机会和他谈谈，所以我不停地摇动着头，想让他拿掉这块毛巾，我好和他说话。正在这时，他把东西 插进来了，摆弄着那东西。

由于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马上紧张起来，嘴堵着喘不上，鼻子的呼吸变得更急促。过 了一会儿他到我的面前，嘴里带着酒气向我喷了一口烟，对我说其实他一直喜欢的是阿华，可阿华被几个大头脑包围着，他从来没能动过他。我被送来的当晚，他就 也喜欢我了；只是因为我不顺从他，才几次对我下手狠了些，可反而更喜欢我。他又说他不喜欢南方人，瘦小，没点男人气，皮肤又黑云云，接下来开始说的就又是 一些下流之极的话。

我 拼命地冲着他晃着头，扬着脸，两眼看着他，希望他拿掉毛巾。他说他明白，然后只是对我笑，又坐回到我的身后，说我上次把他骂苦了，恨不得两拳打死我；然后 又问我今晚能不能让他满意，我抬起头拼命地摇晃。他出声笑着，然后又摆弄着那个已经插进来的东西，并且一出一进地抽插。我又紧张了，同时不明白他为什么不 像以前两次那样上来就做。听声音他好像还在喝酒，我想他一定是想把我耗疲劳，就挣扎不了了。想到这里，我也尽量放松，同时小心听着他的动静。他站起来用两 只手在我身上到处摸着，我反感极了，猛地挣扎两下，他哈哈地笑说他最喜欢看到我挣扎，只是一会儿他干那事时别乱动就行了。

我 的火气开始冒起来；一是被他的话激怒，二是心里发急，到现在还一点儿办法都想不出来如何抵抗一会儿就要发生的事。黑畜牲不急不忙地耗着时间，用手在我的屁 股一下一下地拍打，每拍打一下，那个已经插进来的东西就颤动着，黑畜牲笑着，还不时对我说着话。他是在玩弄我，拿我开心；我开始失去冷静，这段时间显得那 么长，那么难捱，如果不是嘴被堵着的话，我会对他大喊：「不就是想×我？来吧！」这一场羞辱终于结束，但另一场随即开始了。我明知挣扎是没用的，但那也是 我唯一能做的事，我不能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让他侮辱我。

黑 畜牲似乎很得意，一边动一边说着我今天表现得使他很满意，如果我早就这样的话就不会受到那些折磨了，过了一会儿又说今晚要我住在他屋里去。我已挣扎得满身 出汗，而且疼得浑身颤抖，开始去挣动两条腿，移动屁股，力争甩掉那东西。这一回桌子在我的挣扎下挪动位置，发出了声响；正在这时我突然发现我的左脚可以活 动，又再狠狠地挣动一下，似乎感觉到有一道绳子在脚腕上。继续挣动，脚终于挣脱出来，但已经太晚，那个畜牲正在我的体内发泄着。我狠命

地 用左脚向后蹬出去，那畜牲立刻尖叫一声，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我不知道踢到他什么地方，但我知道这一脚相当有力。几个打手跑进来，黑畜牲肯定是疼到说不出话 来，只是叫着。屋里立时乱成一团，打手们跑进跑出，有人把我的脚又捆到桌腿上去了，有人喊着去找阿华，让阿华去请医生。我在极力地平静着自己，等待着他们 的报复。果然不一会儿，皮带抽在我的屁股上。我闭着眼睛数着数，在数到二十二时抽打停止了。有人扒开我的屁股，我以为什么人又要做那种事，刚一挣扎，一根 硬梆梆、烫烫的东西插了进来；我只觉身体猛烈地震动了两下，便什么也不知道了。事后我才从阿华那里知道，那是一根烧得热烫的铁棍。

我是被凉水浇醒的；发现自己躺在那个专门吊人的小院的地上，阿华正在向我身上浇着凉水，火辣辣的纠心疼痛占据我的全身。这一次，我才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疼，什么又是难忍，几次我疼得用头撞地；阿华马上抱住我的头。医生进来了，什么话也没说，马上给我打了一针，很快我的神智就又模糊了。医生摇着头说：「太残酷了。我对他们说了必须马上送医院，他们不同意，要我治。我没治过烧伤，这里又没有书，我只能试试看。」可能是我的伤真的太可怕，最后医生束手无策，让我吃了几粒药后即匆匆走了。

第三十八章 让我安静地死

不 久后，看守来送饭；看到地上那碗前一餐的饭，问我是不是又绝食了。我点点头，把手伸给他让他背铐我。但他没有动，马上说他要去报告。其实我根本还没想好下 一步怎么办，看守的话倒提醒了我。这次伤得那么重，正是个机会，又是个借口；我该做点什么事，如果又像上次一样什么也不做的话，「下次」又会很快到来，而 且不知道又会是什么。事情总得有个结局，我要按我的办法去做。求人，我就要付出代价，那个代价我不愿付也付不起。凡事要靠自己，我已经这样了，他们还能拿 我怎么办？再往我食道里灌水？我不怕。再用刑？我也不怕。与其这样没完没了地受辱、受刑，倒不如死好。这一次，或者我胜，或者我死；一定要弄出个结局。

一连三天，什么事也没发生，既没来灌水，也没人来提我出去。医生晚上来一次，打一针，吃几粒药，一句话不说又匆匆走了。白天的看守仍执行他的职责，晚饭后把我背铐起来，老看守来了又给我解了下来。小号里被关的人都静悄悄想要看看事情会如何发展。

打 手们没来提他们出去，估计黑畜牲伤得也不轻。到了第三天，我已虚弱得不想说话也想不了事情，被烫的地方开始有水一样的东西流出来。那天的晚饭后我双手刚被 铐到背后不过十分钟，那个曾带着人来强行给我注射葡萄糖的警察来了，另有一个矮矮胖胖、头上只有几根稀疏头发的人站在门外，这个人的身后是阿华、看守，还 有那个医生。我以为又是来注射或灌水的，所以仍趴在地上没有动，等他们来拖我出去。

医 生进来了，一把扯掉那块我系在腰间的遮羞布，然后扒开我的屁股让警察和那个人看，又指着屁股上被抽打的伤痕、后背上一道道的绳子印、后背和右手被烫的地 方。然后他和阿华两人又把我翻过来，指着我的左胸、腿上被狗咬出的伤、大脚趾上那个翻起来的指甲、胳膊上被烫的地方、手腕和腿上的绳子印……；那个秃头的 人看得很仔细，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说话，医生也仅是用手指着我浑身各伤处而没有说一句话。警察问我有什么话要说，现在都可以讲出来，又指着秃头的人向我 介绍，说他就是监狱当局几个主要负责人之一。秃头的人立刻对我轻轻地点了一下头，又做了个手势，看守马上进来拿掉我的手铐。

我 用双手费力地撑起身体，把头靠在墙上，看着这个负责人。我决定对他说，且尽可能地多说，但必须小心地说。这个人看起来年龄与我相仿，白白的脸上带着文气； 在看我的伤处时，有两次皱了一下眉。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个人也应该是和我一样同属于八十年代中以后根据赵紫阳提出的「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而提拔起来的 知识份子。这个人很可能是我的机会，无论如何要把握。

我 开始按着我的思路，尽可能平静地对他讲起一切。首先，我坚持我是被错抓的，一定是误会。我把曾对讯官们说了两遍的理由对他又重复了一遍，接着便狠狠地告了 那个审讯官一状，提到他的审问方法上的问题：滥用刑法，不准受审人说话；明知这里是个什么地方、会发生什么，但仍把可能无辜的人送来受辱受刑；一个月前他 代表上级向我保证的三件事，到现在一件也没有做到，我反而被轮奸一次，强奸一次，被吊十六个半小时，被打、被狗咬、被烫。我不受这种侮辱和这种折磨了，我 想死。绝食不是要抗议什么，只是为了死。时至今日，我不知道为什么被抓来，更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受到这些；没有人对我做出任何解释和说明，我已经感到这样的 忍受没有尽头，我绝望了。一个人死了不会影响任何人或事，请他不必关心，如果坚持认为我违反某项规定或者是在对抗什么的话，下令处罚我或者再让那群畜牲们 强奸我、用刑，我不在乎，我只是想死，早早解脱。说到这里，我感谢他来探望我，然后对那个看守说：「我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请把我铐起来吧。」说完，趴到 了地上，把双手放到背后。没有人来铐我，我听到他们在低声说话。我静静地等待着这个人的答复，过了一会儿听到那个警察对我说：「领导已经做出了指示，会马 上派专人调查你被捕的原因，也会调查这个惩罚监里滥用刑法和强 暴、轮奸的问题，并且下令立即采取措施对你进行治疗。领导说这些事情都是需要时间的，请你放弃绝食的念头，耐心等待。」我不说话，仍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 警察问我听到他刚才说的话没有，我仍不理他。医生进来了，伸手来摸我的前额，对我说：「这位领导是个极负责任的人，他答应的事一定会办到的。」我仍不说 话。

医 生出去了；时间不久，我终于听到这位领导说话了。他很缓和地对我说：「你不要想死，人死了就什么事也做不了了。给我一点时间，我会让你看到这几件事都有个 结局的。即使你是无辜的，我也不会让你带着一身伤出去。现在我们分工：你吃饭、接受治疗；我去办这几件事。还有什么要求，可以都说出来。」听他说完了，我 又撑着身体把头靠在墙上对他说：「按道理讲，你说的话我应该听，但是上次那个审讯官曾自称代表上级对我讲过和你一模一样的话，我相信了，后来却又受到报复 性的折磨和强奸。这几天我一直在后悔，如果那时不听他的，我早死了，就没有这些事发生。到现在，我的要求只有单纯一个：让我死；或帮助我，不要来打扰，让我安静地死。不要在精神上折磨我了。」

我 刚说完，他马上说：「你说的这件事我不知道，也无法对你解释什么。现在我可以告诉你的是：相信我。给我同时也给你一个机会。」那个警察接上来说：

「领导的 话你要相信。上次的事领导不知道，这一次你相信领导的话，还有什么要求，尽量提出来，领导会考虑解决的。」他说完后，这个秃头的人向我点了一下头。事情到 了这一步，我反倒没话说了，无论如何对我来说这又是一次希望。我又提出了小阿山的事，秃头对我说：「这一两天，我派人重审一下，尽快做个决定。」我没说 话，只好点点头。马上那个警察忙起来，他宣布让医生在白天守护我，以便治疗；又让医生告诉他需要什么药品，明天他派人去外面买；并下令给看守今后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就不要给我戴手铐了；最后又让看守马上去厨房要病号饭。他也告诉阿华，无论这里今后再发生什么，都要马上通知他，他会立即向领导报告。

一通通的命令下完后，他和秃头人都看着我，应该就等着我说声谢谢，他们就可以告辞走了。我只点了一下头，扭过了头不看他们，那个秃头人又弯腰走进囚室对我说：「好好休息。」逼得我只好仍说了声谢。

我 的手又自由了，这对我来说是一项优待。在共产党宽大政策的体现下，我有一段时间不会被拉出去受刑和强奸了；同时还享受到病号饭的待遇：饭里沙石少了一点， 汤里菜叶子多了几片。医生每天早饭后就来，一直到晚饭后才走。尽管他手里多了几种药，但仍然在抱怨着药不够也不全。阿华每天来几次，好像得到了什么默许似 的，理所当然地从什么地方整碗整碗地拿来肉和菜。我由于疼，其实吃不下什么。现在我才知道，治疗实际上比受刑时的痛苦还要大多了。首先是疼，我紧闭着双 眼、咬紧牙，仍是疼得一阵阵出汗；只要一张嘴，一定会疼得叫出声。这个医生从没治疗过这种伤，是一边翻看着一本《医学辞典》一边想，然后才动手治疗。又怕 我太疼，所以动手小心，，每次时间都很长。

另 外就是难堪的感觉，我总是用双手捂着脸；医生不时地还说着安慰我的话。每次治疗前阿华都把阿山带到外面空屋子里去，然后回来帮助医生；他也是想让我放松， 不要不好意思，但他说话随便，他认为是没什么的话，几次却使我差点哭出来。医生一天感叹几次，总是不相信会有人做出这种事来，又叹惜我当时是怎么受的。我 告诉他，其实当时我没感觉到什么，几乎马上就昏了过去，受罪的开始其实是用刑过后和现在。每次结束一天三次这种治疗时，我都疼得筋疲力尽，头也晕沉沉的。 医生也由于紧张和疲累，半天松弛不下来；阿华则怔怔地坐在那里，一边用水冲洗着我的浑身汗水，同时不时地给医生胡出主意。白班的那个看守竟变成医生和阿华 的佣人，准确无误地执行着他们的俩的命令；并几次问候我，又试图和我说话。以前他那副蛮不讲理的样子再也不敢在我这间小号里使用出来，医生要他去找块毛巾 为我擦汗，他马上拿来新毛巾两块，令阿华也惊奇。一次，我发现他正在偷看医生为我治疗，我一点没客气地斥骂了他一顿，他也一声不吭地走了。

一 天晚上老看守看到我还没睡，一边和我抽着烟，一边叹息着与我小声聊着。他说他当看守的这三十多年，冤案、假案、错案，一年比一年多，但真正的罪犯被抓住的 并不多，即使被抓住了也不会受折磨的。就好像黑畜牲那时，因为人人都在求一个共同的利益，就是钱；真正的罪犯都愿意花钱买个无罪释放，重罪犯愿意花钱买个 轻判，于是就苦了没钱的犯人和被错抓的人，受刑挨打的也只会是他们。他回忆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两个女人因为要被强奸时不顺从，被用烧红的铁棍烫过，后 来就没再听说有人受过这种刑。从来都是女人被强奸，近几年才出现男人也被奸的事，这让他极不理解；而对男人用这种烧刑，我还是第一个。他告诉我，那个秃头 的人确实是这个监狱里的一个负责人，听说为人还不坏，他能来看我，是我吉星高照，因为阿华与这个人有特殊关系。说到这里，老看守对我做了个秘密的表情。

秃 头的人来看我，我是会有被放出去的希望的，只是但愿越快越好；他告诉我几乎每年都有一段不长的时间，监狱里夜夜有人被带出去枪毙；因为社会上犯罪率高，警 察又抓不到真正的罪犯，于是抓来些无辜的人天天用刑折磨，逼他们承认犯行；或者枪毙，或者重判，然后向上级报功，说他们破获了多少案子，抓了多少罪犯，已 经枪毙了多少，已经判刑了多少。上级要的是数字，根本从不调查，于是大家一块儿分绩效奖金。他又叹了一口气对我说：「我也老了，再有一两年就退休了，我是 不敢牵扯这些缺德事的。为了儿孙后代，我也要积点德。」我倒是注意到，这几天关在这里的几个人没有被带出去受刑被奸。至于惩办黑畜牲一伙人，我是不太相信 的，那不等于断了他们的财路了？会去调查我的被捕原因，我更怀疑；无论从阿华说的，或者老看守告诉我的，我即便是不被拉出去枪毙顶罪，也要至少关上一年或 者更长。不要认为共产党是土匪起家就不要面子，反而其实共产党是死要面子，更不会认错的；越是出身不正的人，就越讲究面子。共产党一贯是做婊的，贞洁牌坊却建得到处都是。

小阿山走了。我的生活马上变得单调乏味。每天，除了消受着疼痛以外，就再也无事可做。医生是个不爱说话的人，除去三次治疗，就只是坐在小院子里抱着那本医学辞典看。

阿 华仍是每天来几次，但都是他说话，我听。他仍整碗地拿食物来，我总是让医生先吃，或让他先拿一半走；医生坚持和我一起吃，阿华则站在医生一边，让我们一块 吃。有时这令我很生气；当阿华不在时我告诉医生，我让他先吃或先拿走一半的是因为我脏，所以希望他接受我说的方法，不要每顿饭都次次要与我争论。我对他说 这话时，是十分郑重的，可医生却不理解，说：「每天洗三次澡，怎么会脏？」

至 少有六七个人把他们的那种东西喷在了我的体内，我不脏？医生闭口不提这件事；不嫌我脏，其实是不想刺激我。事实明摆在那里，做作又有什么用？想让我忘了， 那是不可能的。有些事能全然遗忘，有些事能慢慢淡忘，但这种耻辱是不可能忘记的。女人受暴，没有报仇的能力。我是有的。我比那个黑畜牲高出半个头，有力 气，又受过军队训练，以后到外面见到他，我会毫不犹豫地打倒他，再杀死他。至于那群打手们，我更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我要把他们一个一个像抓小鸡一样抓在手 里掐死。我改变了自杀寻死的想法；我要亲手报仇。已经让他们把我弄脏了，当然我就也不会在乎两手沾上点血了。

只 有报了仇，这个耻辱才能洗刷掉；但其实我知道，我的身心脏污仍是永远洗不净的，最后仍是要一死，才能终结这一切痛苦。又是一个星期过去，肿已经消失，化脓 与感染也治好了；烧退去，但仍然疼，只是不那么厉害了，我已可以站起来。医生给我留下药，因为他不再被允许来看我。监狱工厂又接到加工合同，犯人们又要日 夜地干活了。那医生讲，犯人们还是愿意干活的，因为在干活期间可以吃饱饭，且每周还可以吃到一次肉。可怜，就为了吃饱和这点肉食，八百多人犯们甘愿受一天 十二个小时苦力。我的囚室门必须二十四小时上锁了。

不 知阿华怎么替我做了一项交易，就是白天仍不锁门，让我在院子里活动，因为医生要我多走路；但必须戴上手铐，晚饭关门后，手铐仍拿掉。开始的两天，在早饭后 门就打开了，手也铐上，但我却没出去。其它的小号里还关着人，我既不愿意见到任何人，更不想和任何人说话。两天后，关在小号里的人都送走了，小院里静静的 只有我一个人，我才走了出来。

我 马上就明白了为什么医生说要多走路的原因；但一开始时，每迈一步，那个地方就像又被重新撕裂开似地疼。两三个星期没有走路，身体虚弱得厉害，站一会儿都 累，走不了二十步就浑身大汗，而且随时都像马上要倒下一样。我知道锻炼对我来说是重要的；趁着几天院子里没人，我努力地练习行步，总共不过十米长 的小院，一口气走上一两百个来回，休息一下又走一两百个来回，一天至少这样走四、五次。到了一天晚上，我发现两个脚踝上全被铁镣磨破了；但只要第二天小院 里仍是我一个人，我就继续锻炼。三、四天后，又有人被关了进来，我告诉阿华我不想出去了，让他们锁门好了，也好把手铐拿掉。

门 再被锁上后，就又是一个星期没打开过。阿华有钥匙，他有时进来坐一会儿，留下几支烟，就又走了。烦闷枯燥加上热得令人难受的天气，几乎使我发疯。幸亏，水 管子仍在，还有医生留下的医药肥皂，我每天至少洗五、六次澡解闷。医生是要让我保持所有伤处的清洁，而我其实是为了解闷和降温。我的头发已经快要长到肩上 了。从小我就不喜欢长头发，总是剪得短短的；两个半月被关在

这里，没有人可以来替我剪头发。我求阿华几次，让他去找个推子来帮我剪一剪，他就是不，认为我 留长头发好看；我知道不是真的，只是因为他自己长发，他才这么说。

第三十九章戴了两个多月的脚镣

那天正用水冲着头，突然想到我已四十一岁了，生日已经过去一个月。去年四十岁生日那天，正坐车去参加政治部主任和后勤部长召开的会议，临时才说非要我穿军服才放行，我干脆让司机送我回家过生日去了。时间过得真是快，一眨眼已一年多。

一 年前我是副所长、第一副书记，有专车、司机、秘书，管理着一个一千人的机构；今天，我是个戴着脚镣被关在小号里的囚犯。母亲当初的话是对的，我仍记得她对 我提出的问题：「当上级的意图与做人的原则和你的所学所信背道而驰时，你怎么办？」看来，我现在的处境正回答了这个问题；母亲还说过，没有后台没有靠山， 就是做了元帅部长，要坐牢也一样去坐牢，不给饭吃，活活饿死……。现在想起这些话，我还是感觉好笑。

一 想起我的母亲，心里就温暖了一些；虽然她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在政治上的见解有时实在胡涂，使人哭笑不得。难道我落到今天这一步只是没有后台，没有靠 山的结果？父亲一生辛勤工作，中年开始有了声望和名誉，他是很珍惜的；一天，不知为什么，母亲突然说父亲的名声不如唱戏的马连良大，这一句话就把父亲气个 半死。在我得到副教授职称的那天，我想母亲是好意想鼓励我努力工作，不断地写出新论文、发表新观点；结果她举了一个当时一个唱歌女星的例子——她说，两年 来这女人始终只是嚎叫两三个歌，已经开始不走红；我当时正喝着酒，听了这个比喻，气得我差点没让这口酒噎死。我想到，如果让母亲知道我现在正在监狱里，一定会急疯了的。在后来的多少年，我也始终没有让家里任何人知道我曾有过监狱这一段经历。

囚室的门被锁上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上午，刚吃完饭不久，看守来开门，然后又进来蹲下去解我的脚镣。我正要开口问，阿华笑着进来，带来了我的衣服和鞋袜。我一边穿衣服，一边看着他；看守就站在门口，所以我没问这是怎么回事，阿华也不说话，只是做了几个我不太明白的手势。

穿 好衣服后，阿华让我出来；我刚一迈步就差点摔倒，戴了两个多月的脚镣了，一旦拿掉，人马上就变得头重脚轻。他们两个人扶着我走到一个小铁门前，推开门，我 看到门边一个看守正拿着手铐等着。戴上手铐后，也没容我和阿华说上话，小铁门就关上了。跟着这个看守走了一段，来到一排监房前，又走到尽头的一间囚室里。 这间囚室与我刚来时与阿齐被关的地方一模一样，但这次却只有关我一个人。看守没有拿掉我的手铐就关门走了。

我 坐在木板床上，开始分析这一变化的原因。首先我不怀疑，惩罚已经结束，我终于离开了那个可怕的地方。而这里又是什么地方？刚才路过这一排监房时，我看到各 囚室里的人都没有穿囚衣，也没有见到有人戴手铐，证明这里不是他们说的那个「前边」，比较像我刚来时被关的地方一样，仍是个属于等待审问和判决的地方；但 我还没有被定罪，为什么要铐住我呢？或许一会儿送我去农场，所以才铐着？既要放我，那就没必要再铐住我；或许他们已经知道我是谁，一会儿那两个便衣会出现 把我带回北京？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又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刑罚，最终仍是一个死。

想 到这里，我决定不想了，该来的就来吧，我能应付就应付，应付不过去也不过一死；让我出卖朋友、出卖同志，不如死。我躺下来。两个月来第一次可以伸直腿躺 下，感到挺舒服。在与那两个便衣的接触中，他们提到两点；一个是我个子高，另一个是从我的口音上断定我是从北京来。尽管他们说我就是他们要找的人，其实我 认为他们也不太敢肯定；如果知道我是谁，完全可以马上说出我名字、工作单位和职业，用不着绕圈子。通过在这里两个半月的经验，我仍可以再编一套假的去对抗他们。想到这里，马上感到轻松。

晚 饭和放风一个小时。这边的人多，足有七、八十人在散步，院子里挤满了人。由于只有我戴着手铐，所以特别引人注意，不少人用眼色和手势向我打招呼；我去洗 脸，马上人们为我让开路，又有人为我拧开水管开关。放风结束回囚室的路上我仍走不稳，绊了一下，马上有人扶我一把。回到囚室后不久，就有人敲墙，走到门口 就听到一个声音在问我要不要吸些粉。我告诉他我只吸烟，从不吸粉。几支烟与火柴从门外的地上滑了进来。我躺下来，抽着烟。那个审讯官对我的审问实际上等于 刚开始，会不会今天晚上还要继续？我开始尽力地回想我的阿尹

故事，以防备这种可能性的出现。一直到很晚，既没有人来提我，那两个便衣也没出现。我确实困 了，便不知不觉睡去。

第 二天整天什么事也没发生，也没有人来拿掉我的手铐。直到傍晚天将黑，我听到脚步声停在我的门外；门打开，三个警察进来拿掉了我的手铐，命令我转过身去背对 着他们。我以为他们要背铐我，没想到他们用一根绳子把我连手带胳膊地捆到背后。我问他们为什么，一个声音马上说：「不准说话！」我被推着走过这排监房后， 突然想到他们是不是要把我秘密处决？

走 到放风的院子里时，我忍不住再问他们：「这是想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我问是不是要把我处决了？又是一声：「不准说话！」我开始冒火，一个走在我旁边的警 察碰了一下我的胳膊，又走了几步来到一个办公室。刚一进去，就看到两个穿便衣的男人在那里。先是一惊，但我马上就认出来他们不是抓我的那两个便衣。一个警 察问其中一个人说：「是不是这个人？」一个便衣看了我一下，对警察用广东话说：「就是他。」两个便衣一个人抓住我的一只胳膊带我走出办公室。两个警察在前 边引着路，正要问这两个人是什么人、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时，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铁门前面。警察开了门，两个便衣拉着我走过了这个门，我突然发现我们已经 站在监狱大墙外面。

便衣与警察握手时，外边并没有吉普车。两个人把我夹在中间沿着大墙走，走出大约二十几步远时，我正要再问他们，一个便衣用极重的广东口音叫出我的名字。我一惊，他又追问我是不是叫这个名字，我马上否认，但我知道这一次是真的完了。

两 个人发出轻轻的笑声。一个人问我是否认识阿景。我否认。这个人马上说：「阿景可认得你，他正在前边的马路上等你呢。」说完，两个人又笑了一下。一个人上来 解我的绳子，另一个人对我说：「没办法的，不要见怪呀，只好这样才能把你带出来的。」我马上问他们是什么人。一个人说：「去问阿景吧，让他告诉你，我们的 事情做完了。」说完，他催我快走。我看到不远的公路上停着一辆小汽车，走了几步发现那是一辆出租车，我回头看看紧跟着我的这两人，实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也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

一 声「大哥」从出租车里传了出来，我一听就知道是阿景。他把头伸出窗外，我惊喜地叫着：「阿景，真的是你！」他笑着说：「不是我是鬼？你可把人急死了，这下 就好了。」我快步走到车边，他推开门一把拉我坐进车里，马上就给

我一个大拥抱。我推开他，问他怎么找到我的。他仍是那副半开玩笑的样子说：「哈，还问我？ 古叔都快急死了。我这已经是第二次来广州了，这次再找不到你，我们就不找了。你呀，头发这么长，一身臭味，怎么我看好像连路都不会走了，病了？」我马上 说：「放心吧，没病，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我该不是在梦里吧？」他笑着拍着我的胳膊说：「要不要我掐你一下？看看我，不是正坐在你旁边吗？坐牢都快把你 坐出病来了。抽支烟，告诉我你想吃什么？」这个时刻我什么也不想吃，只想知道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坐在车里不好问。

阿 景是高兴的，用广东话与那两个人交谈着什么。一个广东人开玩笑问我，当我见到他们时怕不怕，是不是以为要被处决了。我告诉他，我早已对阿景能来救我不抱希 望，已经有了各种心理准备。一路说笑着，车子进入市区。我问阿景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他看看我说：「哈，到什么地方去，看看你的这个样子，还能到什么地方 去。当然是先和我回旅馆，剪剪头发，好好洗一洗，扔掉这身臭衣服，然后再问到什么地方去，好不好？」

大约晚上十点半左右，我和阿景就已经坐在阿海家的饭桌边。头发修剪短了，穿着阿景在旅馆里为我买的新衣和鞋袜。本来阿景说，一定要和我在旅馆餐厅吃完饭再去阿海家，我 不同意，怕会再被便衣们认出来；阿景听了，拍打着头连连说自己胡涂，又问我想吃什么。我急于想先知道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恨不得马上到阿海家，可以坐下 来谈这一切。我告诉阿景叫出租车，让司机带我们去找在我被捕前一晚、阿海太太买来的那种鸡肉。司机是知道的，阿景又买了不少其它的食品，然后去了阿海家。 阿景在我洗澡时已打电话通知阿海，所以当我们到达时，阿海一家人已经正等着我们。阿海夫妇见到我后一再道歉，说他们不应该坚持让我出去散步；阿芝甚至还哭 起来。一会儿，气氛马上就恢复了，我们边吃边谈笑着，终于话题转到营救我的过程上来。

那 天阿芝和我分手后，马上去找她哥哥，阿海则立即通知古叔。阿景在第二天就到了广州。他们不敢说出我的真名字，只好向警察去描述我的相貌和身高，但在那段时 间里我并没有与警察有过任何接触，所以尽管他们去了不少派出所，也去了几个拘留所和劳改农场，但仍毫无线索。几天后阿景要回香港了，临走前把寻找我的事托 付给那两个把我带出监狱的人，给这两个人留下足够的钱，要求他们一个一个拘留所去问，一个一个监狱去找。两个多星期前，这两个人才找到那个我被关了四天的 拘留所，向看守们描述我；幸亏有两个看守还记得我，查了记录后告诉他们我叫阿尹，四十五岁，上海来的采购员，又指着旁边的监狱并说出我被送去的日期。这两 个人又把我和阿景在香港合拍的照片给他们看，才证实了这个阿尹就是我。

两 个人没有通知阿景，而是先与监狱方面联系要求探监，但均遭拒绝甚至否认有这么个人在监狱。这两个人只好去找人情、托关系，最后找到一位在广州市公安局工作 与监狱里的人认识的一个小干部，在一周前证实我阿尹仍在这个监狱，当即就要这小干部把监狱里几个干部请出来到饭馆吃饭，在饭局中提出钱的问题。其中有一个 干部在说话中透露他知道我的案情，监狱当局很是伤脑筋，目前还没有决定究竟是要继续关我一段时间还是送到农场去，并表示他可以去问问。

两 三天后，这两个人接到口讯，监狱当局可以考虑放我；于是这两人打电话告诉阿景，阿景则在前天一早赶到广州，并马上与监狱当局见面。由于监狱当局方面发现阿 景是从香港过来的，于是把价钱开得很高，同时还提出只要港币，不要人民币。阿景没有讨价还价，当即把钱就放在桌子上，讲定当晚放我及放我的办法。

听 到这里，我想到一定是他们收了钱后，我才被拿掉脚镣，穿上衣服离开了小号的。阿景又告诉我，交易做成后，监狱方面很郑重地警告阿景，第一不许他问我监狱里 的事；第二要他转告我不准说在监狱里的事，否则一定要严惩。说到这里，阿景对我说：「你的那张嘴呀，小心点吧。监狱里的人说你的态度不好，对他们大喊大叫 而且还闹事，为了这些要走我四千块钱。等到了加拿大后你说不说，我不管你，在没离开这里之前最好闭上嘴。三个月，你知道多少人在为你着急！」听着阿景的 话，我的火气立时就冲到头顶上。我说共产党是土匪，是婊子，还有人居然不信；我被他们糟蹋成这个样子，他们还反过来说我不是，还敢要走四千块港币，简直混 蛋。

隔 天清晨，阿海送阿景坐火车回香港去。阿芝接受了上次的教训，把屋子里的窗帘都拉严了；去买菜时，还把门从外面反锁上。我笑着说不要如此紧张，他们不会挨门 挨户地搜查的。阿芝非要我在她健身用的磅秤上称称体重，结果我把自己也吓了一跳。一百四十二磅。我原来是一百八十九磅的，仅两个月竟减少了四十七磅，真不 敢想象再多关几个月的话会是什么样子。阿芝拼命地追问我为什么会这么瘦，又好奇问我监狱里是个什么情形。我想阿芝已是成年人，又受过高中教育，多少应该让 她知道一些共产党的黑暗。监狱方面警告我不许说出监狱里的事，我也确实不愿意说出我所受到的一切，但拘留所并没有说不许讲。我对她详细讲述了在拘留所的那四天四夜我所经历和知道的一切，也向她讲述阿莲的身世、遭遇及在拘留所里所受到的一切，也没有漏掉那一对上海情侣的故事。

听 我说时，阿芝是哭着的。阿芝一定在当晚把我讲的这一切又告诉阿海夫妇，第二天一早，阿海问我是不是对阿莲有感情，他可以帮我去查找一下。我回答，

不。但我 告诉他，我和阿莲确实是有约，不管谁出来早，就去找对方。我认为阿莲一定早就出来了，但她是找不到我的，因为她根本不知道我的名字，无从找起。我相信她现 在已经在广西与儿女团聚，没必要去查找了。我虽不知道她在广西的地址，但我仍能记得那个校长的地址，只是忘了校长的名字。我告诉阿海，过几天我写封信去问 候一下也就是了。但是，阿海坚持要去拘留所问一下阿莲被送到哪个农场去，然后去农场问是否放出去了，也好放心，然后再写信去问候。

我 还没说话，阿芝马上表示她要去做这件事，我马上反对，不想让阿芝这个年轻姑娘去和拘留所那群畜牲说话。阿芝坚决要去，阿海同意，给阿芝五百块钱，告诉她万 一阿莲仍在农场的话就用这钱马上把她买出来。阿芝答应，站起来要走，我又给了她五百元港币，要她坐出租车去，找不到马上回来，那些地方都不是好地方，不要 多耽搁。我知道阿海对我始终抱歉，所以想办法做些事让我高兴。其实一切不是他的错，他好意让我出去散步，天知道事情竟会那么巧，刚出去就遇上事。阿芝是个 善良的女孩子，要去找阿莲一方面是为了我，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女人对女人的同情。

天 很晚了，阿芝才回来。第一句话就告诉我，找到阿莲了；她仍在农场里，场长不放她走。阿海太太马上问道：「给他们钱也不放？为什么不多给他们一些钱？」我马 上让阿芝坐下先吃饭，慢慢说。阿芝边吃饭边告诉我们，阿莲被留在拘留所一个多月后才被送到那个农场，由于离拘留所不远，所以阿芝马上乘长途汽车去了那个农 场，一打听才知道阿莲仍在农场。阿芝这个女孩子胆子也大，马上要求见阿莲，很快就被允许，她和阿莲整整说了一个多钟头的话。

阿 莲在被送到农场的第二天，就被场长看中并「包」起来。农场方面是同意收钱放人，而且也定出三百块的价钱。阿莲通知在外面的姐妹送来钱，但农场又不敢收，说 是要等场长同意。场长曾向她保证准放她，但不是立刻。他会向阿莲要这三百块钱，并保证收钱当天就放她出来；而还没向她要钱之前，她必须老老实实地陪着他。 从那以后，场长不让她干活，也不让她见人，并让她住在场长的屋子里，给他洗衣服、做饭，整天整夜地陪着他。阿芝去找那个场长，问他究竟要多少钱才能放阿 莲，并告诉场长如果马上放人就给五百港币。没想到，那个场长笑嘻嘻地对阿芝说：「只要妳被送来这里，我就一分钱都不要，马上放阿莲。」阿芝吓坏了，一句话 也没敢多说，马上回来告诉阿莲。阿莲哭得厉害，让阿芝快走，以后不要去看她了；等她放出来后，会来找阿芝的。

阿芝回家前，已经把这一切告诉阿海。阿海的意思是让阿芝明天再去，并再多给场长五百块钱。我马上反对。我认为阿莲现在的情形根本不是花钱能办到的事，

只能等待了。阿莲现在既不受罪，又不干活，只是陪一个人睡觉，比起在拘留所的情形强多了。

我多灾多难，出狱第二天就患上黄疸病，差点要了命。我的身体弱极了，幸运的是，在与世隔绝般二十多天艰苦治病期间过后不久，阿莲终于出来了；那个场长从新送去的「犯人」中发现了另一个他中意的美女，放弃了阿莲。我们给阿莲买火车票，她回老家了。

第四十章两死两失踪

我目前的处境还是很危险，天天盼着早日出去。八月底，一张火车票送到我的手里。这是一张高级软席卧铺票，需要有一定级别的官员才可以享受到这种待遇。我以前享受过这种旅行，他们仅看证件而不登记，也没有人到这节车厢来检查，所以比较安全，只要在上火车前不被发现就没事了。

这 是一张到昆明去的票，路途大约需要三十个小时。昆明是个美丽的城市，四季常春，气温总是在二十度左右。以前几次去云南考察，都是在昆明转车；那时候我一心 在工作上，来去匆匆，从没想起在昆明待两天走走看看。这一次，是古叔安排的；他知道我怕热，也一定听阿海讲起我带着一身的伤，所以让我到昆明去休养一下。 广州的闷热实在是要命，尤其一身伤疤都还没好，疼痒不说，有几处已有淡颜色的水流出来。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所以总是穿长袖衬衫，扣子系得严严的，整天汗水 淋漓，对伤口复原也是不利。与阿海一家人告别时，每个人都依依不舍；相处一个月了，彼此都有了感情，离开前一晚我们一直说笑着直到午夜。阿芝说她要写信给 阿莲，告诉她我已动身去了加拿大，问我有什么话要对阿莲说。我仍爱着阿莲，希望她劝说阿莲将来找一个体面正派的丈夫，十年或者二十年后我一定会去看望她 的。

上 了火车，车厢里的空调冷气包围我全身，一种舒服感觉浸透到心里。四个月了，终于要结束这些闷热烦人的日子了。极度虚弱的身体，使我把一大半的旅途

时间都用 在睡觉上。到了昆明时，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已经等在火车站里，他带我到了一处离市区不远的地方安置下，告诉我可以到市区去走走。警察和便衣在云南省的注意力 大部份放在毒品上，相对来说我就比较安全。他要我安心休养，大约十天到两个星期内还会有几个人来与我会合，然后他会送我们再与另一批人一起被护送越过国 境。古叔已经向沿途的护送人为我付了双倍的钱，他要我放心，我会受到特殊的保护；这一点我完全相信古叔，现在这个人给我安排的地方就已使我满意极了。

这 里靠山近水，风景极美，静得听不到一点儿声音，空气清新，气温比广州低了二十度，真是四个月来最舒服的两个星期；唯一差一点的就是那个被派来照顾我的女 人，她人十分好，只是烹调技术一般。我去了两座很好的古寺院，但总是感觉人们都在看我，又觉得有人在后面跟踪我；最后宁可不出去，每天散步、跑步、看看 书，希望对恢复有益。一天中午，这个三十多岁的人带来三个广东人，他们就是我等在这里要会合的人。两个小时后，我们五个人便坐在一部小面包车里出发了。

当 天夜里，我们在一家又脏又小的客店里吃饭并睡了几个小时后，便继续着行程，整整十五个小时不停地走着。第二天傍晚，面包车停在山路的一个拐弯处路边，离路 边不远有几间已倒塌了一半的石头房子。我们四个人被带到了石头房里，阴影里竟然有男女二十来个年轻人挤在那里。这批人是等在这里与我们会合的，那个在昆明 接迎我的人说，他的工作已经结束了，要和司机连夜赶回昆明，然后向古叔报告我已被安全移交。他向我介绍了一个小个子年轻人，这个人与另外三个人将护送我们 二十个人到下一个中转站。这个小个子与我握了手，对我说：「我已接到通知，专门护送你。不必担心，这条路很安全。」

我 马上感谢他，与那个人握手告别。一支烟还没抽完，就看到一部军队的带帆布蓬的大卡车停在公路边上，两个军人从驾驶室里跳了出来，向我们这边挥着手。所有人 都被催促着跑上公路，爬上卡车，钻进篷子。我看着那个小个子，他马上对我说：「不要怕，都是自己人。」我是最后一个钻进篷子的人。一个军人一边封紧篷子一 边对我们说：「大家都坐好，不要说话，尤其当汽车停下时要绝对安静，听到没有？」二十四个人挤在里面，连动一动身体都很难。小个子让我尽量多睡一会儿，卡 车不停地开了一夜。

天 快亮的时候，车停在公路边上。我们跳下车，向离公路边不过十米远的一座孤零零的大房子跑去。房子后面的院子里，一个粗糙的大木桌上已摆好各种食品，三个上 了年纪的人招待着我们。大房子里的一间屋子的地上已铺放好了两排草席，是给我们睡觉休息用的，每个吃饱了的人很快都入睡了。被叫醒的时候，估

计不过是中午 刚过去不久，一部军车已停在公路边上。后院的桌边上坐着在吃东西的两个军人，其中一个人是中尉军官；看到我们都出来后，他用很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我们说： 「下边的路并不远，只要两个小时就到公路的尽头了；现在你们是在边境的军事区里，我们要经过五、六个军事检查站，必须要保持安静，尤其在停车检查时，谁也 不要弄出声响来。你们保证做到，我就保证把你们安全送到。」

这 时我才知道那十六个人都是来自浙江省，其中有四个女人，他们向中尉提了不少问题。一个士兵被中尉派去站在公路上两边张望着；每看到他挥一下手，这里就有两 三个人马上跑过去钻进车里。公路上军车来往不断，这个过程几乎用了二十分钟才完成。我又是最后一个，那个小个子和中尉扶我上了车。卡车几乎每二十分钟就停 一次，可以清楚地听到那个军官与别人的说笑、开关车门声。每每一两分钟后，汽车又开动，途中五次停车，竟然没有人来掀开篷布检查。

汽 车再次停下来时，篷布门被打开，军官扶我跳下车，跟着小个子向路边的一座小山顶上走去，在一片灌木丛中坐了下来。风景很美，一条河水就在山脚下流过，公路 已到了尽头，卡车调头开了回去，四周马上是一片宁静。小个子看起来是个负责人，他对大家说我们要在这里等上三个小时，天黑后就去河边，有船来接我们。乘船 大约一个小时，在河的对岸上岸，那边有几个武装人员负责对我们下一段护送；我们要再步行一夜，翻越几座大山并穿过一片原始森林进入缅甸，所以要大家现在好 好休息，保持体力。说完，他走过来坐到我的旁边对我说：「下边的路很苦的，我帮你把不必要的东西扔掉一些。等你到了对岸，那边有两个人是专门护送你的。不 要管别人，无论你走的慢或者你要休息一下，那两个人都会陪着你，你不会被丢下的。」说着，他打开我的旅行袋，除了给留下一套衣服、一条毛巾、一把牙刷以 外，他把其它的东西都用绳子捆起来。我伸手把英文字典拿了来，放回旅行袋，又拿回我的便鞋穿在脚上，把脱下来的皮鞋给他。

他 笑着对我说，我的东西都很好，一会儿扔到河里去太可惜了，问可不可以都给他。我点了点头。他高兴了，从口袋里要拿钱给我。我笑了，对他说：「我要钱做什 么？下面这段路还不知道我能不能走出去呢。」他马上郑重地对我说：「你放心。你可能还不知道，有人为你付了双倍的钱，所以无论是哪一段路，都会有人特别关 照你。我们道上的人是有规矩的，收了人家的钱，就一定要给人家把事干好。人家付的钱多，我们就特别小心。你不要担心，他们是一定会帮你走出去。」说完，他 拿出一包美国烟放进我的口袋，对我说：「你不收钱，就收我一包烟把。我们的规矩是不可以白要人家东西的。」我对他笑了笑，又拍拍他的肩膀，心里觉得他们还 比共产党可强多了，至少还讲规矩与道义。

入 夜后，我们上了一艘作为轮渡用的大铁船，柴油机冒着黑烟，发着震耳欲聋的声音。我尽力地吃了一些船上准备的食物和水，望着远方一座座起伏的大山，我实在感 到没有信心的，他们一些年轻人又说又笑，兴致很高，不懂步行在原始的大山林里的可能危险。我是有经验的，以前搞考察，进过几次原始山林，只要迷失了方向， 可能就一辈子也走不出来；现在连伤带病，体力还远远没有恢复，我恐怕是见不到明天的日出了；但我已没有退路，回去让他们抓住活活打死我，我宁可死在这条路 上。

船 靠岸时，天已经黑了。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两个身背冲锋枪的人拉我上了岸，一边和我握手一边在听那个小个子对他们说着什么。一个人把我的旅行袋背在自 己的身上。小个子和我握了手，就跳回到船上，另一个人给了我一根竹竿，让我代步，又笑着对我说：「你知道柴玲吗？她就是我们护送从这条路走的。放心吧，我 们一定把你带出去的。」人群开始移动了。由于没有路，人们只是一个跟着一个地随着前面两个背冲锋枪的人走着。人虽不多，但也形成了一条小小的长龙。我数了 数，一共是七个背着枪的护送人，全是冲锋枪，这使我不禁觉得这条路可能并不安全。我鼓足精神，跟着走在我前边的人，一步也不落后地走着。渐渐地我们走进了 群山的包围之中，穿进一片森林，悄悄地走过一个小村寨。不知走了多久，又到了一座大山的顶上，被四周闪耀的星星包围着，然后又进了漆黑的原始大林。

我 开始落后了；后边的人一个个地走到我的前边，终于我变成最后的一个。那两个人一步不离地跟着我，那个个子高的递给我一个军用水壶，我大大地喝了一口，没想 到里面装的不是水是酒，是一种自酿酒，味道很醇正，但却是相当的壮。立时一股热气从我的胃传遍了全身，我又有了精神了，大步跟上了队伍。一直不停地走了五 个小时之后，我已经是走不动了；问那个高个子护送人时间。他告诉我已经两点钟了，对我说再走半个小时就会让大家休息一下的，慢一点走不要紧，但不要停。休 息后，下面的路就不远了，会让我们都到河里去洗澡，洗完澡上岸就在缅甸了；天亮时，就走出去了。他说完这番话后不过十分钟，在队伍右边突然响起了枪声。

一 开始时只不过两三声枪响，但队伍马上就乱了，有人乱跑又喊叫，立时引来几支枪同时射击。我马上趴在地上，又叫前边的人趴下。我看不到开枪的人，但在距离我 们不足百米远的地方，可以看到几个枪口喷出的火光。那个高个子正提着枪弯着腰向队伍前边跑去，边跑边喊叫着让人们都趴下。另一个人把枪拿在手里，紧紧地趴 在我的身边。我问他这些开枪的是什么人，他告诉我这一带是边防军的巡逻地区，我们必须要从这里经过，再也没有其它路可以绕了；他们已经在这一带与边防军交 过几次火。护送的人向我们行进方向的右前方大约不到二十米的地方与对方正面交锋，但他们并不向前进，只是变转着位置射击；在保护着我们。队伍全乱了，一片 喊叫声，成为对方射击的目标。

一 个离我最近的正在交战中的护送人，突然迅速地向右前方移动，正在这时在我的右后方出现两个火点，十分迅速地向我们移动着。我旁边这个人也注意到，正在瞄准 着。我一把抓过了他的枪，立刻跳起来，单腿跪在了地上，向那两个不断跳动的火点瞄准并立即打出一串子弹，然后马上扑倒在地上。两个火点消失了，我正要再站 起来，这个人马上按住我，并抓过去枪。我松开手，指着正前方向对他连声说：「上去！上去！快！快！」他弯着腰快速地向前移动，但并没有移动到我想象的那个 位置便马上转向左边开火。这时前方的枪声已不是那么密集，双方这场交战不过持续一分钟，周围就恢复平静。

护 送的人催促我们快走，惊慌的人们马上跑了起来，但很快刚才的那种快跑变成快走，又变成了和我一样的慢走。大约不到二十分钟，前面的人们都纷纷躺在林中的一 块空地上。看来危险已经过了。几个护送人大声地骂着说着，并抽起烟，我也马上点了支烟抽。那个一直在我身边并背着我的旅行包的人来到我面前，把旅行包交给 我说：「两死两失踪。一个护送人中枪伤，在那里等待那两个失踪的人回来。队长让我回去帮他去找那两个人。一会儿那个高个子的人仍继续护送你。」说完就向我 们来的路上跑回去了。我已累得有些迷糊，那个高个子叫醒了我，又让我喝了一大口酒。队伍又在移动了。

山 路似乎走完了，下边的路一直在大森林里，茂盛的枝叶打在身上脸上，甚至划破了皮肤。我一步不离地紧跟在前边的人身后，在这种地方掉了队，自己是永远也找不 着路的。高个子一步不离地在我的身后，并不断让我慢一些，又告诉我不要怕，他熟悉这条路。一种恐惧感仍使我一步也不敢慢，也忘记了累，在这漆黑的密林中， 所能看到的只有我前面的那个人的阴影。不知走了多久，突然眼前光亮，终于出了大森林。天也亮了，前面是一条约四十至五十米宽的河；没有船，也没有桥，水流 很急，我们在河边坐下。一夜几乎九个小时的步行，不仅是我，所有人都筋疲力尽。河对岸有六个背枪的军人，正把两根粗大的绳子系在对岸两棵大树上，两个军人 每个人握住绳子的另一端向我们游了过来。上岸后便把绳子拉紧，系在这边的两棵树上；人们开始纷纷下水，会游泳的人自己抓住绳子游过去，不会的人就趴在护送 人的背上，由护送人拉着绳子把他们一个一个送过去。我是会游的，但下到水里时，我马上就明白我过不去；水急不是问题，问题是我太疲劳。那个高个子马上跳下 水来，把我送过去。过了河，足足在河边休息了有一个小时。

这 时我才看三个广东人中少了一个人；十六个浙江人中少了三个人；七个护送的人只剩下五个。一直走在前面带路的人是那个队长，大约三十岁，走到我的面前抓住我 的手紧紧地握着，对我说如果我没有打掉那两个火点的话，至少再多出两个伤亡。他说：「我已经看到了，但我不能打；在我的那个位置，只要射击

就一定会伤到一 个我们的人。我正要变位置，就看到你开火了。谢谢你呀，否则我回去就更无法交待了。」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树叶包裹着的米饭团给我，又把我向那六个 军人做了介绍。他讲缅甸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只好三两口地吃下那个饭团。六个军人向我点头微笑，其中两个人向我走来，都讲中国话，告诉我他们是奉命来专门 护送我的。我正要问他俩下边的路还要走多久，这五个护送的人向我们挥手道别，又一个一个地和我握手。我从身上掏出那个军队发给我的证件交给那个队长，请他 把这个证件扔在夜晚交火的地点。他看着我，答应了，收起证件便跳下水里，向对岸游去。

当 那五人消失在对岸的密林中后，这边两个会讲中国话的军人便向我们宣布，我们现在是在缅甸境内人民军占领区，这条河是边界河，他们的任务就是把我们送出这片 无人区，并送到最近的一个村子里，我们就可以吃饭休息。在这之前，我们还要在原始森林中步行六个小时，但是绝对安全，除非缅甸政府军进攻人民军的占领区。 一旦这种事发生，他们要求大家千万不要慌乱，必须服从指挥，绝不可乱跑和喊叫，并要大家记住前一个夜晚的教训。接下来他们又一再地告诫我们一件事，在下面 的路边会有许多河水和泉水，水干净且清凉，但绝对不能喝，因为大多数的河水和泉水有毒，喝下去是一定要送命。

最 后一个军人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瓶子，又从瓶子倒出两粒药在手上让我们看。那是一种制造得非常粗糙的黄色大药片。热带的原始森林中常有疟疾、瘴气和毒虫叮咬出 的病，他们让我们每个人现在就吃下两片药，可以保证在三个星期内体内有足够抵抗力不致患上这些病。军人们拿出他们的军用水壶，开始给我们分水吃药。

我 吃下了药，并得到比规定多一倍的水的待遇。队伍又出发了。我站起来，却迈不出步了，两个军人扶着我走了二、三十米后，我才又可以走路。走了约一个小时后， 我就已经看不见队伍了；两个军人劝我不要急，慢慢走。又走了一个小时以后，我突然眼前发黑，不由自主地摔倒并失去知觉。醒来后，发现我躺在地上，两个军人 满头大汗地坐在我身边，两个人都只穿着内裤。我努力坐了起来，才看到我是躺在用两根大树杈和两条裤子拼凑起来的担架上；这两个人一定是抬着我走了一段路 了。

一 个军人把水壶给我，我喝了一口，然后拿出烟请他们抽。他们惊喜地看到是美国烟，于是和我说笑着，很小心地抽着烟。一会儿，他们又要抬我走，我拒绝了，站了 起来。一个军人马上把我的一只胳膊搭在他肩上，于是我们又上路了。我拼命地坚持着，拼命地走着，大约一小时左右，又摔倒了。休息了一下后，我再次站了起 来，但这一次无论我怎么努力，却再也迈不出步了。他们扶我躺到

那个担架上，我已不能拒绝了。两个人抬着我一直不停地走了一个多小时，当他们放下担架时，我 看到四个穿着傣族服饰的女人来到我们面前，她们带着饭和猪肉，我们三个人大吃了起来。

饭 后，军人让我坐在担架上别动，而抬担架的竟是两个女人。我喊叫着让她们停下，她们不懂我的话，仍快步地走着。两个军人笑了起来，对我说：「让你体会一下我 们的女人是多么能干。」然后又说这里离住宿的村子也不过是一个小时的路，两个女人一班，一个轮换就到了。我问他们明天还要走多少路。他们告诉我明天有拖拉 机送我们，把我们送到一条大河边的一个大村寨里，然后就坐船进入泰国北部边境。一个军人奇怪地问，我看起来是高大的人，为什么会身体这么弱？我苦笑了笑， 又给他们一人一支烟，心里自己对自己说：「我反倒很吃惊，你能终于走出来，真是奇迹！回到广州的四个月里，前三个月在监狱，几次差点被打死，好不容易活着 出了狱，又是一场大病，病刚好还不到三个星期，就是这次十几个小时的步行，不要看我四十多岁了，实际上我比那群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还棒得多！」

我 笑了。一个军人对我说：「一会儿到了村子里，给你找个女人来，让她给你从头到脚做个按摩，然后再喝点酒、睡上一觉后，明天你就没事了。」这时女人们换班 了，又走不过十几分钟就是一条大河，河面很宽，但水很浅，两个女人抬着我走下河里，她们光着脚，踩在河底的石头上，竟然毫不减速地仍快走着。

已 经看到了村子，我问军人是不是就在那个村子休息。军人们点着头，又祝贺我终于支撑着经过了无人区。我刚才摔倒昏过去后把他们吓坏了，怕我死了；现在他们放 心了，来到有人的地带，无论有什么病都不怕了，这里的老人们都会治病的。我告诉他们我没有病，只是太累。这时，我们已经来到村子边了，我请女人们停下，我 要在河水里洗一洗。两个军人也要洗。女人们进村了。我们洗完后，两个军人扶着我进了一家人家的屋子。这是一个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小村子，每家都住进了几个 偷渡的人。我躺在一张竹床上，两个年纪比较大的女人进来，对我笑了笑，不容分说一起上来脱掉我的衣服。我说话她们不懂，又没有力气去反抗。她们把一块布盖 在我的下身，把我的湿衣服晾到院子里后，两个人开始了按摩。

这 个时候，我确实需要一个彻底的按摩，否则明天我即便能站起来，恐怕仍走不了路。我闭上眼睛，任由她们按了起来。她们看见我身上带伤，小心地避开了。她们的 手劲很强，我好像又在受刑一样，尽管咬牙忍着，但仍有几次疼得嘴里出了声。终于，她们用一块毯子盖住我让我休息；一支烟刚抽完，就睡去了。

第四十一章 权力欲望

当 我被叫醒时，太阳已经出来，几张关切的脸看着我。一个军人对我说：「你没事吧？从昨天下午一直睡到现在，把大家都吓坏了。」我摇了摇头，又闭上眼睛还想再 睡一会儿。那军人又说：「起来吧，指挥官要见你，正等着你一块吃早饭呢。」我不情不愿地坐了起来，说道：「见我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们指挥官。」他说： 「我也不知道，指挥官想见你，一定有好事。」

早 晨的空气很新鲜，那些浙江人、广东人都在外面懒洋洋地坐着。我一脚高一脚低地随着军人来到一户人家的屋里，见到一位中等身材，大约三十五、六岁的男人。他 穿着军裤，上衣是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腰上挂着一支很大的中国造的手枪。这个人已经发福了，一个大肚子挺出来，白白胖胖的脸，一对大眼睛。与我握手时，他 的手是很有力的。他首先做自我介绍，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他是中国人。接着又是，他从大连军校毕业，在武汉军区工作了几年，现在是缅甸人民军的指挥官，驻守 在这一地区也已有数年了，由于听到军人们向他提到有我这么一位年龄的人，所以想见见我。说完，他笑着请我坐到摆满了食物的桌边。

这 个人从外表到举止到说话神情，完全是一副彻头彻尾共产党干部的样子，再加上他向我介绍的履历，多少使我感到一点紧张，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人，为什么要见我。 坐下后，我很客气地问他：「不知道指挥官先生找我来有什么事？」说着，我用手指了一下窗外的那些浙江人、广东人，又说：「我和他们都是一样的，也不过就是 想到外国去做份工，多挣几个钱而已。」他大笑了起来，为我点了支烟，说：「紧张什么？这里是缅甸，不是大陆中国，你以为我是共产党？我过去是，否则我也上 不了军校，做不了上尉军官，但那些都过去了。我现在是这方圆一千多公理的最高指挥官，凡是从大陆过来的人我都想见见。可是来的人不是如你刚刚所说，想去国 外挣钱，就是在国内贪污了一笔巨款，想带到国外去享受。你，不像是这两种人。告诉我，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出来？不要怕，你可以说实话。」

在 他的这番话里，我听不出恶意，但是缅甸人民军是受中共支持的，昨天我就注意到这些军人们从头到脚全部装备都和大陆军队没有什么两样，就连停在屋外的那辆吉 普车都是北京制造。指挥官一边吃着，一边让我也吃，同时又笑着看着我。我只好对他也笑了笑，然后说：「我实在没什么特别的，不过就是个教书的。六四以后， 有点小麻烦，所以我想不如躲出来算了。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共产党。」他又大笑了起来，边笑边说：「你以为我喜欢共产党？正是因为我恨共产党，所以我才跑了 出来。我也是走这条路出来的，这里的人听说我是专业军人，说什么也不让我走，所以就留下来了。」我马上问：「人民军是中共扶植的，他们听中共的，为什么要 留你？」

他 开始对我讲起：「以前是没有人民军的，只有缅甸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小游击队，旨在推翻现有政府，建立共产党政权，中共当然高兴，又怕苏联插手，所以马上支 持，于是人民军成立，又逐渐地控制了一部分的土地和人口，形成势力。由于中共策动和支持的赤柬波尔布特政权的灭亡，加上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三年前缅甸学 生们发动了民主运动，被政府镇压，于是不少学加生入人民军，要求是建立一个民主缅甸。人民军领袖们对民主的兴趣不大，同时也明白，依靠着中共支持要想推翻 政府根本不可能，他们也清楚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倒台，人民军已经没有政治目的了，只是向中共仍打着共产党的旗号，以得到军火和支持；实际上，也不过就 是维持现状而已。」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继续留在这里？」

他 又笑起来，反问我说：「你说你是个教书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人什么样的欲望是无限的？」我摇了摇头，他马上说：「权欲——权力的欲望！钱、女人多到一 定的程度，就对你没有用了。但权力不同，它是无限的；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是皇上，我想的事就一定能办得到，人们尊敬、恭维、服从我，像神一样把我 供奉着，只要张嘴就没有我办不到的事。你说，我还能想要什么？」听了他的话，我很吃惊，但不得不承认我喜欢这个人，至少他说实话。

一 部中国造的拖拉机拉着一个大拖车停在外面，浙江人、广东人都进了车里。我站起来向指挥官告辞，他推我坐下，告诉我他也要去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因为他的一支 部队驻扎在那里，让我一会儿和他坐吉普车去，并说他和我的谈话并没有结束。然后他又很神气地对我说：「我坐在这里不动，你去问问他们谁敢走。我们继续吃， 让他们等着。」

从昨天中午吃饭一直到现在，我确实饿了，和他一起吃了起来。饭后，女人们又端上一种当地的极苦的茶，据说是祛病防毒的，居住在热带雨林中的人都喝这种茶。我也喝了一杯，苦，但不难喝。

终 于，外面人的等待结束了。他拉着我走了出来，军人们向他敬礼，女人们向他屈膝。坐进了吉普车后，他很悠闲地吸了两口烟后，才发出了开车的命令。车子开出村 子，两部等在村外的摩托车开道，一部小卡车上面坐着大约十个全副武装的军人跟在我们的后边，大拖拉机跟在小卡车的后面。我们要去的地方只有三十公里，但由 于没有路，又要上山过河，所以需要三个小时。每次上坡、过河时，除了我和他以外，所有的人都要下车来，并帮忙推车，耽误不少时间。一路上关卡不少，每个关 卡都至少有五、六个军人，当他们远远地看到这支军队

时，都立正敬礼，直到我们离开很远。这位指挥官先生不但不回礼，连看也不看一眼。

一 路上，他都在不停地对我说着；被称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对他的影响很大，他恨毛泽东，但羡慕他至高无上的权力。他认为，只有从军、利用战乱才可以迅速提升， 得到权力；所以他十八岁时便进军校，四年后以中尉军衔毕业。那时正是中越战争时期，他多次请求上战场，得到上司赏识，被派驻在中缅边境上；这时他才感到事 实并不如他想的那样，打了两年仗才提升一级，驻扎在这里，今后的提升更是无望。他失望了，这段时间，尽管他没说，不难想象到他做过一些不法的事情，也被上 司发现，在接到被调离职务的通知的当晚，就逃来缅甸。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形下，他参加并指挥游击队对政府军的一次进攻，由于他是专业军人，又有过作战经 验，那一战十分成功，于是在坚决的挽留下，他留了下来，现在是人民军里一个主要人物。

近 两年来，他劝说过一些从大陆逃出来的学生和政府官员，想请他们留下帮他做事，但看起来他没能使任何人留下。这次由于他听到那两个护送我的军人向他说了那场 与边防军的枪战，和在过了那条边界河以后，我曾向中国方向鞠了三个躬，于是他认为我一定有什么背景，决定要见我，又说对我的印象很好，他需要人为他工作。 我笑着表示，我只不过是个穷教书的人，根本不懂军事，对他是毫无用处的。他看着我，又大笑起来，并表示他不相信我说的话。

这 时，车子爬上一个小山顶，我们看到在不足百米的山下有一个大村子。汽车下了山坡仅几十米，一群大约两三百穿着傣族服装的女人站在村外等着迎接这位指挥官 了。他从车窗里伸出了手向人群挥动着，吉普车停在人群中，他笑着挥着手走过人群，前边就是几十个军人列队在向他敬礼。他向两个跑过来的军官握了手，然后又 向我招招手，我们就在人群的簇拥下走进村子。看来村子这一部份是一个大操场，左边一排平房，做仓库用的一间没有门的屋里，有一台柴油发电机，右边操场后面 是三排很整齐的竹楼，大约有二十座左右。他向操场上站立的几十个军人敬了礼后，便拉着我走到了第二排竹楼中的一座竹楼下，我们踩着出声的竹梯走上竹楼。

一 个女人打开了门，我们进到了屋里。屋里比较暗，有一盏灯亮着，还有一台电扇在转动着。屋里十分干净，布置得很好，也很简单，两个军官也进来了。我站起来要 走，他拉住我坐下，用缅甸话与两个军官交谈了有二十分钟。这期间有女人送来了茶、水果还为我们点上烟，两个军官走后，他似乎还要对我说什么，这时一个军人 带着一个女人进来，说已经把我安置在这个女人家里住宿。于是我跟着女人出来了。

村民们住的地区的情形就大大不同。村中街道泥泞肮脏，竹楼都很破旧，楼下养着鸡和猪，火塘在竹楼里冒着呛人的烟。由于早饭吃得多，所以我没有吃午饭，看了一眼女主人为我准备的小屋子后，便马上出来坐在竹楼的阳台上。我很喜欢这里少数民族风情的景色，村外大片的稻田，群山环抱，村子南边一条河水流过，山上的树木，村边的竹林，一切都是那么宁静，令人感到舒适自然。一位五十多岁穿傣族服装的中国男人走上来，告诉我他是这个村子的村长，又指着那条河告诉我，逆流而上几公里就进入湄公河，我们将住在这里几天等船来，然后乘船进入湄公河，路经金三角，直到泰国。我很感兴趣地听着他几乎讲了一个下午的关于金三角的故事，以及有关的毒品、走私等等，直到他想起来要为指挥官安排晚饭了才走。

竹楼的女主人大约二、三十岁，一直在不停地忙这忙那儿的。她有四个孩子，三个是女孩，在她身上背着男孩。我们无法交谈。她笑着比划着让我吃饭。饭后又比划着让我到河里去洗澡。河水很清凉，那些浙江人、广东人都在洗。通过交谈我才知道，浙江人都去西班牙做工，广东人都去加拿大投靠亲戚。很可能这一个白天，我都是他们交谈的话题，这时见到我来，几个人用挖苦我的口吻问我：「这么大年纪了，跑出来做什么？这个村子里女人多，可以多讨几个老婆，留在这里算了。你就是到了外国也挣不到钱的，简直是找死。」我一概报之以微笑，匆匆地洗了澡便回来了。那台发电机发出振荡的声响，家家的竹楼里都亮起灯。这对村民来说就像是个信号，人们结束串门闲谈，各回自己的竹楼准备睡觉。女主人也带着四个孩子从河边洗完澡回来。

打发孩子们睡了后，她便走出来对我打着手势，拉我进了那间为我准备好的小屋。她嘴里在说着什么，又开始解开我的衣服，让我趴下来，原来她要为我按摩，我很乐意地接受了。当她让我翻过身来时，我看到她已经脱光衣服，一对乳房在胸前晃动着。我并不吃惊，以前曾几次进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考察，有一些民族是有这种待客礼节，我通常会拒绝的。当女主人结束按摩后，我把她推出了门，女主人失望地看了我一眼，便回到她的孩子们那边去。

隔天一早，村长来找我，告诉我那个女主人一早就去找他，要他问问我是不是不喜欢她。村长开始向我解释这里的风俗，其实我比他更懂，我以身体不适向他做了解释。村长下面的话开始引起了我的注意：由于水质的问题，当地女孩子的出生率大大地高于男孩，而本来就为数不多的男孩子们到了十四、五岁时就被征去当兵，而连年的战乱之下，男人的死亡率又大大超过了女人。他问我注意到没有，在这一带所有的村子里几乎见不到几个男人，村里女人和女孩的总数超过四百，而男人和男孩的人数不足五十，每当有外人来村里时，村长就轮流着

把外人分配到各家去住宿，是为了让女人们挣点钱，以贴补生活上的不足。在人民军占领区使用两种货币， 中国钱和缅甸钱，只要付几块钱就可以了。

我很吃惊。原来这个民族的古老而质朴的待客习俗已经变成了谋生的手段，看着村子里一群正在玩耍的孩子们，我沉思着。中饭时，我尽可能地向女主人做出高兴和满意的样子，并给了她五块钱以答谢她昨晚的按摩，女主人马上就高兴了。

下 午，我正闲得无聊时，一个军人来了，带我到指挥官的竹楼下，又示意让我一个人上去，一个坐在门外的女人为我开了门。一进去就看到这位指挥官正躺在地上，胖 大的身体赤裸着，四个跪坐在他四周的女人正在给他按摩。见到我，他大笑起来，显然是村长告诉他那件事，他边笑边问我是不是不喜欢那家女主人，他可以让村长 给我换到另一家去住。我对他笑着摇摇头。几句闲谈后，我把话题引到了人民军这场战争的最后目标是什么上来。他很郑重地说，当然是要建立一个新政府。这个目 标其实很难达到，不那么容易；国际舆论认为他们是共产党，所以支持政府的国家多，恐怕这种割据的现状要维持很长时间。

我 没有再在这个问题上多问什么，只是向他提到了村民们的艰苦生活，各家劳动力不足，孩子们似乎都没有上学，以及村中的卫生环境水平低落等等问题。他叼着烟， 看着我说：「我知道你的意思，可不要忘了，这个国家在打仗，我们所有的钱都用在战争上。老百姓的生活是苦一些，但我比共产党可强多了，从不去打扰他们的生 活，更不去控制他们的思想，他们是有自由的，无论说什么、做什么或者到什么地方去，是没有人干涉的。仅这一点，生活在大陆上的人是绝对比不上这里的人。」 停了一下，他又说：「其实办教育办医疗都花不了几个钱，我也想搞经济，把这个地区搞繁荣一些。可是人呢？没有人才呀，我需要有人帮助我。这里的人，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才好，这么多年了，我花费大力气去训练军队，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军官没有一个让我满意，士兵们就更不要提了。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留下来，不是要你给我做事，是你和我共同做事。」

我 笑着对他说，他要的是军队，我不懂军事，只是个教书的，帮不上忙的。他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明早船就来了，我们就启程，希望我再想想，如果想留下 来的话，可以向他提出任何要求和条件。说完，他起来穿衣服，又要四个女人给我按摩。我马上谢绝了。不知他对她们说了一句什么，四个女人马上脱光了衣服，他 大笑着对我说：「女人同样需要男人的，挑两个去满足她们，让她们怀孕、生孩子，我们需要人。」我站起来告辞，他笑着留住我，一直到晚饭后才让我离去。

第 二天早饭后不久，我们被通知去大操场集合，船已经来了。我向女主人告别，又给她十块钱。她高兴地送我去大操场。指挥官也在那里，我走上去和他握手，并感谢 他的照顾。他看着远方对我说：「真不明白你们这些人，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干什么？」我笑着对他说，也不过是为名或者利吧。他看了我一眼，大声地对站在他旁边 的两个军官说着什么，然后沉默地握一下我的手，便坐进吉普车走了。那两个讲中国话的军人又站到我旁边，这一次我们仅走了十分钟就来到船边，这是一条已经很 旧了的长长大木船，船上有一台柴油发电机，三个船工。我们十六个人加上六个人民军都坐进船后，船舱里仍有不少空余的地方。船速极快，由于河水浅，船底与河 床发生摩擦时，不但产生巨大的声响，而且也造成船身剧烈抖动。很快地，船逆流飞驶在湄公河上。两个军人与我说着话，一会儿指着远方告诉我那就是政府军控制 区，但没有危险，因为他们与政府军私下有交易，所以无论运人还是运送毒品都没问题；但在通过寮国边界时就不敢讲了，有时是要打着通过的。他们又说：「不用怕，寮国是个穷国，军队没有重武器。即使打起来，我们这六支枪也足够对付他们。」

我坐在船尾舵手的旁边，尽情地领略着湄公河西岸的风景，高山密林，宽广的河面。很快，河面变得很狭窄而且多弯，高山遮住太阳，岸上的一切都看得很清楚。我欢喜大自然，也喜爱这热带雨林的植物世界，千奇百怪、形貌各异的树木花草，形成一副绝美的景致。

我陶醉了；凭我的经验，在那一座座大山背后或大森林的深处，会有一些尚未被发现的原始部落或群体正生活在那里，不受任何外界干扰地在发展着他们的文化。我宁愿安安静静那样地生活着。

这 时，我看见六个军人已把枪拿在了手里，紧张地注视着北边的岸上。已经进入寮国的边界了。一个军人让我进船舱，舱里的年轻人似乎已经忘了那天夜晚的教训，大 声地说笑打闹着。大约接近十一点钟时，北岸上传来枪声，所有人马上尖叫着趴在甲板上。枪声不密，听起来不过是一两支枪在零星射击着，船上没有还击。我们很 快驶出这段水路，一切又回复正常。船仍在飞驶着。大约十几分钟后，河面突然变窄，船随着河面拐一个弯后，马上就看到前方两、三百米远有一棵大树倒在河面 上，树上站着六个军人，一个人手里挥动着一面小红旗，另一个军人站在他的旁边，正端着枪向我们的船瞄准着。

几 乎就在同时，船头有人开枪了，那两个人同时掉进河里；岸上的反应不大，仅响了几枪。船迅速接近大树，绕过大树后，继续飞驶着。不过一两分钟后，前方又响起 枪声，且越来越密集。我在船尾的舱里和大家一样马上趴在甲板上，已经听到有子弹打在船身侧板上。突然一声清脆的响声扫过我的右耳边，抬头一

看，就在我头边 不到十五公分，一个刚被子弹打穿的小洞，正在冒着白烟。一股无名怒火立时冲上我的头，天下乌鸦都是一样的黑，天下的共产党也都一样不是个东西；我不认识你 们，你们也不认识我，可这一枪险些没要了我的命。我立刻猛地翻个身，滚到船舱外边，伸手去抓那个正在还击的 军人的枪。我左手抓住枪，那个军人死活不松手，我用右边的胳膊肘猛地打在他肩上让他松开了手，我抓过了枪。我瞄着北岸丛林中凡我怀疑有人的地方，两三颗、 两三颗地发射着子弹。那个军人爬了过来，趴在我的旁边说着什么，但我听不见，仍在全神贯注地寻找着可疑点，并不时地射击着。这时，那个军人一边指点着北岸 上他认为的可疑点，一边向空了的弹夹里压子弹。

对 方把战线拉得很长，枪响时而密集，时而稀少，船上的军人们也是时而枪声大振地还击，时而停止，这样持续了足足有四、五分钟后，枪声终于全部停止。我正指着 甲板上一个被子弹打出的洞让那个军人看时，船舱里又传出了大乱的声音，原来一个浙江人的脖子上中了一弹，血流不止，两个军人正在包扎，那个人已经昏迷了。 我身边的这个军人匆匆跑到船头，对船头的三个军人在说着什么，我则坐在舵手的旁边抽烟，并观察着北岸，心里考虑着。幸亏寮国是个穷国，否则如果他们有掷弹 筒的话，这条船只要中一弹，立刻船毁人亡，不管年轻年老的全部葬身河底。

那 个军人跑回来，对其它军人说了我的打法，认为可以节省子弹，我只用了一个弹夹的子弹，而那几个军人已消耗一半的子弹了。我看着他的脸，又给了他一支烟，他 也不过二十岁，其它的几个军人看起来不过十六或十七、八岁的样子，都还是带着一张孩子脸。那位指挥官就是靠着这样的一群兵，我真怕他连保住地盘都难。我对 这个军人说，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我的打法，我当过兵、受过一点训练，这种打法不是为了省子弹，本就应当这样打。因为你不知道目标，当找到一个焦点，就多打几 粒子弹，坚决把目标打掉；交火时，无论是谁连续不断地射击，就等于给了对方目标，那是纯粹找死。

船 仍飞驶在窄河道中。我们刚抽完烟，北岸又响起了几声枪响，船上没有还击，不足一分钟，枪声密集了，又不断地有子弹打在船上，于是我们开始还击。很快，我就 发现船上的另外五个军人都用我的打法了，几乎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岸上的一个军人从一块至少有三、四个人那么高的大岩石上摔下来，船上人们欢呼起来。终于枪 声稀少了，又静了下来。这个军人告诉我危险地段已经过去，虽然我们仍在寮国边界，但前面的河面已经变宽。我把枪还给他，坐在舵手旁边，心里那种无名火气才 渐渐地消失。大约一个小时后，这条船慢慢地在南岸边一大片伸向水中的灌木丛中靠岸。军人告诉我，我们要在这里吃饭休息，直到太阳落山时才继续开航。丛林中出现五个人，把饭和水抬上了船，由于那个浙江人伤势严重，一直昏迷不醒，他们制作了一副担架，把他抬上岸去了。

饭 后，我上岸想散散步，但仅走了几步就又回来了。岸上是一片的密林，我相信只要走出十几步，会马上迷失方向的。大半个下午，我躺在甲板上，半睡半醒地听着那 个军人讲着他们几次往返金三角运送毒品的冒险经历。终于船又开航了，但这次是以极慢的速度在行进着。天很快就黑下来，四周一片漆黑。远远地看到灯光，半个 多小时后，才看清那是灯火通明的一个大集镇。

那 个军人告诉我，这就是金三角。这片灯光足足有一公里长，由于河面太宽，船又是远远地靠近北岸行驶，所以什么也看不清，但那片灯光足以显示出这里的一片繁华 与歌舞升平的景象。听说那位叫昆山的毒品大王手下有一个师的装备精良兵力，又处于这样的一块人迹罕至的地方，要想彻底剿灭他确实不是易事，可毒品害了多少 人啊。

金三角的灯光消失了，四周又是一片的漆黑。四只电动船无声地出现在船边，船上的人们分别上这四只船。那个军人告诉我，他们的任务完成了；小船送我们上岸，就是泰国，会有人等在岸上连夜把我们送到曼谷去。他们一一和我握手告别。大船消失在黑暗中。

电 动船开得很快，大约半小时后我们就在一片灌木丛中上岸。四个中国人等在那里，步行了大约半小时，便穿越过一条公路，进入一片小树丛后，两部面包车停在那 里。我们分别上车后，车子便上了公路，飞快地行驶两个多小时，到了一个小城市，在城市里拐了几个弯后，开进了一户人家的院子里。那四个中国人很和气地告诉 我们，现在吃饭休息几个小时，半夜启程后就不再停车了，会一路把我们送到曼谷，担保人已在曼谷等着把我们分别接走，再去安排下一段行程。他们祝贺我们，最艰苦的行程已经结束，能活着来到这里的人基本上就等于已经走完百分之九十的路；泰国是个很美的国家，我们的担保人会安排我们在曼谷停留几天，然后上飞机直达目的地。

第四十二章 这里是泰国男人的天堂

我 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回想着这一路的经历，感到松了一口气，至少现在已经安全了。这支原本是二十人的队伍，两死、一伤、两失踪，现在只剩下十五人。究竟到外 国能多赚多少钱？我不知道。这个已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一个年纪大一些的中国人走近我，叫出我的名字，又举起那只拿着酒瓶的手向我摇了摇，一定要我喝杯 酒庆祝一下，这正是我平时爱喝的那种酒，可这次喝到嘴里却觉得那么地苦。

又 是十一个小时不停地行驶着，隔天下午我们进入曼谷，一个小时后便进到了一座大楼里的一间大屋子里。隔天一早醒来后，偌大的屋子里只有我和一个一路护送我们 来的中国人。昨晚和半夜，浙江人和广东人的担保人已将他们都接走了，我和这个人在这间大屋子里整待了一天，在等古叔派来接我的人。快到黄昏时，一个四十多 岁的中国人来了，说是要送我去和来接我的人见面。我们坐进了车，行驶了两个小时，在路上他告诉我，来接我的人在清迈等我。我很高兴，因为听说清迈是个很美 的城市，也是游客们必访之地。泰国是个佛教国家，我实在很想多走走看看。车子开进清迈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在 城里转了一阵后，终于开进一条僻静的小街，车子进了一座小楼房的车库。库门关上后，我们下车进到一间小房间，里面有三个年轻人。这个带我来的人突然说：「我不管你是什么人，我们的人一路上出生入死把你送出来，可你却不付我们钱，这不行！我们老板让我把你送到这里来扣押，直到你的担保人付清了钱才放你。」 不等我说话，一个三十多岁，看起来很是文气的高个子对我说：「我们干这个的就是要挣钱，白干是不行的，既把你送到我这里扣押，就要服从我，我绝不亏待你， 可如果你想逃跑，我就一枪打死你。」说着，一个年轻人突然用一支左轮手枪对着我的头，喊叫着问我听见没有。

这 时我的火气已经冒上来，出于本能地一把抓住了那支枪。那三个人马上扑了上来把我按在地上，他们四个人又脱掉我的衬衫、长裤和鞋袜，用一根铁链锁上了我的双 脚，才放我坐了起来。我问他们这是做什么，他们说这是这里的规矩。我要求给香港打电话，他们又说他们的老板会和我的担保人联系。我要求见他们老板，这次没 有回答，两个人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关进地下室，实在没想到，我会再次又成了囚徒。地下室很大，只有一盏很暗的灯，地面已铺上光滑的地板，但四壁仍是很粗糙的 水泥墙，里面也没有窗户。这里还有三个人，两男一女，脚上也都锁着铁链。见到有人进来，一边的一男一女两个人马上坐了起来，那个男的从墙角拿起一块凉席和 一个枕头向我扔了过来。女的站了起来，用四川口

音告诉我洗手间在哪里，又走过去拉开门让我看。没有人问我问题，我正一肚子火，也不想说话，把凉席放在屋角 便坐下。

那 女人也坐下，很和气地对我做了自我介绍。她是四川大学毕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已两年，六四大屠杀后，她决心出走，但由于既无亲友在海外担保，又苦于在国内无 门路，于是经人介绍认识一个走私团伙，答应帮她出走。她变卖一切财产，把钱给了那伙人，但到了曼谷后就被送来这里关押，原因也是说她没付钱。她讲明了事实 经过后，这伙人经过调查得知，她所托的那伙人就在她动身后，由于涉嫌走私毒品已被大陆警方逮捕，她交的钱也被当做是走私毒品非法所得而没收，被关在这里已 八个多月，最后才问我是不是也是因为没付钱而被关。

这 女人和气，说话又直率，所以我也把刚发生的事向她讲了一遍。她劝告我最好做好长期被扣押的打算，但最终还是会有解决办法的。我看着她。没等我再问，她就指 着在她身边的那个男人告诉我，那个人是杭州人，命实在是苦，去年底与他的同胞姐姐走我来的那条路出来，但他的姐姐喝了有毒的泉水，死在半路上。这姐弟俩从 小没有母亲，由父亲一手带大，在出走前他的父亲先付了一部分的钱，讲好待他们到泰国后再全部付清。

当 到曼谷，他告诉父亲他姐姐的死讯，父亲当即在电话旁就犯心脏病，送到医院救治，但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他父亲手边余下的钱全部花在了住院和丧葬上，于是这 个人也被扣押在这里，已是十个月了。这女人对我说这伙人明知是收不到他们的钱了，再把他们这样扣押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所以打算把他们放了，且仍送到美国 去，让他们工作慢慢还钱。

这 两个人的故事是够惨的，但我绝不相信古叔会不付钱，这里头一定有误会，只好耐心等待几天，让他们去调查清楚。我正要问那第三个人时，这女人向我摇摇手，我 以为他睡了，所以也就没多问。第二天醒来后，我发现屋里只有我和昨晚早寐的人，他正坐在那里。我向他道早安，但他没理我，甚至也不抬头看我，这时我才发 现，他手上戴着一副手铐。这是个十分矮小的人，看样子不过二十岁。当我从洗手间出来后，那一男一女两人正在屋中央的地上摆放着早饭，他们脚上的铁链都不见 了。那女人笑着让我过去吃东西，那个戴手铐的人仍双手抱膝坐在那里不动，我叫他来吃早饭，那女人冲着我摇摇头。

我 问她，他们脚上的铁链怎么不见了。她告诉我，他和杭州人是只在夜晚才锁上，白天他们要做三顿饭，维持清洁卫生，而且这也是交易的一部分。这伙人付

他们工 资，但不付现金，而是以记账的方式减少他们的债务。这女人说：「别看这伙人是黑社会，其实我发现他们比共产党可强多了，至少讲理，不打不骂，而且给我们吃 得好。他们就是一件事：欠钱不行。」

我 们三个人吃完东西后，他们俩就出去了。这时那个小个子才过来吃东西，吃完又坐回到角落里去。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没事干，所以把用过的餐具拿到洗手间清洗，然 后又把地面也全擦干净。过了一会儿，昨晚我见到的那三个人进来了。小个子马上就跪在了地上，向这三个人连连地磕着头，并大声地说着：「求求你们，别打我 了，我父亲一定付钱，求求你们……。」两个年轻看守并不说话，走上去拿掉他的手铐后，又反绑他的双手，拉他站在角落里。那个三十岁的高个子已把一根绳子挂 在屋顶，他们把小个子吊了起来。这个小个子一直是大哭大喊地叫着，一个看守抡起了皮带在他身上一下一下地抽打着。我大声地对他们说：「你们打他干什么？他 已经说了，他父亲会付钱的。刚才那个女人还说你们比共产党强，可……」那个高个子回头对我笑了笑，打断我说：「在那儿看着，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他 回过头去，对着这个小个子大声地说：「说！你父亲是个什么东西？」小个子马上说：「他是个大坏蛋！大坏蛋！」他又问：「说！怎么是个坏蛋？」小个子又说： 「他贪赃枉法，坑害无辜，陷害人命……」高个子又大声说：「还有什么？」小个子马上又说：「还强奸妇女、霸占妇女……，我求求你别打我了，我知道我父亲是 个坏蛋。」高个子从口袋里拿出了个电话，拨了号码后，用一种凶狠的声音对着电话说：「有钱没钱？不行！什么？……我让你听听你儿子的声音。」

他 把电话放到小个子的嘴上，一个看守又狠狠地抽了他两下，小个子尖叫着对着电话喊道：「给他们钱，快「给他们钱，爸！救救我呀！我受不了了！」高个子拿回了 电话，他又对着电话说：你听到了，明天这个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你看着办。」他挂断电话，对那个看守说：「再给他几下，他和他爸一样，都不是个东西。」 看守又抡起了皮带，打了六、七下后，两个看守就出去了。小个子还在哭叫着。高个子坐到我的对面，给了我一支烟，问我：「明白了吗？」我摇摇头说不，不管怎 么说打人就是不对。我问他们是不是也会这样打我一顿？他笑着为我点燃烟，说：「我们不打人，只打畜牲。」接着他开始告诉我这个小个子为什么会被送到这里。

大 约两个星期前，一批福建人被护送到曼谷，其中就有这个小个子和十几个男人，还有三个女人，被安排在一个地方暂时住下，等他们的担保人来接他们。这个小个子 对护送人说他有钱，想去旅店开房睡觉。护送人把他送到附近一家旅

店后，这小个子让护送人回去把那三个女人叫来和他同睡。一会儿护送人回来告诉他，女人们不 来。

小 个子大怒，给了护送人一百美元，让他与其它几个护送人把三个女人拉来，这个护送人把钱退给他，并说他们不干这种事，要他最好自己去。这小个子马上就回到这 一群人中，进门后对这三个女人连踢带打，最后又揪着三个女人的头发往外拉。几个护送人看不下去，上前去保护那些女人，又劝走了小个子。他们看到当小个子行 凶时，这群人中的十几个男人不但不上前劝阻，反而都装作没看见躲到一边去，认为这里边有问题；盘问三个女人，她们却什么也不说，于是又盘问男人们，男人们 也不说。最后几个护送人急了，连威胁带恐吓的，终于有几个人说了话。

原 来，这小个子的父亲就是这群人所在县里的党委书记，兼任着公安局长，是地方上一霸，没有人敢去惹的。两三年前，这个恶霸的大儿子带着一批他贪污来的巨款去 了美国，在那里开了一家工厂，据说生意好，还要多雇人，于是这个书记就让小个子带着这批人偷渡美国，到那个工厂去做工。小个子和他父亲一样，一路上对这些 人张口骂举手打，像对待奴隶一样，还把三个女人都强奸了。以后又几次和这三个女人同睡，大家都不敢说话，因为一来惧怕他父亲是个无恶不做的人，二来怕惹怒 了小个子会向他父亲告状，在家乡的家里人会遭殃的。几个女人又讲了几件这个书记干过图财害命、官报私仇、陷害无辜、强占妇女的实事。

几 个护送人开始抱不平，当晚便把这一切告诉他们的老板，隔天一早就把小个子送来这里了。小个子刚来时先是骂，后来威胁，最后又许愿，挨了两顿打后哭哭啼啼地 让他们去他的旅行包里拿出一万美元做代价，求他们放了他。看守打开他的旅行包，确实找到了那一万美元，无论是看守还是护送人都是从大陆跑出来的人，尽管是 干着黑道上的事，谁也是都知道共产党干部无恶不作，也都痛恨贪污腐败，所以决定要教训这对畜牲父子，并向小个子的父亲要二十万美元的惩罚金。

看 着他这个被吊着的样子，就想起我几次被吊打的情景，心里有点可怜他；但想想他做的事，枪毙他都是应该的。中共无法无天，能在海外执行一点正义，又什么不 好？于是，每天上午看小个子被吊打，成了我唯一的事。由于每吨饭都有鱼有肉，我要求看守替我买来一瓶酒和烟，中饭和晚饭就喝点酒，以打发这难熬的日子。很 快，我就发现原来那一男一女正在热恋中。白天除了吃饭以外根本见不到他们，晚上回来，两个人也是脸对脸地躺在一起说话。半夜，两个人又去厕所做爱，声音大 得惊醒过我两次。我为他们高兴，两个苦命的年轻人如能

长久地结成一对，当然是好事。第四天晚上，那个小个子向我要了一支烟，我扔给他，他抽着烟又看着我，突然对我说：「他们这么对待我，早晚他们要倒霉的。我出去后非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不可。」我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那 女人突然坐了起来，对他说：「他们倒什么楣？现在是你倒霉。其实我现在非常想看到你老子也倒霉，不过别着急，会有这一天的。你又有什么厉害？你是仅靠着你 父亲，到你父亲被枪毙了后，你以为你还能活着？好好想想你们干的那些坏事，还有什么可说嘴的？」她刚说完，没想到小个子竟马上还击说：「我们有没有干坏事 关你什么事？你们每天半夜在洗手间干的什么事……。」下边是一句极下流的话，我有点生气了。那女人马上站了起来，但马上被那杭州人拉着又坐下。这时我第一 次听到这个杭州人说话。

他先骂了小个子一句，接着说：「你们干尽了坏事，你们祸国殃民，怎么与我们无关？你父亲混蛋，你比你父亲更混蛋，闭上你的嘴，小心我揍你！」小个子没再说话，但显然不服气。

隔 了一会儿，他向我伸出手，我明白是要烟，可他又一句话不说。看他那样子，我就有气。我对他说：「刚才你要烟，我给你了，可你连个谢子也没说。这次你又要 烟，连句话也不说，只是伸手。为什么要给你？是因为你厉害？还是因为我也应该怕你父亲？」他又看着我说：「你也不是人，我被打成这个样子，找你要支烟还得 听你这个。」我的火气上来了，还没说话就听那女人说：「你才不是人呢，打死都应该！刚才那支烟就不应给你。」我向那女人摆了一下手，对小个子说：「刚才他 们两个人说的话有什么不对吗？我问你有什么不对？这里的看守们打你，也没有错，因为你们父子做了坏事，你自己看看你那个样子，每天跪着磕头求饶，又哭又叫 的，也算是个男人？还敢问我是不是个人？正因为我是个人，所以才痛恨你们这群畜牲，所以才在监狱里被一群像你父亲一样的畜牲们折磨成这样。我受到的那些折 磨，让你听到都能吓死的，我可没像你又哭又叫又求饶的。」

我 说到这里，那一男一女向我走来，女人对我说：「我们俩已经议论几次了，估计到你是从监狱里跑出来的，看你身上这一块一块、一道一道的痕迹就知道。」说着， 两个人拉我到灯光下看我浑身的伤痕。几天来，我一直是待在离灯光很远的角落里，而且一直用胳膊去遮挡着左胸上那个又黑又大的乳头。今天，由于这个小畜牲激 怒了我，我开始指着身上一块一块的伤，告诉他们每一块伤的来历，我没有说出被奸的事，但我告诉他们我的直肠也被烫过。我对小个子说：「我听说你父亲也是公 安局长，那一定也没少折磨人的，你最好告诉你父亲，没有一个人受到这些后会忘记的，十年、二十年后，伤疤会消失，但这个仇没人会忘

的。我听说你强奸了三个 女人，你以为那三个女人会忘记？我告诉你，她们会记住一辈子，只要有机会，她们三个人会一个一个地向你报仇，你会死得连条狗都不如！」说完，我又回到了角 落里。那个杭州人握了一下我的手，女人却是一点不客气地把那个小个子骂了一顿。

第 二天上午，当那两个看守正在吊小个子时，那个高个子走到我面前，把我拉过去到灯光下，浑身上下地看了一遍后。他大声地命令两个看守：「给我狠狠地打！」然 后对我说：「我马上给老板打电话，让他快点查清你的事。你应该马上去医院治疗。」在当天晚上，一位三、四十岁、被这三个看守称作老板的人出现在地下室。他 很客气地和我握手，也看了一遍我身上的伤，然后命令看守马上解开我脚上的铁链，说他会尽快在几天内做出个决定，要我耐心地等几天，问我需要什么药品，他会 马上让看守去买。最后又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把他拉到角落里，低声请问何时那一对恋人才能到他们要去的美国，他点点头说：「很快，很快。」

我 对他说到那个小个子的事，告诉他我的看法。二十万美元，那是一百三十万人民币，对于一个县来说，那是人均四至五块钱的一笔大数目，如果他父亲手头没有这笔 钱，那一县的百姓们就要遭殃了。我请求他不要这样去逼那小个子的父亲，并提出如果他与美国的帮会有联系的话，就通知美国帮会控制住这两兄弟，只要以后再听 到他们的父亲又干坏事，就可以随时抓住这两兄弟以阻止那个老畜牲。听我说完，这位老板点了一下头说：「我会考虑的！」他们走了后，这一对恋人很惊喜地发现 他们脚上的锁被撤去了，向我表示感谢。我又告诉他们，那个老板说会很快把他们送到美国去的。他们高兴了。

可 能是这一次谈话的缘故，第二天一早我又被允许离开地下室，可以到各屋走走，与看守们聊天，或帮助这一对恋人做饭。我向看守要出我的衣服和旅行包，用了半天 的时间在卫生间里，用一把大刷子把我的全部东西都刷洗干净。那女人帮我把衣服很整齐地熨平并折迭起来，又交还给看守。我留下那本英文字典，每天当书看，又 在那女人的帮助下，力图每天背会二十个英文单词。但这个时候，我开始又病了。旅途上的过度劳累使我全身都在疼，加上不知为什么而引起的头疼、肝疼和心脏跳 动不规律。我不知道该吃什么药，因为胃口仍好，我以为一切只是因为过度疲劳，再加上一路上饮食不对味所致。

钱 包里除去古叔两次给我的几千港币外，我还有些人民币。看守讲他们黑道上的人需要人民币，所以用泰币换走了我全部几百块钱的人民币。泰币的比值很低，所以又 换回了不少泰币。我把泰币都给了看守，让他们到外面去买上等的中国

白酒，还有他们提到的那些烹制极佳的鸡、鸭、鱼、肉回来，除了小个子外，我们六个人共 享。几天这样的吃与喝，使我忘掉了病。

在 被关到这里来的第九天晚上，那个四十岁，当初把我骗到这里的人来接我出来了。坐在车里，他很客气地告诉我，事情已经解决了，但究竟是怎么解决的和这件事是 为什么发生的，他说不清。他按老板的命令把我送到一个旅店去，并告诉我在明天中午前会有人去接我，又把五百泰币放进了我的手里。车子停在一家很好的旅店门 前，由于他已订好房间，所以直接带我进了房间。房间很大，很好，我十分满意。他出去叫侍者送来烟、酒、食物和水果，最后又带着一个女人进来，笑着对我说：「这里是泰国，男人的天堂。老板让我给你叫个女人让你好好享受一下，钱我全付了。我走了。记住明天上午不要出去，等着接你的人来。」

泰 国女人温柔善良，从小就受到母亲的教导和影响，加上对男人的尊敬崇拜的传统，一切都在这一个女人身上表现出来。她受到很好的职业训练，一整套周到细致的服 务，表现出了这个行当的尊严及水准；我感到很刺激，也很快活舒服，尽管无法交流，但凭着手势和身体动作就足以沟通了。然而，当我们在进行性交最后的程序 时，我彻底失败。

在 这时与这个女人的实践中证实了，我的性器官已连带着受到了伤害，不能勃起，没有功能，我竟也失去了一个男人对异性应产生的反应与能力了。看到那妓女的失望 的眼神，我极惭愧，把头深深地埋在枕头里，要她快走。那一夜，我的心情很复杂，想了很多，几乎一夜没睡，把侍者送来的酒都喝尽。

第 二天中午，三个中国人来了。负责我下一段路的人是一位香港的阿仁先生，他们接到阿仁的电话，说是有些事正在安排中，明天上午才会与我联络。他们已为我在另 一家旅店包了房间，且已把房间里电话号码告诉了阿仁，至于细节和下一步怎么做，他们则一概不知；现在他们是奉阿仁之命而来，带我出去玩玩、吃饭，然后送我 去那家旅馆。那天下午，他们用汽车带着我玩了几个地方，晚饭后便将我送到他们预定的旅店，然后又商量着要打电话为我叫个女人来。我谢绝了，并不是因昨晚的 沮丧发现，而是我确实病了。

他 们走后，我一个人来到街上，想去找一家医院或医生，走出不远后才发现，那些在五光十色的灯光下映照出来的文字我一个也不认识，一直走出去很远，但什么也没 找到。我明白了，就算现在就站在一家医院的门口，我不识泰文也不

会知道这正是我要找的地方；即使我见到了医生，又能怎么办，对人家说什么？这时，我第一次 感到我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他乡了。沿着另一条街开始往回走时，意外地发现一家药店，我惊喜地走了进去。一个店主模样的人向我微笑，双手合什向我说着什 么。我愣住了，只能马上也笑开，双手合什地退出来。我第一次知道语言的重要性和不能交流的痛苦；一边往回走着，一边对自己说，只要能活着到加拿大，一定要 首先攻克语言关。

那一晚，可能是病的缘故，我又像死了一样地睡去，直到隔天中午电话铃声才惊醒了我。那位香港的阿仁先生打来的。他告诉我，一会儿有一位张先生接我去住到他家里，他很快会飞来曼谷见我，安排我去加拿大，同时又要我在被张先生接出去之后，马上给古叔打电话，让古叔知道我已自由了。下午三点左右，张先生打来了电话，证实了我就是他要接的人后，很快就出现在我的房里了。这是一个三十多岁上下、矮矮胖胖的人，看上去他很热情，也爱说话，且精力充沛。他说打通香港电话的最好时间是在傍晚，于是先带我去了一处叫做「金鱼缸」的声色娱乐所玩了两个小时，晚饭后才给古叔打电话。

电 话中，古叔详细地告诉我，他是如何在香港找到一个走私人口集团，向他们交了一笔钱，讲好由他们护送我一直到曼谷，但这笔钱在昆明被接待我的那个人独吞了。 当我在清迈被扣押后，古叔马上就猜到是这么一回事，并责问那香港集团，这个集团却找不到那个人了。古叔大怒，马上利用自己在香港的影响，向这个集团施加压 力，迫使集团向这伙人又交出一笔钱。古叔又与曼谷这伙人的大老板通了电话，讲了我的实际情况，于是这伙人不但马上放了我，且悻悻然打消了向古叔再多敲一笔 的想法。本来古叔打算在我安全到达曼谷后，仍由那个集团继续安排我去加拿大的行程，但由于这件事的发生，他大为恼火，所以才又找到阿仁这伙人来护送我。古 叔一再地要我注意身体，在泰国好好地趁空档休养恢复。我告诉古叔，我又病了。他要我不要怕，也不要慌，什么也不要想，叫我把电话拿给张先生。几分钟后，张先生挂上电话，拉着我坐进他的车里飞快离开，一边抱怨为什么之前没有先告诉他，我正病着。

第四十三章 穿着内裤的男人揪着裸体女人的胳膊走出房间

张先生的家是一所半独立的小楼房，不大，但很干净，布置很好。张先生很得意地把他太太介绍给我，又急着开车去请医生了。张太太是泰国人，长得很美，年纪轻得好像张先生的女儿。她不会讲中国话，只微笑着为我点烟、沏茶，又不断地端出水果和甜食招待我。我努力地向她做着手势，希望能有个地方让我躺下，因为我已经病得坐不住了。

她终于明白，引我上了楼，进了一间很舒适的小房间，然后轻轻关上门。我迷迷糊糊地躺下了。一会儿，我知道张先生请了一位医生来，医生对我说话，我勉强地回答，后来有好像给我打了一针，又喝着张太太喂我的一种苦药，再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整整两天，我一直这样神智不清地昏睡着，直到第三天早上，才清醒过来。

张先生得意地看着我，夸赞着他父亲的这位老中医朋友。正说着，医生来了，一位很祥和的医生，谈吐间可以知道是一位饱学之士。检查后，老先生说我已恢复，留下了一点药后就走了。张先生也放心了，张太太又端来苦药，我努力一口喝下去。我从不相信中医，可这次却偏偏是中医和中药救了我，所以再苦的药我也喝。张先 生看起来无事可做，一整天和我不停地说着，我开始了解他的一些身世。他是广东人，在几岁时，母亲就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不久他父亲带着他逃出大陆来到曼 谷，父子俩相依为命，父亲每天去做工，他去上学，生活很清苦。父亲是个能干的人，几年间积了一些钱，自己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店，在后来十五、六年中，逐渐 地发展成了四、五间象样的小店，生活开始好起来。他的父母感情很好，父亲始终怀念着死去的太太而一直没有再娶。

张先生高中毕业后便不想再继续求学了，他既不想去工作，更不想帮父亲经营店铺，而是很快就加入到一个专干走私商品的团伙中去，由原来的走私香烟、手表、打火机，逐渐发展到走私人口这个生意上来。五年前，他父亲去世，张先 生立即卖掉父亲苦心二十年经营起来的几家店，从此更大胆地干起人口走私行当。据他自己讲，他喜欢干这种事，轻松、自由，又可以整天玩，风险不大，又挺赚 钱。他又在另一处地方买下一座小楼房，雇佣几个人在那里，专门接待从大陆偷渡出来等待被送到西方国家的人，暂时住在那里。

我 是由于古叔和阿仁的特别交待，所以住到他自己的家里来，否则也是要住到那座小楼房里去的。他直言不讳地提到，他的爱好就是女人。他感谢他父亲把他带到这个 「男人的天堂」里来。父亲死后，他便将他父亲为他订了婚的女人打发掉，每天与不同的女人来往、上床，从不想结婚。去年的一天，他去泰国北部边境接一批逃出 来的中国人时，无意中发现一个不到十六岁的山区女孩子，他一眼就喜欢上了，当时就以一万泰币（三百美元）的价钱把这个女孩子从她父母的手里买来，并与接到 的人同天带回曼谷。几个月后便不再把这个女孩子当做性奴对待，正式娶了她，就是现在的张太太。两个月前，这位张太太又向他贡献了一个儿子，张先生高兴极了。

然 而他仍每天晚上出去找女人。这次我生病，他整整在家陪了我两天，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他劝我今天晚上和他一起出去找女人玩。我笑着问 他：「你看我这个样子能出去玩？」他不说话。我让他再让我恢复两天，我一定和他一起去。他无可奈何地搓着两只手叹息着。第二天晚饭后，我实在不忍心再拒绝张先 生了，他马上高兴起来。也就是从这个晚上起，生活规律完全颠倒了，变成每天天亮以后才回来睡觉，睡到下午才起来，晚饭后就又出去，整夜地被他带着从裸体舞 厅到兼做卖身生意的歌厅；从一处处私人表演，到一处处离奇古怪、专门满足男人的奇想和怪欲的地方。看着这些一场场、一幕幕活生生、赤裸裸的表演，我被刺激 得口干舌燥，热血沸腾。但是，那个部位却仍然丝毫反应也没有。我不死心，继续跟着他整夜地到处跑，不断地寻求着更大、更新奇的刺激。我仍然抱着一线希望， 希望这只不过是由于那场大病和旅途中的过度劳累而引起的，多接受些刺激会有反应的。

午夜以后，张先生就开着车开始到处寻找那些专门提供妓女服务的两小时旅店。通常的做法是在进入旅店后，就被引导着进入一间小客厅里坐下，随后老板带着旗下的女人们进来供挑选，客人选中妓女便开房间，包括妓女和房间总共在六百至八百泰元之间（十六至二十二美元）。张先生是老手，每夜都要去找不同的这种旅店去开房间，有的时候由于在一家旅店挑不到满意的妓女，便马上又去寻找下一个旅店去了。我则总是坐在旅店的门厅或走廊的沙发上看电视等他，同时享受着老板免费提供的茶和香烟，等他出来后，我们就一起回去睡觉。张先生每次都劝我挑一个妓女，有时他要直接替我选，但我总是笑着摇摇头。我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我被从地下室放出来第一晚的那个妓女看我的那失望眼神，始终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种眼神同时也可以是嘲笑和讥讽。

一天的午夜后，照例一番猎奇和刺激后，我们又来到了一家这种旅馆。这是一个两层楼的建筑物，楼下是一家饭馆和几家小商店，楼上便是旅店。我们坐在沙发上，张先生仍在劝我挑个女人开房间，并说出了一大堆的理由。这时老板带着七、八个女人进来了，其中的一个妓女立刻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她的眼睛很像阿莲；头发的样式、甚至年龄，也都与阿莲相仿。我一直盯着她看着，张先生也注意到

了，一再让我留下这个女人，我仍拒绝。那天晚上生意看起来比较好，我坐在办公室外面沙发上，看着悬吊在对面墙上的电视。老板带着这群妓女出出进进，几阵忙乱之后，才给我端来了茶和烟。我正喝着，突然 听到走廊里的一个房间的门像是被撞开了的声音，我回头去看，一个穿着内裤的男人揪住裸体女人的胳膊走出房间，迅速来到办公室门外。男人把女人推倒在地上， 老板也听到声音，从办公室走了出来。男人用很重的广东口音向老板讲着泰语，同时还打着手势，老板一把揪住那女人的头发，迫使她跪在地上，然后抡起了拳头去 打女人。女人在哭着说着什么，老板又揪起她的头发问她话，这时我看到女人就是那个眼睛像阿莲的女人。我也不知为什么，跳起来一把抓住老板那只握成拳头的 手，脱口说：「不准打人！」

老板愣了一下，马上说着什么，我当然更不懂了。拉下了他的手后，我又去抓住了他的另 一只揪着女人头发的手，迫使他松开头发。这时，那个穿内裤的男人用生硬的普通话对我高声说：「关你什么事？这女人的服务不好，我有权向老板投诉，老板教训 她是应该的，你又管什么？」他转向老板大声地说了一句什么，老板就抡起了拳头向女人打了下去。我突然控制不住自己，想也没想地一拳向那个男人的脸上打去， 他猛地倒退几步摔倒在地上。我回头想去抓老板的手，但老板比我更快，已跑进办公室并拉开办公桌上的一个抽屉，立刻抓起一只左轮手枪，用枪对着我，一步一步 走出办公室向我走来。

我正想要不要伸手去抓枪，但马上又停住，这位老板的个子矮，拿的这只枪正对着我的肚子。我犹豫了，我曾受到过的训练都是如何在枪对着头和胸部徒手夺来，现在枪对着我的肚子，使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了。我后退了一步，两眼盯着那只枪，仍在找机会夺过来。

老板似乎看出来了，也后退了一步，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变大了，再去夺枪已经不可能。我只好举起双手，一步一步地慢慢地倒退着走到门口。来到门外，我恐怕他会打电话叫警察，所以马上走到马路的对面，躲藏在路灯和树的阴影里。没有警察来。过了一会儿，张先生出来了，他大声地叫着我，我才从阴影里出来。坐在车上，我向他道了歉，又问他会不会有麻烦。他笑着，满不在乎地告诉我，那老板去敲他房间的门，说我打了他的客人；他有的是这方面的经验，只不过多给了两百块钱，老板马上笑了，并又客客气气地把他送出来。

隔天午夜，在我们又快到去找另一家类似的旅店的时候，我问张先 生能不能再去昨晚是那家旅店。他马上笑着对我说：「我就知道昨晚你看中了一个妓女，让你叫她，你又不干，怎么今天又想去了？」我没有回答他，只是问：「我 只是怕那个老板仍记恨，如果不让我进去怎么办？」他笑着说：「那怎么可能？他们

要赚钱，怎么能拒绝客人呢？你不要管，让我来对付他。」我们走进这家旅店 后，那个老板一眼就认出了我，但马上装出一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笑着、恭敬地把我们让进小客厅，然后又把他旗下的妓女们带了进来，那个眼睛像阿莲的女人走在最后。我马上向老板指着她，老板把她推到我的身边。张先生也挑选好了一个后，我让他问老板，我想和这个女人待一夜，他们要收多少钱。张先生高兴了，马上表示他也在这儿待一夜，明天中午回家。又告诉我这不用问，只要多付两百块钱就可以。说着，他给了老板九百块钱，我也拿出了一千块钱（三十美元），示意他不必找钱了。老板马上对我露出和善的笑容，我也马上对着他笑了。张先生在一边说了两句什么话，老板又为我点了一支烟，我心里想：「这就对了，昨天我可没打你。」

老 板带着我们进了房间后，很快又给我们送来茶、水果和香烟。我让他把烟拿走，泰国产的香烟实在难抽。这女人坐在沙发的扶手上，对我笑着，又不停地挑起水果放 进我的嘴里，开始对我比比划划地说起话来。她认出了我，可能是在说着昨晚的事。我笑着看着她，她的眼睛确实像阿莲，黑黑亮亮的，这也是个爱说话的女人，一 直对我说着、比划着，我却一点也不懂，也不想懂，看着她的眼睛我已经很满足。她走到浴室里去洗刷那个大澡盆，又在里面注满热水，然后走出来，跪在我的面 前，一件一件地脱掉我的衣服和鞋袜。我感到有些难堪起来。在她很快地也脱光自己的衣服后，带我走进了卫生间，让 我躺在澡盆里。她用一块抹满肥皂的大海棉用力地擦洗着我的全身。她的手很有力，搓得我甚至感觉疼了，但没有让她知道，也不想让她停下来。我感受着阿莲当初 用水管给我洗澡时的那种感觉。这女人也像阿莲一样，洗得很认真仔细，不同的是她比阿莲有力气，我全身的皮肤都被她搓洗成了红色。终于，看起来，她满意了， 用一条大毛巾擦干我的身体，让我躺到床上去。她又回到浴室，轻轻地关上了门。她也像阿莲一样，不愿意让我看她洗澡。

门 轻轻地打开，她无声地走出来了。小心地上了床后，便跪在我的身边，用她那双小而有力的手开始给我按摩。有些部位使我感到很舒服，但当她碰到我的一些伤处 时，疼得我不禁抓住她的手。她把台灯放在我的身边，一边看一边用手去摸那一块块的伤痕。她凑近我的脸，表情很是认真地对我说着话，并不断地做着手势，又指 着我的伤处。我以为，她一定不理解。尽管是个妓女，见的男人多，但也很少见到一个像我这样带着一身伤来妓院的吧。

她 还不停地说着。我想到泰国是个民主国家，一定报导了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六四大屠杀和大清洗等等，她可能猜想我一定是个从监狱里出来的人。不管她在说什 么，我都笑着冲着她点头；她仍是很认真地说着，我也不断地点头表示同意。后来她似乎开始觉得难过，把头贴在我的胸前。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又开始说，并用 手比划着，用一只手握成拳头做着打人的样子，后来又指着她的肩头，转过身去让我看她的后背。在她的肩上和后背上有几块紫红色的印子，我用

手去抚摸了几下， 又用嘴去亲吻着。她激动了，又对我说着、比划着，恐怕她是在把共产党与妓院的老板做着比较。如果是如此，我确实想告诉她，共产党可比妓院头子凶残不知多少倍。

我 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让她明白，法制是在民主制度建立以后才逐渐的形成和完善起来，她终会得到解脱的，而且也会有机会去控告伤害过她的人。我把她抱住，不断 地抚摸着她，又在她的脸上头上亲吻着，安慰着她。过了一会儿，她可能是想到了她的职责，又跪起来继续为我按摩，这一次她做得很仔细，而且时间也很长，同时 小心地避开我的伤处。她又要为我做；这是我第二次经历这种性行为，说实话我并不喜欢，而且认为是对女性的不尊敬。我阻止她，她看看我，可能以为我急于要和 她性交，于是轻轻地下了床，去关上灯和电视，只留着一盏发着柔和暗淡的光的台灯，然后爬上床来，与我并肩躺下。她手里拿着的一个保险套，被我抓过来扔掉 了。她不理解地看着我，我关上台灯，躺在她的腿上，她马上坐起来，一只手抱着我的头，把我的脸紧紧地贴在她的一只乳房上，另一只手开始轻轻地在我身上抚摸 着。

我 几乎认为她就是阿莲了。我们就这样待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她的嘴里轻轻地发出声音，好像是在哼着一支歌，直到这个声音停止了，我坐起来，轻轻地放她躺下，然 后用两手在她光滑的身体上抚摸着，我闭上眼睛，去努力寻找着对异性肉体的那种激情和欲望。我用嘴几乎亲吻遍了她每一寸的身体，那激情、那种对异性占有的欲 望使我的心跳加快，血液在我的身体里迅速地流动着；但令人失望地，那个东西仍丝毫没有反应。我期望着奇迹，继续不停地抚摸她和渴望她，由于激动和兴奋，在 这间冷气十足的房间里我已浑身大汗。终于我失望了，跳下床，坐在沙发上大口地抽起了烟。

她 也起来了，无声地走到我面前跪了下来，又要为我。我推开了她，她又要过来做，我又推开她。她站起来，拿来了一条大毛巾，为我擦净全身的汗水。她拉开了半边 的窗帘，夜色透进房间。她又在对我说话，并摇着头，夜色下，她的眼睛更像阿莲了。我抱住她又去抚摸她，她也抚摸着我，终于我平静了。抽完第二支烟后，她拉 我回到床上。这一回她不顾我的阻拦，很坚决地为我，同时双手仍在不停地摸着我。终于她也累了，对着我的耳朵在说着什么，然后又拉我坐了起来，抱着我的头放 在她的大腿上，一只手搂着我的头，把一个乳头放进我的嘴里，另一只手轻轻的抚摸着我，嘴里又像是在哼着歌。在天快亮的时候，我就这样睡着了。

张先生敲门的声音惊醒我。睁开了眼睛，看到这女人已经穿好衣服，正坐在床边看着我。张先生进来问我打算什么时候走，我告诉他我想带这个女人出去吃饭

再走。他摇了摇头，对我说：「老板是不会同意的，凡是买来的女人，他绝对不会让客人带出旅馆的。你不要找麻烦，好不好？」我穿好衣服，拿出五百块钱塞在这个女人的手里，她惊喜地看着我。我在她的脸上摸了一下，便和张先生走了。

就 在那天下午，香港的那位阿仁先生飞来了。这是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戴着一副眼镜，人看上去很是干练，说话也果断。他向我说明了他的整个的安排，并提到 古叔完全赞成他的这个计划。我将在明天傍晚乘坐长途旅游车到寮国，后天天亮时到达泰国和寮国的边境，出泰国海关进寮国。在寮国待一天一夜，大后天一早乘泰 国航空公司的班机 再返回曼谷，在曼谷机场与一位叫阿亮的先生见面，下面的路途就由阿亮护送我。我们在曼谷机场不进关，大约一个多小时后，转机到马来西亚去，傍晚到达后仍不 进关，马上直飞比利时。在比利时休息几天，再乘飞机直飞加拿大的多伦多，飞机中途停在波士顿约半个小时，阿亮就在波士顿下飞机，我一个人继续飞到多伦多 去。

阿 仁说，我到达多伦多后，就可以把实话都告诉机场海关的官员了，他们不但会保护我，还会告诉我合法地留在加拿大的全部细节，我就完全自由了。对于他的安排， 我只有听从，因为我毫无国际旅行常识。但对于去寮国，我有些不情不愿，也不明白为什么。阿仁直率地告诉我，他为我准备的护照是假的，为了变假成真，就要有 出关和进关的印章。出关没有人注意护照的真假，只有进关会严格检查。寮国因为是个穷共产党国家，少有人去，加上国家穷，没有检验护照的科技仪器，所以不会 出问题的。我要看那个护照，他没让我看，而是给了张先生，他对我说：「我让张先生陪你去寮国，然后再一同返回曼谷机场。他会介绍你同阿亮认识，并把护照给阿亮，阿亮在波士顿下飞机同时也把护照带走。你对加拿大海关可以实话实说，你从没见过护照，且一路有人护送，这样可以少些麻烦。古叔对我讲，你前一半的路遇到太多麻烦，他希望我尽快把你平安送到，不要再有任何意外了。」

说完，他拿出几张我也看不明白的汽车票和飞机票给了张先生，然后就站起来告辞，同时又给了我两千美元和一个小包，告诉我是古叔给我的，小包里是各种药品。我想让阿仁和我们一起吃饭，但他马上笑着摇摇头便匆忙地走了。阿仁走了后，张先生很高兴地对我说，阿仁对我的这个安排绝对可靠，可以说是完全地排除了一切可能发生的风险。这时他也才告诉我，他和阿仁是一伙的，已经在一起干这种事几年了。对于偷渡的人，他们通常的做法就是给一本假护照，由张先生负责将这个人送出曼谷机场的海关，然后看着这个人上飞机，起飞后他们的工作就结束了。据他讲，最近的两年来，只有五、六次用这个方式安排把人送到西方，绝对安全的。三、四天后我就会到达加拿大了。

听了他的话，我也高兴。他催我快吃饭，饭后和我出去玩一场庆祝一下。吃饭的时候，我对他说：「泰国有很多的名胜古迹，而我在泰国只有一天的时间了，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王宫、四面佛和一些古寺庙和一些有特色的风土人情，这些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东西。」他显然对我的话没兴趣，马上一本正经地对我说：「男人来到泰国就是来享受女人的，你说的那些地方是为女游客们提供的。阿仁连饭都不在我这里吃，匆匆忙忙就走了，也是去享受女人去了。他明天一早飞香港，今晚当然要大玩一场了。」说完又催我快吃饭。我没办法了，看来我想看的东西正是他最不感兴趣的事情，而他整天沉醉的事，又正触到我说不出的痛苦。终于，我还是和他达成协议，今晚听他的，明天下午参观四面佛，然后启程。

那天晚上刚九点钟，我对张先生说，我还想到昨天夜里我们去的那个旅店。他马上笑起来，对我说：「喂！玩妓女可不能动感情呀，否则可会有麻烦的，告诉我，你是不是又看中了另一个了？还是又要去找昨晚的那个？」我没回答他，心里想：是个人就有感情。那个眼睛像阿莲的女人不但不嘲笑我的无能，反而尽力帮助我、安慰我，即使对这样的女人动了感情也是应该的，何况也只有这一个晚上了。

在我的坚持下，他同意送我去，但他还要继续玩，并且发现一个新的这样的旅店去过夜，讲好明天中午来接我。一路上他不停地拿我开着玩笑，直到下车时，他还在笑着。我走进旅馆，那个老板和一群妓女都坐在办公室里，我用手指了一下那个女人，她马上笑着跑了出来，拉着我的胳膊把身体靠在我身上。老板笑着拿着钥匙要带我们去开房间，我拦住他，向他打着手势表示我想带她到楼下的饭馆里吃顿饭。他明白了，马上拼命地摇头，又抓住这女人的胳膊把她拉到他的背后。我向前迈一步想继续请求他，但老板马上退进办公室，把一只手放在抽屉上。他是又在威胁我，因为那支枪就在那个抽屉里。这一次我可不怕他拿枪，张先生已经告诉我了，凡是做这种生意的老板都备枪，但绝对不敢开枪，而且也不敢主动叫警察来的。

我不是来找麻烦，只是想带这女人出去吃顿饭。我拿出了钱夹，先付给当晚的一千泰币，他抓过去放进口袋，我又把钱夹里的港币全拿出来，数了数大约可以折合二百二十美元。我把钱放在柜台上，开始向他打手势，意思是要他放心，我不是想抢走这个女人，不过是带她到楼下吃饭，这笔钱是押金，可以折合八千多泰币的，即使我把这女人带跑了，有了这笔钱，他也不算吃亏。终于他明白了，把女人推回到我身边。

这 女人高兴得一直不停地和我说话，我笑着，看着她的眼睛，点着头，竟把饭馆里的侍者骗了，以为我是本地人，把泰文菜单递给我。我一个字也不认识，只好又给了 这女人，她兴奋地指着单上的几行字对我说着什么。看来实在是无法沟通，我只好向侍者指着几个标价比较高的菜，侍者点头明白了。我又拉着这女人到饭馆里的小 酒吧去，让她为自己选一种酒。她似乎并不懂得酒，不好意思地摇着头，最后还是在侍者的帮助下为她选择了一种葡萄酒。菜一道一地道端上来，我很高兴几道菜都 不错，看得出来她也都喜欢。她仍在说着，而且吃得很高兴。

不 久，可能是葡萄酒起作用了，她的脸红起来，两只眼睛更亮了。我不断地给她夹菜。那顿饭我们吃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几盘菜都吃光了。她不好意思地对我笑着，又 把半杯酒推到我的面前，我一口喝干后，她便拉着我出来了。可以看得出来，她是不被允许出来的，她站到外面贪婪地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又站在几家 小店的橱窗外看着。我想让她进去看看，她却摇摇头，拉着我走上了楼。

仍 是昨天的那个房间。老板随后送来了茶和水果。我向他伸出了手，他不情不愿地把港币还给我。当他走出去并轻轻地关上门后，这女人一下子跳到我身上，抱着我的 脖子在我脸上亲了几下，又把我推坐在沙发上。她便很快地脱光了自己的衣服，然后坐在我的膝盖上为我倒茶，又不断地挑选着水果放进我嘴里。她向我说着、比划 着，我似乎明白了，她希望她的裸体会对我产生刺激。这几天跟着张先生到处去玩，每一个所到之处我所受到的刺激都是以前从来没经历过的，但通过昨天与这个女人的实践，似乎一切经验一点用处也没有。今天我又来这里，无非是想在我有好感的这个女人这里再试一次，希望能发现哪怕是一点点的反应，也可以证明我还是有希望的。

当 我又被她擦洗得全身皮肤通红通红的躺到床上后，我拒绝她的按摩，并要她关闭所有的灯，只有在漆黑中，我才不会感到那么难堪，而且也多少减少些自卑心理。我 慢慢地并且长时间地抚摸亲吻了她全身上下的每一寸地方，她又同样地抚摸和亲吻了我的全身上下，然后又坚持为我做了很长时间的。我全身的血液在升腾，性的欲 望已经强烈得快要爆炸，但那个地方仍然毫无反应，我开始想拿把刀把那个东西一刀切掉。我翻过身去趴在床上，把头深深地埋在了枕头里。她打开台灯，用毛巾擦 干我全身的汗水，又在我的后背上轻轻地按摩着。我平静一些了，又翻过身来，对她摇摇头。她的眼睛里竟然充满了泪水。

关 上了台灯，我拉她躺在我的身边，搂着她，开始讲起中文，讲到我的过去，以及被捕的经历与在监狱里受到的一切折磨。说着，我控制不住自己，开始痛骂

那群折磨 过我的畜牲们，痛骂起共产党，并且发誓一定要尽余力去推翻共产党，并且亲手杀死一切祸国殃民的畜牲。我激动了，一直不停地大声地说着；她把脸贴在我的胸 前，一直在静静地听着。她当然听不懂我说的是什么了，但我相信她理解我的情绪。

终 于我又平静下来。下了床，坐在沙发上抽起烟。她轻轻地坐在沙发扶手上，抱住我的头吻着。我问她：「我刚才说的话，妳都听懂了？」她马上看着我，十分认真地 点点头，我又说：「相信我，我早晚会亲手杀掉那群畜牲们，而且我一定要写本书，向全世界公布共产党的罪恶，也一定会看到共产党倒台！」她向我重重地点了点 头，我看着她，突然笑了，把她抱到床上。她看我笑了，马上把脸凑到我的面前，很认真地对我说起话，我也很认真听着，同时揣测着她可能会说什么，并不断地点 着头，终于我又笑了。这一次她也笑，又要为我，我拦住她。她再次把我的头放在她腿上，把一个乳头放进我嘴里，然后一只手抱着我的头，一只手轻轻地在我的身 体上抚摸着。我静静地享受这一刻，同时更珍惜这一切。不久，我就这样入睡了，这是我最后一次从女人那里得到温馨和爱抚，以后便再也没有了。

第二天中午在离开前，我又往她手里塞进五百泰币，并让张先生告诉她不要被老板知道，留着以后有机会为自己赎身。她透过张先生告诉我，希望我今晚再来。我没等张先生那些开玩笑的话说出口，便匆匆地点点头，拉着张先生出来。

第四十四章 一群裸体女人陪我们喝酒

那天夜里，我和张先生坐在飞驰的旅行大客车里向寮国出发。张先生已睡着了，我却没有丝毫睡意。在泰国这些日子里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不知不觉就是二十天过去，我觉得自己什么也没有做。一到曼谷，我就做了九天的囚徒，刚一获得自由，又病了四天，这最后的四、五天，又被张先 生拉着整天寻欢。总算今天下午参观了四面佛，虽然著名，但地方很小。人们都说四面佛灵验，有求必应；我是个从不相信任何宗教的人，可能是这五个多月来受到 了太多苦难和折磨的缘故，竟也不自觉地买了香烛，在佛前拜了几拜，祈求他保佑我平安到达加拿大。现在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我都再也不希望有任何事，让他保佑我快一点到加拿大吧，那应该是个安全的地方。我需要休养和恢复，然后必须马上学习英语，尽快找到工作。我要努力去工作，好好地存一笔钱后早一点退 休，然后就可以安心地写书，把我的经历告诉人们。我还必须要学会做饭，学会料理自己的生活。我的后半生是不会再有女人的了。我已经是个无用的人，而且更是个肮脏的人，为什么还要拖累别人？

因 为遇到这个眼睛像阿莲的女人，在泰国的二十天也不能说是全浪费了。她没有嘲笑我，更没有看不起我，而是尽力地帮助我，给我同情和安慰，这样的好人能遇上一 个，就是福气；加上阿莲，我竟在五个多月里遇到了两个好女人，应该知足，这样的运气就算这辈子都不再有了，我也无怨。好人应该有好结果，我怎么会忘了？应 该帮助这个女人赎身的，我怎么会没想到？张先 生说过，买一个女人的价钱通常都是在五、六千到一万块泰币之间，那也就是说最多三百美元就够了，应该把她买出来，从此不再受客人的欺凌和老板的打骂，找个 男人成家过日子去。我算了算口袋里的钱，尽管我不知道下面的路途还要多少天或还会遇到什么，但两三百块美元应是拿得出来的。

在天亮时，张先 生醒了，我马上就对他提起这件事。他对我翻了翻眼睛，问我是不是疯了，并马上表示他不同意我这么做。我对他讲起我第一次看到这女人是如何被老板揪着头发用 拳头打的情景。他认为这是这个行业的规矩，不值得大惊小怪。我没再多说什么，但我会说服他的。清晨，我们走出了泰国的海关，一点麻烦也没有。跨过了一座 桥，就进入了一间又脏又破旧的小房间。张先生告诉我那就是寮国的海关时，我简直不敢相信。

张先生向几个穿着破旧制服的关员们递上护照，果然他们连看也不看一眼，就在护照上盖了章。走出这间破屋子就是一条又窄又脏的街道，街道对面是一面至少有两米高、一米 五米宽的砖砌墙，墙上是一个巨大的人头像。不用说，这个人一定是这个国家的伟大领袖了。他也像所有共产国家的领导一样，强迫人民每天看着他，并时时地想 着。正也就是因为他，这个国家才会变得这么穷。看着这颗人头，我竟想起在湄公河上的那三场枪战里，那颗仅差十几公分险些打在我头上的子弹。

街上停着不少的人力车，还有两部五十年代的美国汽车也停在那里，已经破旧得不像个样子。张先生拉我坐进了其中的一部车，笑着对我说：「想不到吧？一会儿我们到了这个国家最好的国际旅店时，我会托着你的下巴，免得你吃惊得张大嘴，下巴会掉下来。」

这 一路看到的是除了脏乱以外就是旧陋了，十字路口竟然连个交通信号灯也没有，而警察们竟都躲在角落的树荫下乘凉。汽车开上一条稍微宽一点的路上，两边低矮破 旧的平房可看得更清楚，街央有一个圆形大花坛，花坛中心又是这个人的巨大人头像，难怪花坛里的花草都是枯死的。汽车绕过花坛，停在花坛北面一条街上的一座 两层破旧小楼房的门前。下了车后，张先生就笑着把手放在了我的下巴上，我知道这座楼一定就是那个国际饭店了。在一个漆成黑色的柜台前，张先生又向一位领带系歪了的人递上证件，这个人一声不响把我们带上了二楼，里面总共五个房间，四个房间空着，门都是开着的。

张先生挑了一间和我走进去，里面只有一张床，我要他再开一个房间，他笑着对我说：「我们晚上不在这里睡，我带你去个好地方玩一夜。」一个侍者推门进来，手里的托盘放着两瓶泰国矿泉水，放下矿泉水后就向我伸出手，张先生马上过来在他手上放一枚硬币，他才一声不响地出去。张先 生要我和他一块儿躺下睡觉，养足精神今天晚上才可以大玩一场，又说睡醒后，在那个大花坛的南边，就是这个国家唯一一家不错的饭馆，下午我们就到那里去吃 饭。他说，这里是共产党国家，所以才「死要面子」，娼妓业不可以公开。其实他知道有几处地方，那里的东西比泰国的还要刺激得多。我没有睡觉，洗了个澡后便 一个人走到街上。这一带肯定是商业区了，但仍有不少的街道是土路，狭窄的街道两边便是一家一家的小商店，店面小得可怜，里面黑乎乎的，东倒西歪的货架上根本看不到有什么商品，一个上午也不会超过十个顾客的。

快 到中午时，我饿了，比较几家饭馆的菜色后，决定在一家菜单上有五道菜的饭馆里去吃，我指着菜单上第一和第二两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菜后不到十秒钟，侍者便端 上来两碗菜放在我面前，是凉的。我由于饿了，所以倒也不在乎烹调

的技艺了，很快地吃完。付账时，还引起了一点小风波来。我因为没有这个国家的钱，又不知道 该付多少钱，于是拿出美元、泰币和港币放在了桌子上，请他们挑选。他们不要美元和港币，先是拿走一百元的泰币，过一会儿抱着柜台上的钱盒又回来把那张泰币 钞票退给我，从我手里拿走一张五十元泰币，然后把钱盒子里的钱一张一张给了我；他们看着我，又看看钱盒子，里面还有几张钞票，于是又从我手里拿走几个泰国硬币，把盒子里那几张钞票又给了我。

这时，他们满意地对我露出笑容，这还是我从进入这个国家以来，第一次看到笑脸。走出饭馆，我数着他们找给我的钱，竟然是两千块寮国钱；怎么也算不出这顿饭我花了多少钱。晚饭时，我和张先 生去了那家最好的饭店：一家西式的饭馆，里面有六张餐桌，我们坐下后，还有四张桌子是空的。我们每人点了一份汤和两道菜，一道是猪扒，一道是烤鱼，这就是 这个饭馆全部的供应了。不得不承认的是味道确实好，但在最后看账单时，我吓得几呼叫出声：总共是两万六千多块钱，我的下巴是真的差一点没有掉下来。

张先 生付了账，走出来后，才笑着对我说：「你算吧，一百美元兑换三千六百泰币，而一百元泰币又兑换四千元寮国币；饭钱把你吓坏了，其实才不过十几块美元。」我 把我在吃中午饭时遇到的事讲给他听，又拿出他们找回来的钱让他看。他对我说：「这个国家唯一有来往的国家就是泰国，所以这里的人只认识泰国钱，也喜欢泰 币，不要看一顿饭花掉我们两万六千多块钱，你手里的这两千块钱是足够我在这里『玩』上几天的了。」

我把这钱塞在了他手里，我用不着，明天一早就要飞走了。我们沿着大花坛的这条街向南走不远，就看到树影下出现女人的身影。张先生高兴地走过去和这些女人们交谈着，我则站在街道中心等着他。这个时候根本看不到一辆机动车，也没有自行车，只是偶尔几个行人匆匆走过。一个大约十岁的男孩子走到我的面前，对我急急地说着什么，我听不懂，于是把张先生叫了过来。张先 生和这个孩子交谈了几句后，显得很是兴奋，一边让我跟着他们走，一边继续和这个男孩子说着。走不很远，我们走进一条两边都是平房的小巷，大约又走进十几米 远后，我们随着这个男孩进了一户人家的小院子，又进到房子里，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坐下了。男孩子跑了出去，屋里只剩我们两个人。

我 问他为什么我们要到这儿来，那个男孩子又是什么人。他兴奋又神秘地告诉我，那个男孩子是个拉皮条的，这个小巷里几乎每一家的女人马上都会到这所房子里来， 她们将脱光衣服陪我们喝酒。这些女人不但服从，而且保证会让我们满意，现在这个孩子男孩子就是去通知各家女人了。听他这样一说，我倒并不吃惊，但是我对他 说：「男女间的事一对一我是没问题的，这种一群裸体女人陪

我们喝酒的玩法，我感到太过份，恐怕我不能接受的……」不等我说完，他就打断了我说：「你有点同 情心好不好？人民穷，女人们才想出这办法来，无论多少每个女人挣点钱。那个男孩子已经去告诉各家女人，说我们是从泰国来的两个人。他们都想从我们身上赚 钱，你如果感到心里不适意的话，我们就再多给他们一些钱，但可不准走。这里的人们那么穷，正巴不得从两个外国人身上挣几个钱呢。」

我问张先 生，我们每个人都付给每个女人多少钱。他见我这么问，知道我不走了，马上高兴地告诉我：「一般来讲，像我们两个人一共付给他们一百元泰币，然后再加上十元 或二十元泰币的小费，她们就会很高兴了。既然你有同情心能留下，我们给她们两百元泰币，然后再把你刚给我的两千寮国币给她们做小费，她们会极高兴的。你看 好不好？」我点了点头。我们正说着话，一个女人轻轻地走了进来，很客气地对我们在说着什么。这个女人，瘦瘦小小的样子，三十多岁了，看样子一点儿不像是个 卖身的女人，说话声音很轻，脸上红红的，显得很不好意思的样子。

张先 生把她的话翻译给我听，大意是：「这里的人们穷，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我们，都是女人们从各自的家里带来不同的食物放在一起，希望我们不要见笑，多喝几 杯酒。酒都是各家自己酿造，还是不错的。女人们都不是干这种事的，照顾不到的地方要我们多原谅。有一点让我们放心，这些女人们通常一年也不过做上一次两 次。」说完，她便引导着我们向后面房间走去。这女人推开一扇破旧木板门，里面有五个裸体女人站在一张长方形桌子四周，每个女人的脸上都带着不好意思的微 笑，没有人说话。桌子上摆放着不少的盘碗，里面都是些青菜水果之类的东西。带我们进来的女人让我和张先生分别坐在桌子两端，女人们也坐下，并给我们倒上酒。我尝了一口，味道很好，只可惜浓度淡了一点。屋里人不少，但却显得冷清。

张先生喝了一口酒，然后马上开始显示出他的本领来了。他开始说笑着，一会儿去摸这个女人的乳房，一会儿又去摸那个女人的屁股，然后又高声地笑着。他要那个带我们进来的女人也把衣服脱光，当那女人背过身去脱衣服时，他又在那女人的屁股上拧了一把。张先生不愧是个老手，他痛快地玩闹、说笑着，同时也把屋子里的气氛带动了起来。他高声地对我说：「别坐在那儿光是喝酒，像我一样去摸她们，别让她们认为你不喜欢她们，你把你身边的那两个照顾好，这四个归我。」

这 时，我才开始注意这两个女人。她们都大约三十到四十岁的年龄，脸上都是红红的不好意思地低着头坐在那里。我每喝一口酒，一个女人就马上给我倒满，

我拿起一 支烟，一个女人马上为我点燃，然后用两只胳膊去遮挡她的乳房。我伸出手去摸两个女人的后背，但却感觉不到任何的肉感，完全是皮包着骨头。可怜的女人为了生 活而来做这种营生，她们都有家、有丈夫孩子，只是为了生活艰难，或许是为了帮助丈夫自愿来的，也许是被丈夫逼着来的。张先生说给她们两百泰币和那两千寮国币，听起来六个女人共挣了一万块，但也不过仅折合七块二美元。

这时张先生那边的气氛更热闹了，他正在把两个女人的乳头分别浸在酒杯里，然后又去吸吮她们的乳头，我这边的两个女人仍低头坐着。或许张先 生刚才的话是对的，女人，总还是要男人去喜欢的。我伸手从她们的胳膊下去摸她们的乳房，果然两个女人抬起了头对我笑了一下，一个为我倒酒，另一个不知把什 么又辣又酸的东西放进了我的嘴里。两个人开始说话了。无法沟通是个大问题，我最多就是对她们笑笑，除了不时地用手去摸她们以外，我就不知道还应该做什么 了。酒的味道很好，我喝很多。其实我一点儿酒意也没有，但我开始做出喝多了的样子。我实在不太喜欢这种场合，决定离开；我走开，张先生可能会玩得更痛快些的。

我装着摇晃的样子站了起来，又从钱夹中拿出两百泰币放在桌子上，请张先生把我的话翻译给女人们听，说我喝醉了，今晚很愉快，但我必须回去睡觉了，今晚的费用由我出了。张先生没骗我，两百泰币使女人们顿时高兴了起来，女人们都说起话来。张先生告诉我，女人们说已经准备下房间了，也可以让两三个女人陪我去睡。我笑着摇摇头，做出醉态走了出来。

走 出房子后，也不过二十几步远，就来到街上。那个带我们来这里的男孩子正坐在树荫下，见到我就跑了上来，拉着我说着什么。我掏出一个硬币给他，便快步地向了 旅店方向走去。大概走出一百米左右，一个女孩子从树荫里出来拉住我的手，没容我说话，就把我那只被她拉着的手放在她的乳房上，又急急地对我说着什么。我对 她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硬币给她，便走开了。刚走出不远，又是一个女人挡住我，向我掀起她的衬衫，展现着一对乳房。我站住了，仔细地看了看那个乳房， 对她笑着伸出大拇指，然后也给了她一个硬币。

再 走出大约不到一百米，一个小女孩向我掀起她的衣衫，展现出的却是一对尚未发育的乳房，我又给她一个硬币后，便走上街道的中央。总共与大约不到十个躲在树影 下的女人招手微笑后，我终于走到大花坛。那位伟大领袖依然被挂在墙上，他大睁着两眼，想必也看到了我刚刚经历的这些；他仍旧认为他是伟大的，而且也会下令 给什么人去编出一个歌，把他的共产党形容得「像妈妈一样」，

正在领导着全国的女人们卖淫过活。看看四周没人，我在这张肖像前吐出一口浓浓的痰沫。

绕过花坛走上旅馆所在的那条街，又见四、五个打扮入时的女人站在树影下，旅馆门口外立着一块黑板，两个侍者站在黑板边上。黑板上写的字我不认识，但「一百块钱」那一部分我还是能看明白的。

旅 店一楼正在开舞会，那几个女人一定是舞女了。一位女侍者向我指指旅店里的舞会，又指指那几个女人，又对我笑了一笑，我也笑着对她摇摇头便进了门。里面有二 十几个人在跳舞，另有三、四个人在敲打着乐器。我上了楼，回到房间洗了澡后，便准备睡觉，但马上发现楼下的喧闹声使我无法入睡。看了看墙上的钟，还不到九 点，我只好穿上衣服又下楼来，找个地方坐下，准备听听音乐；但仅几分钟，我就站起来走出旅店。我这个人既不保守也不固执，但对于音乐上的选择是比较严格。 对于东西方的古典音乐我能全盘接受，但对于民族音乐，我只能有选择地接受，除此之外我统统以嚎叫、呻吟或者尖叫来称呼那些所谓音乐。

我 们吃饭的那家饭馆已经关门了。我坐在饭馆外面的台阶上，从这里可以看到旅店里的舞会，只要它一结束，我可以马上回去睡觉。周围静静的，暗暗的。我抽着烟无 聊地坐在那里，忽然听到了脚步声。饭馆旁边的一条黑黑的小巷里走出一个女人，她来到我面前对我说话，我打着手势告诉她我听不懂。她明白了，但仍不走，还在 向我打着手势，并低声地说着。我实在不明白，掏出烟让她抽，她摇着手。我掏出一个硬币给她，她接受了，但仍不走，还在说着、比划着。我又给她一个硬币，她 又接受了，这回她用手拉着我的手让我站起来，然后拉着我走进小巷。小巷里很黑，我跟她走了几步便站住了。

她又拉我并用手指着小巷的深处，我对她摇头又摇手，正要退出来，这女人马上对我掀起了上衣露出乳房。这回我明白了，转身走回饭馆又坐在台阶上。这女人也走出来，并紧靠着我坐下。我没有理她，她也不说话了。

在 我点烟时，借着火光看了一眼这女人的脸，估计她应该有三、四十岁的年龄，而且是个不难看的女人。尽管我现在闲得无聊，但我是绝不想再在任何女人面前去显示 我的无能了，就让它成为我一个人的秘密吧。我马上就要到加拿大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我会很忙、很愉快，就会把女人忘记了吧。

我 正想着，感觉到这个女人把手放到了我的背上，并轻轻地移动着。我既没有动，也没去阻止她，我反正没事可做，倒想知道她还要做什么。在抽完一支烟后，那只手 消失了，她正用双手捂着脸在哭。这正是我最怕的事。我后悔了，应该早甩下她就对了。现在的情形，她下不了台，我也下不了台了。我用胳膊碰了她几下，她抬起 眼睛看着我。我用手比划着，想告诉她我只是头疼，天气热得不好受。不知道她是怎么理解的，她把我的一只手放在她的乳房上。我没有急于收回我的手，而是摸 着、摆弄着。她又对我说话，想告诉我什么。

这 时，旅店的舞会结束了，我从钱夹抽出了一张二十元的泰币放在她的手里，便站了起来。她也站起来，又拉我走进小巷，几步后我站住了，她看着我用手做出了性交 的手势。我摇摇头要走，她又拉着我，我又掏出了钱夹，问她还想要多少。她摇手，把我那只拿着钱夹的手放进我的口袋，然后似乎犹豫了一下，低下头去迅速地脱 下裤子，又转过身去并弯下腰。我马上就明白了，她可能急需钱，但我给了二十泰币后，她又不愿意白要我的钱；既然我不想跟她去她要带我去的地方，所以她要在 这里给我一点回报。我有些感动了，这又是一个好女人。她还正背对着我，弯着腰，两只手抓着已经褪到膝盖上的裤子，正等着我的反应呢。我用双手抱了一下她，又在她的头上亲了一下，然后用英语对她说了两遍：「谢谢妳，再见！」便转身向旅馆大步走去。

那 晚我睡得不好，一直做梦。我梦见一个巨大而豪华的宫殿，突然有一辆装满垃圾的卡车开进来，在宫殿里到处乱跑，又把垃圾倾倒在华贵的大理石的地面上。我正要 上前去阻止，又有许多卡车开进来，穿着华丽衣服的人们喊叫奔跑着；这些卡车撞断了巨大的柱子，又撞倒墙和那些华丽的巨大的门窗，到处都是垃圾瓦砾。宫殿开 始倒塌，巨大的石块和木头夹杂着灰土落到地上。我拼命地跑着，跳过了一堆堆的碎土，躲过一块正在落下来的巨石，但却找不到逃出去的路。宫殿倒塌了，我浑身 尘土地趴在一堆废墟上，四周一片荒凉，无数裸露着身体的女人正在这堆废墟中蠕动着，到处是鲜血和哀叫声。

一只手从废墟里伸了出来，我抓住了那只手拼命拉着，当拉出了这个布满伤痕和鲜血的躯体后，突然发现她是阿莲。她微笑着对我说：「你不要管，这都是我们女人该受的罪。」

我伤心、愤怒，想大声喊叫，但却发不出声音。然后，我惊醒了，窗外的太阳已经很高，浴室里传出哗哗的水声，我仍旧躺在床上。张先生淋浴完出来了，看得

出来，这一夜他是玩痛快了，对我又说又笑，还把我挖苦了一顿，然后催我起床，我们要去赶飞机。

飞机场里只有一条跑道，跑道两边杂草丛生，堆满垃圾。一架泰国航空的七三七客机停在跑道上。张先生告诉我，从泰国飞寮国只有这一个航班，一个星期飞来一次，停留半个多小时后就飞回去了。说着带着我进了机场的大厅，我简直不能相信这几间破旧肮脏的房子就是候机厅。张先生在办理出关登机的手续，我在旁边的一个满是尘土的小柜台前等着什么人出现。想买一盒烟；张先生把我拉了过去，告诉我这个国家免税店里的东西比不免税还要贵，让我到泰国机场去买。

坐在飞机上，张先 生打算睡觉，我却没让他睡。我对他讲起阿莲的事，从阿莲我又说到那个眼睛像阿莲的妓女。于是他明白了我为什么在旅店打人，和两次去找同一个妓女的原因。我 向他讲述了这个妓女如何被那个广东人裸体拉到房间外，又是如何被老板揪着头发用拳头打，所以我求他今晚去那家旅店，把那个女人买出来。他不高兴了，对我 说：「你说的这些完全不成为理由，客人投诉，老板打她，那是规矩，要她以后好好对客人服务。你喜欢她，是因为她的眼睛像阿莲；其它的客人也会喜欢她，因为 她的眼睛鼻子或者嘴长得像什么人。你把这个女人买出来了，其它客人岂不是要失望？再说，如果你定居在泰国，买个女人伺候你，这无可非议。你不在这里，可又 要把她买出来，你知道多少人会因为你而失去一个享受，懂不懂？」

他 是不会帮我做这件事的。和他相处了十多天，我始终认为他是个好人，为人真诚热情而且直爽。他把我当朋友，把身世家事都告诉我，又在我生病的时候尽力地照顾 我。对于这些，我很感激他，尽管他干着不公不法的生意，但我无法去指责他；若没有他们这些人做这种生意的话，像我这样的人岂不是都要被共产党斩尽杀绝？至 于他的女人喜好，确实是过份，我也为他那位十七岁的太太抱不平；但他太太对他却是充满着一片感激和报恩之情。他生长在并生活在这个被称做是「男人天堂」的 国度里，我又能说什么？

但 是那天下午我们去参观四面佛时，我发现他在拜佛时是非常虔诚的。我已经想好一个理由去说服他。我叹了口气，对他说：「你说的这些都对，但我也没办法了。你 是知道的，在我遇到你之前，在路上经历了多少的苦难！两次差点送了命。我再也受不住任何事了。所以在佛前我许了愿，要破些钱财，把一个女人从火坑里救出 来；请四面佛保佑我一路平安，不要再有事。所以不管你怎么说，这件事你还是要帮我办的，否则你我都会在佛前获罪不小。」他翻着眼睛看着我。

我掏出钱夹，问他买那个女人大约要多少钱。他半天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才不情不愿地说：「在佛前你许什么愿不好，非许下这么个愿……，好吧，今天晚上我去把她买出来，明天还得带她去佛前拜谢的。你给我找了多大的麻烦！今晚把她带出来，让她住哪儿呀？」

说 着他拿过去我的钱夹，把里面的泰币和港币都拿出来数着，最后把几百块港币放回钱夹，对我说：「五千块钱，是可以把她买出来的，但是这种事讨价还价的很是麻 烦，我给他六千块，就不用和那个老板多废话，我省点事，他也高兴，你同意不？」我马上双手合什地向他行礼，然后又把那几百元的港币也放在他的手里，请他替 我为他的太太和儿子都买件礼物。他马上高兴了，收起港币，又从手里的泰币中拿出两张钞票给我，让我一会儿在机场买一条烟带在路上抽。我又谢了他，心里马上 舒服了许多。六千块泰币听起来吓人，其实不过一百六、七十美元，我到了加拿大后马上去工作，这点钱实在不算什么。但盼阿莲知道后会高兴，那女人也会高兴， 我也高兴了。

第四十五章 我平生第一次感谢起共产党来

在曼谷机场里，张先生一眼就看到了那位被阿仁派来护送我的阿亮。他们是认识的。这位阿亮先生看上去年龄与我相仿，西装笔挺，戴着眼镜，人很有精神，但不会讲普通话。他很客气地与我握手问候，然后又指着一个在远处免税店橱窗外站着的孩子的背影，告诉我那是阿才，将和我一路同行。张先生马上问：「那个阿才是怎么回事？你应该在三天前送他出关，让他一个人上飞机走，今天你是要来专门送这个人，阿仁是这么告诉我的。你这么做，阿仁知道不？」阿亮马上用广东话对张先生说着，我能听懂的就是这个阿才也是要去加拿大，听说阿亮要护送我去，所以求阿亮把他也带着，走我的这条路一同去，并愿意多付钱。

他们仍用广东话说着，那个叫阿才的孩子走了过来，走到我面前时我才看清楚，这是个三十岁上下的成年人，他也马上加入了这场广东话的交谈。我实在听不太懂广东话，所以去免税店买了一条烟，找回了几个硬币，又买了杯咖啡，坐在那里喝着等他们。一会儿张先生走过来，告诉我该上飞机了。我们握着手，又互相在对方的肩上拍了拍。我请他多保重，他祝我一路平安，我们都有些依依不舍。

阿 亮在香港阿仁开办的那个旅游公司工作，据说英语很好，国际旅行方面很有经验，所以阿仁才派他专程护送我。这位阿才，据他自己讲是广州人，在广州做生意赚了 些钱，要去加拿大投资。这两个人都讲广东话，一路上大声地交谈着，我便以看报和看电视来打发时间。当飞机到达马来西亚时，天已经黑了。阿亮告诉我，我们要 等大约一小时，然后再乘飞机到比利时。飞机上会提供的食物很少，我告诉阿亮我要去餐厅吃些东西，留下他们两个人继续说话。机场餐厅很大，里面的人也不少。 吃着东西时，我看到一个向导带着一群二十几个年轻人进了餐厅，这些人马上就分坐在我四周的桌子边上。他们都讲中国话，那个三十多岁的向导就坐在我旁边，向 这群人讲着，他们过一会儿也要上飞机，明天上午就到比利时。原来他们也和我同路到比利时。

向 导说完，转向我问：「你是中国人？到哪儿去？」我回答后，他马上自我介绍说，他在国家旅游局工作，正在组织这批人到欧洲几个国家观光旅行。我没有等他再 问，便站起来出去了。国家旅游局是大陆的官方机构，我最好还是不要与他们多说话。这批年轻人能花这么多的钱去欧洲旅游，想必也都是有背景的。大陆社会畸形 发展，官商勾结，贪污腐败，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突然暴富，花钱供子女们去欧洲？我更不想和这些年轻人说话了。在登机时，这群人和我们上了同一架飞 机，幸运的是座位相隔比较远，我放心了。

阿 亮告诉我，我们要飞行大约八、九个小时，在飞机第二次降落时，就是比利时。我们在比利时最多待一到两天，再上飞机就直达加拿大。算了算，我从广州动身到现 在已一个多月，尽管仍在路途上，但到底总算有了到加拿大的日期了。别人坐飞机二十个小时就飞到加拿大，可我呢……？我逃出来，没有护照，还不知加拿大会不 会接受我；既不是旅游观光，又没有钱去投资做生意，带着一身的伤和病去求人家让我留下，万一人家不接受，又怎么办？想到这里，我有点慌了，打断了他们的广 东话交谈。

他 们马上都笑了起来，阿亮问我知不知道有个「日内瓦协议」，我摇摇头。他对我讲解起来，最后两个人都肯定地对我表示，加拿大和美国一贯对受政治迫害的人给予 保护，只要我把实话说告诉海关的人，他们就一定会接受。我可能是想太多了，头又疼起来，吃了一粒古叔带给我的药，便慢慢地睡了。半夜里飞机降落了一次，醒 来看到他们两个人仍在交谈着。飞机起飞后，我又睡去。再醒来时，天已亮了。阿亮和阿才睡着。我拿出了字典翻看，查出几个单词后，拼出了一个句子去问空中小 姐，到比利时还有多远。这位小姐很和气地伸出三个手指头，告诉我大约三个小时，然后又说又比划地告诉我，当这架飞机再次起降后，便是比利时。我听得很明白 的是，在两个小时后飞机会降落在一个我没听懂的地方，然后再起飞。这是我第一次试着用英语与别人交谈，这位小姐听懂了我的

问题，我也大致明白她在告诉我的 是什么。我心里很高兴，同时又在想着明天，最迟后天，我就可以到加拿大，那时就自由了。

两 个小时不到，飞机降落。阿亮匆匆地带着我们下飞机，我向他解释我们还应该有一个多小时的飞行，但他不理我，只是催我们。下飞机前，我看到那二十多个中国人 仍在飞机里坐着，我怀疑我们是下错了地点。阿才对我说，阿亮是有经验的，我们只跟着他走不会错，不要胡思乱想。走进了机场大楼时，我看到了标志着这个城市 名字的一串英文字母，可怎么也拼不出比利时的声音来。我马上拿出字典，但阿才用手挡着字典，让我马上收起来。我没有听他的，打开字典查到这里是法兰克福， 西德的一个城市。这个时候，阿亮已经在向海关的关员递上了护照和飞机票，跟着我就听到一场英语和广东话的交谈，显然关员和阿亮之间无法沟通。于是关员叫我 们站在一边，让排在我们后边的人先进关。

阿才这时显得很慌乱，与阿亮在用广东话小声地说着什么。从阿亮的脸上看，他似乎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时我对他们说：「请你们停止用广东话交谈，用普通话和我说。」说着我把字典递给阿亮，并告诉他我已经问过空中小姐，我们还应该再多飞一个多小时才到比利时，现在我们在德国。听了我的话，阿亮也有些慌乱了。我又查出几个单词去服务台，结结巴巴地问那位小 姐，我们是不是下错了飞机。这位小姐马上从阿亮手里拿走飞机票看了一下，证实了我的怀疑。我们是在德国。我不懂德语，但我父亲懂，他曾常把在中国工作的德 国工程师和清华大学的德国留学生带到家里做客，他们讲话时就是这种声音。我把我问这位小姐的问题和已经证实了我们在德国的证据讲给阿亮听，他马上用手拍打 着自己的头说：「糟了！阿仁如果知道的话，非杀了我不可！」我对他说，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只要问一下这位小姐下一班飞比利时的班机是几点钟就可以了。

这时那位小姐放下电话，用英语对我说着什么，我向她摇了摇头，把阿亮推了上去。阿亮又一把拉着我和他一起走近柜台，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这位阿亮先生的英语实在也不比我强多少。他是在说着广东话时，中间夹杂进一两个英文单词的广东式发音，而那位小姐的话他基本上是没听懂的。我只好指指我的字典，又指着一张纸，用结结巴巴的英语问问题，请这位小姐把答案写下来。经过五、六分钟查字典后我终于明白，一个小时后有一班从这里飞比利时的班机，她让我们坐下休息，到时会有人把我们领上飞机。我去向那位小姐道谢，她很客气地对我笑了笑。

阿 亮放心了，开始不断地和我说话；阿才却是很慌乱的样子，坐在离我们远远的地方。我仍在查字典，想准备出一句话，在我们到了比利时后对出租司机讲。阿亮告诉 我，阿仁已经为我们在比利时订好旅店和房间。在我和阿亮讨论这家

旅店名的英文发音时，我们有一点小争执，于是一起去问过那位服务台的小姐，那位小姐认为我的发音至少可以让人能听懂，于是招来阿亮的一句:「北方人嘛!」

一 位身穿制服的高大男人，十分有礼貌地引导着我们走进机场，送我们上了一架小飞机。机上只有三、四十个座位。总共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机上仍有食品的服务，而 且食物相当精美。我们到了比利时已是上午十点多钟了，阿亮走在前面，我们顺利地进了关。司机并不太困难地听懂了我的话，把我们送到这家古雅的十九世纪风格 的旅店。由于我在飞机上做了准备，旅店方面马上就查到了阿仁的预订，然后我们被礼貌地引进房间。房间很大，既漂亮又舒适。我推开窗子向外面看，街道两边的 所有建筑物都洋溢着欧洲古典建筑艺术风格，门窗的式样、街道的样貌、连那路灯的样子，都与我看过的欧洲古典油画完全一模一样。我惊喜了，真没想到我会来到这里，会亲眼看到这些。

我 不能待在房间里。一个人走了出来，走在石块铺成的路上，欣赏着各式建筑物，惊叹着那一座座的青铜塑像，彷佛置身于画中。我激动得要哭出来，像发疯了似的走 着、看着，一心想要找到一个博物馆，一个油画展览，或一个音乐厅可以欣赏到一场古典音乐，一个剧场可以看到一场芭蕾舞或听到一场歌剧。但是，我什么也发现 不了。这是一个法语国家，我连英文都不懂，当然更不懂法语。即便我现在就站在一个剧场或者博物馆的门外，也是浑然不知。

傍 晚，筋疲力尽地回到旅馆，看到阿亮和阿才两个人都一脸的忧虑。没等我问，阿亮就告诉我，那架从马来西亚飞比利时的班机，在到达比利时机场后立即就被比利时 警方包围，从飞机上抓走二十多个从中国大陆来的偷渡者。听他这么一说，我也吓一跳，马上想到在马来西亚机场餐厅看到的那二十多个中国年轻人，和那个自称是 国家旅游局的向导。阿亮继续对我讲着，这个消息是他在给阿仁打电话时阿仁告诉他的。阿仁以为我们也被抓了，正急得发疯的时候接到阿亮的电话，向他报告我们 平安到达比利时。阿仁当时高兴得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并且对于阿亮带我们下错了飞机一事，一点也没有责备。

阿亮在告诉我这些时，不但不高兴，反而心事重重的样子。阿才也是一样，坐在那里一句话不说。我感到这里一定还有事，于是我提议大家一起出去喝杯酒，庆祝我们躲过了一个劫难。但两个人没有反应，我点上了一支烟，问阿亮是不是还有别的不好的消息。

阿 亮犹豫了一下，对我说：「你有没有想到，如果我们没下错飞机的话，我们也会被捕的。」我笑了。对他说：「我想是四面佛在保佑我，知道我受难太多，所以才让 我们下错飞机，躲过这一难的。」阿亮摇摇头说：「你还是不懂，如果我们三个人都被捕了，你不会有事的，而我们俩将会被判刑坐牢……」我打断他，说：「我也 是非法偷渡来这里的，我又怎么会没事？」他马上说：「这里已是民主国家，你到了安全的地方了。在这里你可以对警方讲实话，说出你的一切，这个国家不但会马 上保护你，而且也会接受你留在这里。如果你一定要去加拿大的话，他们会和加拿大政府联系，然后把你送过去。

听了他的话，我高兴了。原来我已经来到自由世界，再也不用怕被抓去受折磨，或让他们把我打死了。当我在泰国的时候，张先生不让我一个人出去，凡是出去都是坐他的汽车去。张先生告诉我几次了，说泰国虽然有民主也有自由，但由于贪污腐败和大陆中国对泰国的政治渗透活动，对我来讲并不是那么安全。在我生病时，他宁可请医生到家里给我治病，也不肯送我去医院。现在，就是现在起，我完全自由了，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不会有人因为思想和文章而入狱。

在 高兴之余，我多少有一点察觉阿才为什么那么紧张慌乱。他们既不愿意讲，我也不想去问。由于心里高兴，我又邀他们去喝酒。在我回旅店的路上，我发现了一家离 这里很近的酒吧，不但保留了上个世纪的风格，而且欧洲情调特别浓。正在这时，电话响了，阿亮跑过去接，又把电话给了我。是古叔打给我的。古叔在电话里的第 一句话就对我说：「你可真是多灾多难啊！」接下来，他提到他已知道比利时机场发生的事了，为此阿仁很是生阿亮的气，因为阿亮并没有告诉阿仁他把阿才带在身 边与我们同行。

关 于阿才这个人的情形，阿仁是知道的。阿仁认为阿亮一定是私下里收了阿才的钱才这样做。但由于比利时机场发生的事，事情在我们三个人当中，就变得格外复杂； 首先是阿亮吓坏了，坚决要求回香港，不再继续送我。阿亮对阿仁讲，让古叔说服我就在比利时向当地政府申请保护，让阿才自己走下边的路。古叔坚决不同意，已 经对阿仁说，如果阿亮不敢再送我，那么阿仁必须马上派其它人来比利时继续送我。古叔讲，阿亮害怕并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阿才，如果没有阿才这个人在一起， 阿亮不会害怕的，也不会拒绝把我送到目的地。

比 利时机场的事同样把阿才吓坏了，他已和阿仁通了话，无论再花多少钱，他也要和我一路同行，而且坚决要求有人护送。阿才为什么提出非要和我同行，古叔解释： 「我不知道这个人的事情，但我想他是要利用你。你不要答应他任何事，也不对他作任何许诺，更不要去管他的事。我会和阿仁谈好这一切的。现在事情变复杂，我 只要你记住一件事，现在你是自由人了，你可以随时去到任何

一个国家的政府向他们讲出实话，他们不但会马上保护你，而且也会接受你留下。无论阿亮或者那个阿 才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去管他们，他们的事也影响不到你。你对政府实话实说，就不会有任何麻烦的。」听到这些， 我的头又疼了起来。我向古叔保证会听他的话。电话挂断后，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也感觉到我确实是多灾多难。阿亮对我做了个手势，我跟他来到了旅店门外。他 说想请我喝杯酒，我知道他是想和我单独谈谈。我们去了我发现的那个酒吧，一路上他心事重重，一句话也不讲。来到酒吧后，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他开始说 话。

他 问我，在广州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大街上到处都贴着的一张通缉令。我告诉他那段时间我不可以上街，所以不知道。他沉默了一下后才告诉我，这个阿才就是那份 通缉令中八个人之一。他和几个人勾结一起，合伙骗了政府的一笔巨额的工程款，由于数额特别巨大，警方对他紧追不放；如果不逃出来的话，一旦被抓住一定是会 被枪毙的。阿才这个人看起来像个孩子那么小，其实已三十多岁了，有老婆也有孩子。两三年前，不知他是怎么搞的，竟把老婆孩子弄到加拿大温哥华去，这次出了 事，阿才是带着那笔钱跑的。至于他是怎么到曼谷的，阿亮就不知道了。阿仁这次给阿亮的任务，就是到曼谷从张先生那座小楼房里接出阿才，然后想办法把阿才从曼谷机场送出关，让他一个人上飞机走。然后他把我护送走，工作就完成了。

当 他到了曼谷后看到了阿才那个装满脏钱的大提包后，他马上拒绝送阿才出关。几经商量后，阿才才同意把提包暂寄在一个朋友家，于是阿亮才同意送他出去。阿亮无 意中说漏嘴，提到要送我这么一个人去加拿大，阿才马上求他同意和我一起走，于是又请他吃饭、嫖妓。阿亮当然没说阿才私下给了他多少钱，他也没有告诉阿仁， 私自决定带阿才与我同行。今天比利时机场上的事，确实把他吓坏了。他对我说：「如果我仅是送你，今天的事对我们也不会有大麻烦。阿仁告诉了我一点关于你的 事，无论哪个国家只要接受你，也就不会给我麻烦。但现在不同，有这个阿才在这里，一旦出了事，天晓得他会向警方胡说八道什么。他是绝对不会说实话的，他也 不会说是去加拿大与老婆孩子团聚。国际社会都知道，加拿大政府在亲属团圆上的政策一向十分优先，交出大笔的费用偷渡去与妻儿团圆，这本身就暴露他在大陆是 犯罪而逃避制裁的。如果警方严加盘问，这个人很可能会为了保护自己，把我说成是人口走私集团骗他去加拿大做工，我又逼他还钱，这样一来我是一定要吃一场大 官司，而且还会坐牢的。」

说 到这里，他紧张起来，一口喝光了杯子里的酒，又对我说：「我已经对阿仁讲了，让你在这里向比利时政府提出政治保护的要求，他们一定会接受你，如果你想去加 拿大，他们会安排的你去。至于阿才，让他自己走下面的路，我回香港，这样对你对我都有好处。阿才还在发愁一旦他到了加拿大后，用什么理由请求政府接受他， 所以他想花钱买你的全部的事情，想要你帮助他编造理由，你最好离开他。」听他讲完这些，证实我对阿才这个人的判断，同时我也更加看不

起阿亮这个人；拿了阿 才的脏钱贪图小惠的时候什么也不怕，对后果想都不想，一路上他和阿才不断说笑，亲热得好像父子，可当听说发生了事，就算事情并没发生到自己头上，马上就吓成这个样子，什么坏处都想起来，分析地有条有理。他一路上对我不理不睬的，现在又关心起我来，都是为了他自己脱身找借口。

我 有些生气，但看看他的样子，又可怜起他来了。他不像我，我什么都没有，能逃出来就还有条命，逃不出来就连命也没有。他这个年龄，一定有家、有老婆孩子。听 他说话，他也有头脑，不怕找不到其它的工作，跟着阿仁干这种事也不就是为了挣钱多一些，养家而已。谁愿意为了这点钱去坐牢？挣得再多坐牢也是不值得的。他 已经把话说清楚，也说完了，看来他在等我的回答。

我 对他说，我不打算在这里申请保护，原因很简单，这是法语国家。法语我是一窍不通，英语我有点基础，下些功夫会很快掌握，所以我还是要到加拿大去。至于阿 才，请他不要为我担心；阿才再精明，想钻我的空子，或是利用我，也是不可能的，我也不会去碰他的脏钱。他现在理亏心虚，言不顺名不正，我也不怕他。如果他 动手，那他就是在找死。关于阿亮本人，我劝告他：「给阿仁打电话，把你刚才对我谈的这些想法告诉他。阿仁是个精明的人，他会为你设身处地的想办法的，如果 你进了监狱，他也怕你供出他，他也就会有大麻烦的。」阿亮抬头看我，对我说他已经告诉阿仁了，阿仁明天会给他来电话的，又要我不要把他对我说的话告诉阿 才，我笑了一下。当我们回到旅店时，阿才正在打电话，见我们回来马上就把电话挂上。他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刚才那种紧张和慌乱的样子不见了，又主动让我 烟，并和我说话。阿亮问他给在谁打电话，他笑着对阿亮说：「明天我会告诉你的。」我的头又疼了。

第 二天很早，我一个人又来到街上。我要尽量多走走看看、多感受一些这里的艺术气氛。十月下旬的欧洲已经冷了起来，我却还连件外衣也没有，一早出来只穿着件衬 衫，确实冷得我打战，但心情却好得不得了。我自由了，又置身于这一幅幅美妙的油画中，这些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我仍没能够发现一处绘画展览，但已是身在 画中了，于是尽情地欣赏着这里的建筑艺术，同时赞美那些精妙绝伦的雕塑艺术，还不时地与过往的行人打着招呼，问候早安。我平生第一次感谢起共产党来，想想 若不是他们，我又怎能亲身来到这里，亲眼看到这些。接近中午时分，商店都开门了。我鼓起勇气走进一家服装店，用极糟糕的英语请求一位上了年纪的秃头男人帮 我挑选一件西装上衣，他很是殷勤地为我挑选了几件外衣，但我只要了那件最便宜的。我又走进一家小饭馆，吃了一份意大利面。在开始下午的观光之前，必须先回 旅店向阿亮问清楚我们是今天还是明天飞加拿大。

见 到他们两个人后，我就感觉一定又有什么事发生了。阿亮仍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而阿才却是兴高采烈，看到我马上就说，阿仁中午来了电话，同意了他的请求。 我问他向阿仁请求了什么。他马上说：「就是让阿亮把咱们两个人送到加拿大，这一两天，阿仁会派人去曼谷，把我的提包直接送到温哥华我老婆那里。」我也是有 意的问他：「提包？什么提包，你为什么不自己随身带来？」他得意忘形了，张嘴就说出了：「就是那笔钱，我是为了这笔钱才跑出来的。」

我 又盯着他问：「你的意思是说那笔钱是你抢来的，或者是骗来的？你的样子可不像是个政府公务人员，所以不是贪污的，对吗？」他愣了一下，说：「那是我的 钱，……不要提它了，阿仁在电话里说，比利时机场刚发生了那件事，让咱们三个人今天或者明天去卢森堡住几天避一避，他会重新安排。」

第四十六章 脏钱可以在文明国家买个公民身份

听 阿才说完，我看着阿亮。阿亮向我点了点头，我有些不高兴，问：「我们去卢森堡不也一样要经过比利时的海关吗？」阿亮说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进出是不查护照的， 我们坐火车去，他们只检查火车票，不查任何证件。我又说：「阿仁重新做安排又不知道要等多少天，我已经在路上走了一个半月，实在是筋疲力尽，希望尽快到加 拿大安定下来。阿仁这样做，等于是一点儿也没考虑到我，完全是只照顾到阿才的要求了。」接着我转向阿才问他：「你向阿仁提出这个要求，他一定没少找你要钱 吧？」阿才笑着回答：「我是向他付出了一大笔钱，但这是为了你和我的安全。而且阿仁还要我从今天下午开始，负担咱们三个人一切的开支费用，所以钱你不用担心。」

听 了他的话，我开始冒火，对他说：「我的安全不用你操心，无论你付出了多少钱，那是为了你自己；我现在就可以向比利时政府提出保护的要求，并请求他们把我送 到加拿大去。」我刚说完，他们两个人马上都站了起来，向我又摇头又摆手的；阿亮急急忙忙的对我说：「你千万不要这么做，阿仁坚持要我把你们俩送到加拿大。 有你在，出了事我还有个借口，他们接受了你，就不会给我太

大的麻烦；没有你，万一出了事，你想想我有老婆和两个孩子，我这个家就毁了。就算是我求你，可千 万不要这么做，你有什么要求对我说，我会告诉阿仁的，你的那位古叔也坚持要我送你的」。

我还没顾上说话，阿才又接上来说：「只要你不在当地要求保护，你想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我问他：「你要阿亮送你到加拿大，阿仁已经同意了，你的目的达到了，我又为什么要向你要钱？」他没有马上回答我，而且摆出了一副至少我认为是下流的样子， 拿出谈生意的神情对我说：「你也该想想，我听说你在加拿大根本没有亲友，你又没有钱，也不会英语，一个人在异国他乡你可怎么办？阿亮对我讲你是因为政治原 因才逃的，我想请你把你的事情全部经过讲给我听，我愿意出一千美元买你的故事，然后我还要请你帮我一个忙，我还可以再付你三千美元，这样你到加拿大后不会 是两手空空，同时也帮了我一个忙。你考虑一下，钱多钱少都可以商量的。」

说 完之后，他似乎是很自信地在看着我，等待着我与他讨价还价。我连理也没理他，站起来向电话机走去。我要给古叔打电话。阿亮拦住了我说：「明天我们到了卢森 堡后，我会给阿仁打电话的，阿仁今天也说他会和古叔商量这件事。现在你最好为了明天买火车票和住旅馆准备几句英语。」我一句话也没说，转身走出旅店，一边 在街上走着一边恼火着，这个情形的突然出现也使我产生了一种被当做了人质的感觉。第二天的中午以前，我们就已经在卢森堡的一家里火车站很近的旅店里住下 了。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我再一次地又病了；仍然是头疼，心跳不规律和肝部疼，我加大剂量地吃着古叔托阿仁带给我的药，但不知为什么根本不管用。到了第二天，我就起不来了，浑身无力，吃不下东西，只能喝水。

这 两个人不但一点儿也没有帮忙，阿亮反而在接到阿仁的电话时告诉了阿仁我在生病。对于这两个人来说，我生病倒反而使他们放心，因为我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一个 人返回比利时向政府要求保护。所以他们仍是中午出去，晚上才回来。当晚古叔给我打来了电话，听着他那关切的问候，不知为什么我感到委屈，差点流出了眼泪。 古叔说当他知道阿仁为了贪阿才的钱而改变对我的安排时，他相当生气。

几个小时前，他才知道我又病了。他认为这样也好，正好利用这段等待的时间让我去治病，并说他马上用 DHL 的 快递服务再给我寄一千美元来。他要我忘掉行程，什么也不要想，马上让阿亮陪我去医院，他还说阿亮的英文是很好的。古叔再再地嘱咐我不要考虑钱，治病要紧。 并提到阿仁已经告诉阿才他必须负担我

们的一切开支，包括旅费、住宿费、吃喝等一切开支，所以要我不可在治病上省钱，一定要去医院。

挂 上电话后，这两个人刚好也回来。我要求阿亮陪我去医院。阿亮马上摇着手说：「你知道我的英语不行，怎么陪你去？」我说我已从字典里查到了有关我的病的症状 的几个单词，我会对医生说的，只是要你陪我一起去找到一家医院。他马上说他先出去找，等找好医院后再回来接我。不久后，他回来对我说他打听了几个人，由于 这个国家太小所以没有医院，只有医生办公室。但现在太晚了，所有的办公室都关门了，只好等明天。我已经病得没有精力去和这种人生气了。

隔 天一早，这两个人还在睡觉。我拿着字典一个人出了旅店，走到火车站前，要求一位出租车司机把我送到医院去。其实连五分钟都不到，车就到了一间医院的门口。 司机是个很好的人，看到我病得很厉害，扶着我下了车，又送我去了急诊室。医生很和气，他似乎并没有什么困难就听懂了我的叙述，于是马上做了检查。打了针 后，他让我躺在一间小屋里的床上，又打开了我的字典，指着一个英文单词让我看，我明白他是要留我在这里观察。这一整天里，这位医生检查了我三次，并且打了 三次针，还吃了几次药，直到晚上才让我走。临走前，他又对我说着什么，我请他写下他要对我说的话，告诉他字典会帮助我明白的，他笑了。

回到旅店后，那两个人都不在。我查着字典去翻译医生的字条。医生写了不少，但由于许多字可能都是医学专用名词，我的字典上找不到。他要我明天再去检查，并且每天去打两针，这点我是完全看懂了。这一天在医院花掉我六百多美元。我躺在床上，心里凄苦极了。

当 阿亮和阿才说说笑笑地回来后，没等他们对我说话，我就把他们狠狠地责备了一顿。我一点不客气地指出他们两个人处于不同的处境，都在心怀鬼胎，又一语道破他 们都在利用我，但又对我的病不闻不问，甚至撒谎说这个国家没有医院。我越说越有气，最后我站了起来，收拾东西准备当晚坐火车回比利时请求政治保护。

这 一下，两个人慌乱起来了，上来拉着我又向我道歉。我也是在气头上，一点不客气地把阿亮挖苦了一顿，说他根本没有国际旅行的常识，不懂装懂，又不会英文，而 且公然撒谎，连做一个人的起码的道德和良心都没有，更提不到职业道德。我对他说：「你这一路上的表现和你所做的所说的话，我会一件一件地告

诉阿仁。而且我 也会把这些都写出来向香港的报界投稿，我相信阿仁饶不了你，公众舆论也不会放过你们。」对阿才我则几乎是在痛骂他，我说：「你不要搞错，你我虽然同样是在 偷渡，但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你应该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不要以为你有钱就可以买到一切的，我就不相信你的脏钱可以在一个文明国家买个公民身份的。你不信的 话现在就和我一起到比利时警方投案去，你敢讲实话？我是反对共产党，但同时我也反对贪污犯，你和我不一样，我身上有的东西你是一点也没有的，而你身上的东 西走到哪儿也没有人欢迎的。」

说 到这里，又对他们两个人说：「我手里拿着这本字典，我可以走遍全西方，我不需要你们，也不让你们利用我，我有足够的能力自己到加拿大去的。」说完，我背着 旅行包要走。这两个人一起上来不让我走，一个抓住我的旅行包，一个把我推坐在沙发上。正在僵持着，电话铃响了。阿亮拿起电话听了一下，就一声不响地把电话 给了我。是古叔打来问候的我的病情的，我正一肚子的气还没发泄痛快，于是对着电话又把我刚才挖苦和痛责这两人的话大声地说了一遍。

古 叔的声音都变了，让我叫阿亮听电话。我把电话扔给了阿亮，对他说：「你自己去说！」阿亮在电话上足足有五、六分钟，我虽听不懂广东话，但也能知道古叔一定 给了阿亮一顿好听的。阿亮又是道歉又是保证地答应着。阿亮把电话又给了我。古叔说他马上去找阿仁质问，并说明天我就会收到钱，什么也不要想，治病第一，并 且要我不准采取任何行动自己去加拿大。挂上电话后，看得出来阿亮害怕了，头上的汗都冒了出来。我当然明白了，凭古叔在香港社会上的影响，如果想给阿仁或阿 亮找些麻烦的话，那是一点也不费事的。

阿 亮再次地向我道歉，公开承认了他根本就不会英文，只是为了这份工作，所以对阿仁说他会英文；又承认这是他第一次来欧洲，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以前只是来 往于香港和曼谷之间，再也没有到过其它任何地方。他请求我原谅他，并承认我说的话都对，接下来就又是许愿、又是保证的。我本来还想在道德问题上多说几句 的，可看到他那样子，又停住了。他和我年龄相仿，已是过了大半辈子了，现在再谈道德岂不是太晚？又想到事情已经如此了，我又在生病，无论如何总还是要和他 们一起再待上几天的，没必要把关系搞得太紧张。

于 是我向他点了点头，算是原谅他。他马上跑了出去，说是要为我买些食物来。房间里只剩下我和阿才两个人。对于这个人，我是根本对他无话可说的；刚才骂了他一 顿，我都后悔失了身份。阿才不声不响地递给我一迭美金，我看了一眼，他马上笑着说：「这是两千美元，你先拿去看病，不够的话我再给你。」我对他说：「我这 大半辈子是清清白白地过来的，我会接受这个脏钱？」他又说：「这就算是我向你赔礼道歉吧，不管脏不脏，反正是我的一点意思。我知道你看不起

我，但是我还得 求你帮我……。」我问他要我帮什么，且说：「你的事我是帮不上了的，你最好去求阿仁帮你。」他停一下，继续说：「我听说你在广州待了一段时间，你能不能对 加拿大移民局说你曾在我的家里住了几天？」我问他为什么，他马上说：「我就可以告诉移民局，后来大陆警方发现了要抓我，所以我只好逃走了。」我听了他的话 差点没笑出来，这种极端自私自利的犯罪分子竟然也想给自己弄个政治上的理由，去强求一个民主国家的保护。我问他：「你是为什么让我住在你家里？」这一次他 结巴了，又说出不少根本不成为理由的理由。

我一直在忍着笑听着，并不断地摇着头。最后他说：「因为我恨共产党，所以要帮助搞民主运动的人。」我马上说：「你是没有理由去恨共产党的，只有在共产党的那种制度下，你才可以贪污到一大笔钱，而且足够你下半辈子享受的了，你应该感谢共产党才对。」他不说话了。

我 去洗澡。热水使我的心情平静了下来。走出卫生间，看到阿亮和阿才正在低声说着什么，阿亮看到我马上对我说，他只买来了一些甜点和牛奶，因为太晚，商店都关 门了。我在医院已经吃过饭了。由于刚才的激动和说话太多感到口渴，我打开了那个纸盒包装的牛奶喝了两口，并把医生给我的药吃了。阿亮这时才问我得的是什么 病，医生又是怎么说的。我把医生写的字条拿给他看，又指了指字条的后面，凡是我能翻译出来的话，我都写在那里。他马上表示明天陪我去医院检查和打针。然后 又说：「看病是很贵的，阿才给你的钱，你应该拿着。他刚才对我说了，他应该对你的病负责，他愿意负担一切开支，直到你好了为止。他也说了他觉得对不住你， 希望你原谅他。他的处境并不比你好，他确实需要你的帮助的。你正在生病，先不谈这些。过两天你好了，你再好好考虑一下。」

这 时阿才说话了，他对我说：「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骂我，我都不在乎，可你也替我想想，到了加拿大海关，你可以进去，我进不去，又回不去，我怎么办？我没有 其它地方可以去了。我父母去世早，我十几岁就开始自己养自己，吃了很多苦，后来遇到我老婆，我们已经生活在一起十几年，我儿子都十几岁了，他们就是我唯一 的亲人，我和他们已经几年没见面了。我弄的这笔钱是不对，可哪一个共产党的官不贪污不要钱？！难道只许他们弄钱不许我们老百姓弄钱？况且我也不是为我自 己，我弄到的这笔钱也是为了我老婆和儿子。他们也苦，去加拿大几年了，不会英语，只能在中国饭馆打工，挣得少，根本不够生活。我只求你帮我这个忙，你要多少钱或者任何要求，我都答应你。你只要多说这几句话，我们一家人就团聚了，否则这个世界再大，你说我又能到哪儿去？」他露出很委屈的样子，又似乎是要哭，而且反反复覆地把这番话又重复了几遍，终于安静了。

我 对阿亮笑了笑，听了他这番话，他不但很苦，而且还很有理。阿亮马上笑着说：「是呀！是呀！共产党很坏很坏的。」我躺到床上。感到疲乏而且睡意已经很浓。我 说：「我父亲今年六十八岁了，仍然在工作。他也是官，可他不贪污。我也工作快二十年了，我也是官，可我也不贪污。为了反贪污，前年的六月四号，多少人被打 死在天安门广场上，到现在又有多少人仍然在监狱里。说起苦来，共产党的这四十多年来，所有中国人都苦，又有几个家庭在历次运动中没死过人？提起共产党大家 都说不好，那就推翻它，又为什么留着？我不理解也不明白中国人怎么变得这么复杂了，好坏是非总还要有个原则吧？见到钱连命都不要了，拿到钱又什么都想起来 了。」我也不知道我还说了些什么，就这样睡去。

第 二天，这两个人对我态度完全不同。我刚起床，两个人也马上跳了起来；我正洗脸，阿才就告诉我出租车已经停在外面等了。两个人一起陪我去医院，又是检查，又 是打针，费去了很长时间，最后坐在医生的办公室里。看来医生不是很忙，他打开了我的字典，一边翻着指着一个一个单词，一边又教我发音。我明白了，我的病已 经好了，不需要再来检查了，但仍要每天打两针，并连打四天。让我不要忘记吃药，多喝水，尽量多吃东西，几天后就会完全恢复。我懂了，对他笑，他对我也笑 了。我又把事先准备好的话，用英语去问他：「我还要向你付多少钱？」他又笑了，向我摇摇手送我出去。等在外面的这两个人马上又过份殷勤小心地搀扶着我走出医院，又叫车回旅店，我被他们弄得有些不好意思。

中 午以前，阿仁打电话来，两个人在电话上足足说了有十分钟，最后阿亮把电话给了我。阿仁在电话里对我至少道歉了三次，又是许愿又是保证又问我有什么要求，我 一直没说话，最后才对他说我的病几天就全好了，请他安排路程，我希望尽快到加拿大。他马上做了几个保证，让我好好养病，电话就挂断了。以后的整整四天，这 两个人每天都雇车陪我去打针，又雇车送我回来，可以说殷勤小心，周到细致地伺候着我，我简直是受宠若惊。阿才的表现更甚，我知道他仍不死心，但我不给他启 齿的机会。

由于身体虚弱还不能出去走动，躺在旅店中正无聊，突然想起了曼谷的张先生，我计算好了时差，正好在他睡醒觉和吃晚餐之前的那段时间给他打去了电话。我没弄错，接电话的正是他。他很吃惊，但又很高兴我给他打电话。几句简短的交谈后，我问他是否已把那个女人买出来，这一下就把他的那些抱怨的话都招惹出来了。

他一点儿不客气地抱怨我给他找了个大麻烦，他足足用了三天的时间才把那个女人买出来，那个老板一开始死活不卖，后来又开了天价，当然了张先生可不傻，终于在第三天的下午讲定六千块钱，一手交钱一手领人。领出来后，这女人告诉

张先生她没地方可去，她有丈夫，就是她丈夫把她四千五百块钱卖给了这个老板的，所以她不敢回丈夫家，怕又被卖了。而且她在曼谷也没有亲友，她的老家是在北部山区，十年前她就是被她父亲卖给她丈夫的，所以她也不敢回老家，怕她父亲又卖她或逼她嫁人。这女人一开始以为是张先生买她，直到张先生带她去四面佛前拜谢以后，张先生才告诉她是我托他办的这件事，并对这女人说她自由了。这女人马上抓住张先生不放，求张先生带她找我。张先生对我说：「她跪在地上哭着，非让我带她找你，围了一大群人在看着，你说我怎么办？我把她拉进车里，对她说你在两天前被一辆汽车撞死了，因为我和你是朋友，听你提到过她，所以我是遵照你的遗愿才买她出来的。」

听 了他的话，真是让我哭笑不得。对他说：「你说我什么不行，非把我给说死了，怪不得我又病了。」他在电话里哈哈大笑着说：「你给我找足了麻烦了，为了这点事 整跑了三天，我正在一肚子气上，干脆告诉她你已经死了，也省得她再逼我。你说，我不怎么说又怎么说？我带她上哪儿找你去？你也算没看错人，她为你的死整整 哭了两天，头上还为你戴上了孝，你没白花钱，不冤。」我对他说：「这玩笑开的太大了，我是一片好意，想让她高兴，结果让你这么一句把她搞得这么伤心。」

电 话里又传来他的笑声，他对我说：「你还敢抱怨我？你替我想想，她又没地方去，总不能扔在街上不管她吧，我把她带到我的那座小楼房瑞安顿下来了。昨天我去看 她，她的情绪好一点了，我让她以后给那些人做饭，每月我付她些工资。你是好意，可给了我多少麻烦。现在你告诉我这女人是你的，你要是想要就快点回来，别让 她一等多少年，你要是不想要，我就要了。」我马上大声对他说：「不行，你不许碰她，否则你可就是在佛前犯了罪了，让她在你那里干一段时间，以后有合适的让 她结婚吧。」他又哈哈大笑着说：「慌什么？朋友妻不可欺，如果你喜欢她，我可以再把你说活了，让她等着你。你到加拿大后，一切安顿好了，就来一趟，我也挺 想你的。」

张先 生是个好人。尽管他说我被汽车撞死了，但这件事他办得很好，也确实给他麻烦不少。我真心的感激了他，并请求他一定要给那个女人自由，最后又开玩笑地告诉 他，不必再费心把我说活了，短期内我是不会回去的。我终于又恢复了，每天起来得很早，起来后就出去一直到晚上才回旅店。这两个人则是要睡到中午或下午，晚 饭前出去，半夜才回来时我早已睡了。

我几乎走遍了这个城市。正是深秋季节，黄红色的树叶给这座中世纪的城市更是增添了色彩。我走着跑着，一边锻炼身体，一边翻看着字典学英语，许多的人坐

在不同的地方画画，我有时就蹲在旁边看。遇到讲英语的人，我也不管人家嫌不嫌烦，马上就与人家说话。

有的人朝我翻了翻眼睛就走了，但大多数的人都很和气地与我对话，教我几个单词或一句简单的话。尤其遇上老年人，他们可以高兴地教我一个小时的英文。我真是很羡慕这里的人，他们都是讲法语的，但英语讲起来也是那么的好，据说许多人还可以讲德语。

这 个城市的商业区是我每天都要去的地方。每次去都是坐在不同的地方，为的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这一幅幅活生生的图画。我吃着各种各样的面包和奶酪，很快就习 惯了。我喜欢不同的文化，也喜欢不同的食物。这一期间，我越来越惊奇地发现，西方国家不仅完整地保留和继承了他们的这些曾令世界震惊和赞美的文化和艺术， 而且又在迅速地发展着现代的科学技术与文明，在传统与现代这两个方面相互协调，各不打扰。赞叹之余，想到了中国大陆，我又伤心了。五千年的灿烂的文明，博 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已被共产党破坏得荡然无存，道德与传统也被共产党批判得体无完肤，而他们提出的现代化也仅仅只是一个口号而已。市场上到处充斥着日本人 的商品，街头和电视里整天看到的是劣质的广告，农业从来就没有得到发展，工业则正在走向崩溃，科技人员又纷纷逃往海外。共产党整天在嚎叫着要赶上和超过西 方的工业强国，开什么玩笑？这一次我是亲眼看到了工业强国是个什么样子。共产党马上滚蛋，中国立即实行民主，一百年后，中国赶上西方强国是有希望，否则这 个距离只会越来越大。

这 一天，我在太阳落山前就往旅店走去了。几天来，阿才每天都给我留条子，让我与他们共进晚餐。我知道，他还是为了那件事要求我，所以我一直也没有给他机会。 这天的早上，又是一张条子，是阿亮写的，仍是邀请我和他们吃晚饭；并说晚饭后阿才安排了精彩节目，要我务必给他个面子，不要太拒人于千里之外。自从上次我 的那场发作后，阿亮对我的态度是彻底转变了。实际上，他仍是站在阿才一边的，我一直以为只有女人才可以被钱买来卖去的，没想到阿亮这个自称是受过高等教育 的人也可以被阿才这么一个不学无术、身高不足一米五的人收买了。他整天和阿才在一起，寸步不离，还不就是为了阿才口袋里的那些美金？不要太拒人于千里之外这句话也没错，同时我也是为了见识看看那个精彩节目。

当 他们看到我时都显得很高兴。阿才马上告诉我，他们来到这里的第二天就发现了一家中国餐馆，这些天来，他们天天在那里吃饭，据他说有几个菜还是不错的，希望 我和他们一起去尝尝。他又说了两遍他请客，阿亮也在一边帮腔，两个人迫不及待地等我洗完了澡，便带我去了那家饭馆。饭馆确实不算小，据他们讲这是这个国家 唯一一家中国饭馆。我们进去后，经理、老板、侍者们都与他

们两个人打招呼，说笑着。阿才并不看菜单，就对侍者点了不少的菜，侍者们又向我介绍他们刚从中国 运到一批白酒，这倒使我很高兴，便要了一杯。

这时，三个大约二、三十岁的中国女人进了饭馆，而且直接走到我们的餐桌来。阿才马上笑着站起来向我介绍说这三位小姐都是大陆政府派出来在这里的中国银行工作的，说完又把一位小姐推到我身边，我只好向她点点头，并请她坐下。我有些不太高兴地看着阿才。

侍 者端上了菜，阿才忙着给大家分菜，没有看到我正在瞪着他看。对于这些被政府派出来工作的人，我是很警惕的。这些人在派出来之前都要受到两、三个月的训练， 而且不少人还带有特殊任务的，这是我第一个不愿意与这种人打交道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当这些人工作一年期满回去后，马上就不再平等看待自己的同胞。在大 陆能出国是个特权，这些人自以为高人一等，带回几个外国钱、几件外国买回来的东西，整天炫耀，神气得不得了。我不明白阿才为什么要邀请她们来，我又不好 问，所以我也不说话，只是吃着喝着。可是这位坐在我旁边的小姐却不断地和我说话，我也不知道阿才是对她怎么说的。几个女人一再问我在香港的公司是做什么生意的，生意好不好，座落在香港什么地方。我无法回答，又不能对她们说实话，所以我又看着阿才。阿亮马上替我回答起来。

我 站起来要阿才同我一起到卫生间去，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笑嘻嘻地对我说，他付了每个女人六百美元，晚饭后女人陪我们睡觉，房间他已定好了。我对他说： 「我的病刚好，是不能做这种事的。」他马上抓住我的胳膊说：「这算是我对你的赔礼道歉，请一定接受。人都来了，你可不要让我下不来台呀。」我没说话，只点 了一下头，他马上高兴了。饭后，我并没有带这个女人去阿才为我们订的房间，而是带她去了一家酒吧。坐下，然后我第一句话就问她：「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要做 这个？」她的脸马上红了，低下头去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我又问她干了多少次了，每次收多少钱。她似乎有点

慌， 抬起头看着我，问我：「你是干什么的？你不像个商人，你是不是也是大陆政府派出来的？」我看着她的眼睛，很严肃地说：「现在是我在问妳，妳回答我的问题， 我不问妳的名字，也不打算让妳有麻烦。」她害怕了，又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儿，她小声对我说：「被派出国工作的人苦呀，一个月的额外津贴才合不到二十美元。 出来工作了一年，家里的人和亲戚们都盼着我们能从国外给他们买点东西回去，可积存了一年也不过两百多美元，我还有两个月就该回国了，所以才跟她们出来干这 事，已经有五、六次了，每次都是一百美元，有时还有点小费。我都告诉你了，你不会去汇报吧？」

我 没有回答他，又接着问：「那位叫阿才的人为什么给你们两百块钱呢？」她说：「两天前，阿才就告诉我，让我帮助他和你做一个协议，只要你帮他做一件事，他愿 意付给你五千美元，另外给我五百美元。他没告诉我是什么事，他只是说，我一提这件事，你准知道。」我点了点头，又问她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中共党员？」她 犹豫了一下，小声回答：「是。派出国的人都必须是党员。」我最后问她的问题是：「阿才说要给妳的两百美元，拿到了没有？」她点了点头。至此，我已知道了我 想要知道的，所以我对她说：「我不需要妳陪我上床，妳可以走了。」

她 一愣，看着我问：「你是什么人？你是不是不喜欢我？」这时我才对她笑了一下，说：「我是什么人对妳不重要。我已经说了我不问妳的名字，也不让妳有麻烦，我 说到做到。至于喜欢或者不喜欢，根本不是个问题，反正钱妳已经拿到了，妳没有损失。我不会和阿才搞什么协议，所以妳也得不到那五百美元。我觉得我已经说明 白了，妳可以走了。」这女人什么话也没再说，站起来匆匆忙忙地跑了出去，酒吧里的人直看我。

第 二天，我又一早出去锻炼、学习，直到下午，估计这两个人该起床了，我开始走回旅店。我考虑我必须和阿才认真地谈一谈，否则他不知又搞出什么新花样来。果 然，两个人刚起床不久。我没等他们问我昨晚的艳事，直截了当地告诉阿才，我让那个女人走了，没和她上床。然后不等他问我，我就对他说：「我明白，你仍想让 我帮你造假，我觉得应该和你谈谈这件事。首先，你想买我的故事，但是我确实不知道我的故事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怎么去开始，我可以坐在这给你讲上两天， 你也不用花钱买，因为我知道肯定对你没用。另外我也并不像你想的那么重要，所以也不可能因为在你家住了几天被员警发现后，于是你就受到了通缉。因为我并不 是政府公开通缉的人，所以即使我同意你的办法告诉移民局我曾在你家住过，这对你也构不成一条充足的理由的。」

我 说到这里，阿才脸上露出了明显的失望神色，并且像是要说什么的样子。我停了一下，他没有说出来，所以我又继续说：「政治上的事情是十分复杂的，其实我也不 懂政治，我只是个搞研究、写文章的人。我可以告诉你实话，至今连我自己都搞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落到这个结局，我没有去过天安门广场，也没有参加绝食或者游 行，更没喊过口号、贴标语反对共产党，我所能勉强想起来的事也不过就是在官场上与上司和同僚在一些事情上的看法不同而已，这就是我刚说的政治上的事情复 杂。一件事情的发生并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说明白的，许多事情，即使我现在就开始讲给你听，你也是不会明白，因为有些事连我也不明白。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把你 和我硬联系在一起的话，我相信你是在为自己找麻烦，我虽然不懂移民局的事情，仅凭我的猜想，他们是不会光听你一说就马上相信你的。尤其牵扯到政治保护，他 们也应该了解你的家庭、社会背景，你的文化教

育程度，你的政治观点、文章、著作等等。我帮了你，就等于害了你，一旦他们询问你这些问题时，你是一定会栽跟 头的，这些事你是应该认真考虑的。」

阿亮一直在听着，也不断地点头。阿才可能也是想不出反驳我的理由，所以他也没说话，但他变得忧虑。

我 洗完澡出来，阿才似乎是有主意了似的，对我说：「这样吧，你把你的事情大概讲一些出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把我加在你接触的人里面，你看好不好？」我笑了。 对他说：「刚才我已经说了，我自己都搞不清，你让我怎么给你讲？至于我接触的人，我可以告诉你，在我没出事以前，我接触的人都是研究员、工程师、教授和专 家们，还有就是国家十三级以上的官员和办公室的文员、秘书们，你想让我把你夹在哪里都可以，问题是你应付不了就一定栽跟头。至于现在我接触的人就是你和阿 亮，也可以加上阿仁和古叔。你告诉我把你夹在哪里合适？」

我 刚说完，阿亮笑了，我也笑了。阿才没听出来我最后这句话的意思，他马上又说：「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就说你在我家住了两天。其它的就不要你管，我自己有办法 去对付。你就去对海关的人说这么一句话。要多少钱，我付给你。」我马上恼火了，板起了脸对他说：「我在广州总共四个月，三个月在监狱，一个月在患病，你告 诉我，你认为什么时候我到你家去住合适？」阿亮马上站了起来，说：「好了，好了，今天就谈到这里，不谈了，都去吃饭，我请客。」他们吃饭去，我没有去，我 已经为自己买了面包、香肠，一纸盒牛奶及一块小小的甜点，我一边享受着食物，一边看电视。就在这天的晚上，我

收到了阿仁用 DHL 快 递服务寄来的三张比利时经波士顿直飞加拿大多伦多的

飞机票，时间是后天的上午。信封中并附有阿仁写给阿亮的一封短信，要阿亮明天去买三张后天一早从卢森堡 飞比利时的机票。现在我也有了一些常识，阿仁的这个安排我也明白，从这里上飞机是只查票不看护照，到了比利时机场后，不必进关，只要在机场等候一个小时左 右就可登上飞多伦多的飞机，又是只查票不看护照。途中停波士顿，阿亮下飞机，飞机再起飞就直达多伦多。我有些激动，马上跑了出去，到那家中国饭馆去找他 们，把三张票和短信给了阿亮。我们一起回到了旅店。阿亮要我明天和他一块去买飞机票，所以我 正在查字典。阿亮一定是在向阿才讲解这个安排，过一会儿，我就听到阿才高声地在抱怨，又大骂阿仁黑心，贪污了他的钱。我觉得好笑，放下字典，听他在说什 么。他首先抱怨阿仁没让阿亮把他送到温哥华去，骂阿仁为了这么个安排就向他多要走一万美元；又说在卢森堡这十天中，他又花出六千多美元。阿亮还在对他解释 着什么，可阿才不听，声音越来越高地骂着，又要给阿仁打电话让阿仁重新安排。

阿 亮拦住了他。看得出来，阿亮对于这个安排是无所谓的。他已经出来半个月了，当然也有点急于回家了。阿才着急的是到了多伦多后，他又如何从那里去温哥华。我 始终记着在我离开香港之前，古叔很郑重地告诫我的一句话：「我想办法送你去多伦多，你千万不要去温哥华。那里的华人太多了，不利于你掌握英语进入主流社 会，你千万记住，如果你掉进华人的圈子，你可就一辈子也出不来。」阿仁的这个安排看起来仍然是古叔的意思。现在我担心的是如果阿才这么一闹，或者又多给阿 仁钱，阿仁同意再重做安排的话，那就不知道又要等多少天了。现在我必须和阿亮站在一起，按照这个安排进行。

所 以，我对阿才说：「其实这也要怪你了，你几次要求阿仁把你送到加拿大去，并没有说送到哪个城市去，你的问题仍然是个能不能进入加拿大的问题。如果在多伦多 你能进关，那么去温哥华就根本不是个问题，如果在多伦多你进不了关，那么就是把你送到温哥华去，你也同样进不了关的，我认为这个才是你现在应该着急的 事。」阿才不说话了。阿亮马上表示：「对，对。我们做的事就是把你送到你要去的国家，至于你能不能进去或者去哪个城市，那就不是我们的事情了。」阿才仍没 说话。我又开始查字典了，可能是阿才给了阿亮个手势，两个人站起来走出去。我大声对阿亮说：「明早我叫你，我们去买飞机票。」他在门外说：「一定，一 定。」

隔 天一早我叫醒了阿亮，拉着他出来和我一起散步，又指给他看这里的建筑风格，带他去看那些雕塑品，又拉他和我一起跑步。来了十天了，他还是第一次真正出来走 走，看到这些不一样的东西。我把我的一些看法讲给他听，又在几个街头画家旁边看他们选景的角度，并去了我每天都去的公园里的几条长椅那里，与那些老人们问 候，聊天学英语。阿亮似乎才开始了解到西方文化的魅力，又对我的生活习惯感到新奇。他兴趣十足地跟着我到处地走着、跑着，最后来到了商业区。

由 于时间仍早，我们进了一家咖啡店坐下。看来这一早晨三个小时的活动对他很有感受的，他开始结结巴巴地讲着普通话，向我表达着他的这种新感觉。我一直是笑着 听着他讲着。我的计划是今天拉他跟我出来一天，不让他与阿才接触。阿才肯定会给阿仁打电话的，所以也不让他接电话。晚上我们再回旅店，阿才再有什么计划也 太晚。

因 为明天一早又要早起赶这班飞机，我们必须在上午九点钟以前到达比利时机场，否则就误了那班飞多伦多的班机了。从目前来看，实行我今天的计划应该问

题不大。 阿亮兴趣十足，而且他似乎是刚开始了解我，很愿意和我接触。旅行社开门了，在我们买机票时，他仍然是站在我后面一句话不说，任由我结结巴巴地与那位小姐打交道。至此我不怪他了。买好机票出来，把商业区的商店一家一家的都跑遍了。

中午我又请他去了一家我已去了几次的饭馆，请他吃了几种不同的面包和奶酪；他高兴了，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吃西方的饭。

快 傍晚的时候，我们都玩累了，坐在街边的一个露天咖啡店休息。阿亮开始向我讲起了阿才，说这个人刚捡回命就又心疼钱了。昨天夜里他和阿才在一起，听阿才说了 大半夜的话。他也才知道阿才向阿仁另外付了三万美元，求阿仁派人去曼谷取出那个装钱的提包送到温哥华去。几天前阿才给他老婆打电话，他老婆已经收到那个提 包了。他还告诉我，阿才为了偷渡，这次额外付的钱、在卢森堡的开支加上送提包的三万块钱，总共支出了八万多美元。我吓了一跳，这笔钱折合六十多万人民币 呀。我问他知不知道阿才一共贪污了多少钱，他摇摇头说阿才从不提这笔钱有多少，可是说过几次他要在温哥华海边买一座房子、两部汽车，还要开一间中国饭馆。从他的这个计划上，估计也至少弄了有四、五百万人民币。「你不要小看他了，他要才没才，只上过小学四年级；要貌没貌，买衣服都是去童装店买的，偏偏这种人发了大财，老天也真是不公道。」阿亮说。

我 看着他唉声叹气的样子笑了，又问他：「阿才付你了多少钱，你才同意带他和我一块走的？」他愣了一下，马上叹着气说：「我若是早知道他在路上会搞出这么多的 麻烦，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带他的。阿仁现在也知道我收了阿才的钱，我回去后还不知道阿仁会对我怎么样呢。不提了，是我把事情搞糟了。」我本来想挖苦他几 句，看到他这个样子，我便不好说什么了。我望着夕阳的余晖，欣赏着四周的景致。阿亮对我说：「阿才还是没有个正当理由可以说服移民局，他仍把希望放在你的 身上；可自从你那晚对他说了那一番话以后，我也劝他自己想办法，像他这种人一旦陷入政治问题，不要说他应付不了，移民局也不会相信的。这几天我就一直觉得 老天不公，就像你吃苦受罪一场，才应该有那笔钱，到了加拿大好好地享受生活，报答一下自己，可老天偏偏让阿才这种人发财，你说是不是不公？」

我 又笑了，对他说：「这你就把我看错了，即使那笔钱放在我面前，我也不会去碰一下。另外，我还从来没想享受生活，我遇到不少的人都说我与众不同，我也承认我 与别人不同，我的这个不同就是至少我还有那么一点忧国忧民的心。你不要以为我到了加拿大后，就会和其它人一样去挣钱买房买车的。三种情况下我会立即回去 的，第一种是大陆出现了地下武装力量与共产党作战，我会马上回去参加的；第二，中共如果像苏共一样自动倒台解散，我马上回去帮助新政府工作；最后一种情况 是如果小日本再次侵华，我也要马上回去痛揍小日本。这

就是那天我骂阿才的话，我身上有的东西，他是一点也没有。不提阿才了，我恐怕你也不会去做的。」

他 听了我最后这句话后笑了，并点了点头，表示他确实也不会。他提议回旅店找一下阿才一块吃晚饭，我摇摇头，又问他为什么，他笑着说：「你是与别的人不同，但 是我也和你不同，我还是要去吃中国饭的，而且阿才必须负责这最后一顿饭的，交易就是交易。我也要你和我一起去，因为明天这个时间，你就已经在加拿大，无论 如何也值得庆祝一下。」说完，他就拉我起来往回走。庆祝一下还是应该的，而且我也不想破坏今天一天好不容易才在我和他之间建立起的那么一点的好感。

在 往回走的路上，阿亮很是关心地对我说：「加拿大现在经济不大好，找工作比较难，你也四十岁了，又是两手空空，学习语言上须要时间，我都为你发愁，面对这么 多的困难，你可怎么办？我想劝劝你，考虑一下就帮阿才说那么几句话，他愿意付你四千到五千美元，至少几个月之内不挨饿的。……」我看了他一眼，问他：「你 到底懂不懂做人的原则……」他笑着摆手打断了我说：「好了，好了，我们不谈这个，不要破坏晚饭的气氛。」回到旅店，阿才正无精打采地看电视；见到我们回来 了，抱怨我们为什么出去一整天不回来。又说他给阿仁打了电话，阿仁不同意更改安排，于是又开始骂起阿仁来。我进卫生间无洗澡，让他向阿亮去诉苦吧。阿亮的 兴致仍很高，敲了两次卫生间的门，催我快洗。

在 去那家中国饭馆的路上，阿才仍在对我们抱怨着，阿亮冲着我笑了笑，对阿才大声说：「你住嘴吧，明天你就到了加拿大享福了，还抱怨什么？你好好请我们吃顿 饭，回旅店后把账结算清，明天一早你再付一个出租车钱，你和阿仁的交易就终止了，也不再要你花钱了。」阿才不说话了。晚饭时，阿亮是这三个人中兴致最好 的。他一点儿不客气地点了几个最好最贵的菜，又在说笑之中不断地拿阿才开玩笑，一反过去他对阿才的那种殷勤小心、唯命是从的态度；又在阿才去卫生间时，把 我喝的中国白酒掺进了阿才的啤酒里，结果让阿才喝醉，阿亮笑着对我说：「今晚我可以睡个好觉了。」

这 是一架只可以乘坐十个人的小飞机，在云与雾中钻来钻去。天气很好，早晨的阳光照得眼睛睁不开。我的心情好极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将在下午五点钟到达多 伦多。在比利时机场转机也是出奇地顺利。我们坐在一架巨大的七三七客机里，我完全放心了，心情好得只想唱唱歌，但我从没有唱过。

阿 才心事重重，闭着眼睛一直在打盹。阿亮的心情也好，一路上和我不停地说着话，在快要到达波士顿的时候，我握住他的手，向他表示了真诚的感激。他不好意思 了，我马上对他说：「我们都在学新东西，你的这次任务虽然遇到了很多的意外，但最后总算是一切圆满，比我强多了。古叔已经两次对我说我真是『多灾多难』， 我也承认我确实是。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在一起快半个月，无论发生了什么，我最终还是很感激你的护送。」他似乎有些感动，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下飞 机后，还向我们不断挥着手。

飞 机又起飞了，机上只剩几十个乘客，绝大部分的座位都空了出来。阿才突然紧张地抓住我的胳膊问我究竟帮不帮他？说着从他的提包中拿出一迭美金往我上衣口袋里 塞。我挡住了口袋，对他说：「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我如果帮你，那是害你。」他看着我半天，又说：「我不管，我就对他们这么说，而且从现在起，我一步 也不离开你。」我笑了，再也没有和他多说什么，只是翻看着我那本字典。

第四十七章　现在你可以入境了

飞机降落了。那一天是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五 点钟，我来到了加拿大。算了算，从广州启程的那一天起，整整的五十九天的旅程结束了。我大步地走向加拿大海关，用英语向一位海关人员提出了政治保护的要 求。在一位翻译的帮助下，我与一位年轻的移民官进行了大约二十分钟的谈话，然后我被要求等待，一位高级移民官要见我。从书里我知道加拿大是极讲究礼貌而且 相当文明的地方，我绝没想到我会受到一位高级官员的接见。所以我赶快去卫生间想把自己的外表整理一下。

我打开了旅行包，才知道我是没有衣服可换的。旅行包里只有一件干净的衬衫，一双袜子，一本字典，一条毛巾，一把牙刷和一个杯子，这就是我的全部东西，我所能做的就是洗了脸，换件衬衫，重新打一遍领带，用手整理了一下头发，最后擦干净鞋。

我 走出卫生间，在走过刚才那位年轻的移民官接见我的办公室时，看到阿才坐在那里的背影，正在对翻译说：「他是北京的一个什么研究所里的大官，政府正在抓他， 他跑来广州，没有地方住，我就让他住在我家里，并且想办法保护他……，警察发现了，后来出事……我帮他想办法外逃，我也不能回家了……政府通缉我，没办法 了，只好和他一起逃出来……我实在不清楚他是怎么回事……」我走开了，坐到远离这个办公室的一张椅子上，心里感叹着，现在的这一刻对于我来说，是正式地结 束在中国大陆 41 年来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从此以后，我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说我心里想说的话，再也不必去说假话、说违心的话或者我不愿意说的话了。而这位阿才正相反，在中国他在骗，来到这里他还是要骗。我替他发愁，他今后的生活会很累的，而且会是人不人鬼不鬼无法真实地活着。我恐怕他今生今世在这个世界上是永远要讲假话，而且也不会再找到一个可以说实话、挺起胸膛做人的地方，这确实是太悲惨了。

高 级移民官是一位相貌很体面的人，个子和我差不多高，他很热情地和我握过手后，便请我坐下。他很礼貌但却是很能击中要害地提出了几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我并没 有只是简单地回答问题，这时的我就像是一种终于回到了家、可以松口气了的感觉，正巴不得向什么人倾吐我所经历的一切艰难困苦。通过翻译的帮助，我向他们述 说了我所遭遇的一切，又讲到了香港警方的搜查，偷回广州后的入狱、患病，以及这整整 59 天 旅途中发生的一切。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高级移民官除了偶尔问了几个问题外，一直是我在说着，不停地说着，终于我说完了，我激动得半天平静不下来。他 们为我拿来了一杯咖啡，我喝着咖啡，尽力地使自己平静。高级移民官看我情绪激动，对我笑了笑，并有意地使接见暂时停顿一下，与那个翻译像是在谈着一个轻松 的话题。大约一分钟左右，翻译对我说：「高级移民官先生要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能如实的回答。」我马上点了点头。

第 一个问题他问我的是：「你是不是中共的党员？」我马上回答：「是的，我最后的党内职务是研究所党委第一副书记。」第二个问题是：「你是不是中国政府的官 员？」我也毫不犹豫地对他说：「是的，在军队接管之前，我是这个研究所的副所长，并代行所长职务。军队接管后我仍是这个研究所的副所长，代行所长职务，由 于军管所以多了一个上校军衔，但是我从没穿过发给我的那套军服。」最后的问题是：「你在中国大陆一共上了多少年的学？」我计算了一下后回答：「十七年，我 是学历史和社会学的，五年前成为历史学副教授。」我回答了后，他站了起来，隔着办公桌与我握手，并通过翻译告诉我：「加拿大欢迎你，希望你生活在这里能感到愉快。」

我 放心了。在回答了他的前两个问题后，我以为我会被拒绝入境的，没想到他对我表示欢迎。我又一次地激动了。他用了大约一分钟的时间，向我讲解了移民的程序 后，我们都站了起来，他送我到办公室的门口，再次与我握手道别；我感动了，加拿大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那么的友好和亲切，我是不会忘记的。秘书小姐把几件档案 交给了我以后，翻译对我讲：「现在你可以入境了。」我被接受了，可以大大方方地入境了！从此结束了一年零五个月的逃亡生活，从此以后再不需要躲躲藏藏的， 再也不必担心被抓住受折磨进监狱了。尽管这里的一切对我是那么的陌生，伴随着我的只有一个空空的旅行袋，但是我还活着，我终于活着来到了加拿大。

走出机场大楼，看着满天的星光与远处地面上的灯光连接成了一片。夜晚的空气是那么的清凉，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禁打了几个寒颤。「明天，应该去买一件过冬的外衣。」我对自己说。